列寧工作室■精選文庫

蘇聯歷史檔案系列

蘇共野史

【蘇】阿·阿夫托爾漢諾夫 著



К·МАРКС ГЕЛЬС·
РЕВОЛЮЦИЯ·ВИХР ИЙ НАЗАД
ВСЕХ ЕМ ЩИХСЯ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苏共野史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苏 共 野 史

（原书名：党治制的由来）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
晨 曦、李荫寰、关 益译

上 卷

中央委员会与列 宁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苏共野史

（原书名：党治制的由来）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
晨　曦、李荫寰、关　益译

下　卷

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苏共野史

上、下卷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

晨曦、李荫寰、关益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8.25印张 571,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400

统一书号 3106·642 定价：3.23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内 容 提 要

晨 曦

本书作者阿夫托尔汉诺夫，系苏联高加索车臣族人，早年加入联共（布）党，三十年代曾在联共（布）党中央工作，任中央督导员。1937年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同年被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入狱，直到1942年才获释。1943年流亡西方，获博士学位，就任俄国史教授。

阿夫托尔汉诺夫被捕之前曾在苏联出版过六部书，主要涉及车臣族和高加索历史，到国外后发表大约十本著作，长期以来，以“克里姆林宫学专家”而蜚声西方世界。他所著的《权力学》、《斯大林死之谜》、《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弱点》等书均已在我国翻译出版。

《苏共野史》（原书名：《党治制的由来》）是作者积多年研究和讲学成果的大作，是他所有关于苏共历史的著作中叙述最详、篇幅最长的一部，全书六十三万字，被西方视为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

该书详细叙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联共（布）前身，第一次代表大会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全部活动，着重介绍了党中央委员会内各个派别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介绍了党内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广泛活动。书中还收录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等所通过的决议、决定和文件。

从全书内容看，作者博览了相当多的书籍、文件、材料，仔细研究过自第一次代表大会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苏共党内的斗争。他在本书中引用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有的引自《列宁全集》，更多的是引自其他档案和各种回忆录。对于这些材料，特别是引自其他档案和各种回忆录的那部分材料，我们不了解，也无法核对。假设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真实的（非伪造的），而且是符合事实的，那么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本书内容提要如下：

本世纪初的俄国革命造就了崭新的政体形式——党治制，它是继君主制，贵族制（或寡头制）和民主制之后出现的第四种政体形式。它的特点是：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国家本身。党治制的形成史也就是列宁党中央的历史。

写作本书的宗旨不外有三：一、在不贬低列宁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恢复其真实作用的本来面目，揭示党中央内部冲突的实质。二、尽可能地揭露列宁继承者们权力斗争的戏剧性演变的内幕。三、揭示斯大林的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根源、历史演进和取得胜利的合理性。

在革命过程中，列宁要不断跟"老布尔什维克"的保守主义进行斗争，夺取政权后，又要同"左派幼稚病"进行斗争。在党中央内部的一切斗争中，列宁最终都是胜利者。然而，他执事不长，不得不躺在病榻上亲眼目睹他的战友和学生们为了争夺他的政治遗产——权力，怎样开始激烈的角逐。列宁以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预感到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将是他的党的掘墓人——斯大林。他的"政治遗嘱"和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就是这种先见之明的见证。作为革命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斯大林根本无法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媲美，作为权力大师，他比后两者加在一起还要远胜一筹。当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枪杀"人民的敌人"时，列宁对他的惨无

人道赞赏备至，而当斯大林把他的惨无人道的作法运用于党内斗争时，列宁不能不对他产生疑虑和警觉。随着列宁的“搞政治的布尔什维主义”同他本人一道作古，一个新的、“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时代便由斯大林开始了。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被敌人杀害的3人、自然死亡5人、因斯大林自杀的2人、失宠的3人、被斯大林枪毙的15人，第29人即唯一活着的一人便是斯大林。在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6名成员中，4人死在斯大林独裁之前，12人被斯大林杀害。国内战争的16位前线司令员中10人是被斯大林杀死的。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70%（98人）被斯大林杀害。

从1898年3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的纲领和建设问题，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夺取政权后，党中央接连出现两次危机。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政变”遇到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等三个方面的抵抗，这种情况导致党中央出现第一次危机。第二次危机是围绕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发生的。这段时期，正是托洛茨基的立场而非斯大林的立场决定了列宁制度和列宁本人的命运。当时党的机器是由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人的名字代表的，所以，在一票之差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以弃权的形式对列宁表示让步，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如任何政党一样，俄国共产党领导亦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列宁依靠机会主义者并同理想主义者一直进行斗争。在理想主义者中，列宁对托洛茨基尤其警惕。在旧《火星报》期间（1900—1903年），托洛茨基与列宁如此接近，以至被人称作“列宁的大棒”。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厕身于孟什维克之列，又于1904年同孟什维克分道扬镳而成为

“超派别社会民主主义者”。然而他继续同列宁进行斗争，称他为“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者的职业利用者”。列宁也并不示弱，给托洛茨基贴上了形形色色的侮辱性标签。但是，在俄国历史的决定性转折关头——1917年革命中——托洛茨基和列宁殊途同归了。他们正是在从二月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以党中央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全都起来反对列宁及其“四月提纲”。托洛茨基无条件地支持了列宁。从此，他们的合作开始了。这表现在，无论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进行中，还是在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一向是并驾齐驱的。

但是，出色的政论家、卓越的演说家和天才的革命大师托洛茨基毕竟是个不谙权力之道的人，这最终表现为他在同革命的粗工劣匠、然而却是天才的权力大师的斯大林的斗争中败北。在中央领导人中，列宁认为只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人是他的独裁的可能竞争对手。但列宁不恰当地把托洛茨基置于斯大林之上，所以，他首先同斯大林结盟反对托洛茨基。在九大的工会辩论中就是如此。在这场辩论中，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

十大的中心纲领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苏联至今在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不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而是因为斯大林取消了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组织上形成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核心。季诺维也夫是个没有理性的人、感情用事的人、走极端的人，权力欲是他生活的主旨。斯大林在十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一事是由谁倡议的呢？据托洛茨基1930年记载，这是季诺维也夫违背列宁的意志倡议的，但列宁容忍了。

列宁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成立苏维埃联盟的原则问题上，在对外贸易垄断法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分歧。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放心反映在他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和政治遗嘱中。这份遗嘱是写给十二大的，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帮”向十二大隐瞒了列宁遗嘱，目的是等列宁不能视事时向托洛茨基发难。因此，随着列宁溘然长逝，托洛茨基失宠是毫不奇怪的。斯大林欺骗了在南方疗养的托洛茨基，使他未能参加列宁的葬礼。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三大上搞掉了托洛茨基。十三大闭幕后，斯大林就开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论上的轻率”公开表示不满。果然，到十四大时，斯大林又利用布哈林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难。然而，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还是之后的布哈林分子，都不会走上革命的、用暴力消除斯大林机关专制的道路。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而斯大林则是共产主义的老爷。在他们的心目中，斯大林毕竟是共产主义者，虽然是有错误的共产主义者。而他们在斯大林心目中则是敌人，是斯大林一有机会就要杀头的敌人。现在轮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了，直到1927年十五大上他们被开除出中央。这样，为期四年之久的夺权斗争结束了。斯大林先是同托洛茨基“左倾反对派”（1923—1924）、然后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1925—1926)、又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斗争，并取得彻底胜利。但这并不是思想的胜利，而是机器的胜利，是斯大林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经过改装、更新和完善到了尽善尽美地步的党的巨大机器的胜利。

斯大林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左倾反对派”之后，开始推行取消新经济政策的计划，结果，又招致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反对派”。斯大林的新经济纲领是革列

宁新经济政策的命，主要是想把农村变为工业化的财政源泉。粮食的出路何在？布哈林提出，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按正常价格向农民市场投放更多的商品，制止一切“从左的方面取消新经济政策”的企图。而斯大林和米高扬主张实行强迫征粮制。正是1927年的斯大林—米高扬征购制在政治局里引起新的分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宣称，斯大林的新计划是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则宣布他们是党内的“右倾反对派”。

布哈林“右倾反对派”被粉碎之后，斯大林就成了党的独一无二的领袖。1929年斯大林五十寿辰的庆典只有罗马帝国的凯旋将军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堪与媲美。为了进一步巩固个人独裁，斯大林从十六大到十七大集中加强军队、警察和党机关的组织建设，并为此提出三条新理论：一、修改马、恩、列关于国家逐渐消亡的学说，提出国家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是它的最大加强（1933年1月全会）；二、阶级斗争要求不断清洗（十七大）；三、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就越发尖锐，即使在阶级对抗消亡之后还存在阶级斗争。这三条理论为斯大林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书是根据1973年西德出版的俄文原著翻译的。为了帮助阅读，译者和编者加了一些注释。对于作者的引文与我国流行的版本的引文出处不相符合的，我们保留了作者引文的原样，注明了“引文有出入”等字样。

一九八二年一月

目　　录

（上卷：中央委员会与列宁）

目　　录

（下卷：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

导　言

一　什么是党治制（ПаРтокРатия）？

早在亚里士多德①时代，人们就知晓三种主要统治形式，即专制、贵族（寡头）和民主统治形式。

最近两千五百年来的法学思想及国家体制的历史表明，在这方面并没有创造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新东西。直至本世纪初，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国家政权，才出现了迄今不被人们所了解的第四种新统治形式——共产主义党治制。如今这种统治形式主宰着三大洲的十四个国家，其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共产主义党治制是一种新的、独特的统治形式，但是它仍能体现出所有三种传统统治形式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的暴政便是专制，政治局专政便是寡头政治，苏维埃体制则是假民主。

1917年的二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民主（人民政权，即全民的政权），而八个月之后发生的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的却是党治制（党派掌权，即部分人掌权）。官方理论说，十月革命不是一党的革命，而是整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按着这种理论来看，十月革命仍属于少数人的革命，因为1917年俄罗斯工业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

“党治制”这一术语，笔者在最近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

①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译者注

(The Communist Partyapparatus,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68)①中首次使用。笔者认为，这一术语能更确切地表达列宁关于共产党专政的理论实质。那本书所探讨的是，党治制是如何发挥其职能的，本书主要分析党治制是如何产生的。

让我们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下国家和法学的历史。

自从人脱离了原始社会，变成——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动物”以后，他就经常琢磨建立一个理想的、有组织的人类社会，这便是国家（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固定的领土、居民，而且也包括统治形式）。如果我们只看有文字记载的西方文明的话，那末我们的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初有道，这道便是法律！”假若在我们文明史的摇篮时期没有一部刻在著名的《十二铜表》②上的古罗马法，那末人类的法学思想还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才能通过二世纪初卓越的古罗马法律创始者（盖·泽尔斯、尤利安、阿弗里坎、波姆波尼、巴巴尼安）达到历次立法活动的顶点——尤斯季尼安编纂的法典（纪元529—534年）！

无论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还是近代和现代的学者，在他们有关法学、法学和国家的哲学论文中，国家性质和国家统治形式问题总是占主要地位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而是西塞罗③，都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人的社会生活天性，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眷恋之情。在近代，由于产生了一些民族国家，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这些

① 《共产党组织》，1968年纽约世界出版公司出版。——译者注

② 古罗马法集，纪元前451—前450年间，由特别遴选编制十二铜表的立法者把它写在十二铜表上。——译者注

③ 西塞罗·马克·图里（纪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的杰出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理论却相反认为，国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是孤僻的、追求绝对自由、喜欢混乱。因此应当引导人习惯于相对的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只有人们根据自己的相互利益制定出的一定的秩序才能保证这一点，而国家便是这一秩序的最高体现。由此可见，国家是人的智慧的产物，是同为所欲为的自然法的自然状态（Naturzustand）相对立的。

国家乃是人们谈判的结果。“谈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布斯[①]论证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末日即是国家的开始，因为那时大家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利益都将放弃自己无限的权利。让·雅克·卢梭[②]不同意霍布斯的观点，他说，人在同其他人谈判达成协议时便失去了自然法律状态。人即便是同其他人联合起来，他仍是自由的。“自由是不能收归公有的。”——卢梭说。洛克[③]断言，人即使在自然状态中，也拥有同自由和财产概念有关的一系列权利，然而在此种状态中，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只有谈判才能调整和保障这些权力。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和法学家都强调权利的道德原理，其核心是对公共利益和正义的关切。亚里士多德说，国家能培植人的美德精神，而黑格尔也正是在道德完善方面引进了发展意志思想的最新因素。只有康德与自己的“绝对无上命令”的道德基础反其道而行之，看不到在组建国家过程中道德伦理动机会起什么作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作者[④]认为，法学和国家的最高原则是纯粹的理性，纯粹的理性根本不

① 霍布斯·托马斯（1588—1679年）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阶级思想家。——译者注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③ 洛克·约翰（1632—170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④ 指康德。——译者注

包括经验，所以他把“谈判理论”也认作是未经证实的假想。其他德国学者也摈弃“谈判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机体论”（国家——这是上帝造出的“机体”）。

由于几乎所有的法学理论家都同意国家的职能是执行道德法律和关心人民的公共利益，所以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国家的历史职能在于，国家应成为保证“普天安宁”的机关。这离德国的“开明的专制制度”（十七至十八世纪）只有一步之隔。“开明的专制制度”是所有这些理论之中最著名的理论，它一出现，便立即成为现行法律。

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既然国家的目的是保证“所有人的安宁”，因而国家在实行这一理论时需要拥有无限的权力（专制制度）。

当国家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经济、精神、个人生活及其他领域——进行绝对干预时，这种“开明的专制制度”便成为警察国家（Polizeistaat）在实践中所尊崇的理论。

现代西方关于把法制国家（Rechtsstaat）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理论便是对警察法的理论和实践所做的反响。这种法制国家就是各种治理形式（议会制国家、总统制国家、立宪君主制国家）下的一种现代西方民主。民主国家的形式多种多样，这就说明，民主——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死板的公式。根据许多因素和特点——历史的、民族的、地理政治的——每个国家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并促使法制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法典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条件。

但是应当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民主也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在执掌政权的人民和人民主权的代表者议会之间产生了政党这种隔阂。卢梭呼吁要恢复的“直接民主”变成了“间接民主”——政党开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治理。全民直接选

举法实质上也变成了西方政党中权势分子的法律，使他们有权事先就指派出将来的议员，而这些议员候选人要过很久才能在选民面前出现。实际上人民不是选举代表，而是选举政党；选举时所考虑的不是代表的个人品质，而是政党在选举前所颁布的纲领。问题甚至还不止于此。党派成员当选议员后，由于受自己党派纪律的约束，使他在议会通过法律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而只能听凭党派领导的命令。诚然，宪法上全然不是这么说，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说："德国议会议员……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他们不受各种委托和指示的束缚，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第38页）但是，如果有哪一个议员对这一条款恪守不渝，忽视党的"委托"和"指示"，那末下一次选举时，他就不会被党提为候选人，而不经过党的提名就想进议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一位德国的法学教授在研究各政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权体系有如何影响时指出："各政党有权指派负责人，这是联邦治理的通病——从公社到总理办公室（Bundeskanzleramt）均是如此……各政党都不允许自己的周围有另外的上帝。不赞同党的人，就是党的反对者……各政党同'人民'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今天这种距离大概比魏玛共和国甚至比俾斯麦帝国时期还要大。'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是议会民主的基石，这一基石并不是稳固得不可能有人再以人民的名义对这种国家提出异议"（理查德·洛文塔尔和汉斯—培特·史华尔兹，《联邦共和国二十五年》，西华尔特出版社，斯图加特，见文集中威廉·根尼斯教授的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西方民主（政党国家）也带有党治制的某些特点，尽管这是多党统治的特点。

但是，比起苏联的党治制来，这种民主的优越性还是不容置疑

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各政党为了获取选民的信任，彼此间进行竞争，他们不仅在提出自己的纲领时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执政后，在实行相应的改革时也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第二，人们确有从几个政党的纲领中选择出一种的余地。第三，在野党可以通过议会对执政党的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督，以使执政党遵守法律，从而使社会得到保障。第四，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议会，还是执政机关，均处在自由新闻机构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哪一个执政者——从总理到总统，如果滥用自己的权力，新闻机构都不会饶过他们。第五，如果现有政党都不能使你称心如意，那末你可以和你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一个新的党来参加竞选。第六，独立的最高宪法法院也同样在监视着国家宪法的遵守情况及执政机关和议会的活动情况。总之，可以用邱吉尔的话来说明问题：民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形式，但是它是人类迄今所想出的诸形式中最好的一种。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论述是新奇和荒谬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学说可以概括如下：（一）国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化为对抗阶级的结果；（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三）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会产生一个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四）随着各对抗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将消失，它由于不再需要而消亡。

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十分认真地论证说，无产阶级新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举动——颁布生产资料国有化法律——也将是国家的最后一个举动。恩格斯说，现在要管理的不再是人而是物。但是，要想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不是幻想，就需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取得胜利。诚然，一开始连列

宁也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幻想的俘虏。因此，如此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列宁竟在夺取政权之后，天真地把下列几点宣布为自己纲领的原则：（一）在新的苏维埃国家里“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四月提纲》，1917年）；（二）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规军队、没有特权官员的**”新型国家（列宁在1917年4月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三）列宁郑重其事地援引恩格斯的话说：“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执政后，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他也发现自己是天真的。列宁想取缔的常规军队、秘密警察和特权官僚阶层，恰恰是这个独裁国家赖以生存五十六年的三大支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这一不切实际的理论的破产，以及列宁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破产，迫使列宁提出全新的理论，以便论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最高统治者。从1919年开始，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答复，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同“工人反对派”的辩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均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列宁有关这方面的基本论述是数不胜数的。我们只举几个主要的例子。列宁在一本书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每一个有组织的无产者来实现……党要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专政就由这个先锋队实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64—65页）在另一本书中，列宁写道：“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实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

193页）①在第三本书中，列宁写道："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23页）②在第四本书中，列宁写道："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无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一切缺点、任命一切人员和进行一切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342页）③

然而，"党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弄清直接行使"党专政"的那个"先锋队里的先锋队"是很重要的。列宁给我们讲清了什么是"先锋队里的先锋队"，他写道："由大会选举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组织局（现在的书记处。——作者注）和政治局……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如果引号确是列宁加的，那显然是多余的。——作者注）……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这种机构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3—194页）④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3页（本书译者注中提到的书，除注明其它出处外，均指中文版页码）。本书有许多引文同我国流行的版本（中文版或俄文版）的原文相对照有些出入，可能是作者引自另外的版本，也可能是作者引用时作了删节。这里的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7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203—205页。——译者注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这些特点使得布尔什维克的"新型国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极权的党治制国家。

让我们分析一下党治制国家同已知的专制形式国家以及所谓的"极权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吧。把共产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制度同法西斯制度混为一谈，同极权统治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如果你只热衷于总结它们之间的同类现象，那末你不仅会忽视每种制度的本质，而且会忽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作法还会使你忽略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同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一样，是对共产主义行动的反应，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模仿，以便用敌人的斗争手段和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这一模仿比起不寻常的实物来说，总还是一件拙劣的赝品。让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主导因素做一番比较和分析，以便尽可能对上述观点加以说明。先从"极权主义"的定义说起。一般说来，什么叫"极权主义"呢？

苏联的定义是：

"极权国家——是一种公开实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恐怖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当年曾是极权国家。"（《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2版第43卷第67页）

英国的定义是：

"极权国家是指德国的纳粹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和俄国的共产党政府。这些国家的管理权是高度集中的。极权国家里的政党不是被取缔，便是被并为一个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由于强调国家的有机统一而被掩盖。"（Encyclopedia Britanica,

vol.22,p.313,1947)①

德国的定义是：

"极权主义是一种高度追求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集中化、统一化和片面规则化的极端形式。"（Das Fischer Lexikon, „Staat und Politik", S.294）②

菲舍尔小百科全书也把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列为极权国家。

由此可见，苏联和西方的百科全书皆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极权国家。他们也一致认为，极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独裁、恐怖和反人道的实质。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只有这些是相同的。苏联不承认自己是极权国家，它认为极权国家只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变种"，即西方法制国家的变种（见上述苏联的定义）。与此相反，西方理论家们发现，在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因而从法学角度来说，它们是警察极权国家。

应当指出，在西方文献有关极权的基本定义中，不仅包括极权国家的治理实践，而且包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墨索里尼的理论乃至术语。还不止如此。**研究人员发现，被墨索里尼看作理想、目标的东西，现在已成为事实，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可见，共产主义的现实同法西斯的理想已结为一体。**如果我们读一读法西斯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述，那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例如，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学说》（《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4卷，引自维什尼亚克的译文，见《社会主义通报》1956年9月第9期第169页。）一文中说，对于这个学说来讲，"一切

① 《英国百科全书》1947年英文版第22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 《菲舍尔小百科全书》"国家和政治"分册德文版第294页。——译者注

都包括在国家之中，无论人和精神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超乎国家之外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是极权的，法西斯统治能把一切财富集聚和联合起来，能解释、发展和体现人民的全部生活。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能置于国家之外……

法西斯主义要改变的不是人们生活的形式，而是其内容，是要改变人，改变人的性格和信仰。”

不难发现，墨索里尼把国家同人民对立起来，把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他似乎在篡改和曲解林肯的一句名言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①，以便提出与之截然相反的“人民依靠国家，为了国家，听从国家”的思想。国家置于法律之上（“国家主义论”）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而法治国家（法律置于国家之上）则被看作是软弱和腐败的民主的产物。然而这种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恰恰是当时笃信天主教的意大利（那时官方认为意大利仍是君主国）的理想，而不是现实。在这方面希特勒比墨索里尼捷足先登，可是，恰恰在极重要的两个领域里，即在精神生活和建立极权的、民族化的经济体系方面他远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希特勒（在较大的程度上）和墨索里尼（在较小的程度上）所做到的，只是对国家管理机构实行一党专政，而旧的国家机器并没有被打碎。这种一党专政逐渐对社会实行控制，不过，只有控制是全面的，领导并没有达到全面的地步。只有共产党人才实现了全面领导。

归纳西方对极权主义所下的定义时，可以看出，这个定义至少包含下列几个因素：

（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

（二）对公民实行恐怖的警察监督制；

---

① 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译者注

（三）一个执政党；

（四）统一的、规则化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

（五）吹嘘社会革新；

（六）吹嘘自己的种族（纳粹分子的种族论和在种族问题上的所做所为；战时布尔什维克对高加索各族人民、克里木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及加尔梅克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苏维埃爱国主义"理论；莫斯科和北京之争中的种族因素；苏联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幌子下所进行的反犹太人主义）。

除最后一项外，所有其它因素皆是共产主义制度发明的（"纳粹主义"是斯大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但是这些因素本身还不能使极权统治形式变成绝无仅有的形式，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的一切专制和独裁制度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些特点。共产党政权所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新的统治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即党治制，是由这个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党说了算。因此党的机关才成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党的意志，它的"权欲"和它的威力几乎象康德所说的一样，是无上命令（但是没有无上命令的道德实体！），是国家的绝对法律，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如果我们有意展示一下列宁的党治制和民主治理、法西斯制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我们就要说：如果林肯主张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墨索里尼主张的是依靠国家的人民要"听从国家和为了国家"而生存，那末列宁的主张则是，无论政府、人民还是国家都要依靠党、以党的名义和为了党而生存。从此才出现了无处不有的"对党的崇拜"。（列宁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党。照共产党人自己下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型党"。它之所以新，乃是因为它有取代国

家和国家机关的独特历史使命，有特殊的内部结构。一方面它是一个有着各级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公开的、有数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党的上层人物和积极分子犹如“党中之党”一般。

按照共产党人的学说来看，共产党不仅仅是唯一的国家执政党，它甚至不只是国家中的国家，它本身就是国家，是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各级正式立法机关只是行政执行机关而已，负责贯彻执行各级党组织的决议和指示，而各级党的组织只是形式上的执行机关。**现今的共产党国家可以不要正式的国家机关而存在，但是要是没有党的机关，它就不能存在下去。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而是主从关系，从而消除了管理中的重叠现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没有打碎德国和意大利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在国家机器中安插了自己的干部。列宁打碎了俄国旧的国家机器，以便用新的党的机器取而代之。这机器就是党治制。

新建的形式上的国家机器——苏维埃，所以能和党机器并存，是因为苏维埃能在技术上帮助党机关治理国家，在政治上又能给党治制披上一件“代表人民”的外衣。

西方极权制度是警察性质的制度，其特点可以大体归纳如下：普遍设置政治秘密警察，取缔公民的一切自由，政治警察凌驾于国家之上，它的惩罚机关有权对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公民做出随心所欲的裁决。总之，政治警察作为侦查和反侦查机关，作为审判和执行机关而独立于国家之外，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相反，在党治制国家里，全部国家机器，这部机器的每一枚螺丝钉，其全部的“传动装置”、思想意识及权力艺术都浸透着无所不包、到处可见的契卡精神。因此，这里的政治警察只是完成职业行政职能的一种函数，是一党统治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诚

然，西方的极权制度对政治、社会及精神生活实行过统一化、规则化，实行过监督。但是，在党治制国家里，不但没有不受监督和规则限制的生活，甚至不受领导的生活也不存在。全面控制只是西方极权主义者的理想，而共产党人已经把全面领导变成事实。他们的出发点也不同：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极权主义者保存了旧的国家机器，使它相应地法西斯化，而共产党人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党的机器；西方极权主义者保留了旧的有产阶级，而共产党人不但把他们从经济上，而且从肉体上全然消灭；西方极权主义者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把它们解散，共产党则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政党。

不过共产主义和西方极权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别乃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即把旧社会连同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原则一齐铲除，在新的经济、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经济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生活。列宁开始的这一社会革命，由于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中断，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又接着搞了下去。这一革命使共产党成了全俄罗斯民族经济的唯一主人。工业和土地的国有化，随着经济国有化而产生的工人和农民劳动的国有化，对内外贸易所实行的垄断，交通工具的国有化，精神生活及学校的民族化——所有这一切也是一种“新型”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党对国民经济实行的史无前例的垄断**被合法化了，在这种垄断下，不是人民，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即党独揽了计划、监督、管理和分配国家财富的权力。由此产生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后果。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斯大林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核心，开始了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实验。这一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人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属性。党自己也不把党对国家财富的垄断看作是目的本身和个别党员发财致富的源泉，而是看作一种工具，看作一座能进行自愿或强迫改造旧人、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工厂。苏联社会的物质分配原则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对社会付出的劳动大小领取报酬，而这条原则的实际贯彻执行是为了促使新试验获得成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的劳动报酬和在社会阶梯的位置取决于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取决于你在贯彻执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所达到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论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莫斯科1949年俄文版第7页）①不仅是统治术的基础，而且是有关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一理论不仅要靠党对经济实行垄断，而且要靠党对政治实行垄断。与马克思不同，列宁甚至强调政治重于经济，他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62页）②这是适用于造就“新人”的理论的，就是说，当经济在党的手中是起间接作用的消极因素时，那末政治，也就是权力，便是起直接作用的积极因素。所以一位苏联法学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就这一问题写道，“在苏联社会中党的权力（政治）对生活，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莫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从前任何历史时代所不可能具有的。”（阿尔扎诺夫：《国家和法的相互关系》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页）他还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1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不仅仅进行外部的、形式上的调整，它要直接地组织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深入到生活内部去。”（同上，第14页）

由于党的政治机关和从属于党的国家机构的这种作用，党治制不仅象西方极权制度那样，做到了对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监督，而且它还进了一步：它直接**操纵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人的爱好和情感**。我们无法在这里分析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即在心理上新制度控制本国人民的有机程度和深度究竟如何，但我们可以说，在组织上新制度只能凭借强大的肉体和精神恐怖机器才能控制本国人民。这也是党治制牢固长存的秘诀所在。

我们说过，新制度不仅操纵着苏联的政治和经济，而且操纵着苏维埃人的思想和感情。这绝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从精神上控制了人民。共产党人操纵着支配人民精神的机关，而且，他们还在精神生活方面创造出共产主义的上流社会，创造了共产主义著作，但是却**没有创造出新文化和新的精神财富**。很多人都说苏联的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不错，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各种人文科学却一概停滞在1917年的水平上。为什么自然科学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没有得到发展？

答案很简单：为了维护**苏联军事机器**（核子物理学、电子学、火箭技术等）的利益，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而人文科学工作者只能撰写有助于巩固**苏联党机器**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列宁提出的“科学的党性”一直是必须遵守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在苏联只能出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撰写的社会科学著作，而且这些著作还必须是为当前党的总路线服务的。

这还意味着，在苏联只能出版这样一些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还没有写成之前，拥护共产主义的结论早已得出了。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代替了艰苦细致的分析；到处可以套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真理代替了科学工作假说；宣扬老朽、陈腐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不可动摇的学说，从而取代了对新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体系和理论的探讨。因此，苏联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名存实亡，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科学的顶峰"，而对其采取批评态度就被认为是犯国事罪，所以，今天生活在原子、电子和宇宙时代的研究人员所宣传和普及的仍是马克思和列宁在"煤油灯"下所写的东西。

党不仅对精神生活实行全面控制，不仅领导着精神生活，而且还把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定为精神创作的题材和方法。这一方法的实质概括起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分子是从党及其现行政策的立场看待和理解过去、今天和将来的。

小说、歌剧、油画、雕塑、电影、马戏都应该运用其特殊手段和"艺术"形象来宣传党的英明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同党的这条规定格格不入的作品是不会见到天日的，既使见到天日，也会被打成"形式主义"和"颓废派"作品，从而被打入冷宫，有时甚至其作者也一起被打入冷宫。

由此可见，西方极权主义只在政治领域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在精神生活领域实行相对的全面控制，而苏联的党治制不仅对苏联人的所有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和活动实行绝对的全面控制，而且实行绝对的全面领导。共产党的行径超过了墨索里尼的国家全面征服人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苏维埃国家本身也被党全面征服了。布尔什维主义领导人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政权拿来同其它极权制度相媲美，而且可以同民主制度相媲美，他们完全有理由说："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象我们苏维埃政权这样强大

而有威信的政权。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象我们共产党这样强大而有威信的政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31页）①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器。”（见1934年3月30日《消息报》发表的布哈林的文章）

这部机器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允许把它同软弱的和很不完善的类似机器相提并论。所以说，党治制是实行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绝对统治的等级官僚制度，是“党中之党”——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实行统治的官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立法、审判、监督、管理和支配的职权都合而为一，并集中在党中央手中，而管理和支配机关却是重叠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机关，执行机构是各级国家机关。对于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来说，苏联宪法只有形式上的作用，而党机关经常变化的意志才具有绝对作用。

甚至连“党的宪法”——党章，对它们来说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象党治制这样的独裁制度不可能听凭写在纸上的某种法律。列宁在论述布尔什维主义专政时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41页）②这当然不是说，在党治制的活动中，灵机一动占主导地位。相反，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则和法律在准确无误地操纵着党治制这台硕大无朋的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和每一条传动带。不成文的“党机关章程”（同形成文字的“党章”不同）的规则和法律，在本质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这个制度的不同首脑有所变化——如果寡头专政（列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8页。——译者注

宁）占党治制的主导地位，那末党机关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同党分享立法权力；如果是个人独裁者（斯大林）占据党治制的首脑地位，那末不仅党，就连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只有发言权，他们只能在个人独裁的控制下行使行政权力。

苏联的统治形式——党治制，对欧洲、亚洲、美洲（古巴）所有新诞生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一直是个不变的党和国家的模式。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古巴之间的真假分歧所涉及的问题不管有多广，但是有一点，即这些政权的党治制实质，却没有涉及到（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虽然苏联是党治制的发祥地，但是"修正主义者"和"正统分子"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为改变党治制而争吵，他们所争的一是领导权，二是"党治制的主权"。

二　本书的目的和材料来源

党治制的历史即是列宁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

近十年来苏联出版了《列宁全集》，再版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新公布了一系列有关党史和革命历史的珍贵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能使人们正确阐明和重新评价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冲突和列宁的立场。应当指出，苏联历史学家从他们的档案材料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所应该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是相反，他们往往得出与这些材料明显对立的结论。"列宁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中央委员会时时处处按列宁的指示办事，只有几个职业叛徒例外"——这就是党的历史学的正式基调。然而，客观地分析一下苏联自己的文件就会看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是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为争夺党内领导权而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

不贬低列宁在他的党内所起的作用和所占据的地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他在党内所起的实际作用，阐明中央委员会

内部冲突的性质，这便是我的目的之一。

十月革命前，列宁所领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一个极左翼（诚然，有过例外情况），执政后，他领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右翼。在革命中，列宁与他轻蔑地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进行过斗争，并用这个名称强调他们是保守主义者。掌握政权后，列宁同“幼稚的左派”展开了斗争，同那些患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人展开了斗争。甚至连列宁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继承人斯大林，在他与布哈林的右派联合、反对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时，所继续执行的也是那条右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路线。列宁在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冲突中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因为列宁不是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非凡的布尔什维克，他一手拿着马克思的书，一手拿着尼采的书①，而头脑里却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②。

然而，列宁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被自己的创始人折磨很久。列宁病魔缠身，卧床达一年多，但是他仍十分关心党的现状和未来的命运，他曾亲眼看到他的学生和战友们为了争夺他的政治遗产——权力，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列宁还以明察秋毫的政治家的敏感，准确无误地预见到斯大林将成为他的党的掘墓人。他的“遗嘱”——列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写的关于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信以及他给斯大林个人的绝交信，便是由此产生的。但是，“列宁的近卫军们”自找苦

---

① 尼采·弗里德里希（1844—1900年）是德国反动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非理性论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② 马基雅弗利·尼科洛·地·伯纳尔多（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马基雅弗利主义是不择手段的，即采取罪恶手段也在所不惜的政策的同义语。——译者注

吃，他们不相信垂危导师的话，他们所信任的是蒸蒸日上的“总书记”。努力揭示列宁的继承者们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揭示这一斗争的内幕，这是我的第二个目的。

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政党能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简直是按着自己的“时间表”（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四月提纲》、《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圆满、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夺取政权。但是历史上也不曾有一个政党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掌握政权后便随随便便地、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党是列宁缔造的，是被斯大林扼杀的，但是斯大林是借助从列宁手中继承下来的武器将党扼杀的。作为一个策略家和战略家，斯大林不仅无法同列宁相比，也无法同托洛茨基相比。但是作为玩弄权术的行家来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斯大林。我发现，斯大林所以能在通往个人独裁的道路上取得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就，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运用起列宁主义的外科器械来，比这些器械的发明者本人还熟练。斯大林没有给列宁的武库补充一件新东西，但是在完善和运用列宁的武器方面，他却开辟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新时代，因为他给布尔什维克“权力学”增添了货真价实的新成分，即为取得个人权力所使用的罪恶手段和支配这种权力的罪恶制度。党寡头政治的列宁专政受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中央委员会也位于列宁之上，而代替列宁专政的斯大林独裁却监督和驾驭起中央委员会来。这一点是通过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搞政治谋杀，在列宁逝世以后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的，总共只用了五年时间（1924——1929年）。其实，这还不能算作谋杀，确切地说，这是自杀，并且不是一举完成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不是斯大林动手的，而是各部分彼此杀戮，直到列宁中央委员会的人已所剩无几才停止。可悲的是斯大林正是幸存的人。但自杀是斯大林操纵

的，而且这些自杀的人当时还没有醒悟到这一点。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得承认，斯大林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了把刑事艺术同政治相结合的突出成就，从而使他成为列宁遗产的自然而然的继承人，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是打着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旗帜去接受遗产的。当然，从心理学上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相比，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列宁是俄国的世袭贵族，是一个受西方政治书籍熏陶的人，斯大林则是一个破落的鞋匠的儿子，受的是愚昧和落后的亚洲教育。虽然列宁自己不会搞犯罪活动，但是他经常委托斯大林搞，无论是革命前（在高加索搞“剥夺”），还是在内战时期（例如，1918年在察里津指挥集体屠杀），都是如此。

列宁虽然否认政治斗争中有任何全人类的、“非阶级的”道德，但是由于出身所限（“存在决定意识”1），他没有摆脱沉重的“资产阶级贵族偏见”的包袱，例如，对人格、义务、忠实等概念的理解，有时甚至对自己的政敌（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公爵）也信守这些概念。而斯大林在政治上对所有人都一律用阴险、不讲道义的态度对待，无论是对党内的战友，还是对自己的学生皆是如此。当斯大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枪毙“人民的敌人”时，列宁赞赏斯大林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当斯大林在党内运用起列宁的“阶级道德”时，他的所作所为便引起了列宁的沉思。据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有一次列宁讲：斯大林“缺乏最起码的、最普通的人的诚实。”（L·Trotsky, Stalin, p.375）①他不仅说，而且还做了相应的结论（《遗嘱》、《论自治》一文、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

正是斯大林的这种丝毫不讲人格的作法，使他利用列宁的“道德规范”（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自己导师关于撤销

---

① 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英文版第375页。——译者注

"不忠实的"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意愿），战胜了列宁，战胜了争夺列宁宝座的诚实对手们。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手头除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之外，再没有别的材料，那他也是可以说明斯大林是一个天才的、政治上的刑事犯，国家本身将他的刑事罪合法化了。刑事犯罪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斯大林主义。

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组织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一条最基本的结论，这条结论可以概括如下：老的，独断专横的，然而是搞政治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列宁一起死去了。从斯大林起，开始了新的，独裁的，然而是搞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纪元。

指出斯大林的搞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根源、历史形成及其在苏联获胜的规律——这是我的第三个目的。不管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怎样绞尽脑汁，力图证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严酷刑法并不是党治制本身的产物，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似乎也只是"歪曲""列宁原则"的结果，但是笔者在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应当到列宁极权的"权力哲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例如，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第二，应当到这一专政的组织独裁制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认为，"无产者"本身不能直接实行专政，而只有他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我在另一本书中把这一制度称为"党治制"）才能实行；第三，应当到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分子（著名的高加索"剥夺分子""战斗队"——他们是在柯巴—斯大林和卡莫—特尔—彼得罗相领导下于1905—1912年间搞暗杀"敌人"、抢劫银行、商店、邮局的恐怖分子）的罪恶历史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第四，应当到斯大林本

人罪恶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向斯大林教授了一条列宁"权力哲学"的主导原则，这是一条关于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斯大林学得很好：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41页）①

列宁甚至提示斯大林说，需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的专政。当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批评起他们党的正式领导人，说他们企图建立"领袖专政"来取代"群众专政"时，列宁回答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同上，第189页）②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已经把列宁的这两条原则当做解释列宁主义的根据了（见《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116、128页）。③斯大林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避而不谈列宁在1920年归纳的第三条列宁主义的主导原则，以便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秘密，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这条原则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一长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19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④

斯大林还通过列宁借用了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并恰恰用它摧毁了列宁的党和国家机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考虑是正确的，他认为只有搞垮党内有思考能力的人，并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剩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才能建立起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199页。——译者注

③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46、151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6页。——译者注

列宁指出的独裁统治和一个领袖的专政。

在实现这一目的时，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在党内实行“特别戒严”（这种状况被称之为“党的团结一致”）的决议案在斯大林手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在主张一丝不苟地执行关于在党内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的“列宁原则”时，他的做法及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仍然超过了导师。斯大林发现，模仿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远比列宁的主张更为合乎逻辑，他们不仅把大规模的恐怖作为治理人民的基础，而且也作为治理本党的基础。不同思想还没有形成之前，甚至还没有露头之前就要对它提出警告。由此才产生了斯大林的下述理论：在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时，潜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军不断增长。于是他搞预防性的恐怖措施，以便对付这些潜在的“人民的敌人”。

在这方面希特勒给斯大林上了一堂示范课，他给斯大林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主意：不仅要谋杀反对派的活动家（施列赫尔将军），而且要谋杀以列姆为首的亲密战友们，其罪名是搞“阴谋”。不言而喻，其实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搞过阴谋。五个月之后，斯大林暗杀了他的密友、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并从此开始给老布尔什维克们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将领们罗织一系列“阴谋”罪名，以便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但是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超过了希特勒，他能迫使这些受害者自己诬陷自己，迫使他们承认搞过莫须有的阴谋、暗杀、间谍活动、破坏活动，而且其细节竟编得如此维妙维肖，以致局外人会真地相信斯大林所整肃的列宁的党，是由阴谋分子、暗杀分子和间谍所组成的。

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资本主义、反民主、“民族社会主义”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国沙文主

义、无神论、崇拜“领袖”和“元首”）和在统治方法上（在不断搞肉体恐怖的情况下实行极权的警察专政）变得异常相似，以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头子们完全有权声称，在同民主西方进行斗争时，他们的世界观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可以停止一切意识形态之争。

1939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所签订的条约是布尔什维主义蜕变为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的合理结局。据意大利外交部长契阿诺说，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首的政治局为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所举行的宴会结束后，里宾特洛普说，在宴会上，他“感觉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犹如置身于党的老同事之中”。（A· Rossi, Russian-German Alliance 1939—1941, Beacon Press, Boston, 1957, p.71）[①]这是绝非偶然的。宴会后的第二天，里宾特洛普洋洋得意地向希特勒报告说，礼仪上没有规定的话斯大林在干杯时也说了。斯大林说：“我知道，德国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想为他的健康干一杯。”（„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pp. 6—7, 19……）[②]。这不是一国政府首脑对另一国政府首脑的普通的礼节性外交祝酒，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是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这是“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对“德国人民的领袖”的祝酒，是苏联法西斯头子对德国法西斯头子的祝酒。

两种法西斯主义彼此间达成了如此的谅解，以至于斯大林通过他的忠实走卒、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之口说出了下面一

---

① 罗西著《1939—1941年间的苏德同盟》英文版第71页，波士顿毕肯出版社1957年出版。——译者注

② 《1939—1941年纳粹与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英文版第6—7，19……页。——译者注

段确有“历史意义”的话：

“同其它一切思想体系一样，对希特勒主义的思想可以承认，也可以否认……但是，任何人都明白，不能用暴力消灭思想，不能用战争来根除它。因此，**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罪过的。**”（1939年11月1日《真理报》）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专家墨索里尼所说的话了，他在1939年10月断言：

“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见罗西上述著作第77页）

我们知道，不是斯大林而是希特勒背叛了斯大林—希特勒同盟。斯大林对希特勒深信不移，对他情同手足，因此他完全有权称希特勒对他的进攻为“背信弃义”！斯大林正是这样说的，对这四个字也应做如实地理解。希特勒毫无理由地毁掉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但是，斯大林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答案要到另一个问题中去找：列宁是不可避免的吗？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客观因素的巧合使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必然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将在专门的章节详细加以论述。这里我们只指出列宁、斯大林及其敌人的一个一致的看法，即如果临时政府退出战争，立即宣布有利于农民的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取得政权。那样的话，可能只有少数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人才会知道列宁，至于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然而，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主观因素方面的问题，即革命中列宁党的机器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心理假说提出的。

政治是一个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如果这些未知数能事先算出，那末人类的历史虽然是和谐的，但因失去了内部的紧张性而

会变得枯燥异常：数以千计的国王、君主、暴君还没登极就会拒绝坐皇帝的宝座，为的是不致死于非命；几百次战争也不会发生；为了避免灾祸，几十次有组织的革命根本不可能爆发，以免这些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我敢断言，如果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事先知道胜利之后有什么在等待他们，那末十月革命同样也不会发生。那末，让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的“父与子”们的命运吧：

领导过十月革命的二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三人被敌人打死（П·А·查帕里泽、М·С·乌里茨基、С·Г·邵武勉），五人在斯大林实行专政前自然死去（列宁、Ф·Э·捷尔任斯基、В·П·诺根、Я·М·斯维尔德洛夫、Ф·А·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两人因斯大林而自杀（А·А·约费、Н·А·斯克里普尼克），三人失宠被黜（М·К·穆拉诺夫、Е·Д·斯塔索娃、А·М·柯伦泰），十五人被斯大林枪毙（Я·А·别尔津、Н·И·布哈林、А·С·布勃诺夫、Г·Е·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А·С·基谢廖夫、Н·Н·克列斯廷斯基、Г·Е·洛莫夫、В·П·米柳亭、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А·И·李可夫、Е·Т·斯米尔加、Г·Я·索柯里尼柯夫、Л·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奸细杀害、В·Н·雅柯夫列娃），第二十九个人便是斯大林自己。

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十月起义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三十名领导人中（中央委员除外），七人是在斯大林专政之前就死去或被杀害的（阿瓦涅索夫、古谢夫、叶列梅也夫、拉齐米尔、萨多夫斯基、斯克梁斯基、丘德诺夫斯基），一人因斯大林而自杀（拉舍维奇），二人失宠被黜（波德沃伊斯基、萨莫伊洛夫），十八人被斯大林枪毙（安东诺夫—奥甫谢因柯、安采洛维奇、鲍基、戈洛谢金、迪宾柯、扎鲁茨基、卡拉

汉、克德罗夫、克雷连柯、拉齐斯、梅霍诺申、涅夫斯基、帕甫卢诺夫斯基、佩捷尔斯、波泽尔恩、翁什利赫特、楚巴尔、尤列涅夫），只有两人是幸存者（马努伊利斯基、莫洛托夫）。

第一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十六名委员中，四人死于斯大林专政之前（列宁、诺根、卢那察尔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十二人被斯大林枪毙（阿维洛夫、迪宾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П·А·柯鲍泽夫、克雷连柯、洛莫夫、米柳亭、奥甫谢因柯、李可夫、泰奥多罗维奇、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

国内战争时期的十六名红军前线司令员，三人属自然死亡（В·Н·叶戈里也夫、П·П·列别捷夫、А·А·萨莫伊洛），一人被布尔什维克打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М·А·穆拉维也夫），一人下落不明（В·В·雅柯夫列夫），一人由于斯大林强迫做手术而死亡（季诺维也夫分子伏龙芝），十人被斯大林枪毙（安东诺夫—奥甫谢因柯、Р·И·别尔津、В·М·基提斯、А·И·叶戈罗夫、Н·Н·佩京、М·С·斯维奇尼柯夫、П·П·塞京、М·Н·土哈切夫斯基、В·И·绍林、集团军司令И·Э·亚基尔）。

三名苏俄全军总司令中，两人被斯大林枪毙（Н·В·科雷连柯、И·И·瓦采季斯），而第三名死后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С·С·加米涅夫）。

甚至经过三次清洗的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仍有九十八名老布尔什维克（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被斯大林枪毙。

如果所有这些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司令员事先知道，胜利后不但他们本人要被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杀害，而且这个制度还将堕落为史无前例的个人独裁的暴虐制度，那

末，他们根本就不会起来革命。可能有人会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反驳我的这一说法：1940年2月托洛茨基在"遗嘱"中写道，如果他能有第二次生命的话，就一定再重复一遍他今世的生活，并且说，他过去是个革命者、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要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死。1940年3月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遗嘱"中补充说，他保留用自杀的办法来确定自己死期的权利，但是他预感到他的死期可能由斯大林来确定，所以托洛茨基补充说："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下死，我都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Trotsky's Diary in Exile, p.1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①

另一个例子是：1937年6月11日传奇式的红军将领И·亚基尔在临刑前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

不言而喻，象托洛茨基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有别种写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种想法，何况他又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何等命运。但是，如果在1917年10月24日那天能对托洛茨基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夺的政权将会落入你们党内一个要把你杀死的人的手中，他要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制度，要杀死你的孩子，要把你所有的同志连同所有"列宁的近卫军"一道统统枪毙，最后，当你被驱逐国外后，他还要用十字镐敲碎你的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还同意搞革命，夺取这个政权呢？如果说托洛茨基对1917年10月24日提出的这个问题仍会做肯定的回答，那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人。

至于说亚基尔，从心理上来看，没有任何一点迷糊，"斯大林同志万岁！"在他说来只意味着一点："我在斯大林面前也没

① 《托洛茨基的流放日记》英文版第166页，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有一丁点儿错，可见，斯大林是杀害我的凶手。”据赫鲁晓夫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契卡的刽子手向斯大林汇报亚基尔死前所说的话后，斯大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他还把亚基尔骂了一通。

现在讲一讲本书的材料来源。

我的主要材料来源，是苏联党的文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反对派的文件，各种有关革命历史的文献，官方和反对派的出版物，党的历史学家的某些学术著作。我的所有主要结论都是依据党的这些文件做出的。只有在党和党的活动家的有关文件在苏联没有发表的情况下，我才引用西方的著作（美国、英国、德国和俄国侨民的著作），在西方，这些著作早已被当作学术论文。德国外交部关于资助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件也属于这一类。官方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党史教科书我引用得最少。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从来没有写过而且将来也写不出一部科学的、客观的自己党的历史。如果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写信（1931年）以前还出现过一些有价值的党史著作和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那末斯大林写了这封信之后，苏联共产党历史这门科学就完全被取缔了。

斯大林把所有过去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书皆宣布为“托洛茨基的私货”，其中甚至包括列宁曾给予很高评价的书（例如，约翰·里德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还为之写了前言），并决定亲自写一本党史。结果臭名昭著的《简明教程》出笼了，这本书作为学术著作一钱不值，而在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方面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38年中央委员会正式做出决议，宣布《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历史学的顶峰”，二十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在苏联起着共产主义圣经的作

用。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仍是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其成员也与1938年相仿佛，只是没有斯大林，却承认《简明教程》根本不是什么“百科全书”，而是蓄意“伪造党的历史”，是崇拜斯大林的“顶峰”。

斯大林受批判后，所谓的“党史学”也恢复了，其研究对象是苏联共产党和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然而研究这门科学的方法、原则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一套。因此，对党和俄国革命一无所知的人正是“党史学”的候补博士和博士。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华，相反，他们之中很多人有才能，甚至是些杰出的人，但是，他们所学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冒充科学的骗术和党的萨满教的大杂烩[1]；他们研究历史时所用的材料并非是真正的历史性文件，而是他们编造的假材料。这些假材料编得很巧妙，以便使党的未来的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的政论著作。

不仅如此，甚至连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列宁近卫军”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著作对党的历史学家来说也属于禁书，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书就更不用说了。一千五百万党员每天在党校都能听到这些“异端者”的名字。但是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师，没有一个人明白为什么列宁的战友和朋友会成为斯大林眼中的“异端者”，会成为希特勒的“间谍”，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人的生平，《苏联大百科全书》不介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的生平，但是对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思想毫无二致）等人的生平却做介绍。党的历史学家所能引用的唯一历史

---

① 萨满教是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最为发达的一种宗教形式；相信有灵魂。——译者注

资料是列宁的著作，但是他们从列宁的著作中所引用的也只是一些与党的目前政策相吻合的东西，而对那些和目前政策相抵触的东西则避而不谈。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过，斯大林分子如何利用下述理由来回避列宁著作中不利于他们的话：

“不要过多地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在他的著作中什么都能找到，就象雅柯夫大叔什么货都有一样，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引用列宁的话呢？”（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明目张胆地曲解列宁的本意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在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和波斯佩洛夫主编的七卷集《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对《给代表大会的信》，即列宁的“遗嘱”，以及对他的《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一文所做的粗暴的、反列宁的解释，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和本意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例证）。

他们的另一个材料来源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是不经常指出斯大林的名字。党的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列宁提出的和斯大林阐释的“科学中的党性”原则。这一阐释的实质可以归纳如下：在分析和评价一切事物、范畴、现象、事件和人物时，要从现阶段党的政治总路线的利益出发。所以，拿苏联历史学界元老波克罗夫斯基的话说，在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昔日被推翻了的政治”。因此，他们能用“现在发生的事阐明历史事实”，这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谈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时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不能把所有现在发生的事都用来阐明历史事实。对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事实，他们索性宣布没有发生过，这也是为了迎合那条“科学中的党性”原则的需要。

总之，“避而不谈”是党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手法。如果某些

事件非常引人瞩目，回避不了，那他们就在解释时随心所欲地编造事实。例如，在谈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不得不提及托洛茨基的名字。于是他们提了他的名字。但是，他们是如何提的呢？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苏联科学院院士，过去为斯大林撰写《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充当秘书的明茨，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十月革命》一书中是这样描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

“虽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起义的决议，但是他没有做起义的实际准备工作，并且没有参加任何起义计划的制订工作。”（1967年俄文版第2卷第954页）

但是明茨的导师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在《真理报》上写道：

“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皆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这样快地转向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搞得之所以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1918年11月7日《真理报》）

苏联所有历史教科书在谈到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时，都千篇一律地说：托洛茨基一贯背叛、出卖和破坏红军的胜利果实。而且，党的历史学家们竟然不为自己缺乏起码的政治逻辑感到羞愧：“明察秋毫、无所不知的天才”列宁怎么会容忍这样的“叛徒”、“奸细”和“破坏分子”做红军的首领呢？

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也是反科学的。一般说来，在开始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研究人员要给自己拟定一个工作假说，或者拟定一系列的假说，认真搜集所有资料，不仅搜集对自己的假说有利的资料，而且也搜集与自己的假说相矛盾的资料，然后把

资料分门别类，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只有在这之后，研究人员才能给自己提出具体的目标，才能着手写作。著作完成后，它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与最初的假想截然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中的党性”原则不允许这么做。党的历史学家还没有着手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就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他们只不过从列宁的著作或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抄几段语录，然后再搜集那些能印证这些语录的事实材料罢了。

斯大林死后出版的有关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学术著作也大都如此。布贾洛夫教授撰写的有关1917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历史以及库兹明教授撰写的有关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作用这两部有价值的著作，是个例外。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从二十大以后，也出现过许多有关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赫鲁晓夫倒台后，几乎再没有这样的书问世。

新领导时期出版的六卷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貌似巨著，其实也不过是一本斯大林的《简明教程》而已，只是篇幅拉长了，搞了六卷八分册。当你读这部《六卷集》时，你总觉得是在读一种早已熟谙的东西，而当你再进一步回想一下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你读的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斯大林的著作。不仅《六卷集》作者的构思，而且连论据也是从《简明教程》和《斯大林全集》那里抄来的。在《六卷集》中，我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新文献，没有发现一个新奇的想法是我从前在斯大林的书中没读到过的。原以为，象这样一部精心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巨著，一定会把四十年来或是五十年来的（1919 — 1930 ……）中央全会记录做为学术资料收进去，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些记录还作为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材料加以封存？

按照党内级别，我可以阅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稿是由中央委员会印刷厂印制，份数有限，由“斯大林同志的书记处”发至州委书记一级，其中也包括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阅后交回中央委员会）。因此我可以证实，那个时期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没有任何长期性的国家机密。但是那些记录中有各反对派提供的事实材料，证明斯大林及其中央机关如何采取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制造假案，以便搞垮列宁原来的党——俄共（布），建立斯大林式的新党——苏联共产党。所以，现在的党自然不愿意让苏联各族人民从中央委员会的这些记录中看到他们是如何靠非法手段起家的。

赫鲁晓夫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昔日同赫鲁晓夫一道谴责斯大林是罪犯，今天在没有赫鲁晓夫的情况下又一致为斯大林平反，说他是“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倘若斯大林的这些门徒的所做所为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的话，那本来应该说他们是无原则的。经验向他们表明，现行的寡头政治专政不允许选择其它统治方法，只能选择斯大林的统治方法，尽管这已是一种现代化的斯大林统治方法。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为这个过去的罪犯“父亲”翻案的同时，就把对斯大林暴行所应负的历史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并公开承认自己从精神上是与斯大林一脉相承的。

的确，这不能说明党治制的首脑在政治上是英明的，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却因此变得极为简单了：他们无需再象赫鲁晓夫时期那样去证明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人为地将斯大林与列宁对立起来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历史上，斯大林过去是列宁，将来也是列宁，他只不过是沿着列宁的逻辑走到底了而已。所以说，政治局里斯大林的学生在二十大以前喋喋不休所重复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这句话是对的。这句口号已有进化，概括说来就是：他们现在嘴上只说列宁，心里想的却是斯大林。

除上述材料外，本书还在某种程度上不注明出处地引用了另一种材料来源，这便是从二十年代中期起我个人积累的经验。当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少年时，就多报几岁入了党。当时政治局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斯大林所组成的。我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晋级颇快，因而得以从内部观察各反对派为反对斯大林派所展开的斗争。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中，我同情斯大林；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中，我同情布哈林。这一点在我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反映，在那篇文章中，我对政治局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发表的两个文件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批评了中央委员会认可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列宁的民族政策。我还认为，在民族共和国内实行集体化的方针显然也不是列宁的方针。就第一个问题我写道：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建设速度不仅不能确保在本五年计划内甚至不能确保在最近几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及1923年）所提出的极其明确而又十分实际的任务……应当（采取）实际措施，尽快地消除各民族间确实存在的不平等……不能说，一切目前从经济上看来不合理和低效率的事情，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去做。”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考虑到1929年至1930年间的反集体农庄起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规模比在俄罗斯族地区大”，并从这一点出发，批驳了政治局文件中的这样一点，即“在东部的民族地区，开始可以普遍发展共耕社，作为向劳动组合过渡的形式。”（《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595—596页）①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3页。——译者注

针对这一点我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认为，大规模地建立集体农庄和共耕社运动的准备工作应当从头做起，即从土地规划做起。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是从共耕社做起，那就不符合列宁的原则了……应当从最简单的，然而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做起，即从土地规划做起。”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援引了上一次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说：

“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进行土地规划的费用由国家负担。土地规划应和其它的措施（农艺指导、贷款、土壤改良、机器供应等）取得极密切的配合……必须立即确定苏联全国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的基本原则”。（《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65页）①。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都举了大量的实例，证明中央所说的话与地方机关的做法不一致。（见1930年6月22日《真理报》发表的阿夫托尔汉诺夫的文章，题为：《贯彻执行党对民族问题的指示》）

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关于这场争论我在另一本书中做了详细的叙述（见我的《权力学》一书）。这里我只从一个批判过我的人的文章里摘引几句话，这文章与其说是批判我，不如说是批判一个垂死的党，从那时起，在这个党里对斯大林中央所做的任何批评，都被看成是“背叛行为”。这篇文章写道：

“如果沿着阿夫托尔汉诺夫同志建议的道路走下去，结果会如何呢？那就意味着真地长久取消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行集体化的口号……因为他所说的土地规划方法是个体农民经济的土地规划方法……阿夫托尔汉诺夫确实患了右倾机会主义病。他对少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3页。——译者注

数民族地区的现状视而不见，而‘不承认现状是不行的，它自己会迫使人们承认它的’（列宁）。我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阿夫托尔汉诺夫同志?因为‘现在是困难时期，问题又无比重要，在这个时候患病，那就意味着有断送革命的危险。’（引自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批判布哈林的讲话）从阿夫托尔汉诺夫对少数民族边区集体化的道路所发表的议论可以看出他那右派老手的叛徒嘴脸。”（见1930年6月30日《真理报》发表的戈特弗里德的文章，题为：《评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提的正确的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建议》）

把我与布哈林直接联系起来，而且还用列宁的话警告我说，由于我，红色教授学院一名默默无闻的学员，整个革命会有断送的危险，这是高抬我。

辩论在继续，我竟“斗胆”引用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有关土地规划方法的决议，后来斯大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做报告时，一句话便结束了这场辩论：

“改变土地规划方法以利于集体农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286页）①

斯大林做了这一指示性的“答复”后，我决定用当时人们惯用的手法挽救“革命”和我自己的党证：发表悔过声明（见1930年7月4日《真理报》）。

我的文章只使我本人得到了益处——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批判地对待过去发生的事，用批判的态度注视将要发生的事。我很快便发现，我们的理想——是虚构，允诺——是欺骗，希望——是自欺欺人。1937年我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时，斯大林分子似乎是为了让我受完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教育，当年就把我投入人民内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1页。——译者注

务部的监狱，宣布我是“人民的敌人”。应当承认，五年内我在这所契卡“大学”里所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教授所不能给予的：直到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清了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真实面貌，看清了他那只本来就是“赤裸裸的革命之剑”——契卡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当然，这一切我是不会写出来的，但是这种个人经历不仅可以使你更好地理解各种文件的虚伪词句，而且可以使你明白事件本身的底蕴。

在这一优越性中也蕴藏着极大的危险，我时刻都提防着。这一危险便是：我个人的感情是否会在学术中有所流露，从而损害科学的客观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对我的这部著作会做如何反应，这是不难预料的。如果这部著作传不到无处不有的地下出版社手中（地下出版社是苏联各族人民真正的自由之声），那末他们对这部作品将一言不发，噤若寒蝉，如果这本书传到地下出版社手中，他们会宣布这是一部“诽谤性”的著作。苏联科学界的宪兵们是不会就这部著作的实际内容进行辩论的。要知道，学术辩论不是他们权限和职能范围内的事，这是有别于其它所有法制国家的。他们的职业是“抓住不放”，极权警察制度国家的情况大都如此。况且，把我打成“诽谤者”要比推翻我的结论省力气得多，因为这些结论全部基于对苏联官方材料的分析。无论斯大林时期也好，斯大林以后的时期也好，所有党的历史学家故意不加引用的材料，我都给公布于众了。他们对列宁的著作所做的有利于斯大林的解释，我均按着列宁的精神做了修改；党的历史学家从中央委员会及党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只引用那些讲列宁如何英明的人的发言，而我也引用了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发言；那些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问题就在这“等”字上）这一公式赶出革命和党的历史的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我如实地记述了他们在党内所起的作用；那些在党的教科书中被谴责为“革命的叛徒”从而被剥夺阐明自己真正立场的权力的各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我还给他们“言论自由”，让他们讲明自己的道理。我认为，这样便可大致得出列宁中央委员会的真实历史面貌，这与官方历史学家所描绘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笔者不存任何幻想，自知这本书还欠完善。一部十全十美的中央委员会历史只有将来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治警察局的保密档案馆对外开放时，历史学家才能写出来。只要现今的新斯大林政权不退出政治舞台，这一点就不可能做到。所以，我这本书的任务比较简单：在分析苏联官方所公布材料的基础上，再现“列宁中央委员会胜利与灭亡”的历史。这是一部有文件可查的历史。至于这个任务我完成得如何，那就不该由我而是由诚挚的批评家以及有钻研精神的读者们去评论了。

阿·阿夫托尔汉诺夫

我在写作过程中不得已引用了三种版本的《列宁全集》，并用不同的办法（用罗马或阿拉伯数字）标明书名或卷次，以区别其版本。

作者附笔

第 一 章

党中央委员会的产生

历史同大自然一样，充满反常和离奇。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在苏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认为是苏联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日子，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敌——“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九名代表，八人后来成了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一人被斯大林在大清洗时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上层人物一起干掉；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被视为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但是它的起草人却是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司徒卢威。尽管如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仍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创建了后来能改变整个时代的著名组织：**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日至3日举行，代表们佯装举行晚会，为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的妻子祝贺命名日。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城郊的一所小木房子里举行，小木房子位于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对面便是宪兵马队的楼房（《苏联共产党历史》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60—265页）。当时认为，在警察局鼻子底下开会是最好的保密方法。

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市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工人报》（基辅）编辑部及崩得推选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人乌里杨诺夫（列宁）和柴杰尔巴乌姆（马尔托夫）因流放缺席。第

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他们是：克列梅尔（崩得的领导人，该组织成立于1897年），拉德琴柯（于1907年背弃布尔什维主义），艾伊杰里曼（1942年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的决议做了如下表述：

“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代表大会还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包括：

“（一）关心党的有计划的活动（分配人力和物力，提出并执行统一的要求等等）……；

（二）出版书刊并送达各地方委员会；

（三）组织有全俄意义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就重大事件印发传单，支援罢工工人等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册第14页）①

如果中央委员会面临特别重要的、只有党代表大会才有权解决的问题，那末中央委员会可以就其通过一致决议，并向下届代表大会报告这一决议。中央委员会有权补选新委员。中央委员会代表党同其他革命组织发生关系。

同后来列宁的党章相比，第一个党章的特点是，它的指导思想是党对其执行机关拥有主权。这一思想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第七条中表现得很突出：

“地方委员会采取它们认为比较适合当地条件的方式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地方委员会在向中央委员会说明理由以后，有权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此外，地方委员会可以完全独立行动，不过得以党纲为指针。”（同上，第15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7页。——译者注

页）①

决议的第九条又一次强调了党对中央委员会拥有主权的思想：

“党的最高机关是各地方委员会代表举行的代表大会。”（同上）②

中央委员会负责支配党的经费，经费来自地方委员会经费的自愿的定期的提成和专门为党举办的募捐。（同上，第14页）③

代表大会一闭幕，大多数代表（9人中有5人）便被逮捕了。

未被逮捕的中央委员克列梅尔和拉德琴柯组织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宣言的编辑出版工作，宣言的起草者是上边提到的司徒卢威。宣言充满了热情洋溢的话语：

“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儒、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并且一定能把它承担起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思潮，它继续着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做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但是社会民主党选择了另一种手段和途径。”（同上，第13页）④

斯大林时期认为，这一宣言政治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苏联共

---

①②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8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5—6页。——译者注

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对该宣言所做的评论是：

“当时发表的‘宣言’有重大的缺点：‘宣言’上忽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及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也忽略过去了……”（同上，第11页）①

这些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斯大林的官方历史学家要求“宣言”中阐明当时连列宁都没有考虑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等思想。这些思想列宁是在1900年至1905年提出的。

关于“宣言”列宁写道：

“我们……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的目的。”（同上，第18页）②

这些指责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新的巨著《苏联共产党历史》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提法。书中说：

“虽然司徒卢威远不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写进‘宣言’。”（《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1卷第265—266页）

司徒卢威的“宣言”确实比列宁本人早期的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什么是人民之友》）革命得多，激进得多。至于党章，特别是对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实同后来列宁主义的组织学说存在深刻分歧。虽然当时列宁已经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党的活动家和政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2页。——译者注

论家，但是，他头脑里并没有勾勒出将来建立革命政党的“组织计划”，这一计划他是在自己的名著《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提出的。但是，列宁从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所关心的就是运动思想的一脉相承和纯洁的正统性。意见统一，而不是分散——这是列宁党的理想。因此列宁在《火花报》创刊号（1900年12月）编辑部文章中写到：

“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19页）①

有关新型政党的组织问题的完整学说是列宁在上文提到的《怎么办？》一书中提出的。列宁用一句话概括了该学说的精髓：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458页）②

“组织”——这是列宁革命计划的起点和终点。“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论党的建设》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88页）③他一生对这一原则始终恪守不渝。

列宁是一位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很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而对之发生兴趣，他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工具，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思想武器，用它来建立“革命者组织”。而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7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10页。——译者注

且，在这方面列宁也是忠于“辩证法”的：他用俄国特点这一滤纸，将欧洲精神产物马克思主义加以过滤，除去其中所有幻想和华丽之物，把一切实际的、有生气的东西加以利用。列宁在自己的一部早期著作中就曾建议从马克思主义中“创造一个最合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布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个政治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卷第302页）①

然而，列宁对“组织”的理解也不外乎是一般的政党、联盟或者协会而已。

无论在历史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当今共产主义的武库里，这一问题都极其重要，因此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列宁认为，“革命者的组织”——这并不单单是组织，而是带有两种网络的**组织系统**：一种是党组织本身的**纵向网**，等级森严，从属分明；一种是由辅佐性机构组成的**横向网**，这些机构表面上是非党组织，实际上是纵向网意志的执行机关。

首先和最早建立的是最高的、人数很少的党的领袖组织，列宁称其为“职业革命家组织”。他对这一组织做了下述言简意赅的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蛊惑人心的人诱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容易）；（3）参加这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8页。——译者注

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454—456页）①

在警察制度下，所建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其保密技术应能同政治警察的保密技术相媲美。列宁的这一组织，在革命工作技术方面，应当既是侦探组织，又是反侦探组织，是全面领导地下革命工作的“中枢神经”和宣传总部。列宁也正是这样讲的：

“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专门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的事情——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全城各区域、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同上，第457页）②

列宁认为，在警察制度下，要求按民主原则建立党组织是天真可笑的。应当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其领导应当是独断专行的。列宁说，在专制制度下，不能实行民主，因为民主“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的统治下，**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民主……（民主）只能便于警察来广泛破获我们的组织……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列宁全集》第3版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33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6页。——译者注

第4卷第468—469页）①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被破坏后，由于经过四年间歇，加以《火星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为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做了两年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因而为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立了思想政治及组织前提。《火星报》编委中，一对朋友和敌人——列宁和马尔托夫——作为组织者和党的理论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们的领导下，《火星报》分社和各种组织的秘密网遍布俄国各地，秘密网的工作开展得颇为出色。这就为1902年11月以革命方式建立新的党中央机构——“筹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创造了条件。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与《火星报》不同，它不是建在国外，而是建在俄国本土，在普斯科夫市。

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建立“组委”这一事实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由俄侨政论家的理论开始变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最初参加组委的有党的实践家和组织家——В·Н·克拉斯努哈（代表彼得堡委员会）、Е·Я·列文（代表《南方工人报》派）、И·И·拉德琴柯（代表《火星报》组织）。后来，Г·М·克尔日查诺夫斯基、Ф·В·连格尼克、П·А·克拉西柯夫、И·Н·列佩申斯基（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要人）、К·波尔特诺伊（代表崩得）、Р·С·加利别尔戈什塔特、Е·М·亚历山大洛娃、В·Н·罗札诺夫（代表《南方工人报》派）、А·М·斯托帕尼（代表《北方协会》）也被补选为组委委员。（《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5卷第415页）组委行使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并在1903年2月全会上（奥勒尔市）制定了召开新的、第二次党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48—350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代表大会的程序。

组委散发了“通告”，宣布组委成立，阐明它的宗旨和任务。“通告”说：

“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面临着任何地方委员会……都不能胜任的重大任务……只有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成一支**集中的、有纪律的队伍**所产生的集体力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6页）①

组织委员会宣布，它的目的正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党，因此在党的中央机构恢复以前，组织委员会将担负某些全国性的工作（印刷全俄传单，全面的运送和技术工作，建立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等等）。（同上）②

列宁在《火花报》上发表文章评论“通告”说：

“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的声明已经把自己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需要统一起来的不是某些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切领导工人运动以唤起居民中整整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去争取独立生活、去进行斗争的人。我们需要以**严格的和有原则的团结**为基础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委员会、组织、团体、知识分子和工人都必须自觉地和坚决地去实行的。”（同上，第277页）③

“通告”的主要口号——党是“一支集中的、有纪律的大军”——是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的口号，而列宁所做的评论——这样的党要建立在“严格的、原则性团结”的基础上，来自他的另一个口号：“联合之前先要划清界线”。列宁在党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76页。——译者注

② 同上。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7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力争建立的正是这样的党。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问世一年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大会起初在布鲁塞尔，后来移至伦敦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分子”（国外社会民主党《火星报》（1900年）的拥护者，该报由上边提到的“六人”编辑委员会所领导）在组织问题上所持的两种观点第一次冲突起来。迄今为止《火星报》组织在反对党的右翼即所谓“经济派”（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等人）的斗争中一直是统一的、团结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却分裂为两派。在组织问题上（而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他们各有各的理论，这就是党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的根由。在如何对待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分裂已有显露，而代表大会闭幕前选举党中央机构时，分裂已成事实。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代表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的支持。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派得到《火星报》其他编委的支持。

局外人甚至很难理解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把党章第一条的两种提法做一个比较，一个是列宁的提法，一个是马尔托夫的提法。

马尔托夫的提法：“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7版第1册第45页）①

列宁的提法：“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同上，第43页）②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页。——译者注

表面上看，党章第一条的两种提法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包含在这“几乎”二字之中。马尔托夫说，凡“在党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列宁却说，只有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马尔托夫想扩大党，列宁想缩小党。马尔托夫要建立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党，列宁要建立一个有纪律性的党。马尔托夫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能控制自己中央机构的党，列宁要建立一个由独断专行的中央所领导和控制的等级制组织网。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说：“党员越多越好。我认为，阴谋组织之所以有意义，那是因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能将其包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63页）

列宁回答说：“我们需要建立各式各样、各种**类型**、**级别**和**性质**的组织，从人数很少的秘密组织，到人数很多的、自由的lose Organisationen①。党组织的必然特点是，它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同上，第265页）列宁还进一步在党内建立了“联环保”，他补充说：“任何一个党员都要对党负责，党也要对党员负责。”（同上，第277页）

列宁总结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指出：

“实际上，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机会主义分子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已经有所暴露：他们替那个捉摸不定、没有紧密团结起来的党组织进行辩解，对**从上至下地建立党**的思想持敌视态度。”（列宁《论党的建设》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2页）

列宁提醒反对他的人说，当初《火星报》是赞同他的建党方案的。他写道：《火星报》当时竭力想把某些基本思想作为党组

---

① 涣散的组织。——译者注

织的原则，实际上，这些思想可以归纳如下："第一，集中制思想……这一思想应当贯穿党章的始终……"（同上，第153页）

在代表大会上，围绕党章第一条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为此大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议。代表阿基莫夫在陈述反对列宁方案的人的意见时说，列宁极力想把"纯粹的军警精神写进我们的党章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96页）

普列汉诺夫一直沉默不语，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听他的发言，他是最后发言者之一。他说：

"大家对这个题目谈论得越多，我对大家的发言越是仔细琢磨，我头脑中的一个信念就越加坚定：真理在列宁一边。"（同上，第271页）

至于有人说，列宁的提法是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教授关起党的大门，普列汉诺夫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同教授打交道，事先就要做最坏的打算。"（同上，第271页）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这一问题上支持列宁，而且还支持列宁反对代表马尔丁诺夫的进攻，后者列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言论，充分证明，列宁有关"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理论，特别是"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理论，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指责马尔丁诺夫断章取义，说他和某位书刊检查员差不多，一次，那位书刊检查员说：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祈祷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那我就能向您证明，这段祈祷词的作者应该被吊死。"（同上，第108页）

但是，列宁关于积极的先锋队和消极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党纲之中。党纲是《火星报》制定的，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的一致通过。"经济派"阿

基莫夫天才地预见到党章和党纲要把人们引向何处，他说：

“对党来说，争取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成了次要事情，成了一时的权宜之计。所以，在党纲的这一条中，出现了把我们党及其利益同无产阶级及其利益相割裂的趋势。在论述党的任务那一段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那一段中，党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了，党总是以积极活动的集体身份出现，而无产阶级则是以受党影响的消极群众的身份出现。因此，草案中，党这个词总是做主语，而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总是作宾语（笑声）。”（同上，第127页）

布尔什维主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预见是何其深刻，尽管当初这一预见却遭到一些人的嘲笑。不过，嘲笑这一预见的人，后来却首先做了自己不识相的牺牲品。

历史形成的术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初力量对比和第一次分裂。未来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专制党**？在这一场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争论中，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即是“孟什维克”，而马尔托夫处于多数地位，是“布尔什维克”①。五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二十三人投票赞成列宁的草案，二十八人反对，而马尔托夫的草案二十八人赞成，二十二人反对（一人弃权）。

列宁默默地忍受了自己的失败，没有使事态加剧，没有进一步加深分裂。他信守自己所喜爱的一句格言：“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列宁《论党的建设》俄文版第358页）②他

① 布尔什维克是俄语“большевик”一词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孟什维克是俄语“меньшевик”一词的音译，意即少数派。——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4页。——译者注

在代表大会上就立刻“学习”起来，以便将来战胜自己的对手。他巧妙地运用迂回出击和分化瓦解战术，好一来打击和分化敌人的力量，二来让敌人自相倾轧。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因为马尔托夫的“多数”并不是一个紧密的实体，它是由下述三种不同派别的代表所组成：（一）马尔托夫派；（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会的成员及《工人事业报》编辑部成员，他们同《火星报》组织势不两立；（三）犹太社会主义协会“崩得”的代表，这个协会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享有独立，列宁和马尔托夫对此表示反对。

列宁及其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的所做所为，使后两派终于退出了代表大会。于是，列宁由“少数派”领袖变成了“多数派”领袖。此事发生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委和《火星报》编委之时。主要分歧是在选举中央机关报编委时暴露出来的。

马尔托夫建议代表大会把先前所有的编委即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全部选进去。列宁建议只选前三名，即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

马尔托夫的理由是：这六个人一贯表现很好，他们筹备了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六人当中，不论谁的名誉受损，马尔托夫都是不能接受的。

列宁的理由是：这六个人没能胜任文字加工工作，六个人太多，不能迅速有效地做好工作，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只重感情”。

其实，列宁另有考虑。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原来的六人，有四人拥护马尔托夫。代表大会上只有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站在列宁一边。如果选三人，力量对比（二比一）就会对列宁有利。

为了使代表们能充分展开争论，代表大会建议这六个人都退

出会场。这时，列宁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工作成效第一次显示出来了——列宁的拥护者们人多，心齐，守纪律，他们一致支持列宁的提议。投票时六个人返回会场。马尔托夫再次提醒代表大会说，如果只选三个人，他就拒绝当选。然而，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议，选出了由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普列汉诺夫获二十三票，马尔托夫——二十二票，列宁——二十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375页）

于是马尔托夫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

“尽管我声明不做候选人，然而我还是当选了，因此我要声明，我不能接受给予我的荣誉……我不能为三人小组的政治负责，根据通过的党章，这个小组应当对俄罗斯事业的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我不想做这个机构中的‘第三者’，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这一机构的附属品罢了……事实上，党的所有权力都落到两人手中，如果我同意在他们那里做一个第三者，那就太不珍惜编辑这一称号了。”（同上）

马尔托夫的这一声明，标志着俄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地分裂为两大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和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派。人们开始把第一派叫做“孟什维克”，把第二派叫做“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是根据选举中央机关报编委和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们各自所得的票数而来的。

中央委员会也是由清一色的列宁的拥护者所组成，而且，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还有权补选中央委员。还选出了党的总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审判监督机关，总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人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两人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第五个人是党总委员会的主席，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普列汉诺夫当选党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然而，代表大会过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就发生了龃龉。大概，普列汉诺夫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他的错误给他带来了如何的后果。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出色的雄辩家，他对党内低级、庸俗的工作感到由衷的厌恶。他的贵族气质不适于干这样的工作。列宁却相反，他极端蔑视抽象的理论和夸夸其谈，他任劳任怨，整天忙于平凡的建党工作。普列汉诺夫是位理论家，列宁是位实干家，在这方面他们两人很好地彼此取长补短。起初，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联盟确实象一桩深谋远虑的婚姻。当上文讲到过的阿基莫夫提醒普列汉诺夫，要他注意同列宁在政治上结合是多么危险时，普列汉诺夫用一个历史笑话搪塞说：

“拿破仑有一个怪僻，他爱挑拨他的将军们同妻子离婚，有些将军便对他做了让步，虽然他们是爱自己妻子的。阿基莫夫同志在这一点上颇象拿破仑——他一定要我和列宁离婚。但是，我比拿破仑的将军们固执得多，我不想同列宁离婚，并且希望他也不打算同我离婚。”此处的会议记录注明说：“列宁同志边笑、边摇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37页）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离婚”了。普列汉诺夫建议列宁将《火星报》编辑部先前的成员吸收到编辑部来，这项建议是普列汉诺夫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压力下做出的，而且他也想借此向列宁提出警告，否则有彻底分裂的可能。列宁退出编辑部，以示抗议。普列汉诺夫现在只好邀请（补选）马尔托夫和其他三位编委回到编辑部来。他们接受了邀请。于是“新”《火星报》诞生了。布尔什维克称之为“孟什维主义的”《火星报》，尽管这家报纸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领导的。

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党。从此，两党

之间的组织分歧也逐渐发展成策略和思想分歧。代表大会之后，当孟什维克重又掌握党的领导机关之后（中央机关报、党总委员会，但是中央委员会仍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列宁不久就建议将他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去），列宁发表了一部新作——《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在这部著作中，他维护自己的组织计划，并论证说，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就是“进一步”，而“孟什维克”掌握党权，就是“退两步”。列宁写道：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以及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怀疑一分钟，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意志薄弱的表现。”（列宁：《论党的建设》俄文版第287页）①

可是列宁说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以后，两派之间的分歧不是纲领性甚至不是策略性的分歧，而是组织性的分歧。他写道：

“分歧不是纲领性的和策略性的，这只是些组织性质的问题……新《火星报》的立场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在围绕着党章第一条所展开的争论中，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已经暴露出来了……”（同上，第124页）

他号召他的拥护者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开展严峻的斗争，要他们对反对者不要心慈手软。他写道：“在政治上战利品并不是不用代价就能得来的，而是经过战斗争取来的。”（同上，第286页）②

列宁还谈到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同国际社会民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08页。——译者注

主党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原则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可以看到，不过（有相当的改变）罢了。”（同上，第273——274页）①

有一个人一语道破了列宁计划的宗旨，这个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被人看作是“列宁手中的大棒”，在代表大会期间他背弃了列宁，他便是托洛茨基。

列宁写道，托洛茨基正确地阐明了党章，因为他说：“我们的党章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都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同上，第161页）②

如此说来，什么是列宁心目中的党呢？老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对此回答说：

“对列宁来说，党就是他的‘计划’，是他指导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即是党。”（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总号70；作者引自《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431页）

马尔托夫描写过列宁拟定的“过分集中的原则”，阿克雪里罗得则把这一原则说成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列宁：《论党的建设》俄文版第155、245页）③。对于所有这些指责，列宁做了心平气和的回答，并且有他自己的逻辑。他说，对，“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2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41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32、354页。——译者注

人群众组织”（同上，第147页）。

甚至还不仅如此。当马尔托夫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列宁主义”时，列宁却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他说，所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了委屈的人，现在都“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并举起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旗帜”——列宁把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加了括号，并补充说：

“马尔托夫总想等到他自己方面凑成五个人时实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绝顶恭维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同上，第147页）①

列宁自己不喜欢听恭维话，他对自己的对手也只会说一种恭维话——破口大骂。

代表大会之后，列宁立即着手实现在地方建立党组织体系的计划。在一封名叫《给一位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的通讯中，列宁对自己的计划做了具体的说明。他建议不仅在各级委员会中，而且在至关重要的特殊部门中启用地下社会民主党的优秀党员，例如可以让他们印刷和传递文件、巡回宣传、在身份证办理局工作、做军事小组的领导，也可以让他们做“反间谍小组”的领导。列宁指示说：

“（一）我们应当使工人认识：杀死特务、挑衅者和叛徒，有时当然是绝对必要的……”，

“（二）还需要建立一些战斗小组，组织一些服过军役的人或者身强力壮的机智的工人在游行示威、越狱等等时协助进行工作”；

“（三）应当适应运动的需要，按照设立委员会的分部机构的方式，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如大学、中学青年小组、官员协

① 见《列宁文选》第2版第1卷第502页。——译者注

助者小组、运输小组、印刷小组、身份证办理小组、筹划秘密住宅小组、监视特务小组、军事小组、武器供应小组、'筹集财务的机构'小组等等。建立秘密组织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利用一切力量，'把工作分配给每一个人'，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5卷第184—187页）①

党内有同志反对说，如果中央混进能力不强的人或是政治警察的代理人（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代理人，他于1912年混进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那末列宁的过分集权的组织便会产生很大危险。列宁回答时指出，"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这种现象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样做甚至就是直接危害革命工作。"（同上）②

当时特别重视在工厂开展工作。但是，那里的党组织系统也是按着一般的、等级制的规定建立的：

"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因此，工厂的工人组织应当同任何革命组织一样，内部是秘密的，外部是'枝脉纵横的'，应当把自己的触角远远地伸展到各方面去……工厂委员会应当由极少数革命者组成，这些人直接接受委员会（上一级委员会。——作者）的委托。工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应当是委员会（上一级委员会。——作者）的代办员，必须服从委员会的一切指示，必须遵守'作战军'的一切'法令和常规'。加入'作战军'以后，不经过长官的允许没有权利在战争时期离开军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5卷第185—186页）③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2—215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2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13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列宁对他所说的"集中领导"做了通俗的解释，他把中央比作乐队指挥，党是乐队。他写道：

"为了使党的中央能够实际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如何练习和练习完了某种乐器，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拍节，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调换谁去，怎样调换和调到什么地方，等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5卷第190页。）①

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把独裁集中制冒充为"民主集中制"。列宁最后做了下述重要的结论：

"运动的领导应该尽可能由同类成份成员的小组的极少数人和经验极其丰富的极少数职业革命家来担当。参加运动的人数和无产阶级各阶层（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阶级）中的各种小组应该尽可能多。"（同上，第189页）②

列宁一语道破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集中领导，分散负责。"（同上，第188页）③直到现在，这句话仍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指南。（A·Avtorkhanov, The Communist Party Apparatus, Chicago, Regnery, 1966, pp.7—16）④

然而，党分级别并实行集中领导这一列宁的主导思想，在列宁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审批的党章草案有关组织问题的准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列宁的党章草案有个明显弊病，即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列宁一直说他的敌人有这一弊病。换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7—21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18页。——译者注

④ 阿·阿夫托尔汉诺夫：《共产党组织》1966年英文版第7—16页。芝加哥雷纳律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之，在组织问题上列宁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受党内民主派（马尔托夫集团）的压力和影响，接受了他们有关建立党的上层机构的组织纲领。例如，在列宁的党纲草案中有明显反列宁的党的“多中心”思想。列宁提议不是建立一个而是三个独立的、互不从属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党总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在他的草案第四条中对这一要求做了说明。第四条说：“党代表大会任命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43页）①下边的条款对于这三个机构的职权范围做了规定：

“5、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主管党的中央会计处以及一切技术性的全党机构。中央委员会处理党的各种组织、各种机构之间的以及它们内部的争端。

“6、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思想上领导党……

“7、党总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选中任命五人组成。总委员会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在一般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方面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党总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完全被破坏时重新建立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分册第43—44页）②

第八条说，新的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批准，但是它们必须同样服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决定。（同上，第76页）③

马尔托夫写道，代表大会围绕党章第一条开展的斗争，是“最有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斗争。”（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

①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2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3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主党历史》俄文版第75页，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出版社出版）但是他又补充说，“对于列宁来说，由于通过了党章的其他各条，所以他在第一条上所遭到的失败也就化为乌有了。”（同上，第76页）

对于列宁来说，党章获得通过的意义在于，即便党章中有“多中心”思想，他仍能使中央委员会具有一种实际作用，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得以凌驾于另外两个机构之上。建立一个独断专行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列宁最终的理想。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本小册子中说，一次，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中央委员会应该具有何等的权威和力量时，象征性地向会场挥起了“拳头”。（M·A·Landau—Aldanov, Lenine, Paris, стр.63①；斯皮里多维奇，《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1922年巴黎俄文版第75页）

列宁自己在总结代表大会有关党章的辩论时写道：“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所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430页）②

但是，不是任何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列宁都需要。他要的是只有他才能驾驭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想通过改选后的中央机关报将这种驾驭以组织的形式写进党章。当马尔托夫指责列宁的这一企图时，列宁公开承认说，对，他的目的正在于此。列宁说：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甚至竟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如果

---

① 朗多—阿勒达诺夫：《列宁》巴黎法文版第6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文稿》第1卷第210页。——译者注

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末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307页）①

代表大会选举了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派的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派的马尔托夫当选为编委。代表大会还选出了由克尔日查诺夫斯基、连格尼克、诺斯柯夫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三人皆是布尔什维克。当普列汉诺夫提出要把中央机关报所有旧编委都请回来时，列宁退出了编辑部，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又被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加利佩林也被补选进中央委员会，成为第五名中央委员。就这样，中央机关报被孟什维克所把持，而中央委员会被布尔什维克所把持。

1903年7月在基辅成立了以克尔日查诺夫斯基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Л·克尼波维奇任书记，后来被E·斯塔索娃所替换）。在日内瓦成立了以连格尼克（他的助手是中央委员会在国外的代办员——M·利亚多夫、П·列佩申斯基、B·邦奇—勃鲁也维奇）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分部。（《苏联共产党历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482—483页）1903年9月，Ф·古萨罗夫、P·泽姆利亚奇卡、Л·克拉辛和M·埃森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设置了组织组、技术组、财政军需组和军事组。还成立了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中央委员会的全盘工作。（同上，第483页）

中央机关报改组之后，党总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三人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的普列汉诺夫，另外两人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和连格尼克。当党总委员会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61页。——译者注

要求补选孟什维克的代表进中央委员会时，列宁坚决反对总委员会这一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出路只有一条——召开代表大会"。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说："把所有一切力量都调到各委员会里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29页）①

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建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布尔什维主义据点——中央委员会北方局（负责指导莫斯科、彼得格勒、特维奥斯克、尼日戈罗德、北方及里加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南方局（负责指导敖德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和尼柯莱也夫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东方局（负责指导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局在高加索的职权由高加索联合委员会代行。

官方历史学家指出："中央委员会各区域执行局的建立，使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各区域执行局为建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奠定了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497页）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之争：马尔托夫为建立一个实行民主治理的党而斗争，而列宁要建立一个绝对集中制的党。新《火星报》上写道，列宁想建立的党，犹如一座特殊的大工厂，中央委员会是厂长，而把党员都变成"小齿轮和小螺丝钉"。（同上，第502页）列宁的方针是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是党总委员会没有接受列宁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于是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履行召开代表大会的职责（按党章规定，应由党总委员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没有听从列宁的一而再，再

①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196页。——译者注

而三的劝告。列宁大为恼火，他写道：

"我认为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实际上都是些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马尔托夫派吐他们一脸口水，他们擦干了竟来教训我说：'斗争没有益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6卷第355页）①

1904年2月列宁终于迫使在俄国的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了他有关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使列宁大失所望——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五票（加利佩林、克尔日查诺夫斯基、诺斯柯夫、古萨罗夫和克拉辛）反对，一票（泽姆利亚奇卡）赞成，否决了列宁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1卷第509页）。在国外的中央委员连格尼克和埃森支持列宁。尽管如此，列宁仍不是多数（九人有五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

很快中央委员会便发生了新的变化：被列宁派回俄国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连格尼克和埃森被逮捕，泽姆利亚奇卡被调离中央委员会（因为她兼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克尔日查诺夫斯基提出辞职，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古萨罗夫自动离职。中央委员会只剩下三名委员：诺斯柯夫、加利佩林和克拉辛。1904年7月底，这三个人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了称为"七月宣言"的关于同孟什维克和解、统一全党的决定。中央委员会还承认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原先的编委补进编辑部是合法的，并且认为这个报纸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另外两项决定：取消列宁在国外代表中央委员会的资格，派人检查列宁的著作（"每次出版他的著作需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同上，第509页）。禁止任何有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宣传。列宁的拥护

①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1页。——译者注

者邦奇一勃鲁也维奇不再负责党在国外的一切技术性工作，这项工作改由诺斯柯夫负责。列宁的另一个拥护者利亚多夫也交出了党的财权。又有三名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人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他们不是列宁主义者，他们是：A·柳比莫夫、Л·卡尔波夫和И·杜勃罗夫斯基。列宁把所有这些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称做"调和主义者"，这乃是"机会主义者"的同义词。列宁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一样，与他们展开了同样残酷的斗争。

不久，中央委员会又增加三名孟什维克的代表，这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彻底变成了反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官方党的历史学家写道："孟什维克似乎可以庆祝胜利了；所有党的中央机构都落到了他们手里。然而，孟什维克得到的只是机构，而不是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1卷第510页）

如果列宁找不出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那他就不称其为列宁了。在政治上，列宁从不承认有绝无出路的情况。作为党的策略家和谋士，他是没有对手的。他宣布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一个"使我们党蒙受耻辱的国外小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47页）① 列宁说，"完全把持在自行补选出来的野心家手里的新中央委员会，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破坏和分裂多数派的一切地方委员会。请同志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以为中央委员会没有另外的目的。"（同上，第147——148页）②

列宁认为，他的任务是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同俄国各地方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隔离开来。他在日内瓦城郊召集的"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新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机构问题；用

---

①②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0页。——译者注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代替目前公开的中央委员会，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代替现在合法的《火星报》编辑部。

会议结束后，列宁立即派自己的拥护者到俄国去，以便在各地方委员会提出和批准这些决议。同时会议还发表《告全党书》批评旧的中央委员会、阐明建立新的党中央机构的任务以及尽快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必要性。二十个拥有表决权的地方委员会中，十二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1卷第512页）1904年11月至12月间在俄国召开了三次区域代表会议，十三个委员会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由列宁、P·泽姆利亚奇卡、A·波格丹诺夫、M·利亚多夫、Г·古谢夫、M·利特维诺夫、П·鲁缅采夫所组成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同上，第514—515页）常务局应当在俄国开展工作。1904年11月至12月间，还在国外成立了《前进报》编辑部，列宁、B·沃罗夫斯基、A·卢那察尔斯基、M·奥利明斯基任编委，H·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同上，第515页）

列宁就是用这种迂回包抄的战术，使中央委员会所有旨在把相互斗争的两大派联合起来的努力均告无效。

孟什维克也用同样的方法回敬列宁。他们加强了反对列宁的行动：在国外他们获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国内获得的成绩较小。在国外，孟什维克获得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的同情，特别是获得第二国际最主要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孟什维克某些领导人想借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之手，来消除列宁的影响。例如，1904年5月14日波特列索夫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

“……我急于想告诉您一个消息，我刚刚收到考茨基的信，他允许我们在《火星报》上发表他给利金（即利亚多夫，是列宁的拥护者）的回信。看来，第一颗炮弹造好了，感谢上帝帮忙，

列宁就要飞上天了。我认为，制订一项反列宁运动的总计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要轰炸他，就要把他炸垮，要讲究方法，要按计划行事。如何打击列宁——这还是一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让权威们——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去反对他。”（《关于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资料》俄文版第1卷第124—125页，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主派——孟什维克，这是很自然的事。考茨基在上述那封给利亚多夫的回信中写道：

“……假如我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并要在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做抉择的话，那末，根据我们在德国的全部活动经验，我会坚决拥护马尔托夫的。”（1904年5月15日《火星报》，第66号）

尽管如此，恰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企图使这两个对立派言归于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颇受列宁的尊敬，他写信给列宁，愿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调停人。第二国际领导人委任倍倍尔为仲裁法庭庭长。但是，列宁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于列宁来说，不是按照他的组织计划建立起来的党，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理论，不是他自己的领导，他是绝不接受的。尽管他在政治上能表现出极大的策略灵活性，但是，在争夺权力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他象钢铁一样坚定。他说：“原则性的政策是最正确的政策。”

正如上文所说，1904年夏，由于几名中央委员被捕，中央委员会违背列宁的意愿，把几名孟什维克补进中央委员会。为此，孟什维克把自己发行文件的机关交由中央委员会掌管，并在形式上将自己的地方委员会置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现在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所以中央委员会才通过决议，承认普列汉诺夫补选原中央机关报编委是合法的。

现在，孟什维克不再反对同列宁讲和。他们建议列宁仍旧回到编辑部来。列宁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指责过去同他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搞调和。之后列宁便组建了上述两个新的党机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是布尔什维克新的中央委员会，《前进报》则是布尔什维克新的中央机关报。

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之间为争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 二 章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吃了败仗的孟什维克，立即在国外党组织中奋力反击，在这些组织中，他们从一开始就占优势。当时召开了称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同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大会，大会谴责了列宁的“官僚集中制”，拥护孟什维克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所有主要争论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对此做了反击，解散了代表大会，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废除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3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成立大会，选举了国外组织委员会，批准了委员会章程。

据说法不一的官方资料来看，当时俄国国内各方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开展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三十二个，小组三十五个，开展活动的孟什维克委员会二十三个，小组二十七个，其余十个委员会和四十三个小组持中立或“调和立场”。（《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9页）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只占精神优势，而物质优势则在孟什维克一边。因此他说：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孟什维克掌握了较多的钱，较多的报刊杂志，较多的运输机构，较多的代办员，较多的‘名人’和较多的工作人员。不看到这一点，就是不可饶恕的幼稚行为。”（《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46页）

据《前进报》说，在二十九个由总委员会确认的“合格组织”中，十五个拥护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同上，第335—336页）①，但是，“总委员会撕毁党章，用欺骗手段规避召开代表大会的职责。”（同上）②

1905年1月21日多数派常务局担负起党总委员会的任务，发布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附有列宁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论证了常务局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孟什维克的总委员会和采取调和立场的中央委员会抵制代表大会的召开。俄国国内党组织对《通告》的反应表明，列宁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的党总委员会决定利用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倍倍尔提出的关于恢复党的统一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905年3月10日所做的决定是给参加俄国国内常务局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通知，它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德国党和倍倍尔的调停以恢复党的统一，并表示同意派两名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以便商谈如何实现调停的主张”。（《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49页）③这一决定对列宁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党总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就是从实际上及法律上承认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列宁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列宁不无道理地指责总委员会的行径不合逻辑。他写道：

“你们为什么只愿意派两名**国外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呢？为什么不派一切党组织的代表呢？要知道，俄国国内多数

①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198—19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9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12页。——译者注

派委员会常委局的委员们曾邀请所有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同上，第352—353页）①

党总委员会实际上是投降的行为明显地提高了代表大会的威望。1905年初，十一名中央委员中，有九名在俄国被逮捕，其余两名没被逮捕的中央委员——克拉辛和柳比莫夫于1905年2月就召开代表大会问题开始同常务局谈判。克拉辛代表中央委员会，古谢夫代表常务局。列宁唯恐党总委员会背着中央委员会搞把戏欺骗他。列宁写信给古谢夫说：“常务局无权对中央委员会作丝毫的让步。不然，我们在这里将举行哗变，而一切坚定不移的委员会将和我们站在一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15页）②

然而，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说党总委员会做了有条件的投降，那末，党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则是无条件的投降。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局决定设置组织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告全党书》说，“召开代表大会是为了确定党的共同策略和党的组织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638—684页）

列宁庆祝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他写道：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庆祝精神上的完全胜利了！俄国国内比国外占了上风。中央委员会在最后一分钟表现出足够的光明正大的勇气……起来反对国外总委员会。”（《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70—371页）③

列宁几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截至1905年4月，俄国的二十

---

①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15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9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37—238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九个组织中有二十个拥护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成立的委员会，经中央批准，有权参加代表大会）。

即将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所有主要文件——有关策略和有关组织的文件——均由《前进报》编辑部所起草。

4月12日（25日）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会议一直持续到1905年4月（5月）27日（10日）。二十四名拥有表决权和十四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二十一个委员会派出了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代表大会确认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起了领导作用，是这一革命的动力，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今后，要将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把群众的政治罢工引向武装起义——这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的这一总纲领，并把它作为指示文件发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以便同专制制度展开直接的斗争，这是党在目前革命中的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450—451页）按着列宁的上述纲领，这一斗争应该产生“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临时革命政府则是这一专政的首脑机关。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否参加这一政府的问题，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意见分歧。孟什维克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不应参加这一革命政府。列宁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写道，“根据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不容事先做出确切判断的因素，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451—452页）

在农民问题上，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纲领，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当时列宁著作中所提的纲领更为激进些。只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日益增长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列宁才首次承认俄国农民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盟军，这个同盟军最终使他掌握了俄国的权柄。如果说从前列宁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主张把1861年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获得解放时地主夺走的土地还给农民的话，那末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则提出没收地主、官方、教堂、寺院和皇室的土地，并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施这一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454页）

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代表大会建议"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掌握工人运动的企图给予强有力的抵制"，但是，要"支持革命的、或仅仅是站在反政府立场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资产阶级"。（《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82页）①

列宁提交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新党章，已经是真正的列宁的党章，它同列宁的旧的"多中心论"党章已毫无共同之处。

首先，代表大会把列宁提出的著名的第一条写进了新党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工作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同上，第87页）②

党章中，有几条讲的是旧党章中的"多中心论"应予废除：

"第五条　中央委员会代表党同其他政党发生关系，任命一个中央委员担任中央机关报的主编；组织各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和党的其他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88页）③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95—96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10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04页。——译者注

“第八条 ……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一切党组织还应从其全部收入中提出百分之二十向中央会计处缴纳党费……”（同上，第89页）①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和参加党组织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工人同时赞成解散地方委员会，那末中央委员会就应当解散地方委员会。”（同上）②

新党章还规定，“补选中央委员会委员，需经一致同意。”但是，在地方各个委员会中，以多数票决定补选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同上）③

这样一来，党总委员会被取消了，中央机关报不再是独立的组织，它不再由代表大会而是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编委，地方委员会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分会。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有关孟什维克的专门决定，把他们称为“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而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孟什维克可以参加地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81页）④

代表大会选出由列宁、A·波格丹诺夫、Л·克拉辛、Д·波斯托洛夫斯基和A·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波格丹诺夫、克拉辛、李可夫属“调和”派。列宁没能阻止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声明，从现在起《火星报》不再是中央机关报（因为《火星报》的编委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火星报》的路线也是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背道而驰的）。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

---

①②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05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94页。——译者注

会创办新党报，名称叫《无产者报》。

中央委员的分工是：列宁任中央机关报责任编辑和国外中央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任秘书）；A·波格丹诺夫任国内所有报刊杂志的责任编辑和组织者；Л·克拉辛主管财务和运输部门；A·李可夫和Д·波斯托洛夫斯基（亚历山大罗夫）主管国内党组织工作（与地方委员会联系，分配人力等）。中央委员出缺时，由候补中央委员A·埃森、П·鲁缅采夫和C·古谢夫递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471页）

几乎在布尔什维克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十四个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从俄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孟什维克的侨民组织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据《火星报》编辑部说，这些代表实际上代表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党员，尽管如此，孟什维克领导人仍不愿意把自己的会议叫做代表大会。虽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总委员会——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但是孟什维克并没有利用它们。

布尔什维克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合法章程，而孟什维克却对章程恪守不渝。所以，他们才把自己实际上的代表大会叫做咨议性机关——"代表会议"。从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可以看出孟什维克内部分裂的痕迹。一位西方著作家写道："从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可以看出严重分歧的迹象，这些分歧已在孟什维克队伍中形成。"（《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y L·Schapiro, New York, 1959, p·62）①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两种观点之间展开了斗争，那些追随阿

① 夏皮罗：《苏联共产党》英文版第62页，1959年纽约出版。——译者注

克雪里罗得的人力争要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合法的工人党（列宁称他们为“取消派”），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维护由《火星报》建立的秘密干部组织，不过要使这一组织摆脱列宁的极端做法（马尔托夫）。所以，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具有两面性：在提出合法要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罢工自由和在现存制度允许范围内建立工会的自由）的同时，又提出一些革命的要求，如群众应当准备参加必然要举行的起义，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准备将自发的革命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些要求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同小异。

虽然孟什维克否认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认为，既然俄国革命对其他各国革命可以起推动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同上，第63页）夏皮罗在比较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的立场时写道：“很显然，许多孟什维克的见解是颇有道理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列宁刚愎自用和执意要建立一个由他个人指挥的党的话，两派是不会闹分裂的。”（同上，第63页）

把两派1905年革命的策略路线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断定：“布尔什维克当时要建立一个革命‘左派’联盟，并由布尔什维克自己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孟什维克要建立一个由所有革命势力和反对派所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两派在那次革命中的战略目标是：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即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以便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合法斗争创造条件。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错误地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做让步，没有把它选出的党的最高机关叫“中央委员会”而叫“组织委员

会”。代表会议建议恢复党的统一，但是要从基层开始，从地方委员会开始，然后再恢复党中央的统一。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指责说，两派都在加剧分裂，于是他自己出版了一份机关报，取名叫《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日记》。

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日子，那天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会上，如上所述，中央委员进行了分工，规定了联系时使用的暗语、密码和代号，还讨论了财政、运输、技术等问题，指定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便中央委员遭逮捕时递补。此外，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俄国各地派遣自己的代表宣讲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并在俄国组织党的著作家和宣传家小组。

很快中央委员会便分成两部分，成立了两个中央局：一个中央局主管国外工作，另一个主管俄国国内工作。第二个中央局取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常务局”，总部设在彼得堡。其第一届成员是：A·波格丹诺夫、Д·波斯托洛夫斯基、Л·克拉辛及补选进中央委员会的П·鲁缅采夫。“中央委员会俄国常务局”下设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由十至十二人组成的专门宣传、鼓动小组。虽然法定的党中央是“俄国常务局”，然而以列宁为首的国外常务局成了实际上的党中央。国外常务局除做总的领导工作之外，还负责出版和发行党的报刊杂志。为此，国外常务局下设经济委员会、发行处、印刷所及财会处。（《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64—66页）

当革命正在进行中，沙皇政府于1905年8月6日发表了关于召集国家杜马这一“谘议性机构”的宣言（宣言草案的起草者是内务大臣布里根，因此，国家杜马又叫布里根杜马）。杜马的选

举是受限制和不平等的选举，许多社会阶层的选举权全然被取消。但是，这是专制制度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面前所做的第一次让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抵制这届杜马，准备武装起义。

国内展开的罢工运动规模越来越大。政府竭力想用武力来结束这种局面。

10月13日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发布的著名命令——“不要放空炮，不要怜惜子弹”——只能使局势进一步加剧。到10月中旬，近二百万工人、职员、学生参加了政治总罢工。沙皇做了前所未闻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让步：他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言大意是：

（一）宣布公民所享有的全部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

（二）规定“没有国家杜马的批准，任何法律不能生效，并且把这条作为固定法，以便保证人民选出的代表真正能对当局行动的合理性实行监督。”（奥利登布尔格：《尼古拉二世王朝》，1939年贝尔格莱德俄文版第2册第317页）

左派党认为，“宣言”虽不是革命的彻底胜利，但毕竟是一个胜利。10月17日晚米留可夫在宴会上说：“是啊，这是一个胜利，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不是首要的胜利。这是斗争的新阶段。”（见《俄国札记》一书中的“关键性的岁月”一章，1939年俄文版）

沙皇不仅给俄国撰写了一份“宣言”，而且还指定自由派分子维特伯爵为新内阁总理，但是，内务大臣、反动分子特列波夫却继续留用。就此Л·托洛茨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通报》上写道：

“给了个维特，却留下了特列波夫。无产阶级既不要流氓警察特列波夫，也不要自由派调停人维特，既不要狼，也不要狐

狸。无产阶级不想要用宪法裹着的皮鞭。”（见奥利登布尔格上述著作第318页）

列宁写道："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所以应当'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列宁全集》第5版第12卷第27页）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告俄国人民书》，其中说，"人民需要的不是写在纸上的允诺，而是确实可靠的保障：立即武装人民，取消戒严，立刻召开立宪会议，取消阶层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立即实行全面的政治大赦。"（《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99页）

10月13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了。11月中旬，工人代表苏维埃已有五百六十二名代表，代表着一百四十七个工厂，三十四个作坊和十六个工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17页）

十月总罢工和苏维埃选举恰恰表明，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中的威望比布尔什维克大得多。孟什维克赫鲁斯塔列夫—诺萨里当选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他于11月26日被捕。11月27日苏维埃再次召开会议，在列宁出席的情况下，会议选出的主席托洛茨基依旧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样，执行的是武装起义的方针。官方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写道，赫鲁斯塔列夫被捕后，苏维埃举行会议，"列宁、马尔托夫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动员力量，准备起义，以此来回敬政府的新挑衅。"（《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25页）

应当指出一个饶有兴味的情况：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成

---

①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415页。——译者注

立那天起，中央委员会俄国常务局就要求它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并且威胁说，否则它就要退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一篇文章中质问："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党？"官方的历史学家解释说，之所以对苏维埃不信任，是因为"苏维埃的领导一开始就落到了孟什维克的手中。"（同上，第104页）

列宁精通自己的业务，他纠正了中央委员会的提法。他对提出的问题答复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是党。"（《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61页）[①]列宁那时就看出苏维埃既可以作为起义机关，又可以作为新政权的雏型。

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崩得等政党的拥有发言权的代表，正式参加了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A·波格丹诺夫、Д·波斯托洛夫斯基参加苏维埃，此外，中央委员Л·克拉辛也当选苏维埃代表，有时列宁还亲自代表中央委员会去参加苏维埃的会议。（《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17页）

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在发表了《12月17日宣言》的俄国条件下，列宁对党的组织机构是怎样考虑的呢？

当时列宁首次提出一条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了所有民主国家里的共产党的指导原则。该理论说：党应当有两套机构——一套做合法工作，一套做秘密工作。用党的语言来说，就是"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相结合"。实际上，这意味着：党的首脑机关和党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合法的委员会，其各级组成人员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参加议会、工会、地方自治机关、党的公开机关和党的报刊杂志编委会等等。此外，各级委员会还

①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页。——译者注

有另一个平行的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绝对保密的，其领导人员不为人们所了解，其中很多人甚至不公开他们的党员身分。

《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一个月，列宁写了一篇《论党的改组》的文章。列宁在谈到改组任务时说："总之，任务很明确：暂时保存秘密机关，同时发展新的、公开的机关。"但是，"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lose"①组织。(列宁：《论党的建设》1956年俄文版第341页)②谈到领导干部和"职业革命家"时，列宁一步也没有偏离自己的理论，而是强调"**继承性**在党的发展事业中的重大意义。"

① 松散的。——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1、15页。——译者注

第　三　章

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俄国革命的进程挫败了列宁以及第三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把孟什维克的领袖与工人、革命运动相隔绝的策略。革命的进程也挫败了布尔什维克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企图。

不仅孟什维克而且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也谴责狭隘的、实质上是宗派主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恢复党的统一。地方上一些党的委员会已经联合起来了。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一如既往，继续宣传日内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同意这种观点。孟什维克在组织罢工运动和广泛建立工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孟什维克在建立彼得堡苏维埃和其他地方苏维埃（五十多个）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迫使列宁第一次向孟什维克投降，然而，他却把最终的胜利寄托在这次投降上。

实际上苏联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写道：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符合革命利益的。在从10月开始的革命高潮时期，基层的统一行动，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的统一行动，在群众的政治罢工中，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组织的共同工作中广泛展开。这使工人认识到，党的分裂是有可能和必须结束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支持这一要求，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会从自身的感受中体会到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最终会使孟什维克的首领们陷于孤立，

会使布尔什维克将广大党员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28—129页）

然而，列宁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却断然声称："统一两个部分，我们同意。混淆两个部分，永远办不到。"（《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80页）①列宁要求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一个是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以便讨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联合方案。但是，列宁想使自己的派别在这一联合体中作为有机的、独立的整体保存下来。所以，在那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他要求说："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去团结，去改善我们这部分党组织。这个策略好象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它是唯一合理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80页）②

1905年11月20日在彼得堡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列宁关于同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的想法，建议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组织委员会合并，组成联合中央委员会，以便召开统一的、旨在搞联合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还建议创办联合的中央机关报。代表会议还向布尔什维克做了和解姿态，接受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

继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之后，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于12月12日至17日在列宁的主持下进行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提出的所有联合条件。列宁对于联合提心吊胆，缺少热情。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报告人克拉辛和鲁缅采夫以及地方委员会的代表都证实说，基层的联合已属既成事实，趁这场联合运

①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35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51—352页。——译者注

动还没有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甩在一旁的时候，应当批准这一运动。列宁只争取到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写上如下几句话：

“党的两个部分应于同时同地召集代表大会，并在彼此商定工作日程之后，在双方的表决权票数相等的条件下，合并为一个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96页）①

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使列宁提出的这一条件也破了产，孟什维克获得了多数表决权票数。

代表会议同时宣布，今后党要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上，党的所有机构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这些机构可以撤换，并向党报告工作。（同上，第99页）②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和自己将来的继承人——斯大林——第一次见面了。

1905年10月底党内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合并，组成一个联合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参加联合委员会的有克拉辛、И·拉拉扬茨和И·萨梅尔），其任务是召开统一代表大会。

1906年2月7日在彼得堡出版了党的联合中央机关报《党内通报》创刊号。编委会由六人组成，三名布尔什维克（列宁、卢那察尔斯基、В·巴札罗夫），三名孟什维克（Ф·唐恩、Ю·马尔托夫、А·马尔丁诺夫）。

开始选举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从前，这一选举只局限在各委员会委员一级的职业革命家小圈子内进行，如今则在民主的基础上，根据每三百名党员选举一名代表的原则进行选举。（《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75页）新的选举程序表明，1905年革命后，孟什维克变得比布尔什维克更加坚强。它同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1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9页。——译者注

时还表明，广大党员谴责列宁热衷搞派别活动。

1906年4月10日（23日）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开幕时，人们看到，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有六十二票，布尔什维克只有四十六票。一百一十二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二十二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六十二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边区、崩得、乌克兰和芬兰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性政策和策略决议，大都符合孟什维克的主张。

代表大会就土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列宁坚持土地国有的思想。孟什维克的报告人坚持土地地方公有的思想（将地主的土地转归地方当局）。不仅孟什维克，而且连一些布尔什维克（苏沃罗夫、巴札罗夫、斯大林等人）也反对列宁的意见，他们主张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人们称他们为“分地派”）。

在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反驳尤为尖锐。他说：“列宁的方案同革命者夺取政权的空想是紧密相联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60页）普列汉诺夫在另一次发言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布朗基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列宁同志自己承认，他的土地方案同他的夺取政权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同上，第139页）

普列汉诺夫对他的土地地方公有的建议做了如下说明：

“我们的纲领应当铲除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可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不能铲除这一基础……列宁认为，他所向往的共和国一旦建立，似乎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土地地方公有则是另一回事儿。在发生复辟的情况下，土地地方公有就不会使土地重新落入旧制度的政治代表者手中……我重复拿破仑的一句

话：心存侥幸的人是不好的。”（同上，第61页）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就这一问题以“伊万诺维奇”的化名做了发言。他既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也反对列宁的意见。斯大林说：

“下述论断应当作为我们纲领的基本点：因为我们要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农民建立暂时的革命联盟，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农民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应当支持他们的这些要求。

农民要求分地，那我们就应该支持没收全部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无论是土地国有化，还是土地地方公有，都是不能接受的。”（同上，第79页）

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纲领。

代表大会前夕，布尔什维克在讨论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时，从积极抵制杜马的立场出发（后来列宁承认这一立场是错误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8页）[①]，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其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断然拒绝参加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488页）

在代表大会上，由于抵制运动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几次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现在说，“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国家杜马，利用它与政府的冲突以及它自己内部的矛盾”，同时，布尔什维克又反对在杜马中建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同上，第493页）然而，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代表组成的杜马党团。于是布尔什维克建议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发出明确“指示”，以确保党对自己的议会党团实行监督。这一建议说：

“中央委员会通知党的所有组织：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页。——译者注

（1）谁；

（2）在什么时候；

（3）在什么条件下被中央委员会指派为议会党团中党的代表。中央委员会还要定期向党的所有组织详细报告议会党团的活动。”（同上，第535页）

代表大会通过了以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新党章。这一原则意味着什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理解。孟什维克把这一原则的重点放在“民主”二字上，布尔什维克则把重点放在“集中”二字上。列宁这一幸运的发现，使不可调和的东西暂时得到了调和，使双方在解释这一原则时，都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后来，斯大林每采取一次措施以使其政权专制化时，都必定援引“民主集中制”，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赫鲁晓夫取消斯大林的集中制时，引用的也是这条原则。那些取消赫鲁晓夫分权制的人，引用的还是这条原则。

在代表大会上，就党的几个领导机关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孟什维克的报告人在谈到党章时说：

“我们主张由代表大会单独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则认为应由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然后再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办法更为合理。”

布尔什维克的报告人对自己的要求做了如下的阐述：

“由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会产生过去那种双重中心。最终编辑部会经常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还不算，在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机关报一道工作的提法中，双重中心具有三重中心的性质。这种联席会议具有从前党总委员会的某些特点。”（同上，第461—463页）

最后还是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双重中心的建议，也就是说，代

表大会单独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由于事先两派之间达成过协议，所以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机关报的选举只用了几分钟。中央委员会由七名孟什维克（B·罗札诺夫、Л·戈利德曼、Л·拉德琴柯、B·克罗赫马利、Б·巴赫梅捷也夫、П·柯洛柯利尼柯夫和Л·欣丘克）和三名布尔什维克（B·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Л·克拉辛、A·李可夫，李可夫被逮捕后，由A·波格丹诺夫接替）所组成。

后来，中央委员会又吸收了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A·瓦尔斯基和Ф·捷尔任斯基（后来契卡的首脑）；拉脱维亚人代表K·达尼舍夫斯基；崩得代表P·阿勃拉莫维奇和A·克拉梅尔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委全部由孟什维克担任，他们是：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马斯洛夫、唐恩、波特列索夫。（同上，第639页，另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91页）不久后，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边区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崩得都作为地方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发表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

在《告全党书》中，列宁对代表大会的所有主要决议和疏忽之处大肆进行批评。他写道：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占很少数。"（《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99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4页。——译者注

总之，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服从这些决议。这种“辩证”提法不仅可以抵制中央委员会，而且可以抵制它的全部实际日常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是在代表大会“错误决议”的基础上开展的。同时，列宁对有利于少数反对派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带来的权利做了肯定。他写道：

“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汇报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和一贯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是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同上，第399——400页）①

列宁就是利用少数反对派的所有这些特权（但是，列宁从不承认他的反对者有这种特权），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间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把广大党员和地方党委员会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出版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报纸《无产者报》（1906年8月）。由于党章规定只准许有一家中央机关报，所以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报纸叫作彼得堡、莫斯科委员会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它只是暂时受挫而已。因此策略不应建立在参加杜马的工作上，而应建立在准备新的全国武装起义之上。为此布尔什维克特别注重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工作。大约五十个党的委员会拥有专门的军事组织和小组，其名称是“军事委员会”。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4页。——译者注

彼得堡委员会（出版了士兵报纸《军营报》）和莫斯科委员会（出版了《士兵生活报》）是两个在军队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196页）1906年7月8日第一届杜马为了农民的利益要求讨论土地问题而被沙皇解散时，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建议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发出呼吁，用举行全面武装起义的办法回击解散杜马。中央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要求，但是决定同杜马中其他左派党一道（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制订所谓的《维堡宣言》。宣言号召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拒绝缴税、不服兵役、不认购沙皇公债。（同上，第204页）

然而列宁仍继续执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他要求说，除苏维埃之外，还需建立专门的"军事组织"领导起义。他说：

"这些组织应当建立一些很小的自愿小组，象十人小组、五人小组，甚至也可以是三人小组来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必须大力宣传战斗就要到来，每一个诚实的公民都应当在这次战斗中牺牲自己……这些小组应当有的是党的，有的是非党的，它们都被一个直接的革命任务——起义反对政府联系起来……自愿战斗小组，'战斗队'小组（如果可以用这个在莫斯科伟大的十二月的日子里获得莫大荣誉的称号来称呼它的话）会在爆发时带来极大的好处。善于射击的战斗队可以解除警察的武装，突然袭击巡逻队，把武装夺到自己手中。不善于射击的或没有夺到武装的战斗队可以协助建筑街垒，当侦察员、组织联络、伏击敌人、焚烧敌人盘踞的房屋、占据可以作为起义者的据点的住宅。"（《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22—323页）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08—109页。——译者注

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到处破坏联合中央委员会政策的威信，——这就是列宁的党的策略。中央委员会完全能预料到，它所要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即便是完全符合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也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横加批判。例如，当中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游行以抗议解散杜马时，列宁回答说：

“和平示威会使无产阶级削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会帮助警察和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演习，逮捕和枪杀他们。”（同上，第315页）①但是，同一个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建议说：“正要加紧利用杜马的解散，把它当作集中进行鼓动来号召全民起义的理由。”（同上，第318页）②

列宁不是把自己全部巨大的政治天才用来反对政府，甚至不是用来反对他极为憎恶的自由资产阶级，而是用来反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列宁不单单是写文章，他还通过组织得很好的、以《无产者报》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办员组织，在地方委员会中煽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鼓动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这一活动已初见成效。在这一活动中，列宁把合法中央的任务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发表呼吁书，呼吁书中写道：

“党的首脑机关中央委员会只代表一派（过去的少数派），而它最近的行径又表明，它违背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愿望。”（《1905—1907年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传单》俄文版第3册第79页）彼得堡委员会要求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以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不久，莫斯科、乌拉尔、尼热戈尔德、明斯克等地的党组织以及中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地方常务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0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05页。——译者注

局、伏尔加河流域区组织代表会议、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管理总局、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等也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08页）

所有发动新的全国起义的企图均告失败，国家杜马在广大居民中间越来越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放弃了抵制杜马的策略。他们决定参加第二届杜马选举，只同劳动团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在上层结成选举联盟。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也可以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选举联盟，这个党主要由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教授、律师、医生、文学家、自由主义企业家）的代表所组成。虽然这个党当时还不是共和党，但它强烈反对专制制度，拥护英国式的议会民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从而比右派政党十月党人（这个党把自已称作"十月十七日同盟"，借此强调它的目标和纲领是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公开的保皇专制分子（对于这些人来说，《10月17日宣言》是一个过于革命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文件）抢先一步。

1906年11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新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端得到解决。代表会议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激进要求。那些由布尔什维克定调子的委员会，仍在抵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彼得堡委员会亦是如此，它拒不承认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彼得堡党组织重又分裂为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结果使得实际上是农民党而不是工人党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堡取得了意外的重大胜利。

第二届杜马（1907年2月20日成立）选举的总结果表明，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所采取的选举策略是正确的：第一届杜马中

只有十八名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二届杜马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获得了六十五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只有十五人。（《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11页）而且，这届杜马也比因“幼稚”而被沙皇解散的第一届杜马左一些。布尔什维克在杜马中继续执行他们先前宣布的策略，即利用杜马的合法讲坛宣传革命主张。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主席是孟什维克策烈铁里）的大多数代表为满足人民的迫切社会需要，努力争取在杜马中讨论一些建设性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遭到少数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坚决反对。对于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来说，现在不应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利用这些需要来达到发动新的起义的目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再是发动革命的有利理由了。因此，杜马制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性的社会法令对革命是再有害不过了。所以，列宁集中党的一切精力，批判党的杜马党团所进行的立法工作。同时，这也为批判中央委员会本身打下了基础，官方历史学家写道，“批判杜马党团所做的工作同批判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结合，这一批判为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又增添一个新理由。”（同上，第214页）

布尔什维克开展运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这个运动组织得很好，很广泛，并已收到成效。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为首的几个最大的党组织投票赞同列宁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纲领”（这是列宁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

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会议于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5月13日至6月1日）在南门路兄弟会教堂（费边主义者所有）举行。三百零三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三十九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代表着一百四十五个党组织的十五万党员。拥有表决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共一百七十七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八十九人，孟什维克八十八人，波兰和立陶宛代表

四十五人，拉脱维亚代表二十六人，崩得代表五十五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621—631页）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A·C·布勃诺夫、K·E·伏罗希洛夫、Г·Г·邵武勉、M·П·波克罗夫斯基、Г·E·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И·B·斯大林是拥有发言权的代表。波兰、立陶宛的代表由大名鼎鼎的罗莎·卢森堡（她同时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率领，扬·季什卡、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Л·Д·托洛茨基以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身分参加了大会。参加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有：Г·B·普列汉诺夫、Ю·马尔托夫、Б·阿克雪里罗得、A·И·马尔丁诺夫、H·若尔达尼娅等人。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党周围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大会。大会的议程很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杜马党团的报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工会和党、游击发动、军队工作、组织问题。

马尔托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波格丹诺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做报告。列宁的发言实际上是对这一报告的补充。列宁指责中央委员会背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策，向自由资产阶级做节节让步，推行向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机会主义政策。列宁得出结论说：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破产，首先而且主要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破产。"（《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21页）①

布尔什维克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做了如此评价之后，建议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做出下述决议：

代表大会审查了中央委员会过去一年来的活动后，认为：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433页。——译者注

1.中央委员会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表现在：

（一）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和争取杜马为政权机关等口号；

（二）企图放弃没收土地不付赎金的要求，而代之以出让土地的要求（出让土地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要求）；

（三）在选举运动时实行了同反革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

（四）在国家杜马中实行了同这个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并拒绝在杜马内外使冲突加深；

2.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表现在：

（一）上述种种违背统一代表大会决议的行为；

（二）中央委员会对无产阶级的重大斗争（同盟歇业和许多类似的事情）响应不够；

（三）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实际工作、组织工作、情报工作及其他工作中，不是党的最高的实际中央机关，而仅仅是党的一部分的代表，即党的少数人的代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56--157页）①

围绕这一决议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崩得和拉脱维亚的代表提出一项建议并获得托洛茨基“中派”的支持，从而结束了这场辩论。这项建议说：

“代表大会听取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之后，撇开所有决议转入以下既定的工作。”（同上，第163页）② 代表大会除四十八票弃权外，以一百四十三票对九十一票的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孟什维克、崩得及拉脱维亚的代表投了赞成票，波兰代表弃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95—19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05页。——译者注

权。

但是，在另一个对他们同样很重要的关于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决议案说：

“1.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

“（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

“（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要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要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将政权转交到人民代表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2.应当把**作为我们党的一个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批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所提出的法案应当为这些目的服务，而不应当为直接立法的目的服务。杜马斗争的总的性质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在杜马外进行的整个斗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61页）①

议会是宣传革命的讲坛，在议会里的工作是炸毁整个国家机器的工作，议会党团是党的组织，而不是人民的代表——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党对待议会的态度上所持的理论。1917年革命后，列宁把这一理论提到永远不变的高度。

1902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列宁所写的这样几句话，这几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议会中所负的使命：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09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否认议会制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形式，否认议会有长期得胜的可能；它以粉碎议会制为己任。**因此，问题只是怎样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以达到摧毁这些机构的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581页）

虽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表面上没有宣布这一决议已经过时，但却补充说，共产党人不仅可以通过起义取得政权，而且可以通过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取得政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

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他认为颇为重要的组织问题上重又获得胜利。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党的多中心（党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被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又将其恢复为双重中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现在则被彻底取消。党章已经修改。中央委员会又变成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党的唯一最高机关，而中央机关报编委则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并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补选制度已废除。从现在起，如中央委员出缺，应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递补。

代表大会否决了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想法（阿克雪里罗得、拉林），认为这种想法会导致"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65页）①谴责了布尔什维克所搞的游击发动和抢劫（"剥夺"）。（同上，第169页）②代表大会还号召全党对工会实行思想领导。（同上，第170页）③。

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加强军队中的工作，召开军事组织代表会议。（同上）④大会选出由五名布尔什维克（И·П·戈利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0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3页。——译者注

③④ 同上，第214页。——译者注

德曼、И·Ф·杜勃罗文斯基、Н·А·罗日柯夫、И·А·泰奥多罗维奇、В·П·诺根）、四名孟什维克（А·С·马尔丁诺夫、Н·Н·若尔达尼娅、И·А·伊苏夫、尼基弗尔）、两名波兰人（А·С·瓦尔斯基、Ф·Э·捷尔任斯基）和一名拉脱维亚人（К·Х·达尼舍夫斯基）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崩得和拉脱维亚人还应再派出三名代表。（《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26页）

虽然列宁已经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形式上的多数，但他对中央委员会仍不信任。况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大多数是调和派（杜勃罗文斯基、诺根、罗日柯夫），其中一人(罗日柯夫)后来完全转到了孟什维克方面。列宁决定用非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机构包围正式的党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即将结束时，列宁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中央”。除中央委员外，被选进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人有：克拉辛、波克罗夫斯基、列伊捷津、尚采尔、塔拉图塔、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列宁亲自主持中央的工作。（同上，第227页）

这又一次证明，列宁是不大相信能同孟什维克领导人实现有机统一的。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很正确的——思想不统一、组织松散的中央是不能领导革命的。列宁要建立一个意志坚强、有自我牺牲精神、驯服的、思想上如磐石般团结的中央。列宁甚至不大相信亲布尔什维克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能成为这样一个中央机构。所以才需要一个既合法又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

从1907年6月3日起俄罗斯革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天沙皇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并且未经杜马同意（这意味破坏《十月十七日宣言》），便颁布了能保证右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新选举法。通常人们把沙皇的这一举动叫做“六三政变”。从法律上说，沙皇的这一

举动只意味着他把实际状况合法化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业已结束，沙皇专制制度从防御转入进攻，反动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是同内阁总理斯托雷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革命爆发的原因和制止革命的手段，斯托雷平有自己的一套颇为严整、合乎逻辑的理论。两个思想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革命恐怖应当无情地被镇压下去（实施特别军事法庭），而且引起革命的社会根源也应予以铲除：主要应把农民安置好，把他们从农村公社社员变为个体所有者（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顺利地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想法。根据苏联的统计（不言而喻，这是夸大了的数字），1907年至1909年间因涉嫌政治案件二万六千人受审，一百七十万人被监禁，五千零八十六人被处死刑。（《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39页）然而，斯托雷平在实现他的第二个想法，即把农民从公社中分离出来，使他们变成拥有足够土地（独立田庄、独立农庄和俄罗斯边区的土地）的个体所有者时，既遭到了右派（反动地主）也遭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

如果斯托雷平成功地解决土地问题，那只能意味着他彻底地扼杀了俄国革命，夺走革命的主要成员——农民。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会变成保守派，变成反对革命的人。那末，列宁的以“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夺取政权斗争中结成的“联盟”为基础的全部革命理论就会破产。

列宁针对这一点写道：“我承认斯托雷平的政策比‘普鲁士’的办法更进一步（指和平解决土地问题。——作者），而且到一定程度这一办法就会产生一个辩证的转换点，从而打消对美国的办法（即革命的办法。——作者）所抱的一切希望。但是我敢断言，现在这一转换点还没有到来。”“我们还在斗争，两种

土地改革办法还没有决定胜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补充部分第1章第1版第313和317页。另见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纲要》俄文版第463—472页，1933年党的出版社出版）

依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是一届明显的右派杜马——右翼保皇党分子占杜马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十二月党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立宪民主党人占百分之二十三，左派占百分之七。社会民主党党团只有十九名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有六十五名代表）。布尔什维克有四名代表（波列塔也夫、札哈罗夫、苏尔柯夫和柯索罗托夫）。

逮捕浪潮开始了，它摧毁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及其委员会。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都逃往国外。12月列宁从芬兰取道瑞典逃往瑞士，并在日内瓦安顿下来。至1908年年底，已有近九百名社会民主党人流亡国外。（《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48页）中央委员会俄国常务局是当时党在俄国的领导中心，由布尔什维克杜勃罗文斯基、戈利坚别尔格、诺根和孟什维克若尔达尼娅、拉米什维利(候补中央委员)所组成。《无产者报》（1906—1909年）实际上仍起着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中央委员会正式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从第二期起改在国外出版（1909—1917年）。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两派共同的报纸，但是它的调子却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定的。

1908和1909两年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来说，是充满颇为深刻的思想危机和组织危机的两年。这一次是在“分裂者”中间，即在历史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之所以产生危机，是因为无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还是在孟什维克内部，党的活动家对时代的主要问题——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在

杜马、“议会的”俄罗斯情况下应该如何开展工作——看法皆不一致。在孟什维克内部，有这样一个派别开始占上风，他们主张党顺应杜马俄罗斯的合法条件，广泛地建立合法工人党，抛弃过去的秘密党组织。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派（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孟什维克内的第二派主张保存地下党。这一派人数较少，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

列宁把第一派叫做“取消主义者”（说这一派想“取消”党），并与之展开了最无情的斗争。列宁把第二派称作“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并建议与他们结成联盟，以反对取消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派内部也出现了好几个派别，如“召回派”、“最后通牒派”以及所谓的“造神派”，后来这些派别联合为一个文学思想派，即“前进派”。就政治面貌而论，“召回派”是布尔什维克的极左翼，是正统的、始终不渝的布尔什维克派。这一派是于1908年3、4月间在莫斯科讨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工作时产生的。那一年的5月召开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会上三十二名代表中，十四名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社会民主党代表辞去代表职务，以此来强调杜马的真正性质，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策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4卷第499页）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自愿退出杜马，那就干脆把他们召回（“召回派”），或者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派”），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

列宁著作的官方解释人说：

“召回派不仅仅在莫斯科深深地扎了根：彼得堡、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地方的委员会也通过了召回派的决议。”（同上，第499页）

莫斯科召回派的领导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沃利斯基。最后通牒派的领导人是阿列克辛斯基和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说，

应当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两个问题：(一)关于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二)关于在杜马外开展工作问题。”（同上，第500页）

召回派谴责列宁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立场上归附孟什维克。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在谈到这一点时不无惊奇地说：“谁不知道列宁因搞孟什维主义受到指责？”另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说：“列宁正在执行一条右派崩得路线。”（《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3、15页）①

列宁把召回派叫作“反面的取消派”或是“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并在党的报刊上和会议上展开大规模的反召回派运动。为反对这些左翼布尔什维克，列宁甚至同左翼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结成了同盟。为了事业的需要，列宁可以在策略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一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及其辅助机关的体制是这样的：从联合中央委员会内分出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拥有中央委员会权力的所谓“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其成员是：布尔什维克一名、孟什维克一名、拉脱维亚人一名、波兰人一名、崩得分子一名)。“中央委员会核心组”设在俄国国内。国外设有中央委员会的三个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下属的若干委员会。当时还设置了中央委员会联合常务局，起联络和情报中心的作用。该常务局由在国外的中央委员领导，被认为是“中央委员会核心组”的从属机构。

另外还建立了称为“中央委员会国外中央局”的机构，由十人组成，由一名拥有否决权的中央委员所主持。国外中央局被认为是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协调、联系机构。它有权做出决议，如果中央委员会主席对这些决议不加否决，则国外组织必需予以执

① 见《列宁文稿》第2卷第53、55页。——译者注

行。中央局也隶属"中央委员会核心组"。

中央委员会还设有军事局，其任务是在陆军和海军中开展秘密工作（筹建基层组织，撰写和散发传单，等等）。中央委员会还设置了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工会和合作运动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委员会"、"传单委员会"（撰写传单、呼吁书、宣言和小册子来宣传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有专人负责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工作。党责成党员领导大学生和教授为争取大学的自治而斗争。所有辅助机关皆由中央委员领导，并负责向"中央委员会核心组"报告工作，所有党的积极分子都被吸收到这些辅助机关中工作。当时还办起了党的联合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也同时并存，其编委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杜勃罗文斯基）。

1908年召开的八月中央全会在明确中央委员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职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全会指出，委员会全体会议具有全部职权，全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紧急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中六名委员的要求或根据在俄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多数的要求召开。如果全体会议有八名中央委员参加，该全体会议即认为有效。

在前后两次全体会议之间，俄国的全部日常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处理。根据"中央委员会核心组"的倡议，凡迫切的问题可采取向委员会全体委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解决。一般性的策略问题，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由"中央委员会核心组"来解决，如果情况不紧急，则推至中央全会召开时再解决。委托"中央委员会核心组"领导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全会决议直言不讳地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隶属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事机关。（《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98页）①并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50页。——译者注

说，“由于中央委员会要对党负责党团的工作，因此在党团的决定危害党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应当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对党团决定的否决权。”（同上，第201页）①

总地说来，“中央委员会核心组”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进行活动，并以拥有全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身分进行工作。为了互通消息，“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应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活动情况书面通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全会决议在谈到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时说，国外局“是中央委员会在国外的代表机关”（不要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中央委员会侨民局相混淆）。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就是在俄国工作的俄国五人团。（同上，第188—189页）②这很使列宁称心如意，因为“中央委员会核心组”的五名委员中，拥护他的人以三（布尔什维克一人，波兰代表一人，拉脱维亚代表一人）比二（孟什维克一人，崩得分子一人）占多数。

党的第五次全俄代表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阵地。这次会议于12月21日至27日（1909年1月3日至9日）在巴黎举行。共十六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列宁、季诺维也夫、塔拉图塔（皆是中央委员）；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布尔什维克召回派的代表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捷尼索夫；布尔什维克最后通牒派的代表沃利斯基和利亚多夫；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代表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拉米什维利（中央委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59—260页）“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37—238页。——译者注

列宁派在代表会议上占统治地位。这就确保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策略决议案得以在会议上通过。列宁在总结第五次代表会议时写道：

“过去的一年，是涣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陷入泥泞之中的一年……无疑的，当时的危机，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危机。”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代表会议决议指出了摆脱这一危机的出路。列宁认为，代表会议决议的实质有如下述：

“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

尽管危机严重，尽管俄国一百五十万人的社会民主党只剩下不足二十万人，列宁仍旧是乐观的。对，尽管他把俄国人民叫做“奴隶的民族”，但是他对俄国无产阶级却评价很高。在我们援引的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引以自豪的，就是1905年在它的领导之下，奴隶的民族第一次变成了进攻沙皇制度的千百万人的军队，变成了革命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又能够坚定地、顽强地、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以培养更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新干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54、360、361页）①

代表会议谴责了“取消派”（但是，对“召回派”却只字未提），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维护党的完整和统一”，并认为，“只有当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服从党的纪律、并在一个机构范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18、323、324页。——译者注

内以及在这个机构的各个执行机关内忠实地进行工作时，中央委员会才有可能完全顺利地去进行工作。”（《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95页）①

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俄国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享有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一切权利的机构”（“核心组”），但同时又指出，“具有原则性的策略问题”应该尽可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研究。”代表会议还批准了设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定。（同上，第204—205页）②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派别斗争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列宁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他的派别里又产生了一个比列宁还左的小派别（“前进派”）。两边夹击的态势迫使列宁做了某些妥协，但是他在心底里是蔑视这些妥协的，并打算一有可能便抛弃这些妥协。列宁认为重要的是吞掉孟什维克派和它的所有委员会，但是其领导人他不想要。列宁从来不相信他们会转变成布尔什维克。他还想让“左派”也彻底投降。

与此同时，党基层的统一运动也日益发展。由于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也赞成真正的统一，所以列宁只好小心翼翼地随机应变。在没有介入两派之争的托洛茨基集团（他们在维也纳出版了《真理报》）和崩得的调停下，1910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所谓的“中央委员会统一全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杜勃罗文斯基、诺根和戈利坚别尔格；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代表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若尔达尼娅、拉米什维利、戈列夫；“前进派”的代表波格丹诺夫和尚采尔；波兰社会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4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59页。——译者注

民主党人的代表蒂什卡和瓦尔斯基；崩得的代表柯伊根和阿伊津什塔德；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奥佐林（利巴夫斯基）；维也纳《真理报》的代表托洛茨基，出席了全会。普列汉诺夫没有到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298页）

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全会，但是也没有同全会展开积极的斗争，因为他并不相信全会能取得什么结果。全会的主要决议可归纳如下：

（一）选举由五人组成的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和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波兰人瓦尔斯基）；

（二）停止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三）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

（四）选举俄国中央委员会，俄国中央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两名布尔什维克（诺根和戈利坚别尔格），两名孟什维克（没有公布名字），还有马尔丁诺夫、崩得分子阿勃拉莫维奇（列伊恩）和拉脱维亚人利巴夫斯基；

（五）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组后由五人组成（布尔什维克——柳比莫夫，后来是谢马什柯；孟什维克——戈列夫）；

（六）把数目为五十万的现金从布尔什维克会计处转到联合中央会计处（这些钱原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保管）；

（七）资助托洛茨基的《真理报》，承认它为党的机关报，派一名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工作；

（八）把反列宁的“前进派”集团当作党的文学集团；

（九）在巴黎开办宣传员党校；

（十）出版“讨论专集”（该专集的编辑部由各派代表一人

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一人组成）；

（十一）制订俄国的党组织计划，在合法组织中建立小组，在秘密组织中建立“基层组织”，现有的各派合并；

（十二）在俄国出版合法的机关报；

（十三）召开既有秘密运动活动家也有合法运动活动家参加的全党代表会议。（斯皮里多维奇：《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1922年巴黎俄文版第208页）

全会还通过了专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基本条文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七人委员会（“七人团”）享有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权利（“七人团”中布尔什维克两人，孟什维克两人，崩得分子一人，波兰人一人，拉脱维亚人一人）；

（二）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必须担任一项工作；

（三）现在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

（四）七名委员中，如有某个委员离职时，可由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来代替，如果没有这样的候补委员时，“七人团”自己可指定候补委员为“七人团”成员；

（五）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可按照章程的规定来代替离职的中央委员；

（六）中央委员会指定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国外开展活动。国外局的成员中应包括各“民族”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三人，他们可以不是中央委员（但是这些人不得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掌管党的财产、出版事业和具体事务工作，它在国外代表党，统一党的国外协助小组，并作为它们和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

（七）全体会议（十五个中央委员组成的）由下列人员参加：

（1）“七人团”成员；（2）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的国外局成员；（3）如果两者加起来还不足十五人时，则吸收候补委员参加全会的工作；在以候补委员代替时应遵守各派分别占一定比例的原则。关于究竟哪一位候补委员有权参加全会的问题，由该派别中央委员会决定。党章获得一致通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4卷第472--473页）

官方历史学家写道：“全会不顾列宁反对，决定停止出版《无产者报》，把一部分属于布尔什维克的资金立即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余的则在两年内转交。钱暂时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梅林、蔡特金和考茨基三位保管人’保管。”（《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00页）

官方历史学家的这种论调同列宁和其他参加全会的布尔什维克所签署的下述文件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下列署名者）完全欢迎这种在党的组织统一问题上已经成熟了的要求，同时声明：

“（一）我们解散我们的派别中心；

“（二）我们停止出版《无产者报》；

“（三）……；

“（四）…（这两条说的是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即把自己的部分财产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列宁全集》俄文第8版第14卷第475页）

但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这一决议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派”集团的反对。这个集团发表了专门的告布尔什维克同志书，其中说：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中央委员会所通过和公布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声明。这个声明承认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关闭《无产者报》，布尔什维克的钱转交给中央委员会，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组织的思想的派别被宣布为不复存在……

"现领导人在所有方面都背弃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

"这不仅仅是观点的改变。这完全是有意的欺骗，旨在反对整个布尔什维克派……最近两年没有向组织做过一次财务报告，几十万被挥霍了……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中央在思想方面、物质方面和组织方面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无所顾忌的主宰者，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要听凭国外来处理……但是后来布尔什维克中央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最后一个步骤——不征求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意见，就正式取消派别，把它（派别）的财产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同时以单独的著作家集团的身份为自己保留了一大笔钱。欺骗是靠伪善和篡夺的办法达到的：假借他人名义（"布尔什维克中央"），挥霍他人的金钱，解散他人的组织……

"思想派别应当领导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只有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决定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没有做出之前，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做的关于解散派别、把钱转交给中央委员会等决定不具有任何效力。"（斯皮里多维奇：《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俄文版第219—222页）

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担心纯属多余。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实现各敌对派别的联合变成了一场幻梦。相反，正是在这次全会之后，各派之间的分歧更尖锐了。一月全会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派别、集团和小组，其数量之可观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孟什维克阵营内形成了整整四个派别——波特列索夫派(《我们的曙光》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右翼；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派（《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解的托洛茨基派（《真理报》）；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报》）。

布尔什维克分三派——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高尔基派（“前进派”集团）和积极争取同孟什维克联合的“调和派”（中央委员杜勃罗文斯基、诺根、柳比莫夫、戈利坚别尔格等）。

党的三个中央机构中，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掌握在“调和派”手中，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掌握在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手中（虽然马尔托夫和唐恩也是编委，但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利用第五名编委——一个波兰人，能够在中央机关报推行自己的路线，甚至竟然不选用马尔托夫的文章）。

在这一时期，列宁努力同普列汉诺夫派搞联合。1910年以来，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派开始在彼得堡一道出版合法的党报《星报》。此外，1911年末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合法杂志《启蒙》。

党校于1911年春在巴黎近郊的隆茹莫开学。它为把俄国的党组织争取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起过极其重大的作用。该党校曾培养出象奥尔忠尼启则、别洛斯托茨基、什瓦尔茨、勃列斯拉夫这样一些列宁的忠实信徒（列宁在党校讲过五十六堂课），他们回国后便筹备召开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且自己也跻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之列。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一月“统一”全会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过统一。无论是来自右的（孟什维克“取消派”）还是左的（布尔什维克“召回派”）反对统一的力量均是非常强大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完全拒绝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承认一月全会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发表了一封“致同志们的信”，反对布尔什维克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所做的解释（《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4卷第476—480页），在俄国，孟什维克着手

出版合法刊物——《我们的曙光》。

布尔什维克虽然郑重允诺解散自己的派别中心，停止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把钱转给新的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42页）①，表面上承认全会的决议，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这些决议的。

至于党的钱财，实际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支配的。他们还停止资助托洛茨基，并把派到托洛茨基报社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召了回来。中央委员会办了一份机关报《工人报》与托洛茨基的报纸抗衡。一月全会创建的《讨论文集》也停刊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左派布尔什维克“前进派”的代表退出了编辑部。俄国警察使中央委员会进一步瓦解——1910年4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全体成员被逮捕，这之后，一月全会上刚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七人团”也被逮捕。

所以，中央委员会的实权集中到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手中，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占优势。列宁决定建议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退出国外局，以便搞垮国外局（后来真地这样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带着钱和文件离弃了国外局）。

之后列宁建议“七人团”中唯一没有被逮捕的一名委员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于5月28日（6月10日）至6月4日（17日）在巴黎举行。布尔什维克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及崩得均有代表参加。当《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及崩得的代表获悉会议的组织者——列宁的意图之后，便退出了会议。在这之后，留下来的中央委员通过了召开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为筹备会议的召开成立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应当组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08—309页。——译者注

织一个由地方人士参加的、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俄国委员会。还成立了技术委员会，以便“执行许多同党的出版工作和运输工作等有关的技术职能。”（《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48页）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通告必定要引起他人的谴责，因为布尔什维克采用非法手段夺去了控制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权力。通告说：“这里所指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执行党的基本任务。”（同上，第246页）②

然而，孟什维克把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恰恰理解成了夺取政权。马尔托夫和唐恩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因而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刊物变成了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所有各派（“取消派”除外）均被邀请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如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真理报》）派、波格丹诺夫（“前进派”）派、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同上，第249页）③

列宁解释说，他之所以邀请《真理报》派及“前进派”参加代表会议，是因为他考虑到：

“越过‘前进派’和《真理报》，反对‘前进派’和《真理报》，而直接同那些受它们影响的俄国工人取得联系，——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所执行的，也是将来不顾一切障碍贯彻到底的政策。”（《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50页）④

恐怕连马基雅弗利也想不出比这更妙的办法。

国外组织委员会指派奥尔忠尼启则、什瓦尔茨和勃列斯拉夫充当在俄国的代表。1911年9月29日在巴库召开了许多党组织的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18页。——译者注

② 同上，315页。——译者注

③ 同上，319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55页。——译者注

会议，会上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全俄代表会议。俄国组织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奥尔忠尼启则、什瓦尔茨、邵武勉、斯潘达梁和一名普列汉诺夫分子索柯林所组成。（《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49页）这样，列宁实际上在俄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央委员会。

至此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发动的新政变已大功告成。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使右派和左派孟什维克勃然大怒。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不承认对它的解散。它在伯尔尼召开会议以示抗拒（1911年8月20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真理报》编辑部、崩得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旨在筹备召开俄国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并以此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分庭抗礼。（斯皮里多维奇《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俄文版第231——232页）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急速走向彻底的、不可挽回的分裂，这种分裂使他们不仅在策略上，而且在思想上成了不可调和的冤家对头。

第 五 章

布尔什维主义犯罪派的兴起（“剥夺派”）

为了更好地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即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后中央委员会夭折，为了从文件上考证未来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的始末，需要读读布尔什维克党内犯罪派兴起的历史，即高加索“剥夺者”的历史。这里，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运动史上，我们破天荒地看到：有人鼓吹运用纯粹的刑事犯罪手段（凶杀、抢劫、放火、制造伪币），以便实现纲领的政治目标（夺取政权），于是政治和刑事犯罪结合在一起了。这一结合物产生于1905年革命，当时它是以工人自卫“战斗队”的名义出现的。但是，革命失败后，列宁决定仍然保存这些战斗队，目的有两个：（一）通过“剥夺剥夺者”的办法为党筹集资金；（二）杀死间谍、“黑帮分子”和“警察、军队和海军的长官”。

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只能进行“剥夺剥夺者”的说法翻译成明确的俄语——“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一年后，列宁正是这样概括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的。列宁说：

“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老头向一个哥萨克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解释得很明确。哥萨克问：‘你们布尔什维克真的要抢东西吗？’那个老头回答说：‘对，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251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86页。——译者注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允许运用政治土匪的手段吗？允许为党的利益“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和为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杀死反对者吗？对于这些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所做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

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反对在对敌斗争中运用任何刑事犯罪和不道德的手段，但是他们在原则上不否认，如果国家处于革命阶段，可以用党和工人阶级的名义搞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与此相反，列宁和某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手段道德与否，方法和形式许可与否，这种提法本身在政治上不仅是“机会主义的”，而且是犯罪的。后来列宁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概括为下面几句话：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32页）①

两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代表大会都讨论过“战斗队”和“游击战争”（即“搞剥夺”）问题。分析一下双方在两次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时所持的立场，不仅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内犯罪派的进一步演变，而且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革命“道德哲学”方面形成了多么深的鸿沟。实际上，两派在政治斗争中所持的伦理原则是针锋相对的。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游击发动”的两个决议草案做一番比较，看一看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反列宁的决议，再看一看列宁在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上同不利于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9页。——译者注

他的决议所展开的斗争，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极其准确地得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两种道德观。

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草案的出发点是，俄国革命仍以“向敌人发动游击进攻”的形式在继续，所以他建议：第一，“党应该承认，目前党的或靠近党的战斗队的游击性战斗发动在原则上是容许的；第二，“为了夺取资金而进行的战斗发动也是可以允许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481、482页）

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说：

“鉴于社会上的流氓、刑事罪犯和城市居民中的渣滓一贯利用革命风潮来达到自己危害社会的目的，革命人民则要采取严峻措施对付盗贼横行的局面；最后，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在于它对革命群众、对社会以及对整个军队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同时革命在瓦解国家政权的时候，不是以造成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为自己的任务，而是以组织各种社会力量为任务，——代表大会决定：

“（一）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或口号夺取钱财的行为作斗争；

“（二）避免损害和平公民的个人安全或私有财产；

“（三）只有在为了达到直接战斗的目的时，才破坏和损毁官厅房屋、铁路以及其他公私建筑物；

“（四）不夺取国家银行、国库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款项，除非是该地已成立革命政权机关并有该机关的指示，同时没收官方机关中的人民的款项应该公开进行并须有完备的账目。属于政府的武器和弹药一有可能时即予夺取。”（同上，第528页）

两个草案先在代表大会起草委员会中加以讨论。使列宁颇为难过的是，起草委员会中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列宁的“关

于游击发动”决议案投了反对票，对孟什维克的草案却投赞成票。孟什维克契列瓦宁向代表大会报告这件事时说：

“在向代表大会提出‘游击发动’的决议草案时，我要声明，在这一问题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变简单了，因为多数同志（即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多数。——作者）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同上，第401页）

投票表决时，列宁在自己的派别内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出席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代表六十二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四十六人。孟什维克决议案的第一个重要部分（第一至第四条）以六十八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四票反对（其中有列宁一票）获得通过。二十人弃权。（同上，第462页）

不言而喻，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列宁遭到自己派别的反对，但他仍不想服从党的最高机关的这一决定。代表大会闭幕五个月后，列宁在给《无产者报》写文章时说：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窃贼，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见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懂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呢？……”（《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86页）①

列宁确实不“懂”这一点。他补充说：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同上）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80页。——译者注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列宁似乎无意中说出，现在所争论的实质是关于他的派别中是否产生了新**派别**，尽管他否认产生这种新派别的事实。下面是列宁的话：

“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发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派别**问题。”（同上，第88页①。黑体是列宁标示的。——作者）

在列宁精神指导下，布尔什维克派内一个新的政治犯罪派正在崛起，这正是争论的实质。列宁身在国外，所以他很快就失去了控制这一新派别的能力。

1906年8月15日，依据波兰社会主义者政党的决定，在波兰的许多城市里（华沙、罗兹、腊多姆和普罗次克）搞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几十名警士和俄国士兵被杀。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行为激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列宁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谈最近的事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

“我党中央委员会……声明：不言而喻，所谓‘游击的’战斗发动仍旧遭到党的反对。这是绝对错误的，而且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劝告为数众多的我党所有战斗小组不应再无所作为，要进行一系列的游击活动，要正确地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尽量少‘侵犯’和平公民的‘人身安全’，尽量多侵犯密探，积极活动的黑帮分子，警察、军队和海军的长官等等的人身安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45—47页。第二处黑体是列宁标示的。——作者）②

然而，列宁的这番话全然推翻了所有教科书中的这样一种传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2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译者注

奇说法，即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似乎与民粹派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同，反对搞个人恐怖。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当时列宁的亲密战友——格里戈里·阿列克辛斯基对“剥夺派”产生的历史做了这样的报导：

“1906—1910年间，布尔什维克派是由一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操纵的，该委员会的存在不仅对警察保密，而且对党员也是保密的。委员会由列宁、克拉辛和另外一个现在不愿意过问政治的人（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第三个人指的是波格丹诺夫。——作者）组成。这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主要搞党的财务工作。在不断寻找财源的过程中，委员会选择了一种简便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好长时间以后邦农所使用的手段……但邦农是自己动手，而布尔什维克‘三人团’却只做些一般性的指导……他们抢劫邮局、车站财会室、颠覆并抢劫火车。（Le Matin, 9 Septembre, 1921）①

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占多数的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上（1907年4月—5月），重又讨论了“剥夺”问题。中央委员会报告人马尔托夫向代表大会做报告时说：

“所谓的游击恐怖和剥夺活动业已泛滥成灾……恐怖和剥夺活动不仅使政府加强了镇压活动，使资产阶级居民感到恐惧，从而把他们推向反动派一边，而且还瓦解了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和靠近无产阶级的青年，常常极大地败坏他们的队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记录全文》1909年俄文版第71页）

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就这一问题发表权威见解说：

“对于搞剥夺，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布尔什维克同意搞部

① 1921年9月9日《晨报》。——译者注

分剥夺，孟什维克伪善地宣称，他们反对搞剥夺……当一些剥夺派把搞来的钱用于个人需要时，剥夺可能退化为而且有时**已经退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发动，甚至退化为**土匪行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史纲要》193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94页）

基于这些原因，这次亲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虽都符合列宁的观点，但也通过了一项反对列宁的决议，即“关于游击发动”的决议。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决定说：

“在现时比较沉寂的情况下，游击发动必然要退化为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式……附属于党委员会的战斗队……必然变成闭塞的阴谋小集团，脱离广大群众，并且由于思想上逐渐败坏而使党的队伍瓦解，——鉴于上述种种，代表大会认为……游击发动是不合适的，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思想上同这种发动展开斗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1册第162页）①

不言而喻，列宁同样也不会把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这一决议放在眼里。代表大会一闭幕，他立即着手准备搞一次新的“剥夺”，这是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所搞的“剥夺”事件中最著名的一次。列宁把这次“剥夺”任务交给一个为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所不熟悉的、然而在第比利斯却是赫赫有名的“战斗队员”和“剥夺者”柯巴·索索·朱加施维里，正是由于他完成了列宁交给的这一任务，他才成了斯大林。

在讲列宁的这一任务如何完成以前，让我们先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讲一讲他同列宁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讲一讲列宁给他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04页。——译者注

留下了如何的印象。列宁逝世一周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军事学校学员晚会上讲到列宁时说，他是于1903年第一次同列宁通信的。这个时机不是随便选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知道，当1903年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后，斯大林直到1904年年底，一直追随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如果你翻阅一下《斯大林全集》第1卷，你不仅在他1903年的著作中而且在1904和1905年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篇签有斯大林笔名的、能表明斯大林对分裂问题持何种立场的文章。第1卷收了两封《库泰依斯来信》，发信时间是1904年9月和10月，在这两封信中斯大林拥护列宁，反对马尔托夫——但这也是一年之后的事啊！而且，这两封信是否真实也还值得怀疑，因为，第一，对这两封信加了注解："首次发表"，第二，这两封信被贝利亚这种知名的"学者"在他的题为《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一文中当作"学术文件"引用过。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对贝利亚的"著作"做过这样的分析："对斯大林的崇拜导致了直接歪曲历史事实"，贝利亚的文章"牵强附会，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历史问题》杂志1956年第3期第4页）

不过，斯大林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小心翼翼地环顾过四周、耐心地研究过党内的形势之后，结果他在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并在1905与1906年之交归附了列宁。应当认为，这是可能的。如果抛开贝利亚强加给斯大林的那些令人怀疑的"信件"不算，那末斯大林是在1906年3月8日首次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上用格鲁吉亚文发表文章的。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反对孟什维克，拥护列宁抵制杜马的策略。

现在再谈一谈列宁给斯大林留下了如何的印象。在上文提到的那个晚会上斯大林说：

"我于1903年结识了列宁……是在通信中认识的……我了解

到列宁的革命活动后深信，我们有个不平凡的人，他就是列宁……当我把他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做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们——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比列宁矮整整一头，同他们相比，列宁不是普通的领导者，而是一名高级领导者，是一只无所畏惧的山鹰。”（杰米扬·别德内伊写道，斯大林是高加索人，所以他把列宁比做“山鹰”，北方人则可能会把列宁比做“北极光”）。

斯大林接着说，他在给一位侨居国外的人写信时谈过自己对列宁的这种印象，而那个人便将信给列宁看了。于是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纲领性的回信，在这封信中，“每一句话不是说出而是射出来的”。斯大林说，按老地下工作者的习惯，他将列宁的这封信“烧毁了”（然而，对于信件的处理过分认真的列宁也没有保存这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底稿）。

斯大林于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在党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两次见到列宁，并听了他的讲话，当时斯大林是以拥有发言权的第比利斯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斯大林用“伊万诺维奇”的化名参加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在高加索人们都叫他“柯巴”。（这个化名斯大林取自格鲁吉亚古典作家卡兹别基公爵的中篇小说《弑父》，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柯巴不仅是大无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化身，而且还是无限忠于人道主义和友谊的理想化身！）

斯大林于1907年在柏林与列宁的会见是一次最重要的会见，这次会见最终使斯大林跻身于党的上层。撰写斯大林生平的共产党员作家安里·巴尔比尤斯在他的《斯大林》这本书中记述了这次会见。斯大林同列宁晤谈之后回到第比利斯，可是同年他又去柏林，以便与列宁第二次会面。一次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柳德维格谈话时，他自己也说他到过柏林，但是在斯大林的正式传记中

却从不准描写他曾两次在柏林会见列宁这一重要事实，尽管巴尔比尤斯在透露这两次会见时引用的是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的话，并且征得斯大林的同意。那末，原因何在呢？如果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或第五次代表大会一闭幕之后（代表大会于1907年5月19日闭幕）斯大林与列宁在柏林的会见是事实，那末他们的谈话内容则永远是个秘密。因为他们所谈的话题正是组织“剥夺”问题，这是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禁止的。消息灵通的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斯大林专程去德国首都与列宁会面，那绝不是为了进行理论性的‘晤谈’。会见可能安排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更有可能安排在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之后，几乎无需怀疑，这次会面是为商谈将要进行的剥夺活动和筹款等问题。”

为什么他们不在伦敦而在柏林会面呢？——托洛茨基问。托洛茨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很可能列宁不想在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沙皇间谍及其他间谍的监视之下会见“伊万诺维奇”，而且还可能有一位同代表大会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者参加了会见。（L·Trotsky, Stalin, p.108）①托洛茨基没有说出这位第三者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第三者”——卡莫——一个月之后便因领导了沙皇俄国历史上一次最果断的土匪袭击活动而驰名全球了。

列宁、柯巴和卡莫很可能是在5月19日以后会面的。一个月后，即1907年6月26日，发生了著名的第比利斯“剥夺事件”。

首先要搞清楚，卡莫是谁？他是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他的真名实姓是特尔—彼得罗相。他和斯大林一样，出生在戈里城，年纪和斯大林相仿佛（卡莫只比斯大林小两岁）。1937年出

① 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英文版第108页。——译者注

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载有卡莫的正式传记，传记中说：

“卡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是高加索最积极的战斗队员，是游击发动的英雄。卡莫是**斯大林的学生**……卡莫组织过许多重大的剥夺活动……1907年参加过著名的第比利斯埃里温广场剥夺事件。由于这次剥夺事件他于1907年11月22日在柏林被捕……（《苏联大百科全书》1937年俄文第1版第31卷第133页）

然而，斯大林在世时就编辑加工并于1953年出版的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却只字未提卡莫生前所搞的“剥夺活动”，连著名的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也没有提及，虽然在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卡莫生平所占的篇幅是第一版的二倍。新版的卡莫生平如同旧版一样，说卡莫的老师是斯大林：卡莫“于1901年结识了斯大林，并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苏联大百科全书》1953年俄文第2版第19卷第543页）接着提到卡莫于1906年3月抵彼得堡，在那里他认识了列宁。他把武器从彼得堡运到高加索，在第比利斯办起制造炸弹的工场作坊，“组织和武装战斗小组和战斗队，参加过同沙皇军队、警察和黑帮分子发生的武装冲突……1907年11月在柏林被捕，1909年年底被引渡给沙皇当局。”（同上，第543—544页）

为什么要逮捕他？为什么要将他引渡？关于这些第二版的卡莫生平只字未提。为什么？下面我们会谈到，但是现在要将第一版卡莫生平中的两件事记住，这很重要。第一，卡莫是名符其实的“斯大林的学生”，第二，斯大林从1905年起开始向卡莫教授的主要革命专业便是搞“剥夺”。

1906年11月柯巴—卡莫集团在恰图拉抢劫邮政列车事件是这一年所有“剥夺事件”中最危险的一次。“剥夺分子”抢劫了二万一千卢布，但只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寄去一万五千。（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100页）其他“剥夺事件”，如“尼古拉一世号”船

及巴基港的"剥夺事件"，也使列宁捞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现款。

列宁在制定"游击战争"、"战斗队"和"剥夺活动"的理论时，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高加索是不无道理的，他从他高加索的学生中挑出两个"战斗队员"——柯巴和卡莫，以完成这一目的。这里有历史和个人条件方面的原因。托洛茨基指出过其中的一个历史原因：

"由于在高加索有抢劫和闹流血内讧的浪漫传统（这一传统现在仍然保持着），所以适合打游击的勇敢善战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仅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在高加索就搞了一千多起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托洛茨基：《斯大林》英文版第96页）

个人条件也很重要。在所有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中，柯巴和卡莫不仅无条件地支持列宁的"剥夺"理论，而且列宁的这一理论本身也是卡莫的"战斗队"在其老师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苏联大百科全书》特别强调这一点）在高加索搞"一系列剥夺活动"的经验总结。1907年第比利斯的"剥夺事件"即是柏林会见的直接结果。

斯大林正传的作者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苏瓦林在评价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对柯巴的外迁所起的作用时写道：

"第比利斯'剥夺事件'是所有'剥夺事件'中最宏伟的一次，是一种杰作，就其戏剧性与所取得的绝对成就来说，它使所有从前的'剥夺事件'黯然失色。这次'剥夺事件'确认了斯大林挑选领导人的原则权力。柯巴是地方上一位默默无闻的战斗队员，一直在神秘的'三人同盟'（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作者）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个par excellence① '职业革命家'，

① 完美的。——译者注

不善于靠个人智慧在党内晋升，但是愿意为党的事业效劳；现在他有显示自己坚强性格的机会了。”（B.C.Souvarine,Stalin, p.94）①

下面我们将看到，斯大林的确显示了自己的坚强性格。斯大林的学生——卡莫（即特尔—彼得罗相，他对俄文一知半解，总是把“komy”②这个词说成“卡莫”，因此斯大林才给他起了个绰号“卡莫”，从此他就永远叫这个名字了）是一个社会闹事分子、卓越的冒险家和英勇强盗的有机结合体，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强毅力。在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中卡莫的所有这些品质都表现了出来。下面讲讲这次“剥夺事件”的简单经过。

柯巴在柏林会见列宁以后，回第比利斯建立了一个由最勇敢的“剥夺分子”所组成的自由匪帮。据说，这个组织近五十人，其任务是，在第比利斯国家银行转送现款时发动武装袭击，夺取现款。柯巴任命卡莫为匪帮领导人，给他穿上威武的军官服，派给他一个“侦察小组”。两个格鲁吉亚女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侦察。匪徒们分成几个小组，“守候”在预定的进攻地点埃里温广场四周。柯巴是否曾亲临广场指挥“战役”？托洛茨基写道，“党内认为柯巴亲自参加了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106页）托洛茨基补充说，直到1932年为止他也这样认为，但是他进一步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后确信，斯大林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剥夺事件”，他只充当过卡莫的“顾问”。根据什么？苏联出版的很多书都没有说斯大林亲自参加过这次“剥夺事件”，而且斯大林本人也没有说过。但是托洛茨基的“确信”本身就不能使人信服。在苏联之所以从来

---

① 苏瓦林著《斯大林》法文版第94页。——译者注

② 正确发音应为“卡木”。——译者注

没有人写斯大林参加过第比利斯“剥夺事件”，那仅仅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禁止这样做。斯大林当上大国首脑之后，不想使自己看起来象一个“高加索土匪”，既便是一个勇敢的土匪也罢（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说：“罗斯福以为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是一位绅士，其实，是从前高加索的一个土匪”）。托洛茨基有“私心”，他不愿意承认斯大林是位英雄，即便是一个犯过刑事罪的英雄也罢。对他来说，斯大林只不过是个格鲁吉亚佬，不是阿里一卡波涅①。苏瓦林比较客观，他说，列宁关于“剥夺”的理论，使“斯大林有了发挥自己的天赋之机”（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88页）。这天赋当然也包括他个人的勇敢。

我们还是回到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上来吧。这次事件发生在1907年6月2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时埃里温广场上人很多。这时有两辆马车朝广场驶来，车上装着国家银行的一笔巨款，银车由哥萨克护卫队解押。在这之前不久，广场上停了两辆敞蓬马车，其中一辆坐着两个女人，另一辆坐着一个身着军官服的男人。银车一到广场，穿军官服的男人便发出一声号令。突然五十来个土匪一下子钻了出来，他们向银车和护兵投掷爆炸力很强的炸弹，炸弹也从两个女人的马车上投出来。总共投了近十枚炸弹。结果是三人被打死，五十多人受伤。土匪们抢走了钱（有的资料说抢走了三百四十万卢布，有的说抢走了二百五十万卢布），便迅速消失了。

《新时代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枪弹英雄》的通讯，这篇通讯描写了这次抢劫事件的细节，文章最后感叹道：“只有魔鬼才知道，这次前所未闻的果敢抢劫是如何完成的。”

所有的军队、警察、特务都出动了，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国

---

① 意大利江洋大盗。——译者注

境线封锁了，几百人被逮捕，但是，不论是当天，还是过后，一个土匪也不曾抓到，一个戈比也未曾找到。

土匪们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把钱放到什么地方了？土匪们又回到了“和平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把“和平工作”同自己的主要职业结合得维妙维肖（列宁的“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钱藏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台长办公室的沙发下面，在这里柯巴—索索·朱加施维里也以观察员兼统计的身份从事着“和平劳动”。不久钱到了列宁手里。

柯巴就是这样领导这次“剥夺事件”的。人们还指控他参与过谋杀第比利斯总督戈里亚兹诺夫将军和恰甫恰瓦泽公爵案件，甚至说他参与过谋杀一名与他一同在巴库监狱坐过牢的人。关于这件事下边还要谈到。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之后，柯巴和卡莫两人越过国境，在国外会见了列宁，看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列宁汇报有关这次行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外国刑事警察机关接到了俄国政府的通告，因此当布尔什维克侨民企图将抢来的卢布兑换成外币时外国警察逮捕了他们。在巴黎、慕尼黑、斯德哥尔摩和日内瓦都发生过类似逮捕事件。被逮捕的人之中有后来的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谢马什柯。直到这些逮捕事件发生后，全党（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派）才知道第比利斯武装抢劫是列宁的学生——柯巴和卡莫干的。鉴于每次把卢布兑换成外币时都有人遭逮捕，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其余的钱烧掉。

应孟什维克要求，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被迫讨论了第比利斯“剥夺事件”。成立了以齐切林（当时是孟什维克，后为外交人民委员）为首的委员会进行细致调查。齐切林的委员会很快查明，列宁的学生们不仅在第比利斯搞了血腥的抢劫，而且卡莫正在准备炸毁柏林有名的门德尔松银行，这次是为了给列宁剥夺外国货币。齐

切林的委员会还查明，布尔什维克已向他们的特工人员发出指示，要他们搞到制造假钞票的专门用纸。一部分这种用纸已经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发行部门（报社领导对此事当然一无所知）发往芬兰的库奥卡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当时曾秘密侨居此地。递送员将这批纸交给了“中央委员会技术局”局长克拉辛（“三人同盟”成员），他是凭给他的照片认出克拉辛的。

列宁利用自己在中央委员会所占的多数，中止了这次揭发，他建议中央委员会将这一案件转给“对外联络局”继续调查。（托洛茨基建议由第二国际负责这件案子的全部工作，但是这个建议未被采纳）。此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也对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做了调查和研究。高加索委员会查明柯巴和卡莫违反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搞“剥夺”后，决定开除他们和所有其他参加这次“剥夺事件”的社会民主党人出党。为不把他们暴露给警察局起见，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99—100页）

早在苏维埃俄罗斯时，马尔托夫就在1918年3月18日的《工人报》上提醒列宁说，“有一位名叫斯大林的公民”要参加他的政府，人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干过各种可疑的勾当，并因搞第比利斯“剥夺事件”被开除出党。（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101页）不久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局”便将调查工作束之高阁了，因为第比利斯“剥夺事件”的主要肇事人卡莫由于大名鼎鼎的布尔什维克日托米尔斯基（原来他是俄国警察的暗探）的告密而被柏林警察逮捕了。鉴于卡莫案件不仅可能暴露高加索的全部“剥夺分子”，而且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来极危险的政治与刑事后果，因此，克拉辛通过卡莫的德国律师建议卡莫装疯。

这个角色卡莫表演得妙极了，不仅症状很象，而且行为自然

得体，简直胜过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跺足、叫喊、嚎啕大哭、大发脾气、撕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吃饭、打看护人员、往墙上撞……把他关进冰房，他一点也不在乎。后来又把他转到医院的特殊隔离室，对他进行了四个月的各种实验，从精密的科学实验到难熬的肉体实验，但是他仍不屈服。他又不吃饭了，于是医院就用粗暴的办法强迫他吃饭，吃这样一顿饭他的牙齿要被打掉好几颗。他的脾气更大了，揪头发、撞墙，然后便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惊奇的看护人员急忙奔向他的囚室，发现他正吊在那里，做垂死挣扎，人们把他从铁窗上解下来，使他恢复知觉。然后重又给他做"实验"，让他遭受新的痛苦。不让他活，也不让他死。他最后又想了个办法，企图骗过德国的"心理分析家"而死去：他用一块锋利的骨头割断了静脉，等人们发现时，他已经倒在血泊中。医院又把他抢救过来。他不屈服，但是医生屈服了。于是把他转到精神病院继续试验，但是这一次完全是进行肉体折磨，正常人是绝不会经受住这些折磨的。为了证实卡莫不是佯装无知觉，他们往他脚心钉钉子，用烧红的铁烙他，——所有这一切他都顶住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好象他是钢打铁铸的一般。

德国医学界的学术权威们证明说，卡莫不是装疯，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病患者。于是德国政府在1909年年底将卡莫引渡给俄国政府，后者又将他关进做案地点的第比利斯麦捷赫监狱。新的试验和拷问又开始了，这些试验和拷问比迂腐的德国学者们搞得更加残酷和无情。当然，这些残酷的手段不会使人致死，但是，正如苏瓦林所说，却完全可以"使一个健康的人发疯"。可是，卡莫这一次仍旧没有屈服。不过他还是被送到了第比利斯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安详地用面包屑喂着他在牢房里养的鸽子。他要使法庭相信，审判他就象审判他的这只鸽子一样徒劳无益。法庭撤销了对他的审判，他又被送回医院

精神病科继续接受试验。

1911年8月卡莫在"剥夺派"成员科特·钦查杰的帮助下准备越狱。从麦捷赫监狱逃走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卡莫决心要证明这是有希望的。他锯断手铐脚镣，锯断铁窗，沿着匆忙搓成的细绳朝库拉河下来，可是绳子断了，卡莫重重地摔在岩石上，失去了知觉。但是多年的"疯人"锻炼起了作用，他很快恢复了知觉，甩掉追踪的人，逃往巴统。在巴统他钻进一艘轮船的底舱偷渡到国外。一两星期之后他已经成了在巴黎的列宁的座上客了。列宁给他吃饱，穿暖，做了一番指示，便将他打发到巴尔干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从那里将武器运往高加索，以便搞新的"剥夺事件"。他在伊斯坦布尔被捕，但由于格鲁吉亚僧侣作保而获释放。卡莫改道去索非亚，但是在索非亚他又不幸被捕，幸亏著名的保加利亚革命家、列宁的朋友勃拉戈也夫帮忙，他才得以逃之夭夭。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他在一艘不大的船上又被土耳其人扣住，他携带的行李里装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炸弹。但是这一次他又逃脱了（也许是通过行贿的办法），并来到希腊。当党的经费日趋减少时，列宁把卡莫从巴尔干叫了回来，并把他派往高加索搞新的"剥夺"。卡莫顺利地到达第比利斯，把从前的土匪召集起来，准备干一番新的事业。1912年9月卡莫同他的匪徒们在科扎尔公路上又向财政邮车发动了一次勇敢的袭击。几乎有一整队哥萨克护兵押车，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七个哥萨克被打死，几乎所有的匪徒都被击毙，他们的头目卡莫虽然安然无恙，但又被投入了那所麦捷赫监狱。军事法庭对他做过四次死刑判决。他给隔壁牢房中的战友钦查杰写了个条子，说他将以绝对平静的心情去迎接死神……"我的坟墓上本该早就长着几尺高的青草了。谁都不免一死，但是我还要再碰碰运气。请您采取一切手段组织越狱。也许我们还能再嘲笑一次我们的敌人。如何行动

由您斟酌，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103页）越狱没有成功。但是，据苏瓦林说，长官们暗暗佩服卡莫在创造史无前例的刑事犯罪纪录时所表现的勇敢、果断和机智，所以他们有意拖延卡莫的死刑办理手续。在等一年之后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时将要实行大赦，他们想使卡莫也得到赦免。事情果真如此。卡莫于第二年即1913年被免除死刑，减为二十年苦役。后来1917年的革命使他获得自由。

可是在搞最后一次“剥夺事件”时，柯巴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否参加了这次“剥夺事件”的筹划工作呢？一次柯巴从流放地逃走后，便经常往返于彼得堡和第比利斯之间，同他的学生卡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很难说柯巴不知道这次新的“剥夺事件”。诚然，柯巴当时在党内还不大出名，但是他因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受到列宁的器重，并于1912年1月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他从高加索调到彼得堡工作，1912年5月合法报纸《真理报》创刊了，因此他的名声也传遍了全俄国。所以有理由认为，卡莫1912年9月搞的那次“剥夺事件”不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大概正因为如此，这次“剥夺事件”才没有搞成功。

我们再谈谈第比利斯抢劫事件之后，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柯巴在第比利斯被开除出党后（在第比利斯孟什维克占优势），他决定去巴库。他很快同巴库的党委员会接上关系，那里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比第比利斯大得多。柯巴到这里来是想当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但是柯巴只长于搞“剥夺”，连中学也没毕业。因而在争夺这里的领导地位时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对手是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生、一个名叫邵武勉的亚美尼亚人。（奥尔忠尼启则说：“邵武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门重炮。”）所以从第一天起，柯巴与邵武勉之间就展开了公开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斗争正在高潮时邵武勉被捕了。了解柯巴性格的人都怀疑他为了搞掉

竞争者而向警察局告发了邵武勉。这件事在党内广为流传，一家格鲁吉亚报纸（《Брозолис Кха》）竟然公开谴责柯巴告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甚至给柯巴立了专案。1908年3月柯巴被捕之后，才停止了他的专案审查。（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110页）同柯巴在巴库巴伊洛夫监狱一同坐过牢的谢苗·维列夏克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回忆录，对柯巴——斯大林在监狱里的情况做过描述。这篇回忆录登在1928年1月22日和24日的《天天报》上，这是克伦斯基在巴黎所办的报纸。

鉴于布尔什维克把侨民所写的一切有关他们的文章皆说成是"诽谤"，所以本不打算援引维列夏克的回忆录，然而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报纸《真理报》1929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篇评维列夏克回忆录的文章，并说这篇回忆录是真实的。《真理报》的这篇评回忆录的文章，标题就叫"核实无误"。当然，《真理报》只援引了维列夏克回忆录中对它有利的段落，而我们感到饶有兴味的地方却被删掉了。我们把《真理报》刊登和删掉的段落都列举出来。下面是《真理报》刊出的段落：

"1908年巴库宪兵局把我投进巴伊洛夫监狱时，我还很年轻……在一所能容纳四百人的监狱里囚禁着一千五百人……一天，囚禁布尔什维克的牢房里来了一个新人。当我问这位同志是谁时，别人神秘地告诉我说：'他是柯巴……'柯巴用的名字是索索·朱加施维里，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因此被吸收加入狱中公社……在会议和小组的领导人之中（指监狱中的。——作者）柯巴是一个出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身穿一件蓝色的缎纹布衬衫，敞着领口，不扎皮带，不戴帽子，一顶长耳帽搭在肩头上，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柯巴从不参与个人之间的争论，而在'有组织的辩论会'上他总是向每一个人挑起辩论。这些'有组织的辩论会'连续不断，每天辩论的题目

不一，有土地问题、策略问题、哲学问题等。土地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尤为激烈，有时甚至动起手来。我永远也忘不了柯巴组织的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会，在这次辩论会上柯巴的同事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为了维护柯巴的论点（我们知道，在1906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柯巴一直是一个‘分地派’，他既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也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地方公有’。——作者），在结束发言时竟朝一个做补充发言的社会民主党人伊利亚·卡尔采瓦泽的脸上抓去，为此他被社会民主党人狠狠地揍了一通……柯巴通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能战无不胜。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任何一种现象他都能用相应的马克思的观点加以解释。他给年轻的、政治上无知的党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高加索柯巴普遍被认为是第二个列宁。所以他特别恨孟什维主义（大概是因为孟什维克采取反对‘剥夺活动’的立场。——作者）……他总是积极支持带头闹事的人。因此犯人们都把他当作一名好同志。1909年复活节的头一天，萨利扬团第一连的士兵面对面列成两队，让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从中间走过，士兵则从两边毒打他们。柯巴从中间走过时，虽然士兵们用枪托打他，他却不低头，手里拿着一本书。”（不久，在苏联诗人的笔下，这本书就变成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作者）

《真理报》非常喜欢这几句话，该报编委杰米扬·别德内伊还写了一篇赞美词：

“难道斯大林的经历不是塑造壮丽图画的题材吗？我要向作家们呼吁：你们没有写英雄的素材吗？给你们！！……但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些谦虚的人……一个要求严格的布尔什维克是从不谈论自己的，但是，敌人无意中说出了实话，我们也不喝倒采。”（别德内伊：《核实无误》，见1929年12月20日《真理报》，不

过这篇文章写于1928年2月7日）

但是，即便是《真理报》上所援引的这段话也有重要的疏漏，使得维列夏克所描写的柯巴形象完全走了样。我们用自己的话将这些遗漏补上。维列夏克同柯巴一起坐了八个月的牢，在这段时间里完全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因为在监狱的环境里，人的性格恰恰是表现得特别突出和准确的。所有革命家都记得，当1899年斯大林因参加地下马克思主义小组而被第比利斯宗教学校开除时，他便到校方告发了小组其他成员，让他们也一道随他被开除。维列夏克写道，愤怒的学生们骂斯大林告密可耻，斯大林却用下述理由替自己的行为辩解：学生们失去做神父的权力之后，会成为“很好的革命者”。监狱里革命者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即不得同刑事犯打交道，但是人们总是看到柯巴同杀人犯、强盗和讹诈犯们在一起。只有那些能干麻利“事”的人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在辩论时所表现出的粗鲁以及他那不讨人喜欢的个性，使他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好争吵者。他不会说俏皮话，语言枯燥乏味，但是他的机械记忆力是惊人的。由于他缺少原则性，又天性狡黠，所以他长于策略。他说，反对敌人时，可以“不择手段”。每次夜里在监狱院中执行死刑判决时，所有监狱里的人都惴惴不安，而柯巴不是若无其事地睡觉，便是研究世界语，他认为世界语将是未来的国际语言。他从不对监狱中不公正的制度提出抗议，不搞策反，但是他支持别人搞。为什么柯巴在党内能这样久地不为人们所注意呢？这是因为他善于“暗地唆使别人，自己却从不介入”。在监狱里柯巴也使出了这套本领。维列夏克举了几个例子。有一次，一个格鲁吉亚青年因被指控为“特务和奸细”而被打了个半死。当时谁都不了解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遭到指控。后来才知道，这起“案子”原来是柯巴制造的。又有一次，一个名叫米特卡的布尔什维克打死了一名青年工人，罪

名是搞特务活动。好长时间这件案子审理不清楚。所有革命政党都有这样一条规则：只有根据集团或公意的判决，才能处死特务，个人是不能下这种命令的。后来米特卡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是由于柯巴的唆使才杀死这个工人的。维列夏克透露说，在监狱外柯巴插手过很多起案件——他搞过人人皆知的抢劫国家金钱的活动（“剥夺事件”），伪造钞票，现在他同这些强盗（“剥夺分子”）和伪造钞票的人一起坐在监牢里，而侦探机关却没发现他有任何可疑之处。这并不奇怪：柯巴不仅是一个内行的秘密工作者，而且他的谨慎还是一种“积极的”谨慎。这一点可以从维列夏克的表述中看出来。他说：柯巴自己在领导搞恐怖和“剥夺”活动时，却高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搞恐怖与“剥夺”！

苏瓦林在分析柯巴早期的外迁史时发现，那时在斯大林的性格中，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已经占了主要地位：1.“权欲”；2.狭隘的现实主义；3.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庸俗、简单的公式；4.玩弄阴谋时所表现出的东方人的狡猾；5.不诚挚；6.对人没有感情；7.蔑视人和人的生命。（见苏瓦林上述著作第115页）

不过，苏瓦林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那个时期的斯大林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实从他出现在高加索舞台上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一个把“职业革命家”与职业强盗、“剥夺者”、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和恐怖分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正是布尔什维主义犯罪派的创始人。

虽然只有列宁才算得上“剥夺者”们的精神之父（这一点上文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但是他给搞“剥夺”的游击队员们以很大的“自治权”。他在上述《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

“我们一点也不想强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

式，或者从书斋里来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问题。”（《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88页）①

对于列宁来说，重要的不是“斗争形式”，而是柯巴和卡莫给他提供的革命经费，后来他对待德国钱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为了革命，不经抢劫而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流进了列宁的腰包。但是，在德国人面前，列宁除应在俄国搞革命外（没有德国人他也是要搞的），不负担任何义务。至于柯巴和卡莫，列宁则要靠他们来维持党在最困难时期（1905—1912年）的司令部和出版物的开销。

列宁曾在大庭广众之中声称，他对高加索的“剥夺事件”负有政治上及道义上的全部责任。列宁祝福柯巴和卡莫建树“功勋”，给他们“行动自由”，他就是如此为柯巴和卡莫的犯罪、恐怖活动负责任的。但是，列宁对于历史和他自己的党所应负的最大责任不在于他靠土匪抢钱，而在于他念“剥夺者”的首领搞武装抢劫有功，以致把这种人拉进了党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1912年与斯大林同在中央委员会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只不过流放了十来个布尔什维克，而“剥夺派分子”斯大林后来把整个列宁党扼杀了，并且用搞“剥夺”的方法把苏维埃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水深火热、灾难重重的国家。列宁逝世以后，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堕落成斯大林的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其种子正是在搞“剥夺”的年代里由列宁亲手播下的。

卡莫被捕及柯巴被调往彼得堡（为了提高其声誉）之后，高加索的“剥夺活动”停止了。列宁开始寻求其他搞钱的“办法”。（二十年代，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家杂志上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同莫斯科一位非常有钱的女商人同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2页。——译者注

居，这个女商人定期向党的财会处交数目很大的捐款，但是“未婚夫”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同女商人吵了一架之后便离开了她，于是捐款中断了。列宁劝他回到女商人那儿去，“未婚夫”执拗不肯，并说他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当他问列宁自己是否会用这种办法为党筹款时，列宁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我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做，但你可以，请你还是回到她那里去吧。”这个故事我是凭记忆写出的，手头并没有那本刊登这件事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名字似乎叫《红色档案》，但是我敢担保，老布尔什维克所讲的故事大意确实如此。）

甚至连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从有名的工厂主莫罗佐夫到不大出名的季霍米尔诺夫（他资助过《真理报》）和施米特（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留下近二十八万卢布的遗产，布尔什维克从他的姊妹们那里拿到了这笔款。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第195页），也开始帮助布尔什维克了。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曾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很多钱捐给党的财会处，他遍游美洲，并将所筹集的钱全部交给了党。既然连俄国的“职业革命家”也只能从中央委员会那里领取很少的薪金（据雅罗斯拉夫斯基提供的材料说，“职业革命家”每月的薪金是三、五、十卢布不等，最多二十五至三十卢布），那末党的经费大部分是用在维持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内外出版物的开销上了。

卡莫被捕受审后，列宁同高加索幸存的“剥夺者”失去了一切联系，不过革命前柯巴同列宁还见过两次面，两次皆是中央委员会于1912年在克拉科夫开会期间的事，一次是在1912年11月，另一次是在12月。最后一次会见时，柯巴大概告诉列宁说，他想改行，不想再搞“剥夺”，而想做一名“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问题”，这虽说是个狭隘的问题，但是对未来的俄罗斯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管怎样，柯巴确实放弃了同"剥夺"有关的一切活动，甚至不再叫"柯巴"这个化名了，他用这个化名步步高升，直至中央委员的高位。斯大林有过许多革命化名，如："达维特"、"尼热拉泽"、"奇日柯夫"、"伊万诺维奇"、"柯巴"等等。从前他用格鲁吉亚文写作时，也用过许多笔名。他的第一个笔名听起来是很有象征性的："别索什维里"（俄文叫"别索夫"！）。①但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还是"柯巴"，后来又用"卡托"。从1909年起他开始用俄文写作，他努力想给自己起一个纯俄国人的笔名。从他所换的一个又一个笔名即可看出，想出一个能反映他的"权欲"的笔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1909年他所写的文章署名是"克·斯捷芬"。1912年4月15日他发表在《星报》上的一篇文章署名是"克·萨林"。三天后他又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署名是"克·索林"。直到1913年1月12（25）日他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彼得堡的选举》的长篇通讯时，才用了"克·斯大林"这个最后的新笔名。（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

柯巴（当时他还不是斯大林）想成为一个民族问题理论家，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列宁的赞许：列宁委托他写一篇有关的文章，甚至还派布哈林做他的助手，帮助他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列涅尔、奥托·鲍威尔）的民族问题著作中选择和翻译引语。斯大林从克拉科夫来到维也纳，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大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13年2月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过这件事：

"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的合法杂志。——作者）写一篇长文

---

① "别索夫"（"Бесов"）是由俄文бес（魔鬼）一词派生的。——译者注

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斯大林全集》俄文第2卷第403页）①

当杂志编辑部想把这篇文章登出供讨论时，列宁反对说：

“我们绝对反对。文章写得**好极了**。我们对崩得混蛋们丝毫也不放弃原则立场。（同上）②

文章在《启蒙》杂志上分三期连载，署名是“克·斯大林”。柯巴变成了斯大林。他向列宁证实，他不仅是一个“剥夺者”，而且是一个“理论家”。然而在列宁的眼里，他依旧是一个“剥夺者”“柯巴”。当1913年2月底斯大林回到彼得堡后被捕时，列宁写道：“国内逮捕事件严重。柯巴被抓去了……”（同上）③

最后我们再谈谈斯大林的学生卡莫的命运。上文说过，二月革命使卡莫从哈里科夫的苦役监禁中获释之后，他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列宁在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推荐卡莫时写道，他了解卡莫，他是“一个极其忠诚勇敢和有毅力的人。”（《列宁文集》1945年俄文版第35卷第73页）列宁在给斯克良斯基和斯米尔加的另一个便条中写道，他了解卡莫是一个“极其勇敢的人，在搞爆炸和袭击时尤其是这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42页）

列宁著作的评论员说，“卡莫率领一批战斗队员，携带枪枝弹药和书籍从莫斯科秘密前往高加索开展地下工作。”（《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708页）

卡莫是被派到格鲁吉亚（苏维埃俄罗斯承认格鲁吉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搞爆破的。苏俄驻格鲁吉亚大使谢尔盖·基洛夫于1919年12月向列宁汇报时，不顾秘密工作的规定和自己的“大

---

①②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86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使”身份，直言不讳地写道，卡莫仍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基洛夫的这一轻率举动使列宁大为恼火（“外交丑闻”！），他吩咐自己的秘书说：

“发一份密电，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许再用卡莫这个代号，立即改用一个新的代号。卡莫所在的城市用密码书写。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1页）

与此同时，卡莫到达第比利斯，他还不如基洛夫小心谨慎，开始在格鲁吉亚搞“爆破”。他很快被逮捕，并于1920年1月被驱逐出格鲁吉亚。卡莫又来到巴库，继续对另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共和国——阿塞拜疆搞颠覆。

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卡莫开始在第比利斯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要知道，卡莫也是一个财政“专家”）。列宁生病期间卡莫仍继续同他保持联系。他要求在列宁到高加索做治疗期间担任他的警卫，列宁说，如果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奥尔忠尼启则同意的话，他也同意。（同上，第230页）

不久卡莫就招来了横祸，这是他自己所没想到的。高加索人认为，一个英雄如不表现自己，那就不算是英雄。况且年迈人过起平凡生活后，总是要回忆过去的浪漫史的。第比利斯的财政“专家”开始在每一个小酒铺里向人们讲述，他如何同俄罗斯的身兼两个部的部长，即现在活泼愉快的“总书记”柯巴一道谋杀“黑帮分子”、“剥夺剥夺者”，当时进行过何等英勇的搏斗，最主要的是——他和柯巴如何将抢劫的钱送给列宁本人。他不单单是向人们讲述，而且还把文件、报纸上刊登的通讯文章、信札拿出来给人看……据第一个给卡莫写传记的作家比比涅伊什维利（贝利亚将他枪毙了）说，很快一名重要的特使来到了第比利斯，收走了卡莫所有的材料。从此卡莫再没有听到一点有关那些材料和那位特使的消息。托洛茨基在引用比比涅伊什维利这段

话时问道：

“我认为，斯大林通过他的特工人员抢走了卡莫的那些证明材料，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材料使他深感不安。这样作结论不会太轻率吧？”（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109页）

我们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托洛茨基的结论是错误的：斯大林没收卡莫的材料，不是因为从这些材料中看不出柯巴在“剥夺活动”中所起的个人“英雄作用”，相反，是因为这种作用在这些文件中看得太清楚、太明确了。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万一卡莫的材料落到敌人手中，那末全世界就会知道，昔日的职业土匪竟当上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所有给斯大林写传记的作家都抱怨说，斯大林尽管不否认参加过“剥夺活动”，但他也从未承认参加过这些活动。这些抱怨是没有根据的。斯大林说卡莫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他这样说就等于承认领导过卡莫的所有“剥夺活动”。他只不过没有象卡莫那样张扬“剥夺活动”而已。现在卡莫只能坐在第比利斯的小酒铺里，向别人讲他当年如何如何，而斯大林却坐在克里姆林宫，他所支配的已不再是“剥夺分子”，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恰恰是“国家的理由”，才要求卡莫缄默不语。他真地缄默不语了。就在没收卡莫材料的1922年，一天卡莫骑着自行车行驶在第比利斯的街道上。当时街上的车辆并不多，因为那时人们坐的还是马车，全第比利斯也只不过有四、五辆汽车。然而，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跑出一辆汽车来，一下子撞到卡莫身上，将他压死了。如果说这辆汽车的司机是斯大林的特工人员，那末，“这样作结论不会太轻率吧？”

第 六 章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911年12月列宁在巴黎召开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会议，会议做出两项决定：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为新的党中央，并建立其辅助性机构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领导机构及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1912年1月18日召开了有二十个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六次（布拉格）全俄党代表会议。

除“取消派”外（《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其他派别皆受到代表会议的邀请，但是所有这些派别都拒绝承认和参加这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前进派”集团也拒绝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各“民族”的代表也没有参加。个人拒绝参加会议的有高尔基和普列汉诺夫，但是两个在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派分子参加了代表会议。这就有理由认为，列宁倡导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党员的联盟”表面上已经实现了。

但是普列汉诺夫集团的代表们（泽文、什瓦尔茨曼）从代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他们不承认代表会议有权以全党的名义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58—360页）

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人对党的国外派别持颇为怀疑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说过，国外派别等于零。”（同上，第369页）但是这种提法对于列宁也是适用的。他的派别也在国外。这一点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第二位领导人斯潘达梁的发言中就看得更明显了。他要求索性解散国外派别组织，他说：“谁愿意工

作，……就到我们俄国来。”（同上）

列宁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的这一要求。他袒护“同俄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侨民，（同上，第370页）他的助手谢马什柯竟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解散所有的组织，扼杀为了帮助你们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可是你们既封不住马尔托夫的嘴，也封不住《真理报》的嘴。”（同上）

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七人（列宁、季诺维也夫、戈洛谢金、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什瓦尔茨曼、马利诺夫斯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会议规定中央委员会有权只用多数赞成的办法补选新委员。代表会议的选举程序如下：每个代表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字记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交给列宁。为保密起见，代表会议没有宣布选举结果。只有列宁知道选举结果。代表会议结束后，列宁向当选人发出通知。”（《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70页）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除什瓦尔茨曼一人是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外，其余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代表（普列汉诺夫不承认这一决定）。代表会议还选举了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代表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补选了那些在代表会议上落选的布尔什维克为中央委员（别洛斯托斯基和斯大林）。后来中央委员会又补选了两名布尔什维克（彼得罗夫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中央委员被逮捕时，由指定的五位候补委员递补，五人全是布尔什维克（布勃诺夫、加里宁、A·П·斯米尔诺夫、斯塔索夫和邵武勉）。

为了领导俄国国内党的工作，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俄国局由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戈洛谢金、斯大林和斯塔索夫组

成，他们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会议对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俄国组织委员会在团结所有俄国的一切派别的党组织和把我们党恢复为全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友好合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是在警察迫害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同上，第268—269页）

列宁有充分的理由庆祝自己的胜利。他给高尔基写信时谈到过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结果：“终于使取消派的混蛋们扫兴了——重建了党和中央委员会。”（《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卷第19页）

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认为布拉格代表会议几乎同党的创建代表大会有同等意义。该书说，这次代表会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第134页）①甚至说“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正式形成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同上，第139页）②因为斯大林是这次代表会议之后才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所以他愿意把党看成是这次代表会议以后产生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本书中所制造的有关假象也是很有趣的——书中提到斯大林时，好象他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而当选的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戈洛谢金、什瓦尔茨曼、马利诺夫斯基却根本没有被提及）。（同上，第137页）③

---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5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1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58页。——译者注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做了十年工作，以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布尔什维克党，夺得领导这个党的权力，这一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现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它在列宁取得俄国政权的道路上起着“职业革命家核心作用”。

当孟什维克领导人在国外侨民会议上和侨民报刊上对于党的统一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时，列宁和他的学生们将他们的俄国组织的领导权也夺走了。打起统一的、生气勃勃和大有作为的党的旗帜后，这是不难做到的。列宁正是这样做的。

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直到现在，直到1912年，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任务才彻底得到解决。列宁终于建立了一个由纯正的列宁主义者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调和派分子”，至于孟什维克那就更无需说了。只有一个普列汉诺夫派的孟什维克作为例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目的是争取普列汉诺夫。当这一打算落空后，那个普列汉诺夫分子也不知去向了。

列宁开始按照这一原则改组中央委员会和俄国所有各级党委员会。在改组过程中，列宁所遵循的方针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口号是他后来归纳的。宁愿要一支人数少，但有纪律性、受过训练、善于沉默、愿做牺牲的执行者队伍，而不要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有批评能力和爱发议论的群众的党。

忘我的牺牲精神、对领袖忠诚达到狂热程度、认真、勤勉可靠、讲团结、有纪律性，不言而喻，还要有极高的警惕性——列宁认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应有的品质。

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第四届杜马的代表罗曼·马利诺夫斯基。可是他不仅仅是俄国秘密警察的工具，也是列宁的工具。他是否是一个双料特务，而且列宁也知道

这一点——这仍然是个谜。但是，至少马利诺夫斯基在杜马中所做的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发言（讲稿可能是列宁撰写或修改的）最终是对警察局不利的。正因为如此，警察局自己揭穿了自己的特务，把他的身份通知了第四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罗将柯建议马利诺夫斯基退出杜马时，马利诺夫斯基便逃往国外去找……列宁！尽管自由派（布尔采夫）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的报刊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身份做了揭发，但是列宁仍久久不愿同他分离。连布尔什维克布哈林、特罗扬诺夫斯基、罗兹米罗维奇也对马利诺夫斯基做了口头揭发。除此之外，列宁还知道，马利诺夫斯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他的历史就是"龌龊的。"（见B·D·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60, p. 554—555）[①] 列宁还写文章袒护马利诺夫斯基（《启蒙》杂志）。马利诺夫斯基后来的命运也令人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利诺夫斯基做了德国人的俘虏，他在俄国战俘之间做过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工作，还经常收到列宁的妻子、中央委员会秘书克鲁普斯卡娅从瑞士通过红十字会寄来的食品和衣物。可以说，克鲁普斯卡娅做这些事时，她的丈夫是不会不知道的。

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在秘密警察局——暗探局——的档案被公布从而马利诺夫斯基被彻底揭穿之后），列宁是这样替自己做辩解的，他说，他之所以袒护马利诺夫斯基，那是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在《真理报》社和杜马中工作时，主要是帮助他和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暗探局。

---

① 沃尔夫著《三个搞革命的人》英文版第554—555页，1960年纽约代尔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马利诺夫斯基的结局也令人生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整一年，即在1918年11月，他从国外回来，直奔彼得格勒的斯摩尔尼宫，他要求说，要么让他见列宁，要么就逮捕他。列宁考虑三天之后，才决定还是将他逮捕为好。后来对他进行了审讯。“审讯时马利诺夫斯基趾高气扬，几次要求列宁出庭，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见沃尔夫上述著作第555页）看来，列宁的作法是很明智的。法庭是秘密进行审讯的。后来马利诺夫斯基被处决了。

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甚至连当事者也看清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党，而且这两个党不是一对孪生兄弟，而是冤家对头。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最大差别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而在于，第一，他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第二，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比起孟什维克之所以占绝对优势，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始终如一的、很活跃的、为达到既定目标所制定的理论，即夺取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理论就叫做列宁主义。

孟什维克没有统一的理论，对于这一问题他们的领导人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可以大致归纳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能夺取俄国的政权，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还应该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民主的长期发展阶段。正因为他们持这种观点，列宁才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1912年2月28日（3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非列宁派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普列汉诺夫集团、“前进派”集

团、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托洛茨基集团及崩得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谴责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在党内搞政变和篡权”。会议号召地方组织不要服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会议把给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抗议信寄给了国际社会主义局。1912年3月2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Vorwärts》（《前进报》）也刊登了一篇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长篇文章。（《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370—377页）

托洛茨基认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均应对党的进一步分裂负责，因为孟什维克忽视秘密党，而布尔什维克篡夺了属于全党的权利。（见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y Leonard Schapiro, New York, p.126）①

1912年8月25日至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十八名拥有表决权及十六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由托洛茨基集团以不满意列宁搞政变的所有社会民主党派别的名义召集的。一个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后来发现他是警察局的奸细。布尔什维克“前进派”集团也参加了会议。当马尔托夫在代表会议上指出列宁主义者是“政治骗子”的时候，会场上发生了一系列难以调停的事端(见斯皮里多维奇上述著作第242页)。这说明，列宁的精神竟然也笼罩着列宁的反对者的代表会议。会议选出“组织委员会”来同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分庭抗礼。

1912年、1913年的特点是：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建立党的秘密基层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地方中心，建立“受托人”制度，加强他们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这纯属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工作路线。然而，依据列宁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理论，即把秘密

---

① 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纽约英文版第126页。——译者注

工作同在合法组织中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理论，中央委员会积极执行它的第二条路线，即建立和巩固党的合法机构。中央委员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在俄国创建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1912年5月5日）的，报纸的名字也是借用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创刊前，从1910年12月开始出版过日报《星报》，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合办的；1914年还出版过中央委员会的合法机关刊物《启蒙》杂志）。

布尔什维克奥利明斯基、波列塔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真理报》编辑部。莫洛托夫任秘书（莫洛托夫的朋友、一个名叫季霍米尔诺夫的富有大学生为创办报纸提供了资金，他曾同莫洛托夫一道参加过喀山地下布尔什维克小组）。

作为合法报纸，《真理报》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斯大林的党史中写道："《真理报》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真理报》争取了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站到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来（发行四万份）……一个合法的报纸是不可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它只能暗示……例如，当《真理报》说到"1905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时，工人们就懂得"这是指布尔什维克的几个革命口号，即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第144—145页）①

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13年11月写给《真理报》的信表明，布尔什维克在需要时，也会做"合法主义者"、"取消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这封信中，他们因为报纸过于左倾、过于革命而对报纸提出了批评，并要求报纸把调子降低。信中说：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7—168页。——译者注

“无论如何要把调子大大降低，使之合法些、温和些。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并规定自己的审查制度。一定要这么办，否则你们就会把事业白白断送掉。”（《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217—218页）①

1913年1月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为了离俄国更近一些，列宁当时已从巴黎移居加里西亚）。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央委员，也有党的合法工作者，其中包括第四届杜马代表。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特罗扬诺夫斯基、梅得维杰夫、洛巴娃、罗兹米罗维奇、第四届杜马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巴达也夫和彼得罗夫斯基（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团由十三人组成，即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六人团”和孟什维克“七人团”）参加了会议。

为了保密起见，中央委员会一月会议称作“二月会议”。会议“通报”说：

“今年2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到会的有彼得堡、莫斯科区域、南方地区、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的代表……几乎全体与会者都积极参加了各种**合法**的工人团体，利用了所谓‘合法机会’。因此，会议的成员保证了能正确地反映俄国各主要地区全部党的工作的状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88页）②

至于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参加合法组织，会议所做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方面继续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从黑帮杜马讲坛，到任何一个戒酒协会都要加以利用，来进行坚

---

①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54—55页。黑体字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70—371页。——译者注

持不懈的有计划的工作；同时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只有真正按照党的决议的精神，即从日益增长的革命着眼通过的考虑周到的决议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一切工作的人，才配得上党员的崇高称号……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随波逐流，高唱合法主义，而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在秘密党的周围。……统一问题不是在合法的刊物上空谈'统一'……，只有把各地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工人都联合起来，真正溶合成一个统一的秘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统一问题。"（同上，第289—290页）①

列宁正是这样建立秘密政党的，这是一个实行等级制度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会便是这个组织的参谋部，在作战中参谋部依靠所有一切合法机构，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到"戒酒协会"。不仅"取消主义者"，而且孟什维克护党分子也不能胜任这一工作。

会议决议指出：

"刚刚开始的新的革命是沙皇政府六三政策破产的必然结果。"会议着重强调了秘密工作，一切合法行动都要服从秘密工作："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许多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围绕着的无数党支部的总和。"（同上，第292—293页）②

因此，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看法相反，当前的主要目标乃是进一步建设秘密的党。决议中就这一问题说道：

"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在所有的工厂中建立有纯洁的党性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72—374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6—377页。——译者注

的秘密委员会……在每个中心建立一个由分散的地方小组组成的领导组织……为了建立地方组织同中央委员会的密切联系，同时为了指导和统一党的工作，会议认为绝对必须在工人运动的主要地区建立区域的中心组织。”（同上，第293—294页）①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直是作为一个服从党的各个中央机构为代表的党的机关而存在的”，对它的工作“必须实现党的监督”。（同上，第295页）②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13年9月23日至10月1日（10月6日至14日）在波罗宁诺（克拉科夫附近）举行（为了保密起见，这次会议称为“八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五名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十名俄国组织和五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其中包括加涅茨基—菲尤尔斯坚别尔格）。列宁任会议主席，副主席是马利诺夫斯基。会议持续了九天。共举行了十八次会议，五次是听取并讨论地方和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据官方报道，这次会议研究了罢工运动、在合法社团中的工作、党的刊物、宣传任务、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族等问题以及定于1914年夏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来分析研究的，即一场新的革命最近必将开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02页）③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集中讨论了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问题。经中央批准后会议建议扩大地方上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数目（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除中央委员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77—378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89页。——译者注

外，在俄国已有十四个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413页）关于这些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代办员）决议说：

“会议认为，在中央委员会下建立受托人制度对于统一全俄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每个大的工人运动中心推选出尽可能多的受托人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10页）① 谈到党的合法基层组织时说，要加强所有合法工人组织（工会、俱乐部、医院保险处、合作社等）中的工作，并逐步使之控制在党之下，“争取每一个这样的机构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支柱”，要“尽量使党的拥护者被选到所有的负责岗位上去。”（同上，第314页）②

会议指出，在即将爆发的革命中，俄国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将起重要的作用。应当预先得到他们对党的支持。为此，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会议提出下列原则作为民族问题的主要口号：承认“在沙皇君主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的自决权，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同上，第315—316页）③ 但是中央委员会又立刻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从而完全取消了刚才宣布的民族自决权。中央委员会说，不要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同“适当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党每一次都要具体地加以解决，要根据“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加以解决。（同上）④

列宁通过这两次会议证明，党不是有两个中央（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而是只有一个实际在俄国开展工作的领导机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9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4—40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06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407页。——译者注

构，即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政权——这是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治热情的焦点。列宁发现中央委员会是取得国家政权的工具。中央委员会似乎预感到就要取得这一政权了，所以它在波罗宁诺会议“通告”中写下了下面这段不折不扣的预言：

“关于新的革命的问题在国内整个政治生活中占着统治的地位……道路已经确定。党已经找到了目前过渡时期的基本工作形式……同志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时期正在来临。决定我们祖国命运的极重要的事变快要到来了。”（同上，第302—308页）①

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仍在采取措施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对立派别讲和（第一次是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进行调停的，后来根据国际局的成员卢森堡的建议又进行过一次调停）。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于1913年12月14日举行特别会议，会议曾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解。

1914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吉斯曼斯、卢森堡就这一问题召集了联席会议。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崩得、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真理报》及《我们的工人报》编辑部、“六人团”和“七人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个人有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

列宁对联合的建议回答说，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值得联合了，全党有五分之四的人赞成他的中央委员会。列宁用最后通牒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必须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唯一的领导中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89—396页。——译者注

心，必须取缔孟什维克的中央机构——组织委员会。”（《纪念弗·伊·乌里杨诺夫（列宁）五十寿辰》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29页）

列宁的发言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批评。普列汉诺夫甚至说，列宁之所以不愿意联合，是因为他不想交出手中党的经费。普列汉诺夫说，列宁用“盗贼的手段”窃取了部分经费（因为这句话普列汉诺夫被迫中断讲话，被取消了发言资格）。（见斯皮里多维奇上述著作第261页）

结果如何呢？结果没能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达成“联合”协议。参加会议的人各奔东西了。以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继续统治着党，这个党……实际上一半以上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对于几个少数未被逮捕的干部来说，对于由几个老练的、狂热的领导人（他们有周密的行动计划和现成的指示）所组成的坚强的司令部来说，所缺少的只是钱和军队了。（见斯皮里多维奇上述著作第26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提供了军队，德国参谋部又给他们提供了钱。无论是军队还是钱，列宁都运用得很巧妙。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央委员会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还是失败，——这对俄国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如要理解布尔什维主义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就必须弄清列宁的“政权哲学”。列宁对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国内事物也好，国际事物也好——只用一种观点去看待，即这一事物能使他接近政权呢，还是使他远离政权。无论是饥馑，还是经济罢工，无论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自然灾害，甚至象水灾、地震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列宁都是从政权这一角度去看待的。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些事件和灾害来为夺取政权服务。如果民族生存的利益同夺取政权斗争的利益相抵触时，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夺取政权斗争的利益。民族是为了政权而生存，因为民族仅仅是一定数目的人而已，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支配民族的权力只有使全国遭到一场大灾难（如在战争中遭受失败）才能夺得的话，那末这条路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一条最可靠的捷径。

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战争问题的宣言（1914年11月）同这一“政权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宣言说：

“……交战国双方，在掠夺方面、在战争的野蛮和无限残酷方面，都不相上下……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蒙受而且还要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一切合法的工人刊物被查封了。大多数工会被取缔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志被逮捕和流放了。但是我们的议会代表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

团——认为：不投票赞成军费开支……这是它的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的义务……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毫无疑问，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看，**最好是**……**沙皇君主政府失败**……**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准备工作。”（《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20、323、324页）①

于是列宁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以便利用战争的恐怖和俄国的困难局面开辟“第二条战线”，即在俄国后方进行内战。

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几乎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都被逮捕（斯潘达梁、别洛斯托茨基、什瓦尔茨曼、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谢金）。许多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被捕和被流放。列宁本人在战争初期也被奥地利作为俄国“奸细”逮捕，但是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列宁曾同他们进行过残酷的斗争）的调停而获释，这之后他便去瑞士了。在回俄国参加革命之前，他一直住在瑞士。

不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而且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也主张要俄国失败，主张实行国际主义，反对爱国主义，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却未能重新统一。普列汉诺夫集团（普列汉诺夫、捷伊奇、查苏利奇等人）拥护护国主义的观点（保护俄国在战争中不受德国侵犯）。布尔什维克（然而是反列宁的）“前进派”集团领导人之一阿列克辛斯基也加入到“护国派分子”的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12、414、416、417、418页。
——译者注

行列之中。

1915年2月14日至19日（2月27日至3月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伯尔尼召开了所有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团体代表会议。十六人参加了代表会议，其中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加米涅夫、布哈林、特罗扬诺夫斯基和他的妻子E·罗兹米罗维奇等人。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仍是战争问题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确认了“中央委员会宣言”中所提出的要俄国失败的方针。决议说：

“在每个国家，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国政府的斗争，不应当由于进行革命的鼓动可能使本国失败而停顿下来……这个原理运用到俄国来特别正确。如果俄国胜利了，世界反动势力……就会加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俄国失败都是害处最少的。**”（同上，第329页）①

会议谴责了所有孟什维克派的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取消派”（《新曙光》）和普列汉诺夫派也受到谴责。甚至连组织委员会中的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也遭到谴责。决议就此问题说：

“事实上站在沙文主义方面的还有组织委员会……还有亲德沙文主义占上风的崩得……聚集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的分子（托洛茨基派分子）摇摆不定，一方面假惺惺地赞成国际主义，一方面又想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组织委员会讲统一。社会民主党的齐赫泽党团也是这样摇摆不定……”（同上）②

决议中补充说，“只有那些主张坚决同组织委员会，《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崩得在组织上断绝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才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2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25—426页。——译者注

可以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同上，第330页）①

会议还做了名为“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的专门决议。这一决议指出，“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战时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上表现得特别鲜明。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策，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这就是撕毁第二国际的最重要的决议，直接背叛社会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支持无产阶级的一切国际性的和群众性的革命发动，竭力密切同国际的一切反沙文主义分子的关系。”（同上，第328页）②

会议选举了国外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国外的辅助机构。

不久列宁积极地参加了1915年10月9日至12日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挪威、罗马尼亚、法国、瑞典、瑞士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党左派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列宁、梁赞诺夫）、组织委员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切尔诺夫和纳塔松）、崩得（利普尼克）代表俄国参加了会议。俄国方面参加会议的还有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区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

列宁在代表会议上宣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中所陈述的原则，阐释了他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要求代表会议采纳这一口号。当德国的代表列德布尔责备列宁说，在平安无事的瑞士鼓吹在俄国打内战倒是件轻松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2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23—424页。——译者注

事时，列宁回答说，“到时候他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内战胜利时他不会推卸执掌政权的重任的。”（《纪念乌里杨诺夫（列宁）五十寿辰》192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2页）

鉴于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许多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受托人”）被捕，国外的中央委员早在1914年4月就决定改组中央委员会秘密组织。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任务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为此党团成员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也夫被擢升为中央委员，党团成员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和沙戈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受托人。此外，还成立了中央委员会“组织部”，负责领导地下工作。为掩人耳目，该委员会叫做“工人合作委员会”。“组织部”的任务是：（1）指导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2）关心一切合法组织的工作联系，（3）寻求掩护秘密联系以及地下活动的特殊秘密形式，（4）统一全俄范围内的工作，建立正常的联络与巡视制度。“组织部”的成员由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任命，人数为三至五名。（《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55页）①

有人说，列宁曾提议加里宁、基谢廖夫以及保险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组织部，（同上，第481页）②但是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新机构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方面的文字材料。

总地说来，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对战争所做的反应同列宁相似。布尔什维克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巴达也夫在彼得堡对记者声明说，“用战争来对付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要为这一口号而斗争。”（巴达也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1954年俄文版第344页）

---

① 见《列宁文稿》第2卷第205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475页。——译者注

1914年7月26日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道）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谴责和反对战争。在表决军费时，所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投票，并退出杜马会场以示抗议。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指出：

“这是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联合行动。孟什维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怕彻底失去群众的信任。”（《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490页）

但是，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同时又能以秘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的身份在工厂掀起反战运动，在革命集会上公开做演讲。沙皇警察对他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是杜马代表，不受逮捕。不久政府就结束了这种局面。

1914年11月4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近郊举行代表会议讨论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时，五名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六名布尔什维克干部被捕，其中包括中央机关报编委和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罗晋费尔德（加米涅夫）。

1915年2月10（23）日他们被指控参加旨在推翻现行国家制度的组织而受审。逮捕他们时所查获的列宁写的名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战争中的任务》的提纲和名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是主要的罪证材料。被告人有被处死的危险，但是他们在加米涅夫的领导下做了出色的辩解，致使法庭相信了他们没有参加过中央委员会的反爱国主义活动和其他任何秘密活动。被告人否认他们主张俄罗斯失败。列宁对自己的同志们，特别是对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表现感到不满。

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的审判证明什么？》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

“它表明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先进部队在法庭上表现得不够坚强……象罗晋费尔德那样，竭力证明自己和社会爱国主

义者约尔丹斯基先生意见一致，或者证明自己同中央委员会意见不合，都是不正确的办法，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不能容许采用的办法。”（《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26卷 第168页）①

如果被告不是这样做的话，那末列宁自己也承认，“在初审时，代表们是受到军事法庭和死刑威胁的。”（同上，第171页）②法庭判决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合法报纸《真理报》于1914年7月8（21）日被查封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被取缔是对列宁的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打击。列宁颇有理由地宽慰自己说，“约有四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则更多。就让战争、牢狱、西伯利亚、苦役夺去他们中间五分之四、十分之九的人吧！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必须同这个阶层一起活动……朝社会革命的方向。”（同上，第175——176页）③

这些逮捕事件发生后，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机构完全瘫痪了。中央委员会只剩下了在国外的委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和1915年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施略普尼柯夫，他又是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新任特派员。克鲁普斯卡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543页）直到1915年秋才重新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所补选的委员是B·H·扎列日斯基、И·И·弗金、Г·И·奥西波夫、A·Г·施略普尼柯夫，后来又补选了K·C·叶列梅也夫和E·A·杜纳也夫。但是，到1916年春天，差不多所有这些人又都被逮捕了。1916年秋天，俄国局第三次更新，П·A·扎鲁茨基、B·M·莫洛托夫和A·Г·施略普尼柯夫被选进新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4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54页。——译者注

的俄国局。（同上，第543—544页）

1916年夏成立的彼得堡委员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州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执行局、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1916年5月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各州组织执行局（从1917年1月起）曾对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给予过帮助。其他组织有的解散，有的瘫痪了。官方历史学家承认：

“不过，在战争年代里区和州的组织很少，他们只是偶而才举行活动，同地方上也没有牢固的联系。”（同上，第544页）而且，“战争初期，党员的数目锐减。”（同上）

其实，两个首都里的党员数目本来就不多。1914年11月彼得格勒有一百至一百二十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国内的困难的增加，工人中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党员数目也随之增长。例如，到1917年初彼得堡党组织已经有二千人。这二千人便是十个月后在首都搞十月革命的骨干力量。1915年夏莫斯科有二百名布尔什维克，到秋天已增至五百人。1915年春哈尔科夫有近十五名党员，到秋天增至八十五人，到1916年秋增至二百人，到1917年初已增至四百人。（同上，第547—548页）

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近一年后在瑞士复刊。从1914年11月1日至1917年1月31日共出版了二十六期。少量《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传到了俄国。

中央委员会所属的专门小组经过斯德哥尔摩沿俄国与瑞典、挪威边境地区的通路运送书籍和报刊。在俄国国内的八十个城市里出版了六百多种传单，印数近两百万份。（同上，第550—551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小组还在各种合法组织里，如在工会、保险协会、患病职工补助会、合作社里展开活动。“合法组织常常起着掩护秘密活动的作用，”——官方历史学家写道。（同

上，第556页）

战争一爆发，布尔什维克就尽一切努力渗入军队和前线去。“布尔什维克知道，如果不把士兵群众争取到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一边来，那就不能指望革命会得到胜利，”——官方历史学家又写道。（同上，第559页）

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建立党小组，向他们提供秘密书刊。这一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所以1916年年中警察局报告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印发的革命呼吁书在彼得堡流传甚广，其中很多份已传到正在作战的部队和舰队。”（同上，第559页）

几乎每一个党的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军事部，军事部负责在后方部队中开展工作，往前线寄送书刊，组织自己的工作人员去部队中做宣传，在这些部队中建立新的党小组。在北方前线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建立了八十个军事党小组，在西部前线建立了三十个。（同上，第560页）在党的军事工作中，迪宾柯、拉斯柯利尼柯夫、法勃里齐乌斯、伏龙芝、米亚斯尼柯夫等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人已崭露头角。

孟什维克的组织工作远不如布尔什维克搞得好。1916年1月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担心，这是非常自然的，他写道：

“我们在俄国的情况不妙……唐恩怕所有人都投奔到列宁派分子那里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1901至1916年间通信集》柏林1924年俄文版第355页）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列宁的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理论正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经住考验的。沙皇警察很容易抓到取消派的合法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秘密机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没被逮捕的取消主义者现在只好到从前被他们痛斥为阴谋

组织的列宁主义者的秘密组织中来找藏身之所了。

二月革命开始时，党的状况就是如此。关于各政党参加1917年二月革命问题，文献中有各种看法。事变参加者、第一个写1917年俄国革命历史的左派孟什维克苏哈诺夫（他自称是“半个列宁主义者”）写道：

“当时没有一个党料到会有伟大的革命发生。所有人都在幻想、犹豫，有的人有所预感和‘觉察’……”（苏哈诺夫：《革命札记》1922年俄文版第1卷：“柏林—彼得格勒—莫斯科”第19页）

这是一个感情用事的评价，不能算是实际的分析。毫无疑问，二月革命是当时一次最伟大的人民自发的革命。同样不会有多大疑问的是，这次革命不是按照各政党的时间表发生的。但是，二月革命是人民愤怒的自然爆发，它绝不是一桩偶然的事件。在这之前，俄国历史的一切发展已为这次革命做好准备工作。在这一历史准备过程中，俄罗斯的左派党——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布尔什维克——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在国家杜马讲坛上系统地批判过沙皇政府的无所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斯柯别列夫、齐赫泽）也在这个讲坛上对整个现行制度做过公开的揭发，并以革命相威胁。布尔什维克在杜马之外做过革命的分化工作，由于诡计多端的拉斯普庭和内阁的迭次更换，王朝自己也暴露无遗，再加上对战争的普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二月革命一触即发的局势。

当然，二月革命使资产阶级政党感到措手不及。不用说，孟什维克在杜马中的上层人物同革命的地下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布尔什维克在其合法机构（杜马党团、《真理报》）被破坏后，则把所有力量都投入了地下工作。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中央局

及其代理机关预见到了二月革命，并把这一点通知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直到1965年才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负责人A·施略普尼柯夫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列宁）的秘密报告。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它记述了中央局二月革命前所做的工作。让我们援引其中几句话：

“我们的组织工作搞得不错，但是如果有人手，还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我们在南方、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顺利地进行组织工作。成立了莫斯科州执行局。现在正等着高加索方面的消息。需要人员和书刊。在俄国国内出版书刊，是中央委员会执行局当前的首要任务。所挑选的人都是很好的、坚定的、有才干的。同其他组织相比，我们的形势很好。可以说，现在只有我们才有全俄范围的组织……孟什维克、统一派和其他分裂出去的人重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不满情绪在全国激荡。不日即可爆发革命风暴……情况很危险。”（《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5年第9期第81页）

两周后刮起了“革命风暴”。一些历史学家写道：对列宁来说，1917年革命是很突然的。然而，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一场大的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都会导致革命，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全部实质。列宁从来没有怀疑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定会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薄弱环节！”）爆发革命。不仅可以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一句话，而且可以找出成千句话，甚至可以找出他的整整一本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春，1917年4月出版）——来证明列宁的这一论断。这样做没有必要。我们只援引列宁1917年1月所做的一个报告中的几句话，那些历史学家们也引用过列宁的这个报告。列宁在报告中说：“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在最近几年内，正是这次掠夺性的战

争，会引起欧洲人民举行起义。”接下去便是似乎能证明列宁对革命感到“突然”的那句话：“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57页）① 按照列宁的理解，我们至今仍没有活到“决战那个时候”，因为列宁所说的“决战那个时候”，是指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革命的胜利时刻。

我们再从列宁的题为《世界政治的转变》一文中引一句话，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1月31日。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断言：“欧洲的革命形势现在已经形成了。”（同上，第385页）② 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提出了一些政治家的名单，如果沙皇同德国皇帝单独媾和的话，就由他们组织新的革命政府。列宁说，这个政府将由“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甚至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来领导。（同上，第381页）③ 当这几位政治家不是由于单独媾和而是由于人民自发革命而上台执政时，列宁只对自己的预言做了一处修改：“原来亦此亦彼：三个人全在一起。多么可爱！”（《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5—6页）④

列宁所抱的正是这种信念，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能为我们做证。她写道：“我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任何时候也没有象1916年最后几个月和1917年最初几个月那样充满不讲和的情绪。他深信革命日益临近了。”（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俄文版第271页，1957年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

目击者对革命的开始做了如下的描述：

“2月23日星期四，一早彼得格勒各工厂就开始了罢工，罢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7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1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8页。——译者注

工很快变成了街头骚动。骚动是自发的……起因是铺子里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第二天人群里出现了小红旗，有人喊道："打倒战争！给我们面包！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Д·扎斯拉夫斯基、B·Л·康托罗维奇：《二月革命纪事》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18—19页）

但是局势越来越严重。2月25日杜马主席罗将柯给沙皇的电报对局势做了如下描述：

"局势严重。首都一片混乱。政府瘫痪了……街上的人们在胡乱射击。一些部队发生火并。必须立刻委托一个受全国信任的人组成新政府。不可拖延。任何拖延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看来，这封电报没有引起沙皇的重视。罗将柯又发了第二封电报：

"局势在恶化。应当立刻采取措施，否则就迟了。决定祖国和王朝命运的最后时刻到了。"（同上，第25、28页）

沙皇的回答是解散杜马。然而，当时杜马实际上也起义了——杜马的首领们决定不解散，并成立了临时杜马委员会，"以便同当局和各个机关保持联络"。临时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所有的杜马党团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齐赫泽）。以罗将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除两名是社会党人外，其余皆是保皇党和一切革命的死敌。但是二月风暴迫使他们违心地担负起革命总部的任务。当事人证实说：

"当国家杜马成员还在犹豫不决时，事变已迫使塔福里宫（杜马）担负起领导任务。部队和群众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人们向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齐赫泽请示。带来了被捕的人……运来了武器……"（同上，第29页）

临时委员会仍不肯以革命的名义夺取政权。他们想心平气和

地劝说工人回工厂，士兵回兵营去。但这已绝对办不到了。临时委员会委员、保皇党舒尔金在描写那几天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

“机枪——这就是我当时想要的东西，因为我感到，当时只能用机枪同街上的人群说话，只有子弹才能把跑出来的可怕野兽赶回它们的巢穴……天哪——这头野兽就是……俄国人民陛下。”（《苏联国内战争史》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0—71页）

除后来成为官方政权基础的临时委员会外，2月27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非官方的革命政权机构——工人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人立刻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首脑人物，因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是他们所主张的，而且这个机构也是以他们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为核心而建立的。2月27日晚9时齐赫泽就在杜马的塔福里宫主持了第一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会上选出了由十四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由三人组成的主席团。两名孟什维克（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和一名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还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和扎鲁茨基）。孟什维克索柯洛夫任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是著名的“一号命令”的起草人。

后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因各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劳动党、人民社会党、崩得、“区联派”、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都派了正式代表而有所扩大。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执行委员会。（见扎斯拉夫斯基和康托罗维奇上述著作第30页）

2月28日苏维埃发布“公告”说，苏维埃由各工厂、起义部队、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推选的代表所组成。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力量，为在俄国彻底巩固政治自由和实行由人民治理而斗争。苏维埃指派区委员建立彼得堡各区人民政权。”（同上，第284页）“呼吁书”对共和国只字未提，只说将来要

召开立宪会议。直到2月28日，当革命在彼得堡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临时委员会才夺取政权，并且马上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展开谈判。

新政府的性质、组成和纲领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苏维埃各政党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三派：人数不多的克伦斯基派主张苏维埃正式参加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派人数更少，他们建议成立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临时革命政府”，但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第三派是由孟什维克（苏哈诺夫、斯捷克洛夫、齐赫泽）为首的苏维埃大多数代表所组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者和苏维埃参加临时政府。

孟什维克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党内没有能组阁的专门力量）和所谓的教条主义（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组阁）。因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十三票对七票否决了参加临时政府的提议。（同上，第43页）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承认新政府的条件。为使自己的条件能被立宪民主党人所接受，执行委员会在这些条件中抛弃了革命的主要问题——政权形式问题（共和国）、土地问题、和平问题、八小时工作制问题。这些问题应由将来的立宪会议解决，不过立宪会议应尽快召开。

新政府所面临的直接任务是：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使军队民主化，取缔警察，代之以民警，立即组织地方自治机关的民主选举，不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撤出彼得格勒。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代表（齐赫泽等人）会谈时，这些条件基本被接受了。

3月2日沙皇宣布他和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阿列克赛——让位给米哈依尔大公。3月3日米哈依尔大公也相继让位。罗曼诺夫王朝已不复存在。3月3日那一天公布了由杜马临时委员会指定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只有一名社会革命党人、苏维埃副主席克

伦斯基参加了政府。同时还发表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呼吁书”，“呼吁书”对临时政府拟定实施的改革表示欢迎。这些改革是：实行赦免，保证公民的自由，取缔宗教和民族限制，立即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用民警取代警察，民主选举地方自治机构，不裁减和调走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在保证军纪的情况下取消对士兵的一切限制，使其享受社会权利。

苏维埃保证说，临时政府实行多大程度的改革，苏维埃就给予临时政府以多大程度的支持。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做的。（同上，第288－289页）

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家们硬说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但是既没有文件，也没有当事人能证明这种作用。《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说：

“在街垒战中布尔什维克冲锋在前，而苏维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俄文版第1卷第84页）

六卷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作者们写道，“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利用2月23日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机会举行会议和集会……2月23日群众的战斗情绪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游行，首都的大街和广场上挤满了游行队伍，革命的第一天开始了……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指示说，要极大地发展开始了的运动。”（俄文版第2卷第659、660页）

看来，二月革命似乎是根据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指示开始的，然而该书的作者们却没有说出这一指示的内容。不过他们引证了两个委员会所散发的号召工人继续进行斗争的传单。但是这些传单是在革命已达高潮即2月25日才散发的。从这一天起，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积极地参加了事变。但是2月26日晨几乎所有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就全部被逮捕了，它的职能改由维堡区委员会代行。（同上，第667页）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家们说，

不仅罢工和游行而且连自发的武装起义也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他们写道：

“2月26日晚上维堡区委员会的成员同中央委员会执行局的代表们在乌杰利车站聚会。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心决定变罢工为武装起义。制定了行动计划：同士兵们联欢，解除警察的武装，占领军械库，武装工人，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同上，第668—669页）

这个“行动计划”是事件发生近五十年后拟定的，因此这些著作家们拿不出任何文件加以印证，即便是回忆录也拿不出。只有这个莫须有的计划的最后一点，即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是有据可查的。

宣言是本着尽人皆知的党的要求精神起草的，这些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停止战争。但是宣言中却没有提到列宁的最主要的要求——号召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却提出了列宁没有提的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要求。（《苏联国内战争史》俄文版第1卷第74页）不过，当列宁分析外国报纸所刊登的这篇宣言时，他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讲的是苏维埃。（《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4页）①但是列宁的学生们所没提到的东西，却被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作为重点在呼吁书中提出来了。呼吁书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将是一支把“全民革命胜利进行到底”的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见扎斯拉夫斯基和康托罗维奇上述著作俄文版第286页）

为什么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呢？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是：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28页。——译者注

“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孟什维克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合法开展活动，公开露面，他们有象杜马党团这样的重要合法据点。被迫转入地下的布尔什维克是不具备这些的……还有一个原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武装起义上，低估了政权问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2卷第676、677页）托洛茨基也写过在革命最初几天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莫洛托夫是如何“束手无策和丧失原则的”。（L. 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S. 112, Frankfurt/M.,Fischer Verlag,1967）①关于是谁领导了二月革命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是列宁党培育的觉悟工人，但是他又马上补充说：“这一领导足以保证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足以使革命领导权转归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同上，第139页）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没有夺取政权？列宁解释得很简单：“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06页）②列宁认为，二月革命最有趣的特点是一下子产生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权：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临时政府第一任主席李沃夫公爵后来写道，“临时政府有权无力，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却有力无权”。（《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4页）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德文版第112页，1967年法兰克福费舍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2页。——译者注

第八章

革命时期的中央委员会

1917年3月6(19)日列宁用法文往斯德哥尔摩拍的一封电报，是他对二月革命所做的第一个反应。电报是拍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在这封电报里列宁给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布尔什维克党做了简明的策略指示。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请将这个策略电告彼得格勒。”（《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页）①

这封电报送到了彼得格勒，3月13（26）日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封电报，同一天又在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同上，第502—503页）

列宁的这一指示不仅没有被俄国国内党的领导人所采纳，而且也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如果说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原来的委员们在2月间在深入开展革命和夺取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等方面是比较左的，同列宁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话，如果说从3月5日起开始出版的旧《真理报》（其编委是：奥利明斯基、加里宁、叶列梅也夫、莫洛托夫）曾宣布说李沃夫一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反革命政府的话，那末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新委员们和新的《真理报》编委（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则是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3卷第302页。——译者注

站在反列宁的立场上。关于旧的中央委员会以及《真理报》原编委，列宁曾写道："我们拥护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拥护《真理报》，拥护自己的党，拥护服务于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民警。"（《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10页）①对新的中央局和《真理报》新编委，列宁从未说过这种话。

列宁从瑞士寄来几封论策略的信（《远方来信》）要《真理报》给予发表，而《真理报》只同意刊登其中的一封，这个事实也能说明中央委员会新领导在反对列宁方面已达到何种程度。而且连这一封信也做了很多删节。据布尔什维克的注释者对列宁全集所做的注释说，"删去的主要是对妥协党，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的评论，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是一副奴颜媚骨相……列宁揭露临时政府趋向君主立宪和帝国主义的地方也被删去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504页）

如何对待临时政府问题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是列宁与新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为了弄清问题的实质，就必须讲一讲二月革命后头两周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所发生的变化。

在斯大林时代，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的记录是绝密材料。1962年，当揭发斯大林的运动正值高潮时，这些记录第一次公布。这些记录使人们得以看到中央委员会在列宁回国前所实行的真正策略，从而理解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意义，列宁把这次革命引向反对自己党的道路，没有这次革命就绝对不会有列宁的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

3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不是每天开会，就是隔一两天开一次。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在3月4（17）日举行的。根据记录可以

①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95页。——译者注

断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委员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和莫洛托夫外，中央局前委员叶列梅也夫、施维德奇柯夫、扎列日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第136页）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局委员们进行了分工，并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决定着手进行《真理报》的复刊工作，指定了编委（叶列梅也夫、莫洛托夫和加里宁），指出，“三位编委都要同样负责，问题由三人协商一致解决”，如有意见分歧，由最高仲裁机关中央局决定。经济工作由施维德奇柯夫负责。С·М·扎克斯主管对外联络，Г·И·鲍金负责国内各省。施略普尼柯夫管党的财政工作。（同上，第136—137页）

3月4日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策略任务”的决议堪称最重要的决议。这个决议透露了列宁对临时政府所做的评价。决议说：“现在的临时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反动的政府，因为它是由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贵族所组成的，因此同它不能讲任何妥协。”（同上，第136页）

列宁的学生不大讲“辩证法”，他们在决议的第二部分又重复起老师在1905年革命时所说的过时话：“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同上）。

对于列宁来说，现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便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的新形式，1905年的时候他还没有看清这一点。

彼得堡委员会所持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反列宁的观点。3月3日彼得堡委员会做出决定，赞同彼得格勒苏维埃3月2（15）日所做的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央局想扭转这一局面，当它建议彼得堡委员会批准一项决议，拒绝给“反革命的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时，彼得堡委员会3月13（26）日却重申

了自己从前的决定。（同上，第155页）

3月初老布尔什维克、从前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开始从西伯利亚返回。这使中央委员的数目逐渐增加。

3月7（20）日中央局决定扩充其成员，吸收获释和从流放地返回的前中央局委员K·C·叶列梅也夫、B·H·扎列日斯基、K·M·施维德奇柯夫进中央局，此外，还满足了彼得堡委员会提出的吸收它的三名代表—M·И·加里宁、K·И·舒特柯和哈哈列夫为中央局委员的要求。3月8日的中央局会议还补选了下述人员为中央局委员：奥利尚斯基、M·И·乌里杨诺娃（列宁的妹妹）、A·И·叶利扎罗娃—乌里杨诺娃（列宁的姐姐）。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的策略决议，即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和对临时政府态度问题的决议。关于战争的决议是依据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所做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宣言的精神起草的，决议指出，新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所以党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现在仍然有效。关于对临时政府采取何种态度，记录中写道：

"通过辩论看出，所有中央局委员都认为不能支持临时政府，但是积极抵制也是不可能的，如同不能替临时政府承担责任一样。"（同上，第141页）

中央局愈扩大，它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愈温和，如果我们不看它所做的关于战争的宣言，而是看它在苏维埃中所做的实际工作的话，那末中央局显然背离了列宁的路线。

中央局与彼得堡委员会（3月间H·K·安基波夫、B·H·扎列日斯基、M·И·加里宁、H·П·科马罗夫、И·И·斯图奇卡、H·Г·托尔马契夫、K·И·舒特柯、H·И·波德沃伊斯基和A·Г·施略普尼柯夫被选进了彼得堡委员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摩擦。（《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22页）

我们在上文中讲过，彼得堡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比中央局温和得多。此外，彼得堡委员会还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争得独立的领导地位，有时忽视中央局的指示。3月12日中央局会议谈到了这一点。彼得堡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声明说，它与中央局不同，“彼得堡委员会的主张完全符合现时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彼得堡委员会声明接着指出，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声明还指出，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举动有损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接着同志们又提醒大家注意《真理报》的文章是空洞无物的。”（《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第144页）

这样，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中央局，它是合法的党的最高机关；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它是首都党的实际政权机关。

由于一半中央局委员兼任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明显地朝着彼得堡委员会一家独揽大权的方向发展。后来有一个情况阻碍了这一事态的发展。那就是前中央委员穆拉诺夫、斯大林以及中央机关报先前的编委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回来了。3月12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吸收他们参加中央局的问题，还讨论了吸收鲍金进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中央局发表了声明，说明中央局将根据什么标准和从哪些新回来的人中间补选中央局委员。声明说，中央局将吸收所有那些根据它的“政治信仰”来看是有益处的人以及那些“可贵的理论工作者”为自己的成员。鲍金被擢升为中央局委员，“因为他站在中央局的立场上。接着讨论了穆拉诺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问题。第一个人一致通过。关于斯大林

有人报告说，1912年他充当过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这是个错误：斯大林从1910年起充任中央委员会的受托人，从1912年起任中央委员。——作者），因此他是中央局委员合适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他个人的某些特点，中央局的意见是聘请他做拥有发言权的委员。至于加米涅夫，鉴于他在法庭（1915年）上的表现和布尔什维克关于他的问题所做的决议，决定接纳他为《真理报》的工作人员……他的文章可以作为资料发表，但是由他署名的文章不予刊登。”（同上，第143页）

除此之外，会上还有人建议加米涅夫应对自己在1915年审判国家杜马代表的法庭上的表现加以解释（当时加米涅夫曾表示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在战争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在讨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问题时，充分表现出中央局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皆是十分软弱的。中央局在法律上的软弱表现在，中央委员斯大林和中央机关报编委加米涅夫并没有因被捕而失去党内职务，并且在他们获释后又自动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说中央局在政治上是软弱的，是因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作为党的领导人，比所有中央局委员加在一起还要强。

没过几天，他们就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从3月中旬开始，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把控制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的大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不久彼得格勒党的领导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便结束了。不过，目前尚由原来的中央委员会支撑局面。

鉴于中央局有所扩大，所以选举了中央局主席团。主席团由穆拉诺夫、莫洛托夫、斯塔索娃、奥利尚斯基、施略普尼柯夫（别列宁）和候补委员扎鲁茨基（彼得罗夫）组成。（同上，第145页）

在3月13日中央局的会议上（十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斯大林，他拥有发言权）宣读了列宁的电报，电报中提出“不

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武装无产阶级”，“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等口号。这封电报未必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电报谴责了对临时政府采取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拒绝同孟什维克达成任何协议，就是说谴责了迄今为止中央局多数人以及整个彼得堡委员会所执行的政策。大概正因为如此，才在讨论了列宁的电报之后，“提出了必须讨论政策问题，因为只有空洞的口号是不够的……会议认为一定要制订一个纲领来阐明中央局所提出的口号。”（同上，第145页）

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斯大林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据报告说，加米涅夫出于政治原因和考虑到党的利益，拒绝“在同列宁会谈之前”报告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真理报》编辑部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编辑部由奥利明斯基、斯大林、加里宁、叶列梅也夫和乌里杨诺娃组成。（同上，第146页）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以“缺乏经验”为理由辞去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主席团和《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切职务。

中央局的记录表明，虽然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当时不是中央局委员，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仅开始左右《真理报》编辑部的政策，而且左右全党的政策，因而引起中央局的不满。3月15日《真理报》发表的题为“不要搞秘密外交”的社论（加米涅夫、斯大林）使中央局尤为感到不满。在这篇社论中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变得比右的中央委员会还右，实际上他们是在支持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关于这篇社论3月15日中央局的记录说，对于这篇社论“中央局的全体委员都感到不满意，建议**新来的同志们**在开会讨论之前仍执行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决议。”（同上，第148页）

“新来的同志”指的就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那次会议上他们还是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胜利。《真理报》编辑部又进行了

改组，这次当选编委的有加米涅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叶列梅也夫。（同上，第148页）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被选进中央局主席团（其现在的成员是：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穆拉诺夫、斯塔索娃、扎鲁茨基）。同时决定提升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让他们在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接替莫洛托夫和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的职务。（同上，第149页）这样，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把中央委员会、《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党团的权力完全抓到了自己手中。

但是，中央委员会中有人仍在继续反对加米涅夫。3月17日中央局开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说，在党的代表会议没有解决加米涅夫的问题之前，不选他进中央局和苏维埃。（同上，第150页）

这次会议讨论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分子（马尔托夫派）的代表发表的关于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联合的声明，还讨论了"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区联派委员会"发表的同样内容的声明。"区联派组织"于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由退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各派所组成。其成员有托洛茨基分子，部分孟什维克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前进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1917年5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后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除托洛茨基外，"区联派组织"中还有象卢那察尔斯基、马努伊利斯基、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中央局对这一问题表态说，中央局"希望并欢迎"区联派组织同党合并，但是这一问题需由彼得格勒委员会来解决（"彼得堡委员会改名为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亲德怀疑"，——同上，第146页）

对"区联派"，列宁持同样的观点。（《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395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00页。——译者注

但重要的是另一个决议，这个决议说：

“至于同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分子联合的问题，则应由中央局、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著作家集团的领导成员来讨论。”（《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第151页）

“著作家集团”是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集团，但是“著作家集团”已通过列宁的嘴声明说：“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谈到马尔托夫派时，列宁对他们参加党（而不是同他们联合！）提出一项条件，即这个派别要公开同“‘护国派’断绝关系”。（《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395页）①

在3月22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急剧右转，会议通过了两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决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这两个决议作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性文件刊登在1917年3月26日《真理报》上。尽管如此，这两项决议并未收进《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一书中。这说明现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承认这两项决议。对这两个决议稍加分析就会弄清问题的所在。还可以弄清自斯大林、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其他中央委员从西伯利亚回来（3月13日）至列宁回国（4月4日）这一期间，中央委员会乃至布尔什维克全党在对待临时政府问题上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妥协的、反列宁的政策。这两个决议说：

1.关于临时政府：

“苏维埃应当对临时政府的一切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第153页）

列宁的观点是：监督临时政府——这是其害无穷的幻想。全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00页。——译者注

国从下至上的全部政权都应该转归苏维埃。

2.关于战争与和平：

“不仅要迫使临时政府放弃一切征服计划，而且还要它立即公开表达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同所有交战国讲和。”（同上，第153页）

列宁的观点是：以为可以迫使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签订和约——这就是在散布其害无穷的幻想。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建议签订这种和约。

党的官方历史学家故意否认这一时期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有反列宁的倾向，虽然他们承认在这两个决议中有严重的策略错误。官方历史学家评论说：

“中央局、大多数地方组织和《真理报》编辑部是站在列宁的立场上评价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但是他们还不能找到摆脱战争的正确途径，因为他们没有把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即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没有把战争问题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苏联共产党历史》1967年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36页）

一点不错，所有一切问题，不管大小，不管是哲学方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列宁一定要把它同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俄国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中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代替临时政府的机构。列宁却想出来了，那就是苏维埃。但是，为了把这一选择强加给全党，第一，需要列宁亲自回到俄国，第二，“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在做这两件事之前又召开了一次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会议，即1917年3月27日—4月2日召开的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

在揭发斯大林之后，这次会议的记录也予以公布了。（《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第106—125页）只要仔细地

分析一下会议的报告、讨论和决议，我们就会明白，列宁回国后面临的任务不是——用苏哈诺夫和托洛茨基的话说——“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而简直是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列宁回国五天后，即4月9日，《真理报》发表的“论两个政权”一文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47—148页）①

如果仅仅是“维护者”和“因素”的话，那末换句话说就是，在俄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党！

分析一下这次会议的进程即可看出，列宁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由于1917年3月29日拟定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所以中央局决定召开全俄（三月）党的工作者会议。这次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要同中央局一起讨论党在苏维埃会议上的一致策略和革命现阶段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因此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二）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三）关于同孟什维克进行联合的问题（一些专门的问题在小组上进行了讨论，成立了军事、组织、工人问题、土地、食品、地方事务小组）。七十个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三十个组织同孟什维克实现了“联合”），共有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就是说，全党的精华都齐集一堂了。（《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第106、123页）

从记录中看出，会上就如何对待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明显的三派：第一派是“革命的护国主义分子”（他们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护国路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沃伊廷斯基、埃利阿瓦、谢甫鲁克等人。第二派是同第一派相对立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页。——译者注

左派，其领导人是柯伦泰、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莫洛托夫。第三派主张实行“有条件的护国”政策和对临时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这一派联合了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它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克拉西柯夫的观点是独特的，下面我们还要谈到他。

在3月29日的会议上斯大林做了题为“论对联合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在评价临时政府的社会本性上斯大林同意列宁的观点（即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政府），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支持临时政府问题，斯大林的回答很奇特：“临时政府对革命的发展起多大巩固作用，我们就给予它多大的支持。”（《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第112页）斯大林宣读了中央局的决议，决议说要通过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所有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斯大林说，他并不完全同意中央局的决议，他更赞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所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说，“只要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军队不断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就可以保证政府”服从革命需要，对于革命的需要“临时政府满足多少，我们就给临时政府以多少支持”。（同上，第112、113、114页）

沃伊廷斯基做了补充报告，他的意见同斯大林基本一致，只是更进一步发挥了必须支持临时政府的观点而已。他说，“临时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管家”，“在资产阶级体制的国家里，我们是不能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上，第114、115页）克列斯廷斯基注意到斯大林与沃伊廷斯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说：“在实际步骤上斯大林与沃伊廷斯基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同上，第119页）

他认为，沃伊廷斯基的关于“应当支持临时政府的明确的革命行动”的决议案也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主张。（同上，第120页

第2注）

3月30日讨论“修改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案”时，有一个人终于发言了，他的意见同全体与会者截然不同。他的发言是如此异乎寻常和出人意料，不仅触怒了大家，而且还被剥夺了发言权。关于这件事记录中是这样写的：

“**克拉西柯夫**：问题的实质不是修改，不是显示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目前形势。如果我们承认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那末问题就不在于我们对某一个问题采取了何种具体措施。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是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了，那就应该提出这一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政权。我认为，在彼得格勒，在俄国的其他城市，力量是足够的（会场活跃，有人喊：‘不对’）。我参加过……

“**会议主席**：现在不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克拉西柯夫**（继续发言）：既然问题不是这样，那末，是否还有必要对临时政府采取某些步骤……

“**会议主席**剥夺了他的发言权。”

前中央委员克拉西柯夫（巴甫洛维奇）当时是整个会场中唯一的列宁主义者，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目前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的提法，恰恰是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全部思想。

3月30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举行了讨论战争问题的联席会议。人们发现，孟什维克内部有一个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相近的派别（叶尔曼斯基），而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个同孟什维克观点相近的派别（沃伊廷斯基、谢甫鲁克、埃利阿瓦、雅杭托夫、波泽尔恩等人）。

在如何对待战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分裂。全体“革命护国派分子”，除波泽尔恩外，退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单独

会议，转而参加了孟什维克会议。后来布尔什维克会议做了特别决定，邀请他们回来。（《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135页）

布尔什维克会议所做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是重复从前中央局会议所说过的话：迫使临时政府签订和约，而“在这之前，我们不同意解散军队，认为必须保存军队的实力，号召所有的士兵和工人坚持自己的岗位，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同上，第136页）

布尔什维克会议将这一决议作为它的战争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给正在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为了使苏维埃顺利通过这一决议，布尔什维克会议再次赞扬1917年3月14日苏维埃发表的《对世界人民的宣言》。关于这一宣言当时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应该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号召各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大屠杀的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7页）① 相反，列宁却说这个宣言“会在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在政治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并且必然使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全部政策摇摆不定……”（《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78页）②

现在这一“混乱”和“孤立”重又出现了。列宁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的信中有一句与此有关的很有意思的话，在这封信中列宁谈到加米涅夫的特别责任时说：“加米涅夫应该明白，他肩负着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责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23页）

布尔什维克会议在讨论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3月31日的会议自始至终讨论的是这一问题。从前中央局根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3页。——译者注

据斯大林的报告和建议通过的对临时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即“临时政府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的提法在会上受到了批判。在这一批判的影响下，现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骤然改变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加米涅夫声明说：

“决议中关于支持临时政府这一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别说支持，甚至连暗示支持也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能支持临时政府，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政府，尽管它发表过声明，但是它仍留在与英法资产阶级同盟之中。”（《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62年第6期第137页）

“斯大林建议给起草委员会发一个指示，修改有关支持临时政府的条款。”（同上，第138页）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显然已改变了腔调。人们已经意识到列宁的火车快到俄国边境了！在多数人同意下（四人反对）从决议中删去了关于支持临时政府这一条。后来通过了起草委员会（米柳亭、加米涅夫、斯大林、泰奥多罗维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已不再提对临时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了，但是却保留了另一种反列宁的提法：“密切地监督临时政府的行动。”（同上，第141页）

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即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的问题上，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先前提出的联合起来反对联合的敌人（莫洛托夫、斯克雷普尼克、扎鲁茨基等人）的路线则取得了彻底胜利。斯大林对孟什维克领导人策烈铁里提出的联合建议回答说：“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我们要提出自己的联合方针的。可能会按着齐美尔瓦尔得和金塔利的方针实行联合。”（同上，第139页）

莫洛托夫、斯克雷普尼克和扎鲁茨基相继发言，对联合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

分歧，这时斯大林回答说："不应该先提分歧。没有分歧就没有党的生活……"（同上，第140页）

斯大林提出的同孟什维克进行联合的建议以十四票赞成十三票反对获得通过。选举了谈判委员会（斯大林、加米涅夫、诺根、泰奥多罗维奇）。委托斯大林在讨论联合的会议上做报告。该会议定于4月4日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举行。布尔什维克上层人物搞这一反列宁的大阴谋，目的在于使列宁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已经实现联合的既成事实。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便不是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了。斯大林、加米涅夫、马尔托夫、策烈铁里才应当做统一党的领头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列宁向阴谋者发出了警告。

第 九 章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发动的政变

全面分析一下1917年2月23日至4月4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就会看出这样一条党在革命中发展的总规律：布尔什维主义的级别越高，革命的态度就越不明朗，对临时政府采取的机会主义的奉公守法态度就越明显。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赖以生存的革命基础——工厂、兵营里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推动临时政府，而且也推动自己的司令部——党中央委员会“向左转”。

这时党也发展壮大了：1917年1月党内有二万三千名党员（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二，职员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农民占百分之七点六，其他人占百分之六点四，——《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24页），可是到了4月，党组织已吸收了近六万名新党员。这就是革命先锋队里的那些迫使沙皇让位、迫使杜马（临时杜马委员会）成立临时政府的人。毫无疑问，如果当时列宁在彼得格勒，那末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定会在2月底发生。这个先锋队当时只缺少列宁。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仍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筹备发动新革命，对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当时他需要酝酿新的革命形势，二月革命时期中央委员会的旧领导（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莫洛托夫）由于力量薄弱，错过了新的革命形势，三月间由于新领导（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的机会主义新的革命形势又被错过了。

因此，在准备进行一场反对临时政府的新革命之前，列宁需要

首先在自己党的上层搞一次革命。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宣战的檄文：一是向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宣战，二是向临时政府宣战，三是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战。

托洛茨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写道："列宁和党的总部之间发生的四月冲突并非唯一的冲突。在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中，除个别的能证明规则的事件外，所有党的领导人在发展的所有时期都比列宁右……在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得到了党内另一个阶层的支持，这个阶层久经考验，并且同群众保持联系。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工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赢得胜利的阶级自然应当掌握政权。这些工人强烈反对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路线，维堡区党委甚至威胁说，要将'领导人'开除出党。地方上也有这种情况……列宁瞧准了这些工人……"（L. 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Fischer Verlag, 1967, S. 359—360）①

不要以为中央委员会会轻易投降。中央委员会从列宁的五封《远方来信》中已经了解到《四月提纲》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已经讲过，《真理报》在3月只刊登了其中的一封，而且还做了很大的删节。

中央局、《真理报》编辑部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不是他们应该服从列宁的观点（他们认为，列宁的观点是侨民的落后观点，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列宁应该服从中央委员会，支持中央局和刚刚闭幕的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决议。况且，当时列宁在党内的威信还不是绝对的。托洛茨基指出："毫无疑问，列宁在党内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这种影响绝不是无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德文版第359—360页，1967年费舍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限的。十月革命后他的影响也没有达到无限的地步。"（同上，第257页）

我们已从历史中看到，列宁的战友、布尔什维主义的各位创始人经常同列宁发生分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列宁取得胜利，但是也有对方取得胜利的情况。诚然，从来还没有过象现在这样的情况，整个布尔什维主义司令部的人都起来反对列宁了。而且他们获胜的希望比较大。虽然列宁也想"只身同一百一十人"进行一场战斗，但是他是一位非常现实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看到，如果他只身一人，没有他现在的军队及其司令部，是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即在近期内夺取政权的。这纯属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党没有列宁就等于汽车没有方向盘，而列宁没有党就等于只有方向盘而没有汽车。一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被列宁称之为"小资产阶级民主的优秀代表"苏哈诺夫写道：

"没有列宁——这不等于挖心割头吗？……党没有列宁就没有了一切。没有列宁，几位大将军也等于零，犹如几个巨大的行星失去了太阳一样。"（苏哈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柏林—彼得堡—莫斯科"，1922年俄文版第54—55页）当然，没有列宁，党也会存在的，就象3月间那样，但是那只能是一个平平的左派革命民主党，比孟什维克稍稍左一些，是一个更象马尔托夫而不象列宁的党。这样的党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给议会政府输送两三个左派部长而已。

然而，列宁并不是为了议会而建立政党的。列宁建党的目的是用它来消灭所有的议会。列宁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争论似乎是策略方面的争论，实际上是列宁在谴责他的党做了教条公式的俘虏，错过了二、三月间夺取政权的机会。

其实，教条公式的作者正是列宁本人，他在《两种策略》（1905年）一文中论证说，依据马克思主义，通常先进行"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主主义专政”），而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正是抓住了这一公式。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列宁恰恰修改了这一公式，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的新理论。

这一修改没有引起他的学生们的重视，因为列宁故意讲得不具体，以免别人说他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已经讲得很具体了，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解释党为什么没有夺取政权，其次，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尽管现在提夺取政权已经为时过晚。下面是《提纲》中有关的话：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黑体是我加的。——作者），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4页）①

这就意味着，你们这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觉悟”和“没有组织性”，没能在二、三月间夺取政权，但是你们现在必须夺取政权，你们甚至已经走上通往政权的道路了。这还意味着，在俄国是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在推翻沙皇后应当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同1905年托洛茨基提出的著名口号毫无二致：“不要沙皇，建立工人的政府。”托洛茨基在谈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四月提纲》所做的反应时说：“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来得十分突然，违反惯例。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难怪有人将列宁的《四月提纲》当作托洛茨基的文章加以痛斥。”（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255页）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译者注

还是让我们按时间顺序讲吧。列宁于4月4日即他回到彼得格勒后的第二天，在塔福里宫对参加全俄工兵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讲了自己的《提纲》。同一天，参加这次全俄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举行联合会议，列宁又在会上重复了自己的演讲。提纲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布尔什维克目前能够而且应该夺取政权。列宁所讲的东西不但孟什维克不理解，布尔什维克也不理解。《提纲》的要点是：

1.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要揭露使这个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的“要求”；

2.对“革命护国主义”不做任何让步，要对它进行揭露；

3.在现在的制度下不可能有和平，为了和平必须夺取政权；

4.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共和国，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在苏维埃中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政党”；

5.修改党纲，更改党的名称为共产党，以便同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的孟什维克划清界线。（《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4—6页）①

这样，列宁实际上同时向三方宣战：1.向临时政府宣战，2.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宣战，3.向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领导人宣战。

对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关于普列汉诺夫集团的反应，列宁本人写道：“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演说叫做‘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怎样的愚蠢和笨拙。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17页。——译者注

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评论'梦话'呢？”（同上，第7页）①

苏哈诺夫讲过，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首脑、后来当上部长的斯柯别列夫是如何评论列宁的讲话的："话题完全转到了列宁身上。斯柯别列夫讲述了列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评价列宁说，这是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我大体上同意对列宁的思想所做的这一评价，我说，现在的列宁无论对任何人都是不能忍受的，因此他现在对我的交谈者米留可夫来说没有丝毫危险。”（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48页）

苏哈诺夫还谈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应："列宁来到后第五天召开了老布尔什维克将军会议……列宁把他的将军们叫来并不是为了说服他们，也不是为了同他们进行争论，他只想知道，他们是否相信他的新真理……将军们都发了言。谁也没有说一句赞同话。”（同上，第50页）

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提纲》。4月8日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主编——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列宁的《提纲》发表了编辑部注释："至于说到列宁同志所制订的总提纲，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一总提纲的出发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并且指望这一革命立即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自己也说，"无论我的提纲或是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中间都引起了一些分歧。”（《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23页）② 这样说好听些。其实，在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中没有一个人说过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1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3页。——译者注

有利于列宁的话。甚至同列宁一起回来的季诺维也夫也不明确表态。只有三个同列宁关系密切的女侨民——柯伦泰、伊涅萨·阿尔曼特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支持他。

列宁提议在党内同起来造反的党员“将军们”展开公开辩论，看谁正确：中央委员会正确还是列宁正确？《真理报》正确还是列宁正确？

“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同上）①

然而，这样做列宁就注定会取得全面胜利。在《四月提纲》中只成功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思想，基层布尔什维克群众对这一思想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中央委员会2月26日的宣言中，这一思想又以政权归“临时政府”的口号形式出现过一次，但是，取代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和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位的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否决了这一思想。从4月8日起，在党的各主要委员会和区级组织中就拥护还是反对列宁的提纲展开了辩论。党组织的级别越低，拥护列宁的人越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党委员会分裂了——上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下层则拥护，多数区级组织拥护列宁的提纲，所有地方基层组织都拥护列宁的提纲。有些地方工兵代表会议甚至要求立即将政权转归苏维埃（《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63页）官方历史学家指出：“提纲恰恰得到了工人的热烈响应。”（同上，第60页）除此之外，列宁并无他求。

用苏哈诺夫的军事术语说，现在的形势是，统帅坐在党的金字塔塔顶上，他决定进行一场决战，位于他下面的是抵制决战计划的参谋部，而金字塔塔基是布尔什维克军队，只要统帅一声令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3页。——译者注

下，这支军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统帅列宁从回国后第一天起，就绕过参谋部径直向这支军队呼吁。

列宁早在1900年就讲过，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员，而且是集体组织者。因此，他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真理报》主编的职务，把斯大林（让他在中央委员会研究民族问题）和加米涅夫（调他去做布尔什维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党团主席）从编辑部中排挤出去。

列宁通过《真理报》同广大普通党员建立了直接联系。为了把党的“军官团”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他在五天内（4月8日—13日）写出了《论两个政权》、《论策略书》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三篇具有非常重大策略意义的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列宁彻底抛弃了旧中央局、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真理报》编辑部的立场和策略。在这几篇文章中，列宁从理论上阐述了改变党的方针、重新武装党的必要性，——列宁宣布说，对于他的学生们至今仍抓住不放的1903—1905年间的旧的、正统的列宁主义要加以修改。重点修改现行党纲中关于在俄国推翻沙皇后建立“民主政府”的条款，修改列宁在《两个策略》（1905年）一文中提出的民主政府是走向社会主义时必定实行的制度的说法。

列宁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19页）①

二、三月间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包括教条主义的原因，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机会。现在是四月，又该怎么办？是否要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列宁说：“我的回答是：（1）应该推翻它，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页。——译者注

寡头政府……（2）但是也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同彼得格勒这样一个主要的苏维埃成立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协议……（3）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同上，第21页）①

怎么办？布尔什维克应当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排挤出去，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便推翻临时政府，不是用"通常"的办法，而是通过起义（1917年10月正是这样）。列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政权问题：工人和士兵们，你们推翻了沙皇，因此政权应当属于你们。"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列宁说。列宁不仅在基层和广大党员中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全俄党代表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定于4月底召开），他又逐步把"党的军官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这对党的将军们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件事苏哈诺夫写道：

"列宁骁勇的'左倾'，不顾一切的急进主义，无论是科学还是健全的头脑都无法遏制的粗俗蛊惑，使他在后来受到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他们除了尝过沙皇皮鞭的滋味以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欢迎。但是列宁宣传手法上的这些特点也赢得了党内较落后分子的同情……而这些人的立场又不可能不对颇有觉悟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将军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列宁把'党的军官们'争取过去以后，象加米涅夫这样的人就完全孤立了……列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57—58页）

从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4月14日）至全俄党代表会议开始（4月24日）这段时间内，列宁战胜了旧中央委员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列宁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亲自做了题为"关于目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1页。——译者注

前形势”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列宁又一次阐述了他为何要对旧的列宁主义加以修正。在谈到“两个政权并存”这一罕见的事实时，列宁指出：“因此须要重新审查‘旧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因为政权已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有些‘老布尔什维克’反驳道：‘它还没有完结，因为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116页）①列宁说，现在恰恰需要为苏维埃单独掌权而斗争，这将意味着把政权交给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前线也不应当扔掉刺刀，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国内。“打倒战争”并不是扔掉刺刀，而是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列宁说。（同上，第119页）②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列宁说。（同上，第120页）③总之：“旧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同上，第122页）④

列宁严厉地谴责了中央局三月决议中有关战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全部革命辞藻：

“革命民主派是毫无用处的，它只是空话……靠和平主义来结束战争，这是空想……没有政权就无法监督（临时政府。——作者）……由于这些政党执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此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实行联合是绝对不可能的。（同上，第123、124、131页）⑤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16—11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20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122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123、124、125、131页。——译者注

所有代表会议的决议都是按着列宁的这一新精神通过的。彼得格勒给地方定了调子。各地开始不断送来拥护《四月提纲》的决议。列宁把这些决议原原本本地登在《真理报》上。列宁也巧妙地利用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由外交部长米留可夫起草的一份给英、法两国的照会（4月18日）引起的。米留可夫在这份照会中写道，俄国将履行自己在战争中的义务，相信战争会胜利结束。这使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怒不可遏。在临时政府所在地马林娜宫前举行了士兵的武装游行和集会（一万五千人）。人们喊着"打倒米留可夫！"，"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他们保证说，要在苏维埃中讨论这一问题。布尔什维克借此危机又一次声明说，只能用苏维埃掌权的办法结束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4月21日决议）。部分彼得格勒委员会领导人(波格丹诺夫派)甚至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在列宁的提议下，中央委员会谴责了这一口号。1917年4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说：

"'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即自觉的和有组织的）人民多数的时候，提出这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在客观上造成冒险行动。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我党政策……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把政权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19—320页）①

列宁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下列实际任务：（1）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四月提纲》政策，（2）揭露和批判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党团，（3）"在每个部队、每个工厂中，特别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3—184页。——译者注

是在仆役、粗工等最落后的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4）“在每个工厂、每个区、每个街区中组织无产阶级，组织、组织、再组织”，（5）“只把那些代表多数人的意志的同志”选到苏维埃中去代替机会主义分子。（同上，第320页）①

中央委员会对党员发出指示说，现在中央委员会反对任何武装游行。因而中央委员会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做的反对这种游行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同上，第320页）②

列宁以此向大庭广众宣布说，他不是在偷偷摸摸行事，而是在走向战斗，在为胜利打下牢固的前提。在这些日子里，列宁多次重复说：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也不是冒险分子。只有多数人站到列宁这一边时，他才准备决战。但是他所指的多数，并不是全国的多数，也不是全军的多数，甚至不是首都居民的多数，而只是彼得格勒各工厂和兵营里的多数，彼得格勒大街上的多数。

这样，列宁只做了两周的工作便使党向左转了，使得彼得格勒的广大党员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中的部分人产生了——按列宁的说法——“想比我们中央‘左一点的’……企图。”（同上，第337页）③但是，列宁号召全党遵守纪律，号召每一个地方组织“同它的中心、同党中央都应当有直接的联系”；“必须时时刻刻巩固和检查这些联系”，“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同上，第338页）④换句话说就是，要准备夺取政权，但是什么时候进行，这次不能由基层的群众而要由上面的党中央决定。

当4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开幕时，党内的情况就是如此。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4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同上，第195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196页。——译者注

第 十 章

1917年4—7月的中央委员会

出席第七次党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共有一百五十一名（一百二十三名拥有表决权，十八名拥有发言权），代表着七十八个党组织的八万名党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70页）列宁当选大会主席，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竟连主席团成员也没当上。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党的全部精华聚集一堂，讨论了《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争和临时政府问题，对待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各区域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33—353页）① 主要的报告都是列宁做的。除此之外，他还就议程上的各种问题发表了三十次左右的讲话。加米涅夫做了补充报告，在报告中他维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旧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加米涅夫声明说："我认为列宁同志是不对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我认为，它没有完结，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说资产阶级民主大势已去还为时过早。"（《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0页）

加米涅夫建议仍继续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让工兵代表苏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31—456页。——译者注

维埃监督其行动。此外，他认为，不应当同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决裂。（同上，第81页）由于各种原因，李可夫、布勃诺夫、斯米多维奇、鲍格达季也夫、米柳亭在不同程度上倒向了加米涅夫。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不同，他是以投降派的面貌出现在代表会议上的。在中央委员会旧政策的所有问题上，斯大林都对《四月提纲》做了理智的、及时的（对他后来的升官晋级来说）投降（三个星期前他还把《四月提纲》称为“空洞无物的提纲”），听凭列宁的慈心处理。如果批评者投降，列宁就给予宽恕。对斯大林也是这样。列宁委托他在代表会议上做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当然，报告的主要提纲是列宁写的，并且已经定为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但是斯大林十分出色地论证了报告中的这些要点（1913年斯大林写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后就被人们公认为党的民族问题专家了）。

前面已经说过，列宁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看做是策略问题，而不是纲领性问题。所以当时提出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要求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问题。这一要求的目的——保证非俄罗斯各族人民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关于各族人民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权利问题就要“根据……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地加以解决。（《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0页）①

在代表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不得不维护这一“辩证的”真理免遭皮达可夫、捷尔任斯基、马哈拉泽、布哈林等人的非难，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真理。对，列宁胜利了，但是，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旧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代表会议上仍继续在所有问题上同列宁的《提纲》做斗争。下述有关表决的材料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译者注

明，当时的讨论进行得何等激烈。（《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分册第332—353页）①

所讨论的问题	赞成列宁	反对列宁	弃权
（1）关于战争	126	—	7
（2）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122	3	8
（3）关于土地问题	122	—	11
（4）关于拒绝参加第二国际代表会议问题（关于柏格别尔格的建议）	140	—	8
（5）关于民族问题	56	16	18
（6）关于参加齐美尔瓦尔得派的代表会议问题	1（列宁本人）	132	—
（7）关于目前形势	71	39	8
（8）关于苏维埃	全体	—	3

代表会议闭幕前进行了1912年巴黎代表会议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九人当选中央委员，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柳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斯大林、费多罗夫。（《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80页）

除斯米尔加和列宁之外，其余皆是旧机会主义中央局的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的立场不鲜明）。列宁同意领导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这表明，当代表会议对全部有争议的问题做了符合列宁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30—456页。——译者注

主张的决定后，党的将军们便投降了。

列宁取得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

三位杰出的列宁同代人做了三种不同的回答。苏哈诺夫说："天才的列宁是一位历史权威，这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党内除列宁之外，当时再没有任何人了。"（苏哈诺夫：《革命札记》俄文版第3卷第55页）

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毫无疑问，列宁在党内确实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种威望决不是无止境的。即使是在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他也不曾是一个具有无限威望的人。（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德文版第257页）这里提一下列宁本人如何看待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影响是很有意思的：1921年A·A·约费给列宁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中央委员会即是列宁"。对此，列宁回答说："您重复说（多次重复），'我即是中央委员会'，您说错了……旧中央委员会（1919—1920年）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战胜过我，这您从辩论中可以知道。在组织问题和人员问题上我常常是处于少数地位的。您做中央委员时，也亲眼见过这样的例子。"（《列宁文集》1958年俄文版第36卷第208页）

托洛茨基认为，老布尔什维克奥利明斯基的看法比较确切。奥利明斯基写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还以为是在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针。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准备发动十月革命时，还以为是在准备发动二月革命呢。"（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258页）托洛茨基补充说，"老布尔什维克们之所以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们所维护的党的传统中的那些因素，正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东西。"（同上，第259页）斯大林强调过列宁在讲演时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诚然，斯大林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55页）①

当然，布尔什维克领袖本人的品质，同他的历史威望一样，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客观因素，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组织）内隶属系统的等级原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阐述自己意见的权利是相对的，俯首听命才是绝对的。照列宁本人的话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如果打个比喻，那末布尔什维克党象是由列宁发明和创办的政治商行，列宁是这个商行的老板。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些人是他的工人。如果“工人们”起来造反（“前进派分子”），就把他们一脚踢出了事。列宁手操商号大权，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不可代替的。实际上他也正是这样的人。在历史急转弯时，只有具有政治远见的领袖，才有希望获得成功；只有能为党指出令人信服的夺取政权的道路的人，才能控制自己的党。列宁正是这样的人。此外，列宁还是一个权迷。权欲逐渐变成了他的思想动力，变成了他所缔造的党的思想动力。获得权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社会欲望。要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就得先战胜自己的党。四月，列宁战胜了自己的党。1917年5月2日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在总结四月代表会议时仅仅指出了一些事实。这家报纸写道：

“列宁著名的《提纲》不再是他从国外带来的个人作品了……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0页。——译者注

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一百四十名代表几乎一致通过了会议决议，这些决议发挥了提纲的基本思想。”

列宁把党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之后，便在人民中间特别积极地宣传四月代表会议决议。从1917年4月至7月4日列宁在六十九种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百七十五篇文章和短记。(《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85—86页)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如不把政权转交给布尔什维克，俄国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印数逾五十万份的党的五十种报刊也宣传这一思想。列宁向党的积极分子和军官们首要灌输的是夺取政权思想——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几天、几周后的现实，最多是几个月后的现实，决不会超过一年。

为从组织上准备夺取政权，列宁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重新做了调整。中央委员会设置了新的起领导作用的执行机构——以职业革命家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处下设两个辅助机关：军事组织局和出版局。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开展从工人和士兵中吸收党员的运动。这使党发展了。四月代表会议闭幕后三个月，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中部工业区的党组织扩大了一倍多。同时，与孟什维克也划清了界线。地方党组织依据四月代表会议所制定的方针将那些不承认这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孟什维克赶出了党。

在公布四月代表会议决议时，列宁附了一个说明：“要取得这一胜利……要掌握并巧妙地运用这一政权……就必须组织、组织、再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56页)① 列宁对这种组织做了下述发挥：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84页。——译者注

1．在工人中间。真正地在每个工厂中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在所有的工会中（工厂委员会）建立党团。1917年5月30日—6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列宁和劳动部长、社会党人斯柯别列夫在会上讲了话。劳动部长讲了政府对生产实行监督问题，而列宁建议实行**工人监督**，"让大多数工人参加一切负责机关，要行政机关向……工人组织报告工作。"（《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40页）① 总之，生产的主人不是所有者，也不是临时政府，而是实行监督的工人阶级。这种宣传工作有了成效：代表会议闭幕前选举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中央总委员会，其中十九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官方历史学家说：

"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便可以通过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总委员会对其他城市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施加影响"，因为，"直到1917年10月为止，它一直起着全俄中心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99页）

2．在农民中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阵地最不坚固。只谈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直到夺取政权之前，布尔什维克未能在农村建起一个基层组织。俄国农村是民粹主义精神的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的天下。不过有趣的是，布尔什维克不仅采纳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通过农民委员会把土地转归农民），而且还提出要求说，不要等那凶多吉少的立宪会议，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从而使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部长们威信扫地，并在政治上一举将社会革命党人置于死地。列宁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论述了这一要求。没有一个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只有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518页。——译者注

一个由十四人组成的“无党派人士小组”同情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说，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种纲领。列宁的这一纲领堪称具有蛊惑力的纲领，因为它的效果是颇为明显的。列宁说，俄国的欧洲部分共有三万最富有的地主，拥有土地七千万俄亩，而一千万户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也是七千至七千五百万俄亩左右，这就是说，那里每一个地主有二千多俄亩土地，而一户贫农只有七俄亩土地！列宁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174页）[①]列宁说，这一点可以通过宣布土地为“全民财产”的办法来实现。虽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大会，但是记录中说“人们鼓掌”欢送列宁。不仅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和意志报》指出，“最近两天代表大会的气氛非常紧张。很多代表要求立即宣布土地为全民财产……列宁做报告后（5月23日）的第二天气氛尤为紧张……”（《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490页）。

布尔什维克的冰块也在俄罗斯农民的海洋中动了起来。一千四百万俄国大军——这就是换上士兵大衣的俄罗斯农民。列宁夺取政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俄罗斯农民的态度。在俄罗斯土地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刻（三月爆发过五十次农民发动，而五、六月间爆发过一千六百次），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喧嚣一时的口号：“抢那些抢来的东西。”于是农民抢掠、焚烧、夺走地主的财产。

3．**在士兵中间**。列宁十分清楚，如果在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军队站在政府一边，那末单有无产阶级是无济于事的。应当唆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52页。——译者注

使军队反对临时政府，为此应当提出一些普通士兵听得懂的口号。这些口号中最主要的有："立即实现和平"，"停止可恶的大屠杀"（托洛茨基），放士兵回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团队和兵舰上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基层组织的指示。五月，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已有近六千布尔什维克，所有团队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20页）

中央委员会通过军事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专门为军队出版的报纸——《士兵真理报》，在军队中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宣传工作网。党和军队之间有了经常的联系。仅6月一个月，就有九千多个前线和后方卫戍部队的代表找中央军事委员会出主意和听取指示。（同上，第120页）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把莫斯科卫戍部队中的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士兵联合了起来。波罗的海舰队中，几乎所有的大军舰都有党的组织或小组。截至1917年夏，波罗的海舰队中的共产党员总数已达3—4千人。（同上，第121页）驻扎在拉脱维亚区的第十二军的军事组织有三千五百多人。它曾出版过《战壕真理报》。（同上，第122页）

6月16—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俄前线和后方组织军事代表会议。四十三个前线组织和十七个后方组织（二万六千名党员）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做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代表大会关于这个报告所做的决议说："最积极地全面地准备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的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阶段"——即迎接夺取政权。（《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56页）① 代表会议批准了军事党组织章程，确定了从连队支部（最基层单位）到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全俄局（最高一级组织）的党组织机构。后来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59页。——译者注

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安东诺夫—奥甫谢因柯，克雷连柯、波德沃伊斯基、克德罗夫、梅霍诺申、涅夫斯基等人被选进军事组织全俄局。（《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25—126页）

4．**在非俄罗斯人民中间。**在俄国列宁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直言不讳地宣布多民族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自决直至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家。他甚至认为乌克兰也有这种权利，这使他的学生们感到吃惊，使他的敌人感到害怕。列宁的目的当然不是肢解俄国，但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通过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的办法来争取俄罗斯各族人民。承认这种权利就可以确保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支持他夺取政权。俄罗斯族布尔什维克有义务承认这一权利，俄国非俄罗斯族布尔什维克有义务宣传不要退出俄罗斯——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制定的方针。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策略。斯大林在总结列宁的这一策略时写得好：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旧俄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51页）①

对于那些愿意留在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建议他们成立民族自治区。直到1917年6月列宁才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次找到一个寻求已久的提法。他在依旧承认各族人民自决权的同时，提议建立一个新俄国，一种联邦共和国式的俄国。他说：“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吧。”（《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86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1页。——译者注

当芬兰国会和乌克兰拉达（第一号“宣言”）要求让他们的国家实行自治而临时政府又拒绝了这一要求时（临时政府推说这应由全俄立宪会议来决定），列宁显示了他在民族问题上所实行的灵活策略。在这次冲突中，俄国的所有政党，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到立宪民主党（比较右的派别就无需说了），都一致支持临时政府。只有列宁及其政党承认这两个国家有实行自治甚至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权利。例如，对于乌克兰的要求列宁写道：

“哪一个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都不能否认乌克兰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同样，哪一个民主主义者也不能否认乌克兰有从俄国分离出去的自由权利。”（《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51页）

诚然，当1918年1月乌克兰拉达宣布乌克兰脱离苏维埃俄国而独立时，列宁曾声明：布尔什维克承认过乌克兰人民有独立权利，而没有承认过乌克兰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有这种权利！布尔什维克无论是解决世界大事也好，还是改善生活服务也好，总是要把它们同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政权转到他们手中联系起来。只有政权才能满足一切要求。1917年5月的一份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着重指出，市政（民政）问题只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时才能得到符合人民利益的解决。（《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07页）

这样，通过把大的政治问题同日常“琐事”联系在一起的办法，中央委员会达到了在苏维埃和城市杜马中增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名额的目的。这一策略取得了一些胜利，当然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例如，1917年3月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约有四十名布尔什维克，而到7月时已有四百名了。6月时，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六百二十五名代表中有二百零五人是布尔什维克。（同上，第93、94页）5月，彼得格勒进行区杜马选举时，布尔什维克获得的票数

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所获的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二。（同上，第108页）这还远远不是多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势力以这种速度发展，那末，离所向往的目标，即《四月提纲》所说的通过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平取得政权，还遥远得很。

列宁硬说，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取得这样微乎其微的成绩，是因为无产阶级有“劣根性”的缘故！他在5月6日的文章中写道：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有劣根性，例如他们经过很长时期才能抛弃小资产阶级幻想，经过很长时期才能确信，正是他们这个阶级而且只有他们这个阶级才应取得全部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5页）①

策烈铁里在他的《二月革命回忆录》中说，其实，列宁早在5月就教育他的学生准备用暴力夺取政权了。策烈铁里写道：

“早在5月，列宁就在自己同事的圈子中，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开始向支持他的人努力灌输这些观点，而且他正是用这些观点来说明为什么必须立即从宣传工作转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策烈铁里：《二月革命回忆录》1963年巴黎俄文版第2册第168页）

从列宁在1917年6月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插话和发言可以看出，即使列宁在苏维埃中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他仍准备夺取政权。有八百二十二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五百三十三名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联盟（社会革命党二百八十五人，孟什维克二百四十八人）的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仅有一百零五人。（同上，第165页。另见《苏联共产党历史》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333页。——译者注

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41页）

谈到此处，策烈铁里回忆起他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及列宁的插话，他写道（不过，在所有布尔什维克撰写的有关1917年的著作中也都提到了这件事）：

“我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要取而代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党。出乎大家所料的是，列宁突然从座位上示威性地站起来喊道：‘有！’列宁这一声喊引起了轩然大波。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第一次决定声明，他的党要立即夺取政权。”（同上，第169—170页）

6月4（17）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又重复了他的“有”：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们尽可以随便发笑，但是，如果部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和右派政党相提并论，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67页）①

后来，列宁在1917年9月论证一旦时机成熟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时写道：

“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一般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90—291页）②

策烈铁里说，列宁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宣布了布尔什维克策略上的新转折，即从通过苏维埃的多数和平取得政权的策略（《四月提纲》）转入在没有取得多数之前就用暴力夺取政权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70页。——译者注

的策略。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批准了这一方针。指定了起义日期——1917年6月10日。定于在这一天举行武装游行，最后游行将发展为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布尔什维克的这一起义计划是1922年在苏哈诺夫的《革命札记》第四卷中首次公布于世的。苏哈诺夫所公布的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材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异议。策烈铁里对于布尔什维克曾有过这样的一个计划也不存疑义。他在转述苏哈诺夫的话时写道：

"据苏哈诺夫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讨论6月10日的发动问题时，列宁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拥护者所持的立场是：'列宁派不打算一开始就夺取政权，而是准备在时机有利时夺权，他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制造有利时机。'中央委员斯大林和斯塔索娃反对这一小心谨慎的策略。这两个人有涅夫斯基撑腰，此人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建议加快发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发动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发动。大多数中央委员否决了这两个极端的建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述行动计划：'6月10日示威游行的打击重点是临时政府所在地马林娜宫。要把工人队伍和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团队开到那里去。指定的专人要将内阁成员叫出来并向他们提出问题。指定的专门小组要在部长们答话时表达'人民的不满情绪'，提高群众的士气。在适当的情势下当场逮捕临时政府的官员们。"（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185页）

对，列宁正是这样建议的。看了中央委员会向士兵和工人发出的呼吁书后，对此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1917年6月9日在彼得格勒的工厂、军营和大街上散发了这一呼吁书。呼吁书说：

"工人们！加入士兵的队伍吧……同志们，都到街上去！

"士兵们！向工人伸出援助之手……今天不应该有一个团、一个连呆在兵营里。

“同志们，都到大街上去！

“全部政权归全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204—205页）

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决定于6月10日在和平示威游行的掩护下举行发动。

发动的任务是：如果力量和形势允许，则将发动转为起义，如果出现不利情况，则仅局限于举行武装“和平”示威。然而这个计划被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破坏了，大会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官方历史学家写道：

“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处境相当困难。举行示威游行就会违反自己代表大会的规定……就会贻人口实，说布尔什维克搞阴谋诡计，就会受到镇压。”（《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44页）

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巨大压力下，6月9日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做了让步：中央委员会取消了这次发动。当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于6月18日举行和平游行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喊着它为6月10日准备的口号参加了游行，这些口号有：“打倒十个资产阶级部长！”（其余六个是社会主义者），“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官方历史学家也证实了苏哈诺夫和策烈铁里所提供的有关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材料：

“6月6日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彼得沃伊斯基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宣布了军事组织的决议，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势力，主张举行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讨论时产生了两种观点。列宁认为，最好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对临时政府的联合游行，要求

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支持这一观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根反对示威游行……诺根说，列宁'偏要我们在国内处于少数地位时发动革命'。"（《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43页。另见《俄国的革命运动》："文件和材料"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85页）

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企图就这样失败了。

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根本不认为6月10日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他们写道：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革命群众的威严要求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是不稳固的。虽然六月事变没有促使政府垮台，但是事变是在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的条件下发生的……"（同上，第147页）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这一次布尔什维克没能推翻政府，但是他们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做到这一点。

旁观者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其含义恰恰是"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直到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布尔什维克在首都和各地方的苏维埃中仍是占少数，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例如，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各政党的代表名额是：代表总数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孟什维克一百零四人，社会革命党人九十九人，同情他们的小党派代表十八人，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十五人。"（《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42页）

所以，政权转归苏维埃应意味着建立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政党参加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列宁答应对苏维埃政府

给予有条件的支持，但是他所以答应，是因为他相信，**政权不会转到这个苏维埃的手中**，而是转到将在胜利起义的过程中建立和改选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手中。四月代表会议就曾提出过撤换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的口号。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前线进攻失败，临时政府产生新的危机，这些使形势变得更加紧张。部队急剧瓦解。俄国军队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在6月进攻中又伤了元气。这次进攻中，从6月18日到7月6日有五万六千人在西南战线被打死打伤。但更为严重的是：连、团、师拒绝执行进攻命令。前线总司令勃鲁西洛夫说，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从连长到总司令，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得动士兵。另一位将军克列姆鲍夫斯基沮丧地嘟哝道："怎么办呢？""动用死刑？但是能够把整整一师人都绞死吗？追究法律责任？那样的话军队中就会有一半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L·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chen Revolution, Fischer Verlag, 1967, S.379）①

这就是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开展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发生了新危机：7月3日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马努伊洛夫、沙霍夫斯柯伊和申加列夫宣布退出政府。理由是去基辅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涅克拉索夫）承认了乌克兰的内部自治（乌克兰拉达的"第二号宣言"）。这个代表团向临时政府呈报了有关建议，但是以米留可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不愿听到在乌克兰实行任何自治，即便是文化自治也不行。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甚至连一些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叶弗列莫夫）都认为，为了革命民主的团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1967年德文版第379页，费舍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结，恰恰在俄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应该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一些灵活性。

政府新危机和前线最近一次进攻失利，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发动一次新的起义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依旧是：组织一次士兵、红色近卫军和工人的武装游行。游行队伍不象4月时那样前往马林娜宫(临时政府所在地)，而是象1917年2月时那样，前往苏维埃所在地塔福里宫（2月时此处是杜马的所在地）。游行示威的参加者这一次要建议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全部政权都掌握到自己手中。如果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发现力量对比变得对布尔什维克有利，而苏维埃又对游行示威者（即起义者）的最后通牒做让步，那末布尔什维克就夺取政权。如果局面由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所控制，布尔什维克就解散游行队伍。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声称游行是无组织的、自发的，按照斯大林的教科书的说法，布尔什维克只不过决定对这次游行示威加以引导，以便"把它变成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6年俄文版第186页）①

官方最新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对这件事的说法与从前已有所不同。新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说，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在一次专门会议上"做出决定：7月4日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和平的和有组织的示威游行。会议否决了加米涅夫提出的不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只举行集会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拿武器上街的建议也没有得到支持。"（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50页）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在7月3日夜晚和4日凌晨所散发的"呼吁书"也证明游行不

---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15页。——译者注

是自发的，如果可能，布尔什维克是想夺取政权的。呼吁书说：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愿全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全部权力都争取到自己手中。这是彼得格勒革命居民的意志……昨天彼得格勒的革命卫戍部队和工人走出兵营和工厂，宣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号召把这次在团队和工厂爆发的运动变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农民的一次和平的、有组织的发动。"（策烈铁里：《二月革命回忆录》俄文版第2册第289页）

从一清早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在团队和工厂中散发这个呼吁书。呼吁书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苏维埃和临时政府都十分清楚，这不是一次自发的示威游行，而是一次力量试验，如果可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就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越是起劲强调示威游行是和平的，相信他们的人就越少。策烈铁里谈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次苏维埃召开会议时，斯大林来了，他通知苏维埃说，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群众要上街，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阻止他们，派了宣传员到各团部和工厂去"。斯大林发表完这番武断的声明之后，要求会议主席将他的这一声明载入会议记录中，然后便和他的同志们一道离开了会场……齐赫泽冷笑着对我说："现在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我问他，他所说的问题清楚是指什么而言。齐赫泽回答说："我指的是，真正要和平的人就没有必要一定把他的和平愿望载入记录。"（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267页）

中央委员会与彼得格勒和各区委员会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的任务是，当群众冲上街头举行起义时，负责组织群众的"自发运动"，而中央委员会要在试验力量和试探敌人的信心时起"组织"和"劝阻"作用。策烈铁里也指出过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双重角色（起义失败时，中央委员会就会

做出起义与己无关的样子），他写道：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所做所为是值得注意的，7月3日晚十一时以前它一直扮演着反对士兵和工人群众冲上街头的角色。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机关竭力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下午四时后党的宣传员们号召举行发动一事（这一号召先是得到各区委员会的支持，继而又得到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支持）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这一号召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做出的。”（同上，第298页）

中央委员会极其秘密地把自己装扮成与事无关的样子，甚至把列宁也送往位于彼得格勒郊区的邦奇—勃鲁也维奇别墅假装养病，7月4日他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7月4日的工人、士兵和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武装示威游行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说，有五十万人参加了游行，策烈铁里说只有几万人。不管怎么说，示威游行的规模很大，单单是布尔什维克从喀琅施塔得运来的水兵就有一万人左右。游行队伍首先来到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中央委员会设在女演员克舍辛斯卡娅的一幢楼房里）。示威群众要求列宁讲话，但是列宁却建议请卢那察尔斯基讲话。群众对卢那察尔斯基模棱两可的发言感到不满。于是列宁亲自发表讲话。但是列宁也故意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一方面列宁对群众说，应该保持“镇静”，另一方面又要群众有“坚毅精神”，但是他强调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该而且能够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页）①

之后群众在中央委员们的率领下前往塔福里宫（苏维埃所在地）要求苏维埃立即夺取全部政权。然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01页。——译者注

那里也表现得心口不一。策烈铁里回忆说：

"塔福里宫前群情激昂，游行示威者想动手逮捕社会党人部长（他们把这些部长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反对者），然而他们发现，对这一行动最感到害怕的竟是他们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306页）

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走出来安抚群众，水兵将他逮捕，并押上汽车准备带走。这时在齐赫泽的提议下，苏维埃中的左派代表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出来会见示威群众，要求释放切尔诺夫。托洛茨基借用水兵领导人拉斯柯利尼柯夫的话描述了后来发生的事："列甫·达威多维奇[1]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在结束讲话时问道：'谁主张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请举手！''没有，那好，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托洛茨基郑重宣布说。"（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33页）

出乎布尔什维克所料，苏维埃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仓惶逃跑，而且决心要把起义压下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心指望苏维埃领导人会在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的压力下做让步，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策烈铁里回忆说：

"7月4日起义达到了顶点，这一天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对起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这次会议，因为列宁及其拥护者已确定在这一天做一次夺权的尝试，只看苏维埃里的多数人是否会在街头游行示威的影响下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纯苏维埃式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十分清楚，如果他们能在革命的民主的中央机关的协议掩护下顺利完成夺取政权的第一阶段，那末威胁他

① 即托洛茨基。——译者注

们的主要危险——调部队到彼得格勒来恢复秩序——就消除了。”（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319—320页）

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走过苏维埃的会议室，要求苏维埃夺取全部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参加讨论，他们站在一旁注视着讨论的进展情况。甚至连孟什维克国际派领袖马尔托夫（他反对孟什维克的正式领导机关——组织委员会）也要求政权归苏维埃。

然而，苏维埃大多数人从语言转到了行动：他们动用忠于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双方伤亡都很大。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得知一支混合部队已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来维持秩序时，便授权季诺维也夫在7月4日夜晚发表了下述声明：

“为了使自发的运动变为有组织的运动，我们党做了一切努力，现在我们党正在修改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呼吁书：不要到街上去，停止游行示威（喊声：在尸骨成山之后吗？）。”（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330页）

这个声明表明，中央委员会承认自己夺取政权的企图失败了。但是，中央委员会不承认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没有失去将来再次夺取政权的信心。在上述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中，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建议工人和士兵们撤离大街，但同时又指出：“游行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工人阶级和士兵的先锋队的口号已经得到充分的宣传……让我们继续积蓄力量吧……”（《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52页）托洛茨基回忆列宁七月起义后的情绪时说：

“7月5日早晨我见到了列宁。群众的进攻已经被击退。列宁说：‘他们现在可以把我们通通枪毙，对他们来讲，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不是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

报复情绪，而是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决心和果敢。”（托洛茨基：《我的生涯》1930年柏林俄文版第2册第34页）

后来斯大林承认，7月3—4日的发动是一次力量试验，如果敌人的力量比起义的力量弱，就作为起义的“第一次打击”。他说：

“有时候，党把坚决发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自以为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后备力量，就认为举行尝试性的发动来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和检查一下自己的战斗准备是适当的……它（“力量试验”）是介乎游行示威和起义……的一种中间物。在有利的条件下，它能够发展成第一次打击（时机的选择），发展成起义（我们党在10月底的发动），而在不利的条件下，它能够使党直接受到毁灭性的威胁（1917年7月3日至4日的游行示威）。因此进行力量试验最适当的时候是‘果实已经成熟’……党在进行力量试验的时候应当准备应付一切变化。”（《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75—76页）①

有了这一可靠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7月3日至4日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力量试验”，试图通过起义夺取政权，但遭到了失败。临时政府查封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发布了逮捕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命令，罪名是叛国和组织武装起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被指控为德国的奸细。7月12日前线开始对逃兵处以死刑。7月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要求成立苏维埃专门委员会调查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指控。7月7日列宁亲自写信给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信中说，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政府逮捕他的命令，他就同意受逮捕。列宁写道：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直到现在，7月7日下午3时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1—62页。——译者注

15分，我才获悉，昨天夜里一群武装人员，不顾我妻子的抗议，未出示搜查证，就搜查了我的住所。我对此表示抗议，并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调查这一公然违法的行动。同时，我认为我有责任正式作书面声明：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这一点，我坚信没有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此会表示怀疑。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尼·列宁）1917年7月7日于彼得格勒。”（《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45页）①

这封信列宁是经过周密思考才写出的，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花招。他需要时间以便隐匿起来。他获得了这一时间。

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声明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确实在7月5日开会讨论了这一声明。常务局做出同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完全相符的决定：

“鉴于有人在全市和报刊上非难说，列宁和其他政治活动家从一些不明不白的德国人那里领取金钱，执行委员会特此公布如下：应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的要求，执委会成立了案件调查委员会。因此，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结束之前，执行委员会建议不要再传播令人难堪的非难，也不要对这些非难表示任何态度，执行委员会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表示何种态度都是不许可的。”

这个决定于1917年7月6日发表在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上。（见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341页）

应当指出，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人及其领袖们（齐赫泽、策烈铁里、唐恩、戈茨等）尽了一切努力阻止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杰夫

①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451—456页。——译者注

在报纸上发表有关列宁同德国参谋部有联系的报道。这篇报道说，列宁通过受托人从德国人手里拿到了一大笔钱。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受托人有布尔什维克加涅茨基（菲尤尔斯坚别尔格），他是列宁的老朋友和学生；帕尔乌斯（盖利方得医生），他是托洛茨基的老师和多年的好友；在彼得格勒有布尔什维克律师柯兹洛夫斯基和加涅茨基的一个女亲戚苏缅松。报道说，“军事检查部门发现，德国特务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保持着频繁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电报联系。”（同上，第333页）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拜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人齐赫泽，请他和社会党人部长策烈铁里（也是格鲁吉亚人）想办法阻止报纸刊登这条消息。策烈铁里对斯大林的这次拜访结果描述说：

“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齐赫泽，让他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和策烈铁里的部长名义要求所有报纸不刊登这一材料。齐赫泽问我是否同意这样做，当我做了肯定的答复后，他马上打电话提出了这一要求。”（同上，第334页）

不过，一家右派报纸（《生动语言报》）还是刊登了这条消息，材料是第二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列克辛斯基和先前的政治流放者潘克拉托夫提供的。7月22日各报刊登了检察官关于对列宁案件进行调查的通知。列宁对此事所做的最初反应中，有两种提法很明显是不正确的，列宁自己的材料也推翻了这两种提法。其一是：列宁7月11日给《新生活》编辑部写信说，有人把他“扯到加涅茨基和柯兹洛夫斯基的商业活动”之中，他声明说，“根本没有从上面提到的两个同志那里为个人或者为党领过一个戈比。”（《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页）①其二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9—170页。——译者注

是：列宁在题为：《答复》这篇文章（1917年7月22日至26日）中写道："检查官竟玩弄花样，说帕尔乌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则同列宁有联系！这简直是骗人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乌斯之间有金钱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同上，第31页）①就这样，列宁声称他与加涅茨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列宁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在《工人和士兵报》上发表文章时，谁也不知道列宁与加涅茨基保持着经常的频繁的通信联系。直到列宁和加涅茨基掌权之后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加涅茨基是列宁的亲密同事和朋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的支持，他被波兰布尔什维克选入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四月，列宁在动身回俄国之前，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加涅茨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主持国外局的工作。列宁公开袒护加涅茨基。（《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41页）②除此之外，《列宁全集》第49卷还收了列宁给加涅茨基的八封私人信件和七封私人电报。在这些信里列宁正是称加涅茨基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一次甚至用德语称他为"Werter Genosse"（"敬爱的同志"），这些信件的内容就实质而论也是颇有趣味的。这八封信使人确信无疑，从1917年2月起加涅茨基已是向列宁提供金钱的主要人物，这些钱不是列宁本人用，而是给党用的。下面是这几封信的摘抄。

战争初期加涅茨基自己并没有钱，他曾向列宁要过钱。1914年11月28日列宁回答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0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448页。——译者注

"亲爱的朋友：……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会借给您。维克多（他现在在热那亚，9月30日或10月1日将回国）答应一定给我寄钱来。我……立即给您寄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7—8页）①

当列宁准备取道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回俄国时，于1917年4月1日给加涅茨基拍了一封电报：

"请拨出两千克朗给我们作旅费，三千更好。"（同上，第425页）②

4月12日列宁回到俄国后，立即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加涅茨基和拉狄克写信：

"亲爱的朋友们！至今还没有收到，简直一点没有收到您们的信札、邮包及汇款。通信要非常准时和特别谨慎小心。"（同上，第437页）③

1917年4月21日列宁在给加涅茨基的信中写道：

"科兹洛夫斯基汇来的款子（二千）也收到了……总共出版约十五种布尔什维克报纸。（同上，第438页）④早在1923年，当斯大林得知列宁想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时（列宁的"遗书"），就瞒着生病的列宁，建议发表列宁的上述最后两封信，因为这两封信可以揭露列宁通过工作人员帕尔乌斯和加涅茨基同德国人打过交道。由于列宁掌权后仍矢口否认他曾通过加涅茨基与帕尔乌斯和德国人有来往，所以发表这两封信（《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3年第9期）就会在党内造成爆炸性的后果。斯大林似乎想以此举提醒列宁说：不要太胆大妄为，别忘了，你自己也不干净！

---

①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5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33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461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444页。——译者注

问题完全不在于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国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否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加涅茨基、卡尔·拉狄克和柯兹洛夫斯基接受过德国人的钱（外交部及参谋部的基金）。问题也不在于列宁自己是否知道，给他搞革命的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下面的问题才是应该弄清楚的：

1．德国政府为在俄国组织反对国家和反战宣传总共花了多少钱？

2．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否知道这件事？

3．除布尔什维克外，德国政府还资助过哪些俄国的革命组织？

为了搞垮民主俄国，为了在俄国打内战，为了使俄国退出战争，为了使反战反爱国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德国皇帝与列宁的利益趋于一致了。如果列宁当时出于某种道德上的考虑，拒绝接受德国人的帮助，那末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布尔什维克，而只是一个可怜的社会主义狂热派的鼓吹者而已。马基雅弗利就说过，政治和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列宁自己也说过："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09页）①

1921年1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应算是列宁在世时对德国提供金钱所做的一切重要揭发中的最主要的揭发。伯恩施坦写道："列宁和他的同事们的确从德意志帝国那里拿过一大笔钱。我是1917年12月底知道这件事的……这笔款子数目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至少有五千万金马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译者注

克，钱的数目如此之大，因此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不言而喻，是知道钱的来源的。我当然明白，从三国同盟的军事政治观点来看，给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提供资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个军人还向我透露了某个德国同盟国的显要议员对他讲的一句话，那位议员说，提供这笔资金是‘德国走的一步妙棋……’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的后果之一是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大概对德国指挥官们的傲慢态度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还记忆犹新吧。同他们进行谈判的霍夫曼将军（从这种含义上来说，他们是握在霍夫曼将军的手心里的）让他们十分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如果我的消息可靠，那末列宁当年对协约国的指控似乎曾回答说，他从那里拿钱，这与任何人无关。提供钱的人追求什么目的，这完全不重要，——他，列宁，把给他的钱用在搞社会革命上了，这就足够了。”（摘引自策烈铁里上述著作第338—339页）

无论列宁，还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都从来没有对这一指控进行过驳斥，只说这一切皆是污蔑。1917年7月底列宁就这一指控写道：

“当然，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是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4卷第21页）①

列宁不愿意在法院、检察院甚至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经列宁本人提议成立的）的范围内对此事做答复。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7月至8月）专门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出庭受审问题。一些代表（沃洛达尔斯基、马努伊利斯基、拉舍维奇）向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说，如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代表大会可以让他们“去当局受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9页。——译者注

审”。（《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79页）但是，代表大会按着那些更了解内情的人（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斯克雷普尼克、什利赫捷尔）的建议否决了这一决议案。

现在有些人同仇视列宁阵营中的历史学家一样，过于简单地提出“列宁是德国参谋部的奸细”这一问题。列宁不是那种受侦探机关雇用的人，而是一个能雇用敌人侦探机关的人。所以，从政治的广义上来说，不是列宁做过德国政府的奸细，相反，当列宁在俄国组织革命时，德国政府曾是列宁的财政代办处。因此，不是德国政府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领取金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列宁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这些钱，怎样用，在那里用，完全随他的便，他只需对自己负责。正因为如此，列宁不仅用德国钱组织反俄国政府的宣传，而且也用德国钱组织反对德国政府的宣传！列宁把在俄国搞共产主义革命同在德国搞共产主义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金钱的人明确这一点，但是他们以为自己能比列宁胜一筹。然而他们却没能如意。列宁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革命扫除了德国的君主制，尽管德国的列宁曾受到过警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在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所有著作中总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口号：“尼古拉二世是同威廉皇帝一模一样的强盗”，“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同柏林的德国政府一样，是帝国主义的强盗政府”。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德国钱”一案，那末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清楚了。1958年伦敦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 Z・A・B・Zeman（策曼）编纂的文件汇编。这本书的名字叫《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5—1918》①（《德国外交部档案馆

① 《德国和1915至1918年间的俄国革命》。——译者注

文件选》），这里我们只从中引用两段话：

一.1917年9月29日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Kühlmann(邱尔曼）写道：

“如果没有我们的长期支持，布尔什维克运动永远达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第71号文件第70页）

二.1917年12月3日Kühlmann还写道：

“俄国是敌人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所以当时的任务是要逐渐把这一环解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它扯下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俄国后方搞颠覆活动的目的，首先鼓励分离倾向和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没有通过各种渠道和以各种名义接受我们不断增加的资金之前，俄国这一环是解不下来的。拿到资金以后他们才得以发展自己主要的机关报《真理报》，组织强有力的宣传，显著地扩大原是很狭小的自己党的基地。”（第94号文件第44页）

最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布尔什维克竟然在掌权后仍继续拿德国人的钱。例如，1917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为了搞政治宣传接受了一千五百万马克，1918年5月13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先生在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后，建议他的政府仍旧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柏林回答说，米尔巴赫有权动用四千万马克进行这一援助。(见上述第75、92、124、128、129、131、132、133、135号文件）但是，Z·Zeman和夏皮罗都认为，既然米尔巴赫于1918年7月6日被打死了，说明钱并没有送到俄国。（见策曼上述著作第137页；见夏皮罗《苏联共产党》英文版第184页）

所有这一切表明，列宁是不会到临时政府法庭受审的。因而，一位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说，“斯大林在列宁是否去反动法庭受审的问题上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他援引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话说：“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利切夫指出，在个人迷信时期不允许写斯大林对1917年列宁是否应该去反动法庭受审的问题所犯的极为严重的错误。”《简明教程》毫无根据地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很耐人寻味的：“代表大会上（第六次代表大会）有些代表被苏维埃的气氛和立宪的幻想所左右，**幼稚地认为**，对列宁的审判会变成对阿列克辛斯基、策烈铁里之流的揭露，党会在这一审判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4期第46、48页）

说得对，党的确不会在这一审判中获得胜利，因为事实对它是不利的。

第十一章

七月起义后的中央委员会

七月起义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筹备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或者按列宁的说法，开始了一个“新周期”。列宁说，新阶段同旧阶段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列宁通过苏维埃实现“和平”夺取政权的希望（“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已经破灭。由于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人拥护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由于苏维埃参加了镇压七月起义，这一希望变得不切实际了。因此列宁断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克伦斯基新政府（7月8日克伦斯基接替了李沃夫的政府主席职务）不过是胜利了的反革命势力的工具而已，而苏维埃则变成了这一反动势力的“遮羞布”。因此列宁收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声明说：从今以后不是通过苏维埃而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所写的《政治形势》一文中说：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不要……对一切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武装起义的目的只能是使政权转到受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来实现我党的纲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5页）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168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对党提出严重警告说：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同时，应当象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结合起来。”（同上）① 换言之，我们不退出苏维埃，但是鉴于它**现在**的组成情况，我们不再把它当做夺权的工具。只有彻底孤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才能实现夺权。

后来，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出一项理论说，在西方，共产主义革命只有通过约束工人阶级中的社会民主政党的政治与组织影响才能取得胜利。列宁把这一理论提到任何国家都应遵循的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革命规律的高度。

列宁提出新的任务和口号以后，便同季诺维也夫一起隐退了。起先他们住在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草棚中，后来，在8、9月间又潜入法国，在那里他们实际上已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提议（唐恩的决议案）谴责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应对“审判被指控搞叛乱和接受德国钱的布尔什维克”一事感到关切，在审判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停止了他们的职务。苏哈诺夫就此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处理实际上是公正的，但这不等于说政治上是允许的。”（苏哈诺夫：《革命札记》俄文版第5卷第50页）

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克雷连柯、梅霍诺申、柯伦泰、拉斯柯利尼柯夫（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政委）被逮捕了。托洛茨基在报纸上挑衅性地发表一封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他说，如果列宁是德国的间谍，那末他——托洛茨基，也是德国的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8页。——译者注

谍。因此他要求政府也对他发逮捕令。唐恩说（借用布拉塔代表的话），托洛茨基还算明智人，他在致政府的信中没有说出自己的住址。然而政府很快就找到了托洛茨基的住址，满足了他的要求：托洛茨基也被逮捕了。

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党团一样，仍继续存在并开展合法活动。诚然，斯大林很少在苏维埃露面，但是中央委员诺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李可夫、梁赞诺夫和孟什维克国际派分子领袖马尔托夫在苏维埃的会议上则完全按着列宁的意见强烈谴责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政策。

虽然临时政府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馆，占了克舍辛斯卡娅的房子，发布了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命令，逮捕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但是它没有宣布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为违法的叛乱组织。临时政府谴责的只是个别人，而不是整个组织。因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党团，彼得格勒、莫斯科、各省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工厂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之间不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皆有很强的战斗力。列宁虽然人不在，但是他能通过无数的信札，通过他的专职联络员（绍特曼）在政治上控制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其实政府并没有搜捕列宁，大概他不再公开活动已使政府感到满意了。

因此党的领导机关能毫无困难地继续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13—1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虽然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们说，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是会议参加者是如此之广泛，恰好说明这不是一次秘密会议。除中央委员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州执行局、莫斯科市委员会、莫斯科区委员会的代表及工作人员。

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七月起义后党所面临的形势，但是会

议既不同意列宁对政治形势所做的总的估计，也不同意他提出的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不是建立了反革命军事专政，而是建立了“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叶弗列莫夫专政”，它是“一部分工人跟着走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小资产阶级专政与右翼“目前正在讨价还价”，“反革命已经从进攻布尔什维克转到进攻苏维埃和苏维埃多数的政党……苏维埃的作用下降了。”（《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69页）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号召建立一个能实现和平、工人监督和给农民土地的政权。决议指出，这样的政权仍然只有通过苏维埃，即**现在的**苏维埃才能建立。决议说（这段话同列宁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力求把全部政权集中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手中，并且认为，只有实现了上述纲领，这个政权才有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69—370页）②

三、四月之后（列宁回国之前）斯大林已经第二次公开觊觎党的领袖地位。三、四月间还有加米涅夫同他进行抗争，但是现在加米涅夫被捕了。其余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是斯大林的对手（诺根、米柳亭、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费多罗夫）。所以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直接由斯大林主持。

虽然代表们人手一份上述列宁写的名为《政治形势》的提纲，但是中央委员会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一项明显反列宁的决议。苏联党的历史学家虽然不得不指出这一点，但总是尽量贬低这件事情的意义：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75—47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76页。——译者注

“会议决议对当前这样一些问题，如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如何对待‘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等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67页）

这种说法不确切。读者从上文已经看到，会议决议对这些问题做了回答，只不过和列宁所做的回答截然相反。具体来说是：政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掌握在反革命军事专政手里，而是掌握在独裁者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和自由保皇党党员叶弗列莫夫手里。至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积极分子认为没有必要取消。为此列宁在7月一个整月和8月初的日子里，为了按照《政治形势》提纲的精神纠正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取消七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同中央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的顽强斗争。

在《论口号》一文中列宁间接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并对为什么中央委员会应当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做了解释。他写道：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显然，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0页）①

列宁公开反对中央委员会，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错误的。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说：“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的怪想，或者是一种笑料。”（同上，第12页）②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75页。——译者注

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不要按旧的7月前的形势行事，而要按新的形势行事：**现在的**苏维埃出卖了我们，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出卖了我们，因此不仅要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临时政府，而且要反对以齐赫泽、策烈铁里、唐恩、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现在的**苏维埃。列宁反对在政治上讲任何"道德"。他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譬如说，如果这些党谴责自己的领导人并站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来，他就愿意支持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在那篇文章中他也正是这样说的："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帮助大资产阶级。"（同上，第13页）①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从2月27日至7月4日党的政治斗争时期结束了，"新的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同上，第17页）② 由此列宁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要想夺取政权，只有诋毁、孤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而清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形式。整个7月列宁都在同以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诺根为首的公开活动的中央委员作斗争，以便迫使中央委员会按照他在《政治形势》提纲中所提出的新口号和新方针的精神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他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领导人应当修改他们在7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第五次联合代表大会（1907年）闭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80页。——译者注

幕十年后，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区联派分子”（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组织是由“不介入派别之争”的孟什维克国际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前进派分子”和“调和派分子”所组成的）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公开的代表大会，然而，所有官方历史学家都说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大会。（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简史》1930年俄文版第276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俄文版第187页①；《苏联国内战争史》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79页；《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74页。）但是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到会的代表使用的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尽人皆知的代号。更主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报》每天都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加以报道。甚至连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报》也于1917年7月28日对代表大会的工作做了简要报道。大会代表斯克雷普尼克对此很不满，他说：

“我不知道是谁向《言论报》提供了消息。我们举行的是公开会议，但是我们不许别人对我们进行歪曲和污蔑”，因此，按照他的建议大会做了如下的记载：“代表大会声明：只有登在《工人士兵报》上的有关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导才是唯一经过核对和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7—68页）

一个有三百多人参加（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代表大会不可能是秘密的大会。临时政府对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没有加以制止。一百五十七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一十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二十四万名党员。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17页。——译者注

可见，从四月代表会议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即在三个月内）党员人数增长了两倍。代表大会于7月26日至8月3日举行。

大会的议事日程是：

1.组织局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人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局由三名布尔什维克和两名区联派分子所组成）；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斯米尔加）；

3.各地的工作报告；

4.目前形势：（1）战争和国际形势（报告人布哈林），（2）政治形势（报告人斯大林）和经济状况（米柳亭）；

5.立宪会议的选举；

6.国际；

7.修改党纲；

8.党的统一；

9.选举；

10.其他。

大会主席团由五人组成：斯维尔德洛夫、奥利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代表区联派分子）和斯大林。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伦泰和卢那察尔斯基被选为大会荣誉代表。托洛茨基要在会上代替斯大林、布哈林及米柳亭做“目前形势”报告。

斯维尔德洛夫在做组织局报告时指出：“关于报告人的问题组织局做了一切努力，但是代表大会不得不拒绝那些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人做报告。在最后时刻取消了托洛茨基的目前形势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8页）

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孟什维克国际派中央局用口头（通

过拉林）和书面（由马尔托夫和阿斯特罗夫签名）形式向代表大会表示致意。拉林在代表大会上说："据我所知，孟什维克国际派的领袖要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并做正式发言（掌声）。"（同上，第69页）

但是马尔托夫并没有来参加大会，只是给大会发了一封贺信。信中说：

"祝贺贵党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所举行的代表大会……我们相信，这些迫害和搜捕不能动摇国际主义思想对贵党那部分有组织的无产者的影响，借此机会再一次表达我们对污蔑运动的极大愤慨，这个污蔑运动竭力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整整一派说成是德国政府的特务机关。"（同上，第194页）

马尔托夫说，他的派别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方法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因而是不可能实现联合的。（同上，第195页）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给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之所以躲避起来免遭逮捕，是因为"反革命"在办他们的案子，并说，只有"立宪会议才有权决定临时政府是否可以下令逮捕我们。"（同上，第316页）

应当指出，虽然形式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该去法庭受审问题并没有列入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但是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在大会中占了很显著的地位。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教科书中流传的说法完全歪曲了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的全部性质。第一，这些教科书对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曾反对代表大会讨论该问题这一事实避而不谈，第二，教科书中还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列宁可以去法庭受审，而很多代表反对列宁在任何条件下去法庭受审。斯大林对列宁出庭条件的提法本身就不是列宁主义的。当列宁和季诺维也

夫下决心不出庭时，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法庭是民主的，如果保证不折磨他们……如果法庭当局多少讲点信用，他们就出庭。"（同上，第27—28页）

知道列宁意见的大会代表坚决反对斯大林的主张。

斯克膏普尼克说："在斯大林的决议案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条件——保证安全。这个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同志去坐共和国的监牢。我认为，应该提另外一些条件作为决议案的基础……"（同上，第31页）

沃洛达尔斯基说："斯大林同志的决议案中有关讲信用的资产阶级法庭这一点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同上，第32页）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应该以烦琐哲学的态度对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该不该出庭问题。什么叫'讲信用的资产阶级法庭'？难道讲信用的资产阶级法庭就不想杀我们的头吗？"（同上，第34页）但是布哈林却提出了一个更使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能出庭受审。他说："法庭会拿出很多材料证明他们同加涅茨基有联系，加涅茨基又同帕尔乌斯有联系，而帕尔乌斯写过有关列宁的文章。你得证明帕尔乌斯不是奸细！"（同上，第34页）

布哈林提出一项反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任何情况下出庭受审的决议案。代表大会否决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列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去法庭受审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否决了沃洛达尔斯基、拉舍维奇和马努伊利斯基提出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说，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则应该去法庭受审：（一）确保人身安全，（二）公开审讯，（三）苏维埃派代表参加审讯，（四）尽快由有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同上，第32页）。

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哈林的原则上反对出庭的决议案。决议案

说，“不但绝不会有任何公正的审判，而且受审人的起码安全也不会有保障。”（同上，第270页）由于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公然声称，就道德而论，他们不相信列宁会“叛国”，会为德国服务，因此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利用这些领袖们的威信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说话。所以，在关于列宁不去法庭受审的决议补充说：“为揭露卑鄙的诽谤者，代表大会也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所有革命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只有这样的委员会无产阶级才信得过。”（同上，第270页注释）

列宁当然也不会同意到这样一个委员会去受审。列宁的目标只有一个：取得自己革命事业的胜利。他非常清楚，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叙述了1917年4月至7月的事变过程，重复了党关于七月事变和七月革命的著名纲领。针对一部分代表指责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发号施令，并不征求全党意见，斯大林在结束语中说：

“如果要求中央委员会不事先征求地方意见就不能采取任何措施，那就等于要求中央委员会不是走在事件的前边而是落于事件之后，要求中央委员会只在自己的决议中陈述既成事实，那就不成其为中央委员会了。”（同上，第27页）

斯大林在这个结束语以及政治形势报告中，在三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发表了与列宁不一致的看法。这三个问题是：（一）关于是否出庭问题（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二）关于七月起义后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问题（列宁说，反革命势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斯大林却说：“目前政权掌握在谁手中还不清楚。”）（同上，第27--28页）；（三）关于分析二月革命的动力问题。

斯大林说，二月革命中有四种“联合”力量，即工人阶级、

农民、自由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同上，第10页）。而列宁却认为，进行二月革命只有两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

斯维尔德洛夫在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时说，四月，党有七十八个组织，八万党员，到了七月，党已经有一百六十二个组织，二十四万名党员，其中二万六千人是军人（同上，第36页）。党出版了四十一种报纸，每天印数为三十二万份。二十七种报纸用俄文出版，其余的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拉脱维亚、鞑靼、波兰及其他文字出版。”（《苏联国内战争史》俄文版第1卷第177页）

斯米尔加在做中央委员会财政报告时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从上届中央委员会接收了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三卢布二戈比。现在还余二万五千零二十八卢布八十五戈比（支付党的工作人员薪金用了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卢布）。中央委员会花二十六万卢布买了一所印刷厂。他指出，其中约有十四万卢布是“工人们”募集的，另外十二万是《真理报》提供的（报告说，《真理报》所提供的资金是订户所付的报费，不过人人都知道，《真理报》从来是收不回成本的）。《真理报》的发行量为八万五千至九万份，三月有八千订户，四月有一万三千订户，五月有一万八千订户，六月有二万一千订户。（《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38—41页）除此之外，地方组织应向中央委员会交纳百分之十的经费，总数只有四千一百零四卢布六戈比（同上，第38页）。（这里我们要指出：中央委员会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前，而且在掌权以后仍对自己的财政支出极端保密，这一次是另有考虑。）报告人自己也承认：“我们不得不靠募集捐款过活。地方组织上缴的经费很少。”（同上，第39页）（德国人的钱恐怕也算是一种资助革命的“捐款”。）

总地说来，代表大会对苏维埃采取了比列宁更为慎重的态

度。当列宁同时向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宣战时，第六次代表大会却通过了一种有伸缩性的提法，这不同于列宁的绝对反苏维埃的提法，而是一种亲苏维埃的提法。早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列宁就写道，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页）①“现在的苏维埃垮台了，苏维埃由于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操纵而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同上，第17页）②因此列宁要求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这一口号，但也没有取消这一口号。代表大会默认这仍是一个有效的口号，但是苏维埃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政权了。决议的有关部分说：

“苏维埃正在作痛苦的垂死挣扎……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是革命和平发展、使政权无痛苦地转交的口号……现在，和平发展和使政权无痛苦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现在只有彻底消灭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才是正确的口号……”（《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56页）

苏维埃现在（与从前不同）可以成为非和平地、痛苦地转交政权的机关，这种提法是成立的。因此，即或是列宁笔下的那种苏维埃也应该加以爱护。那项决议在提出党的任务时，指的正是这一点：“保卫一切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免受反革命的侵害。”（同上，第257页）很多代表公开反对列宁的要求，建议保留“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对这一口号加以任何修改（雅罗斯拉夫斯基、尤列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札帕里泽等人）。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79页。——译者注

关于党纲，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但是没有着手修改，而是把这项工作推至下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战争”（布哈林）、“政治形势”（斯大林）、“经济状况”（米柳亭）、“工会运动”（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关于青年”（哈里托诺夫和斯米尔加）、“关于党的统一”（尤列涅夫）及“关于新党章”（哈里托诺夫）等决议。

当你读苏联历史学家所写的官方党史时，你会产生一种印象，即列宁早已拟好的草案构成了上述每一项决议的基础。通过对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述每项决议都是有关报告人同起草委员会（小组）共同拟定的，代表大会为每一个报告都选举了相应的起草委员会或小组。

除上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关于为什么他们决定躲避逮捕的声明外，代表大会上没有见到任何列宁起草的文件。所以，官方历史学家的下述说法是完全无根据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文件都是列宁准备的……代表舒米亚茨基指出：‘提纲、草案、决议案、指示——所有这些都是伊里奇起草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第3卷第1分册第174页）因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1958年莫斯科出版）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文件，所以，官方历史学家就援引一些微不足道的证人——回忆录作者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论点。

尽管如此，列宁精神仍笼罩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能独立开展工作恰好说明列宁的本领。列宁制造出一台多么出色的党的机器，尽管机器的设计者和主要驾驶者不在，但它仍能自行运转。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和他的“区联派”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区联派”从1913年起开始在彼得堡活动，战争

期间它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密切起来。布尔什维克“前进派分子”领导人（卢那察尔斯基、马努伊利斯基等人）也通过“区联派”与托洛茨基一道回到党里来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列宁提出的著名的党章第一条现在是这样写的：“凡承认党纲、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84页）① 黑体字是第一次写进党章第一条的话，它的意思只有一个：所有各级党组织都要服从各自委员会的决定，全党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章中对中央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得更加明确和扩大了，中央委员会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核心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可谓“中央委员会中的中央委员会”。还首次成立了检查党及其企业财务工作的检查委员会。一年一次的代表大会被宣布为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代表大会：(一)听取和批准中央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总结报告；(二)重新审查和修改党章；(三)决定党的策略路线；(四)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

看来，之所以成立检查委员会，是因为政治上它并不触动党的一元化，是因为党想进一步了解它的财政来源。直到现在，以列宁为首的少数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既不了解全党的财务工作，也不了解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工作。正是因为对“德国钱”的揭发使得成立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只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变得更为迫切了。

有关中央委员会的条款是这样说的：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每年一次。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96页。——译者注

代表党同其他政党和机关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组织并管理全党性的事业，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并管理党的中央会计处（同上，第384—385页）。①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比前一届扩大了一倍多，用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二十一名中央委员和十名候补委员。代表大会通过决定说，如果大会正常结束（即不发生逮捕），将公布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这一决定在选举完中央委员会之后被取消了，虽然并没有发生任何逮捕事件（临时政府甚至不想给大会的工作找麻烦）。代表大会只公布了四名获选票最多的中央委员：列宁——一百三十三票（满票为一百四十四票），季诺维也夫——一百三十二票，加米涅夫——一百三十一票，托洛茨基——一百三十一票。（"热烈的掌声"——记录在此处注明说。《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52页）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Я·А·别尔津、Н·И·布哈林、А·С·布勃诺夫、Ф·Э·捷尔任斯基、Г·Е·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А·М·柯伦泰、Н·Н·克列斯廷斯基、В·И·列宁、В·П·米柳亭、М·К·穆拉诺夫、В·П·诺根、А·И·李可夫、Я·М·斯维尔德洛夫、Ф·А·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И·Т·斯米尔加、Г·Я·索柯里尼柯夫、И·В·斯大林、Л·Д·托洛茨基、М·С·乌里茨基、С·Г·邵武勉。候补委员：П·А·查帕里泽、А·А·约费、А·С·基谢廖夫、А·洛莫夫、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Н·А·斯柯雷普尼克、Е·Д·斯塔索娃，В·Н·雅柯夫列娃。不久斯塔索娃、洛莫夫和约费就被提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96页。——译者注

升为中央委员。因此，中央委员变为二十四人。（《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97页）

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8月5(1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核心组”，由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捷尔任斯基、米柳亭、乌里茨基、约费、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布勃诺夫、斯塔索娃、邵武勉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很象后来的中央政治局。8月6日“核心组”举行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由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尔任斯基、约费、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13页）

在总结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应当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曾以党的领袖自居。当然，表面上看去，这是由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他形式上还不是党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缘故。但是，正是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表明，在所有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才是阶级的领袖，列宁式的领袖。不过，列宁低估了斯大林。虽然斯大林1898年就加入了党，虽然斯大林同列宁一道参加过1905年赫尔辛基代表会议，参加过1906年和1907年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过1913年的波罗宁诺会议，虽然斯大林于1912年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至于他们之间的书信联系就更不必多说了，但是直到1917年左右列宁还不知道斯大林姓什么。1915年7月列宁在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问道：“您是否记得柯巴的姓？”（《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101页）① 1915年11月列宁在给卡尔平斯基的信中重又提出这个问题：“恳请（向斯帖普科

①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203页。——译者注

或米哈等人）打听“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此事很重要！！”（同上，第161页）[1]但是，后来不仅列宁记住了这个姓氏，而且连整个国家的历史都永远地记住了它。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七月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镇压，甚至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实行镇压，它镇压的只是个别领导人，主要是列宁。但是，甚至对列宁也没有进行大搜捕。只要他不在各种会议上抛头露面，政府就不打搅他的安宁。然而布尔什维克却利用列宁躲避法庭审判这件事，说革命民主政府折磨和迫害一个老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就列宁案件展开了十分活跃的宣传工作。7月，中央委员会和它的地方机关出版了五十一种刊物（这还不包括苏维埃和工会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其中只有十三种刊物在七月起义后被查封，而且这些被查封的刊物中有五种（包括中央机关报）又开始以新的名称出版，除此之外，又增加了五种新刊物。（《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183页）十月革命前夕所有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杂志的日发行量约为六十万份。（同上）

第六次代表大会列举了许多材料说明中央委员会在各地方的代办员为准备革命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听取“各地方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委员会军事组织、十二军和罗马尼亚前线军事组织在会上做了报告，在会上做报告的还有彼得格勒、莫斯科、顿巴斯、白俄罗斯、喀琅施塔得、乌拉尔、中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格罗兹内依、外高加索的文职人员党组织和彼得格勒区联派组织（《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55——96页）。所有

[1]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244页。——译者注

报告人一致强调说，七月起义后各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作得更紧张了，主要是开展公开的工作，当局没有进行压制。第六次代表大会使所有人（看来，临时政府及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领袖除外）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正认真地执行在最近期间举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央委员会以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其结尾并非在炫耀词句。"宣言"（由布哈林撰文）的结尾说："……一场新运动即将来临，旧世界的丧钟敲响了，战友们，准备参加新的战斗吧！"（同上，第276页）

自由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她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这一警告。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偏见，认为布尔什维克即便夺得政权，他们也掌握不了政权，保持不住政权。列宁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驳斥这一偏见，书名是：《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没有做任何总结，没有夸夸其谈，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是：如果十三万地主治理过旧俄罗斯，那末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也可以治理新俄罗斯。列宁对敌人的主要论据——布尔什维克缺少"有文化的干部"，因此他们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复杂任务，不能掌握国家机器——所做的回答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并不想掌握国家机器。我们要打碎国家机器，连最后一个螺丝钉都要打碎，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将通过苏维埃这一新的政权形式治理新的国家。

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委员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怎样在实践中解释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否意味着把工作重点从党的合法机关转到党的秘密机关？另一个问题更微妙：两个首都确定哪一个为将来起义的中心，彼得格勒还是莫斯科？最后，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则上布尔什维克是否可以同苏维埃的其他政党达成反对右翼反革命势力的协议。

中央委员会对第一个首要问题所做的回答是正统的列宁式的

回答：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留在苏维埃中，但是要采取一切手段诋毁**现在的**苏维埃，力争使其改选。甚至要参加莫斯科国家会议（8月12—15日）这种合法机构，在那里右派将军科尔尼洛夫和卡列廷将同所有四届国家杜马的代表以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等人齐集一堂。到这种地方去是为了在会上组成布尔什维克派，任务是制定一份宣言，“会议开幕前宣读这份宣言，然后退场以示抗议”。（《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210页）

布尔什维克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正式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猜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意图，于是开除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所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利用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宣布莫斯科会议开幕那一天为政治总罢工日。

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四十多万工人响应了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同上，第211页）。莫斯科取得了一次出乎意料的重大革命胜利，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莫斯科比彼得格勒保守得多（因此国家会议才在这里举行）。这个胜利迫使列宁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一段时间内）他所制订的夺取政权的战略（起义的中心地点问题）。8月19日列宁写道：

“在莫斯科会议闭幕以后，在罢工以后，在7月3—5日的事变以后，莫斯科就有或可能有**中心**的意义。在这个比彼得格勒大得多的无产阶级的巨大中心，完全有可能产生象7月3—5日那样的运动……1917年7月3—5日，在彼得堡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是不正确的……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现在莫斯科如果爆发自发的运动，口号就应当是夺取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7、78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0—241页。——译者注

在如何对待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临时同盟和达成临时协议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与列宁不同。7月3—5日事变后列宁原则上拒绝同这些政党保持任何联系和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与此相反，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却认为，现在，正当传说科尔尼洛夫准备发动之时，同这些政党保持联系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有益的。8月14日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开会时有人报告说，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两名孟什维克，两名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名总部的人。在那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决定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情报联系"，鉴于谣传右翼在策划阴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成立了由所有苏维埃政党参加的"情报局"。情报局正式邀请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参加该组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参加情报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1页）。

中央委员会的这一行动遭到了列宁的强烈反对。他在《关于阴谋的谣言》一文中谈到过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这一行动，他写道：

"……群众明确地认识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叛行为，**同他们完全断绝关系**，一切革命无产者……无条件地抵制……他们……"列宁要求，"如果真有过联盟，那就必须解除中央委员或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必须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把正式解除他们职务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7页）① 中央委员会没有理睬列宁的这一要求。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39—240页。——译者注

第十二章

中央委员会对列宁起义计划的反对

不过，列宁很快（整一星期之后）就改变了他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策略，改变得如此突然，如同科尔尼洛夫讨伐彼得格勒这个新事变的发生一样。不过，在科尔尼洛夫进攻之前，在8月21（把里加交给了德国人）至8月25日（科尔尼洛夫进攻开始）这段期间里列宁并不想妥协。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列宁给中央委员会送过"关于攻克里加的传单"，在这个传单里列宁提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的口号。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出版这些秘密传单，公开号召推翻政府。列宁建议以"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签署这些传单，以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合法报纸有被查封的危险。列宁所做的说明是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写道：

"我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思想是严重的，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印发秘密传单。"（《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86页）①

但是，如上所述，科尔尼洛夫的进攻不仅使总的局势骤然改变，而且也使列宁的策略急剧改变了。这段时期列宁的政策堪称为策略艺术之佳作。科尔尼洛夫的进攻并非是一次贪图功名的军事冒险。他想制止布尔什维克发动第二次起义，里加失守后列宁便开始号召中央委员会举行这一起义（见列宁上述著作）。科

---

① 见《列宁文稿》第2卷第408页。——译者注

尔尼洛夫认为，把克伦斯基要求调来加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用来同革命的极端主义作斗争倒很不错。所以，当最高指挥官科尔尼洛夫将克雷莫夫将军的第三骑兵军调往彼得格勒的时候，他要求在后方没有彻底恢复秩序以前，能让他掌管全部军事和民政权力。在科尔尼洛夫看来，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无疑是导致混乱的因素。对于科尔尼洛夫的这一要求，克伦斯基所做的回答是，免去他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并要求苏维埃给他以援助，而苏维埃又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求援。这是俄罗斯史无前例的错误。列宁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错误。

初看起来，布尔什维克似乎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利用科尔尼洛夫暴动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要么支持克伦斯基（作为次等敌人）反对科尔尼洛夫。二者必选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做抉择时更不允许感情用事，不能对克伦斯基产生报复之心（他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并且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赶入地下），而要现实地考虑问题，——这才是在解决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对于克伦斯基的命运是如此，而且对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也是如此）的问题时布尔什维克所应采取的态度。托洛茨基写道：

“大家都明白，如果科尔尼洛夫进城来，他首先要杀掉被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39页）

克伦斯基所面临的抉择更为复杂：要么向科尔尼洛夫投降，那样军事专政就会获得胜利，说不定旧制度还会复辟；要么依靠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左派革命战线，同科尔尼洛夫进行公开的斗争，那样科尔尼洛夫可能被击溃，但是将来有可能建立起布尔什维克专政。

无论是克伦斯基政府，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

埃，都过高地估计了第一种前景的危险，而对第二种前景的危险估计不足。在这方面科尔尼洛夫将军本人也对他们起了推动作用。科尔尼洛夫调克雷莫夫将军去彼得格勒时说，“如果需要，克雷莫夫会毫不犹豫地绞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体成员”（《鲁柯姆斯基将军回忆录》1922年柏林俄文版第228页）。“绞死苏维埃全体成员”，这不仅意味着绞死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也要绞死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苏维埃的领导人不喜欢这种前景，他们情愿选择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前景，何况布尔什维克能否胜利还是个问题。列宁一如既往，把这一问题同夺取政权联系了起来：从夺取政权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是否可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从而给克伦斯基以间接的支持呢？这样做会使布尔什维克更接近政权还是更远离政权呢？8月30日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下述策略方针：

“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弱点。这是差别。这个差别虽然很小，但是非常重要，因而决不能把它忘记……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向克伦斯基提出‘局部要求’的鼓动，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堡工人……制定地主土地转交农民的法律，实行工人……的监督……如果认为我们这样就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侧面接近。此刻与其说应该直接鼓动反对克伦斯基，不如说应该间接鼓动反对他，所谓间接就是要求积极而又积极地、真正革命地同科尔尼洛夫作战。**只有这个战争的发展能使我们掌握政权**，但鼓动时应该少说这些话。”（《列宁全集》俄

文第5版第34卷第120—121页）①

应当指出的是，中央委员会从8月25日危机的第一天开始，就不管列宁如何，制定和执行了近似于“有条件地支持”克伦斯基的政策。因此，列宁在这封信的附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同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工人日报》）最近六天（从危机开始算起）的政论文章完全是不谋而合（同上，第121页）②。诚然，中央委员会里曾经有过一个不大的派别，他们主张无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甚至主张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同盟（同上，第119页）③，但是收到列宁这封信后，就再没听到有关这一派别的任何消息了。

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同反革命进行人民斗争委员会”并邀请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参加这一委员会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8月29日中央委员会向各地方党组织发电报，解释为什么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骤然改变态度。电报说：

“为击退反革命势力，我们在技术和情报方面同苏维埃进行合作，但是政治路线保持完全独立。”（《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1917年7月5日—11月5日”俄文版第44页）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始在彼得格勒工人区中积极组织工人战斗队和红色近卫军。他们从政府的仓库甚至直接从工厂领取武器。例如，普吉洛夫斯基工厂给红色近卫军提供了一百门大炮（《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220页）。布尔什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8—28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81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7页。——译者注

维克抽出七百多名教官对红色近卫军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同上）。在这些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充分展开工作，这一次他们是得到政府及苏维埃的官方支持的。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利用科尔尼洛夫暴动和暂时同政府、苏维埃打交道的时机，武装了国内要地的所有支持者。在莫斯科区域、中部工业区、在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外高加索、顿河、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波罗的海沿岸各地都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和红色近卫军。

托洛茨基的看法完全正确，他写道："奋起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即是未来十月革命的军队。"（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39页）不言而喻，临时政府释放了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为首的全部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关于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起诉的命令虽然形式上没有取消，但是，同从前一样，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搜捕。季诺维也夫甚至出席了公开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8月30日科尔尼洛夫的进攻一枪没放就失败了，而前来觐见克伦斯基的克雷莫夫将军在觐见后一小时开枪自杀。科尔尼洛夫被逮捕，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武装队和红色近卫军却保留了下来。当初把他们武装起来的人，现在却无力解散他们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是一箭双雕：粉碎科尔尼洛夫，进而打垮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现在要来决定克伦斯基本人的命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想从参加粉碎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一事中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即在改变首都苏维埃中党派成分这一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已经捞到了资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改选时，布尔什维克和同情他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多数。1917年9月24日中央委员会决定提名托洛茨基任彼得格勒苏维埃

主席（《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69页）。9月25日苏维埃批准了这一决定（另一名中央委员诺根被任命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由于科尔尼洛夫失败，布尔什维克才取得了这一胜利。

不过，虽然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利用它夺取政权却是困难的，因为现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正在寻求使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脱离临时政府的办法和途径，并迫使它组成纯粹的苏维埃政府，即便不吸收布尔什维克参加也行。这种机会竟然出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改组临时政府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应当参加临时政府，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声明说，他们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利用这一局面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妥协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意组织纯粹的苏维埃政府，而布尔什维克则同意放弃立刻将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

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按着加米涅夫报告的精神通过了"论政权"的决议，并把这一决议提交给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提出了下述要求：

1．取缔临时政府，建立"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

2．颁布命令，建立民主共和国；

3．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不付赎金；

4．实行工人监督制度；

5．宣布秘密条约无效，立即建议和谈；

6．停止镇压布尔什维克；

7．在前线废除死刑，选举政委；

8．实行民族自决权（芬兰、乌克兰）；

9．解散国家苏维埃和国家杜马；

10．消灭各阶层（贵族）的特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记录》俄文版第37—38页）

9月1—3日列宁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这一妥协建议。这篇文章就叫《论妥协》。列宁写道，一般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承认任何妥协。列宁说，不管革命者听到这些话会多么引以为荣，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曾有过被迫的和自愿的妥协，但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妥协时，他们仍忠于自己的原则。列宁写道：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的就是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农，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34—135页）①

中央委员会"论政权"的决议案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获得通过（二百七十九人赞成，一百一十五人反对，五十人弃权）。这项决议案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也获得通过（三百五十四人赞成，二百五十二人反对）。但是在上一次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1917年8月31日举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作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手腕而否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57页）。

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执政内阁（五人理事会）组成以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支持这一内阁。在这之后列宁写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0—301页。——译者注

道：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给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5卷第34卷第262页）①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保留了下来，但是现在这一口号已经被当作起义的口号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列宁认为，是时候了，应该把起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增长的同时，党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下述官方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时　间	党员人数
1917年2月	23 000
1917年4月底	80—100 000
1917年8月初	240 000
1917年10月	350 000

（引自《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244页）

布尔什维克的分布情况是：

莫斯科及莫斯科区域——70 000（20%）；

彼得格勒及其省——70 000（17%）；

乌克兰、西南前线及罗马尼亚前线、黑海地区——60 000(17%)

波罗的海沿岸、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驻芬兰的俄罗斯部队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0页。——译者注

——30 000（8.5%）；
白俄罗斯和西部前线——30 000（8.5%）；
伏尔加河流域——20 000（5.5%）；
高加索、高加索前线、顿河流域——20 000（5.5%）
西伯利亚和远东——15 000（4.5%）；
其他——10 000（3.5%）

（材料来源同上）

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所领导的红色近卫军也壮大了。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红色近卫军已逾二万，莫斯科近一万，其他城市也有成百上千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工人中总共有二十万红色近卫军战士（同上，第264页）。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也在迅速增长。从第十二军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报告说："大多数士兵站在我们一边。整团整团的士兵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了。"从第五军向中央委员会发出的报告说："军队中大多数人只相信布尔什维克。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同上，第272页）党的官方历史学家对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军队中有所增长一事做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说："甚至连前线司令员和大本营的代表都不得不承认，军队不听命令，不想继续打仗，他们只听布尔什维克的话。"（同上，第272页）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布尔什维克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合法性和不受惩罚的规定，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同一宣传内容：不惜任何代价缔结和约，让士兵返回家园，在这之前，先立即废除前线的死刑制度，政委和指挥官不应由上面指定，而应由普通士兵选举产生！1917年3月1日发布的关于实行军队民主化的著名"一号命令"（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起草），成了布尔什维克争取军队的有力工具。

苏哈诺夫鲜明地描绘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俄国的总形势："中央政府没有做任何管理和组织工作，地方政府更是如此。政府机构完全瘫痪了。但是全国人民都活着。他们要求建立政权，要求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现在根本没有可能谈土地政策。甚至连上层对土地问题也讳莫如深，而下层的骚乱已达到极限。冬宫里连一个负责人和部长（农业方面的）也没有，贪婪和饥饿的农民在全国掀起了洗劫浪潮。食品供应也不妙。我们在彼得堡搞过火了，于是饥馑接踵而至，并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但是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组织工作等于零，而政治方针所产生的后果又是负值。一两天内士兵就会从前线全部逃走，因为饥饿严重地威胁着他们。所有工业中心罢工接连不断，似乎俄国所有无产者都分别参加了罢工。铁路的状况也很危险。由于缺煤，通车里程减少了……全国各种倾向和观点的报刊，从上到下，一齐高呼：经济快要崩溃了。行政管理也瘫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些地方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能干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现在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一个依据全国准则和首都的指示行事的合法当局。"（苏哈诺夫《革命札记》俄文版第6卷第73—75页）

这怎能不使人回想起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基本规律"呢？把上面所描绘的1917年10月前夕的俄罗斯形势同列宁关于这一规律所讲的话做一番比较吧。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写道：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

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23页）①

当列宁9月12—14日，9月13—14日，9月29和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四封信，坚决地、断然地提出立即夺取政权问题时，国内的情况正是如此。列宁的这几封信除具有原则性意义外，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因为这几封信揭示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就是否及时夺取政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是何其尖锐。在夺取政权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三派：

1．托洛茨基派主张：要夺取政权，但是必须在10月20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进行（后来代表大会改在10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开幕的日期是由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的）；

2．列宁派主张：不等代表大会召开，立即夺取政权；

3．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主张：在目前的条件下夺取政权是冒险行为，会给革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1917年9月12—14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民主会议开幕前夕）中写道：

"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把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包括莫斯科省）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在这一方面进行宣传鼓动而又不致在报刊上泄露出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39—240页）②

9月13—14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第二封信，标题是：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封信象是一篇专门谈战略战术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应为：**怎样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起义是一门艺术。他的具体建议是："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9月15日民主会议要在那儿开幕。——作者），占领彼得巴甫洛要塞（彼得格勒市中心涅瓦河上的要塞。——作者），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联系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7页）①

中央委员会对列宁的这几封信做了如何的反应呢？1917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可以对此做出回答。二十四个中央委员中有十六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人。会议主要和唯一的议程是讨论上述列宁的两封信。从记录中看出，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否决了列宁关于起义的建议。列宁这两封信只给中央委员会"在最近期间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策略问题"提供了借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5页）斯大林提出的"把这两封信发给较重要的组织加以讨论"的建议也未获通过（这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对列宁的信根本不予正面回答）。加米涅夫的提议也未获通过，他强烈要求否决列宁的信。他建议说：

"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信后，否决了信中提出的号召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9—10页。——译者注

有组织只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办事的实际建议，中央委员会重申，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任何上街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同上，第55页）

但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否决列宁方针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结尾部分同加米涅夫的决议案的提法是不谋而合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

“分管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军营和工厂中举行任何发动。”（同上）

中央委员会会议接着做出决定说：列宁的信只保留一份，其他全部毁掉。这一决定以六票赞成、四票反对、六票弃权获得通过。（同上）

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参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1917年9月14日至22日）也是一个错误。除苏维埃各政党以外，城市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合作社、工会、商界和苏维埃本身也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总计约一千五百人。1917年9月中央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参加这次民主会议以及是否参加这次会议所成立的机构——预备议会（共和国的临时苏维埃）问题。9月3日中央委员会通过参加民主会议的原则性决议。中央委员会在发给地方组织的通信中要求说，“要尽一切努力使参加会议的我党党员成立一个较大的团结的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与地方党组织通信集》，“1917年3月至10月”,1957年俄文版第35页）

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征得列宁的同意，列宁虽然不得不承认这项决议，但有很多条件。既然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参加民主会议，列宁就建议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宣读一篇简短的宣言，然后“我们……就应当立刻把我们整个党团

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在那里，我们应该……说明我们的政纲，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就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政纲，要就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7页）①

不言而喻，列宁也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参加预备会议。9月21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讨论了列宁的这些要求，十七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哈林等人。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记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关于民主会议问题所做的决定是：不退出这次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65页）关于预备议会问题，会议以九票赞成、八票反对通过了不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但是因为两种观点的票数接近，所以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定夺，并选出了两位报告人：赞成抵制预备议会的报告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抵制预备议会的报告人是李可夫。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还说："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上以七十七票赞成、五十票反对通过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同上，第65页）只有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拥护列宁的抵制策略。列宁写道："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2页）②

但是列宁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继续接二连三地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写信、字条和文章，说明必须纠正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必须拒绝参加民主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页。——译者注

会议。在《我们党的错误》一文（不过，党中央机关报没有采用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这篇文章才首次发表）中列宁写道："应当抵制民主会议，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都犯了错误……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应当参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同上）① 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列宁也批评中央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摇摆不定的立场。他说："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同上，第263页）② 从 9 月 12 日起，列宁几乎在每封信中都坚决地提到起义问题。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中央委员会应有的注意。于是列宁又在 9 月29日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要么中央委员会接受列宁的关于立即举行起义的建议，要么列宁退出中央委员会。下面是这封信中的最主要段落：

"如果我们立刻从彼得堡、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末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以小于 7 月 3 —5 日的牺牲换得胜利……如果……在目前这样的良好时机也不夺取政权，那末一切关于政权归苏维埃的言论就都是谎话……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时起就坚持实行这个方针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斯大林主办的中央委员会报纸。——作者）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让给孟什维克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9 月25日选举了由四名布尔什维克、两名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名孟什维克所组成的'联合主席团'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页。——译者注

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作者）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2—283页）[①]

中央委员会对列宁的最后通牒反应如何呢？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既没有提到列宁的这封信，也没有提到中央委员会是接受还是否决列宁的辞呈。官方历史著作也回避这一问题。唯一提到这件事的历史文献是中央委员布哈林的回忆录。早在列宁生前，在一次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晚会上布哈林说：

"信（指列宁的信。——作者）写得非常坚决，他在信中威胁说，我们要受到各种处罚。我们都惊呆了。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把这一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烧毁列宁的这封信，大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虽然我们相信，我们无疑会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政权，但是我们认为，在地方上我们还无力达到这一目的。"（引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德文版第601页）托洛茨基在评论布哈林的这些话时说，中央委员会没有一致通过决定烧毁列宁的这封信。然而托洛茨基搞错了，因为他援引的是中央委员会9月15日的会议记录（《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55页），那里边记载的是讨论列宁前两封信的有关情况。托洛茨基还提到对这两封信所进行的表决结果（决定只保留一份：六票赞成，四票反对，六票弃权）。而布哈林讲的是9月29日列宁写的第三封信。（这封信是《危机成熟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67—68页。——译者注

一文的附言，只供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和苏维埃成员阅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0--283页)[1]

9月29日的信还是起作用了。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在下一章里再谈。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68页。——译者注

第十三章

中央委员会——革命的组织者

列宁依靠托洛茨基（列宁说："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取得了初步的、具有重大策略意义的胜利：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一致通过（只有一人反对，可能是加米涅夫）决定：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读完有关宣言后就退出预备议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76页）。1917年1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根据中央委员会这一要求，在读完说明理由的宣言后退出了预备议会。布尔什维克在宣言中提出了关于政权（苏维埃）、土地、和平等人们熟知的要求。

宣言的内在含义比正文还清楚——这就是抵制民主和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专政。

就在10月7日那一天，列宁根据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3日做出的专门决议（《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74页），从芬兰的秘密住所返回彼得格勒，以便象记录中所说的那样，"有一个经常和紧密的联系。"（同上，第74页）从此列宁就开始直接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现在他能有机会同中央委员会及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见面了。他所得到的消息也更加充分了。为了以防万一，列宁剃掉胡须，化了装，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斯米尔加（芬兰省军队、舰队和工人委员会主席）搞了一个名字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的工人身份证。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8页）①列宁的斯摩尔尼大学出入证上写的也是伊万诺夫的名字，斯摩尔尼大学是公开的布尔什维克中心所在地。虽然列宁说，他需要一个假身份证，"以防万一，因为很可能发生'冲突'和'遭遇'"，（同上，第268页）②但实际上却未必有这个必要。临时政府早已不再搜捕列宁了，而中央委员会早在9月6日就建议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说(《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74页），如果他们两人同意，就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在交保的前提下，不要再追究他们的责任(1917年9月4日托洛茨基也被保获释)。但是列宁却认为"不公开身份"更好些。

列宁回国后三天，即1917年10月10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终提出了起义问题。这次会议是在孟什维克国际派分子苏哈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他当时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任编辑。十月革命的敌人苏哈诺夫的住宅怎么竟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场所呢？苏哈诺夫是这样解释的：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齐集一堂……噢，欢乐的缪斯历史女神又在开玩笑了！这个最高级的决定性会议竟在我家(卡尔波夫大街32楼31号)召开了。然而，这一切事前我是一无所知的。我象从前一样，经常在报馆或斯摩尔尼附近过夜，离卡尔波夫大街有八俄里远。那一天在我的住所外采取了特别措施，至少我妻子仔细地打听过我的意图，她友好地、无私地劝告我说，下班后可不必回家。总之，这次高级会议确保不会被我发现……"（苏哈诺夫《革命札记》1923年俄文版第7卷第33页）

---

①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56页。——译者注

列宁戴着假发，拿着那个写着伊万诺夫名字的身份证来到会场。季诺维也夫戴的是假胡须，没戴假发，身份证也是假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季诺维也夫从9月开始，平安无事地参加过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人甚至想给他作保，让他公开身份，但是中央委员会不同意他和列宁分开）。苏哈诺夫在自己的表述中有一处错误和一处遗漏。他所遗漏的是，他没有说明他的妻子苏哈诺娃一弗拉克谢尔曼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人员（《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301页）。官方历史学家说，正是因为弗拉克谢尔曼是苏哈诺夫的妻子，所以苏哈诺夫的住宅“从保密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同上，第301页）

苏哈诺夫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齐集一堂了。然而比苏哈诺夫回忆录晚些时候发表的中央委员会记录却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中央委员参加了1917年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我们知道，第六次代表大会共选出二十一名中央委员，后来又有三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这就是说，中央委员已有二十四人。在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会议参加者的排列顺序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柯伦泰、布勃诺夫、索柯利尼柯夫、洛莫夫（奥波柯夫）。象往常一样，被托洛茨基称为“十月革命总书记”的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了会议（实际上斯维尔德洛夫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是全党上下的实际领导人）。

从会议的议程上却看不出什么“历史意义”来：

议程是：（一）罗马尼亚前线

（二）立陶宛人

（三）明斯克和北部前线

（四）目前形势

（五）州代表大会

（六）撤军

之所以提出这些实际问题和策略问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掩盖对整个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个问题，即关于目前形势问题。列宁就这一问题做了报告。他现在可以亲自陈述发动起义的理由了。他的主导思想是：起义的政治条件早已成熟，但是在党内“从9月初开始就发现有人对起义问题漠然处之……这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很尖锐，关键时刻就要来到……群众之所以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那是因为长篇大论和各种决议使他们感到厌倦了……夺取政权的政治条件业已完全成熟……现在应该谈技术问题。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然而我们却步护国分子的后尘，总是把系统的起义准备工作看成是某种政治过错。等预备议会是毫无意义的，它显然是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84—85页）

只有三个人参加了辩论，而且所谈的题目还不是关于武装起义的原则问题，而是谈有关地方状况的情报问题（洛莫夫、乌里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对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进行了表决，决议案的内容是：所有外部和内部形势都“要求把武装起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势在必行，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党组织以此为指南，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所有一切实际问题。”（同上，第85—86页）十人对决议案投了赞成票，两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决议是由少数中央委员通过的（十人赞成，两人反对，十二人缺席）。缺席的重要中央委员之中，两人——李可夫和诺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一定会站在反对者一边，另一个有名气的中央委员米柳亭也会和他们站在

一起的（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612页）。会上捷尔任斯基建议，“为在近期进行政治领导，应成立由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记录中写道，政治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等七人组成。（《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86页）

托洛茨基说，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政治局，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历史》德文版第616页）。会议没有记录起义日期，但托洛茨基说，口头商定的是10月15日发动起义（斯大林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十月起义正是在10月25日这个预定日期举行的）（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616页）。

决议中有一点很重要、很说明问题：为什么要急于发动起义呢？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列举了有利条件，也指出了一个能使起义失败的不利条件。决议中对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和平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他们企图扼杀俄国的革命。”（《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86页）除“和平受威胁”外，还有另一个威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正在拟定土地分配草案，可能要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平和土地——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全部战略的两大支柱。

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起义决议后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州委员会；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和北方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说，他们反对起义。他们写道："据说：（一）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算了吧！两种说法都不正确，全部问题正是如此。”（同上，第88页）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没有产生实际后果。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机器有条不紊地开动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

料到，他们竟会为给这部机器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合法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起了促进作用。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前一天，即10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举行一次会议，当时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已占多数。这次会上谈到，首先，必须对彼得格勒军事司令部的活动实行监督（有人指责彼得格勒军事司令部说，它想把革命卫戍部队调离彼得格勒），其次，建立革命城防委员会来动员居民保卫彼得格勒。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样做，但是后来他们自己也提议：

1．成立由苏维埃主席参加的"委员会"，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主管，不管调离多少部队，均需征得该"委员会"的同意；

2．清除指挥官中的右翼分子；

3．成立彼得格勒革命城防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欣然通过了这一提议（十三人赞成，十二人反对）（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38页）。当天举行了苏维埃全会，会上人们发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还不够彻底。苏维埃全体会议的记录说，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至于彼得格勒"革命城防委员会"，因为"它能汇集有关保卫彼得格勒及城郊的一切资料"，所以应当成立该委员会（引自决议）。

就这样，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下，为建立起义的合法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打下了基础。这个机构于10月12日正式成立。只有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成员知道成立的是起义机构，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成员还以为成立的是他们所建议的机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托洛茨基竭尽一切努力迷惑他们。甚至在关于委员会任务的决定中布尔什维克也将其真正的目的巧妙地掩藏起来。但是，只有非常幼稚的人才看不到成立这一机构的真正目的。那末，让我们看看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怎样说

的吧：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最近任务是：分配军事力量和保卫首都所必需的辅助工具；统计彼得格勒及其郊区卫戍部队人员的数字；还要统计装备和食品；制定保卫城市工程计划；采取措施使城市不受破坏、防止临阵脱逃；使工人群众和士兵保持革命纪律。军事革命委员会负责召开卫戍部队会议，各兵种均派代表参加。卫戍部队会议的任务是协助军事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它所采取的措施，向军事革命委员会提供有关地方形势的情报，确保革命委员会与各部队之间的紧密联系。”（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40—41页）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首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齐米尔，不言而喻，他并不知道他所领导的机构竟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起义的合法司令部！然而他周围的布尔什维克却知道事情的真谛。他们是托洛茨基、副主席波德沃伊斯基（起义前夕他正式取代了拉齐米尔）、委员会秘书安东诺夫一奥甫谢因柯、委员涅夫斯基、尤列涅夫、梅霍诺申（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秘密工作者们把这个委员会组织得多么妥善啊，他们还在委员会里成立了妙不可言的辅助机关。这就是委员会下属的几个部：（一）保卫部，（二）供应部，（三）通讯部，（四）情报部，（五）工人民警部，（六）报告部，（七）警卫司令部。（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41页）委员会紧紧依靠卫戍部队的十五万士兵（《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14页）。

总之，现在列宁成了一个比克伦斯基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护国派分子”，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近两周时间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支配彼得格勒的权力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尤其令人吃惊。

1917年10月16日（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举行会议讨论武装起义（如果象托洛茨基所说，武装起义的日期是定于10月15日的话，那末这个日期就误事了）。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铁路及彼得格勒区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局）有关负责人一同开会。会议没有记载与会者的姓名，但是从投票情况可以看出，参加会议的共有二十五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斯克雷普尼柯、约费、米柳亭、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当时在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于10月16日这一天批准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彼得格勒郊区的列斯诺夫斯基－－乌捷利宁区杜马所在地举行，当时该区杜马由布尔什维克所控制（主席是加里宁）（《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06页）。

在这次会议上，列宁阐释了10月10日通过的起义决议，而中央委员会和上述组织的代表报告了起义的技术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情况。党的参谋总部没有头脑发热，而是冷静、实事求是地权衡了准备工作的优缺点。从乏味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和他的学生们对待起义就象对待艺术一样，他们对这门艺术的掌握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也有人持悲观态度，不相信事情会一帆风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被信心十足的起义派的喧哗所淹没。

列宁没有发表任何原则性的新见解。他只指出，现在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发生一场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要么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他说，群众不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夸夸其谈，而是要他们在“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采取行动。列宁在进一步做结论之前，想先听一听地方布尔什维克中心的报告。而且他还意

味深长地补充说："不能以群情为准则，因为它反复无常，变化莫测。"（《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94页）

斯维尔德洛夫（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报告说，党员的总数已发展到四十万人（这是个夸大的数字），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军队和舰队中的影响都在扩大。

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领导人鲍基汇报了首都各区的情况：

瓦西里也夫斯基岛——群众没有战斗情绪，但是战斗准备工作在进行。

维堡区——正在准备起义，军事苏维埃已成立。

第一市区——已有了红色近卫军，但是群众情绪很难断定。

第二市区——群众情绪较好。

莫斯科区——苏维埃的号召能立即得到响应，党的号召则不会得到响应。

那尔夫区——群众没有急于发动的情绪，但是党的威信没有下降。

涅瓦区——所有人都会跟苏维埃走。

奥赫坚区——情况不妙。

彼得堡区——观望态度。

圣诞节区——同上。

波罗霍夫区——群众情绪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方面转化。

什利谢利布尔格——群众情绪有利于布尔什维克。

克雷连柯代表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局做报告说，军事组织局对卫戍部队的状况看法不一，但是他个人认为，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是倾向我们的"。

彼得格勒州组织代表斯捷潘诺夫声称，他们那里"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士兵拥护布尔什维克。沃洛达尔斯基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言说，"没有一个人急于上街，

但是只要苏维埃一声令下，所有人都会响应”。工会（五十万会员）代表施密特说，“我们党的力量占优势……群众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五金工人协会代表施略普尼柯夫（前中央委员）指出，在他们那里，布尔什维克占优势，但是，“布尔什维克发动不得人心，这种谣传甚至引起过混乱”。

斯克雷普尼克代表工厂委员会说，人们希望把语言转变为行动，领导已落后于群众。施密特补充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的工人倾向布尔什维克，下层邮政工作人员拥护布尔什维克。

斯维尔德洛夫补充说，由于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莫斯科正在采取措施，查明起义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93—97页）。

会议听取了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报告后展开了“关于目前形势”的讨论。二十一人在讨论时发了言，其中有些人几次发言。米柳亭和绍特曼说，党还没有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现在举行发动还为时过早。斯卡洛夫说，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不能举行起义，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该夺取政权。沃洛达尔斯基也认为，应当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夺取政权问题。鲍基的立场也是悲观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复了他们的旧观点，坚决反对起义，起码反对在最近几天举行起义。季诺维也夫说：“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在最近五天内不举行起义。”加米涅夫说，决议已通过一周，但是没有做好任何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一周的结果表明，“我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加米涅夫在另一次发言中间接地证实了托洛茨基关于起义定于10月15日举行的说法。加米涅夫说：“从前说起义应在20日前举行，而现在又谈起革命的方针来……决定起义是冒险主义。”斯大林驳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

也夫说，他们对起义所采取的观望态度只能帮助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但是“起义日期应当定得合适”。其他发言的人也都支持立即举行起义的方针。

讨论之后提出两项决议案付诸表决：

1．列宁的决议案：“会议十分欢迎和完全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会议号召所有组织、工人和士兵全面地积极地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支持中央委员会为起义而建立的中心机构的工作。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起义的有利时机和合适的办法。”

2．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不放弃侦察和准备工作，但是在未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商谈之前，不允许进行任何发动。”

表决列宁的决议案时，十九人投了赞成票，两人投了反对票，四人弃权。表决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时，六人投了赞成票，十五人投了反对票，三人弃权（《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97—104页）。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管你有多么充分的理由，违反党的纪律皆被视为莫此为甚的罪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党内的级别越高，所负的责任就越大。因此，连列宁在党内最高机关里处于少数时，他也只进行内部辩论，而从未公开反对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当列宁想违反这一纪律原则时，他就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以便能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随意反对中央委员会及其对他无用的决议。

10月10日和16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票反对起义后，又在党外报纸《新生活报》（高尔基和苏哈诺夫所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中央委员，他们违反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条铁的纪律。10月18日加米涅夫写道：“不仅我和季

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许多其他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认为，在目前社会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在几天后即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是不允许的，这样做会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灾难。”（《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16页）

这篇文章使列宁勃然大怒。看来，列宁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也大为恼火。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起义)‘不是十来个人所能解决的’。”列宁还写道：“加米涅夫恬不知耻地喊道：‘中央垮台了，它一星期以来什么事也没有做。’（而我不能加以驳斥，因为要说出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断然要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对这一点只可以而且应该作出这样的答复，——中央委员会马上做出决定：……中央委员会把他们俩人开除出党。”列宁补充说：“在写到关于过去的亲密的同志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很痛心的，但是我认为在这里犹豫就是犯罪……只有自己人才能成为叛徒。”（《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24—426页）①

列宁10月19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不仅没有引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特别注意，而且也没有引起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注意。不错，10月16日(列宁写信前三天)加米涅夫曾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以此回答中央委员会新通过的起义决议，但是中央委员会当时还没有研究这一声明。

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又召开一次会议。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约费、斯维尔德洛夫、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4—206页。——译者注

米柳亭、柯伦泰参加了会议。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列宁所做的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下面是讨论会上饶有兴味的几段对话：

斯维尔德洛夫：“中央委员会无权从党内开除……应当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

斯大林：“列宁的建议应由中央全会决定，建议目前不予解决。”

米柳亭：“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但是我要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

托洛茨基：“我认为，加米涅夫的辞职应予接受。”

斯大林（再次发言）：“我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认为，开除出党不是个好办法，建议将他们留在党内。”

讨论结果，列宁关于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被否决，但是接受了加米涅夫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要求（五人赞成，三人反对）。（《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06—107页）

然而，对加米涅夫辞职的决议后来也做了修改。加米涅夫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1917年10月24日起义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同上，第119页）。

斯大林积极袒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这不仅可以从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看出来：他背着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副总编索柯里尼柯夫在该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致编辑部的一封信，季诺维也夫在这封信中说，“我对有争议问题所持的真实观点还远远不是列宁同志所批驳的那些观点”，并建议“将我们之间的争论推迟到更为合适的时候进行”，这是第一。第二，斯大林给

这个声明写了一篇明显的反列宁的编辑部注释："我们希望，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表这一声明之后（还有加米涅夫同志在苏维埃的声明），问题就算结束了。列宁的措辞激烈的文章不能改变这一点，即我们基本上是志同道合的"（同上，第114—115页）。当大家在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知，斯大林这样做是擅自行动，而他的副手索柯里尼柯夫同列宁一样，认为他这样做是错误时，斯大林声明退出编辑部，但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批准他的辞职（同上，第108页）。

彼得格勒的报纸充满布尔什维克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人们不仅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到起义已经决定，而且从列宁本人发表在《工人之路报》上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人们所猜测的是起义究竟定在哪一天。同列宁保持亲密关系的马克西姆·高尔基10月18日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不能沉默》的文章。他写道："有关10月20日'布尔什维克举行起义'的谣言甚嚣尘上。"他提醒说，不要让"7月3—5日的悲剧"重演。他还写道："人们被纷乱的生活、政治谎言和龌龊所激怒，他们所有的愚昧本性都暴露无遗了，他们会互相残杀，但却不会摈弃自己的愚昧行为。"他建议说，如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变成"寡廉鲜耻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手中的工具"，那末就应对起义的传闻进行辟谣。（苏哈诺夫：《革命札记》俄文版第7卷第46—47页）高尔基认为列宁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

然而，起义的政治特别是技术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召开了首都所有部队和舰队团连委员会会议。会上托洛茨基做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结果："10月21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一权力机关，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为直接指挥机关。"（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86页）苏哈

诺夫证实说："早在10月21日临时政府就被推翻了，在首都它已不复存在……"（同上，第95页）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用书面形式证实说，首都的执政者不是克伦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天苏维埃向所有卫戍部队发了电话记录，电话记录说："任何发给卫戍部队的命令，不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签字不能生效。"（同上，第101页）同时，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向彼得格勒居民散发了传单。传单的内容是：

"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给首都及郊区各部队和特别重要的居民点指派了政委。在这些地方，只有我们委任的政委所批准的命令才能执行。政委是苏维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同上，第109页）

由斯莫尔尼宫十八号房间（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所在地）领导的公开起义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采取行动呢？也许，包围十八号房间的居住者要花费很多力气？苏哈诺夫确有把握地说："一支五百人的精干队伍就完全可以消灭斯莫尔尼宫中的所有人了。"（同上，第109页）然而，临时政府不仅无力争夺政权，而且连生命也危在旦夕了。连临时政府的最可靠支柱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官兵（他们曾拒不承认也不接纳托洛茨基为政委）听完托洛茨基在卫戍部队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后也归附了布尔什维克。彼得巴甫洛要塞卫戍部队几乎一致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和准备举行起义反对临时政府的决议。当时要塞中约有十万支步枪。托洛茨基一席话，这十万支枪就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列宁说得对，彼得格勒的起义时机不仅成熟，而且已经熟透了。

1917年10月24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对举行起义事宜做了最后的指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诺根、洛莫夫、米柳亭、约费、乌里茨基、

布勃诺夫、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别尔津等十一名（总数二十四人）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记录的开头写着："加米涅夫同志建议，今天没有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准许，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通过。"（《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19页）可见，曾投票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现在，在决定其命运的时刻，却同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站在一起领导起义了。斯大林（大概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季诺维也夫缺席，原因不详。10月23日列宁写信给斯维尔德洛夫，谈了他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看来我不能参加全会了，因为现在正'抓'我。"（《十月武装起义》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6页）会上中央委员进行了分工，分头负责主要起义地点和主要攻击目标。决定：布勃诺夫负责铁路，捷尔任斯基负责邮局和电报局，米柳亭负责供应食品，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洛莫夫和诺根负责同莫斯科进行联络，加米涅夫和别尔津负责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谈判。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决定在彼得巴甫洛要塞成立起义后备总部（斯维尔德洛夫应同要塞经常保持联系）。因此决定给每个中央委员都发一张要塞的通行证（《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19—121页）。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及其分工，记录中没有提及。

1917年10月24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起义前的最后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列宁全集》俄文第

5版第34卷第435—436页）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没有讨论列宁的这封信。看来，这封信写晚了，因为我们从上文看到，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开始起义了。列宁是在起义准备工作已达高潮时来到斯莫尔尼宫的。官方历史学家写道：

“10月24日傍晚以前，列宁被迫留在一处秘密住所里。他一直在考虑起义的结局问题，三次派弗法诺娃给中央委员会送信……傍晚中央委员会联络员埃依诺·拉赫雅来了……列宁决定立即去斯莫尔尼宫。他换上衣服，用手帕把脸扎上，戴上假发和一顶破帽子，在傍晚离开了这最后一处秘密住所。”（《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卷第1分册第322页）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证实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占领首都的策略计划。他说：

“全城分为几个战区，由附近的司令部管辖。重要的地点有红色近卫军集结。他们同附近的军队保持着联系，那里的警卫连正枕戈待旦。每一次战斗的目标及为此所需的兵力皆已事先定好。”（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664页）

苏哈诺夫对他所见到的起义过程做了如下叙述：

“不曾有过反抗。从夜里两点开始，车站、桥梁、照明设施、电报局、通讯社就逐渐被从兵营里开出来的一小股一小股部队所占领。一小撮士官生不能也没有想抵抗。总之，战斗好象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市中心的换岗……开头的关键性的战斗完全是不流血的，没有任何伤亡记载……城市很平静。”（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160页）

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去北方前线调忠于政府的部队开往彼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译者注

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却说，克伦斯基是坐着挂有美国国旗的汽车逃走的），但是起义进展顺利，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二点三十五分斯摩尔尼宫举行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会上郑重宣布权力归以军事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有几个部长被逮捕，其余的部长在新的“独裁者”、克伦斯基的副手基什基内率领下盘踞在冬宫内进行抵抗。士官生和妇女突击营保护着他们。军事革命委员会建议他们停止战斗，缴械投降，但是他们不肯。于是著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于晚上九点四十分开始了象征性地炮击。这是向红色近卫军下令攻打冬宫。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冬宫投降了。布尔什维克十月起义完成了。起义中六人被打死，五十人受伤。（《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1分册第328页）

中央委员会开始讨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组成人员。托洛茨基回忆说：“应当成立政府，由我们几个中央委员组成。”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举行了短暂的会议。

“政府的官员叫什么呢？”列宁自言自语道。“无论如何不能叫部长，这是一个龌龊的老掉牙的名字。”托洛茨基建议把部长叫做“人民委员”，把政府叫做“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列宁搭腔说，“这太好了：革命味道浓极了。”

托洛茨基继续回忆说：“第二天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列宁建议任命我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建议使我感到如此突然和不恰当，以致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了起来表示反对。

“‘为什么？’列宁坚持己见：‘您主持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政权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取的。’我建议不经讨论就否决这一提议。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托洛茨基：《我的生涯》1930年柏林俄文版第2册第60—61页）

斯大林不允许公布所有这些中央委员会记录，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仍没有公布，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未否认过托洛茨基的上述说法。所有当时的材料都有力地证明，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所有中央委员中最一贯支持列宁的人。连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也写道：

“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皆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这样快地转向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搞得之所以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同上，第233页）

约翰·里德在他的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说，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指出（同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毫无二致），一开始，“知识分子中赞成举行起义的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3页）列宁为该书做序说，“这本书对所发生的事变做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写”。看来，本书对托洛茨基的作用所做的一切论证皆是多余的。

可是，1968年苏联出版了科学院院士明茨的一部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共二千零六十五页！书名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史》。该书第954页上有这样一段关于托洛茨基的话：“虽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起义的决议，但是他不承认起义是必然的，他没有做实际准备工作，没有参加过任何起义计划的制订工作。”仅这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明茨为首的苏联历史学家们在十月革命问题上所持的是伪造历史和主观主义的立场。

尽管如此，在分析十月革命时，仍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党的机器在革命中所发挥的卓越作用。没有列宁，这部机器照旧会开动，有时它甚至会居于列宁之上。至于托洛茨基就更无庸赘言了。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开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孟什维克唐恩宣布大会开幕（策烈铁里和齐赫泽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到高加索休假去了）。六百七十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布尔什维克三百人，社会革命党人一百九十三人（左派一百六十九人），孟什维克六十八人，统一派国际分子十四人，波兰社会主义者政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十人，其他党派代表四十九人，无党派代表三十六人（《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70、171页，1928年国家出版社出版；另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74页）。

大会选举了主席团，十四名布尔什维克、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三名孟什维克、一名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国际分子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约翰·里德写道：

“这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前任委员走下主席台，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诺根等人取而代之……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这些布尔什维克仅仅四个月前还是一个不被承认、受人通缉的小集团，现在却登上了驾驭伟大俄罗斯的最高宝座，真是一步登天。”（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俄文版第91页）

加米涅夫宣布大会议程：

1．组织权力机构，

2．和平宣言，

3．土地宣言。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要求代表大会批准已经举行的起义（第一天列宁没有出席大会）。对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左派除外）宣读了一份声明，抗议布尔什维克“搞军事阴谋和夺取政权”，之后便退出代表大会会场。这使布尔什维克一下子由少数（六百七十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原占三百名）变成了压倒多数（五

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三百名）。苏哈诺夫的看法全然正确，他写道：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处境变得好多了。现在没有任何反对派妨碍建立无产阶级政府了。”（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239页）

对于几个宣言的表决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号召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呼吁书几乎获得一致通过，两人投反对票，十二人弃权。代表大会的第二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从10月26日晚九时延续到10月27日早晨五时十五分。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两个报告：（一）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和平法令”，依据这一法令，新政府应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和约，不割地不赔款”，为此建议宣布休战三个月。会议还通过了土地法令，其内容完全是从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那里抄袭的（通过地方农民委员会将土地转归农民，不付赎金）（《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13—23页）。①

苏哈诺夫揶揄说：“列宁公然抢劫，他也未能好受。社会革命党人喊道：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妄自尊大地骂了我们十五年，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说我们不讲科学，可是你刚刚夺取政权，就实行起我们的纲领来！列宁反唇相讥：你们的党是一个不错的党，为了实现你们的纲领，就得把你们赶下台。”（见苏哈诺夫上述文章第257页）

在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时，列宁很清楚他的所做所为。俄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有把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宣布为法令的政党，才有可能在当时保住政权（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要求土地收归国有，后来政权得到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4、356、363页。——译者注

巩固时，他们实现了这一纲领）。列宁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他深信，目的（政权）可以为手段（抄袭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做辩解。不过，列宁自己也提到过民主。他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声明说：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作者），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同上，第23页）①

代表大会还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同上，第25页）②说政府是“临时的”，而且还提到立宪会议，这是一个绝妙的策略，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这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才有可能批准他们的一党政府，虽然布尔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占多数。1918年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已不再提“临时”和立宪会议了。（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75页）

参加政府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有：列宁（主席）、托洛茨基（外交委员）、李可夫（内务委员）、米柳亭（副主席）、诺根（商业和工业委员）、洛莫夫（司法委员）、斯大林（民族事务委员）。参加政府的前中央委员有：施略普尼柯夫（劳动委员）、泰奥多罗维奇（粮食委员）、戈列鲍夫—阿维洛夫（邮政、电讯委员）。建立了陆海军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三名军事工作人员安东诺夫—奥甫谢因柯、克雷连柯和迪宾柯所组成。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区联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委员。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5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1页。——译者注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参加政府，但是也分配了领导职务：加米涅夫任苏联议会——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总编（后来季诺维也夫取代了托洛茨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职务）。

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宣布了政府的组成人员。加入马尔托夫派（这个派别没有退出代表大会）的苏哈诺夫曾参加过批准政府成员的10月26日会议。他写道，所宣布的人之中，"大家只认识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大家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262页）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委员一百零一人，各党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所占名额是：布尔什维克六十二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二十九人，国际派社会革命党人六人，乌克兰社会主义党三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分子一人。当时通过决定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要吸收退出代表大会的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参加，但是这一决定却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75页）

在总结这场革命时，应当提出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同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果真如此吗？换句话说，十月革命就其宣布的纲领而论是社会主主革命吗？对这一问题只能断然回答说：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列宁的《四月提纲》吧，这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都说了些什么呢？一句话也没有说。文章说，俄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从把政权给予资产阶级的革命第一阶段向把政权给予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第二阶段过渡。文章没有说新政权将给自己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四月提纲》把"无产阶级"、"苏维埃"新政权的任务归纳为如下几点：

1．和平，

2．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

3．苏维埃国家对生产实行监督，

4．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并对其实行监督。

任何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会提出所有上述要求。依靠苏维埃的临时政府也会顺利地实现这些要求（监督生产——这在大战时期也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列宁本人在《四月提纲》中也写道：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16页）①

诚然，《提纲》中也有两点“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这两点要求在革命五十二年后仍没有实现。这两点是：

1．“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2．“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同上，第115页）②

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否会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呢？苏哈诺夫证实说：“布尔什维克说：‘财主们应有尽有，穷人却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归贫农，我们要把一切分光。这是你们工人阶级政党说的话，这是唯一同财主及其政府斗争、争取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政党……’但是这就产生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个‘纲领’是否包括社会主义？我是否忽视了社会主义？主要东西我是否注意到了？……不，**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当时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当作苏维埃政权的目标和任务**直接向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5—1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5页。——译者注

群众提出，而群众在支持布尔什维克时，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见苏哈诺夫上述著作第24页）

那一时期的所有文字材料皆能证实苏哈诺夫的话是对的，列宁的主张说明，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时的纲领和宣传，全然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这个近期目标。十月革命是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下组织和进行的。十月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朝着人民的民主面孔，一张是戴着面纱朝着党的反民主面孔。苏维埃只是掩盖一党专政的门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牢固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人民才看清苏维埃的假面具和革命的第二张面孔。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夺取国家政权呢？如果当初临时政府退出战争，宣布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的土地改革，那末俄国本来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即便不采取这些措施，只要临时政府当初宣布七月起义和接受德国钱一事的责任不仅应由个别领导人（列宁、季诺维也夫）来负，而且应由以中央委员会为首的整个党来负，并据此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那末十月革命也不会发生。而当时却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的意志”胜过了当时政权的“生存意志”。当然，还有另一个促使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纯主观因素，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绝妙的秘密机构——中央委员会及其基层组织。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写道：“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14页）① 这就是发生历史性大悲剧的基本原因——由于过分自由，致使自由的敌人逍遥法外，因此，民主俄国覆灭了。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译者注

第十四章

夺取政权后党中央的第一次危机

布尔什维克起义遇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抵抗：

一、克伦斯基组织第三骑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彼得格勒进军，攻占了加契纳（10月27日）、皇村（10月28日），直逼彼得格勒。然而，尽管克伦斯基本人做了一切努力，但无论整个军队，还是哥萨克本身（第三骑兵军团），都不愿意继续向彼得格勒挺进，去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据克拉斯诺夫将军称，哥萨克曾说："对付整个俄罗斯，光我们哥萨克人是顶不住的。如果全俄罗斯都同他们（即布尔什维克。——作者）一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克拉斯诺夫：《在内部战线》，《俄国革命档案》1922年柏林俄文第2版第1卷第171页）

二、在彼得格勒市内成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上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派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和市杜马的代表。委员会以社会革命党的著名领袖戈茨为首。这个委员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仅仅局限于一连串徒托空言的声明，而并无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抵抗的打算。著名的"革命民主党"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政变过程中和政变后的现在的表现一直都是极为令人吃惊的。它的领袖们——策烈铁里和齐赫泽，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苏维埃选举中获胜之后便"溜之大吉"，跑回家乡——高加索休假去了。代替他们领导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唐恩，则如著名的列宁传记作家戴维·舒布所指出的，“甚至在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前一天”还带领一个苏维埃代表团“进见克伦斯基并警告他，要他无论如何不得派哥萨克去镇压布尔什维克起义”，因为那将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内战”。（舒布：《自早年》，见《新杂志》1972年第107期第184页）

孟什维克——不过，这是孟什维克国际派分子——的另一位领袖马尔托夫，正如孟什维克的正式领导所做的那样，没有退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是继续积极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承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合法性。坚持留在代表大会上的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赞同了所有的列宁法令，虽然并未同意参加列宁政府（后来在11月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

正式社会革命党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在政变前夕到大本营去了。他对十月政变[①]的反应也应视为是奇怪之至的。10月30日，卢加市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团到加契纳来征询切尔诺夫的意见：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否正确？他们在头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保持中立并对开往两方面的梯队，即援助政府的梯队和响应布尔什维克号召而来的梯队，都一律自由放行。切尔诺夫批准了这项决议。斯坦凯维奇声明，他认为这一决定是对政府的背后一击，切尔诺夫的回答却是：“实际上，重要的一点是放行政府的梯队，因为大概是不会有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去的梯队的。”（《苏联国内战争史》1943年俄文版第2卷第376页；另见前面引用过的克拉斯诺夫著作第171页）

不错，正是那个唐恩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布尔

① “政变”或“十月政变”均指“十月革命”，列宁亦称“十月革命”为“十月政变”，但本书作者使用“政变”一词时，恐含贬义。——译者注

什维克政变，但也正是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政府。对此，托洛茨基不无根据地回敬道："我们**公开地**锻炼了群众起义的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如今有人向我们建议说：放弃胜利，签订协议吧。同谁呢？你们不过是几个可怜虫，你们不过是身败名裂的家伙，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请到你们从此应该呆的地方去吧：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册第49页）

三、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最有效反抗的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如遭布尔什维克拒绝，它就宣布举行全国铁路总罢工）提出了由所有的苏维埃党派组成"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行动纲领。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引起了分裂。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不仅有招致国家生活瘫痪的危险，而且可能破坏从彼得格勒派布尔什维克部队去反击进攻中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分发的电报《告全国同胞》中写道：

"国内没有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作为只依靠一党的委员会，是不可能在全国得到承认和支持的。必须建立一个新政府……"（《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70页）。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建议这个"新政府"要毫无例外地吸收从布尔什维克到右派"人民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社会党的代表。局势是那样的危险，以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不得不决定在中央特别会议上讨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中央特别会议于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举行。以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十一名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不知何故没有出席。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建立一个有一切社会党（苏维埃党）参加的政府

一事，在党中央的记录中写道："（一）付诸表决：中央确认必须扩大政府的基础并可能改变其组成情况（一致通过）。"（同上，第122页）在中央决议的第五点中说："就如下提案进行表决：我们将不就一切苏维埃党乃至包括人民社会主义派进入政府一事作最后通牒。七票赞成，三票反对。"（同上，第122页）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并违背列宁的意愿，接受了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由一切社会党"乃至包括人民社会主义派在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最后通牒。鉴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提出把政变的罪魁祸首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政府中清除出去作为自己进入苏维埃政府的条件，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汇编》的编者注释中有如下一段话："在秘书记录原稿中下面接着的是被勾掉的一句话：'（中央）**还商定放弃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候选提名，如果要求这样做的话**（通过）'。"（同上，第122页）这似乎"被勾掉的一句话"实际上以笼统的措词收入了中央决议的下一点，即第六点。它说："（六）表决如下提案：容许相互撤回党的候选人提名的权利。通过：五票赞同，一票反对，三票弃权。"（同上，第123页）为参加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商讨组织新政府，中央指派了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为同一目的指派了由斯维尔德洛夫、梁赞诺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扎克斯等人组成的代表团。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继续坚持成立联合政府的观点，而不惜把自己的主要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撤出政府作为代价。对中央的控制权有一段时间转入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为代表的民主派手中。他们每个人的官位（加米涅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诺根——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李可夫和米柳亭——人民委

员）使他们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独裁派的极其危险的竞争者。并且，新议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赞同了加米涅夫小组“关于我们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和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而列宁则指控加米涅夫小组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的这项决定是违背中央意愿并“背着中央委员会”搞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8页）① 列宁尤其顽强地致力于把中央新的多数宣布为“反对派”，并使其同领导隔绝。为此采取的惯用手法是：在上面，召开经过挑选的人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在首都和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这样，1917年11月1日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二十三人，其中中央委员十二人，另十一人则是“积极分子”（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和工会的代表、三名政府成员，但非中央委员）。在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条件问题作了报告（他们推举由右翼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或阿夫克谢尼耶夫代替列宁当总理，而以建立“人民苏维埃”取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府则对“人民苏维埃”负责）。

就加米涅夫的报告，托洛茨基声明说：

“从报告中看得很清楚，那些没有参加起义的党派是如何想要把政权从那些把他们推翻了的人手中夺回来……显然，我们不能给予撤消的权利，正如我们不能让出列宁的代表资格一样。因为放弃这点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25页）

捷尔任斯基说，“我们不容许撤回列宁和托洛茨基”。乌里茨基也这样说。加米涅夫对指责他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候选资格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2页。——译者注

问题上同反布尔什维克党派搞交易这一点的回答是，宣读上次大会的决定并证实说，代表团没有讨论候选人问题，没有搞交易，而只是听取了别人的意见；没有中断（谈判）的理由。（同上，第125页）

列宁激烈地声明：“加米涅夫的政策必须即刻停止。现在无需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费口舌。要派军队去莫斯科。”（同上，第126页）列宁补充说：“谈判应当作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同上，第127页）

季诺维也夫没有把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说：“对于我们，有两点是最后决断性的：我们的纲领，政权对作为权力源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负责。”（同上，第127页）

加米涅夫、米柳亭、梁赞诺夫主张继续谈判。经过广泛辩论，中央表决了一项原则提案：中止谈判。四票赞同，十票反对。记录中写道：“中央决定：继续谈判。声明：对于我们，纲领是最后决断性的。”（同上，第129—130页）

这就是说，最后决断的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是党的纲领。

从中央记录中还可看到，会议否决了列宁的关于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的过分强硬的决议案（同上，第129页），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妥协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中说：

“中央决定：鉴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业已公布的决定，允许我党党员参与今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目的是最后揭露这一尝试的站不住脚和最终停止关于联合政权的进一步谈判。”（同上，第130页）

尽管这一决议案是妥协性的，加米涅夫小组还是反对这一决议案。他们认为，应当为真正建立联合政权而进行谈判，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谈判当作准备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

11月2日（旧历）列宁召集了新的中央会议，二十三名中央委员有十五名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会上通过的决议以及列宁就决议的每一项进行表决的结果所作的记号却保存了下来。决议有如下一段前言："中央认为此次会议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因而必须写明这里出现的两种态度。"（《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31页）不待10月29日（11月11日）中央决议所确定的同各苏维埃党派的谈判结束，列宁实质上就提出了修改这一决议的问题。更有甚者，他还以巧妙的手腕把中央过去的多数变为少数反对派，进而，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个人压力下，一些过去站在加米涅夫一边的人转到了列宁一边。依照这种办法，列宁把11月2日的中央会议本身也变成了对加米涅夫派的审判会。在列宁提出的中央决议案中，头三条都是针对少数反对派的，即中央的前多数派。这几条说的是："（一）中央确认，中央内部出现的反对派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基本立场……（二）中央要这个反对派对此时此刻形同犯罪的动摇承担全部责任……（三）中央确信，不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就不能放弃纯布尔什维克政府……"（同上，第131页）

但恰恰是这三条在1917年11月4日《真理报》公布的中央决议中被略去了。这几条是否在同反对派妥协的情况下被中央会议否决了呢？现有文献都没有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在《列宁全集》的编辑注释中就这一问题说得很简单："决议的头三条在手稿中被删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52页）

在其他方面，中央决议持妥协语气，其中第六条说："中央重申，不把任何人开除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它现在完全准备把业已出去的人劝说回来，并承认这些业已出去的人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那种关于布尔什维克似乎不愿同任何人分享政权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同上，第45页）既然这个决议

是列宁起草的，只能认为它是纯策略手腕。列宁是不打算同任何人联合掌权的，虽然他准备暂时接受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参加政府，但以布尔什维克居主导地位为条件。

11月3日，当列宁得知，"昨天在有少数派中央委员直接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公开投票反对中央决议（关于我党在政府组成中的数量和人员代表资格问题）时"（《列宁全集》，同上，第48页），列宁转入了坚决进攻。确实，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尽管源出于11月2日的中央决定，但却与列宁和托洛茨基要保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路线背道而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要求就联合政权问题同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党派继续进行谈判。决议中谈到要把政府中的半数席位给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谈到要扩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增加二百四十五名代表：省[①]农民委员会（七十五名），军队委员会（八十名），工会（四十名），彼得格勒市杜马（五十名）。这项决议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六票反对，一票弃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梁赞诺夫、左派社会革命党方面的卡列林和普罗施扬组成的代表团，以便继续就新政府的组成进行谈判（《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75—276页）。

所有这一切都使列宁怒不可遏。起义夺得的政权开始从他的手中和平地滑落。列宁独自决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最后通牒，也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央的大多数。一位可靠的布尔什维克知情人士介绍说：

"据中央委员布勃诺夫证实，11月3日（16日），列宁在拟定了《中央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之后，邀请当时在彼得

---

① 即现在的州。——译者注

格勒的每一位中央委员单独到他的房间里，向他们介绍了文件内容并建议在上面签字。”（《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75页）

同列宁一起在最后通牒上签字的有下列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约费、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穆拉诺夫。最后通牒中写道：

“我们要求中央少数派以书面形式果断地回答一个问题，少数派愿否保证服从党的纪律和执行由中央通过的列宁同志的决议中所确立的政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和不明确的，我们要向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派、向特别党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建议：要么党应该责成现反对派组织政权……要么——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党赞同中央昨天决议中所表达的唯一可行的革命路线，如果是后者，党应该坚决建议反对派代表们把自己的破坏活动转移到我们党的组织之外去。”（《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34页）

在这一最后通牒之后，党的机关对反对派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使它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组织结论。1917年11月4日中央委员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提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能为中央的这一有害政策承担责任，这一政策是违背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的，他们渴望尽快结束民主各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放弃自己的中央委员称号，以便有权开诚布公地向工人和士兵群众谈出自己的意见，并呼吁他们支持我们的口号：‘由各苏维埃党组成的政府万岁’。”（同上，第135页）

人民委员会的四名委员——李可夫、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诺根同时退出政府，理由是，除各苏维埃党的联合之外，只有一条出路：“通过政治恐怖来维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同上，第136页）

第一个和第二个声明都刊登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1月5日的《消息报》上。

党的领导人关于退出中央和政府的声明所引起的反应，对中央专制派很有利。中央和政府的这次危机恰好表明，列宁的真正目标完全不是本来的苏维埃政权，而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制形式出现的苏维埃政权。但列宁不愿意、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宣布自己的这一目标。然而，列宁不想干也不能干的事情，却由反对派代替他并且违背他的意愿干了。反对派自党的内部、通过党的最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之口向全党和全国揭露了列宁的隐蔽的独裁思想。因此，对列宁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而且要把他们驱逐出党。

应当说，列宁坚持必须维护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就其本身来讲，他是正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有现在，在抓到政权之后，他才自革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谈起社会主义。在关于党内民主派（加米涅夫集团）的那个中央决议中，列宁写道："最后，中央委员会确认，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现在政府的政策，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在欧洲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6页）①

而这一胜利，据斯大林恬不知耻的自白说，只有通过一党专政、只有通过对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即农民采用强制手段才能取得。请看1921年1月斯大林的自供状："……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5—6页）②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9—260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页。——译者注

同独裁的敌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是不可能在俄国推行这种强制性社会主义的。通过对每个中央委员施加个人压力的途径、通过中央和地方党的积极分子以及首都和各省党的报刊动员党的“社会舆论”的办法，列宁—托洛茨基独裁派最终战胜了加米涅夫—李可夫民主派。同时，在主张由一切苏维埃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拥护者中间也开始分化和出现分歧。第一个投降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给同志们的一封信》中解释自己的投降行径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关于联合的谈判中没有表现出要与布尔什维克党达成协议的诚意（《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44页）。季诺维也夫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把破坏协商的责任推给孟什维克后即可进入苏维埃政府（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季诺维也夫要求自己的拥护者服从纪律，并且“在他们就参加预备国会[①]问题处于少数而又保证执行多数政策的时候，要象左派布尔什维克那样行事”（同上，第145页）。

我们从上述事实中看到，这中央少数派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列宁少数派（每当他处于少数时）和中央多数派的两种“纪律”的区别一向在于，列宁通过巧妙地操纵党的意见和摆布中央之外的党内力量（党的积极分子），在各种情况下总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少数变成多数，而把原来的多数分化瓦解之后，宣布为“反对派”。当然，列宁在次要问题上的表面纪律性是无懈可击的，但当事情涉及到他个人意志在原则问题上的胜利，他就会把任何纪律都给摧毁。列宁作为党的战略家的狡黠其实只有当他处于党内危机时期、处于少数时才能看得清楚。他表面上遵守服从多数的纪律，善于绕

① 预备国会系俄国1917年2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组成的协商机构。——译者注

过纪律，而当不可能绕过时，他又善于破坏真正的纪律。在他那里，纪律如同其他范畴的组织和思想一样，只服从于权力的利益。

此番，列宁也是如此行事的。他非常工于心计地分化了中央的多数，其成果之一是季诺维也夫的投降。在1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加米涅夫被解除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由斯维尔德洛夫取而代之。三周之后，他和另三名中央委员（李可夫，米柳亭、诺根）递交了服从“多数”和重返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这一声明没有留存下来，但从列宁在11月29日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声明的作者们认为，“中央作了让步”。列宁断然否认这一点，要他们以书面形式回答，“我们不接受他们回来”（《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54—155页）。乌里茨基就这一问题发了言，他建议接受他们回到中央，但只有在他们做出正式保证，“他们不再从事捣乱”（同上，第155页）的情况下才行。讨论以无定论而告终。以列宁为首的三人中央代表团应当决定这一问题。而决定如何——从党的文献中不得而知。据1918年2月底之前的中央记录判断，“反对派”中参加中央会议的只有季诺维也夫一人（投降得恰是时候！），而其他四人的名字在中央记录中没有见到。由此可以断定，他们没有被重新接受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更为严重的、充满戏剧性紧张的是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与同德国单独媾和相关的。列宁在处于毫无希望的少数之后，宣称要辞去政府首脑之职。如果说这一辞职要求没有被接受，苏维埃制度得了救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布尔什维克都要感恩于那个，照斯大林的说法，他们要到处诅咒的人——托洛茨基。

关于第二次危机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叙述。

第十五章

中央委员会围绕布列斯特和约的第二次危机

鉴于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会议上经常遇到困难，列宁从中得出了某些组织结论。列宁决定改组党、报刊、苏维埃和工会的领导机构，以便一旦发生新的危机时为自己建立可靠的支柱。

在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的机构中作了如下变动：

（一）建立四人“中央执行局”处理紧急问题。这四个人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中央执行局就是后来政治局的前身。关于它的任务在中央记录中只是笼统地说：“在难以召集中央会议的情况下，这个四人小组可以处理一切紧急事务，但必须吸收当时在斯莫尔尼宫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55页）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宣布为“紧急问题”。

（二）确定了《真理报》编委会的新的组成人选：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上，第153页）。

（三）鉴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旧主席团已成为反列宁的了，故而确定了其新的人员组成：克列斯廷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缅任斯基、拉舍维奇、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米尔加、斯图奇卡。后来这个班子又作了变动，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最后组成人员如下：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季诺维也夫、阿瓦涅索夫、兰德尔、奥库洛夫、佩捷尔松、沃洛达尔斯基

（同上，第165、180页）。

（四）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局改选了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派执行部的旧的人员组成，执行部以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为首（由于得了不到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列宁于1918年1月19日以武力驱散了全俄立宪会议）。

（五）指派了中央对工会的党的领导。任命施略普尼柯夫为工会主席、施米特和托姆斯基为书记、戈列鲍夫为工会机关报编辑（同上，第160—161、167—168页）。

（六）军事组织的全面领导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而被推荐为中央在军队和前线代表大会的报告员协助他工作的有拉舍维奇、穆拉诺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上，第153—154页）。

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纲领的两项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和全部土地归农民——预先决定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相对容易取胜。宣布土地属于农民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签订和约一事。布尔什维克指望，只要他们一宣布俄国立即退出战争，德国人马上就会同意"不割地不赔款的媾和"，这个希望落空了。另一个希望也落了空：如果凯撒大帝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媾和，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立即起来造反。关于媾和条件的讨价还价将是长期的、孕育着严重后果的。

停战协定还是1917年12月2日（15日）由苏俄政府和四方联盟大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1月9日（22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和约谈判。苏维埃代表团由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率领。他代表苏维埃政府发表声明说，苏维埃俄国主张不割地不赔款的媾和，但承认人民的自治权利。德国代表团团长屈尔曼轻而易举地识破了苏维埃政府立场的宣传内幕，声称，假如俄国的盟国——协约国——参加和约谈判的话，苏维埃俄国的条件是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的。正是从苏

维埃俄国关于人民自决权的要求出发，德国提出了媾和的主要条件：乌克兰独立（苏维埃政府承认的乌克兰中央拉达[1]代表团作为平等的一方参加了大会），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脱离俄国。对此，苏维埃代表团通过托洛茨基发表声明说，苏维埃俄国不签订和约、停止战争、复员军队。德国人获悉以后，于1918年2月18日恢复了战争并转入全线进攻。

在1月和2月份，在无休无止的中央会议上，就签订和约还是继续战争的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从一开始中央就分裂成三派：（一）列宁派，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立即签订和约；（二）布哈林派，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三）托洛茨基派，主张在"不要战争也不要和约"的口号下进一步施展手腕。

早在1918年1月7日（20日）列宁就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性提出了如下论据："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绝对不能顺利地击退德国的进攻……事件的发展必然会使俄国在遭受最严重的失败以后，被迫签订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签订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48—250页）[2]换言之，继续进行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灭亡，而那时执政的将是其他政党（列宁提到了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列宁在1月8日（21日）于彼得格勒举行的党的领导者会议上提出了这些论点。就列宁的这些论点进行表决时，会议分裂了，象中央一样分裂为三派：赞成按德国人的条件签订和约的（列宁的观点）十五人，赞

---

① 拉达是1917年到1919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0—421页。——译者注

成继续进行革命战争的（布哈林观点）三十二人，赞成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托洛茨基观点）十六人（《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68页）。

列宁在1918年1月11日（24日）的中央会议上最坚定不移地提出了和约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七名中央委员。列宁重申了自己关于媾和的论点，强调指出，"如果开战，我们的政府将被摧毁，和约将由另一个政府签订"（同上，第168页）。列宁补充说，他并没有失去将来进行革命战争的信心，但当前俄国无法进行革命战争。他最后指出，"当然，我们在向右转，这个转弯要通过极肮脏的垃圾堆，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同上，第169页）。

在辩论中发言的多数人都与列宁的估计大相径庭，有的甚至指控说："列宁正在暗暗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做过的事情。"（同上，第172页。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的发言）科西奥尔代表彼得格勒组织声明说："彼得格勒组织现在反对，只要可能，将来也反对列宁同志的观点，并认为只有革命战争的立场是可行的。"（同上，第172页）莫斯科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重申了反对媾和的理由。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支持列宁。不过他们支持的动机却是明显反对列宁的。斯大林为签订和约进行辩护的理由是，旨在进行世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战略破产了。他说："（1917年）十月我们曾谈到神圣战争，那是因为别人对我们说，只消'和平'一词就能动员起西方的革命。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同上，第171页）季诺维也夫虽然赞成媾和，但他警告说，"我们将因媾和而助长德国的沙文主义，削弱西方的革命运动……而前面会呈现另一个前景——这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同上，第171页）

这两位志同道合者的上述理由都被列宁坚决驳回了。中央记

录中说，列宁不同意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如下论断：西方不存在革命运动或者这一运动将因签订和约而削弱。列宁补充说，尽管西方不存在革命，但却存在革命运动，“如果因此我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那末我们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同上，第172页）。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第一次在苏维埃俄国条件下谈出了一个失败主义思想，他就这种思想解释说，他是在什么样条件下才同意“中断”和谈的，这就是——“如果我们确信，中断谈判德国运动就会立即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应当作出自我牺牲，因为德国革命就其力量将远远高于我国革命**”（同上，第172页），但因在当前条件下德国革命的加速还大成问题，于是列宁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目前不清清楚楚地说，我们同意媾和，那我们就只有死亡。”（同上，第172页）

在中央会议行将结束时，列宁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放弃要求立即签订割地和约，而建议就他的新提案进行表决：“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拖延签订和约。”十二票赞同，一票反对。

紧接着，托洛茨基提付表决如下提案：“我们停止战争，不签和约，复员军队。”九票赞同，七票反对（同上，第173页）。

这样，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列宁遭到了失败。通过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布哈林也附议了。因此，迄今一直充斥苏联文献的斯大林神话，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自行其事、叛卖、对抗中央，是明目张胆的历史捏造。

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两天之后，即1918年1月13日，举行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的联席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进入了苏维埃政府）。会议讨论的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次联席会议以多数票提出，要向即将召开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如下方案：“不打仗，不签约”（同上，第283页）。这里，又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战胜了列宁的观点。

然而，列宁并未善罢甘休。在1月13日（26日）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实质上回避了讨论和约问题，而是要代表大会授予人民委员会（政府）以进行和谈和签订和约的无限权力。

在党内，列宁的观点得不到支持。两个起主导作用的首都党组织——彼得格勒组织和莫斯科组织完全脱离了列宁的监督，它们给全党定了调子。这两个组织都表示反对列宁同德国单独媾和的路线。在彼得格勒党委会1月15日给党中央的声明中说："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列宁同志的观点，我党最有影响的组织——彼得格勒组织和莫斯科组织都毫不含糊地反对同德国搞割地和约"（同上，第182页）。彼得格勒委员会有公开分裂之虞。在莫斯科委员会的1月11日决议中说，接受德国人的和谈条件"可能导致一种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同上，第185页）。这些都是直接针对列宁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1月19日又就签订和约问题召开了新的中央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三名中央委员，其中包括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布哈林。托洛茨基因领导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而未到会。在这次会议上，莫斯科党组织主席洛莫夫（奥波科夫）毫不含糊地谴责中央领导人说，他们根本不征询党的意见就"预先决定了同德国人的单独媾和"。他建议中央听取全党意见，党已经"沉默好久了"。他说，为此必须召开党代表大会（同上，第175页）。

列宁反对召开党代表大会，因为按党章规定，代表大会的决定对中央并无约束力。他建议继续奉行拖延谈判的路线，以争取时间。他在这一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颇为接近。维护没有到会的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不是别人，恰是斯大林。斯大林宣称："我党的全部力量在于，我们在所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都是极其

鲜明和毫不含糊的。而这种鲜明性和毫不含糊在和约问题上却没有，因为存在着不同的思潮。应当结束这种状况。**托洛茨基的立场——中间观点给了我们摆脱这种严重局面的出路。**”（同上，第178页）

应该说，这样想的不只是斯大林，列宁起初也是这样想的。还在1月3日(16日)，同当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领导苏维埃和谈代表团的托洛茨基，经过直通电报线的一次谈话中，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不要战争也不要和约”方案表态说：“你们的计划我认为可以讨论。这个计划的最后执行是否缓一步，等这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作出最后决定再说。”（《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25页）①

托洛茨基对此做了如下说明：“党内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与后来的传说相反，斗争不是在我和列宁之间，而是在列宁和绝大多数党的领导机构之间进行。在这一斗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目前能否进行革命战争？通常是否容许革命政权同帝国主义者签订协定？——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完完全全站在列宁一边的。我同他一道，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分歧的第一次比较广泛的讨论是1月21日（旧历1月8日）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进行的。出现了三种观点。列宁主张再尽量拖延谈判，但是遇到最后通牒时即刻投降。我认为必须进行谈判直到破裂，甚至冒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危险，至于投降——如果通常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只好这样做，——只能在明显的动用武力之前。布哈林要求进行战争以便扩大革命舞台……主战派获得了三十二票，列宁获得了十五票，我获得了十六票……在党和政府的所有领导机构里列宁都处于少数……在1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95页。——译者注

月22日决定性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我的提案：拖延谈判。”（托洛茨基：《我的生涯》1930年柏林俄文版第2册第110—111页）

就是这个“拖延”谈判的策略正中列宁的下怀，但是遇到德国人最后通牒时列宁准备投降，而托洛茨基却动摇不定。然而，斯维尔德洛夫同列宁完全一致，于2月14日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说，听取了托洛茨基的报告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自己在布列斯特的代表们的活动方式”（同上，第114页）。

嗣后，在关于单独媾和问题的党的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列宁是这样阐述同托洛茨基的分歧的：“应该把他（指托洛茨基。——作者）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巧妙地利用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他拖延谈判的时候是正确的，但当战争状态已经宣布结束而不签订和约的时候就不正确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0页）①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大事记。

1月21日（2月3日）就和约问题举行的中央委员同党的积极分子的新的会议再次证明，列宁继续处于明显的少数。这一次在会上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出现了不是从前的三派，而是四派：列宁派（六人——列宁、斯大林、穆拉诺夫、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洛莫夫派（六人），奥新斯基派（二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派（三人）。托洛茨基因在布列斯特，没有参加会议。就主要问题：当前是否容许单独签订割地和约？——投赞成票的只有列宁派（五人，因为表决时季诺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1页。——译者注

维也夫不在场），所有其他几派（九人，因表决时布哈林和乌里茨基不在场）都投了反对票。这样，以九票对五票，而如果把缺席的计算在内，则是以十一票对六票，中央会议表决反对列宁的投降提案（《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90—191页）。

从党和政府最高机关的这种立场来看，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执行的僵硬策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还应指出一个重要情况，就是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而且其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代表的苏维埃社会党也都斩钉截铁地反对同德国单独媾和。这也加强了反对列宁的人的地位。

1月21日（2月3日）德国和谈代表团团长（屈尔曼）和奥匈帝国和谈代表团团长（切尔宁），因为托洛茨基顽强固执，要求休会并分赴柏林和维也纳领取新指示。返回后，他们于1月27日（2月9日）同他们的国家所承认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同一天德国人向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要求接受其和谈条件的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托洛茨基声明说，苏维埃俄国不签订和约，但停止战争，复员军队。2月16日德国代表团的霍夫曼将军通知苏维埃代表团说，将于2月18日中午十二时结束停战并恢复战争状态（《苏联国内战争史》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卷第111页）。2月17日晚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德国人的最后通牒。《苏联国内战争史》这部重要巨著竟然歪曲介绍这次中央会议的决定。它说：

“2月17日晚，党中央讨论了德国的最后通牒问题。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一旦德国发动进攻必须签订和约。”（同上，第112页）

实际上相反——以六对五的多数通过决议，拒绝同德国人进行新的谈判。赞成拒绝谈判的有布哈林、托洛茨基、洛莫夫、乌

里茨基、约费、克列斯廷斯基。赞成开始新谈判的有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194—195页）。

当然，列宁并不就此而满足。惊人的意志力、不可遏制的精力、策略手腕的灵活诡诈和玩弄政治愚民低级本能的登峰造极的技巧——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所表现的全部品质又都重新帮了他的大忙。当权的新列宁还多了一个品质——所向无敌的维护权力的本能。他是如此巧妙又如此武断地描绘对德国的投降，以至把它说成是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唯一保证，同时继续玩弄对付对手的惯用伎俩，致使在中央反对列宁的多数阵营中出现了分裂。

2月18日一整天中央都在开会辩论媾和问题。在上午会议上发言的“派别演说家”（记录中这样说）中，主张媾和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媾和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双方力量对比仍然对列宁不利。以七票对六票的多数否决了列宁的提案。2月18日白天德国人恢复军事行动并转入进攻。列宁要求晚上召开新的中央会议，以便研究来自前线的最新情报，而实质是要改变早上的决定。没有出席上午会议的投降派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会议，而出席了上午会议的和约反对派捷尔任斯基却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一点对列宁有利。从中央会议极简单的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对于列宁来说，单独媾和问题并不是“要不要俄罗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治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问题。列宁主张媾和的全部论据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说，“事情已经陷入绝境，革命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如今没有可能再等待了……必须向德国人提出媾和”。但列宁又补充了一句：“假如德国人说，他们要求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那就当然应该打。”（同上，第201页）

列宁同意把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芬兰、甚至白俄罗斯的一部分都给德国人，同意乌克兰独立，但就是不同意放弃政权。政权对于他是一切的一切。哪怕只剩半个俄国，也要保住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其说他想用这个政权为自已的人民“造福”，毋宁说是想使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化。他深信，这将在本次世界大战之末发生。列宁为支持斯大林又提出一个论据：德国人只消“开五分钟的排炮，我们的前线就会一卒不剩”（同上，第202页）。布哈林重申了自己维护“革命战争”和“世界革命”的理由，同时指责了列宁及其拥护者“惊慌失措”（同上，第202—203页）。列宁同样以“惊慌失措”为理由回敬了他。列宁说：“大丈夫决不去打革命战争——而要打倒任何公开这样说的人。”（同上，第203页）既然托洛茨基已经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公开声明，苏维埃政府要复员军队，列宁认为，现在要收回这一声明那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垮台。他是这样说的：“说复员停止了——那一定是说走了嘴。”（同上，第203页）

经过一番相当热烈的争论之后，决定制度命运的问题付诸表决。中央记录中说：

“付表决的问题是：应否即刻向德国政府提出立即签订和约的建议？赞同——七票：列宁、斯米尔加、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五票：乌里茨基、约费、洛莫夫、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附议）。弃权——一票：斯塔索娃”（同上，第204页）。这项决议的确切所指是，苏维埃政府准备就德国人旧的媾和条件签字，“但也不拒绝接受更坏的建议”（同上，第205页）。责成列宁和托洛茨基拟定建议条文。决定即刻向德国人广播苏维埃的建议。列宁没有忘记自已非常微弱的多数，想切断中央的一切退路。

为了最后解决问题，还要求征得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同意，因为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苏维埃联合政府。所以，定于2月18日夜里举行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再次战胜了列宁。在关于会议结果的新闻公报中称，会上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签订和约，另一派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后一派获得多数："多数所持的观点是，俄国革命是经得住考验的；决定抵抗到最后一刻。"（1918年2月20日《社会革命党人报》）

虽然2月18日（下午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决议宣称，两个中央——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决定将被视为政府决定，但是列宁直接地、公开地破坏了自己中央的决议。

未及等到如上所指的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会晤，也就是说，未及等到上面引述的两个中央的决定做出，列宁就于2月19日晨向德国人广播了接受德国媾和条件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以精细著称的德国人发现，列宁广播的不是正式文件。霍夫曼将军教训列宁，应该如何制定正式文件。列宁不该通过太空广播，而应以书面形式同德国人打交道。公函应符合正式规格，应由列宁亲笔签署，盖上相应的图章并站在一定距离上交到德国警备司令德文斯卡手中！列宁急忙答称，苏维埃信使带着苏维埃投降建议的正式文本正在途中。

德国人对苏维埃投降没有立即作答。正在这时收到了俄国盟国法国和英国的建议，说要在同德国人继续打仗的条件下向苏维埃俄国提供军事物质援助。2月22日的中央会议从头至尾都是讨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十一个人。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出席。对问题的讨论导致异常激烈的辩论。以布哈林为首的左翼认

为，布尔什维克在捍卫“无产阶级政权”时原则上不能够利用“英法帝国主义”的援助。托洛茨基认为这种立场起码是幼稚的。他说，“国家不得不做党所做不了的事情”。因此，如果和平不能实现，苏维埃政府就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援助。托洛茨基的建议以一票多数被通过：六票赞同，五票反对（同上，第208页）。没有出席会议的列宁寄来一份“给中央的声明”，为了教训左派空想家以政治现实主义来考虑问题，声明中政治上的厚颜无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列宁写道：“请算我一票：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那里拿到土豆和武器。”（同上，第208页）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声明辞去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之职。关于此事托洛茨基已经同列宁谈过：

“‘我觉得，’我在同列宁的一次单独谈话中说，‘假如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的话，从政治上看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希望，我们不会提出这样的会议程序。’

“‘但我的辞职对德国人将意味着政策的根本转变，从而加强他们对我们这次准备签订和平条约的信任。’

“‘也许，’列宁思索着说，‘这是个有力的政治理由。’”（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17—118页）

在2月22日的这次中央会议上，一批中央委员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以便取得反对中央“微不足道的多数”的“自杀”政策的行动自由，这个“微不足道的多数”已经向德帝国主义投降。在声明上签名的有四名中央委员：布哈林、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勃诺夫。另一批中央委员——约费、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也签署了这项声明，但附带一个保留条件：他们也谴责中央的投降决定，但为不使党分裂，暂且不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09—210页）。这样，在投降问题上，中央事实

上又一次分裂成相等的两部分——七人赞成投降，七人反对。

2月23日收到了德国的复函。看来，德国人已经确信，列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投降，只要不丢掉政权，而他得到政权是不无德国人的帮助的。德国人的复函提出了比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代表团拒绝的条件远为苛刻的新条件。按照新条件，俄国丢失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全部领土、白俄罗斯的一部分，俄国要把卡尔斯、巴统和阿尔达汉等城市让给土耳其，它要立即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要跟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拉达）签订和约，要马上开始全面复员军队，还要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 第1卷 第119—124、446页）苏维埃俄国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接受这些条件，立即向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派出代表团以便在三天之内签订和约。

柏林新的最后通牒就是这样的。列宁在承认他签订“最下贱而又屈辱的和约”的同时，把它的条件同普鲁士人的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的条件相比较，但历史的类比是经不住任何批驳的：在提尔西特，俄国拯救了普鲁士国王的王位，坚持保全了普鲁士这个国家，而俄国本身没有失掉一寸土地，相反，它还获得了比亚韦斯托克州，瓜分了法俄之间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可如今呢？如今普鲁士国王和德国凯撒向俄国提出的条件是，把俄国抛到二百五十年前它所处的西部领土状态上去。稍许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对俄国提出如此前所未闻的刻毒要求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用那些德国臭钱、在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媾和的口号下把俄国军队彻底瓦解的结果。假如列宁哪怕有一分钟想到，只要有不受惩罚的可能，就决不撕毁同德国的和约，那末他就应该被控为自觉背叛俄国，自觉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后者他的左派同事已经控告了他）。列宁被他在中央的反对派们的幼稚可笑可怕地激怒了，这些人考虑的是，遵守一个一旦条件改变就可

撕毁的条约的道德或者法律义务。

列宁在中央为争取接受新的德国最后通牒的斗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2月28日的党中央会议恰恰是讨论新的德国最后通牒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五位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政府领导人。在上次会议上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的左派，也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因为他们的辞职尚未被接受。气氛异常紧张。派别斗争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往往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中央代表的不是一个党，而是两个既有不同策略，又有不同纲领的党：一个是“一国和平”党、“一国社会主义党”（列宁）；另一个是“战争党”、“世界革命党”（布哈林）。还有一个徘徊其间的缓冲派，它神同列宁，心同布哈林。这就是托洛茨基派。斯大林同列宁一道，但保留退避的权利。所以他经常随机应变，从不拆毁通向托洛茨基的桥梁，也从不拆毁通向布哈林的桥梁。托洛茨基问道：“斯大林的立场是什么？他一向没有任何立场。他等待时机并见机行事。‘老头子仍然指望媾和，’他对我向列宁那边呶嘴，‘他的媾和搞不成’。然后他走到列宁那儿去，可想而知，再把那些意见说成是我提的。”（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22页）这决非想当然而已。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象斯大林那样的，在政治上同时用两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不同曲调的，如此精湛的技巧。

在近两、三周的时间内把主张立即媾和的全部论据丢失殆尽之后，列宁采用最后决定性的手段——最后通牒。他在十月政变前夕就是采取这一手要求中央举行起义的。在中央记录中，这一最后通牒是这样表述的：“列宁同志认为，革命空谈政策业已告终。如果现在这种政策还将继续的话，那末他就同时退出政府和中央。”（《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11页）

党要分裂的现实威胁出现了，因为列宁作出声明所采取的形

式，毋庸置疑是他决心走上建立第二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这对托洛茨基派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托洛茨基说："我们不能在党内分裂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战争……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同心同德；既然没有这种同心同德，我就不能承担拥护战争的责任。"（同上，第211—212页）

托洛茨基的这番话预告了列宁的胜利，因为托洛茨基派成员的中立就自动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列宁派变成了在决定媾和问题时的多数。而对布哈林派，无论列宁的最后通牒，无论托洛茨基的声明，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布哈林说，德国提出的条件丝毫不能成为使列宁的陈腐预言得到辩护的理由。而与布哈林观点一致的洛莫夫则直截了当地宣称："既然列宁以辞职相威胁，害怕是无用的。应该争取一个没有弗·伊（列宁）的政权。应当开赴前线和尽力而为。"（同上，第213—214页）然而，正值总的局面开始显出有利于列宁之际，他本派的一员背叛了列宁——这就是斯大林。他直言不讳地说："可以不签字，但要开始和平谈判。"（同上，第212页）

当托洛茨基本人已经为列宁打开了通往媾和之路时，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的旧病复发，把列宁气得发狂。列宁看到，斯大林立场的胜利将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覆没。这是列宁在第二次发言中把主要攻击矛头指向斯大林的原因。列宁说：

"斯大林，当他说可以不签字时，他是不对的。这些条件应当签。如果你们不签署这些条件，那你们就要在三周之后签署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我提出最后通牒不是为了把它撤销。"（同上，第213页）

斯大林回到了列宁营垒，虽然是不无保留的。他在第二次发言时说："我们认为，德国人不能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同上，第213页）在长时间的拖泥带水的辩论之后（共二十一个发

言，有些人发言二、三次），列宁拟定了要表决的问题：

（一）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

七名中央委员（列宁、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赞同，四名中央委员（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布勃诺夫）反对，四名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约费）弃权。

（二）是否立即准备革命战争？

全体中央委员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记录》俄文版第215页）

列宁关于无条件接受新的德国最后通牒的提案就这样通过了。这一提案是由现有中央委员的少数通过的，因为（四名）弃权的中央委员实际上是坚持反对媾和的立场，即布哈林派的立场的。布哈林派从自己的失败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他的成员提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声明。

乌里茨基在说明这个以他自己和布哈林、洛莫夫、布勃诺夫、候补中央委员雅柯夫列娃、著名党工作者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名义发表的声明时写道，既然所通过的决定对国际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毁灭性的，"尤其这一决定是中央少数人通过的，因为四位弃权者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所以他们辞去自己的职务，但目的是为了在党内外进行反对单独媾和的宣传（同上，第216页）。

中央委员克列斯廷斯基、约费和捷尔任斯基也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写道，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比媾和更为危险。所以，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媾和，但认为以弃权为宜(同上，第216页)。托洛茨基对自己弃权的解释是，他想帮助寻找摆脱绝境的出路和不妨碍列宁为建立一致路线

而获得多数票（同上，第216页）。

进而，中央的斗争就围绕接受还是否决布哈林派中央委员辞职这一问题而进行。列宁清楚地看到，在党内起着如此显著作用的布哈林分子退出中央，按照事物的逻辑，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这在当前情况下必将引起灾难性后果。列宁内心深处甚至是同意他们的，但和他们不同的是，他看不出目前继续战争有任何可能。不过，他想同他们一道准备战争，并在一旦苏维埃俄国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时，即刻撕毁目前正要签订的和约。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才同布哈林一起在中央投票赞成准备这样的战争。

列宁无论如何都未能把那个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与道德哲学的起码真理灌注到“空谈革命家”们（他这样称呼布哈林派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脑髓里去，这就是：签订条约并不是为了履行条约，而是为了赢得时间，为了“喘一口气”，以便重整自己的队伍，积蓄新的力量并再度开始新的战争。这种新战争那时将在敌人最大限度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将恪守业已签订的条约的情况下发生，将在改组旧的并积蓄新的布尔什维克力量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情况下发生。列宁想，只有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或者不可救药的政治白痴才无法理解他。当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阐述应该马上签订和约的必要性时，他说：

“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以形式上的考虑来束缚自己……不知道条约是聚积力量的手段，那是十分可笑的……某些人显然象孩子一样，认为签订了和约就是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堕入了地狱。这简直是笑话……失败的时候签订和约是聚积力量的手段……咬紧牙关，不要假装勇敢，而要准备力量。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做实际上的退却，放弃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略和政策要求我们签订最耻辱的和约。”（《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

第334、335、336页）①

为了这一战略，列宁承认布哈林派成员有自由宣传自己反对中央正式政策的观点的权利，这是他在其他情况下永远不承认也不会承认的。他以此为代价力图把他们挽留在中央委员会之中。斯大林没有识透列宁这一策略的实质，抑或是可能根本不同意这种策略，开始对造反分子以开除出党相威胁（斯大林说，“辞职是否意味着实际退党”，第217页）。这样提出问题只能火上浇油。它有明显的挑衅味道。所以列宁赶紧同斯大林划清界限。列宁回答他说，“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意味着退党”（第217页）。

在2月24日举行的下一次中央会议上，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得那样突然，他认为布哈林派成员在中央是那样的不可取代，以至于引起后者的讥讽。斯大林的这种突然转变在中央记录中有所反映。那里面说：

“斯大林同志不提任何动议，而只是谈他对同志们的态度感到痛心……他们极其了解，他们是无人可以代替的，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同上，第224页）

但记录中接下去说：

“乌里茨基对斯大林的发言感到惊讶……斯大林昨天还建议他们退党，不过他们并不想退。”（同上，第224页）

十二名中央委员和三位应邀者出席了2月24日的中央会议，会上决定派出新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签署和约：索柯里尼柯夫（首席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卡拉汉、齐切林。上届代表团（托洛茨基之后）首席代表约费尽管本人反对，但因列宁坚持，被委派为代表团顾问，因为他被认为是所有中央委员中对媾和问题最熟悉的一个。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和约反对者及托洛茨基要求退出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2—105页。——译者注

政府的声明。在解释自己的辞职声明时，托洛茨基说，“当前党内有泾渭分明的两派。如果从议会观点来看，那末我们有两个党，而就议会的意义而言，少数派就应该让位，可我们没有这个，因为我们有的是派别斗争”（同上，第224页）。托洛茨基视这种现状为“政权危机”。斯大林同意这一估价，但有一个保留，就是希望托洛茨基还是留在政府里。记录中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一丝一毫也不责怪托洛茨基，他也认为当前是政权危机，不过还是请他略等几日。”（同上，第224页）

列宁认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政权危机”的说法是错误的。列宁指出，只有代替媾和的政策（无条件地接受德国最后通牒），没有政权危机。他仍然坚持要提出辞职的政府成员（托洛茨基、洛莫夫、斯米尔诺夫、乌里茨基、皮达可夫、鲍戈列波夫、斯彭德）以及从前曾经提出退出中央的人都留在自己的职位上，至少到下次特别党代表大会。列宁当即提出第二项建议，保证和约反对派有权在《真理报》上发表他们不同意中央政策的有关声明。

列宁的这些对少数派权利没有足够保证的提案都被否决了（只有五名中央委员赞成）。通过了克列斯廷斯基和托洛茨基的更为明确的提案：中央建议提出声明的同志留任本职，而不承担政治责任，在党内、报刊、会议上有坚持自己观点的充分自由（同上，第223、226、227页）。全体中央委员，包括提出辞职声明者本身都赞同这一提案。列宁避免了分裂，所付的代价是承认派别自由和反对派的言论自由，这是违背他的全部有关党的学说的。

2月24日夜，布尔什维克派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提交了关于接受德国媾和条件和派遣和谈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以一百一十六票对八十五票的多数得到通过，二十六人弃权。投反对票的有孟什维克、右派和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以及一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的非党成员。

2月24日当天，列宁和托洛茨基打电报给柏林说，苏维埃政府接受媾和条件并派代表团前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列宁那样迫不及待地接受德国最后通牒，仿佛担心，如果象斯大林要求的那样再拖延下去，德国人可能会另外提出他确实不能接受的唯一条件：布尔什维克退出政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除布尔什维克外，俄国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准备向德国人投降。准确了解这一点的德国人比列宁本人还关心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奇怪的是，为什么列宁没有利用自己的这张王牌对付威廉。也可能利用了，只不过我们不晓得罢了。

也就是在2月24日这一天，列宁以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告全党书，其中对为什么必须接受德国最后通牒作了解释。这份文件发表在2月28日《真理报》上。在这项呼吁书中，列宁和党中央不仅向朋友，而且向敌人高声宣布，德国人的军事胜利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和党中央似乎向德国人暗示取胜的捷径。这是骇人听闻而又闻所未闻的，因为如列宁和中央那样，作为自卫国家在同敌人的殊死搏斗中这样轻率地把自己的软弱无力告诉敌人，是史无前例的。请看中央这份呼吁书中的有关段落：

“绝对必须签订和约首先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自卫……俄国现在无力自卫，甚至被德国人微不足道的力量所毁灭，他们只消切断主要铁路干线就足以借助饥饿拿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294—295页）

很难解释这种坦率，若是出自凡夫俗子之口，这只能被认为是叛卖。

在列宁和中央的公开正式声明之后，德国晓得，可以向俄国提出任何条件，乃至要求调动俄国军队去对付西部战线的俄国盟

友，当年拿破仑就是这样用俄国盟友对付俄国人的（在1812年战争中奥国和普鲁士支持拿破仑反对俄国）。然而，德国人没有这样做。在3月1日到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新的会晤中，德国人只是重复了自己的最后通牒，而以索柯里尼柯夫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看也没看就按照指示签署了单独和约。如今只等待在两周时间内由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

这一工作的任务并非要洗刷托洛茨基。他同列宁和斯大林是站在一起的，并对作为革命大师的前者和作为权力大师的后者一同让步。但是，在上述期间，正是托洛茨基的态度，而非斯大林的态度，决定了列宁制度和列宁本人的命运。无记名投票的党的机器——革命的组织者——当时是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为代表的。因此，在中央，托洛茨基以表决时弃权的形式向列宁投降，具有划时代意义。假如是斯大林弃权或者哪怕是投票反对列宁，那不过只有算术记录意义，即列宁少得抑或多得一张选票而已。苏联历史家们把列宁制度的拯救者描绘成列宁主义的敌人，是太不公道了。假如不是托洛茨基采取这个对列宁有利的步骤，列宁就不会躺在莫斯科红场上的灵柩之中了，而关于斯大林的存在，除暗探局和朱加施维里①本人的亲属外，也就再无人知晓了。

① 即斯大林。——译者注

第十六章

党的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

为批准和约而召开的党的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是1918年3月6日至8日举行的。这是在夺取政权后党的首次代表大会。这时全党大约有三十万党员，而代表大会只代表十七万党员，代表他们的是四十七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九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以列宁为首的全体中央委员都只有发言权）。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包括三个主要问题：

一、战争与和平问题。

二、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

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的有六个人，其中包括列宁、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列宁就第一个问题做了报告，布哈林做了反报告。列宁的报告广泛阐述了他在中央各次会议上有关媾和问题的论点。列宁引证了除公开投降别无他途的两个历史事例，但投降是为了争取时间和为最后胜利创造条件。第一个例子涉及的是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当时拿破仑责令战败的普鲁士人给他军队以征服别国人民。谈到这里，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战场上的国际革命上，那末，我们的事情也一定会弄到这种地步。你们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了这种军事奴隶。"（《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1页）[1]

[1]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0页。——译者注

列宁的第二个例子取自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指（1907年）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根据中央决定被迫接受效忠沙皇的宣誓书，因为拒绝接受这一宣誓书的代表即被认为退出杜马。列宁说，“在保皇书上签字而承担了某些义务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不过这些痛苦的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同上，第17页）①列宁以如下一段话结束自己的报告：

“和约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我再说一次，我有决心、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几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约**……要抓住这个机会……以便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并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同上，第22、24页）②

在这个论和约的报告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原则上**不可能**和平共处、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国际革命的任务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说：

“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同上，第11页）③

为实现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历史使命，列宁才想利用“两伙帝国主义”之间——协约国与四方联盟之间正在继续的战争来维护苏维埃政权。列宁同反对派的分歧并不在应当组织世界革命这一点上，而是在如何和何时组织世界革命这一点上。列宁主张维护苏维埃政权是把它当作世界革命的基础，“左派共产主义者”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4—46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71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56—457页。——译者注

主张组织世界革命则是以冒丧失苏维埃政权之险为代价的。

布哈林反对媾和的反论据，其说服力并不亚于列宁主张媾和的论据。首先，布哈林分析了军队瓦解的原因，它确实不愿再打仗。甚至就连那个著名的革命领导者——无产阶级也不想打仗。为什么？布哈林回答说：

“我们在所有会议上，在所有群众集会上，在代表大会上，到处都只提一个首当其冲的口号：现在任何战争都是不可能的……我肯定地说，目前在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那种**精神涣散**，其产生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自己。”他还说：“须知当我们处在在野地位，**当克伦斯基千方百计呼吁保卫祖国时，我们千方百计地瓦解保卫这个祖国的意志**。”（同上，第36、38页）

那确是痛苦的事实，列宁虽然也承认这一事实，但却把它归咎于全党，其中包括布哈林。列宁说：

“当现在布哈林攻击我们，说我们腐蚀群众的精神时，他是绝对正确的，只是他攻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同上，第110页）

布哈林认为，列宁在按照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时，只不过是在帮助德意志同盟继续进行战争而已，因为“奥德同盟帝国主义者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进行这场战争，就是在无情蹂躏俄国的条件下——即使出于纯经济考虑……因为为了进行对付英国的战争，它必须要有原料，它必须要有粮食。”（同上，第28页）布哈林进一步指出，凯撒正是想用这些俄国粮食不仅喂饱军队，而且喂饱德国工人，德国惨重的经济灾难正好把他们推向自己本国的革命。至于说到列宁的“喘息”口号，布哈林认为列宁有关这个口号的全部论据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布哈林说：

“如果列宁同志说：‘要抓住哪怕只有几天的喘息时机’，说正是这样的喘息时机是现在我们面前——我敢断言，那是毫无

价值的……它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因为调整铁路也好，训练居民打靶也好，整顿交通运输也好，整顿经济生活也好， 也就是说，要解决列宁同志所谈到的一切主要任务，都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第30页）

列宁有哪些“不足之点”呢？布哈林历数如下：承认乌克兰独立和脱离俄国，列宁使国家失去了主要粮食和煤炭基地；放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列宁使国家失去了有利的战略地位；根据条约承认在俄国的外国资本不可侵犯，而俄国资本与之紧密相联，列宁从而取消了工业国有化的革命法；根据条约放弃在别国进行革命宣传，列宁就放弃了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整个纲领；根据条约承担支持波斯和阿富汗“独立”的德国立场的义务，苏维埃俄国充当了德帝国主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宪兵的角色。这些就是布哈林历数的列宁的“不足之点”。布哈林说，德国人“从苏维埃俄国夺去了最实质性、最必不可少的东西，即恰恰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按照列宁同志的论据寻求喘息时机和签订和约。”（同上，第31页）

布哈林认为列宁的一个论点是可笑的、滥用感情的、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而是机会主义的论点，这就是，他“有决心签订屈辱几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人的蹂躏”（同上，第22页）①。布哈林说，列宁的这番议论“恰好是空话，不是冷静的估计，而是地地道道的感情冲动，当然，是很好的感情，但与冷静估计相距甚远。冷静的估计告诉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并且应该牺牲成千上万的工人。因为各国机会主义者总是这样议论说：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1页。——译者注

'不要到大街上去，因为可能发生流血'。"（同上，第32—33页）

不言而喻，这里，布尔什维克真理在布哈林一边，而不在列宁一边。这个例子还向列宁本人表明，学生开始明显超过先生。对于布哈林这样提出问题，列宁完全保持缄默，就是一个征兆。列宁亦未能驳倒布哈林的另一个有力论点，他说：

"实际上一眼便可看清，假如在条约中有诸如推翻苏维埃政权、召开立宪会议之类的条件，那末，我们是不会签署的。"（同上，第31页）

是的，列宁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继续革命战争。但是，当有人问他，当德国人夺去了俄国"至为重要的东西"，当俄国被肢解，不错，是利用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口号"民族自决权"肢解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就不能继续革命战争呢？对这些问题，列宁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一个极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性的论据（正如后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被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完全忽略了——这就是俄国的盟国保证给它以必要的物质援助，以便把对德战争继续推进到最后胜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分子表现了自己政治思维的全部教条主义的无能与幼稚。他们认为，利用"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这对革命者来说，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正是在这里，列宁称心如意——他完全允许利用这种援助的可能性，对于他一向明确的是，"目的验证手段"。不过，他大概受德国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条件所制约，抑或他是那样地成了自己"喘息"念头的俘虏，以致除了完全投降以外，不容其他决定，只要保住政权就行。然而，此处应当强调指出，列宁害怕丢失政权与其说是因为害怕德国人进攻、害怕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陷落，不如说是害怕内部起义，主要是害怕

工人起义和军队起义。列宁没有忘记，他开始当政时，所许诺的正是无条件的和平。今天，他在同布哈林辩论时，当然要审慎地绕过这个微妙的问题。

反对投降的人继布哈林之后，在代表大会上重复了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反对意见。第一个发言的乌里茨基声称，他全然“不理解在座者（对德国人的）惊慌失措”（第42页），并补充说：“事实不是在反对我们，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您，列宁同志……签订和约，我们就是在打击那些满怀热情参加红军的同志”（第42—43页）。另一个反对投降的人指责列宁在政治上无原则性，并且用他1917年6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来提醒他。当时列宁说：“关于单独媾和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我们党的决议来看，也丝毫不必怀疑我们是拒绝单独媾和的，正象我们拒绝同资本家进行任何妥协一样。”（《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5卷第20页）①拉狄克指责列宁打算投降，也指责托洛茨基，说他在布列斯特谈判中实行拖延谈判和煽动德国革命的策略本来是正确的，但后来又在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性投票中弃权，从而背叛了自己。外交人民委员在表决战争还是投降问题时是不能弃权的，——拉狄克嚷道。拉狄克向列宁指出了他的公开声明的全部危险性，这些公开声明主张，一俟和约签订，我们即行准备新的对德战争。拉狄克说：“正是这样，您使德国人一旦不同意手中的文件就有权证明，我们在准备新战争，有权再次煽动沙文主义情绪。”（《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0页）托洛茨基解释自己在签订投降条约问题上在中央弃权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认为对它（和约）持这样或那样态度对我国革命的命运就是决定性的……不能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页。——译者注

对德国人进行战争……与此同时，有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的半数或者很大一部分人反对我……鉴于中央形成的力量对比，很多东西取决于我这一票……因为（中央）一些同志赞成我的立场……我以为，退却比签订和约造成虚假喘息更合适，但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承担领导党的责任。”（同上，第65、66、69页）

梁赞诺夫指责列宁说，他指靠的不是欧洲无产阶级，而是俄国小资产者即农民。他阐述自己的思想说：

“列宁想利用托尔斯泰的口号，使其适应现代。托尔斯泰提议建立一个农夫、傻瓜的俄国，列宁提议建立一个农夫、士兵的俄国。我们现在所要对付的正是这个农夫和士兵政策的后果。”（同上，第73页）

作为对列宁的论点，即签订和约就能保住作为世界革命发祥地的苏维埃俄国的论点的回答，梁赞诺夫强烈斥责列宁及其支持者，说他们，第一，想在德国刺刀的保护下苟且偷安，就没有权利宣传这一革命；第二，在以往的宣言中公开扯谎。梁赞诺夫是这样说的：期望把苏维埃俄国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的园地保存下来，“就是期望在德国刺刀的保护下在俄国建立‘罗汉松下的孤庙’。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的权利宣言（发表于1918年1月17日——作者），关于这个宣言，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立宪会议上曾说，它将取代伟大法国革命权利宣言。请费心读一读这纸空文并扪心自问：你们撒了多少次谎了。”（同上，第75页）

梁赞诺夫（此公曾多年任中央马、恩、列研究院院长）是这样结束自己的发言的：

“列宁准备退让、退让、再退让，就是当托洛茨基拉他的衣襟时也是如此。我要说，退让是有界限的。我不想说，这是背叛和出卖。”（第76页）但在否认说背叛时，他所暗示的正是背

叛。

托洛茨基也谈到界限，不能超出这个界限。他说，对于他，这个界限就是德国人要求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而中央和政府应当作出保证，决不走到这个界限（第72页）。对此，投降派斯维尔德洛夫的回答是：

“昨天在中央，托洛茨基同志向我们提出一个相应的决议案，说同文尼钦克（即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作者）媾和是不能容许的。但我们否决了这项提案。我们不认为同文尼钦克媾和是不可能的。”（第80页）（有意思的是，3月6日中央会议的这份记录被列入“无从查找”的清单，因为不这样就无法指责托洛茨基，说他的过错在于，以戈卢鲍维奇为首的乌克兰拉达和谈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受到了承认，尽管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已经承认了它。）党的著名活动家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今天的发言是非常大胆而又意味深长的，它揭穿了由布尔什维克瓦解俄国军队的德国方针与列宁的投降政策之间的联系。他说，早在1917年夏季德国人在里加战线反攻时，“德国人无疑有绝对可能象摧垮俄国军队一样地摧垮俄国革命。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打算以更容易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期待内部瓦解……期待和平党的胜利，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个和平党”（第82页）。

为什么德国人又在这个“和平党”胜利之后发动进攻了？奥波连斯基的回答是：苏维埃政权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眼里是“毫无工作能力的，是根本不能同它搞所需要的那种交易的”（第82—83页）。他最后说：“列宁同志的一切许愿都是地地道道的空话。”（第85页）

柯伦泰坚决反对投降，并以“革命战争万岁”的口号结束了发言，她的这个口号在场内博得了掌声。

在支持列宁的中央委员中发言的，除斯维尔德洛夫，还有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谢尔盖也夫。他们基本上都是重复列宁的论点。

在这个对列宁政权如此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斯大林未说一句有利于媾和的话。这是颇为奇怪而又令人费解的。斯大林的这种作法就是在有关斯大林的历史文献中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在讨论和约问题的中央会议上，虽然他投了赞同列宁的票，但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立场中的某些摇摆。1918年5月13日的一份中央文件业已公布，它可能对斯大林的上述作法给人以某些解释。第七次代表大会开过两月之后，在1918年5月13日的中央会议上讨论了列宁的《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其中就对外政策问题说：

“无论如何不应该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军事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因此总的口号仍然是：随机应变，退却，等待……”（《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7卷第325页）①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中关于提纲的案语里写道：“5月13日党中央会议讨论了提纲。除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外，全体投票赞成列宁提纲。”（《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29页）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头谈代表大会吧。

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需要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归纳如下：从我们方面来看是否可能进行战争？当布哈林说，他的支持者们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可能”，而列宁的支持者们说“不可能”时，列宁从座位上喊道：“可能！”列宁的这句插话使布哈林有理由提出另一个问题：

“如果在最近的将来这一战争是可能的，那就要请问列宁派，他们立场的基点到底是什么？须知你们的论据、你们的全部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5页。——译者注

发言、提案和演说、在群众大会和代表大会上的声明以及所有其他声明的中心恰恰在于，目前，由于客观原因，在军队腐败、粮食现状、交通混乱等情况下，我们不能进行战争。”（同上，第101—102页）

列宁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谈到梁赞诺夫、拉狄克、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发言。他对梁赞诺夫的回答是，当梁赞诺夫说，“列宁让出空间，为的是赢得时间”（第109页）时，他是对的。乌里茨基声称，同德国人媾和是“投降”、“叛卖”——这都是乌里茨基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批评中添来的（第110—111页）。对托洛茨基，列宁说，托洛茨基要求他许诺不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拉达）签订和约，但他，列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承担这种义务……在战争中，任何时候都不能用形式主义的考虑把自己束缚起来”。对代表大会，列宁补充说，如果你们不这样想，“那就请让位给托洛茨基和别人”（第112页）。列宁对布哈林的回答是软弱的、缺乏说服力的。对于在最近的将来战争是否可能这一尖锐提出的问题，列宁的回答是“辩证的”：“可能，但眼下应当媾和。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第110页）①。

报告、最后发言和辩论都结束了。开始表决。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提案由多数通过，三十票赞同，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同上，第175页）。

当开始讨论补充和修改意见时，围绕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实行的策略展开了尖锐的争论。这一策略的表现公

---

① 同报告人一道，发言赞成和约的有九位代表，反对和约的有十一位代表，但和约支持者还是胜利了。取胜的秘诀很简单：列宁以惯用手法组织（而不是召开）支持自己路线的多数派代表大会（后来斯大林也一贯如此）。布哈林在报告中已经提请注意这一事实，他指出，和约支持者“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占巨大多数”（同上，第39页）。——作者注

式是“不战不和”。提出三个议案：

克列斯廷斯基提案：“在布列斯特不签和约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策略。”

季诺维也夫提案：“代表大会欢迎布列斯特苏维埃代表团在揭露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在吸引各国工人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所做的巨大工作。”（第131页）季诺维也夫（他身后有列宁）提案以外交式的巧妙规避了托洛茨基的策略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托洛茨基识破了季诺维也夫提案的狡猾用意，指出，他在布列斯特所执行的策略是经中央多数赞同的，季诺维也夫本人也是肯定了的（季诺维也夫：“当托洛茨基说，他是按中央有全权多数的决议行事时，他是正确的。”——第134—135页）。

在就这两项提案进行表决时，出现了完全混乱不堪的场面：赞同克列斯廷斯基提案的代表十五人，反对的四人；赞同季诺维也夫提案的二十人，反对的三人。因而，主持大会的斯维尔德洛夫宣布两项提案一并通过，这引起了季诺维也夫的抗议。

为了彻底澄清并迫使自己的对手摊牌，托洛茨基自行提出谴责托洛茨基的提案：“代表大会认为我们代表团不签署和约的声明是错误的。”（第133页）在激烈辩论之后，托洛茨基提案，即谴责他在布列斯特的策略的提案，被代表大会所否决（第137页），而通过了或多或少意义暧昧的季诺维也夫提案。列宁在最后发言中还说，“托洛茨基的策略当初旨在拖延，它是正确的。而当宣布停止战争状态又未签订和约时，它就成了不正确的”（第111页）。但此刻，在围绕托洛茨基的策略进行辩论时，他却未置一词。他无法驳倒托洛茨基的声明，他说，本来在1917年11月可以以更有利的条件同德国人媾和，但“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列宁同志，都说：去吧，并要要求德国人表达清楚，要揭露他们，一遇可能就中断谈判并返回来。”（第66页）

为了结束布列斯特和约这个题目，回答如下问题是重要的：

一、是否存在这样的现实危险：德国人在自己推进战争的政治纲领中定能走到要求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地步，而在军事掠夺纲领中定能走到占领俄国中部的地步？

二、列宁对德军战斗力状况的估计是否正确，他确信德军会无止境地进攻（“这条野兽跳得很凶”）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德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国的，苏联的——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军事政治战略的潜伏因素和隐蔽意图，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者的情报中心的秘密战争一样，如今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揭露、研究出来，易于分析、比较和做结论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些价值重大的德国著作，如第一次大战后在柏林出版的多卷集 Die Ursachen des deutschen Zusammenbruches im Jahre 1918（《1918年德国崩溃的原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柏林出版的 Ursachen und Folgen（《前因与后果》）。为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必要到那个时代的迷宫去作广泛的历史旅行。一切裁判中的主要裁判——时间表明，列宁绝对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的物质军事潜力，过高估计了德国军队的打击和进攻力量，完全低估了俄国方面组织新的（革命的）自卫战争的可能性，而且特别在美国参战之后，在对协约国必然战胜四方联盟这一点上草率失算。

其实，且不说德国政府，就连德军领导人本身还在列宁进行投降谈判的时候就确信，他们无力进行胜利战争。奥匈帝国驻布列斯特代表切尔宁伯爵的回忆录出版了。他写道，假如力量够的话，德国人就不会是进行谈判，而是对彼得格勒发动进攻了。托洛茨基援引切尔宁的话写道：“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得出结论：‘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条件应当接受’……据切尔宁

说，屈尔曼在布列斯特确信不疑地谈到必须在事实上接受和约。只有霍夫曼一人反对这一点。”（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14页）

鲁登道夫那样的权威见证人还在战火未熄之时（他的书出版于1919年）就曾写道，1918年初，德国统帅部的任务仅仅在于不让布尔什维克组织新的东方战线，因而要给予短促有力的打击，然而，他补充说，“根本谈不上广泛的军事行动”（埃里希·鲁登道夫：Meine kriegserinnerungen，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447页）①。还是那位鲁登道夫——大本营情报部主任、极右军人集团头子写道，他反对消灭俄国这个国家。在2月18日的最后进攻之后，德国提出的和平条件仅仅是，“避免对俄国内政和经济生活的任何干涉，不把与独立国家的尊严不相容和奴役其居民的任何东西强加于它，……把俄国当时获得的和平与它可能获得的和平比较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同上，第450页）这位将军对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如此迫不及待地同德国人媾和一事，作了两点重要说明：他说，第一，我军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有从布尔什维主义之中解放出来之感”（第452页）；第二，在德国人顽强坚持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开头并不反对同协约国一道继续进行战争（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但“当苏维埃政府看到，协约国想要推翻它并另立政府，而且期望这个政府对进行战争表现出巨大努力时，它（苏维埃政府）便抛弃协约国而转到德国方面，以便在国内巩固政权”（第459页）。

如前所述，德国人为了尔后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集中到危险的西线，恰好需要东线有一个投降党。关于德国如何对待在俄国可能成立另一个民主政府以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个问题，存有

① 埃里希·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译者注

一份极有意思的德国外交部文件。这就是副国务大臣1918年1月9日从柏林寄给国务大臣屈尔曼的信，他当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托洛茨基谈判。信中说，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求见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向他转述了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的信件内容。在这封信件中，切尔诺夫党的代表描述了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布尔什维克凭借这种恐怖而掌权。但是，全国摈弃列宁的日子不会远了，到那时，俄国将在立宪会议的道路上得救。切尔诺夫党建议德国人丢掉对背信弃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幻想，同民主俄国签订诚实的、长久的和约。副国务大臣在通告这一切之后，在信的末尾写道："如果阁下赞同，我打算通知他（社会革命党代表——作者），很遗憾，目前我们不能同其他俄国党联系，因为我们已应邀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请电告您的看法。"屈尔曼回电："我同意。"（策曼：《德国与俄国革命1915—1918》英文版第113—115页）这正是在托洛茨基粗暴地中断谈判、高喊"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的那些日子里。

有关《背后打击》（DolchstoBlegende）这个德国民族传说是众所周知的。按这一传说所说，德国人因为后方革命，输掉了在战场上赢得的战争。当纳粹分子当政时，这个传说对动员民族仇恨起了大爆炸的作用。这个民族曾因统治者的错误而被凡尔赛无所用心的父辈们贬低、侮辱和摈于平等的欧洲大家庭之外。其实，在凡尔赛那里，就播下了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所收到的可怕的人类头颅大丰收（五千万！）的种子。既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右派，又包括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之布尔什维克大本营也抱定了同一个宗旨：赢得战争，在德国组织革命。然而，列宁缺乏耐心并陷于动摇。他似乎对德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有点不敢相信。这种信念有时显得那样不可思议，他竟然准备以"屈

辱一百倍”的条件同凯撒的将军们达成协议（没有任何人问列宁：比布列斯特和约“屈辱一百倍”的和约意味着什么？）。

正当列宁把德国的总力量及其军队的不可战胜夸大得神乎其神的时候，德军领导人自己却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输掉了战争。我们已经援引了鲁登道夫关于被迫压缩德国东部战线军事行动规模的证词，也援引了他的另一个证词，就是德国并不曾把占领种族俄国视为自己的宗旨，况且因为一触即发的内部局势，它也不能抱定这个宗旨。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就这一题目写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专题著作和书籍。这里不妨引证一下最近的德国目击者的记述——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位总理布吕宁的回忆录。布吕宁回忆说：当我对施莱歇将军说，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战斗序列（Aufmarsch）的组织方法而输掉了，但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的战斗序列还是非常出色的，施莱歇将军说：“我早在1918年3月26日就说过，我们的事业早就丢掉了。”（《布吕宁回忆录》，见《明镜周刊》1970年11月2日第45期第196页）请注意，将军是在列宁投降和赢得对俄战争三周之后这样想的，结果是，对德国人十分需要的战略原料和供应后备物资（乌克兰的粮食、肉类、煤炭和金属）落入他们手里，而他们在东方的师团也得以解脱并调到西线。

在那位布吕宁的叙述中更有意思，作为历史文献异常重要的，是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元帅的证词。布吕宁说，1932年他出任总理之后，就开始向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证明，若是正确对待，本可以在1918年制止士兵造凯撒的反，但老头子摇头否定说：“不……我早在1918年2月就知道，战争已经输定了。但是我想给鲁登道夫再一次机会。”（同上，第178页）这些证词，特别是随后发生的证实这些证词的、导致1918年11月革命和德国在西线投降的事件表明，德国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还能在西线坚持八个

月，多亏列宁一人。

列宁的门徒马后炮地把预见德国1918年11月革命的政治英明和远见归功于他，其实，正是由于列宁的投降这场革命才推迟发生了几个月。历史绝对清楚地证明，在预测事态发展、包括德意志帝国的崩溃方面，正确的不是列宁，也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布哈林和兴登堡。真是命运的嘲讽，把列宁从布列斯特单独媾和中拯救出来，又把俄国丢失的领土归还给它的恰恰是被列宁那样挑战式背叛的前俄国盟友：法国、英国和美国。

尽管米留可夫写过，有一段时期德国人试图依靠俄国军官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转折中的俄国》，1927年巴黎俄文版第2卷），但布尔什维克官方历史学家却怀疑这一点。相反，他指出："甚至在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时，德国人也没有象最初威胁那样把自己的士兵开进莫斯科，而仅限于把使馆定员扩大到三百人。"（《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版第7卷第461页）

凯撒需要的不是米留可夫和切尔诺夫，更不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投降分子列宁。

六十年代末，苏联开始出版一套《苏德关系》文件集。文件的选择当然都是片面的、有倾向性的，为的是证明列宁的伟大不凡和高瞻远瞩，证明其反对者在有关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单独和约的争论中鼠目寸光和微不足道。尽管是片面的"阶级选择方法"，但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还是收入了德国出版的某些文件，而这些文件恰恰是批驳布尔什维克历史家们认为业已得到证明的东西。1918年的这些德国文件一方面相当淋漓尽致地描绘了1918年初德国本身的内部形势，另一方面也相当雄辩地证明了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在对待俄国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命运问题上的态度。

1918年2月5日在柏林帝国办公厅的会议上，出席的有总理赫特林、国务大臣屈尔曼、奥地利部长切尔宁、兴登堡元帅、霍夫曼将军等，主战派头子鲁登道夫在坚持进攻的同时，毕竟承认，假如新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那末，“说实在的，它们的进展也将是缓慢的，因为要考虑到大雪、糟糕的道路和辎重力量没有足够保证”（《苏德关系》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89页）。屈尔曼在那次会上认为同托洛茨基签订和约为宜，因为“即使同托洛茨基签订和约，无论就对协约国的态度，还是就我们本身的状况来说，也都是胜利”（同上，第290页）。

在托洛茨基示威性地拒绝了德国条件的那一天，即1918年2月10日，总理在给凯撒的电报中写道，“人民认为，德国的利益要求媾和”，同时指出，拖延媾和只能引起新的示威、罢工，而这一切都势将导致“我们将不会拥有人民和议会的多数，所以我不想对这种局面的可能结局承担责任”（同上，第315页）。

为了讨论托洛茨基为答复鲁登道夫要求“结束军事战争”而宣称“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之后的形势，二月十三日在凯撒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会上，海军总参谋长霍尔茨道尔以毫不含糊的军人语言对自己的同僚说：“没有任何希望很快取胜和抽出部队调往西线。”（同上，第325—326页）

这次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停战逾期后恢复军事行动的决定（根据停战条件，一方废约七天之后即为逾期。既然德国人把托洛茨基2月10日的声明视为废约，所以军事行动只能在2月17日后开始）。但指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为自己提出的仅仅是有限的军事目标，首先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副国务大臣冯·拉多维茨在把会议决定通知给外交总署新闻局局长时写道：“一俟停战期满，即行采取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恢复我占领区毗邻地区之秩序与平静……军事行动应能确保

我方边界，使其以少许部队即可护卫，从而解脱出大部队以开往西线”（同上，第329页）。

在其政治目标中亦可指出同样之点，——德国人不仅主张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反对支持俄国的某种反布尔什维克运动。

在漫长的历史回述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代表大会上来。

关于新党纲的报告仍由头两名报告人来作：列宁作报告，布哈林作副报告。无论作报告的人，还是参加讨论的人，都没有原则分歧。引起某些不同意见的两个问题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问题和关于国家消亡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定义问题。关于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早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就已经提出来了。列宁是这样论证自己建议的：“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都背叛了社会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我们应改名为**共产党**，来代替‘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4卷第6页）[①]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以两个论据来解释这一建议：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自己的党称为共产党（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用“共产党”这个名称代替“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科学上更为确切，而且同时指明了党的最终目标（建设共产主义）。此外，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已被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玷污了，他要从此丢掉这件“肮脏的旧衬衫”。最激烈反对列宁的是党的著名活动家斯切克洛夫。他说，“坚决抗议更改名称，建议保留光荣的旧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用“共产主义者”一词代替偶然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一词放在括号中。在就列宁和斯切克洛夫的两项提案进行表决时，列宁获得了多数票，尤其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页。——译者注

是布哈林支持了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56—158页）。

列宁还在1917年革命之前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就顽固地证明，每一次大的战争都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起源。在共产主义专政已经在俄国取胜的条件下，列宁在自己的党纲报告中，认为需要向党提醒这一理论并把它纳入新纲领中去。列宁援引恩格斯在1887年的著作说：

"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在遭到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给群众造成破坏、野蛮、痛苦和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或者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或者是创造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①，战争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同上，第190页）。

如众所知，中国共产党迄今还在不断鼓吹列宁关于大战同共产主义革命相联的理论，她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后者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犹疑不决和摇摆不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北京的乐观主义相反，热核战争的结果将不是革命，而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引起严重分歧的是，布哈林提出要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下定义的建议，其含义是，共产主义者所期望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儿。还有，既然伴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国家要消亡，那末就要在纲领中定下国家消亡过程的速度。他并不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空想所诱惑，而正是为这样一个社会才夺取政权的。他对政权的评价有多高，他对其社会后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77页。——译者注

果的评价就有多低。但在一个方面列宁很愿意想入非非——这就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今天，当读到列宁的有关痴人说梦时，简直惊诧不已，这位革命巨匠竟然可以达到怎样荒谬的地步。请看列宁在反驳布哈林时是怎样说的：

"什么时候国家开始消亡？在此之前我们来得及开两次以上的代表大会（按党章，当时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作者），以便告诉大家：请看，我们的国家正在如何消亡。"（同上，第162页）

列宁的梦呓当然基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言论。在斯大林那样清醒的权力大师没有把列宁的梦呓抛到九霄云外之前，它在苏联共产党内一直被当作正式教条。无与伦比的"辩证法大师"斯大林在1933年鲜明而又毫不含糊地指出：

"国家消亡的到来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是通过国家政权的极大加强。"（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47年俄文版第394页）

讨论结束时，列宁建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制定新纲领的最后文本。代表大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而倾向于以代表大会的名义成立一个专门纲领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七人委员会。当在委员会候选名单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中央委员乌里茨基提出反对，理由是他不知道斯大林写过什么纲领性文章，而建议由卡尔·拉狄克代替斯大林参加委员会。执行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一向同斯大林关系紧张，但却支持斯大林候选，说斯大林是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文章的作者。一共提出九名候选人。表决结果是有意思的，它标志着每个作为党的理论家和党的领袖的威望的大小。

表决赞成：

列宁　　　　——37票

托洛茨基　　——37票

布哈林　　　——36票
斯米尔诺夫　——32票
季诺维也夫　—— 30票
索柯里尼柯夫——25票
斯大林　　　——21票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63页)

这七人被选入纲领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他们向1919年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提出草案。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减少到十五人。他对这一建议的解释是，原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太臃肿(开头二十一人，后来二十四人)，并且从来也没有全部聚齐过，而"在十月革命期间九至十二人竟然成了定额"(同上，第164页)。因此，斯维尔德洛夫认为，十五名中央委员是"最合适的"数额。这项建议无疑出自列宁及其支持者，他们想确保自己在中央的可靠多数。可是，另一方面，列宁也领悟到，不让"左派共产主义者"参与中央委员会，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这是他出于策略考虑想要避免的。

"左派共产主义者"识破了列宁的策略，宣称为了建立列宁所希望的"清一色中央"，他们压根儿拒绝进入新中央。就这一问题声明不进中央的有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然而，列宁很快发觉了危险性而让步了。他甚至违背本人的意志坚持要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进入中央，一些作为正式委员(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另一些作为候补委员(洛莫夫、乌里茨基、约费)。列宁说：

"洛莫夫十分精明地援引了我的讲话，我是要求中央能够执行单一路线。这并不意味要中央所有的人都只能有一个同样的信

念。这样看，将意味党走向分裂……我也曾处于这种状况，在接受不签订和约的建议时，一言不发，但丝毫也不忽视我不对此负责这一点。”（同上，第167页）。接着，列宁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需要试图找到某种制约办法，以便刹住把退出中央当作时髦的作风。”（同上，第167页）

列宁忘了，正是他，列宁，在处于少数时两次赶“时髦”威胁要退出中央，第一次是在1917年9月29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34卷第282—283页），第二次是在1918年2月23日（《党中央记录汇编》俄文版第211页）。可现在，当他的反对者赶这种“时髦”时，他便想找一个“制约办法”来对付他们。他确实找到了这种办法。他提出一项在各个政党的实践和历史中都是没有先例的动议：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进中央。代表大会认为，拒绝进入中央在党的目前状况下尤为不可取……所以代表大会……不理会这一声明而进行选举。”（《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78页）

列宁的动议被多数票通过。然后开始对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提名进行表决。会场内有表决权的代表共四十四名。其中十名拒绝投列宁及其提议的中央人员组成的赞成票（索洛维约夫正式宣读了名单）。表决以投票方式进行——三十九票有效，五票无效（“空白票”）。表决计票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列宁——34票、托洛茨基——34票、斯维尔德洛夫——33票、季诺维也夫——33票、布哈林——32票、索柯里尼柯夫——32票、斯大林——32票、克列斯廷斯基——32票、斯米尔加——29票、斯塔索娃——28票、拉舍维奇——27票、施米特——26票、捷尔任斯基——26票、弗拉基米尔斯基——24票、谢尔盖也夫——23票。

候补中央委员：约费——24票、基谢廖夫——20票、文特尔——20票、乌里茨基——19票、斯图奇卡——24票、彼得罗夫斯基——23票、洛莫夫——21票、施略普尼柯夫——22票（同上，第170页）。

就这样，列宁得以建立这样一个中央，在这个中央里反对派虽然有代表，但却没有决定性影响（三名正式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

代表大会通过了战争与和平决议的极其重要的附件。这个附件迄今被认为是党的现行法律，所以收入了1970年的苏共决议法典。（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70年俄文版第1册第27页）这个附件的文字如下：

“代表大会特别强调，中央委员会享有全权随时撕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一切和约，并有同等权利向它们宣战”（《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76页）。

假如列宁在那个原子以前的时代使用这个独特的权利，也还不致造成文明的毁灭。可是，如果苏共的某个新独裁者在我们热核时代使用这个权利，那该会怎样呢？只要苏共中央不在自己的例行或非常代表大会上取消这个可怕的决定，克里姆林宫关于“和平共处”的说法就不能被视为是真诚的。

另一个附件，尽管是列宁提出的，但与他的建党学说的主要原则明显矛盾。这个附件说，“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即使留在中央，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并不必对中央路线负责（《苏共决议》第1册，1954年版第406页）。这样，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不仅党内意见自由第一次合法化了，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自由，主要是派别自由，也第一次合法化了。

只是两年之后，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意识到，他恰恰在自己关于党的纪律和坚如磐石般团结的理论的核心

问题上，犯了何等可怕的过失，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进而，他在党内造成一种永远特别戒严状态，这种状态至今依然存在。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退出苏维埃政府作为对接受单独媾和的回答。在东南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旧军官团举起了为把俄国从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大旗。国内战争爆发了。成立了自卫志愿军，为首者先是阿列克谢也夫、科尔尼洛夫，后是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弗兰格尔……

从社会民主党到孟什维克、从立宪民主党到保皇派的所有俄国政党都一齐起来反对自伊凡雷帝时代以来俄国的史无前例的可耻投降。

凯撒的德国对刚刚爆发的国内战争态度如何呢？不言自明，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四个月后，在国内战争打得激烈之时，1918年7月2日，威廉二世主持召开了德国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议，研究德国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策略和政策。就这一问题作报告的又是那个鲁登道夫。他说，“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大大削弱，而保皇分子的影响大增。应当考虑到随时可能发生政变”。德国总理同意这一估计，并强调，他怀疑保皇派会承认布列斯特条约。对于德国，非此即彼的严重选择越来越明显——在这场历史大搏斗中支持谁：布尔什维克还是保皇派（德国人当时认为俄国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是保皇派）。皇帝威廉和保皇派鲁登道夫，尽管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还是做出了反对保皇派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选择。会议采纳了鲁登道夫的观点，就是“即使保皇派是维护秩序派(Ordnungselemente)，我们也不必试图在目前推翻布尔什维克”（《苏德关系》，同上，第567页）。

1918年7月6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被杀一事表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何等坚定不移又是多么长远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柏林也仅限于要求派一营德国士兵到莫斯科去守卫德国使馆。受列宁的委托，驻柏林大使约费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帝国政府。他说，这样的措施会导致布尔什维克被推翻，更有甚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在莫斯科举行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前线总司令、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已经下令要部队向莫斯科挺进，反对列宁政权。结果，德国人收回了自己的要求。列宁第二次被德国人所救。

这里应当略谈一下那些为布尔什维克掌权铺平道路的人的命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夺取政权后，列宁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孟什维克，而是社会革命党人——俄国农民思想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农民视为反动势力。早期的列宁对农民也持这种态度。但1905年革命使他确信，农民是个极易点燃的阶级，善于利用这个阶级可能导致他当政。任何人都没有象列宁那样害怕斯托雷平的“土改”成就。列宁很明白，如果斯托雷平能够把有少量土地的村社成员——暴动者变成自己土地上的殷实所有者，农民就不会再是容易点燃的革命力量。列宁幸灾乐祸地提到斯托雷平的微薄成就（由于反动派和革命派都反对的结果）。利用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心理进行反对一切私有制度的革命——这是列宁的宗旨。

由此出发，列宁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理论。为了这一革命的利益，要支持农民的最反共要求，但正如马克思一样，列宁并未忘记，他是在同反动势力打交道。这便是为什么列宁还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高潮时期写道：

“我们起初是用一切方法尽力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

民。”（《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9卷第213页）①

列宁的土地纲领的理想，就是“土地国有化”。而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则鼓吹“土地社会化”，也就是把土地交到地方农民委员会手中，以便在农民中分配（孟什维克要求“土地市有化”）。

二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看到他们的“土地国有化”口号毫无前途。没有任何一个被选出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出席1917年6月的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整个大会是在社会革命党的旗帜和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迅速判明形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实质上作了亲社会革命党的发言，而三个月后，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举行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搞了政党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剽窃：他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名义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荐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土地纲领。所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致赞同下批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变。

列宁接受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一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主义的策略灵活性，它近乎意识形态中的无原则性，只要这是夺权利益的需要就行。早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宁曾写道，“（社会革命党——作者）的纲领是绝对没有生命力、充满内在矛盾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257页），“**社会革命党失去了一切社会基础。它不依靠任何一个社会阶级**”（同上，第5卷第132页），“社会革命党实质上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最新机会主义与最老民粹派的折衷联合”（同上，第362页）

《苏联大百科全书》在列宁一栏作了扼要补充：“早在伟

---

①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页。——译者注

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社会革命党就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1版第52卷第289页）

正是从这个“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那里，列宁不仅拿去了全部“反革命”土地纲领而不加任何一点布尔什维克的修改，而且捍卫这一纲领，反对那些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人，这些人说列宁对社会革命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关于这一点苏哈诺夫写道：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在作“土地法令”报告时说：“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3页）①

实质在于，列宁确信，通向政权的道路要经过接受社会革命党这个“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才行。

如果说，列宁在思想上投降是为了赢得在政治上的胜利，因而他算尽机关是可以解释得通的话，那末，在需要解释，为什么列宁不仅接受社会革命党这个“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而且还同它组成苏维埃联合政府（1917年11月—1918年3月）这个问题时，党的历史学家的束手无策与低能就是令人惊讶的。（在对待布尔什维克政变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11月分裂成两个党——以维克多·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和以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当然，从列宁方面而言，这不是恋爱婚姻，甚至也不是预约婚姻。这场婚姻，如我们所见，是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为首的中央右派强迫给他的。列宁一开始就坚持建立一党政权的观点。他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译者注

被迫妥协，伺机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自己的政府。但用不着这样做，因为在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单独和约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退出了政府。不过他们仍然留在苏维埃里，既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留在地方。他们不但留下来，而且开始大力加强自己在地方苏维埃的地位。在参加苏维埃第五届全俄代表大会的选举中（1918年7月），尽管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在地方执委会中坚如磐石，尽管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的政治蛊惑技艺甚高，尽管这个宣传机器耍尽花招和手腕，但是，在第五届代表大会的1164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仅有773名，其余代表分布情况如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70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名，保皇分子——4名，其他非党的或有党派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13名。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列宁不能再自诩为完全的主人。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派提出谴责对外政策（单独媾和、同德国人串通）和对内政策（恐怖、死刑）的议案时，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发言者进行最野蛮的起哄，目的是要挑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场，这个目的达到了（在大剧院）。正如研究列宁的苏联评论员坦率地写道，利用这一点，代表大会“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在一切问题上都‘通过了一致决议’”。（《列宁全集》俄文第36卷第628—629页）

后来发生的事件，许多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神秘”，但仅仅是他们感到神秘而已，因为是秘密活动的经验老手——列宁的手在操纵这些事件。当然，只要苏联国土上存在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我们就永远不能洞悉“神秘事件”的细节。但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事件对谁有利？在白卫军开始打内战的情况下，列宁需要自己政权内部的团结，而为此就要摆脱苏维埃内部的最后竞争者和最危险的敌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但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间和部分城市居民中间仍有

极大的影响，需要找出一个使列宁一劳永逸地易于玩火的借口。这种借口找到了。由行使保护驻莫斯科外交使团安全职能的契卡授权，精明强悍的勃柳姆金于1918年7月6日暗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在勃柳姆金的衣袋里有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签署的私人证件。苏维埃政府虽不否认勃柳姆金的官方身份，但同时宣布，他是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使采取行动的，目的是挑起德俄之间的战争。除验明勃柳姆金是契卡工作人员这一事实外，尚未进行任何调查，可列宁竟然能在次日即7月7日就"知道"，暗杀是受社会革命党指使干的。有两份列宁的七月文件保存下来了：一是同《消息报》的谈话（为什么这样急？），另一个是给察里津斯大林的电报。从这两份文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需要暗杀米尔巴赫伯爵的不是社会革命党，而是列宁。列宁在谈话中说，"一个普通的不识字的老太婆对于米尔巴赫被暗杀的事件，愤恨地说：'唉，该死的东西，到底还是把我们推向战争了！'"这些"该死的"是何许人也，老太婆不得而知，但列宁竟然无须调查就能确切地知道："大家也都立刻完全明白了，并且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行动发生以后，俄国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上。人民群众就是这样评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36卷第519页）① 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勃柳姆金投奔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当年被派往前线并在那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苏联人物》）。

在第二份文件，即给在察里津的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命令对左派社会革命党随时随地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必须随时随地无情镇压这些可怜的歇斯底里冒险分子……要无情地对付左派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1页。——译者注

社会革命党并更经常地汇报。”（1936年1月21日《真理报》）

斯大林作了斯大林式的回答：“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斯大林全集》俄文版 第4卷 第118页）①（无需作此保证②）勃柳姆金是7月6日暗杀米尔巴赫的，而列宁7月7日就已经知道，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杀的。1934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暗杀了基洛夫，而12月1日当天斯大林就知道，这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干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得知，基洛夫是雅哥达按照斯大林布置的任务派契卡人员去凶杀的，而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人员又是按照谁布置的任务杀害米尔巴赫的呢？对这个问题只有以后的历史学家能作出彻底的回答，但目前指出这样一点是重要的：不管事实上是谁组织凶杀米尔巴赫的，也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在既定条件下需要这次凶杀的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而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况且，在政治中重要的不是动机，而是后果。后果不期然而然：就在7月6日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全班人马。对此的回答是，在外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夺取了电报局、电话站，而以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但其中某些人仍然留在军队和契卡指挥部）为首的一支契卡军队占领了契卡的官邸，并逮捕了捷尔任斯基及其另一位副手拉齐斯。列宁威胁说，如果捷尔任斯基不被释放，就枪毙会场内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② 斯大林不但不曾手软，而且利用列宁的授权，在察里津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恐怖活动，以致契卡殡葬队来不及埋葬枪刑队的受害者。得知此事后，列宁建议斯大林“节制”火力。请看1970年首次公布的自供状：“当斯大林在察里津杀人时，我想，这是错误，想到，杀得不对。我的错误暴露了，我曾打电报说：请谨慎。”（《列宁文集》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7卷第136页）。——作者注

的全部社会革命党人。捷尔任斯基获释了，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却身陷囹圄。

使列宁摆脱“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正是那些被他用单独媾和给予背后打击的人：俄国的西方盟国——法国、英国、美国迫使德国投降（爆发了革命，凯撒退位）。1918年11月13日莫斯科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

第十七章

列宁、反对派和第八次代表大会

苏维埃俄国得以废除布列斯特单独和约只能是由于德国向西方强国投降的结果，但布尔什维克依然认为，德国投降"有某些消极的作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俄文版第220页）①布尔什维克看到的这种消极作用是，从此协约国变成了"欧亚两洲的统治力量"②，它们不同于德国人的是，可能奉行推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方针。"各协约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援引的斯大林教科书中这样说（第215页）。③

通过干涉推翻布尔什维克制度这个完全可能的事情，被布尔什维克视为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协约国从来没有把通过新战争推翻布尔什维克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

对制度的致命危险来自内部，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应是，在俄国爆发了内战，内战同时在不同地区发生（尽管没有统一领导）：在北部、在伏尔加、在西伯利亚、在北高加索、在顿河地区。尤其危险的是两支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西伯利亚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和北高加索邓尼金将军的军队，这两支军队缓慢地，然而顺利地朝莫斯科方向挺进。

---

①②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5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49页。——译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讨论制定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参加大会的代表中，301名有表决权，102名只有发言权（有趣的是，出席代表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马尔托夫派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代表，代表这派向大会致祝词的是洛佐夫斯基）。

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

一、中央报告。

二、通过新党纲。

三、成立共产国际。

四、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

五、农村工作。

六、组织问题。

七、选举中央。

被选进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多维奇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场被提名的还有李可夫、布哈林和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撤销了自己的候选提名，斯大林没有撤销，但表决时没有通过。托洛茨基没有选进主席团是因为他正在前线。

加米涅夫是自1917年11月退出中央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坚持建立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全体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的布列斯特危机期间，加米涅夫积极支持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为此列宁赦免了他，甚至立即把他列入大会主席团，而"虔诚的"斯大林却只好自革命以来第一次坐在普通群众之中。（在这样的"小事儿"上喜欢记仇的斯大林从来没有原谅伊里奇！）

列宁在中央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论点：第一，只有战争才能产生革命，第二，民主国家和苏

维埃俄国之间的共处绝对不可能。列宁说：

"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实行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一次同战争无关的大革命吗？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7页）①

为了做出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决断，列宁建议在"资产阶级专家"即前沙皇军官的帮助下，成立和建设强大的纪律严明的红军。列宁就是这样提出利用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他说："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双手来创建共产主义社会。"（同上，第20页）②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表现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建立。列宁说，通过把从俄国战俘营招收的并在党中央受训的前战俘秘密遣送到西方国家后方的办法，我们做到了使"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布满了这些国家"。（同上，第24页）③

列宁的中央总结报告的最后部分是谈组织问题。他在组织问题上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如下一段话中：

"组织工作从来不是一般俄国人特别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组织任务。"（同上，第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泽者注

② 同上，第131页。——泽者注

③ 同上，第136页。——泽者注

24页）①

如果谈到布尔什维克在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艺术或者革命后的“权术”，那末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明显矛盾。恰恰是这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奠定史无前例的、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金字塔的塔基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如果说这金字塔基础的基础——政治警察（契卡）建立于1917年12月20日的话，那末组织专政武装力量的原则却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在这次大会上最终确立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专政驾御者，我把他称之为“党内之党”，或曰党的机关等级制。这次代表大会对专政的目的和任务作了思想上的全面论述（通过了新党纲）。这里，我们第一次参与开始这个痛苦的、甚至可悲的过程，即为权力无限的党的机关篡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过程。然而党本身对这一过程的抵制是巨大的。在这以前，列宁一直争取在中央之内和中央之首不容置辩的个人权威，现在，在相对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他又在争取中央和高踞全党之上的整个党的机关等级制的不可置辩的权威。党通过其代表大会开始对这种情况进行坚决抵制。这种抵制的表现是两个反对派的出现：一个是在组织问题上，另一个是在军事问题上。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遇上了这两个反对派。代表大会上的“组织反对派”以奥新斯基（奥波连斯基）为首，“军事反对派”以斯米尔诺夫为首（两人均在1907年入党）。

奥新斯基就列宁的总结报告第一个发言，他说：“列宁同志在今天的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上发表纪念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时指出，在激烈斗争的时代，实行工人专政，就要提出个人权威、个别人物的道德权威原则，这个人的决定无须长时间讨论而须全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译者注

体服从。”（同上，第28页）

奥新斯基证明说，列宁提出的这个单独个人的“权力哲学”，在实践上导致，管理党和国家的不是中央全体，而是个别“有权威的个人”。他说：“我们不是全体一道决定问题，而是单独个人决定问题……中央委员会作为整体事实上已不复存在……问题往往由有权威的同志决定……我们应当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争取产生一个代表同志式整体的中央。”（同上）

在大会专门小组的会议上特别讨论了组织问题。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作报告，奥新斯基代表莫斯科省组织作补充报告。季诺维也夫报告了中央领导人的观点，就是党与党的机关的建立不是按各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联盟原则，而是按最严格的集中原则。这些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只享有俄罗斯联邦党的州或省委员会的权利，并且“党的最高一级的所有决定，下级要绝对执行”（同上，第160页），也就是说，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州委会和省委会无权反对莫斯科中央的决定，而只能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作补充报告的奥新斯基重申了自己的老论点：不幸在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作为整体的中央，有的只是领袖，他们执行着不是党的，而是个人的政策。奥新斯基问道：“党的政策是如何确定的呢？”他的回答是：“更多的是这样：列宁同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互相谈谈就决定了当前的问题……所有的决定都是个人决定……这说明党正在蜕变……要使中央广泛工人化，要有足够数量的工人参加中央……要通过一项决议，使中央选举务必在认真讨论每一名个别候选人之后进行……曾向（上次——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名单，这个名单经过表决通过了，但其中有许多装饰性人物……这是祸根。大会必须结束党内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同上，第166—167页）

代表伊格纳托夫认为，党内正在官僚化。他说："我党必须杜绝我们组织的这种官僚化、这种脱离群众。"（同上，第181页）他认为挽救办法是党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他补充道："尽管伊里奇的脑袋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但仍需在这个脑袋周围有人。"（同上，第182页）

代表斯克雷普尼克也认为，自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党内没有集体意见，没有集体领导。他说："除布列斯特和约外，我不记得有别的问题交给全党讨论过……党讨论这些问题只是在它们已经被决定之后。"（同上，第175页）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中央对大会上开展的对党的领导的批评明显不满。他说："本来期待本党党员有比这里更诚恳更公正得多的批评。"（同上，第184页）

关于党的机关问题的讨论的结果是，建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制定提案。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报告人季诺维也夫和反报告人奥新斯基。

在讨论苏维埃建设和党与苏维埃关系的组织小组会议上，奥新斯基强调指出，本来应有的那种苏维埃政府并不曾有过。最重要的政府政策问题都是由少数人背着政府本身决定的。他说：

"目前，实在说，如果就人民委员会而论，我们并没有统一的政府。在1917到1918年的11月、12月和1月我曾有幸作过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那时基本政策问题都在人民委员会里讨论……可如今，这种情况不见了。"（同上，第192页）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皆因中央违背苏维埃宪法，把自己变成了国家政府。奥新斯基提议恢复让多数中央委员参加苏维埃政府的苏维埃合法性。

代表伊格纳托夫也指出党的机关篡夺苏维埃国家政权这一点。他说，我们开始时用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

“后来我们的建设却有点走样了。我们偏离了最初的道路……我们在宪法中作了一些规定，但后来背离了这些规定……地方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正逐步丧失它们理应起到的作用……不能容许党的组织把苏维埃的职权攫为己有。”（同上，第197—199页）

代表安东诺夫关于苏维埃濒临绝境的思想表达得更加简单明了：“我们看到，不知为什么苏维埃正开始慢慢死去。”（第200页）

萨普隆诺夫在为反对派的提纲辩护时说，“反对派并非为当反对派而产生，显然是生活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听取这些要求”（第201页）。

列宁没有参加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但通过季诺维也夫之口表明，苏维埃是招牌，虽然是冠冕堂皇的招牌，而政权则是中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如今只能解释成“一切权力归中央！”。季诺维也夫在对反对派提起列宁关于党的理论时说：

“出面执行的是人民委员会，而做出决定的是党中央。这一点应否改变？不，不应改变。既然如此，你们的全部提纲就落空了……在你们的议论中没有党中央，所以，我重复一遍，反对党的一切议论都落空了。”（第222页）

季诺维也夫的提纲被大会多数接受为基本原则。在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最后决议中确定了建党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由各级党委领导党和国家。第一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早在1919年1、2月成立的中央领导机关——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在中央全会之间做政治决定，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的组织局做组织决定，此外，还建立了中央书记处，由一名有关书记、一名中央组织局成员和五名技术书记组成。书记处附设由各部组成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人数由十五名增至十九名。

还对反对派作了让步，在这个决议中写道，“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把党的机构的职能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同起来。党要**在宪法范围之内**，通过苏维埃机关贯彻执行自己的决定。党尽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同上，第429页）。

这是出自列宁的策略手腕。在向代表大会的反对派被迫作出让步时，列宁并没有想要容许国内有新的“双重政权”——党的政权和苏维埃的政权。根据他的概念，最高权力只能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央权力。既然在由代表大会所体现的党的上层中，关于民主、人民政权和无限权能的苏维埃的幻想还方兴未艾，那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并相应地改变策略手法。

代表大会上人数甚多、成份又很危险的是“军事反对派”，其宗旨是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这个反对派早在1918年秋八大之前就出现了。它的最近目标是要离间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它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搞倒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以便往后更易于同列宁说话。“军事反对派”的代表在地方党代表大会上激烈批评托洛茨基。甚至在《真理报》上登出文章，批评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和军事领导（1918年11月29日—12月25日《真理报》）。

“军事反对派”是由斯大林鼓励和暗中领导的，但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保持使自己随时可以脱身的状态”（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73页）。伏罗希洛夫在“军事反对派”中充当斯大林的代言人，他指挥察里津战线，而斯大林自1918年6月起任这个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央内部和在同列宁的通信中，斯大林不仅不掩饰他支持“军事反对派”这一点，而且罗列许多理由说明托洛茨基军事政策的弊病（见斯大林在1918—1919年期间的军事信件和电报，《斯大林全集》1947年俄文版第4卷）。在《斯大林全集》第4卷所附的“传记年表”中说：“（1918年）10月8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打

电报给列宁，要求在中央讨论有使南线崩溃危险的托洛茨基的行动问题。”（《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453页）①。

列宁作何反应呢？当反托洛茨基阴谋开始对制度产生危险性质时，列宁决定答复。在列宁起草的1918年12月26日中央决议中说：

“军事部门的政策，如同其他部门和机关的一样，是在党通过中央发出的总的指示的准确基础上得到贯彻执行的，并且是在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的。”（1918年12月26日《真理报》）

就这样，“军事反对派”当时决定在八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正确评价反对派的行动，应当叙述一下它的历史。

托洛茨基早在1930年《我的生涯》回忆录中，就首次公布了中央文件和列宁的信件，它们有力地证明，“军事反对派”乃是斯大林在行将开始的反托洛茨基斗争中的党卫军（这些文件至今未在苏联公布）。下面是托洛茨基的简短叙述：

“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早在组织红军的最初几个月内就形成了。其基本主张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专家，反对实行铁的纪律，反对军队集中制……察里津在红军和军事反对派中占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都纠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斯大林在察里津呆了几个月。斯大林把反对我的幕后斗争——这一斗争构成了他当时活动的实质部分——同伏罗希洛夫的不太高明的反对派结合在一起……然而，斯大林保持使自己随时可以脱身的状态。每天都有总司令部和前线司令部的要求传到察里津。无法使其执行命令……甚至也无法得到对质询的答复。列宁不安地注视这一冲突的发展。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并显然怀疑，察里津人的固执说明，有斯大林在幕后导演……1918年10月4日我通过直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查无此注。——译者注

通电报线对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说：'坚决要求把斯大林调回。我留下伏罗希洛夫任第十军（察里津）司令员，条件是服从南线司令……无暇搞外交谈判。'斯大林被召回去了。10月23日列宁给我写道：'斯大林很想在南线工作……斯大林希望，他在工作中能够证实其观点的正确……列甫·达威多维奇，我把斯大林的这些话都告诉您，我请您斟酌并回答：第一，您是否同意当面听取斯大林解释，他为什么同意来；第二，您是否认为有可能在已知的具体条件下消除以往的磨擦，并安排好共同工作，这是斯大林所非常希望的。至于我，那末我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安排好同斯大林的共同工作。列宁'。"（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69、171—177页）

托洛茨基复电同意妥协并任命斯大林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线大本营设在哈尔科夫。应托洛茨基要求，伏罗希洛夫也被调到那里。但在那里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继续奉行不服从总司令部命令的"察里津"路线（伏罗希洛夫本人曾引述文件说，斯大林对总司令部的某些命令所加的批语是："不予理睬！"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与苏联武装力量》，1951年俄文版第27页）

因此，1919年1月10日托洛茨基打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我断然声明，导致察里津军全军覆没的察里津路线，不容在乌克兰出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路线意味着全部事业的毁灭。"（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177页）列宁认为，需要再次试探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为答复这一要求，托洛茨基于1919年1月11日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妥协当然需要，但不能是腐朽的妥协。实际上，所有察里津派都聚到哈尔科夫来了……我认为，斯大林袒护察里津派是最危险的祸端，比军事专家的任何背叛和出卖都更坏。托洛茨

基。”（同上，第177页）

托洛茨基以如下一段话结束自己有确凿证据的叙述：

“毫不奇怪，军事工作给我制造了不少敌人。当我用胳膊肘推开那些妨碍军事成功的人时，我没有左顾右盼。或者，当我匆忙中碰到了围观者的痛处时，竟未及道歉。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的人是有的。不满的和有怨气的就去找斯大林，有时找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也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前线的每一个挫折都招致不满者对列宁的围攻。而斯大林在那时就已在幕后指挥这些鬼蜮伎俩了。”（同上，第179—180页）

斯大林和“军事反对派”正确地看到，为了使他们的路线取胜，除了让托洛茨基同列宁对立外，别无可靠途径，这样才能借助于列宁把托洛茨基搞掉，然后更容易同列宁说上话。（布哈林说：“斯大林向列宁脚边挖地道”，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184页）

契卡副主席缅任斯基在向托洛茨基报告军内契卡特别部的工作时，告诉他，斯大林“向列宁和别人暗示，您在自己周围纠集一些人专门反对列宁”。但当托洛茨基在一次谈话中问列宁：“莫非这里确有一点儿是真的？——我立即发现，列宁异常激动。甚至脸都红了。‘这是小事儿’，他迟疑地重复说……但我明白了，缅任斯基不是空口说白话。如果列宁否认、不肯说，那仅仅是因为害怕冲突、争吵、个人斗争……而斯大林显然播下了毒种。只有很晚以后我才明白，他是怎样按部就班这样做的。”（同上，第183—184页）

在把列宁—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提交大会讨论时，党内和军内的气氛就是这样。

自然而然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对托洛茨基那样沉重而又充满敌意的气氛下，当涉及的纯系关于托洛茨基的军事领导

时，托洛茨基却决定不出席大会呢？

这是否是列宁的策略步骤，为了不使反对派被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必不可免的激烈回答所激怒，而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更好维护他的立场呢？托洛茨基对此没有回答。斯大林的历史著述中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新的《苏共党史》作了回答，这回答的"毫无党性"令人惊讶。书中说：

"由于对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军事问题的意义估计不足，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之前就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在东部战线和其他几条战线上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把他本人及全体军事代表派到作战部队里去。前线党组织的代表们反对这一建议。大家都明白，军事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延。中央全会同意代表们的意见……托洛茨基本人则被允许到前线去，因而他没有参加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2分册第276页）

现在我们回到代表大会上来。

在开幕会议上，就"军事形势"问题作报告的中央报告人是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他阐述了经中央批准的托洛茨基的"报告提纲"。斯米尔诺夫介绍了"军事反对派"的观点，他是补充报告人。

为了正确估价"军事反对派"的份量和意义，应当对其领袖人物作某些咨询。

在代表大会上领导"军事反对派"的有：

斯米尔诺夫（1907年入党，军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布勃诺夫（1903年入党，以前和后来都是中央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戈洛谢金（1903年入党，1912—1917年中央委员）；

萨发罗夫（1908年入党，第三军党领导人）；

亚力山德罗夫（1900年入党，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员）；

米雅斯尼柯夫（1906年入党，西部战线前司令员，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索林（1917年入党，东部战线军事法庭主席）；

卢希莫维奇（1913年入党，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托尔马切夫（1913年入党，第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米宁（1905年入党，第一骑兵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泽姆利亚奇卡（1898年入党，1917年为莫斯科州党委书记、第八军党领导人）；

皮达可夫（1910年入党，乌克兰政府首脑）；

雅罗斯拉夫斯基（1898年入党，中央军事组织领导人、1921年为中央书记）；

伏罗希洛夫（1903年入党，察里津前线司令员，斯大林是这里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这里要在括弧中指出，证明斯大林是“军事反对派”精神首脑的另一个事实是，后来，在斯大林制度时期，他们都当上了中央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要么就在政府机构里身居高位。但在1936—1939年的“大清洗”期间，斯大林按斯大林方式收拾了他们：不仅“军事反对派”的领袖人物，而且连同其普通参加者都遭杀害，斯大林只保存了那些最忠实的仆从的性命：泽姆利亚奇卡、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索柯里尼柯夫在阐述中央军事政策时指出，自愿组成红军并选举指挥人员的制度业已寿终正寝。（乘十月革命的余波未息，也是为了完成自己以往的许愿，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7年12月26日通过两项法令：（一）“关于选举基础与关于军内政权组织”，（二）“关于使全体军人权利平等”。现在，在政权巩固之后，

中央撤销了这些法令。）按索柯里尼柯夫的说法，自愿参军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即“国家政权事实上不能领导军队”，“终于形成在个别头目周围组成独立小分队的制度”。（同上，第144——145页）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即应当建立大规模常规军，保留从前的等级制度和纪律，大批使用成千上万的沙皇军事专家。

当列宁和托洛茨基确信，无论苏维埃法令，也无论在旧俄军士或党内鼓动员之中进行士兵选举，都不可能造就内行的指挥官时，他们便把所有有关法令都抛到一边，并着手建立由上面指定的前沙皇军官组成的指挥班子。（据托洛茨基统计，至1919年初，红军中这样的军官大约有三万人。——见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80页）

索柯里尼柯夫在解释中央的这一新军事政策时指出：“当我们动员士兵起来反对为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制度服务的上层人物时，我们主张选举制……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撤销它所指定的那个指挥班子，这意味对这个政权投不信任票。”（《第八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47页）

索柯里尼柯夫继续说：“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让旧军官全部返回部队，这就是恢复旧军职和旧军队。但这些同志忘了，指挥官旁边还有政委，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同上，第147页）

索柯里尼柯夫举例为中央新军事政策辩护说：“真相已经大白，哪里吸收军事专家……哪里就获得军事成功。相反，哪里……把中央派去的军事专家打发回来，或者象高加索军那样把他们闲置起来，我们就在哪里彻底瓦解和全军覆没……”（同上，第146页）

中央报告人还指出，地方上有这样的现象：地方共产党支部和在军队机关作为普通公职人员工作的共产党员，拚命要把军队

的控制和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对军队的领导只能是集中的领导。这种领导只能来自中央、苏维埃政府及其军事机关。

索柯里尼柯夫在结束自己的报告时，代表中央表示充分信任和支持军事部的路线和方法。他说，“只有在军事机构继续用我们迄今为止所努力实行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只有在这些方法被运用于迄今尚未完全运用的方面去，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把红军建设成共产主义的支柱”。（同上，第152页）

“军事反对派”的补充报告人斯米尔诺夫证明，被吸收在红军里服务的旧沙皇军官团，鉴于自己的出身和思想体系，倾向于白匪军。所以，他们之中经常有人转到敌人方面去，并将继续有人转到敌人方面去。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任命他们到负责的指挥岗位上，给他们的权力比他们的政委还多。有鉴于此，斯米尔诺夫批评了1918年12月12日政府“关于集团军司令员的条例规定”。在这些条例中说，每个集团军和每条战线为首的都是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集团军司令与前线司令一样，都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选拔和批准。集团军司令员在战略行动问题上享有完全独立，并有权任命、调动和罢免部队全体指挥人员、集团军的军事管理机构和机关。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有限制司令员权限的权利，但作战性问题和部队人员编制问题例外，它每次都要把自己的行动向上级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集团军司令的全部命令和指示都必须由一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签署。）

斯米尔诺夫认为，这种制度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在人民委员会的“条例”中规定，“集团军和前线司令员有指挥军队的权力，而政治委员只有权在个别情况下取消集团军司令员或前线司令员的决定，并要把每个这种情况向上级机关报告。在作战问题上，他们（政委——作者）甚至连这样做的权力也没有……一言

以蔽之，政治委员的作用仅限于监督职能”。（同上，第155—156页）他要求代表大会改变这种政策。他还批评了1919年1月颁布的红军纪律条令。他认为，这个条令恢复旧的军官特权，损害红军战士的权利，同时规定了“繁琐的细则”。

斯米尔诺夫在概括自己对军队组织和指挥部分的批评时说：“经验表明，政治委员必须参加指挥，不能只限于监督职能……必须在作战问题方面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决定权。”（同上，第157页）他批评“中央机关过分庞大”，发布相互矛盾的命令。他要求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给予“最严重的注意”。军队政治部的工作建立在官僚主义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集体原则之上。一句话，中央军事政策迄今一直是漏洞百出的，必须重新修改。

大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报名参加讨论的有六十四人。一位官方历史学家写道：“很清楚，这个问题具有很大意义并面临尖锐辩论。”（《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卷第2分册，1968年版第275页）成立了代表大会“军事组”，有八十五名代表参加了它的三次会议，而参加讨论发言的有二十三名代表。无论斯大林时期，还是斯大林后的党史资料，都在“军事反对派”的纲领问题上顽固地、始终不渝地宣扬一个观点，就是“军事反对派”不是反对中央，不是反对列宁，而是单纯反对托洛茨基。（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第224页；《苏共历史》第3卷第2分册第275—276页）

这样的蓄意歪曲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在公布1919年八大报告的“速记记录”时，有关中央军事政策的全部辩论材料被从记录中抽走了。这在俄国国内战争继续进行的条件下，是完全自然的，为的是不让敌人弄清党内军政委阶层反抗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规模和性质。然而，列宁曾发表长篇讲话的代表大会“军

事组”和全体会议的这些材料，战后也并没有公布。为什么？托洛茨基回答如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我在前线——列宁发表了激烈的讲话，为我执行的军事政策进行辩护，驳斥反对派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党的八大军事组的记录迄未公布。”（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81页）

这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新版八大记录的前言中所作的回答：“鉴于秘书记录未经任何整理，有关第四个问题的材料（《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3月21日举行的大会秘密会议，——不予公布。”后面关于军事组的材料说：“鉴于秘书记录未经任何整理，3月20日和21日举行的军事组会议的材料不予公布。”（《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7、13页）在这个“秘书记录未经整理”的遁词中，令人惊讶的与其说是有目的的欺骗，不如说是前言作者们的非常幼稚的打算：读者对党史问题反正一窍不通，也没有任何批判思维的天赋。

然而，任何有批判思维的读者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八大记录中有组织组和土地组会议讨论的详尽速记记录，而对军事组的讨论和列宁在全体大会上关于“军事反对派”的发言这样重大的问题的“记录”却“未加整理”呢？甚至在斯大林被揭露后出版的《列宁全集》中也没有收入列宁的这篇极其重要的讲话，而前言作者们却广泛引用了列宁这篇讲话中对他们有利的地方。（同上，第14、15页）

解释大概不应在列宁对托洛茨基军事政策的“激烈辩护词”中去寻找（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应在大会军事组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表示的不信任中去找。列宁为托洛茨基辩护，就是为自己辩护。这甚至从党的出版者所发表的少得可怜的材料中亦可看出。例如，我们在八大记录的“按语”中看到：“由于军事组展

开激烈辩论的结果，3月21日上午，多数（37对20）投票反对中央和赞同通过'军事反对派'的提纲。而坚持中央观点的少数另外举行了单独会议，并要求把对该问题的讨论移到大会全体会议上去。"（同上，第539页）在多卷集《苏共历史》中也同样读到："在激烈辩论之后，小组多数赞成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反对派提纲……维护中央观点的大会代表……退出了小组会议。"（《苏共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2分册第276页）

列宁一直对"军事反对派"未予认真注意（所以他未报名参加"军事组"，而报名参加了"土地组"），但当发现，事情发生近乎灾难性转折的时候，他便竭力着手平息反对派。他召集了大会秘密会议，会上军事部代表在议程规定之外作了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报告人（阿拉洛夫）报告的情况，迄今仍被认为是秘密。这些情况中的主要之点是：红军中缺乏百分之六十的军事专家。（同上，第276页）列宁想以此论据把反对派手中关于军事专家的主要王牌打掉。但这对反对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于是列宁亲自发言。如前所述，他的这篇讲话从未公布，但官方历史学家说，"列宁深刻阐明了党建设正规军的路线。在他的讲话中对'军事反对派'作了原则性批评……列宁最坚决地驳斥了'军事反对派'对中央的指控。"（同上，第277页[①]）列宁没有就此罢休。他很清楚，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他背后同反对派勾勾搭搭。他迫使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对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的提纲进行辩护，并对"军事反对派"进行原则批评。他

---

① 关于托洛茨基，列宁声明说："当戈洛谢金同志在这里发言时，他说：军事部不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如果您提出这样的指控，如果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负责的发言者，可以对托洛茨基提出指控，说他不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话，——这是疯子的指控。您提不出半点理由来。"（《列宁文集》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7卷第136页）——作者注

们尽管毫无热情，但被迫这样做了。斯大林说："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250页）①

在其他中央委员作了同样发言之后，列宁深信他已经彻底解除了反对派的武装，建议在大会上表决中央提纲和斯米尔诺夫提纲。意外的表决结果使列宁顿时感到垂头丧气：赞同中央（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提纲的有176名代表，赞同斯米尔诺夫提纲的——95名代表，弃权的——3名，未参加投票的——1名。（《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73页）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列宁从未碰到过这样庞大、抱得紧紧而又坚定的反对派。他更加狂怒地向敌人扑去。列宁丰富的策略武库中的各种武器都用上了：外交、施加压力、威胁和对反对派领袖进行单独"说服"的惯技。列宁做完这全部工作的时间是相当短暂的——从3月22日到23日。3月22日主持大会的季诺维也夫宣布，中央执行局和大会主席团向大会建议：

"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在昨天就军事政策这一根本问题出现的多数与少数之间寻求接近……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代表大会，不要转入对被接受为基础（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提案进行详细讨论，而先把问题提交给五人委员会。"（同上，第273页）

中央执行局和主席团推荐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数派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彼泽尔恩；少数派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萨发罗夫。列宁难以想出更合适的委员会了。被押下赌注的与其说是反对派的命运，毋宁说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官运。列宁所预见的"奇迹"发生了：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军事政策的"一致决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2页。——译者注

定”。3月23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向代表大会汇报了委员会工作的结果：

“因为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提纲作为基础，所以委员会首先研究了这些提纲，认为必须只作文字上的修改……当我们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大会上批评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提纲时，——这些提纲是索柯里尼柯夫在这里所维护的，——我们就曾指出，原则上我们并不反对这些提纲中问题的提出。”（同上，第339页）

反对派态度的这种变化令人惊诧不已。两天前它还在军事组“尖锐激烈的辩论”中驳斥了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提纲，而今天竟认为只需作“文字上的修改”。这种变化之所以成为可能，盖因斯大林及与之有个人联系的“军事反对派”领袖们（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萨发罗夫等人）的投降所致。斯大林组织了“军事反对派”，但当他看到，列宁识破了他的两面手法时，又是他解散了这个“军事反对派”。经调解委员会作了“文字上的修改”的托洛茨基提纲提付表决，除一人弃权外，大会一致通过。（同上，第340页）

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无自豪感地庆幸对“军事反对派”的胜利：

“我们就军事问题作出了一致决定。不管当初分歧有多大，也不管许多同志的意见多么不一致……我们毕竟在委员会中作出了绝对一致的决定。”（同上，第346页）

列宁没有介绍他是如何得逞的，但我们对此已经在上面谈过了。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新的（第二个）党纲。这个文件具有宣传策略上的意义，而极少有纲领意义。新纲领的基

础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著作中的著名思想。列宁的这篇自诩为预见未来并被其信徒捧为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在历史检验中只不过是空想与愿望的混合物。

列宁的基本思想是：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起，资本主义进入了最后的、垄断的、腐朽的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4卷第151、171—172页）①

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达到了最高经济技术水平，到了极限，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向下，走下坡路，直到灭亡，行将到来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而其结果是世界革命。

出路："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引自党纲，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93页）②

列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不喜欢或者有意回避幻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实际将是什么样儿，但却很愿意幻想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然而，"腐朽的资本主义"和"进步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17—818、842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56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的技术经济发展史，最清楚不过地推翻了列宁的大胆幻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切伟大发明（控制论、原子核裂变、电子学等等）的发明权恰恰都属于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社会主义。诚然，苏共有权感到骄傲的是，第一个进入宇宙的人是“苏联共产党人”（这里有一个特殊原因——克里姆林宫建议自己的军事工程师发明一种能够达到美国的火箭，但他们“超额完成了”计划——发明了能够飞进宇宙的火箭）。“资本家”打破了这项苏联成绩，把人送上了月球。

在同一纲领中阐述的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也成了空幻的梦想。列宁纲领的序言庄严宣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同上，第390页）①列宁想，这场“世界革命”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没有边界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很可能，当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建成时，我们将有一个共同纲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1页）

然而，就连用红军的刺刀从苏联把共产主义制度带去的东欧国家都不想同苏联结成一个“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更不消说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称的国家消亡理论也是空想而已。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特别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还在列宁纲领中用如下一句话得到表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在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条件下简化管理职能将导致国家政权的消亡”。（同上，第397页）

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53页。——译者注

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不是国家为人，而是人为国家。所以国家绝对重于人这一点成了苏维埃党内特权阶层的“权力哲学”。因此，在这里官僚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主宰者。正是这个囊括一切的和史无前例的权力目标要求建立囊括一切和史无前例的官僚阶层。

十分自然，并非象列宁纲领中所标榜的那样沿着“国家政权消亡”的道路发展，而是相反，沿着建立“国家超权力”的道路发展。斯大林后来十分“辩证地”解释了要放弃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空想理论这一点，他说，“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是经过它的最大加强来达到。”（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53年俄文版第429页）

在列宁纲领中有些条文是纯系暂时宣传性质的，其宗旨在于直接宣传效果。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对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国内战争条件下举行的，那时布尔什维克需要农民、工人、“资产阶级专家”、非俄罗斯人民和宗教信徒的支持。对其中每个阶级，纲领都许了愿：

一、对农民 列宁：“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农，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农。……我们说，镇压富农的反抗，镇压富农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同上，第347页）[1]纲领：农业公社（那时“集体农庄”一词尚未出现）——是“农民完全自愿的联盟”。（同上，第405页）

二、对工人 “工会必须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权实际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98页。——译者注

集中在自己手里，以此作为一致的经济目标。”（同上，第403页）

三、对资产阶级专家　“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同样必须使资产阶级专家置身于同志式的共同劳动气氛中。”（同上，第405页）[1]

四、对非俄罗斯人民　“民族的完全平等……国家分离权。”（同上，第398页）

五、对宗教信徒　“必须谨慎地避免对信教者感情的任何损伤。”（同上，第402页）

六、给俄国各族人民以自由和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和任何形式的限制自由，都必须仅限于作为同剥削者企图维护或恢复自己的特权进行斗争的临时措施。**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采用这种临时措施的必要性也即消失，因而党将尽力收缩乃至完全取缔这种措施。**”（同上，第395页）

对稍微熟悉苏联历史或者今日苏联现状的人，评论这些条文是完全多余的。列宁纲领完成了自己的组织宣传目的，或者说得粗鲁、但准确些，完成了自己的蛊惑目的：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国内战争。其实，列宁自己承认，他的纲领追求的就是鼓动宣传目标。他是这样评价纲领的一般意义的：“我们的纲领将是宣传鼓动的最得力的材料。”（《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364页）

因此，党代表大会上对纲领的讨论没有引起什么激烈的辩论，也没有引起对列宁和布哈林正式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纲领的报告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代表大会上，没有象讨论组织问题或军事政策时那样，有某一派的补充报告或者反报告。只有中央正

---

[1]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式报告人——列宁和布哈林——互相就一系列抽象问题（关于纲领的结构、关于帝国主义的特征等）进行争论，这些问题很少使代表们感兴趣。唯一争论的问题，按列宁的说法，无论在报告人之间还是在代表之间的辩论中占据“过多位置”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来说，民族问题一向起着显著作用。现在，在内战高潮时期，当邓尼金将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为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斗争”的口号时，民族问题成了整个白色运动，特别成了它的多民族高加索后方的“阿喀琉斯的易伤的脚踵”①。布尔什维克正好看中这个“脚踵”，针对“统一与不可分”的口号提出了一个反口号：“民族自决权”，尽管列宁作为绝对中央集权主义者不仅比邓尼金和高尔察克，而且比所有俄国沙皇加在一起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富有弹性的策略家列宁晓得，郑重承认“民族自决权”不仅是博得非俄罗斯民族好感的最恰当的宣传武器，而且是使他们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段。颇班哲学家布哈林、党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列宁：“随便抓出一个共产党人——就能找出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6页）或者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者”（列宁：“都知道，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总是比一部分真正俄罗斯情调的人干得更过火。”《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58页）无法理解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所玩手腕的全部奥妙。由于这一点，“大俄罗斯反对派”才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

在苏联历史教科书中，不断从一本搬到另一本的神话是，仿

---

① 阿喀琉斯（Achilles）是特洛亚战争中最伟大的希腊英雄，在追击特洛亚人时，他被太阳神的神矢射中脚踵而致死。（见《希腊神话》中文版第539页）由此，“阿喀琉斯的易伤的脚踵”成了“致命要害”的代名词。——译者注

佛只是布哈林和皮达可夫领导这个“大俄罗斯反对派”，避而不谈斯大林也完全赞同它的观点。为取代“民族自决权”这一列宁口号，布哈林恰恰依靠党的民族问题专家斯大林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在委员会中，我依据斯大林同志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提出了一个公式：每一民族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7页）

大会代表（后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也曾指出布哈林“大俄罗斯思想”的根源：“他（布哈林。——作者）继斯大林之后所重复的公式——各劳动阶级自决权，作为客观标准，象各民族自决权一样不能成立。”（同上，第68—69页）

新版《大会记录》（1959年）编辑组的过分献殷勤的斯大林分子所作的注释是：“布哈林对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声明所作的解释是错误的。”（同上，第526页）或“梁赞诺夫关于斯大林‘各劳动阶级自决权’一提法的声明不符合实际情况。”（同上，第529页）

试问，如果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末，当斯大林的观点在代表大会上受到肆无忌惮的歪曲，而与此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正是针对“各劳动阶级自决权”的提法进行不顾一切的争论时，为什么斯大林执意不肯作声呢？只消看一眼所提到的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8年1月），就可以确认，布哈林和梁赞诺夫对斯大林的引证是正确的，而党的历史学家是有意歪曲真相。

斯大林就这一问题是这样说的：“……令人信服地证明乌克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集团如何利用自决原则来实现其本阶级的帝国主义目的。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斯大林全集》俄

文版第4卷第31—32页。黑体是我加的。——作者)[①]可见，“大俄罗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是斯大林，而非布哈林(这一点当我们分析以列宁、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民族倾向分子”为一方，以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为另一方，就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时，还可以再次得到证实)。

一言以蔽之，“大俄罗斯反对派”是在纯粹误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领袖们(斯大林除外！)真诚地相信，列宁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列宁并不亚于塔列兰[②]知道，说话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思想，也不亚于马基雅弗利明白，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他说，“政治是科学与艺术”(《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19页)，“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大忠诚同善于作一切必要的实际妥协、应付、调和、转弯、退却……结合起来”(同上，第231页)，甚至更进一步：为了争取影响和权力，要“作各种各样的牺牲，必要时，要采用各种诡计、花招、非法手段、默不作声、隐瞒事实”(同上，第199页)，也就是进行撒谎和欺骗，但不这样表达就是了。

后来，斯大林在这方面也以登峰造极的说谎术远远超越了列宁，但现在他宁肯默不作声(他没有在任何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而列宁的某些学生却发了言，他们对列宁主义入门掌握得更好。例如，托姆斯基说：“我想，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想说，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运动是正常的和合乎愿望的。我们对此就象对待不可避免的劫数。”(《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译者注

② 塔列兰(1754—1838)是法国著名外交家，以狡猾、奸诈、搞阴谋著称。——译者注

会》俄文版第82页）奥新斯基还把罩在列宁关于“自决”的内心隐秘之上的帷幔轻轻撩起。他说，这个口号有三层含义：“第一、宣言性含义……我们宣称，给各族人民以自决权……第二、这是一个使最民族主义的斗争失去效用的口号，第三、这是一个揭露性的口号。”（同上，第92页）

列宁从这个口号中看到，在国际舞台上，即不仅在殖民地，而且在整个西方国家，都有卓越的策略意义。列宁想到，如果外部世界判明，共产国际充其量不过是俄共（布）的分支机构，而外国民族共产党都从属于俄共（布）中央，那末世界革命事业就会告吹。他说：

“这里许多着迷的同志谈到了全世界国民经济议会和一切民族党（指外国共产党。——作者）服从俄共中央……（皮达可夫自座位上说：“**难道您认为这不好吗？**”）既然他现在发表意见说，这并不坏，那末我需回答，假如纲领中有某种类似的东西，那末批判纲领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建议的提出者已经自己扼杀了自己。”（同上，第100页）

与此相联，列宁的另一个看法简直是先知的预言：“我们应当这样行事，让德国的社会主义叛徒（指社会民主党人。——作者）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万能制度，仿佛可以用红军的刺刀把它带到柏林。”（同上，第55页）

关于党纲的辩论，以选举提供最后方案委员会而告终（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姆斯基、斯米多维奇、布勃诺夫）。加米涅夫代表这个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最后方案，这个最后方案是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人反对——这就是皮达可夫）。党纲作了一些非原则性修改。代表大会否决了皮达可夫就民族问题的修改方案，总地批准了纲领。

按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和检查委员会（由3人组成）。主持最后一次大会的是加米涅夫（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主持全体会议的只有三个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主持了一次会议）。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得知中央选举的程序（选举本身是秘密进行的）。一份名单是由上届中央部分领导人提出而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签署的，一份名单是由另一部分人提出的，一份名单是由莫斯科、彼得格勒、下戈罗德代表团提出的。接下去是：莫斯科省代表名单、乌拉尔代表名单、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名单、由部分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乌克兰、萨拉托夫、白俄罗斯、立陶宛的代表团和部分前线代表团提出的一份名单，乌拉尔、维亚特卡和第十一集团军的代表提出自己的名单。最后，还有一个集团提出自己的名单。历数名单是为了表明，苏联共产党似曾有过“党内民主”之类的东西，这是今天连想都不敢想的。在上述所有名单中被公认的领袖一直只有六个人：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当选的有：

中央委员：1、别洛鲍罗多夫，2、布哈林，3、捷尔任斯基，4、叶甫多基莫夫，5、季诺维也夫，6、加里宁，7、加米涅夫，8、克列斯廷斯基，9、列宁，10、穆拉诺夫，11、拉狄克，12、拉柯夫斯基，13、谢烈布利雅柯夫，14、斯米尔加，15、斯大林，16、斯塔索娃，17、斯图奇卡，18、托姆斯基，19、托洛茨基。

候补中央委员：1、阿尔乔姆，2、布勃诺夫，3、弗拉基米尔斯基，4、达尼舍夫斯基，5、米茨克维奇，6、斯米尔诺夫（И·Н·），7、施米特，8、雅罗斯拉夫斯基。

检查委员会：1、库尔斯基，2、卢那察尔斯基，3、齐夫

齐瓦泽。

中央委员里面没有一个是反对派（如果不把民族问题上的布哈林、军事问题上的斯大林算作反对派的话），而候补委员里面包括两名“军事反对派”（布勃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列宁从反对派方面得到了一年的“喘息”时机——直到下次党代表大会。

3月25日，在新中央全会上选举了领导机关——政治局委员：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

组织局委员：别洛鲍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塔索娃；候补委员：穆拉诺夫。中央责任书记：斯塔索娃（《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3卷第2分册第282页）。

总的结论：如果说在此之前列宁与之斗争的反对派只是产生于中央内部，并且在中央范围内对列宁认为自己的行动毫无错误以及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容置疑表示异议的话，那末现在，在中央基本上经过清洗或安抚之后，斗争则在中央之外展开。如今，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参加的党代表大会成了党内反对派斗争的舞台。在各个党内反对派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在自己的纲领中反映广大党内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时，中央坚持自己的权威不可侵犯和党内上层机关行动的正确无误。这些反对派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把党组织的暂时权宜之计当作党的真正纲领，而把宣传口号当作真正目标。

列宁由此得出的必要结论反映在两个文件中，一个是在八大上通过的，这就是关于以“全体党员普遍登记”为名进行的第一次党内清洗（《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441页），另一个文件就是在第八次党代会上（1919年12月）通过的新党

章，其中尽管保留了“民主集中制”一条，但增加了关于“最严格纪律”的整整新的一节。有关纪律的新的一节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及其各级地方委员会。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志愿入党者必须经过候补考验期一条。清党持续到1919年9月末，结果，据美国历史学家统计，被开除的占二十五万名党员中的半数以上（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by John S.Resheter, 1960, praeger, p.163）[①]。

党的正式统计没有关于第一次清洗中被“清洗”的确切数字。只有九万一千名党员和五万名候补党员被开除出党和动员参加国内战争的总数。与此同时宣布了吸收工人和红军战士入党的所谓“入党周”，吸收了二十万名以上党员（《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1960年俄文版第574页）。接收入党的主要标准是绝对服从党机关的指示。

① 约翰·雷谢特：《苏共简史》1960年普拉埃格英文版第163页。——译者注

第十八章

列宁、九大和反对派"民主集中派"

1919年秋天是苏维埃制度的决定性时刻。如果说东部战线（司令员是前沙皇总参谋部上校卡梅涅夫）对高尔察克取得了重大胜利的话（苏维埃军队推进到乌拉尔山麓），那末在南方，邓尼金开始变成一支可怕而又危险的力量。他的志愿军夺取了察里津、顿河州、克里米亚、顿巴斯、部分乌克兰，并在七月初开始向北，向莫斯科方面大举进攻（10月13日占领奥勒尔市）。

东线的胜利和南线的惨败在中央委员会中，关于军事战略路线的方向和任务引起了严重分歧。托洛茨基和总司令员瓦采提斯（亦为前沙皇总参谋部上校）认为，在战胜高尔察克后，东线可以"在乌拉尔山区停下来过冬"，而把解脱下来的部队调往南线，去对付邓尼金。可是，不仅东线司令员卡梅涅夫坚决反对，而且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老布尔什维克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也都坚决反对（理由是：不给高尔察克以喘息之机）。中央委员会曾犹豫一时。恐怕还是斯大林结束了这种犹豫。他认为，现在是打击托洛茨基的最好时机，而在1919年3月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打击没有得逞。斯大林认为，对邓尼金的失败是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最高司令部的无能和不善于领导这条战线有关。1919年6月4日他致函列宁和政治局说：

"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中央拿出勇气来做出相应结论。中央有足够的气度和耐力吗？"（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册第186页）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还不曾有任何人用这样的语言同列宁对话，不过，似乎也只有列宁能理解这样的语言。至少，1919年7月3日的中央全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瓦采提斯计划，撤销了瓦采提斯的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卡梅涅夫接替他（代替卡梅涅夫任东线司令的是老布尔什维克伏龙芝）。于是，托洛茨基于7月5日提出辞职声明。对于这项辞职声明中央所作的决定，是从不曾见诸于苏联报刊的。决定说：

“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审议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并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职和满足他的请求。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一定竭尽全力，使南方战线，即当前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战线的工作，也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选择的工作，对托洛茨基同志最方便、对共和国最富有成效。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可以以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行事，完全可以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同由他亲自指定、而由中央批准的前线司令一道采取行动。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可能，使他千方百计争取达到直至他认为军事问题的路线已被纠正为止，并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尽量加速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烈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塔索娃”（同上，第186—187页）。

应当认为，对于在这份文件下面出现斯大林签名这一点可以做出解释的，只能是列宁的最后通牒。

在同一次中央全会上，改组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由十五名减为六名。如今，这个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托洛茨基（主席）、斯克梁斯基（副主席）和委员李可夫、斯米尔加、古谢夫（斯大林对他讨厌之极并称他为“好斗的战略公鸡”），总司令卡梅涅夫（《历史问题》杂志1956年第7期第

19页，库兹明文章）。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推荐，任命了新的前线司令：南线——叶戈里耶夫（沙皇军上校）、西线——基提斯（沙皇军上校）。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分歧的一个事实很有意思，可是这个事实却被对托洛茨基那样不吝痛骂之词的苏联历史文献精心掩盖了。1919年10月中旬，邓尼金夺取了奥勒尔城，而以尤登尼奇将军为首的西北战线白军开始顺利进军，在此影响之下，列宁产生了放弃彼得格勒并缩短战线的念头，尤其是尤登尼奇等已攻占了皇村（童村）而进逼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坚决拒绝了列宁放弃彼得格勒的建议。托洛茨基讥讽道：“这大概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反对列宁的唯一一次例外。”他还说：“假如在1919年10月不是列宁反对我，而是我反对列宁，维护放弃彼得格勒的思想，那末今天就会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用世界上各种语言来揭露这托洛茨基主义的致命表现。”（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册第156、189页）

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捍卫彼得格勒的计划。为实行这一计划，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被派赴彼得格勒。与列宁的疑虑相反，红军在十月底击溃了尤登尼奇的军队，捍卫了彼得格勒。因为这一胜利，政治局会议决定授予战友兼敌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红旗勋章。当托洛茨基受勋后（红旗勋章恰是托洛茨基倡议设置的），加米涅夫提议授给斯大林时，纯朴憨厚的加里宁大惑莫解地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给斯大林？”托洛茨基叙述说，会间休息时布哈林冲着加里宁说：“怎么你还不明白？这是依里奇想到的：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而斯大林没有，那他就活不了。他不会饶过的。”（同上，第165页）

在已经引述过的七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列宁起草了题为“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中央提纲。全党和党监督下的所有组织（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的注意力和精力，如今都首

先集中对付邓尼金。中央提纲中说，最危急的关头之一，很可能是共产党专政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来到了。中央要求，苏维埃共和国要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兵营。的确，南线正在决定俄罗斯命运攸关的问题：列宁还是邓尼金？

斯大林时期曾杜撰一个神话，说，粉碎邓尼金的主要计划——取道哈尔科夫一顿巴斯一罗斯托夫的计划，是斯大林在给中央的信中向列宁提出来的，是针对经察里津向诺沃罗西斯克进军的托洛茨基和南线“罪恶”旧计划的（《斯大林传略》俄文1947年版第77页）。苏联历史学家库兹明在分析中央制订粉碎邓尼金计划的历史时，写道：“实际上，如我们所见，计划是由总司令制订并得到中央赞同的”，总地来说，“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在1919年秋天中央制订对付邓尼金的新计划中，并不是基础文件。这封信件是在粉碎邓尼金的新计划业已执行、南线已经获得重大成功的时候才写的。”（《历史问题》杂志1956年第7期第23、32页）顺便提一下，那位苏联历史学家库兹明通过对事件和事实的分析证明，为编造关于斯大林粉碎邓尼金计划的神话，所借助的是1919年11月15日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那正是苏维埃反攻邓尼金的高潮时期，但为了使这封信被人当成是莫须有的斯大林计划的基础，写信的日期被篡改了——斯大林历史学家竟把1919年11月15日改为10月15日（同上，第30页）。不过，斯大林历史学家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在上述信中斯大林批评了得到列宁和中央批准的总司令和托洛茨基的计划。并且还进行了威胁。他写道，如果他的计划不被接受，“我在南方战线的工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罪恶的、不必要的工作了，这就给我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要我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魔鬼那里去，只是不要留在南方战线。”（《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277页）[1] 这之前有

[1]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6页。——译者注

一项声明和一份给列宁的电报，其中有同样的威胁。这就是：11月12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斯大林和谢烈布利雅柯夫给政治局的一项特别声明，要求是，要么撤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现有人员，要么撤换总司令部大本营。11月13日，斯大林向列宁发出了给政治局的电报。电报说：

“我认为有义务声明，按照已知声明的精神改变计划和更换人员将构成一个条件，不实现这个条件留在前线就是不可能的。”（《历史问题》1956年第7期第32页）

斯大林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加强军需供应和补充南线兵员，但同时政治局向斯大林指出，政治局“认为用辞职声明和最后通牒来加强自己实际要求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卷第2分册第364页，1968年出版）。

熟谙列宁突变性格的斯大林，顿时噤若寒蝉，不过他因为怀恨在心，竟把这次受申斥记入了托洛茨基的过失账。

中央协调配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组织两条强大的、并行不悖而协调行动的战线以对付邓尼金：沿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顿巴斯方向的南线（司令员现在是叶戈罗夫，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斯大林和谢烈布利雅柯夫）和经察里津往诺沃罗西斯克方向的东南线（司令员为绍林，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特里弗诺夫和斯米尔加）。全面反攻开始了并以粉碎邓尼金军队而胜利结束。邓尼金残部抱头鼠窜：一部分往北高加索，另一部分往克里米亚。东南战线，现改称高加索战线（新司令员是图哈切夫斯基，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奥尔忠尼启则）于1920年3月底，将邓尼金残部消灭在北高加索。当时邓尼金已卸掉总司令之职，并将该职转交给弗兰格尔将军。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结局事先就已确定了。

从1918年下半年起在俄国苏维埃地区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

制度，在这方面起了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作用。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工业都服务于战争需要，农民的粮食和牲畜被“特种部队”即契卡部队征收而无任何补偿，交通运输只为战争服务，一切有战斗能力的居民都被动员起来，全党正式宣布军事化，而布尔什维克在那些年里登峰造极的宣传技巧即令白军也歆羡不已。1919年当时的白军报刊写道：

“似乎没有哪个生活领域、哪个事件、哪个现象、哪个时机没被布尔什维克用于影响拥护者和敌人的思想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把自己的才能直接用于鼓动工作……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雕塑家的超凡天才亦被调动起来……报纸充满了一个宣传调门，标语口号琳琅满目、形象生动、尖锐泼辣。”（1919年11月29日《俄罗斯报》）

在邓尼金后方，布尔什维克颠覆、破坏和间谍组织紧张活跃于地下。那些支持同邓尼金斗争纲领的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被允许合法化并在苏维埃中派驻自己的代表。列宁和党中央甚至在敌人营垒中从事那样一些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再次证明，对于列宁来说，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一切手段都是可取的。最正规的党史曾经引述这样两个例子，它们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列宁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一个例子涉及哥萨克人，他们无一例外是反对苏维埃的，并在白卫运动中起了杰出作用。但他们向往素来就有的特殊自由和选举制度，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哥萨克同邓尼金发生了冲突（要求自治的库班拉达，以自主的克拉斯诺夫将军为首的顿河军队）。中央决定利用这一形势并在哥萨克和邓尼金之间打进楔子，为此，“中央在秋天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同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白卫政府驻巴黎代表谈判，哥萨克政府曾向俄罗斯联邦提出和平建议”（《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卷第2分册第359页）。

另一个例子更加令人惊异。苏联历史学家援引一份档案文件说，“中央指示……同彼得留拉建立军事事务接触以反对邓尼金”（同上，第365页）。反邓尼金的同样联盟对波兰也提出了。对于向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独立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提出如此奇怪建议的动机，苏联历史学家的解释如下：“高呼‘俄罗斯统一不可分割’口号的邓尼金，不可能指望得到彼得留拉分子和波兰军队的支持”（同上，第 364 页），而高呼“各族人民自决权”口号的列宁则指望这种支持。这是他的惯用手法。这种手法也被斯大林接受下来了：依靠二号敌人干掉头号敌人，以便然后再靠三号敌人易于干掉二号敌人。

对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起了特殊作用的还有他们建立的军事政治机器。政治策略和战略由一个狭小的集体——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来确定，党的和非党的高级干部由中央组织局确定。对红军的政治监督和领导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各级军事委员来执行，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由总司令及其大本营来制定；军队的全部给养都掌握在一人（李可夫）之手，联共（布）中央授予他“军队供应方面的独裁全权”（同上，第 315 页）；整个军队都罩在所谓契卡“特别部”的密网之中。名副其实，这个可怕机关的后方和前线分支机构享有特殊权利：它的代表不仅有权随意逮捕，而且有权就地枪毙任何被捕人员。所有这些组织的工作的协调和指挥，在党的系统是中央全会，在国家系统是国防委员会，为首的是列宁。

如果说在反对邓尼金制度的斗争中，全体布尔什维克是同心同德的话，那末关于他们在党内对待列宁制度的态度，却该当别论。他经常用来对付政敌的方法是：一些情况下，在各个集团之间左右逢源；另一些情况下，搬弄幕后机关势力；再一些情况

下，“分而治之”。这样一种方法，他要自动地用于一切党内派别。他深信，党就是他自己，因而，任何偏离他个人观点的倾向，他都认为是反党行径。如果他在一些或另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地位虚弱、论据不力，那末对于具有显然不容置辩论据的党内对手，他就要竭力用一个永远不变的标准公式来剥夺他的能力：“X”或者“Y”的头脑里，“理论上不可思议地乱作一团！”因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列宁的理论权威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他的反对者只要尚未向列宁缴械投降，就始终是个离经叛道者。在通往胜利的途中，当胜利本身还颇渺茫的时候，列宁是个“民主主义者”，他不但承认少数派（有时还承认多数派！）有权当反对派，而且有权在党内自成派别；但是一旦胜利成为事实，他就成了一个专制独裁者。每逢这种情况，他就要寡廉鲜耻地以时机为由来解释自己昨天的宽宏大度，并告诫自己的时运不佳的追随者们要“辩证”地观察一切生活现象。

然而，列宁并未得到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力。党的小范围内既熟悉他的错误，又熟悉他的弱点。据说，拿破仑在他的搓澡工面前，在这个经常看见他赤身裸体的人面前，最少炫耀他神秘的超人的荣誉。列宁的“搓澡工”——党内权贵多次见过他一丝不挂，对待他即使不是无礼，也是相当大胆的。对他们来说，不仅列宁罪孽深重，而且还了解他比一般反对派的偏向更大得多的错误。因此，在列宁去世后的头几年里，犯有某种过失的党员总是借助当时一个万能公式为自己辩护：“须知列宁也犯过错误！”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有两个“战友兼敌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见证。

托洛茨基先是作为热心的学生（旧《火星报》时期，即1900—1903年间），后作为孟什维克（1903—1904年），再后作为“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在十月革命时期又作为列宁的

亲密战友，以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身份领导起义——正是这个彼得堡苏维埃宣告了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他对列宁的宦海沉浮了如指掌。再补充一点：被斯大林从苏联驱逐出去的托洛茨基，直至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谋杀，始终不渝地绝对忠实于列宁，以为，他不是列宁制度的牺牲品，而是斯大林热月政变的受害者。

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在1930年写道：

"在模仿文学中，对列宁的描绘如今近于苏兹达尔[①]圣像绘制者画圣徒和耶稣：想得很美，画出来的却拙劣得可笑……由于模仿指导者的威信是靠禁止怀疑其绝对正确来维护的，所以绘制出来的列宁就不是天才地洞察形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正确无误的机器人……不错，列宁是天才的……但列宁并不是毫无错误的机械计算机。他的错误要比任何别人在他的地位上所犯的错误少得多。但列宁确有错误，很大很大的错误……"（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册第194—195页）

下面是斯大林的证词。1920年4月，在列宁诞辰五十周年之际，斯大林在莫斯科党委会里讲话时说："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1917年9月……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伊里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

① 苏联地名。——译者注

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直到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316—318页）①

斯大林将不会仿效列宁的"谦虚"。在他面前，所有的人都将要犯错误，列宁要犯错误，党要犯错误，只有他不会犯错误。

总之，我们看到，到1920年初春，红军基本上粉碎了邓尼金的军队，如果不算他的残余部队即在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军队的话。共产党专制得救了。在白卫运动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要算政治原因：白卫军方面进行政治战有多么低能，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就有多么灵活和诡诈。

与不同国度人民之间的民族战争大相径庭，人民内部的战争——国内战争，首先是思想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很少由武器，而经常由思想决定事情的结局。因此，在国内战争中，社会动态和领导的政治艺术往往能代替整师和整兵团的军队。至于说布尔什维克，那末他们仅仅是社会诈骗的能手，不仅如此，他们还向人民作这样的许愿，这些许愿鉴于他们的纲领目标从来不曾兑现过。这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谈过了。这还都不算，他们还不无成效地把对手——邓尼金根本没有的意图强加给他，例如，红色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邓尼金将军想复辟沙皇制度，而邓尼金本人却毫不含糊地公开宣称，他对未来的统治形式预先什么也决定不了，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0—281页。——译者注

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属于全体俄国人民，由他们通过全国立宪会议去解决。在土地和民族问题上，邓尼金的观点也是保守和不堪一击的，这又被赤色分子巧妙地利用了。最后，白卫运动的领袖是用俄国军官团骑士般的传统培养起来的，让他们同那些要道德服务于目的的人相竞争，在政治上他们是太单纯而又直率了。谁不知列宁在1920年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关于道德的普遍人性论概念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只承认阶级的道德。

现在，在转到分析战胜邓尼金后的党内状况时，我们要指出党内一个荒诞的现象，列宁曾称这一现象为"党内危机"。危机表现为几个新的反列宁流派、集团和反对派的出现。它们共同失望的一点是：列宁言行不一。列宁和党机关的许多主要口号，被广大党员群众视为党内生活不可动摇的民主原则，实际上是纯粹的幻想和虚无缥缈的东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列宁的党机关对无产阶级、对国家、对党本身的专政（与某些说法相反，苏联极权主义的鼻祖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于对列宁"权力学"的主要原则的绝对完善，其彻底性既不违背列宁"权力哲学"的文字，也不违背它的精神。

但是党显然不想屈服于自己的机关。在党、苏维埃、工会内部出现了这样的势力，它们决定抵制把党的机关变成超党和超国家的机器。中央机关在中央的独裁和党、国家（苏维埃）以及经济机关领导者在地方的独裁，由于国内战争的非常条件，形成了个别人的独裁体制（"一长制"或"个人负责制"）。现在，在战后，列宁想把它合法化为新制度的经常性的正常领导方法。当列宁发问，没有独裁者何谓"无产阶级专政"呢？在他本人看来，这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如果说，列宁在最高一级口头上对党还是作了例外，而保持"集体领导"原则的话（代表大

会、中央全会、政治局），那末，对国家和经济机关，他却建议实行一长制以取代在集体领导制基础上合法存在的管理秩序。在对待所谓“独立”苏维埃共和国（它们表面上没有加入俄罗斯联邦，而苏联尚未成立）的党组织方面——这些苏维埃共和国应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列宁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修改了中央的政策，固然这暂且还是理论上的。在本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道：尽管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被承认是“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俄国共产党不可能在“独立的共产党联盟”基础上组成，因而只能承认上述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普通俄罗斯州委会的地位，并且它们必须“完全隶属俄共中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443页）。①

实际上，这种服从伴随着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在各民族共产党内，特别是在乌克兰，离心力量还是很大的。也许，这便是如下事实的原因之所在：几个月后，俄共中央做出决议并由第八次党代表会议批准（1919年12月），宣布放松俄共中央对苏维埃乌克兰的专制并对这一专制施加限制。决议中说：

“中央委员会始终遵守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必须再次说明：俄国共产党主张承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同上，第459页）②

只不过四个月之后——在这四个月期间红军占领了差不多整个乌克兰，——莫斯科就开始同“独立的乌克兰”用另一种语言，即大国沙文主义的语言对话了。1920年3月17日至23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乌共〔布〕）代表会议，选举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8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87页。——译者注

新的乌克兰中央。

为了确保俄共中央大国沙文主义路线的胜利，并停止玩弄“乌克兰独立”的外交，列宁派遣了那个在国内战争中博得了“党内成吉斯汗”之盛名的人即斯大林参加代表会议。哪里需要捣毁机关、对党实行恐怖手段和枪杀“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以列宁特命全权代表的身份在那里出现（以前在伏罗希洛夫1929年所著的《斯大林与红军》一书中认为斯大林在列宁生前的“特殊角色”是夸大，现在被中央的新文件所完全证实）。列宁不仅器重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实践智慧、道德“弹性”，而且器重他性格中的非凡素质，这种素质就连列宁本人也先天不足，这就是：斯大林没有那些通常被称之为“激情”、感情、内心分裂等的心理要素。

如今业已真相大白，在筹备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乌克兰共产党打算在大会上向列宁和莫斯科中央宣战，第一，要把苏维埃乌克兰的假独立变成真独立；第二，实行集体领导的管理原则并使之合法化，以代替列宁的“一长制”（个人负责制）。这时，列宁便派斯大林去乌克兰粉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党的分立主义。然而，不仅令列宁，而且令全体中央委员大为惊讶的是，斯大林要么未能胜任自己的使命（这很难设想），要么决定利用乌克兰反对派来反对列宁本人在中央的“个人负责制”，进而反对他的头号敌人——托洛茨基。

党的历史学家没有援引任何文件（因为没有这样的文件），就断言斯大林在乌克兰代表会议上“坚决揭露”了反对列宁的反对派（B·B·罗曼诺夫：《列宁反对“民主集中派”反党集团的斗争》，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6页）。可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反列宁的“民主集中派”反对派却胜利了。

中央正式代表及中央在乌克兰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人斯大林，

在这次会议上对反列宁的反对派未置一词。斯大林准予选举明显反列宁的乌克兰中央，甚至领导了这次选举。请看事实：

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的有二百七十八名代表。斯大林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基础报告《论党的经济政策》（顺便说一句，是按托洛茨基为九大制订的“经济提纲”起草的），也是他领导了俄共九大的代表选举和新乌克兰中央的选举。在九大上宣读了全乌克兰代表会议代表的声明，声明说，“乌共（布）中央的选举是在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主持下进行的，无论在选举之前，还是在选举期间，斯大林同志没有作过任何声明，说选举是错误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210页）。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斯大林在宣布会议闭幕时，不但没有批评反对派和选举，而且相反，说：“请允许我向你们庆贺代表会议成果丰硕的工作。”（《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304页）①

然而，这项“成果丰硕的工作”使列宁暴跳如雷。列宁派和反列宁派按均等原则被选为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当选为新乌克兰中央委员的几乎全都是反对“一长制”的新的反对列宁的反对派的领导人，即以萨普龙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和法尔勃曼等人为首的所谓“民主集中派”（“民集派”），他们是在一百零五票列宁派抵制、一百七十三票反列宁派赞同的情况下当选的。列宁派在大会上占明显少数。得知此情后，列宁往哈尔科夫给斯大林拍了如下电报：

“鉴于在代表大会上每派有十三名代表当选，鉴于有一百零五位代表没有参加中央选举……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局，这个临时局由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各派出两名新代表组成。”（《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167页）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1页。——译者注

就这样，撤销了合法选举，恢复了列宁派占多数的旧中央。乌克兰"独立"和列宁的臭名昭著的"党内民主"的真实价值就是如此。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列宁打倒乌克兰中央一事给《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所作的注解，这个荒谬绝伦、不顾一切逻辑的注解更加令人惊讶。注解说，会议多数反对列宁。但却做了出人意料的结论："鉴于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没有反映乌克兰多数共产党员的意志，俄共（布）中央决定予以解散并成立临时乌共（布）中央。"（同上，第417页）

接下去是涉及乌克兰全党范围的"组织结论"：根据1920年4月5日的俄共(布)中央决定，定于在全乌克兰进行清党，清洗反列宁分子（美其名曰"乌克兰共产党党员重新登记"），为此，六百七十四名"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在五月被派赴乌克兰（同上，第418页）。

反对列宁"一长制"而主张民主"集体领导制"的乌克兰反对派，反映了多数党员的意志。无论经济机关，还是工会的党员阶层，都站在这一立场上，只有党内机关权势分子和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坚决抵制。

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1920年1月23—29日)在听取了列宁关于"一长制"优越性和"集体领导制"弊病的报告后，依然否决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注释者在谈到列宁向代表大会坚持企业管理的一长制原则时，是这样结尾的："代表大会没有接受一长制原则，而赞成集体领导制"。(《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1960年俄文版第599页）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小组（这个代表党的小组领导工会及其中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列宁两次遭到这样的失败。头一次是在1920年1月12日："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的

一长制主张没有得到支持”，——党的注释者说（同上，第584页）。第二次是1920年3月15日在列宁的坚持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小组讨论同一个问题。在听取了列宁为一长制辩护的新理由后，这个小组再次否决了列宁的建议（同上，第584页）。

这两次决定反对列宁的理由是颇有意思的：工会（由老布尔什维克托姆斯基领导）从列宁的建议中发现，列宁的方针是“排除工人管理生产”（同上，第584页）。

不单乌共（布），就连人们所说的那些在列宁鼻子底下的省党委会——莫斯科和图拉省党委也主张集体领导制。

恐怕，反对“一长制”反得最妙的是那位不但实际上，而且法律上被指定为“红军后勤独裁者”的中央委员——李可夫。

在召开俄共（布）九大时(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的国内军事、政治和党内总形势就是如此。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遇上了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利用了列宁本人的理论，即党（和国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就是说，由基层民主选举的中央领导党，但代表地方组织的党又是自己中央的最高权力主宰者）。

“民主集中制”公式是在1906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首次合法化的，这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派别之间在中央作用问题上的妥协。但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列宁都一直把重点放在“集中”上，而孟什维克则强调集中的民主性质。如今，在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党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派系，它正是把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化视为自己的宗旨。这一派系便由此得名叫“民主集中派”（简称“民集派”）。在着手分析它的纲领和列宁的反应之前，先在这

果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人物是颇为相宜的。这些人之中有我们在七大和八大上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反对派”和“军事反对派”的老相识。

T·**萨普龙诺夫**——1912年入党，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A·**布勃诺夫**——1903年入党，1912年为候补中央委员，1917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十月政变的军事革命核心成员；

H·**奥新斯基**——1907年入党，前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家银行行长；

B·**斯米尔诺夫**——1907年入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B·**马克西莫夫斯基**——1903年入党，莫斯科省党委书记，俄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

H·**里希琴**——1910年入党，乌克兰地下党中央领导人之一，后为俄共（布）中央部长；

M·**拉法伊尔（法尔勃曼）**——1910年入党，乌共（布）中央书记；

N·**明科夫**——1911年入党，莫斯科党委会书记；

N·**姆格拉泽（瓦尔丁）**——1907年入党，第一骑兵军政治部主任，俄共（布）中央部长等。

在中央委员中，在某些问题上支持反对派的有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但他们表面上不属于反对派。

大会选出了主席团，进入主席团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舍维奇、加米涅夫、加里宁、谢烈布利雅柯夫和反对派领导人萨普龙诺夫。在五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中还包括两名反对派代表（里希琴和明科夫）。

大会议程：1，中央报告（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2，经

济建设的今后任务（托洛茨基、奥新斯基和李可夫），3，关于工会（布哈林和梁赞诺夫），4，关于共产国际的任务（拉狄克代替生病的季诺维也夫），5，组织问题（加米涅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6，对合作化的态度（克列斯廷斯基），7，选举经济问题（奥新斯基）和组织问题（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副报告人（他们由"民主集中派"提名并由大会批准）。

列宁在中央总结报告中把对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胜利称为"奇迹"，并把对内政策中的这一奇迹的成因解释为"集中化"、"铁一般的纪律"和"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5、22页）①，而在对外政策上的胜利被解释为是由于西方大国的分崩离析和内部矛盾，列宁一向认为利用这些矛盾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

列宁认为，现在必须运用于经济战线的恰是这种"铁一般的组织"和专制独裁的经验。换言之，列宁认为，在权力绝对集中情况下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也是和平时期的理想。甚至连工作方法和法规制度也应同国内战争时期一模一样，只有军队改称"劳动大军"并把其中一部分分别派赴工厂、企业、矿井、交通运输部门，而国防委员会改称"劳动与国防委员会"。

当"民主集中派"开始反对这种"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考茨基语）时，列宁立即向反对派宣战。列宁说："有人对我们说：'集体领导制是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形式之一。'可是我们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过决定：……这种理论上的混乱是决不能容忍的。"（同上，第22页）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6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这里引文稍有出入。——译者注

当缺乏强有力的论据时，就用“理论上的混乱”来吓唬对手，这向来是列宁最司空见惯的伎俩。他现在又在如法炮制。反对派主张，如果我们认真实行工人阶级统治的话，那末这个阶级就应当直接领导经济机关、国家机关，这种领导不是经过中央党内官僚集团的官僚主义代表来实行，而要经过自行选举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集体来实行（列宁自己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和1919年的党纲中恰恰是这样写的）。对于反对派的这种主张，列宁的回答很简单，但毫无说服力：“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就表现在取消了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同上，第23页）①

然而，对一个主要问题——由谁来支配这个新的国家所有制及其社会产品在社会中的分配呢？——列宁没有作答，虽然他在另一处说过，一切都由无所不能的中央来支配，而萨普龙诺夫把这个中央称作“一小撮党阀”。列宁提醒自己的对手们说，他应该从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集体领导制中汲取多么严重的教训和做出相应的结论，当时就连他自己的中央都不顺从他。他说：“这又是通盘实行集体领导制的时期。这是无法跳过的历史事实，有人说，集体领导制是学习管理的学校。但是决不能永远停留在学校的预备班里！这样是行不通的。”②

谈到工会，列宁要求它们按照“反对臭名远扬的民主制残余”的精神来理解自己的任务，“所有这些关于被委派者的叫喊，所有在各个决议案中、在各种谈话中常常说到的陈腐有害的滥调，应当一律扫除干净”（同上，第25页）③。在这里，列宁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68页。——译者注

②③ 同上，第171页。——译者注

不指名地批评了公开发表的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的提纲《论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也批评了托姆斯基的同样关于集体领导制的提纲《工会的任务》（托姆斯基的提纲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党组批准的）。

列宁一贯另留一手，这一手在布尔什维克信徒眼中是非常有效的：给党内反对派扣上同孟什维克精神一致的帽子。这无须任何证据，只须扣上帽子就行。列宁在第八次党代表会议上（1919年12月）是这样干的，说萨普龙诺夫反对派是“劣等孟什维克”，现在他也这样干，宣称“民主集中派”只是仿效“有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要求用集体领导制来代替一长制”（同上，第26页）①。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中央总结报告受到了许多代表的激烈批评，其中有些并不属于反对派。第一个发言的尤列涅夫认为，列宁关于集体管理方法不好、一长制方法好的问题提出本身就是错误的。尤列涅夫说，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长制成了社会生活崩溃的见证。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些场合，集体制好，在另一些场合，一长制好，但“集体管理应当成为工农国家中的基本路线”。他对中央提出批评，因为中央通常总是无视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把因此对中央提出批评的党的工作者撤职，或放逐到对中央安全的地方去。当党开始对中央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时，则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一份“空口白话的一纸声明，对喧然大哗的群众表示让步，而当在其余时间群众默不作声时，中央就该加紧对他们施加影响了……中央是靠我党的软弱来苟且偷生的……我还要谈一下中央的一种管理方法。我要说的这种方法已经上升为一种制度，这就是在各种借口下的流放、放逐制度……”（同上，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72页。——译者注

第47页）尤列涅夫在发言结束时要求："某些同志、中央的一个集团要剔除出中央的话，不能由中央的意志，而要由代表大会的意志来决定……永远都应该说，中央是负责的政府。"（同上，第47页）

马克西莫夫斯基在发言中指出，关于"组织科学"的"列宁讲义"是多余的。列宁以为，"我们原则上是集体领导制的拥护者，但有各种各样的集体领导制拥护者，例如，我们主张收缩集体领导制，有的集体，我们是反对的。首先，中央组织局就是这样的集体"（组织局渐渐变成了党的官僚金字塔的全能的塔尖）。马克西莫夫斯基回敬了列宁对"民主集中派"维护孟什维克观点的指责。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也并非无话可说，似乎我们维护孟什维克观点。我们维护的是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中央的过错在何处呢，在于官僚集中制。这是事物的本质。常言说，鱼从头烂起。党则从上层开始陷入这种官僚集中制的影响。"（同上，第48—49页）

萨普龙诺夫的批评也是同样尖锐而有原则性的。他说，"没有中央报告，只有避开活动的避雷针"。他回顾说，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和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由地方来的干部要求取消垂直集中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列宁同志看来，提出这样要求的人都是无知之辈。这样一来，整个代表大会和列宁同志本人都成了无知之辈，他没有表示反对……开始在群众意见面前躲躲闪闪和向后退却，为的是以后不必执行……个别人民委员会象往常一样继续用逮捕整个省执委会相威胁（有时是付诸实施）。七大明白无误地说，这是不行的……列宁同志，请您告诉我：这是无知还是故意不执行大会决议？"萨普龙诺夫举例说明，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某一件事，而政府（人民委员会）则取消它的决定（如，苏维埃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委员会服从地方苏维埃的决定）。

然而，中央不但无视苏维埃，甚至连自己的党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放在眼里。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内官僚集团的专政。这是事实。不管您，列宁同志，多么有文化，也不管我们多么无知和没文化，任何声明，任何言词都不能抹杀。追求一长制不止见于工厂企业的管理，它已经明显表现为要力图以省长代替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这样，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可言，还有什么工人自主可言呢？——没有任何自主。你们在把党员变成顺从的留声机……我当时问列宁同志：谁来指定中央呢？何况，这里也是一长制。”

萨普龙诺夫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注意到列宁喜欢用自己的理论优势吓唬对手这一点，向列宁提了一个问题：“列宁同志，对于您的理论修养，谁都没说的，在理论上同您进行辩论是太难了。但还是请允许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您沿着这个制度走下去，您是否认为，挽救革命的办法就在于此呢？您是否认为，机械的顺从就是挽救革命的全部办法呢？”（同上，第50—53页）

是的，列宁不但这样想，而且这还是他几十年建党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最奇怪的是，在这个党内竟然还有象“民主集中派”这样的人，并对此抱有幻想。不过，在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发言中，不仅严肃分析了党内现存制度，而且有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列宁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的未来最高阶段。拥护中央派和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雅柯夫列夫（未来的俄共中央委员）以如下论据维护列宁、反对“民集派”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你们想用另一个党魁集团与之对立，只是矮了一头……我们宁肯要一个天才的党魁集团，也不要一个平庸的党魁集团。”

（同上，第57页）

1898年入党的党员、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基谢廖夫谈到，中央对自己不满意的苏维埃议会决定一概废除，也没有贯彻执行上次八大的决议。他说：

“若是有人试图维护八大的决定，您不是被宣布为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被宣布为工团主义者……在我们的纲领中说，工会应该着手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权都实际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当试图依据这一点并维护它时，就出现了最厉害的讹诈。毫不奇怪，在场的许多同志都被吓破了胆。”（同上，第60—61页）

对表达了苏维埃议会的意见并且又不属于反对派的基谢廖夫，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决定当即给予回击。加米涅夫说，有人宣扬，“中央的拳头太硬……可我说，它的拳头太软……这里有人责备列宁，说我们通过电话决定重大问题，说我们搞独裁。不错，我们是借助独裁搞管理……假如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议会途径决定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扼杀革命……”（同上，第71页）

当也不属于反对派的党的著名活动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党的利益出发，建议实行“党权分散”（第68页）时，托洛茨基激烈驳回了这一建议。托洛茨基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需要……党的分权机关。这是根本错误和不可取的。分散党的权力，就是分割党的权力，就是把它变成地方势力的掌中物……事情实际不在于分散党权……我认为，在地方委员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州委会是有害的。”（同上，第77页）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一言未发的斯大林，想必牢牢记住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这些论据，更不用说列宁关于集中化党权专制的理论了。那些以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不同，是“党内民主”的捍卫者和热情鼓吹者的人，是大错而

特错了。斯大林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只是最彻底并最不择手段地实践了列宁、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在九大上所建议的东西，是那样的彻底和无情，以至列宁自己都被这种彻底性惊呆了。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谈。

列宁的闭幕词无非是重施故伎：反对中央的一切反对派都是“理论上的糊涂虫”。他再次谴责了代表大会前夕公布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和莫斯科省委关于集体领导制的提纲，谴责了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列宁还专门批判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关于工会作用的提纲。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要求，对工业实行集体管理（“上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至工厂管理处”）并同时建立经济领导机关和工会。列宁把这种要求称之为“可怕的理论上的混乱”。

大会代表波利多罗夫说，这种“混乱”的根源是党纲，上次代表大会的党纲中写道，“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应当转给工会。他建议把这一点从党纲中去掉，以免继续“混乱”。但列宁不同意这一建议，继续宣扬“工会力图掌管经济生活即工业”（同上，第89页）。

列宁解释说，“民主集中制仅仅意味，地方代表集合在一起并选举负责机关，这个机关应该实行管理”（同上，第84—85页）。但他没有回答反对派的如下指责，即这些“代表”乃是中央委员会自己根据“天才的党魁集团”的利益挑选的，而把中央不中意的人撤离负责岗位并流放到远处去。

看来，列宁对自己的绝对正确和自己政策的无懈可击是那么自信，竟然在代表大会上恣意采取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手段。列宁声称：

“萨普龙诺夫同志关于党魁集团谈得很多。可惜没有举乌克兰的例子。我们在那里看到，地方代表会议对党魁集团进行了怎

样的攻击……如果我们驱赶和遣散了整个乌克兰代表会议，那就应当鸣钟宣布，我们是罪犯。然而，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同上，第87页）

但是，列宁一清二楚地知道，为什么“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同以萨普龙诺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亲自订过君子协定，在大会上不提乌克兰问题，只在中央全会上谈。萨普龙诺夫恪守这一协定，而列宁不但违犯它，而且还指责反对派恪守它。这在代表大会上引起反对派的愤怒和乌克兰代表团的大惑不解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伙乌克兰代表向大会提出如下声明：

“列宁同志在闭幕词中谈及乌克兰情况时说，政治局解散了在全乌克兰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如果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不提出这一问题，那他们就有过失了，而政治局是对的……萨普龙诺夫同志受代表团委托，在抵达莫斯科的头一天就向列宁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把这一问题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来了。俄共中央建议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代表大会后的新俄共中央全会去解决，而**不要把这个问题提给代表大会**。代表团同意了这个建议。”（同上，第210页）

列宁对于公开谴责他不守信用这一点作何反应，在记录中讳莫如深。

在概括总结关于一长制和集体领导制的辩论时，牢记这样一点非常重要，即列宁不仅主张党的和党中央的独裁，而且赞成个人独裁。列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同一长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9页。黑体是我标示的——阿·阿夫托尔汉诺夫）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6页。有的中文版本把引文中的“中央集权制”（Централизм）译为“民主制”。——译者注

代表大会就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报告通过了简短决议，对中央的工作“总的”表示赞同。这种有伸缩性的提法，用党内语言来说，是最低的评价了。决议获得了多数票，但是怎样的多数，从来没有公布过。

在中央的后两个报告中，即在托洛茨基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和布哈林关于工会的报告中，阐述了和平时期在经济和对群众进行劳动动员方面“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统治的基本原则。

为了阐明关于工业和劳动强迫军事化的中央提纲，托洛茨基诉诸一种关于人的道德本质的相当标新立异的哲学。他说：

“按常规来说，人是力求逃避劳动的。可以说，人是相当懒惰的动物，人类进步实质上正是基于这种品质，因为，假如人不力求节约消耗自己的力量、不力求以少量精力换取尽可能多的产品，那末就不会有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可见，如此看来人的懒惰是进步力量。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在宣传鼓动中应当推崇这种品质……这种品质我们本来就已绰绰有余……任务在于，要把这种懒惰性纳入一定轨道并借助于社会劳动组织把它调动起来。”

托洛茨基在着手阐述问题实质时，说：

“在军事方面，有相应的机器，这个机器开动起来是为了强迫士兵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也应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劳动方面……劳动大众不能成为流浪的露西①。他们应同士兵一样，是可以调遣、可以指派、可以指挥的。这是劳动军事化的基础，舍此无工业可言……我们不能板着面孔说话。”（同上，第91、93页）

倘若工人或农民要逃避这样的强迫“劳动军事化”，该怎么

① 古俄罗斯名。——译者注

办呢？

在中央批准和代表大会通过的托洛茨基提案中，有确切的回答："代表大会认为，迫切任务之一……是要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顽强地、严肃地同逃避劳动现象作斗争，途径是……把逃避劳动的人编成惩罚劳动队……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同上，第415页）（托洛茨基的这些建议和九大决议只是二十年后才由斯大林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充分贯彻执行的，即1940年6月26日命令"禁止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擅自外流"和1940年10月19日命令"必须把工程师、技术员、工长、职员和熟练工人从一些企业和机关调转到另一些企业和机关"。）托洛茨基还补充说，没有工会本身的军事化，劳动军事化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重工业要优先于轻工业发展的理论，也不属于斯大林，而属于托洛茨基。他说：

"近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工作是旨在为生产生产资料准备条件。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能转而生产消费资料。"（《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96页）

中央同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坚信排斥任何个人主动性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托洛茨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流通要服从自由市场的行情……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问题。这是特大成就。我们消灭了自由市场、剥削、竞争、投机倒把"（同上，第104页）。

经过一整年之后，在1921年5月26—2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不得不放弃这个"特大成就"，而以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然而，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早在1920年2月就向中央提议放弃"军事共产主义"，但"列宁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这项建议以十一票对四票被中央驳回。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没有把问题

提交代表大会，大会是完全在军事共产主义标志下进行的”（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册第199页）。

托洛茨基声称，由于这一决定，他除了尽力贯彻执行“军事共产主义”原则外，别无他法。这涉及到他的“工会国家化”要求，这个要求完全符合“军事共产主义”精神，但遇到列宁的反对（关于“工会辩论”后面再谈）。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的另一要求，即逐步变红军为劳动大军，在企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部门尽劳动义务。对此，列宁当然不反对，只要红军同时作为武装力量继续存在就行。

不言而喻，托洛茨基始终不渝地维护一长制管理原则，而不要集体领导原则。

“民集派”的补充报告人是奥新斯基。他说，反对派不反对“工业军事化”原则本身，但“我们反对过分扩大军事化概念……我们不同意把党和苏维埃机械地‘军事化’……我再说一遍：请不要在军事化的旗帜下破坏我们的机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也不要用绳子把我们拖向一长制”（《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6、118页）。反对派不认为应在一切管理部门实行绝对的集体领导制，它认为在一长制需要并且有益的时候，是可以有例外的，但原则上，“参加集体领导是学习管理艺术的必要阶段。集体是相互学习的学校”（同上，第118页）。

奥新斯基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主张“绝对一长制”，而列宁采用不光彩的论战方法诋毁反对派的提纲。奥新斯基说：“而列宁同志对待提纲的办法很简单：专抠纯‘原则性’的地方，而忽略实实在在的地方。这只能证明一点：你自己不想实实在在地对待问题。”（同上，第118、119页）奥新斯基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修改旧的、党章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奥新斯基举出如下事实：

"托洛茨基同志对没有公布的部分提纲提出一个问题，即对党务方面的民主集中制该怎么办，回答是：不但在铁路上，并且在一切工业部门都用政治部代替党组织。斯大林同志，我对他深为尊敬，但在这一问题上同他没有共同语言，他早就比托洛茨基同志捷足先登了，并在顿涅茨煤炭工业中建立了煤炭政治部……还可回想一下，在代表大会头一天列宁同志谈到民主集中制时，他是怎样把那些谈论民主集中制的人都宣布为白痴的吧，而把民主集中制本身宣布为陈腐过时的东西。"（同上，第124页）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引出怎样的结论呢？奥新斯基的答案对于党内民主派并不是很大的安慰，但实质上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个答案是："如看个别事实，趋向对我是清楚的。最终趋向是在苏维埃机关的全部环节实行一长制管理。"（同上，第124页）换言之，发展趋势必将导致在苏维埃国家建立个人独裁，与此相联系，奥新斯基提到三名独裁者潜在候选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与列宁志同道合的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正是这样剖析奥新斯基的发言的。加米涅夫说："奥新斯基同志说，这里有个极为危险的趋向，就是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独裁者的个人权力。"（同上，第167页）布哈林更加具体，他说，奥新斯基"说，你们想安插红色省长，你们要把他们纳入一长制，你们大概还要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代替人民委员会……奥新斯基声称，假如这一切发生的话，就会如何如何。但是，恕我不揣冒昧，柯兹马·普鲁特科夫① 有一首献给古希腊老太婆的诗，这老太婆竟

① Козьма прутков—А·К·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科夫三兄弟的联合笔名。用这个笔名，他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在《现代人》和《星火》等杂志上发表抨击时弊的讽刺幽默诗。——译者注

然得到了他的爱情。可是任何古希腊老太婆也未能得到奥新斯基同志的爱情！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同上，第137页）

奥新斯基回敬了他们。他引证了加米涅夫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集体领导制管理比一长制管理优越的长篇议论，因而“列宁同志应当训斥的不是我们，而是加米涅夫同志”。奥新斯基对布哈林的回答引起了大会全场的赞许笑声，这在记录中是有案可查的。奥新斯基回答：“布哈林同志认为我对于普遍向往一长制的担心是对古希腊老太婆的议论，假如她博得了我的爱情的话。我却坚信，古希腊老太婆拚命争取并已争得了布哈林同志的爱情。这老太婆的名字就是官僚制度。但我要用柯兹马·普鲁特科夫下面的话来回答这位老太婆：‘别缠着我吧，老掉了牙的，你的爱抚令人生厌’。”（同上，第187页）

可是，奥新斯基了解并且公开说，管理党的在法律上是集体——中央，而在实际上是一个人——列宁。奥新斯基说：“同志们，把集体领导制同一长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可以集这一集体领导于一身。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制管理可能成为实质上的一长制管理……（场内有笑声）这完全不可笑……我们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有个战斗核心，为首的是一个人——列宁同志，事实上他一直推动大家、领导大家，是事实上的唯一领导者和领袖。他是否在什么时候当过党的正式首脑呢？没有，领导党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中央。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党内的这种集体领导制形式，正如列宁同志不可能放弃实际领导一样。所以，那些刚才发笑的人，是在笑他们自己。”（同上，第184页）

对“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制和实质上的一长制”这个普遍能够接受的论据，无人反对，就是列宁自己也不反对。苏维埃工会领袖托姆斯基指出，当三个月前开始辩论一长制还是集体领导制

时，“列宁同志犹豫了整整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就象一个未婚妻在两个未婚夫之间决定靠向哪一边一样。他本人说过：‘等一等再提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拿准哪个对’。”（同上，第159页）

托姆斯基说，既然业已存在了两年半之久的苏维埃政权是集体领导政权，那末这个事实本身就驳倒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一长制的论据。托姆斯基说，事情竟然发展到，在《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援引了哥尔茨曼著作中的话：“集体领导不好，因为它不让发挥天才的个性。”“如果你们这样提出问题，那就请允许我维护集体领导制……我们不拒绝一长制。但不应把一长制定为原则。”（同上，第163页）托姆斯基对工会军事化也表示怀疑。他说，不错，都说爱工会，但他们对爱的表现却很特别。他举例说：“列宁同志这样爱它们，爱得它们身打哆嗦，头打晃。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搂脖子，竟致使眼珠子差点冒出来。李可夫同志差点没压出肠子来。”（同上，第165页）

当就托洛茨基的报告和奥新斯基的补充报告辩论结束时，李可夫以他个人和奥新斯基、托姆斯基、米柳亭等人的名义提出一项折衷建议：在最高管理环节实行“简化集体领导制”，它不排斥采用一长制管理形式，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要由经济机关和工会共同决定问题。托洛茨基提出否决李可夫的提案，说这是“企图向足够明确的党内多数意志的不明不白的投降”。表决结果：赞成李可夫提案——一百二十三票，反对——三百一十四票，弃权——八票。

大会主席团，其中包括奥新斯基在内，受托审议代表们的补充修改意见并最后校订托洛茨基提案（提纲）的文字。采纳了两点有原则意义的修改意见，这两点不仅在托洛茨基的提纲中没有，而且在修改补充过的中央提纲中也没有——这就是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和关于“国民经济电气化”。党的宣传至今还把

这些建议归功于列宁，然而，这些建议第一次被写入九大决议恰恰用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的措词表达的，摘引自他的小册子《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亲自谈到这一点（《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7页）。大概古谢夫因为这一功劳被提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全面表决托洛茨基（中央）决议案时，反对派投降了：决议在三票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

一句话："大山生了只小老鼠"！（虎头蛇尾）

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1920年12月），根据党的九大决议，批准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订的电气化计划。

一年之后，斯大林在给列宁的秘密信件中，把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同托洛茨基的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写道："你还记得去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战前工业的废墟上依靠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劳动军）的劳动使俄国'经济复兴'的'计划'（他的提纲）吧。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50—51页）① 列宁不可能不记得这一点，因为他同斯大林一道、同党的代表大会一道投票赞成了这个"贫乏"，即赞成建立"劳动军"，赞成强迫动员人民到"社会主义"建设工地上去，赞成为"逃避劳动的人"设立"集中营"。如果注意到斯大林自己为建设他的未来军事警察社会主义而计划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集中营活动的话，托洛茨基计划的"贫乏"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工会的报告之所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之间对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有分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0页。——译者注

歧。以托姆斯基为首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全都不承认一长制这个原则，并提出地方工会的党组直接服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组，而不服从与之平行的党委会的思想。这是中央指派自己的委员布哈林和拉狄克监视和监督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及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原因。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激烈批评中央的这一行径时，列宁回答："有人说，我们把他们（布哈林和拉狄克）派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当政治委员，于是他们想玩弄那个要点，即自发活动受到破坏……可能，你们知道有比拉狄克和布哈林更好的理论家……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中央，不可能搞管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88—89页）

列宁委托在代表大会上作工会报告的正是这位"最好的理论家"布哈林（而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布哈林没有谈出任何原则上的新东西，而只是重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央对工会实行独裁的指示。有人援引党纲证明，苏维埃国家管理政治、工会管理经济、而党对两者实行总的领导（施略普尼柯夫提纲）。他回绝了这些人的要求。布哈林同托洛茨基一道解释了党纲中关于工会的著名一节，如何使工会"国家化"，但布哈林是代表中央提出这一论断的。他说："中央不这样认为，需要立即使工会国家化……但中央认为，工会的整个发展必将要走上这种国家化的道路。"（同上，第219页）在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没有"国家化"这一术语，但用另一些词句表达了这个意思："工会应该逐步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而不是相反。"（同上，第418页）"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针对那些反对派领袖的，他们要求实行的不是工会"国家化"，而是相反，国家"工会化"。甚至有这样的党员，他们说，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虚假的，那末"工会及其联合会——全俄工会中央

理事会就应该取代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同上，第212页）。

谈到工会的当前任务，布哈林要求实行"工会军事化"。他是用党本身的组织性质来解释这一要求的。他说："我们是这样建设起自己的党的，以至我们是迄今存在的最军事化的组织；须知我们党差不多是真正含义上的军事组织，因为马刺并不表明自己必须属于军事。"（同上，第225页）

布哈林在大会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由一批代表推选为补充报告人的托姆斯基拒绝作补充报告，理由是，他同布哈林除在一长制这一点上有分歧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分歧。确实，布哈林报告提纲基本上是托姆斯基为工会代表大会所作提纲的重复，只有一长制一点是例外，况且，这些提纲的最后定稿还是他们两个人完成的。

在托姆斯基拒绝作补充报告后，一批代表（40人）推举由梁赞诺夫作补充报告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央研究院的未来院长。梁赞诺夫最先回敬了李可夫，后者作为托洛茨基的补充报告人，维护工会国家化并呼吁"把所有象梁赞诺夫那样抵制这种观点并腐蚀工会的同志赶出工会"（同上，第129页）。梁赞诺夫说，自1905—1906年起，他一直维护布哈林所阐述的关于工会的立场，甚至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曾于1910年建议他（当时是孟什维克）阐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工会的观点，他也这样做了。梁赞诺夫在这部分讲话最后指出："你们看到，如果说我腐蚀工会的话，那末我早在李可夫同志分不清马鞍与机床的时候就开始顽强地这样做了。"转到谈报告实质时，他发现其中有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全部出自一个根源——出自上次代表大会党纲中对工会问题的不正确的提法。

梁赞诺夫说："如果你们拿起我们的党纲，那末就会看到，那里面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

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①……现在请拿起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原来，本该承担生产管理的工会……按他的提纲，不能接近这件事去挨打”，因为布哈林说：“工会不是特殊独立的组织，也绝不完全单纯管理生产，它们自下而上地参加组织工作。并且，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同上，第229页）

为了摆脱这个荒唐的矛盾，梁赞诺夫建议把有关的这一条从党纲中剔除，并建议工会从事其他任务，诸如：管理劳动力、从事劳动保护、劳动教育、提高工人熟练水平等。梁赞诺夫还补充说：“当然，对于那些幻想将由工会管理的人来说，这一任务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同上，第231页）

中央和列宁不想快刀斩乱麻并明确地告诉工会，它们在党的专政体系中的作用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它们永远也不能管理生产。的确，它们的作用应当在于把它们变成党的机关和国家的辅助工具，不是管理生产，而是管理工人阶级的辅助工具。中央和列宁认为对自己的这个真实意图最好不声张（为时尚早），而是继续在工会领袖中散布幻想，说它们终究还是要管理生产的。这种幻想在代表大会上的鲜明表现者是“工人反对派”的未来领袖之一卢托维诺夫（1904年入党）。他反驳梁赞诺夫说，“能够对每个工业部门负责的只能是生产联合会，而对所有工业部门总负责的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根据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托姆斯基同志声明，他不作报告了，因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提纲中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结果布哈林的提纲便只剩下一副空架子了”（同上，第240页）。布哈林甚至在自己的闭幕词中也没有脱离对党纲的这种解释，使工会领袖们飘飘然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1页，——译者注

如坠五里雾中。选举了最后修订布哈林决议案委员会，其中没有梁赞诺夫，但却包括卢托维诺夫和托姆斯基。除他们外，被选进委员会的还有列宁的两位“政治委员”——布哈林和拉狄克，外加斯大林。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是托姆斯基，他建议批准布哈林决议案。代表大会除三票弃权外，其余都投票批准了这个决议案（同上，第381页）。

就这样，工业中工会至高无上的幻想再次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得到批准。当列宁在几个月之后的“工会辩论”中及随后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打出自己的真牌时，就更加令人失望了……

加米涅夫作了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而代表“民主集中派”作补充报告的是马克西莫夫斯基。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中央和反对派之间没有原则分歧。马克西莫夫斯基一如既往地坚持切实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加米涅夫承认，在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决议案中有某些实际建议是他准备接受的。大会作为基础通过的加米涅夫（中央）决议，在组织组又作了些修改和补充。然后，大会在八票弃权的情况下一致批准了这项决议。决议中说，既然党负责国家经济生活，经济工作就是党的主要工作。决定从中央委员中选举三名中央书记以代替一名负责中央书记。这三名书记是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在随后发生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工会辩论”中，他们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不用说，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把这三个人从中央委员中开除了。他们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被选上。斯大林的不忘旧怨也是从列宁那里学来的！

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组成如下：

委员：1、安德烈耶夫，2、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3、布哈林，4、捷尔任斯基，5、季诺维也夫，6、加里宁，7、

加米涅夫，8、克列斯廷斯基，9、列宁，10、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1、拉狄克，12、拉柯夫斯基，13、鲁祖塔克，14、李可夫，15、谢烈布利雅柯夫，16、斯米尔诺夫，17、斯大林，18、托姆斯基，19、托洛茨基。

候补委员：1、彼得罗夫斯基，2、雅罗斯拉夫斯基，3、穆拉诺夫，4、米柳亭，5、斯图奇卡，6、诺根，7、古谢夫，8、皮亚特尼茨基，9、别洛鲍罗多夫，10、扎鲁茨基，11、莫洛托夫，12、斯米尔加。

"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中没有任何人进入中央委员会。等待他们的是会后新的体面流放。同时，这对那些新的潜在反对派来说当然是个警告。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办法依旧未能奏效。为了使列宁为首的党机关彻底屈服，党还是大伤脑筋的。对于理解党归根到底不过是列宁的化名这一点，党还是依然沉湎于唯心主义的幻想世界之中。就是在中央之中，也只有一个人能够透澈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斯大林。这向列宁保证了一点，即斯大林将来不会成为列宁的公开反对派，但却既不能保证其他中央委员不成为他的反对派，也不能保证斯大林不搞阴谋诡计。

第十九章

工会国家化和中央的分裂

在列宁温良恭谨的外表之下，有着无限的独裁意志。与其说列宁自己关于党的学说是建筑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原则之上的，不如说他是被迫遵守“党内民主”的一切表面特征。这造成了管理中的困难，导致党内各种反对派的出现，有时在中央内部形成了与列宁对立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施展手腕、随机应变、设法人为地瓦解这个多数，使之向有利于自己在中央内的派别方面转化，从而还其“合法”多数的表相。然后，他又以这个多数的名义操纵党内“舆论”为自己的政策服务（当然，有时相反，当列宁在基层组织中寻求支持时，强迫在中央的反对者投降，如我们在1917年4月所看到的那样）。

如同在任何党内一样，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亦有两类人物：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列宁依靠的是机会主义者并一直同理想主义者角逐。在理想主义者之中，列宁对托洛茨基怀有特别戒心。在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托洛茨基是那样地接近列宁，以至被称作“列宁的大棒”，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委身于孟什维克，而从1904年起又脱离孟什维克，变成了“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继续同列宁进行斗争，称他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职业制造者”。列宁也不甘示弱，给托洛茨基加上了各种各样的侮辱外号。但在俄国历史的决定性转折关头——1917年革命中，托洛茨基和列宁的道路殊途同归了。他们正是在从二月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这一

根本问题上相会合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我们所见，以党中央为代表的整个“老布尔什维克派”都起来造列宁及其《四月提纲》的反了。托洛茨基无条件地支持了列宁。正是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的合作。这一点的外部表现反映在，无论在准备和进行十月政变中，还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并驾齐驱的。

历史上难以找到比这两个心理上正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更违反自然的结合了，这两个人每一个都完全有理由追求自主意志和独立思考。何况，既然列宁以自己的政治判断准确无误而自居，那末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那样。现在，这种冲突因为列宁对待托洛茨基异常小心而避开了，尽管托洛茨基经常暗示，他是不会拿自己的独立性作让步，也最不可能接受列宁意志执行者之职的。托洛茨基亲自谈过，他为什么拒绝接受列宁要他作政府中的副手的建议：

“毫无疑问，在日常事务中，列宁在许多情况下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者加米涅夫，要比依靠我方便得多……列宁需要的是唯命是听的实际助手。这种角色对我是不合适的。”（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4—215页）

（所以，对在列宁生病和逝世期间中央和政府大权落入这些“助手”——“三人帮”手中一事，托洛茨基不该抱怨。）

出类拔萃的政论家、卓越的演说家和天才的革命巨匠托洛茨基，却是个没有权力概念的人，这最终说明，他在同革命手艺人、然而是权力大师的斯大林的斗争中将要败北。托洛茨基实际承认了，他缺乏任何权力概念，他写道：

“赢得政权提出了我的政府工作问题。奇怪的是，我对此从来不曾想过……关于夺取政权之后我的个人工作问题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它使我措手不及。政变之后，我试图留在

政府之外……可是列宁不想听到这一点。”（同上，第62页）

当权之后，托洛茨基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权力大师，不如说是革命浪漫家。列宁早在十月政变之前就曾说过，“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0页）[①]，他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每一个行动步骤都同夺权利益联系在一起，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又同掌权利益联系在一起。他的天性是斗争，他的癖好是权力。他认为在中央领导人中独裁的可能竞争者只有两个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他们每个人都常给列宁这样的感觉，不过托洛茨基是因为误会，而斯大林才是有意的。但是，列宁颇不公道地把托洛茨基抬举到斯大林之上，所以首先他同斯大林联合反对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开始的“工会辩论”中就是这样。这场辩论在许多方面都是有意思的：第一，在九大上那样精心挑选的中央分裂成差不多相等的两部分（列宁和托洛茨基）；第二，整个中央书记处都是托洛茨基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第三，列宁公然采取派别斗争手法，把个人独揽中央大权的利益置于党领袖的忠诚之上；第四，参与中央两派辩论的还有中央之外的反对派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伊格纳托夫集团。这样，关于工会的辩论就变成了全党性的辩论。

列宁在《党内危机》的小册子中（1921年1月19日）对辩论的开始是这样描绘的：

“第一阶段。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斗争的开始。在中央委员中，‘斗士’只有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两人。托洛茨基说出了后来成了‘惯用语’的对工会的‘整刷’。托姆斯基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采取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页。——译者注

静观态度……

"第二阶段。11月9日的中央全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提纲草稿'：'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论述了'整刷'政策（即清洗工会领导中的官僚主义者。——作者）。……托姆斯基在列宁的竭力支持下，认为争论的重心，正是'整刷'问题。这里，在争论中，列宁曾作了若干显然夸大了的因而是错误的'攻击'（！），因此就有组织'缓冲集团'的必要。于是就产生了由10位中央委员组成的'缓冲集团'（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和列宁都没有参加）。'缓冲集团'决定'不提出对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决定**取消列宁的报告**（对工会的报告），而指派季诺维也夫为报告人，要他'做一个……不带争辩性质的报告'。托洛茨基的提纲被否决了。采纳了列宁的提纲……

"第三阶段……12月7日的中央全会……布哈林……同意有名的'生产民主'……我们这一派中央委员是少数（尽管'缓冲集团'的季诺维也夫转到列宁方面并在彼得格勒领导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作者）……

"第四阶段……12月15日托洛茨基发表'纲领性小册子'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建立派别组织**……

"第五阶段……争论全面地展开了。一方面是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第六阶段……从上层派别组织进行斗争，转到下层组织参与斗争……

"第七阶段。工会委员会（这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委员会。——作者）发表了纲领……日期为1月14日，署名的有9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

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不是中央委员，而是候补委员。——作者）、阿尔乔姆、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87—91页）①

上述八名中央委员签署了关于工会任务的列宁—季诺维也夫纲领。而签署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也是八名中央委员，他们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安德烈耶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

这样，如果说在中央形成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别的话，那末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肯定，也形成了列宁—季诺维也夫派别，其人数与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别相等。其余三名中央委员（李可夫、拉狄克和斯米尔诺夫）的立场不明，不过李可夫倾向于列宁，而拉狄克和斯米尔诺夫倾向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列宁在这里亦遵循“辩证逻辑”：把自己集团看作党，把托洛茨基集团看作反党派别。此外，他还指控托洛茨基擅自挑起工会辩论，未经中央事先同意就抛出自己的“提纲”，从而制造了“党内危机”。

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以非常鲜明的例证表明，列宁为了诋毁自己的敌手，采用了多么令人不能容忍的手段和歪曲事实。托洛茨基向代表大会介绍说，当他，托洛茨基，说，应当实际地提出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以便消除“工人反对派”的影响，这时，“列宁说：‘我想，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但愿他就这一问题提出提纲。’……而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已在进行……12月中旬，季诺维也夫打电话给我说：‘托洛茨基同志，让我们发表您的提纲吧，因为辩论来自各个方面，继续阻止它已无可能。我刚才跟列宁谈过，我们两个都建议您这样做。’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32页。——译者注

这便是事情的经过。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不对？（季诺维也夫：'完全对'。）

"在季诺维也夫同志通过电话提出这一建议时，只是这时我才发表了……但这是否意味，需要把辩论引向纲领斗争、引向恶化呢？我在这里肯定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对党的过失无疑少于对方：为了使辩论健康地开展，我们做了能够做到的一切(鼓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 第 393 — 394 页）

托洛茨基向列宁指出，在中央内部采取建立派别办法的恰恰是他自己，他并且证明自己有权同思想一致的人"商量"。托洛茨基说："即使列宁说，一方和另一方都有过错，那我也要回答：不一样。当列宁同志补充说：'托洛茨基同志想禁止我们在不同房间里开会，并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分歧'，那么我要提醒，列宁同志就莫斯科代表会议向你们报告了。他说：'把党引到什么地步了，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走到了两个房间的地步。'就这样，他当时把'两个房间'评价为党的解体，而现在对我们说的正相反……但不要忘记，不仅在代表大会上有'两个房间'，而且您正在以此在中央制造'两个房间'……您是想从当前派别集团的角度来实行选举……"（同上，第394页）

关于工会在独裁制度中的意义问题，被争论各方闹得一塌糊涂，其后果是，中央和党内各种流派、各个集团的文章、讲话、"提纲"、"纲领"多如牛毛。基本派别当然还是前面指出的中央内部两大集团，但在这两个集团之间还是难以找出在解释工会作用方面有什么原则不同。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关于这场辩论所编造的那些东西，并不出自辩论材料。"民主集中派"是非常接近真实的，它对争论对象和中央内部争论各派的立场是这样写的：

"工会问题在当前绝对没有特别大的客观意义，也没有特殊

的理论重要性。以中央内部形成的两派集团为代表的我党领导阶层，在业已形成的危机中找到两个基本出路：一派主张立即向工会有条不紊的国家化过渡（使工会同经济机关相结合）、把生产领导职能交给工会（托洛茨基）。另一派不否定在或多或少比较遥远的将来使工会国家化，同时认为必须保持工会作为没有国家政权授权的特殊组织（季诺维也夫）。这两个集团之间没有深刻的原则分歧。它们实际上代表昔日主张经济军事化的同一个集团的两个派别。”（1921年1月16日《真理报》）

对辩论的这一评价基本是正确的，但列宁是唯一确切了解他想干什么的辩论参加者：扩大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保持组织在工会之内的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外表。工会无产阶级是独裁者，但他把自己的独裁权利交给自己“先锋队”——党来代表。谈论工会代表的工人阶级应当管理国家和生产，这在列宁看来，就是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据列宁所见，阶级通常是从来不搞管理的，搞管理的是其先锋队——权贵集团。把苏维埃工业的管理权交给工会之手，这在列宁看来，就是把工业交给“非党自发势力”之手，这是党所不能容许的。所以才在九大决议中写道，工会参加“组织生产”，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管理”。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陛下当家，但只能由党来管理。

官方历史文献批评托洛茨基的“整刷”方法是“强迫方法”，以列宁及其在工会活动中的“说服方法”与之分庭抗礼。与此同时，恰恰是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因为他们建议在生产中实行“生产民主”制度。列宁回敬他们说：

“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一长制还不久，一双鞋子还没有穿坏。决不许制造糊涂观念，制造危险，使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一长制，什么时候需要专政。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9页）①

列宁在1921年1月底重新谈到“生产民主”这一术语时说，“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这样做只是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从否认专政和一长制的意义上去了解它……”（同上，第124—125页）②但列宁在这里批判的并非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而是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列宁把“铁一般的纪律”抬高到党的教义的水平，但当他在中央处于少数时，他不仅亲自破坏了这个纪律，而且甚至在中央驳斥了列宁的观点并通过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之后，竟发表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为俄国共产党党员而作”）。1920年12月7日的中央决议是这样说的：

“（一）在工会运动方面的基本任务是活跃业余生活……（二）同样，在组织方面无论如何必须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即实行工会运动一切机关的广泛选举制并把一切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三）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组织生产（而不光是监督）的任务是第二项任务……（四）所以工人民主方法应当成为生产的工人民主方法。这就是说，应该从不但有政治冷静（候选人的），而且有经营才能……又有经过实际检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利益关心的角度进行一切选举。”（《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831页）

这次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对“生产民主”的这种理解，解散了早先成立的铁路特别政治部和水运特别政治部。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440页。——译者注

列宁不但破坏纪律和推翻自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十二月中央全会的多数为“派别”，而自己的少数集团为党的意见表达者。列宁知道，这样的党的意见还没有，但可以编造出来。列宁便着手编造党的意见，所采用的方法，与《四月提纲》后他受到中央反对时所采用的方法毫无二致。他给地方党组织分发材料，其中都是他的观点，他组织会议，他的拥护者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也都是他的观点，他向他们搜集千方百计谴责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生产民主”的会议决议。

第一个登台的当然是季诺维也夫的党内堡垒——彼得格勒组织。它在1921年1月3日提出的文件，对于一个个别的地方组织来说，是异乎寻常的。这个文件叫《向全党呼吁书》。彼得格勒组织越过中央呼吁全党，要全党站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上，反对十二月中央全会在工会问题上的多数派。“呼吁书”中建议，行将召开的党的十大的选举要按照党内正在辩论的“纲领”进行。“呼吁书”说，彼得格勒组织将向全国各个城市派出自己的报告员，支持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但是，莫斯科委员会断然拒绝彼得格勒委员会窃取党中央职能的尝试。莫斯科委员会的回答中说：

“莫斯科委员会认为，附和彼得格勒组织呼吁书中那些有关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是肯定不可能的……既然中央在争论问题上立场不一致，中央的义务就是要向所有党组织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和善于阐述所有观点的报告员……只有这样，彼得格勒组织的呼吁书才能避免目前极端危险的倾向，即彼得格勒组织要把自己变成筹备党代表大会特别中心的倾向。”（同上，第832—834页）

列宁确实把彼得格勒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不过是执行者）变

成了在召开代表大会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派别中心。他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协助下并通过“向全党呼吁书”，直接呼吁“下层”反对“动摇的上层”的途径组织了十大。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

“我们被迫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诉诸全党……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动摇的话，那末普通党员群众……‘否决了托洛茨基的错误立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144—145页）①

但与此同时，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列宁坚决谴责了“托洛茨基的派别言论”、“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同上，第143—144页）②，而自己却制造派别和鼓吹按中央内不同集团的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这是绝对违背他的建党理论的，但眼下正是这样行事才对他有利。

尤其令列宁愤怒的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上面引述过的中央全会决议所提出的要求：生产领导要逐步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到工会的“生产民主”，尽管这问题的提出来自党纲。列宁就此说道：

“这是跟共产主义完全决裂并转向工团主义立场。这是重复‘国家工会化’的施略普尼科夫口号。这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转交到……工会手中……如果委派工会即十分之九的非党工人管理工业的话，那还要党干什么呢？”（同上，第92页）

十分明显，列宁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不是通过无产阶级（因为十分之九是非党的），而是通过党，尽管在党内无产阶级占无能为力的少数。对于列宁，“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5—466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64—465页，——译者注

但无产阶级永远也念不完这个学校，永远也得不到管理国家的毕业文凭，否则“还要党干什么呢？”

如果读者拜读过苏联思想家对于列宁这位“天才哲学家”的令人作呕的吹捧之词的话（顺便说一句，列宁的政论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最初的副标题是：《非哲学家的笔记》），他想必已经发现，列宁正是在《再论工会……》的小册子中“天才地发展了辩证逻辑”的。在这里，列宁关于“辩证逻辑”的议论离他的学生们为之标榜的东西相距甚远，但却是党的神学花言巧语、强词诡辩的标本。成为列宁哲学议论借口的是布哈林小册子中的如下地方：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48页）①

布哈林以一个通俗的例子向列宁证明二者的正确：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同上，第46页）②

作为答复，列宁写道，他感激地接受布哈林的说明，但又想向布哈林解释一下折衷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是什么。列宁说，“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许许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52页。——译者注

多多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134页）①列宁列举玻璃杯的"许许多多属性"说：玻璃杯是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水，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都是无关的。如果人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末他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然而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但如果人需要玻璃杯不是为了喝水，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末就是杯子没有底也是可以用的。列宁得出结论说：

"形式逻辑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2页。——译者注

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同上，第134—135页）①

列宁把布哈林的这种议论说成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正确的议论该是什么样呢？列宁答道：

"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同上，第136页）②

不言而喻，党的凡夫俗子是无法单独步入这辩证法的丛林的，因而他也就只能全面依赖无所不知的向导——列宁（在激烈辩论的年代曾出现一个党机关内的公式："要想不犯错误，就投伊里奇的票！"）。

如果不算列宁经常强调的党的权力垄断和不同任何人（工会也好，苏维埃也好）分权的话，那末在其他方面，工会辩论是纯烦琐哲学领域中空洞争吵的典范。关于工会在专制制度中的作用问题，争论双方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何况辩论进行得显然文不对题。关于前者和后者，我们都有辩论参加者的证词，如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证词。

在1921年1月5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斯大林写道："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在对工会的原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分段不同。——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5页。——译者注

则性的估价方面……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斯大林不指名地批判了列宁的观点，即党内一部分人想把工会和生产都交给党外群众“自发势力”去摆布。斯大林说：“有人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放松了缰绳，因而使群众受自发势力的玩弄，这是一种未加思考的说法。”（《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4页）①

那末，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认为，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待工人群众的方法。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想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如我们从前一章所看到的，正是九大通过了工业和劳动军事化的决议），而应当采用“说服方法”代替在工会中的“强迫方法”。从斯大林在文章末尾所做的结论中，想认出未来的独裁者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写道：“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同上，第14页）②

后来，在流亡中，托洛茨基写到这个题目：“辩论完全文不对题。党所议论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速度使工会国家化，而问题所涉及的是迫切的粮食问题、燃料问题、工业原料问题。党激烈争论的是‘共产主义学校’，而事情所涉及的实际上是迫在眉睫的经济灾难。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省的起义成了对辩论的最后警告。”（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01页）

中央委员会之外的党内反对派在关于工会作用问题上既同列宁—季诺维也夫集团有原则性分歧，又同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有原则性分歧。这样的反对派有三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反对派。与此同时，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3页。——译者注

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都主张党要毫不含糊地全面实行专政，包括对工会的专政，上述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式的解释是字面上的，可是既然这个无产阶级（当时约有六百万人）都无一例外地组织在工会之中，那末他们就必须要求把党的机关和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逐渐移交给工会。

在这些反对派方面，不仅有合乎逻辑的论据——这些论据来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法权哲学，而且有党纲（1919年）关于工会的直接指示——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逐步移交给工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422页）。

“民主集中派”集团（布勃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加明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奥新斯基、拉法伊尔和萨普龙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提纲，提纲中指出，工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它表现为“工会的官僚主义僵化”，是“整个党、苏维埃和工会机关官僚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个全部过程的后果是“工会逐渐脱离生产工作”。这个集团认为“把工会权利扩大到生产中去是绝对必要的”。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提出建立如下秩序：

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应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推选并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部委会、总局和中心委员会由相应的部门工会中央委员会推选，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批准；

三、所有地方经济机关都按这一模式组成；

四、工厂管理处由相应的工会理事会推选（省的、区的等等），由该经营机关和工会联席会议批准；

五、工会中央委员会有权委派特别委员会调查管理当局的经营活动，一旦发现经济机关的犯罪活动或者玩忽职守，特别委员

会将把犯罪分子交付法院处理；

六、要彻底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原则，也就是"所有工会机关的选举制"和"放弃委派政策"（1921年1月16日《真理报》）。

伊格纳托夫（1912年入党、工人）、柯尔齐诺夫（1904年入党、工人）、奥列霍夫（1907年入党、工人）等人的集团基本上赞成"民主集中派"观点，宣称，"工会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掌握生产"，而在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期间内，生产管理的领导机关应当在国家机关和工会的均等原则上产生。伊格纳托夫派认为，"党在委派和调动工会与经济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时应事先征得工会的同意"（1921年1月19日《真理报》）。

最走极端的并且使列宁和托洛茨基同样深恶痛绝的是"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论工会的任务》。会签这一提纲的是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冶金工人工会中央（施略普尼柯夫）、矿山工人工会中央（基谢廖夫）、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库图佐夫）、农业工人工会中央（库比亚科）、炮兵工厂工人工会中央（托洛康采夫），签署者中还有著名的经济领导者：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奥尔洛夫）、重工业中央理事会主席（柯特利亚科夫）、中型机器制造业理事会主席（巴鲁林）及一系列大工厂经理。

与托洛茨基、列宁、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不同——他们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是体力劳动，按出身他们属于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上述"工人反对派"领导人不仅本身是无产者，而且直接率领俄国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冶金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雇农。因此，列宁同"民主集中派"的知识分子谈话要比同"工人反对派"的世袭无产者谈话容易得多。

在"工人反对派"的提纲的引言部分，提到1918年1月第一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中说，"工会作为无产阶级的

阶级组织，应当承担起组织生产的主要作用”。还援引了1919年2月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中说，“工会由监督生产转为组织生产”。也援引了党纲的著名一条，即“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①。“工人反对派”在援引了这一切之后，指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不是按照这些决议，而是违背这些决议进行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中说：“党的各个核心和国家机关近两年的实际作法一贯束缚工会工作的范围，使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影响几乎等于零。”

在提纲的实际部分提出以下建议：

一、现存一切参加国家机关和工会的均等原则应当向增加工会权力方面扩展；

二、不通过工会，任何人不得被指派到行政经济岗位上；

三、凡工会提名的人，经济机关必须采用并只能由工会召回；

四、逐步建立这样的秩序，即生产上的一切负责人员从下至上都由工会指派；

五、国民经济的最高管理权属于参加工会的生产者全俄代表大会；

六、在一切经济企业和机关中，从工人和职员中选举领导机关——工人委员会。

此外，“工人反对派”要求满足无产阶级的当前直接要求，例如，取消购买口粮和家庭日用品的费用，取消工人及其家属的伙食费，取消洗澡、乘车、看剧的费用，取消住房、取暖和照明费用，通过压缩苏维埃和军事机关给工人提供住宅，依靠企业维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1页。——译者注

修旧住宅，等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63—568页）。

一句话，无产阶级决定，如果业已建立的政权制度确属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末它就有权不理会党和国家官僚阶层的意志来管理这个国家并“按社会主义方式”生活。

中央委员会以外的党内反对派集团参与辩论后，使争论对象立即从官僚主义一烦琐哲学范畴（列宁、托洛茨基）转入社会政治范畴（“工人反对派”）。

列宁第一次面临一个最后通牒式的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物质内容是什么？当国内战争中（1919年）制度的命运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列宁所作的回答是：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36页）①

1920年12月，当新政权对敌人的胜利已是既成事实时，列宁已用另一种语言说话了：

“工会……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由包括这整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4—65页）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3—404页。——译者注

既然无产阶级本身即使由包括这整个阶级的组织都不能实现自己的专政，那末出路又在哪里呢？

需要的正是工会辩论，特别是“工人反对派”的发言及其阐述得极合逻辑而又行之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使列宁不仅打开了“无产阶级专政”公式的引号，而且摊开了自己的牌。

列宁以其特有的开诚布公这样做了。他说：“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64页）①

当然，党外有政治头脑的人明白，列宁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党专政！但在列宁党之中，尤其在党的无产阶级部分中，继续有人对由无产阶级全面通过工会直接真正地行使国家政权抱有幻想。

党对一切人、包括对无产阶级本身实行专政这一点，自此得到了列宁不容置辩的法律的确认。这个新法律是在1923年的十二大上（列宁尚活着）确立的并反映在大会的如下决议中：“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形式，才能得到保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683页）②

“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一句空话。无产阶级比成为幻影还可怜。其实，这是列宁自己说的：“有人责备我们搞一党专政……我们说：‘对了，一党专政！我们坚持一党专政并且不会离开这一立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23页）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呢？列宁下了鲜明透彻的定义。这就是：“专政就是——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请一劳永逸地记住这一点——无限的、依靠力量而不依靠法律的政权。”（同上，第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51页。——译者注

25卷第436页）或者："专政的科学概念不是别的，就是不受任何限制、决不受任何法律、任何规定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同上，第441页）

列宁的这些言论同党的现行统治实践是不矛盾的。大家看到，苏维埃在扮演了夺取政权机关的有用角色后，如今变成了执行党机关的指令和意志的行政技术工具。工会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由一个有组织地表达无产阶级意志的机关变成了实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的附属机关。工会辩论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十章

十大和党内戒严状态

苏维埃俄国在内外全面和平的条件下步入1921年。白卫运动在克里米亚的最后势力即弗兰格尔将军的势力，于1920年11月中旬被粉碎。这之所以成为可能，至少其速度如此之快，是由于苏维埃在西线的冒险攻势受到了挫败。发动西线攻势的目的是使波兰布尔什维克化，并以波兰为桥头堡使德国布尔什维克化，再通过德国使全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结果，苏维埃政府同波兰签订了可耻的和约（1920年10月20日的里加和约）。苏维埃政府在苏波战争爆发前还拒绝承认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提出的（1920年7月12日）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凯尔逊线”①和与之相应的民族边界，现在却把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拱手让给了波兰。这样，全部红军都集中同弗兰格尔作战，加速了后者的溃败。

不过，苏维埃进攻波兰失败的主要过错在斯大林身上。只有那些有机会接触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秘密文件的人才了解这一点。在斯大林生前和死后，直到他被揭露，在苏联历史教科书和调研资料中恰恰把斯大林捧为苏维埃进攻波兰的天才战略家，而托洛茨基则是这次进攻失败的罪魁祸首。

---

① 凯尔逊（1859—1925）是英国外交大臣。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提出波俄边界线建议，1920年7月12日凯尔逊要求苏维埃政府接受这一分界线，遭拒绝。——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是从两条战线开始对波战争的：华沙方向的西部战线由土哈切夫斯基指挥（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克里米亚方向对付弗兰格尔和利沃夫方向对付波兰人的西南战线由叶戈罗夫指挥（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西部战线被视为主要战线，它要占领波兰首都才行。

按照总司令部作战计划——这个计划1920年4月28日得到党中央赞同，——当苏维埃军队开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边界时，西南战线的主力应当并入西线。

根据这一计划，1920年8月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把斯大林从波兰前线召回并责成他筹建新的、对付弗兰格尔的南部战线的政治机关。

斯大林就建立新战线一事给列宁的答复，证明了他的战略奢望、独立程度和缺乏对列宁的应有尊重。有关苏联文件的第一次公布乃在斯大林被揭露之后。8月2日列宁打电报给斯大林说：

"刚才政治局确定了各战线的分工，弗兰格尔专门由您负责。由于有些地区发生骚动，首先是库班，其次是西伯利亚，弗兰格尔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央内部愈来愈倾向于立即同资产阶级波兰媾和。我请您集中精力研究一下弗兰格尔的情况并作出结论。我已同总司令商妥，给您更多的弹药、援兵和飞机。捷尔任斯基和他的战友已建立波兰革命委员会，并发表了宣言。"（《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1卷第239页；①《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第9期第54页，库兹明文章：《关于一项没有执行的指示》）8月3日，如苏联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斯大林"粗暴地答复列宁说不同意中央决定"。斯大林写给列宁说：

"您关于战线分工的来电收悉，**政治局不该管区区小事**。我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1页。——译者注

在前线最多还能工作两周，需要休息，请找一副手。我一分钟也不相信总司令的许愿，他只会用许愿坏事。至于中央想跟波兰媾和的想法，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破坏我们军事成功的结果往往很成功。”（《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116页）

能够这样写信给列宁的人，必是不仅了解对自已的估价，也了解对列宁的估价的人。

列宁给斯大林的答复颇为克制，虽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不悦：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您对战线分工不满意……我觉得，既然弗兰格尔的威胁愈来愈大，这就是必要的。关于副手，请告您对人选的意见。还请告，总司令的哪些许愿是误事的。我们的外交服从中央并且永远不会破坏我们的成功……”（《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第115—116页）

8月4日列宁为中央全会征询了斯大林对两条战线前景的意见。斯大林在给列宁的电报中，对两条战线故意做了虚伪的估计，说，利沃夫将被攻克，“两线总的前景据我看是这样：波兰已疲惫不堪，需要喘息时机，而弗兰格尔将于近日被击溃。”（《苏联国内战争史》俄文版第3卷第339页）

在同一封电报中，他再次拒绝服从中央决定。但为了证明他的估计和行动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试图以西南战线的全部现有兵力拿下利沃夫，以便然后再取弗兰格尔。然而，很快就清楚了，无论华沙还是利沃夫，红军都无法攻克。“疲惫不堪和需要喘息”的波兰顶得非常顽强。最后真相大白了：没有西南战线的支持，西部战线不可能攻下波兰首都。因此，8月5日中央全会重申政治局决定，建议斯大林把十二、十四和第一骑兵军（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交给西部战线，而把西南战线改称为南部战线。总司令（加米涅夫）于8月6日下令前线司令部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的这项决定，但斯大林不服从中央全会和总司令，而下令

第一骑兵军进攻利沃夫。斯大林把自己的战线看成与西线并重，而认为中央和总司令的决定可以不必执行。

总司令第二次直接命令将上述军队拨归西线管辖。当西南战线司令叶戈罗夫遵照这一命令给前线制订相应命令时，斯大林拒不签字(没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签字，前线司令的命令无效)。更有甚者，斯大林还打电报给总司令，批评他的行动（即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决定），他写道："您的最新指示毫无道理地打乱了这些部队所在地区的军力部署……有鉴于此，我拒绝签署相应的命令……斯大林"（《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第9期第62页）。

苏联历史学家在援引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写道："斯大林示威性地拒绝执行总司令命令，而这命令是根据8月2日政治局会议和8月5日中央全会的决定作出的……斯大林竟然在中央全会批准这一命令之后还拒绝服从之（政治局）。"（同上，第62页）

尽管列宁在维护自己的中央制度上态度严厉，而托洛茨基在贯彻执行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令上一丝不苟，但不仅没有追究斯大林的责任，而且竟没有指出其行动的错误。政治局只不过满足了他关于解除其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却保留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1920年9月1日）。一个中央委员拒绝执行中央的（政治局和全会）两次决定而出人意料的逍遥法外，这大概是头一次，何况，这拒绝执行的后果对于整个国家又是灾难性的。关于这种后果，托洛茨基写道：

"不能不指出，华沙城下惨败的规模异常之大的原因之一，是苏军南方集团司令部取道利沃夫的行动所致……斯大林一意孤行要进入利沃夫……当对土哈切夫斯基的军队的危险性已经暴露无遗，而总司令部又命令西南战线掉转方向以打击华沙城郊波军

的侧翼时，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鼓励下继续向西推进：自己占领利沃夫岂不比援助别人拿下华沙更重要……几天的延误起了致命的作用。我军退败四百多公里。”（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192—193页）

斯大林逍遥法外的原因是一系列的：第一，斯大林是列宁反对其唯一竞争者托洛茨基的始终一贯的志同道合者；第二，斯大林推行的反波兰计划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列宁的。托洛茨基谈到，在把基辅从皮尔苏茨基军队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之后，当苏维埃军队接近波兰边境已经疲惫不堪时，他要求“乘军队尚未彻底瘫痪之机，立即并尽快签订和约。支持我的只有李可夫，余者（中央委员。——作者）皆被列宁乘我不在时争取过去了。结果决定：进攻……列宁形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计划……开进华沙”（同上，第190—191页）。

同布列斯特时期相比，列宁和布哈林调换了角色。他成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列宁甚至拟定了波兰苏维埃政府的人选（捷尔任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只待7月29日占领利沃夫（按斯大林与叶戈罗夫计划）和8月16日攻占华沙（按斯米尔加和土哈切夫斯基计划）了，然而取代胜利的却是上面指出的惨重失败。托洛茨基再次建议与波兰签订和约，但这一次已经是在更坏的条件下了。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几乎是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

俄国得到了和平，但因列宁要红军占领波兰的错误计划，俄国丢失了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了这一错误，但不是作为个人错误，而是作为整个中央的错误：“我军的优势被我们估计过高了”，——他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24页）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3月8日至16日举行。参加大

会的有69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9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全党为732，521人）。党的历史学家指出："大会的根本问题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问题。"（同上，第8页）

这样解释十大主要意义的不只苏联的廉价出版物，西方文献资料亦如此。"新经济政策"或"耐普"的说法，无论在列宁的报告中，还是在大会的决议中都一概没有出现过。谈论和采纳的决定是关于一个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局部的问题，即经济政策问题：由余粮征集制，即征收农民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余额，过渡到粮食税，即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的只是预先确定的粮食额。剩余的粮食他们可以用来交换工业品。但在决定中特别强调："交换只限于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同上，第609页）

这是十大最初的私人纳税措施。这项措施在大会后扩大为"新经济政策"，即农村和城市整个经济政策的大转折。这之所以发生依然并非出于自愿和经济考虑，而是出于政治考虑不得已而为之的，目的是要使现存制度在新的工农革命的打击下免遭灭顶之灾，因为这场革命是反对共产主义（"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①——这是新革命的口号）。

列宁仅仅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在1922年11月13日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几年内战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第383页）②列宁实质上承认，"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广大农民群众反对我们"，一

---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7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译者注

些公开造反，另一些充当土匪流寇，还有一些象西伯利亚农民似的牢骚满腹，据十大代表帕霍莫夫说，他们唠叨说："把齿菌换成海绵——能挤出水来。"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430页）

列宁说，正象他现在才明白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第384页）②。

所以说，列宁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临时退却，看作"喘息"，看作策略手腕。他坦率到了极点，在1921年10月17日的会议上谈到："我们以为……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曾想直接用所谓正面攻击来解决这个任务，但是我们失败了……正面攻击失败了，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同上，第47页）③

关于这一切，列宁在十大上均未谈及，因为他不想改变经济政策，只限于实行定额税和"在地方流通范围内交换"。坦波夫的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乱、被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的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省的工人骚动、莫斯科的普遍不满和工人罢工、在俄国最边远省份对这些事件的危险反应都使列宁确信，在"粮食税"上做文章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他要大声宣布新经济政策，说："我们要认真而又长久地实行新经济政策。"

这一切还要加上党内生活的极度紧张。广大党员中间出现了

---

① 俄文"齿菌"（колчак）的书写与发音跟"高尔察克"相同，"海绵"指海中动物。（俄文"海绵"的发音和"省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的发音相近）。这里是双关语，意指高尔察克被打倒了，但"战时共产主义"是为了从农民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0页。——译者注

无数反对派，反对官方路线，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和不满。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中间有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这是不无原由的。据十大材料公布，海军中百分之三十的党员参加叛乱，百分之四十的党员宣布“中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53页）。

假如制度的命运要在全俄国范围内决定的话，恐怕全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也是这样。所以，十大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新经济政策，列宁当时也没想提出这个问题，十大的根本问题压根儿就没列入日程：宣布全面清洗使党处于特别戒严状态。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老传统、同党员“未成文的权利”即可以有自己主张的权利，也就是同党员有组成其纲领与党的正式路线相左的派别的权利，一刀两断了。而列宁本人却是以自己派别的名义，并在这个派别的旗帜下主持整个代表大会的。这就是自1920年11月起合法存在于中央的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派别，或曰“十人纲领”的“十人派”（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其中只有八人是中央委员），而中央内的另一派别——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也是八名中央委员）从来没有合法化过，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以派别出现。尽管如此，为了通过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列宁在代表大会期间频繁举行私下的派别会议，即十大“十人纲领”派会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39页）。大会主席团的选举，同尔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样，也是由“十人”派领导的（指定和推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同上，第714页）。

在大会主席团中，“十人”派中就有五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并且还有五人是他们的拥护者，而在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中只有他们二位加上拉柯夫斯

基。

考虑到“工人反对派”在工会中的巨大影响，也为了防止“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两个集团结盟，列宁派别把“工人反对派”的两名代表——施略普尼柯夫和佩列培契柯塞进了主席团，但却驳回了让“民集派”代表萨普龙诺夫参加主席团的建议，虽然在上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作为一派代表被选入主席团的。

在代表大会的议程上有以下问题：

一、中央报告（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索尔茨）。二、关于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宣传与鼓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民族问题（斯大林和萨发罗夫）。四、工会（季诺维也夫，补充报告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柯夫）。五、党的建设（布哈林）。六、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列宁)。七、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加米涅夫）。八、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季诺维也夫）。九、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

这样，如前所指，代表大会关于全党命运的根本问题——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问题根本没有列入大会议程。列宁的策略手法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代表大会议程在大会前一个月公布，列宁是想防止党内就比工会问题更有“爆炸性”的“爆炸性”题目发生辩论。经过人为挑选的代表大会的组成，保证了“十人”派别的多数。这在列宁选择大会有利时机宣布自己拟好的草案时，是通过理想决议的保证。与既定议程大相径庭，中央非但没有讨论列宁的这些草案，甚至连见也没见过，当然，“十人派”成员即中央少数派不在此列。

一向由列宁本人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从来没有名副其实过。列宁只不过阐述中央和政府的政策并作今后的指示。列宁并不在

事先写出自己的报告，而是利用“提纲”或者简单笔记信口开河。

我们已经引证了列宁政治报告中的一段，在这一段话中列宁承认，他要红军占领波兰的战略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一点讳莫如深，这就是他把占领波兰看作是建立桥头堡，通过这个桥头堡，红军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列宁主义口号：“俄国镰刀和德国铁锤在全世界必胜”。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承认了立即实现“世界革命”赌注的失败，宣称“国际革命的打算并不指望固定期限”，因而现在的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西方即将来临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及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苏维埃俄国在西方搞共产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

转到国内政策时，列宁称“工会辩论”是“不能容许的过分行为”，容许辩论是大错特错的。列宁说，在这场辩论期间，中央收到的“纲领”之多，使他根本来不及看。列宁把党内纲领丰富、议论繁多看作是党内的“半无政府主义倾向”。他称“工人反对派”——它的领袖们在主席团里跟列宁平起平坐——的纲领是“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的反映。尽管还没有一个代表就“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发言，列宁就已警告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座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4、26、27页）① 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列宁精心策划了这次代表大会（下述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1920年12月12日原定十大在1921年2月6日召开，但延期了一个月，即1921年3月6召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5—166页。——译者注

列宁从党内争论和辩论的自由中得出了结论，他说："我们要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容许关于倾向的争论，我们应当画一个句号……把这变成党的义务、变成法律。"（同上，第28页）

因为不仅农民同情喀琅施塔得叛乱，大部分工人阶级也同情这场叛乱，所以列宁说它是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在一起"还要危险得多的运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纲领是：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党派自由、选举自由、直至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看来，如果党不采取暴力措施对付叛乱分子，如果党不同时把这些措施同对农民的让步相结合、给农民以"地方流通中某些自由的可能"，那末这个纲领就可能成为全民起义的纲领。列宁警告代表大会说，喀琅施塔得"情绪对无产阶级也有很大影响，它影响到莫斯科的一些企业，也影响到外省的许多地方的企业"①……须知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夕，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发生了罢工。

在结束报告时，列宁自当政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承认，无产阶级从此不再是党的专政的支柱了。他的论据是："从莫斯科举行的一些非党的（工人）会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民主、自由变成了引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上，第37、39页）②可见，列宁早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在工会辩论中就明白了，把"无产阶级专政"托付给无产阶级本身，这是太严重的事情，只有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党要统一，要贯彻执行自己领导核心的官方统一路线。列宁在开幕词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辩论和争吵是有害的道理。他指出，布尔什维克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2—17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79页。——译者注

敌人这样想："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同上，第2页）① 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说，反对中央的任何反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客观帮凶。

列宁的理由既没有说服"工人反对派"，也没有说服"民主集中派"。这两个反对派的领袖都激烈抨击了中央的官方政策。诚然，列宁有一个目的达到了：他不仅防止了两个反对派在大会上结成联盟，而且唆使它们互相攻讦。"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指出，"党内在党员和领导机关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党从国内战争中承袭下来的工作方法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疏远党。"与广大无产者息息相通的""工人反对派"警告中央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针对列宁报告的实质，施略普尼柯夫说："那些在这里给我们扣的大帽子、那些向我们射来的明枪暗箭、流言蜚语都不能使我们难堪。我们了解自己也非常了解在同谁打交道……列宁同志所踏上的道路不会把我们引向众望所归的统一。"施略普尼柯夫责备列宁说，他轻率地指责无产阶级搞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据报告人（列宁。——作者）看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喀琅施塔得表现了革命的全部美色和骄傲。受到影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它在不久之前还受到季诺维也夫及其他同志的标榜，说彼得堡无产阶级与任何反对派都毫无瓜葛，尤其是同'工人反对派'。"

施略普尼柯夫说，党的"顽症"是党的核心脱离党员群众和整个党的机关——脱离工人群众。这一切的结果是工人的不满和"革命的美色和骄傲"——水兵、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因此，施略普尼柯夫说，"毫无根据地咒骂我们是工团主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8页。——译者注

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不公道的！把我们同一些或另一些骚乱抑或现在还在住宅区里使工人们满腹牢骚的不满联系在一起，这不但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不诚实和蛊惑人心的”（同上，第71—73页）。施略普尼柯夫补充道：“工人不满的原因不用我们到‘工人反对派’中去找，而是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同上，第73页）

谈到列宁的党内制度时，施略普尼柯夫说：“党的工作方法亦需根本改变。必须立即停止党的工作中的一长制、停止把赌注压在被委派者身上。中央一向是借助于指派和委任同地方进行斗争。”（同上，第75页）

在施略普尼柯夫之后紧接着发言的“民集派”领袖之一奥新斯基支持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指责。奥新斯基说，“工团主义在我们这里无疑是存在着。工团主义表现在地方不服从中央”，但又当即指责列宁跟“工团主义者”互送秋波。列宁在口头上宣扬“统一”，在行动上却破坏统一：“请看一个明显的例子：代表大会的开幕。曾是八大和九大反对派代表的萨普龙诺夫，昨天被踢出主席团……与此同时，列宁千方百计把‘工人反对派’的两名代表塞进主席团。中央好象是对‘工人反对派’说：‘你能经得住考验吗？如果能的话，我们就继续同你联合，如果不能，联合就要告吹，我们就要收拾你’。”

但奥新斯基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工人反对派”，他把它说成是“喜欢空喊”和“幸灾乐祸”的反对派（同上，第77—78页）列宁的最近目标——在两个反对派之间打进楔子——从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达到了。

米洛诺夫（萨马尔省党组织负责人）指出，党内迄今一直存在三个相互斗争的集团：“中央集团、‘民集派’集团和‘工人反对派’集团；在这三个集团中只有‘工人反对派’在社会上接

近工人，所以受到工人阶级的信任。”他在批判列宁的分析时说：“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心理，他同我们不是一路……工人阶级受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影响——那末共产党如今靠什么呢？……总不能光靠苏维埃和党的官吏吧？”

无产阶级对党的总信任危机的原因何在？米洛诺夫回答：“我们的党不再是工人的党”（同上，第84—85页）。米洛诺夫对为什么列宁给“工人反对派”贴上工团主义的标签一事，找到了心理解释。他说：“在这里，列宁同志如此武断地、‘行政命令式地’、毫无任何证据地给‘工人反对派’贴上了工团主义的标签。在心理学上，这不难理解。列宁同志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领导着我们的苏维埃政治。显然，任何运动，不管它源出何方，要是它妨碍这一管理工作的话，就要被视为小资产阶级运动、极端有害的运动。”（同上，第83页）

梁赞诺夫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向都是独具一格和尖锐刻薄的。他把列宁对统一的号召同普加乔夫对他那些永远争吵不休的助手们的号召相比。他说：“报告人（列宁）的讲话和萨马尔省的同志（米洛诺夫）的讲话都令我想到我们十八世纪的一位先驱者——普加乔夫同志。在出现‘派别’分歧时……普加乔夫向自己的战友发表感情深沉的讲话：‘将军先生们，你们不要再吵架了。假如所有奥伦堡的母狗都在一个吊架下发情，这并不坏，糟糕的是，我们的公狗们在互相咬架。啵，请你们和解吧！’”梁赞诺夫认为，“中央往往毫无意义地同反对派苦斗”，从而自己“培植”和养大了“工人反对派”（同上，第85—86页）。但梁赞诺夫忘了补充，“培植”只是暂时的，只是为了用以对抗“民集派”“知识分子”反对派而已。完全廓清列宁策略的是“工人反对派”代表佩列培契柯的发言。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份

文件，这是中央机关正式提交给施略普尼柯夫的。这份文件是奥新斯基在图拉省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在这次讲话中“奥新斯基似乎说：‘当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魔力吸引着饥饿、疲惫的工人阶级时，有人谈论工人群众的业余活动。知识分子是吸引一切人的先锋队，在这个时候谈论群众的业余活动，这真可谓是送葬时候吹笛子’。（奥新斯基：‘完全没有的事。这是速记记录之误。’）同志们，如果这是伪造的，那就该把提交这份速记记录的人交付法庭。”（同上，第91页）佩列培契柯指责“民集派”说，他们除想要推举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进入“党的先锋队”之外，别无其他纲领。“工人反对派”却有纲领，这纲领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不应归结为可以随意对待的普通客体的作用”（同上，第92页）。

“民集派”拉法伊尔提醒列宁，“辩论的奢侈品”不在于它被允许，而在于它的形式，这形式是在列宁的庇护下，由“十人派”成员——“头等疯狂的民主派”季诺维也夫和“军事战略家兼头号民主派”斯大林提出的。拉法伊尔指责中央在工会辩论的幌子下搞了一场“全国性无谓争吵”（同上，第99页）。

“工人反对派”小册子的作者柯伦泰，援引中央拥护者斯米尔加的话说，“以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在我们这里已经销声匿迹，代之出现的是一些在上、另一些在下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她指控中央继续对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奉行镇压政策。

1920年9月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中说：“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509页）①

柯伦泰提醒这一决议后问道：“为什么代表会议要求停止把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页。——译者注

我们那些在中央看来是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决定得不到实际贯彻执行呢？我们知道，幕后在对同志们进行评价，评议他们谁留谁去……”（同上，第101页）

尽管只有十二个人就三个最重要的报告发了言，但因这种辩论对中央毫无好处，大会主席团便迫不及待地要辩论草草收场了。

列宁的闭幕词是极其野蛮的，野蛮到不仅用开除出党、而且用步枪威胁“工人反对派”的程度。解释只能有一个：对于列宁制度可怕的不是党外的喀琅施塔得，而是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工人阶级即列宁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公开给自己的反对派鼓掌。如果不在此时此刻、不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把反对派搞垮，中央大权旁落给“工人反对派”的危险就会变成现实。列宁在开始作闭幕词时，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许因此，“代表大会这样快就结束了这些讨论，是不是因为讨论得过于空洞，因为发言的几乎全是一些‘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呢”。①

接下去列宁的讲话表明，反对派的发言在列宁眼里并不那么“空洞”。列宁把“工人反对派”同喀琅施塔得联系起来了。他说：

“我肯定地说，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思想和口号同‘工人反对派’的口号是有联系的。”②

联系在何处？“工人反对派”要求，“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③，而列宁则说，“无产阶级专政不经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同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82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82页。——译者注

上，第112—118页）。列宁认为，“现在‘用步枪来争论’要比用反对派拿来的提纲来争论好得多……无论在哪里，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完结了……如果他们要继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党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去。”（同上，第118、123页）①

施略普尼柯夫曾要求把自已的付手瞿鲁巴交付法庭，因为他的人民委员部正当工人挨饿的时候把土豆放腐烂了。谈到施略普尼柯夫对瞿鲁巴的批评，列宁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列宁说：“为什么不凭这些发言把施略普尼柯夫交付法庭……难道我们是在喀琅施塔得式的会议上？而对这种无政府主义精神的喀琅施塔得陈腐滥调要用步枪来回答。”（同上，第123页）②

这番讲话使所有的人都确信，从此党走到了一条界线，超过这条界线，列宁就打算同党内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用“枪杆子”谈话。

在列宁的闭幕词后，就中央报告提出三项决议案：一项是雅罗斯拉夫斯基以中央拥护者的名义提出的。其中说，代表大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整个说来是正确的”，指出党中央内部不够团结，建议为了党的核心的“十分坚定”，必须把在“党的群众工作中被提拔出来的组织者”吸收到中央委员会中去③。总的来说，这项决议案没有象列宁报告那样语气强硬，目的是要反对派集团有可能投赞成票。但反对派就中央报告提出了自已的决议案。布勃诺夫代表“民集派”集团提出的决议案说，“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特别是其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化”，

---

①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9—195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9页。——译者注

加重了中央的错误，实行了“过分集中化”的方针，中央本身“分裂成集团并成了派别斗争的场所”，决议案要求“在党的建设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原则”。梅德维捷夫代表“工人反对派”集团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指出，中央没有贯彻八大关于把异己分子清洗出党的决定，“中央没有贯彻工人民主原则、领导机关对党内下级机关的负责制和汇报制原则以及广开言路的原则……中央没有实行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工人化”，“中央政策存在一系列不相信工人阶级创造力的偏向”。“工人反对派”认为，只有清除这些缺点，并且通过苏维埃和工会建立党同“广大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才能恢复中央与党之间的信任、恢复“党的真正统一”。

就这些决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雅罗斯拉夫斯基提案得514票，“民集派”提案——47票，“工人反对派”提案——45票(同上，第134—137页)。

当开始对雅罗斯拉夫斯基提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时，出现了一个迥非寻常的细节：代表哈塔耶维奇提议对这个决议案作一点新补充，即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派，这正是列宁所要求的。主持大会的加米涅夫驳回了这项补充意见，理由是，当按议程讨论这些提案时，还要谈到，也就是还要谈“工会”和“党的建设”。这表明，关于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大会代表们尚不得而知，但加米涅夫没有引证它们，这恐怕是有意回避，因为就中央的选举还没进行（同上，第137—138页)。不过关于这些决议草案已经早有传闻，斯米尔加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所作的发言就表明了这一点（同上，第311页）。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分歧意见，这可能是因为在三名讲演者发言之后讨论就停止了（尽管有29人报

名登记）。三名发言者中有两名（札顿斯基和米高扬）批评斯大林报告抽象空洞，而以前这样的批评是见诸于《真理报》的（齐切林的文章《反对斯大林提纲》三续《真理报》，即1921年3月6日、8日、9日）。乌克兰领导人之一札顿斯基说："我在读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时，凭良心说，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问题要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至少，为什么要以那种方式提出……这些提纲仿佛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写出来的……"米高扬提出的问题是，"在边远地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苏维埃制度。遗憾的是，斯大林同志在这方面没有指出任何东西"，再者，"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没有说，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边远地区的各个阶级"（《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01、206—207页）。斯大林在闭幕词中驳斥了所有三个论敌的批评。

苏维埃外交部长齐切林得到了斯大林的如下评语："我仔细阅读了齐切林的文章，我以为，在他的文章中，除了华丽辞藻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上层的联合因素，过低估计了这个托拉斯内部的矛盾。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其实就建立在这上面……写文章当然容易，但要给这些文章冠以'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的标题，就要拿出点严肃的东西来。"（同上，第187页）斯大林也以同样精神回敬了札顿斯基和米高扬。就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说，要消除俄罗斯和非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实际上的不平等"。为此，要"帮助非大俄罗斯人民赶上走在前面的中部俄罗斯，帮助他们：（一）发展和巩固适应这些人民民族风俗情况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由当地人组成的现行法庭、行政当局、经济机关、政权机关……（三）发展新闻、学校、戏剧……"

在贯彻民族政策当中，在共产党员内发生两种偏向——一个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向（这被认为是主要危险），另一个是

当地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偏向（同上，第603、607页）。

当斯大林向民族委员会报告工作时，提出修改意见的只有米高扬一人（当时尼日戈罗德省党委书记）。他指责斯大林，说他的决议案片面地说，在边远地区只应有“劳动人民苏维埃”，而在某些地方还应建立俄罗斯式苏维埃，接下去他说：“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决议案中只字未提改善无产阶级状况”。斯大林答称，他全都谈到了，此刻需要说的是，“米高扬同志无的放矢”（同上，第490页）。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代表大会拒绝了米高扬的修改意见，在两人弃权、其余的人一致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斯大林的决议案。

布哈林代表中央作了论党的建设的报告。他的提纲得到了由布哈林、斯大林、谢烈布利雅柯夫组成的中央小组的赞同。这个提纲连同他的报告差不多包括了辩论过的全部党内生活问题。布哈林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形式是随着条件和时间而变化的。在战争时期党是军事化的，这表现在“极端组织集中和党组织集体机关的紧缩”。现在，在国内战争之后，条件改变了，所以党转向实行“工人民主”。对这一术语应作何理解呢？布哈林的提纲这样解释道：

“党内工人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要保证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积极参加讨论一切问题、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工人民主形式排除一切委派制，而表现在从下至上一切机关的广泛选举制，表现在这些机关的工作汇报制和受监督制。”宣布“党内批评的充分民主”。确定“党员物质地位的平均主义方针”。中央应该按月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中央委员的人数增至二十五人。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应当每两个月不少于一次。为了当前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保留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

局（同上，第645—650页）。

布哈林提纲有同反对派就许诺“工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进行竞争的明显印记。在列宁以“枪杆子”相威胁之后，布哈林的报告是调停呼吁。报告的最后定稿（和调子！）是否是同列宁商定的，尚难说，不过列宁确实喜欢耍鞭子加蜜糖的手腕。况且，布哈林是在党内危机最尖锐的关头可以作为调停者推上前台的最合适的中央委员。须知是列宁这样说布哈林的：“我们了解布哈林的全部柔和性，这是人们这样喜欢他而且不能不喜欢他的素质之一。我们知道，人们不止一次开玩笑称他是柔软的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93页）

不管布哈林报告多么有和解精神，两个反对派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报告人（要想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补充报告人，必须要有四十名代表的联名签字。虽然反对派未及搜集签名，代表大会还是决定允许他们做补充报告。这是代表大会明显的和解姿态）。“工人反对派”的补充报告人是伊格纳托夫。他的讲话比较偏激。他要求党清除官吏和野心家，清除“非无产阶级分子和非农民分子”。他建议，为了使“当政的党不蜕化变质”，要“全体党员经常到企业和工厂去呆一段时间”。他补充说：“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在军队里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明显和突出。”（有人喊：“这是蛊惑煽动。”嘈杂。）伊格纳托夫反驳：“这里没有任何蛊惑煽动，这是可以用事实证明的，要多少事实有多少事实。每一个在军队里呆过的人都知道，在平等方面，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后方这里，都不遵守共产主义。”（伊格纳托夫是1912年入党的党员、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变的领导人之一）伊格纳托夫认为，摆脱目前“党内危机”的出路是只有实行“工人民主”，是要在实际上实行，而不是象迄今为止那样在口头上实行。

“民主集中派”的补充报告人马克西莫夫斯基（1903年入

党、莫斯科州党委会委员、党中央分配部部长）认为，党中央的危机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的危机。党和政府领导人把战争中的好方法机械地搬用到社会上和党内来。他说："无需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任何问题，只需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词，然后通过决议、唱《国际歌》并投入战斗，这在前线固然很好……而在我们这里，这些军事形式被以最激烈的表达方式搬用于民事工作方面……这就是过去和现在在对待民主形式上的问题之所在。"马克西莫夫斯基认为党和国家独揽大权的全部弊害在于，整个权力机关都"建筑在官僚集中化原则之上"。看到中央的腐败，失望的共产党员们就要"呼喊：应当把一切都抛弃，党是腐尸……他们认为共产党没有用处，需要把它解散"。马克西莫夫斯基证明，现存"官僚制度需要的不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而是顺从的执行者，需要的是对上面唯命是听的官吏"。报告人指出，只要官僚主义制度盛行，布哈林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宗旨，他的宗旨表述如下："代表大会完全确认党员物质地位平等的方针"。报告人质问："为什么存在特权？因为存在官僚主义制度！"他建议把组织局和政治局改为"普通执行委员会"。

马克西莫夫斯基在结束补充报告时建议"建立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与党内自由讨论各种问题、保证我们党内个别同志和个别集团发表意见的自由相联系"（《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43—253页）。

梅德维捷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向布哈林指出，"布哈林同志所提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我们的提纲里抄袭的。但当有人开始用重炮轰击我们搞工团主义时，他却躲到树丛中藏了起来"。对此，布哈林回答说，承认反对派在它真正对的地方是对的，他并不认为是可耻的事，所以从它的纲领中抄了许多（同上，第329页）。

但是，有一项建议无论布哈林还是中央都不愿采纳，而“工人反对派”认为它很重要。“工人反对派”证明，如果共产党确实是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希望了解工人阶级的需要和愿望，那末从领袖到普通官员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每年有不少于三个月的时间在企业、工厂、矿山和铁路尽劳动义务。若是确定了这种制度，那时全党就站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上了（同上，第271—272页）。一名军队代表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每年不少于三个月下营房当普通士兵。布哈林说这些建议是“可笑的”。他说同样可笑的还有反对派的另一项实际建议：只选择那些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同上，第325页）。布哈林解释说，假如苏维埃外交部长（人民委员）齐切林在工厂呆三个月、在营房呆三个月，他就不得不在疗养院再呆三个月，而只有三个月从事外交。

表决时布哈林提纲得369票，“工人反对派”得23票，“民集派”提纲得9票。由于在两个反对派的代表参加的起草小组里起草布哈林提纲时，考虑到了这两个反对派的一些修改意见（例如，实行全体党员义务星期六、派长期从事国务和党务工作的官员到车间和田间去劳动等），所以反对派没有投反对票。

工会辩论在十大上已经不象在会前那样激烈了。恐怕喀琅施塔得叛乱产生了影响，它同样吓坏了所有派别：“十人集团”、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工人反对派”和“民集派”。列宁打算以枪杆子进一步辩论的威胁也起了泼冷水的作用。托洛茨基写道，“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省的叛乱对辩论是最后冲击……关于工会的争论立刻失去了全部意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没有参与这场争论，而是让季诺维也夫拿空弹壳来开心……”（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01页）

说列宁没有参与辩论的提法不确，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但“十人”纲领的基础报告确实是季诺维也夫做的。季诺维也夫重

复了“十人”集团早已尽人皆知的旧论点。季诺维也夫指出，与托洛茨基的特殊工会危机的说法相反，国家经历着革命总危机，这场危机是破坏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的结果。因此，“代表大会一致倾向于对农民作一系列让步”。季诺维也夫驳回了“工人反对派”关于把经济权力转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要求。在季诺维也夫（即列宁）看来，这意味着把全部权力交给非党工人和农民之手，而他们相当大部分在代表大会上是由孟什维克和黑帮分子组成的。

补充报告人托洛茨基提醒季诺维也夫（即列宁）说，这场革命总危机他早在一年前就预见到了，那时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与你们马上要讨论和通过的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建议几乎字字相符。我被指控为搞自由贸易主义、追求贸易自由，结果我在中央只得四票……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其他中央委员指控我主张自由贸易主义……我曾证明，必须建立刺激，建立改善农民经济的志向，这通过经济性质的让步是可能做到的”。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的基本指控又给他打了回去：“关于工人国家对待农民态度的根本问题的矛头并不是针对我，而首先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参加的那个集团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349—350页）

布哈林在讨论发言时，指出了“十人集团”两位领袖之间在最主要问题上的矛盾：列宁说，“十人集团”和托洛茨基集团在民主问题上没有任何区别，而季诺维也夫声称，分歧的实质在民主问题上。布哈林问：“究竟谁对呢？须知他们两人签署了同一个纲领。”（“十人纲领”）季诺维也夫在结束语中也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矛盾回敬了他。

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并不是他在当时臭名昭著的运输工会中央的行政命令作法（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一样，

由托洛茨基兼管），而是他的行政命令形式和对镇压的张扬。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他太露骨地，甚至粗暴地提出了“整刷”工会的问题（党中央应清洗工会）。列宁说：“当人们开始保护错误时，这就要变成政治危险的根源。”

列宁从最初对待“工人反对派”的不调和态度上突然后退了。他说，假如我们从“工人反对派”的情绪中找不出最大限度的“工人民主”，“我们就会走上政治毁灭……现在，既然‘工人反对派’保护民主，既然它提出了健康的要求，我们就要作最大努力同它接近”（同上，第379—380页）。

在列宁对待“工人反对派”的策略中的这种急转弯——五天前他还想用步枪与之谈话呢——是代表大会工会代表中对他的激烈攻击所作的不良反应引起的。此外，列宁考虑到，喀琅施塔得的继续叛乱可能随时蔓延到工人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反对派”的帮助对列宁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代表大会上已有例子，如莫斯科党委会为了说服莫斯科的罢工工人，有意利用“工人反对派”发言者效劳）。与此同时，“工人反对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分立集团的继续存在又危及党的独裁本身。无产阶级真正先锋队的作用开始从党转向“工人反对派”。所以，列宁在继续实行瓦解反对派的政策时，准备接受它的“健康要求”，甚至把它的领袖拉入未来的中央委员会，但已不是作为反对派，而是作为其政策的拥护者拉入中央委员会。

表决时“十人纲领”获得336票，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获得50票。在代表大会为协商关于工会的决议而建立的委员会上，“十人集团”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派找到了共同语言。通过了总决议。“工人反对派”投票反对。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是在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决定之前进行的。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是在党内实行戒严状态，

——它应当反映在列宁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与“党的统一”决议中。在3月13日的大会会议上，布哈林建议在“党的建设”决议中加进党的统一和禁止派别集团一项时，执行主席加米涅夫第一次向大会宣布，列宁准备就这两个问题向代表大会提出专门决议案。鉴于这一点，布哈林的建议自然撤消了。

为讨论这些决议和提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候选人，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中建议紧急召集“十人”纲领拥护者的单独会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506页）。3月13日中央委员和“十人”集团成员阿尔乔姆在大会晚间会议上公开宣布，全体“十人”纲领拥护者要留下来开单独会议。这个会议当然没有记录，因为从党章观点来看，它是不合法的。但根据列宁的某些短函，还根据马列主义研究院给《列宁全集》所作的注释，可以复制出会议的一般画面。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讲话提要”中，列宁列出了他要谈的几点。

在这几点中例如有这样一些：

“4.代表大会原则上谴责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

“5.代表大会反对保留派别的决议；

“6.有开除出党的危险；

“8.深入、研究、调查、探听；

“9.为贯彻这一路线当即挑选一系列讲演者（在代表大会上）；

“10.选出……‘十人纲领’班子；

“11.下次会议在彼得堡人（和季诺维也夫）到达当天举行。”（《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78页）

还讨论了未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十人纲领”集团提出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委员与候

补委员名单见于十大记录附注。那里注明中央委员23人并留两个位置给“工人反对派”。

在老中央委员中有五位托洛茨基分子被除名(安德烈耶夫、斯米尔诺夫、克列斯廷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三人为中央书记），但“十人纲领”最热心的拥护者被头一次增补为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哈伊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童图尔、伏龙芝、柯马罗夫、彼得罗夫斯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714页）。

官方评论员毫不掩饰地写道，列宁制定新中央委员会名单有这样一个意图，即要使“十人纲领”派在其中占三分之二的票数（《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460页，注解第125条）。

列宁需要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票数，因为按照他的“关于党内统一”决议草案，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开除出党都正好需要这么多票数。

“十人集团”私下会议确定的所有中央和中央监委候选人都当选了，外加“工人反对派”的两名代表——施略普尼柯夫和库图佐夫为中央委员、另一名代表基谢廖夫为候补中央委员。“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奥新斯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扩大了。选出了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七人组成。选举一如往常，是无记名投票。但并非694名大会代表都参加了选举，因为140名代表被派赴喀琅施塔得领导镇压叛乱，而萨马尔省和萨拉托夫省的代表团由于这两个省里出现了政治麻烦而提前离开了代表大会。所以，只有479名代表参加了选举。

老中央委员中的票数分配情况是颇有意思的。如果关于投列宁赞成票的官方资料不是伪造的话，那末他是唯一得了479张全票的人。然后依次是：拉狄克——475票、托姆斯基——472票、

加里宁——470票、鲁祖塔克——467票、斯大林——458票、李可夫——458票、托洛茨基——452票、布哈林——447票、捷尔任斯基——438票、拉柯夫斯基——430票、季诺维也夫——423票、加米涅夫——406票、阿尔乔姆——282票（新增补的委员是：柯马罗夫、库图佐夫、施略普尼柯夫、彼得罗夫斯基、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童图尔、伏龙芝、伏罗希洛夫）。

由于列宁提出异议，其他老中央委员虽然都被提名，但都落选了。列宁提出异议的理由是什么，从党的文献资料中不得而知。既然落选的都是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而当选的新中央委员又都是"十人集团"的拥护者，那末提出异议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列宁是想在中央保证自己的紧凑的多数。对于"十人集团"在建立新中央上显而易见、千真万确的派别阴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作了如此轻易的投降，这一点是奇怪而又无法解释的。

既然在"十人集团"中定调的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当然是在列宁的庇护下），那末新中央委员首先就是在反托洛茨基的基础上联合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周围的傀儡。那个在列宁生前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策划既反列宁、又反托洛茨基阴谋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核心，在组织上的形成正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不过，在这个核心中占上风的是斯大林派。这只要提一下那些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后来成为斯大林最重要的马前卒的人就够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候补中央委员基洛夫、古比雪夫。季诺维也夫利用忠实的列宁主义者（1917年10月间的罪过除外）和共产国际主席的声誉实际干着斯大林的事业，当然，他本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季诺维也夫乃是一个没有观念的人、感情用事的人、易走极端的人。照斯维尔德

洛夫的说法，“季诺维也夫——这是惊慌失措的人”。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季诺维也夫——这是个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不着边际的人”。照季诺维也夫本人的说法，他的生活主旨就是“渴望权力”（1936年他在出庭受审时的结束语）。斯大林在通往个人权力的途中极出色地利用了他的所有这些品质。不过此乃后话。

最主要的、确实是决定命运的党内问题，也就是苏维埃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党内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以创记录的速度在闭幕前一或两小时内决定了。在代表大会618页的记录中这个“关于党的统一”问题仅占27页。顺便插一句，“十人集团”借口时间不足，急如星火地催促大会，以至实际上没有进行讨论。为什么没有时间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未作解释。“十人集团”甚至想在3月15日就结束代表大会，但因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拉柯夫斯基，所以草草收场的企图没有得逞。但3月15日晚轮到当执行主席的是加米涅夫，他（属于“十人集团”）宣称：“你们拒绝了今天结束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我想，明天一定要结束我们的工作。”（《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91页）

但第二天，3月16日，在代表大会的最后时刻，有人向他提交了两项决议草案：一、《关于党的统一》，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项决议案是列宁提出的。为阐述这两项决议列宁仅仅作了一些说明。他认为，他的决议案是毫无争议的，是无须作报告的。这两项决议的基本点如下：

（一）《关于党的统一》：1、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且不容许按“纲领”组成派别，但要为“扩大民主”、为“清党”而斗争；2、“立即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不执行者开除出党）；3、“为了执行严格的纪律，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时，可

以采取一切办法，直到开除出党”（但要开除中央委员出党，需有占全体中央和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三分之二票数）。

（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指“工人反对派”的）：1、代表大会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有许多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无产阶级本身即工会；2、代表大会认为，与“工人反对派”的意见相反，“生产者”（工人）本身不能管理国民经济，这样的要求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因为这意味着把国家经济交给非党自发势力，管理应当只是党；3、认为宣传“工人反对派”的思想是同在共产党内不相容的（同上，第571—576页）①。

代表大会的导演们限制就这些决议进行讨论。让“民主集中派”的一名代表和“工人反对派”的三名代表发了言。（列宁的）“十人集团”拥护者中没有任何人在讨论中发言，因为通过列宁的决议案是在“十人集团”单独会议上预先决定了的，也是预先得到代表大会多数保证的。各反对派的代表反对列宁决议案的最重要论据是这样一些：

卡明斯基（“民主集中派”）说，纪律当然应该遵守，但在我们这里违反纪律的不是反对派，而是中央委员会。至于列宁的《关于党的统一》决议案，卡明斯基认为：“有两种统一：形式上的统一和实质上的统一，而列宁提出的正是形式上的统一。”卡明斯基提醒说，两次代表大会即第七次和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都以国家的名义宣布，“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基础的基础。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在这个地方注明“笑声”。可能，这是党第一次通过笑声道出了一个真理：苏维埃不是政权，而是招牌。

卡明斯基迫使列宁让步的最致命的论据是：“这里指出，派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80—485页。——译者注

别活动的征兆既表现在所谓'工人反对派'身上，又表现在'民主集中派'身上。不过，同志们，既然你们想说，就要说到底。'十人'纲领派的叫喊声大得多，他们的文件、讲话也多得多。要么这里需要列举部分集团，要么请列举所有集团——二者必居其一。”（同上，第524—525页）

为了否认“十人集团”的派别活动，列宁从自己的草案中删去了提到“民集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字句（比较列宁初稿的第二条和《关于党的统一》的最后决议——同上，第571、632页）。

卡明斯基还反对决议的第四条，这一条说，任何一个提出批评的人都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的危险情况，但允许把发言刊登在“争论快报”和专门文集上，如果它们对党不危险的话。卡明斯基问道：“如果我们不晓得什么思想将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思想，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的辩论呢……因为不应该忘记，被驱逐出党的问题总是可能冒出来的。”

卡明斯基建议把决议的第七条也删掉，这一条给中央委员会的权利是，在有三分之二票数的情况下竟然可以把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开除出党。卡明斯基陈述的理由是，“十人集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已经握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镇压任何在中央内不中意的党内思潮（同上，第525—526页）。

“工人反对派”领袖梅德维捷夫就《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发了言。他说，列宁暗示，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会通过他的两项决议，这并无疑问，因为党的阶级组成，跟代表大会一样，是“小资产阶级阶层”占主导，这“完全可以说明，不可能有相反结果”。列宁的“统一”决议不是解决现存的“严重内部危机”，而是加深这种危机。列宁搞的是形式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对持不同意见者“宣布惩罚措施”而得到保证的。列宁甚至不能自圆其说。

在中央关于"党的建设"提纲中"承认每个党员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与中央意见不一致"，而列宁现在把它取消了。列宁说，"批评应当通过相应领导机关"，换言之，批评党的机关要有它的批准才行！"这样的批评与事无补。列宁同志的决议在惩罚意图方面正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

为了使党免遭不幸——如因滥用列宁的决议而出现"更深刻的危机"，——他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了"党的领导机关倾向于不相信工人阶级创造力的政策，这种政策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并建议把"野心家和官吏集团"从党内清洗出去，在党的活动的"一切方面自下而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同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作实际斗争；责成所有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坚决反对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采取任何直接或隐蔽的镇压措施的一切企图"。与此同时，决议案提议禁止中央内部的一切派别，这里明显暗示列宁自己的"十人"派别集团（同上，第526—530页）。

"工人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分析了列宁关于"工团主义"的第二个决议。他对列宁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立场是大无畏的、语气是代表大会上空前激烈的。施略普尼柯夫一开头就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你们上了一堂课，如何如何是不能达到统一的。我在生平中、在党内二十年间，未见过，也未听到过任何比这个决议更有**煽动性**和更有**诽谤性**的东西。"

施略普尼柯夫提到列宁关于"工团主义"决议的第二条，在这一条中"工人反对派"被描绘成"孟什维克和所有白匪的乌合之众"。施略普尼柯夫呼吁代表大会，为了证实这种评价的荒谬，要注意看一下"我们提纲下的签名和参加私下会议同志的名单"（参加私下会议的只有革命前入党的十大代表。——作者）。他指出，参加这个会议的41名"工人反对派"的相同见解的人中，

16人是在1905年前入党的，而其余25人是战前入党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是孟什维克，没有一人脱过党”（前者和后者恰恰在“十人集团”支持者中有很多）。列宁并不那么一丝不苟，当他的明显荒唐和明显诽谤被揭穿时，他就立即抛掉了这个被施略普尼柯夫批得体无完肤的段落（比较一下“初稿”和决议，同上，第574、635页）。

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就列宁的《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发表声明如下：“1、所提决议案显然是蛊惑性的和不成体统的，它制造分裂并唆使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吏反对工人；2、‘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截然相反的，因为它没有把经济同政治对立起来，不否认政治斗争，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不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不否定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的意义；3、‘工人反对派’建议通过组成工会的生产者代表大会实行苏维埃管理制度，工会选举中央机关与囊括一切的官僚主义抗衡”（同上，第530—532页）。施略普尼柯夫补充说：“不言而喻，既然你们在这里给我扣上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帽子，我就无法作一名有威信的中央委员，故此我向你们声明辞职。”（同上，第532页）

伊格纳托夫（“工人反对派”）向决议起草者列宁指出，他以自己的决议“关闭了党内讨论任何问题的可能性”，“党内的一切活思想”都不再暴露了，决议不是导致统一，而是导致“党内一部分人同另一部分人作对”（同上，第535页）。

卡尔·拉狄克的讲话与众不同，他是不属于中央任何派别的。他是一个明显喜欢冒险的人、博学多识的尼采主义者和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五种民族身份（根据不同的情况，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的世界主义者，拉狄克是政治投机主义的罕见的

天才。他虽然只是从1917年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就在中央选举中所得的票数来说，他仅次于列宁而占第二位，不仅远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前，而且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前。

他的讲话是语意双关的。如果说对矛头指向确定集团的“工团主义”决议拉狄克是无条件地赞成的话，那末对关于“统一”的决议他是有保留地赞成的，应当承认，这些保留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当我在单独会议上听到同志们说，要给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以新的权利——在一定关头决定开除出中央等问题，——我有一个感觉，好象这里是在建立一种规矩，这种规矩还不知道可能针对谁……在投这项决议的赞成票时，我感到，它可能会转而针对我们，尽管如此，我还是赞成这项决议。”（同上，第533—534页）斯大林将来会证明，拉狄克实在太对了。

主席团在四个人发言后中止了讨论。列宁在结束语中表现得更加和解。他说，“工人反对派”并非一切都不好，它关于清洗、关于官僚主义的某些建议是有益的，所以他把它们包括进了自己的决议。在中央中包括“工人反对派”和“民集派”的代表一事表明，党对他们表示信任，而中央本身强调自己要“公正”。至于有关开除中央委员出党的“第七条”，列宁说，第一，这一条不公布，第二，他确信，这一条永远不会运用（两者都没有兑现：“第七条”在1921年8月就用到施略普尼柯夫身上了，只是差一票不够把他开除出中央；而“第七条”也公布了，是1924年1月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由政治局中密而不宣的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暗中）对抗列宁和（公开）对抗托洛茨基而公布的）。列宁建议批准他的决议，拒绝反对派的决议，也拒绝施略普尼柯夫的辞职。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建议。

列宁建议就他的两项决议举行唱名表决。这些决议被多数票

通过了。

这些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历史新时代的到来。从这时起，各级党机关彻底摆脱了党的监督，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势力，而党则沦为自己机关意志的驯服、守纪律、不发议论的执行者。

尽管按党章由党组织选举党的官员的制度形式上保留着，但党机关的各级委派制却成了干部政策的实际法规：在最上层，中央全会的组成人员由中央机关的执行机关指定（早先是由政治局，尔后，在斯大林时期，是由中央书记处），中央机关还指定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会的领导人，而后者又指定市、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市委和区委再指定基层党组织的书记。这些指派命令在党内语言中叫作上级机关向下级组织"推荐"人选，但拒绝这种"推荐"就会被视为"反党行径"并随即对整个组织进行清洗。

在接受列宁《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后，党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清洗就变成了党机关镇压潜在"人民的敌人"的合法武器。

这种"党内生活"的全部准则正是列宁奠定的。区别仅仅是，列宁时，清洗是定期进行的，斯大林时，清洗是"不间断"进行的。党内"戒严状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状态已持续五十年于兹矣。它造成了"党内的新党"——党内权势者集团。

新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全会选举了自己的执行机关：政治局——（以下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以下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和布哈林；组织局——（以下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柯马罗夫和托姆斯基、（以下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和鲁祖塔克；书记处——莫洛托夫（责任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

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扩大（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如今成了不大的党内“议会”，并且是不太准时开会的“议会”。所以，它的作用在大政方针方面实际转向了政治局，在干部政策方面转向了组织局。斯大林是从一开始就重视组织局分配干部的卓越意义的唯一政治局委员（“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语），因此，自组织局成立那一天起，斯大林就是政治局方面参加组织局的唯一成员。

第二十一章
列宁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正如在前一章所指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宣布不是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与西方历史学家所接受的官方说法相反），而是在1921年5月26—28日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只是在十大后三个月，在这一次代表会议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以及不知名的缩写词“耐普”。在列宁为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中说：“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实行的长期的政策。”（《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70年俄文版第2册第268页。黑体字是我标的。——作者）[①]决议接下去谈到“支持小企业和中等企业（私营的与合作的）”问题，这在十大上没谈过，甚至也没暗示过。更有甚者，代表大会确定并由中央批准（根据党章规定，代表会议的决定需经中央批准），“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同上，第269页）[②]。

列宁在宣布代表会议闭幕时，认为需要强调，俄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命运将最终决定于经济舞台。如果共产党俄国能够实际证明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话，“那我们就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取得最终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21页。——译者注

43卷第341页）①。

即使在列宁的这次讲话过了五十年之后，西方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经济制度的效率，要比苏联高二、三倍，西方的生活水平也高很多，不过这已不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而是因为斯大林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时期作为在共产党专制下经济活动空前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而载入苏维埃经济史册。

第十次代表会议议程的第二大问题是讨论和通过"党中央工作计划"。在党的机关的团结和对党和国家的彻底胜利方面，这个计划早在斯大林当总书记之前就起了重大作用。他身兼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对制定这一计划有最直接的关系。"中央工作计划"的基本思想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合理分配党的力量方面"……提拔新干部并把他们"从责任较轻的工作岗位调到责任较重的工作岗位上"。

"为此，必须改进党的全部组织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 第2册第270页）②。在加强机关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和领导效率的意义上，整个党的机关等级体系从下至上都变样了。省委书记每三个月要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一次。整个中部俄国分为10—18个区（每区包括3——4个省），而"为了对直属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地区进行监督和指导，应当派出……责任指导员。这些责任指导员应当亲自巡视自己所负责的地区……省的工作也应当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同上，第271页）③相应加强了党的机关分配部（干部部）的职能和意义，分配部下设新闻科、统计科和干部登记科。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42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2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23页。——译者注

中央和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全部组织工作的最高机构是组织局。

然而，对于党和国家未来命运最重大的决定不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而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小圈子内作出的，这就是关于清党的范围与性质的决定。我们已经谈到，清洗的决定原则上是在十大上通过的，不过当时（据“工人反对派”的倡议）说的是把野心家和官僚主义者清除出党。如今中央是利用这个决定对付一切怀疑党的机关英明正确的人，也就是用它对付党内任何反对派、任何不同意见。当然，野心家和官僚主义者是不属于那些对党机关的专制制度及其决定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示怀疑的党员范畴之列的。在1921年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关于实行清党给各党组织的信》中，清洗的目的表现在一个中心思想上：“必须使我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铁板一块”（同上，第277页），也就是说，清洗后留在党内的只应是那些善于按照上面的命令同样思考和行动的人。“我们要进行的不单纯是重新登记，而是大清洗。我们要严格地、系统地和周密地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我们的队伍里不留一个哪怕可疑的‘共产党员’”（同上，第279页），——在这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

“无产阶级”陛下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党的主导力量，但在有了“工人反对派”无产者的经验之后，列宁对无产阶级大失所望。所以“中央信件”才说，“无产阶级出身决不能为我们保险，党不会背某个摆委员架子的‘无产者’那样的非常有害的包袱”（同上，第279页）。在“中央信件”中，被直接称为“有害的包袱”的既有主张工会独立于党的官员的人，又有提出“生产者联盟”思想的人即“工人反对派”领导人（同上，第276页）。信的结尾指出，“必须仔细地一环一环地过筛每一个党小组和每一个同志，即使这个同志身居高位也不放过”（同上，第277页）。

根据中央的这些方针于1921年8月15日到年底所进行的第一次"大清党"淘汰了169,748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诚然，被开除出党的人没有象后来斯大林时那样被抓起来，但他们自动失去了在国家机关、经济机关或者工会机关中的职位。清洗开始之前中央政治局试图把中央委员、"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列宁在十大上把施略普尼柯夫拉进中央，是想把这个真正的、不带引号的工人反对派的最危险的领袖用中央委员的集体纪律约束住。但列宁很快认识到，他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相反，熟悉党的机器的内部工作的中央委员的威信，只能使他对列宁制度的批评更有份量、更有作用。施略普尼柯夫虽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不停止斗争这一点只能证明他主观的诚实和行动中没有什么野心勃勃的考虑。具有一个党内韬略家的准确嗅觉和正确无误的政治自我保全的本能的列宁感到，施略普尼柯夫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新的社会现象，是新的党内喀琅施塔得（"要无产阶级政党，但不要列宁的寡头政体"）。所以列宁表现了表面上难以解释的匆忙——1921年8月9日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体会议，唯一的议程是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列宁要求全会对施略普尼柯夫运用十大《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中三分之二票数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一条。但是列宁在这次全会上没能搜集到那么多票数来对付施略普尼柯夫。因此不得不局限于这样一个决定："会议坚决呼吁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从根本上转变自己的政治表现，使之符合他本人所在的中央的路线……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不转变自己的表现，中央将受权召集同样的会议，重新审查这一问题。"（《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70年俄文版第2册第281页）

施略普尼柯夫及其拥护者拒绝服从这项最后通牒。当旨在把党对党的机关的主权收归给党的全部努力不仅化为泡影，而且引

起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党内镇压的新浪潮时，由以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米雅斯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二十二名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集团于1922年2月26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声明，控告中央，尽管这等于是把对列宁的控告书交给列宁本人。声明的作者们写道，自称“工党”的俄国共产党百分之六十由非无产者组成，而“我们的领导中心却对允许自己有自己见解的一切人，特别是无产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在党内采取一切镇压措施对付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想要使无产阶级大众接近国家的意图被宣布为‘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而其拥护者要受到迫害……党和工会官僚阶层的联合力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无视我们各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原则的决定。我们的工会派别，甚至各次代表大会的派别，在选举自己的中央时无权表达自己的意志。官僚集团的监护和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党员们在被开除和其他镇压措施的威胁之下被迫选举的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人，而是上层阴谋集团想要的人”（1922年3月7日《真理报》。另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49—750页）。

尽管列宁毫不怀疑他的顺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反应如何，但是老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家丑外扬”使他无法自已。在紧急召开的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受托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并维护中央的立场。由于共产国际头几年还存在着某种表面上的一党内部和党与党之间的民主，而大家都承认各国共产党党员向最高国际当局上诉的权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审查俄国共产党人申诉书委员会。组成委员会的是保加利亚的柯拉罗夫（主席）、克拉拉·蔡特金（德国）、特拉齐尼（意大利）、马赛尔·加香（法国）、麦克马纳斯（英国）、克列伊比赫（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二十二人

集团方面向委员会作解释的是施略普尼柯夫（1901年入党）、柯伦泰(1898年入党)、普拉夫金（1899年入党）。文明的欧洲人与列宁主义的狂热信徒不同，表示了更大的关注，至少，在审理诉状中表现了更多的形式民主。反对派和中央代表在阐述和维护自己论据方面处于相同地位。

柯拉罗夫听取了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陈述，认真记下了他们申诉的每一点。然后，他又把它们念给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听，以便让他们就此作出解释。历史以委员会正式记录的形式给我们保存下来了这份珍贵的文件。柯拉罗夫对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制度的控告作了如下表述：

一、党内不允许批评自由。甚至在通过决议前也不让辩论。一切都由中央委员会本身决定。党只能面对既成事实……

二、中央在指派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员时不断向地方委员会施加压力。中央一贯向地方派出书记人选，如果省委不同意中央建议，就会拿出手段强迫它们同意。

三、各级党组织都忽视工人。不给工人以认真参加党组织工作、工会和苏维埃工作的可能。从而官僚主义大肆蔓延……党发生社会蜕变的危险是巨大的。

四、中央不断向工会的共产党党组施加压力。中央不顾工人党员和工会的意志，并行不悖地编造自己的名册并强迫工会接受这些名册。

五、党想要在“工人反对派”内部挑拨离间。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务鲁比诺夫找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秘书，建议成立第四国际小组……这就为把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开除出党制造了口实。

六、对施略普尼柯夫在莫斯科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尽管他是党中央委员。

七、莫斯科苏维埃的最近一次选举是在工人实际抵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那些投了共产党员赞成票的人也常常是因为害怕迫害才这样做的……

八、苏维埃政府白白地把黄金丢掉，在国外订购那些在俄国国内可以成功生产的机器（蒸汽机车），从而使得俄国工人失业。

九、清党（清洗思想出自工人反对派）被大肆歪曲了。

十、签署申诉书的二十二位同志已收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请柬，这当然是镇压的开始……

十一、在三十五名省委书记中只有三名工人。

十二、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好的，只是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不贯彻执行之。

委员会成员加香在对柯拉罗夫阐述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申诉作补充时指出，"柯伦泰向我们声明：在工人罢工时，红军扮演了工贼的角色……施略普尼柯夫向我们声明：给你们外国人看的是排场和官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进行强大的罢工运动。工人阶级要同目前的政府一刀两断"。(《代表大会委员会报告》第14—24页，1922年莫斯科出版。另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749—756页）

共产国际委员会拿到了2月27日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这项决定中政治局"责成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委员会澄清这个现象的真实性质及其中对现实的歪曲……中央责成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代表会议（委员会）提供十大文件，这些文件表明，早在去年党的代表大会就谴责了那些同志的观点和派别活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签署了这项声明"（《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750—751页）。

这样，共产国际委员会被警告说，它与之打交道的是已被代

表大会谴责过的反对派，尽管二十二人声明签名者的多数当时还没有加入"工人反对派"，而他们现在所列举的控告事实对中央本身也是十分新鲜的。然而，政治局决定中有一条说，这项决定将与"共产国际的决议一道公布"（同上，第751页），这表明，中央很少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共产国际尚未审理二十二人申诉状，中央就已知道它的决议将是什么样子了。

主要被告列宁没有出席共产国际的法庭，把全部案子交给了两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和两名中央委员（拉狄克和鲁祖塔克）。恐怕，这是二十二人集团决定再次对列宁制度提出书面控诉的原因。在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书面声明中说，他们诉诸共产国际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列宁制度，不如说是"警告中央，它所奉行的政策对党孕育着极大危害：一、丧失党同无产阶级的统一，二、党的彻底社会蜕变。"

声明要求共产国际建议俄共中央在党和工会中切实贯彻十大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保证党内批评的真正民主，停止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放弃现在把工人的一切不同意见都归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之列的作法（同上，第775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审理二十二人申诉状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称的宽容态度到了什么程度，它所表现的机会主义也就实质上到了什么程度。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在无法直接驳回老布尔什维克集团的论点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多少有些模棱两可的决议。决议中说："声明签字者们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和缺乏必要的解释，这不仅表现在有关揭露现存混乱的原因部分，而且表现在有关寻找消除混乱的方法和途径的部分……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不能认为二十二位同志的申诉是正确的。"（同上，第751页）

"二十二人集团"领袖之一、老工人、1906年入党的老布尔什

维克米雅斯尼柯夫根据斯大林主持下的中央监委报告被事后开除出党。米雅斯尼柯夫在《伤脑筋的问题》的小册子中写道，在共产党苏维埃国家里，由于党垄断新闻，营私舞弊、贪污行贿、滥用职权现象比比皆是，而党的报刊或者默不作声，或者替党内官僚打掩护。米雅斯尼柯夫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臭不可闻、贪赃枉法的事成堆：需要新闻自由对其揭露之"。所以他建议宣布"从君主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列宁在给米雅斯尼柯夫的私人信件中厚颜无耻地回答："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479、480页）①

这就是新的代表大会前夕的党内形势。新的党代表大会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领导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3月27日到4月2日举行的，即国内战争结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之后。

当选大会主席团的有十九人，其中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等人，但没有一个前"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没被选进主席团的当然还有中央委员施略普尼柯夫。被选进大会秘书处的有叶努基泽、米高扬和基洛夫。被选入起草委员会的有转到列宁阵营方面来的前"民集派"分子布勃诺夫。

代表大会议程：一、中央政治报告（列宁）；二、中央组织报告（莫洛托夫）；三、检查委员会报告（诺根）；四、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索尔茨）；五、共产国际报告（季诺维也夫）；六、清洗总结（什基里亚托夫）；七、党的建设（季诺维也夫）；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页。——译者注

八、关于俄罗斯共青团工作的补充报告（萨发罗夫）；九、工会（托姆斯基、安德烈耶夫）；十、财政政策（索柯里尼柯夫）；十一、论红军（托洛茨基）。

在代表大会开幕、列宁作了简短讲话后，转到加米涅夫主持大会。他宣布议程后，由列宁作中央政治报告。在向代表大会做的这一最后报告中，列宁第一次不是作为党的领袖，而是作为国务活动家出现的。这篇最后的讲话恐怕不但是他政治生涯的总结，而且是他治国才能的顶峰。

关于即将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协约国最高会议邀请了苏维埃俄国参加，——列宁不留丝毫怀疑余地地指出，"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列宁说，在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问题上，在西方有两派：一派想要"武力解决"同俄国的争端，另一派醉心于和平主义。尽管两派都是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但"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善于利用和平主义者"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商人"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11页）。包括在"实际目的"之列的有选择"薄弱环节"瓦解资本主义大国反苏维埃俄国的"统一阵线"。苏联历史学家正是这样解释热那亚会议期间同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的（1922年4月16日）。

在国内政策方面，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一年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工业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目的是向农民证明，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证明这一点，要么农民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必不可免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我国全部政策的根据。"②（同上，第16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20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页）列宁说，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在于证明，他们能够比资本家经营和供应得更好。但是，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工人和农民们却说："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你们倒是一些好人，可是经济工作，你们虽然担当了起来，却不会做……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这些圣人简直要活着升天堂，但是，事情会不会做呢？……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这是第一个教训，这是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我们不会经营"**（同上，第17—18页）①。五十年过去了，列宁的这席话今天还是现实的。

据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教训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会做买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而要向非党的店员—白卫分子学会做买卖！与此同时，列宁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巨大危险"：

"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

汽车明显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报警说："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同上，第23页）

列宁说，退却是相当难的艺术，有危险的惊慌失措，象"工人反对派"那样，或者有幻想，象孟什维克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那样，他们想，我们当真是从共产主义原则上退却。列宁建议：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22页。——译者注

对那些同意布尔什维克退却的孟什维克，即“凡是公开宣扬孟什维主义的人，我们革命法庭一律要处以死刑。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天晓得是什么东西。”（同上，第25页）①

新经济政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纲领，而是策略。所以，那些天真地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当作纲领的人应当象列宁进一步说的那样，“被枪毙”。列宁提议共产党员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驳倒商人对共产党员的嘲笑，说他们从前是“劝说司令”（克伦斯基）、现在是“空谈司令”（列宁）。

关于乌斯特里雅洛夫和“路标转换派”就“新经济政策——蜕化还是策略”这个题目所写的那些东西，列宁说，乌斯特里雅洛夫声称，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变，这“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因为“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列宁不排除布尔什维主义向一方或另一方蜕变的可能性。因此，列宁警告性地概括：“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②（同上，第27—28页）那些冥想演变（今天该说：冥想“趋同”）的人尽可以陶醉于自我欺骗，但布尔什维主义将不放过这种危险并且更加顽强地与之斗争。这还不算。列宁引用一位共产党员的话说：“仅仅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列宁评论这句话的作者说：“看，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这种经济。”③（同上，第31页）

在十一大上列宁第一次用政治中的“主要环节”论补充了自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3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3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639页。——译者注

己的“薄弱环节”论（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的是俄国）。列宁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同上，第39页）①。列宁进一步解释，“抓住主要环节”就是选择战略打击的问题即当前“关键”。他举例说：

“1917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赢得了政权。“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抗战……地主要来了，共产党能同地主作斗争。因此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

“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策，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这是最有害的空谈……目前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挑选人材……应该挑选必需的人材，检查实际执行情况。”（同上，第39—41页）②

在列宁去世前和去世后，斯大林的全部“权力学”都渗透着“主要环节”论和“挑选人材”、“干部”和用他们“检查”对党的机关的指令的“执行情况”的思想。

列宁以颇为悲观的结论结束自己的报告：“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被派去做他们现在适于做的工作，他们都不善于搞自己的业务，因此应当立刻加紧学习。”（同上，第44页）③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50—651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同上，第654页。——译者注

在十一大上列宁头一次抱怨自己生病，这病使他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1922年1、2、3月）脱离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列宁以此来解释人民委员会与政治局之间正确关系的破坏，“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很多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①]结果造成了国家不是由政府，而是由政治局管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列宁提议把他在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李可夫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中央负责书记莫洛托夫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有列宁因之器重他的东西——官僚主义热情（为此列宁说，莫洛托夫“屁股沉得象石头”）。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图柯夫对莫洛托夫报告的评价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渗透了漫不经心的文牍主义宽宏大量和乐观情绪的报告，不多不少……”（同上，第99页）。

然而在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诺根），制度的主要病症——未经任何人选举的党的机关的官僚集团的权力专断——被直呼其名地提了出来。诺根说，既然党的干部的命运及其在党和国家中的配置是由中央机关决定的，检查委员会研究了这个机关是哪些人组成的。检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机关是由未经党推选、有些是党根本不了解的官僚们组成的。对于检查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这个领导着党的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的机关岂不是“党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某种隔阂”吗？回答是：“在沃兹德维任卡工作的那个机关（当时中央书记处设在那里。——作者）的幌子下，我们正在制造这种隔阂……这些同志在党内无人知晓……**这是党的官僚集团、党的官吏。**”（同上，第61页）

上面提到的斯图柯夫补充诺根说，中央组织局（由斯大林主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53页。——译者注

持，他是其中的唯一政治局委员）就是“中央委员会和党之间的主要官僚主义隔阂”（同上，第99页）。

梁赞诺夫是就列宁的报告进行发言的头几个人之一，他对党内状况作了如下形象的描绘：

“提出批评的全体同志（上帝保佑，我可远不是反对派）……因批评中央政策而陷入困境。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十分特殊的机关。人们说，英国议会什么都能，就是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要能耐得多：它已经把不止一个相当革命的男人变成了女人，并且，这种女人的数量正在多得难以置信（场内有笑声）。”（同上，第79页）梁赞诺夫说，照列宁看来，共产党充其量只是对一种要工作的新局面“绝对不适合”，“但现在诺根同志帮了我们的忙，使我们明白了：有什么和尚，有什么庙”。（第79页）

梁赞诺夫认为，只要中央不停止扼杀党内民主，就将永远如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批评列宁，说他尽顾“人民委员会的琐事”而忽视党的工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同意身兼数职而力不胜任的作法。他特别指出斯大林说：“就拿斯大林同志的例子来说吧，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难道能够设想，在一个人负责两个人民委员的工作的时候，还要负责政治局里的工作、组织局里的工作和十来个中央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吗？”（同上，第85页）

前“民集派”分子奥新斯基说，“各上层机关混乱不堪”就是因为，在八大和十大上拒绝接受“民主集中派”的建议：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明确权力分工、给地方苏维埃机关更大的独立性。奥新斯基指出，“政治局的确忙于大量繁琐事务，甚至连‘贵族大院’给农业人民委员部还是不给，印刷厂是否该给某个

机关”这样的事都要过问，而1921年12月取消“土地社会化”法令（1917年）的如此重大决定却没有在党内讨论就在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奥新斯基建议取消人民委员会的立法权，把它转交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至于党内的一般状况，应当“从军事纪律转向党内纪律”。（同上，第88—89页）

施略普尼柯夫指责列宁，说他总是想同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用机关枪语言对话，“昨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在散布惊慌失措，要用机关枪向惊慌失措者开火”。施略普尼柯夫说，自从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人质被拉入中央委员之列后，他听到的只是“机关枪开火”。如果党内有惊慌失措，那末这是因为“党作为活的机体没有参与政治生活……”列宁说，在战争和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非阶级化”了，所以，无产阶级作为在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阶级就不存在了。那末“让我来祝贺你们，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列宁说，我们虽然在开汽车，但所去的却不是要去的地方，那末这是因为，“我们坐得离我国革命的司机——无产阶级相距太远”（同上，第103—105页）

代表拉林指出，“列宁的讲话非常好的地方是，他作了这个讲话，也就是说，他恢复了健康并坐在这里。但如果去掉这个主要优点不提，就所剩无几了”。列宁所猛烈批评的秩序，正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同上，第112页）。

代表马努伊尔斯基谈到反对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增长，其代表就是以施略普尼柯夫为首的二十二人集团（同上，第117页）。

前“工人反对派”的代表梅德维捷夫证实，“在同广大工人群众接触时，常常听到对我们政策的深刻不信任……优秀工人都在离开我们的党……我们甚至在我党中央机关报上看到，党的优秀工作者在声明退党时说，他们感到自己在党内处于表决傀儡的

地位”。（同上，第119页）

党的著名活动家科西奥尔在批评中央无视上届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时，说：“我们党的管理体制与战时官僚主义和军事体制毫无变化。”他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组织局形式上是反对派别，实际上是迫害一切批评党和苏维埃缺点的人。中央把这些批评家当作“反对派”并予取缔。托姆斯基、梁赞诺夫以及原来拥护托洛茨基的一系列人就是这样被撤掉工会工作的，这还不算在地方上被大批清洗的负责工作人员。据科西奥尔说，“中央自己制造派别斗争”，并且在全党建立“苛刻的制度，这种制度与真正的党内纪律毫无共同之处”（同上，第126—128页）。

列宁在闭幕词中回敬科西奥尔说：“科西奥尔埋怨中央，还举了一些人，我不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回答……这里，事情的实质在于，如果中央的人事分配权被取消的话，它就无法规定政策……”对施略普尼柯夫，列宁说：“可怜的施略普尼柯夫！列宁打算对他架机关枪。所说的是党内影响，全然不是什么机关枪。至于机关枪，那是对我们称之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那些人而言的。”（同上，第141页）①，至于施略普尼柯夫，但愿他明白，“我们不会凭白无故在中央设立法庭，而在中央只差三票就把他开除出党了”（同上，第142页）。列宁向代表大会表明，一切站在与中央所指示的观点相反观点上的人，都要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

提出两项决议案：一个是伏龙芝代表一系列代表团拥护中央政策的提案，另一个是梅德维捷夫以个人名义谴责中央政策的提

---

① 《列宁选集》中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1922年4月2日）里没有这两段话。——译者注

案。除四票弃权外，全体赞成伏龙芝决议案，梅德维捷夫决议案无人赞成（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只有发言权）。

索尔茨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是对那些他称之为“企图摆脱党的桎梏”的共产党员的起诉状（同上，第169页）。他详细叙述了中央监委审讯二十二人集团成员的情况，这些人竟越过“自己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他宣布，要开除这个集团的成员施略普尼柯夫出党，在中央和中央监委还不够三分之二的票数（二十七名出席者中，十七人主张开除，十票反对开除）。索尔茨认为，签署二十二人文件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反党派别集团，根据十大决议，它应被开除出党。跟以往每次类似情况一样，党的机关同中央监委共同认定，在签署申诉书的人当中有两名前孟什维克（柯伦泰和米京），一个前邓尼金分子，一个前商人，一个是被开除出党分子，余者的履历尚待查清。索尔茨把所有被告分为三类：一类是申诉书组织者（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柯伦泰），另一类是“社会异己分子”，第三类是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已幡然悔悟的人。索尔茨建议代表大会以中央监委的名义把前两类开除出党，而警告第三类，如果他们不执行党的路线，也将被开除。

就是象列宁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样经过筛选的代表大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的反应也很冷淡。记录没有任何地方注明有赞叹声，甚至在报告结束时也没有表示礼貌的一般“鼓掌”。大概，所有这一切使列宁和机关感到，他们搞得太过分了，因为没等讨论，代表大会主席团就当即提议：把二十二人案件从中央监委报告中分出去，成立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审阅全部材料，然后向代表大会作特别报告，以便日后不再有任何非难”（同上，第177—178页）。被选入这个委员会的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捷尔任斯

基、雅罗斯拉夫斯基。主席团建议干脆不讨论中央监委报告。多数代表不同意这个建议。只好开始辩论。

头一个发言的是梁赞诺夫。他说，他已三次作中央监委系统的被告人，所以他不怕"任何家庭教师，不管是穿裙子的还是穿裤子的"，他提议："应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上，第179页）。

施略普尼柯夫宣称，索尔茨宣读的对他及二十二人集团的起诉书，他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头一次听到的。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事先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指控，说他们组织反党集团。施略普尼柯夫说，当共产国际做出了有利于中央的决定时，我们服从了这个决定。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又需要事后"组织"反党集团了，并且给它的成员编造新的履历，无任何材料依据而对他们进行攻击。是谁在这样干，谁是法官？施略普尼柯夫仅仅举了一个关于法官的例子，这例子对他来得正凑巧：在这次会议上担任执行主席的是第四届杜马的工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在这次针对梅德维捷夫的会议上，中央监委委员谢多伊指控他是孟什维主义者。施略普尼柯夫对代表大会和谢多伊说："我应告诉你们，正是这位梅德维捷夫因为组织反对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和其他代表的审讯的罢工（在彼得格勒）而被流放（1914年），而与此同时，你们也去了，你们是知道往哪儿去的——违背我党的意志到法国军队里去当志愿兵。这真是命运的嘲讽"："护国分子"和"社会爱国者"今天竟成了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审判官！（同上，第188页）施略普尼柯夫举例说，曾经有被派来找他的人，这个人带着要事实上不存在的"工人反对派"加入"第四国际"的建议。

在代表大会的一片死寂中，施略普尼柯夫直冲着列宁说："这件事的策划者们住在'特级'房间并且由苏维埃来报销（'特级'

部住的是外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领袖。——作者），岂非咄咄怪事。把人领来、开会、派信使来找我。我及时报告了中央，但这些活动照例重复。不久前，即两周前，我又向中央报告了，但得到的答复是，我的声明已‘收悉’。”（同上，第189页）为什么是“收悉”，而不是研究？列宁不想引火烧身。

柯伦泰也发了言。她说：“至于说我曾是孟什维克，那末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凭这一点开除，那末开除的就不能是我一个。”她建议：“应当这样改变党内制度，使工人有可能在党内发挥主动性。”（同上，第197、200页）

梅德维捷夫谈到党的法院的工作方法：“中央监察委员会依然故我：它只管起诉，但认为不一定要向你们证明自己的指控”，何况这些指控是虚伪的、是弄鬼的、是杜撰的或者是挑拨性的，这些指控“只有在最居心叵测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可能（同上，第196页）。

尽管“二十二人集团”的领袖们用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中央的明显挑衅性的警察方法，但无论列宁还是中央或中央监委的别的什么人都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回答这些指控。

当提出决议案：“总的”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是正确的、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在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投赞成票的只有223人，其余的人弃权或者主张取消——至少取消地方监察委员会（89人）（同上，第208页）。

代表大会审理二十二人案件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在报告中重复了中央监委对他们的指控。委员会愤慨的是，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柯伦泰声明，他们对向共产国际告中央的状一事完全没有后悔之意。因此，委员会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同上，《十一大委员会关于‘工人反对派’的报告》俄文版第702—710页）。然而，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使对列宁也是相当出

乎意料的。代表大会驳回了中央、中央监委和委员会关于开除二十二人出党的建议。代表大会只是简单记了一笔："责成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同志一旦今后表现出类似反党态度时，把他们开除出党。"（同上，第380页）。列宁这会儿没能干成的，后来都由斯大林干成了：他把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开除了"生活，但却令人奇怪地给柯伦泰留了一条命。

季诺维也夫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跟以往一样，是寡廉鲜耻的、最廉价的欺骗宣传的典范。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的是，这么个人会被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并竟然同斯大林竞争列宁继承人的角色。在他的报告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从第二国际领袖让·隆格那里取来的引语。在回答共产国际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统一战线"的建议时，隆格说，他非常理解，共产党人想用"统一战线"达到什么目的。隆格引用诗人拉辛的话说："我拥抱你，是为了扼死你。""战略家"季诺维也夫承认，他的目的正是这样。但是，据季诺维也夫宣称，第二和第二个半国际回答说："好，统一战线，不过你们要打开俄国的监狱。"（同上，第225页）季诺维也夫对此说道，在俄国监狱中关着的只有这样的人：他们"至今还在列宁同志的胸部留着两颗弹丸"（第226页），仿佛开枪的不是一个卡普兰，而是契卡所抓的成千上万个政治犯。

季诺维也夫的另一个报告——论党的建设也是这么个水平。在读季诺维也夫论党的建设的报告时，只有一点可以弄清：报告人靠列宁的恩赐与别人分享权力，但自己没有任何权力理论。更有甚者，他甚至不晓得，党的权力应该是全面的和极权主义的。正因为缺乏党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极权的概念，有无限权威的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领袖的报告受到了一名二十六岁的年轻省党委书记米高扬的批评。他说：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内容广泛的报告中谈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状况问题。但对所提措施的表述却含糊不清、不够确切……甚至出来一个苏维埃和党划清权限的问题……在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谈到要党离开苏维埃工作时，有些过头了。托洛茨基同志谈到这一点，我不奇怪，因为他是军人。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彼得格勒省党委会工作……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党不应干涉经济事务，就象不应干涉军事事务一样……党不能接受这一点，不能不领导经济……季诺维也夫谈到微不足道的小事，说支部不要同工长的任性作斗争等等。但这并不是一切，也不是最重要的。有另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只字未谈要教会党员作工人的领袖并在政治上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关于农村工作的任务也只字未提。在这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此未置一词，并说，这个问题将在委员会里研究，不过，这可不是个委员会的问题，而是一般政治问题。”（同上，第431—434页）

年轻的米高扬当着列宁的面、在代表大会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教训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只是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米高扬是受斯大林的委托行事的。

如同历届代表大会一样，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机关提议选举党的新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于它的主席诺根批评了中央机关而被取消。

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

委员：1、安德烈耶夫，2、布哈林，3、伏罗希洛夫，4、捷尔任斯基，5、泽林斯基，6、季诺维也夫，7、加里宁，8、加米涅夫，9、科罗特柯夫，10、古比雪夫，11、列宁，12、莫洛托夫，13、奥尔忠尼启则，14、彼得罗夫斯基，15、拉狄克，16、拉柯夫斯基，17、鲁祖塔克，18、李可夫，19、萨普龙诺夫，

20、斯米尔诺夫，21、索柯里尼柯夫，22、斯大林，23、托姆斯基，24、托洛茨基，25、伏龙芝，26、楚巴尔，27、雅罗斯拉夫斯基。

候补委员：1、布勃诺夫，2、巴达也夫，3、古谢夫，4、基洛夫，5、柯马罗夫，6、基谢廖夫，7、克里沃夫，8、列别季，9、列普谢，10、洛鲍夫，11、马努伊尔斯基，12、米哈伊洛夫，13、米高扬，14、拉希姆巴也夫，15、皮达可夫，16、萨发罗夫，17、斯米尔加，18、苏利莫夫，19、施米特。

进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有：

委员：1、瓦连佐娃，2、科罗斯杰洛夫，3、索尔茨，4、钦佐夫，5、什基里亚托夫。

候补委员：1、穆拉诺夫，2、萨莫伊洛夫。

在组织新的党领导机关时，列宁一如既往地要手腕。现在，他拉入中央以代替“工人反对派”前领导人的是“民集派”前领袖人物：萨普龙诺夫——当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和基谢廖夫——当候补委员。托洛茨基拥护者在委员中只有五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在候补委员中只有两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在中央监委中一个也没有。

选举领导机关的新中央委员会会议在1922年4月3日举行。中央全会选出了：政治局（委员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候补委员有布哈林、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书记处（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斯大林首次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以此身份成了中央组织局主席。

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是根据谁的倡议，还依然是个未知数。中央全会的有关记录从未公布过。早在1930年时托洛茨基写

过，斯大林被选上这个位置是季诺维也夫倡议的，他在提出这个倡议时是“违背列宁的意志的，列宁容忍了这一点，因为他当时亲自领导着党”（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 第2册 第218页）。斯大林的苏联传记作家们在他生前写道，斯大林当选总书记是列宁提议的（《斯大林传略》俄文版第88页）。斯大林后的苏联共产党官方历史已经不说斯大林是按列宁的倡议委任的了。（见《苏联共产党历史》〈教科书〉1969年俄文版或《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俄文版第4卷）

即使斯大林被委任为总书记是违背列宁意志的，但委任本身列宁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从1922年4月3日列宁给中央全会的建议中可以看出来：“中央责成书记处严格确定和遵守正式接待的时间安排……责成斯大林同志马上为自己物色副手和助手，使他能解脱苏维埃机关里的工作（原则领导除外）。”（《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9页）

诚然，列宁同意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当总书记这一事实，是因为他想，斯大林也会象在他之前的中央第一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廷斯基和莫洛托夫那样扮演同样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是列宁的中央秘书。列宁象给前任书记一样地给斯大林委托和指示，证明列宁对斯大林也是这么想的。

这种委托和指示的一个范例是：“1922年4月24日，斯大林同志转政治局委员……我建议今天就用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并以我的名义发如下电报给齐切林”（往热那亚——作者）。（《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64页）

列宁很快就意识到，斯大林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列宁在中央系统的秘书，也不认为自己是列宁个人委托的执行者。

因此，不管选举斯大林的倡议来自谁，斯大林出现在中央机关的为首地位是完全合乎逻辑并同样合乎情理的。他是比列宁还

要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是比全体其他中央委员总合起来还要强的权力大师。

第二十二章
“三人帮”的反列宁阴谋

从1921年年末起，列宁经常生病和长期休养。1922年春他还顺利地领导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尽管在这次大会上不如在以前历次代表大会上那么活跃。1918年列宁被两颗子弹打伤，1922年4月23日为他做了手术，取出其中的一颗。4月27日他已能参加政治局会议。随后，列宁整整一个月都在主持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直到第一次中风使他卧倒病榻；他右臂和右腿局部瘫痪、说话言语不清。那是1922年5月25日。

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激动情绪描绘了列宁的病史及其政治后果。他写道：

第三天布哈林来看我。

“您也躺在床上？”他惊叫。

“怎么，除了我还有别人？”我问。

“伊里奇病了：中风。不能走动，不能说话。医生都看不出名堂……”

列宁本是个结实健壮的人，他的健康体魄象是一根坚不可摧的革命的中流砥柱。他始终一贯地积极、机警、稳健、快活……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三月他头疼得厉害……原来，列宁前天就病了。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点也没有怀疑过。布哈林说话十分诚实，“上级”给他灌输什么，他就重复什么。那个时期布哈林总是以纯布哈林式的，也就是半疯狂半孩子似的感情对我恋恋不舍。在说完列宁的病情后，他一头扑到我的身上，隔着被子

紧紧地抱住我，放声大哭：“你们可不能生病啊，我恳求你们：有两个人的死是我从来不敢想的呀……这就是伊里奇和您。”这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仿佛革命本身屏息了……很久之后，我如梦初醒地恍然大悟：关于列宁的病情只是到了第三天才通知给我……这决非偶然。那些早就存心与我作对的人，首先是斯大林，是在竭力争取时间。列宁的病是那种可以猝然导致悲剧结局的病症。明天，甚至就在今天就有可能一古脑儿冒出全部领导问题。政敌们认为，哪怕巧夺一天的准备时间也是重要的……应当认为，在这时就已经产生了“三人帮”（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思想（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06—209页）。正是从这时起，对尚未死，但显然离死不远的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开始了。不错，第一次中风之后列宁似乎恢复了元气，甚至在十月重返了工作岗位，但在十二月，第二次，更为严重的中风接踵而来……列宁显然不久于人世了。政治局里有三位有希望成为继承人的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无论事实上的继承人斯大林，还是法律上的继承人李可夫，都不曾闪现在任何人的脑际。对于李可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斯大林，那是因为对党的机器以及斯大林自进入中央之日起（1912年）在这个机器中的作用一无所知的原故。即使对苏维埃国家机器，任何人，包括列宁在内，都不如斯大林了解得那样博大精深。确实，斯大林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伊始就不停顿地进入中央局、尔后政治局、同时作为唯一的政治局委员进入组织局，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同时又是国家检查人民委员，他是受中央委派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央委派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成员，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派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这并非是些挂名职衔，而是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创造印记的职位。且勿忘记，

在七人立法机构——政治局中有五个人是侨居国外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部分地加米涅夫、李可夫），只有两人是在俄国的真正地下革命工作者——斯大林和托姆斯基。侨居国外的是“党的文学家”——如他们在1917年3月的中央记录中所称呼的，——而在俄国的则是党和革命的组织者。从心理学上来看，斯大林对于工人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来说是“自己人”，而侨居国外的是“知识分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出于对列宁的尊重公开不说，但私下却嘀嘀咕咕：知识分子都是日内瓦咖啡馆和巴黎餐厅的常客——在国外坐待沙皇制度倒台，而象托姆斯基那样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那样的地下工作者才是搞革命的。对领袖人物生平传略的粗浅了解表明，每一个曾侨居国外的政治局委员都只被流放一次，而斯大林七次被捕、五次或六次被流放，并且五次出逃，继续干革命，虽然他也是可以象“知识分子们”那样侨居国外的。如果我们想理解进一步的事态发展的话，对这一切都应该记住才是。

列宁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原则问题（“苏联”这一名称是作为世界联邦的万能形式而选择的，因为其中既无民族的、又无大陆区分的界限；开头列宁想取名为“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922年8月10日，根据政治局提议，成立了由上述共和国代表参加的联邦问题中央组织局委员会。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由他提出委员会决议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所有苏维埃共和国都以自治共和国的权利（“自治化”）进入俄罗斯联邦。斯大林未经列宁同意，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草案寄给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克兰、白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格鲁吉亚拒绝接受这一方案，理由是：“在斯大林同志提纲基础上

以独立的共和国自治化形式构成的联合为时尚早。我们认为联合经济努力和一般政策是必须的，但应保留独立的全部表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56页）白俄罗斯主张保持共和国间的条约关系的旧形式。乌克兰动摇不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支持斯大林的主张。

组织局委员会9月24日接受斯大林方案作为基础。9月25日列宁索要斯大林委员会的全部材料到高尔克村。但正如官方注释者写明的，“未等列宁指示，也未在政治局研究这一问题，中央书记处就同时把委员会决议散发给了拟参加定于10月5日的全体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同上，第558页）。列宁对此不满，于9月26日写信给政治局临时主席加米涅夫，要求讨论这一问题（“问题极为重大。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列宁通知说，在9月26日的单独会见中，“斯大林已同意做一项让步”（草案的第1条）。斯大林的这项让步在原则上改变了联合的全部构想，而是按列宁的模式：苏维埃共和国不象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加入俄罗斯联邦”，而是同俄罗斯联邦一起组成一个主权苏维埃共和国新联邦。但斯大林把自己的让步只看作是提法上的让步，而不是实质上的让步。加盟共和国在同俄罗斯联邦一起组成法律上的新联邦时，实际上要服从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斯大林在9月27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把列宁的“平等和主权”建议评价为是“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列宁的主张当然与斯大林相同，但要寻找在宣传上更灵活的公式）（同上，第558页）。

斯大林方案受到列宁批评的其余各点是：

斯大林的第2条说：

俄罗斯联邦全国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对加盟共和国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同上，第557页）。

列宁建议：随着第1条的改变要改变这一点，即建立新联邦的新立法机关和新执行机关；

斯大林的第4条说：

各加盟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要服从于俄罗斯联邦的相应各人民委员部；

列宁建议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并于全联盟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的第5条说：

其余各人民委员部（司法、教育、农业、内务、卫生、社会保险）是独立的，但各加盟共和国政治保安局机关要服从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保安局。

列宁建议：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包括国家政治保安局，都是独立的，但可以设立相应人民委员部协商性质的共同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同上，第211—212、557页）。

斯大林在给政治局的附函中把列宁的三点修改意见全部驳回了：对第2条修改意见——“我以为，不能接受。在莫斯科存在两个执行委员会除引起冲突和辩论外，别无是处……”；对第4条的修改意见亦未接受，这里“列宁同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建议合并人民委员部……未必该怀疑，这样的‘操之过急’是在给独立的维护者们助长气焰而加害于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托洛茨基：《揭伪造的斯大林学派》俄文版第66—67页）。

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些意见作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在政治局开会这一天即10月6日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说：“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要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坚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14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10月6日，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的方案和列宁的反对意见。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会上交换条子一事表明了局面的紧张。加米涅夫给斯大林写道："伊里奇宣战保卫独立"（共和国的），斯大林回答："我想，我们对列宁应当强硬"（波斯别洛夫：《列宁传》1963年俄文第2版第611页）。

政治局跟整个中央委员会一样，没有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雅斯尼柯夫）并在列宁意见的基础上根本修改斯大林方案。斯大林被迫执行这一决定，而对列宁表现不恭不顺。列宁著作的官方注释者写道，斯大林在向中央委员散发新草案时，对新草案是在列宁的原则意见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点讳莫如深，更有甚者："抹杀了'自治化'方案与列宁方案之间的根本区别，硬说新决议只是'组织局委员会决议更为准确的表述而已，原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可以无条件接受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58—559页）

10月6日全会作出了在列宁批评斯大林草案中所阐述的原则上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斯大林甚至在这之后还在继续争取自己的"自治化"，从而构成了后来所谓"格鲁吉亚问题"的实质。

列宁同斯大林有原则分歧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外贸垄断法问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10月6日中央全会搞了一项决定，修改了外贸垄断基础，允许一系列商品自由输入输出。列宁极为恼火。在通过斯大林给中央委员的信中，列宁认为全会的决定是"破坏外贸垄断"并要求推迟两个月执行——"到下一次中央全会"（同上，第221—222页）。斯大林向中央委员散发了列宁信件的副本。斯大林在附函中写道："列宁同志的信未能使我改变对中央全会决定正确性的信念……不过，鉴于列宁

坚决建议推迟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的决定，我投票赞同推迟，以便使这一问题能重新提到有列宁同志参加的下一次全会上。”（同上，第563页）

这里应指出，当1922年12月15日列宁通知斯大林说，他“跟托洛茨基订下了维护我的外贸垄断观点的合同……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儿也不会比我差”（同上，第338—339页），斯大林决定防止列宁、托洛茨基结盟。所以，斯大林在当天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鉴于最近两个月所积累的、说明应该保持垄断的新材料，我认为有义务宣布，撤销自己反对外贸垄断的意见。”（同上，第589页）不言而喻，“新”材料就是那些老材料，但在党的全部政治发展中显而易见的、对斯大林非常危险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却是新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个联盟。对于斯大林，如同对整个“三人帮”一样，一个受列宁委托行事的托洛茨基比列宁本人还要糟糕。党会明显看出，列宁在让谁充当自己的接班人。

正是在两次中风（5月和12月）之间，列宁和托洛茨基尤为接近了。从10月10日起，列宁重返工作岗位。托洛茨基写道，“列宁感觉到，由于他生病，在他和我的背后正在罗织暂且尚难捉摸的阴谋线索。他打算回击‘三人帮’”（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2页）。在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后几周，列宁同托洛茨基谈话时建议他当副手。托洛茨基拒绝了（这一点党的正式文件亦可证实）。托洛茨基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毫无疑问，对于日常事务，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者加米涅夫更为方便……列宁需要的是听话的实际助手。这种角色我是不合适的。”（同上，第214—215页）

列宁在又一次见面时坚持自己的建议，说“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组人员配置”，新局面将有利于托洛茨基“抖动一下”机

关。托洛茨基回答说，全部祸患与其说在于国家的官僚主义，不如说在于党的官僚主义和围绕在各级党委书记周围的有影响集团的相互庇护中。这时，"列宁略微思考了一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这么说，您不但建议向国家官僚主义开战，而且建议向中央组织局开战'……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机关的老巢"。"恐怕是这样。""那好，"列宁继续说，他显然为我们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而感到满意，"我向您提出联盟：反对官僚主义，特别要反对组织局。""同好人结成好联盟是值得羡慕的。"我说。我们约好过一段时间再见……他拟议成立中央的委员会……我们两人都要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是要成为解决斯大林派别的动力杠杆（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6—217页）。托洛茨基竟没有想到，这对斯大林是何等巨大的赞誉：十月政变的公认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搞掉一个斯大林需要结成联盟！

联盟能否奏效，搞掉斯大林能否成功？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在党机关等级制度中，斯大林的地位差不多是固若金汤的，在中央委员会中，他有由个人拥护者组成的可靠多数，通过"三人帮"形成了准备对抗列宁的势力。托洛茨基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作了回答："列宁能否实行他拟定的领导改组？在当时是毫无问题的。"（同上，第218页）然而，由于随后发生的事变，这没有成为毫无争议的事情。而托洛茨基的第二个答案已经完全没有说服力："不仅如此。我不怀疑，假如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话，没有列宁的直接参加我也会取胜。"（第219页）"党委书记等级制"的整个形势、党内力量分布的全部事实，乃至"三人帮"对十二大的周密准备都决然不能证实托洛茨基的信心，确切地说，是自信心：他一个人就能承担"联盟"的任务。顺便说

说，托洛茨基尽管有列宁的全部支持和督促，但并未打算投入这样的战斗。12月21日，当"三人帮"就外贸垄断问题宣告投降（不错，季诺维也夫为讨好斯大林还负隅顽抗了一阵）、中央修改了自己的旧的决定时，列宁给托洛茨基写道："似乎靠简单的迂回运动，一枪没放就夺取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歇，继续进攻。"（《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7—328页）

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响应列宁"继续进攻"的号召呢？

在听取托洛茨基的陈述之前，不妨让我们叙述一下另两份极端重要的列宁文件的内容：(一)列宁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二)列宁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的便函。

1922年12月13日列宁两次发病，12月15—16日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2月18日举行中央全会，全会以专门决议责成斯大林对遵守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负个人责任。在12月22日到23日的夜间列宁第二次中风——右臂和右腿开始瘫痪。但在12月23日，列宁似乎预感到死亡将临，请求医生允许他向女速记员作五分钟的口述，因为有"一个问题令他不放心"。然而，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医生们都同样不愿让列宁这样做。于是，据列宁的姐姐M·乌里杨诺娃证实，列宁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允许他口述几分钟自己的"日记"，要么他放弃治疗。他得到允许并于1922年12月23日开始口述他著名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12月24日在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与医生们会商之后，政治局不得不重申这样一项决定：

一、允许列宁每天口述五到十分钟，但这不应带通信性质，列宁也不应期待对这些便函作答。禁止会晤。

二、"无论朋友还是家人都不得向列宁透露任何政治生活情况，以便不向他提供引起思考和激动的材料。"（《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710页）

这就是说，列宁被割断了任何政治情报来源，主要的是不能接触一切中央文件。斯大林要监督这个制度的遵守情况。但仍然有一个政治局成员可以同列宁自由谈论政治题目和通报情况，这便是斯大林本人在“值班”探视列宁的时候。这是斯大林自己描写他在列宁患病前期对列宁的一次探视时说的。列宁对斯大林说：“我不能看报，不能谈政治，我竭力躲避桌上的每一片纸，因为我怕它是报纸，怕因此违反纪律。”斯大林对列宁的这番话则注释说：“我哈哈大笑起来，极力称赞列宁同志的纪律性。同时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135页）①

可想而知，斯大林同列宁谈了什么样的“政治”并向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

自12月23日起（列宁开始写“遗嘱”）到1923年3月6日同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止这段时间内，列宁和在列宁周围的情况得以接近还原是由于三方面来源：（一）《列宁值班秘书日记》（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二）《列宁全集》第5版编辑委员会的片断注释；（三）列宁的“札记”。

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和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有多少主观成分，托洛茨基是一个补充来源，因为他所引用的全部事实和文件如今都被苏联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证实了。

1922年12月23日的短信是列宁口授给女秘书沃洛季切娃的。在“日记”中说：“在开始口授前（列宁）说：‘我要对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说得很快，但感觉得出他的病状。”（《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74页）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10页。——译者注

《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部分的实质是，列宁提议：(一)把中央委员的人数扩大“到几十名或者上百名……我想，这件事对于提高中央的威信、对于改善我们机关的严肃工作、对于防止中央少部分人之间的冲突构成对党的整个命运具有过分意义等都是需要的。”(二)“尊重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性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3页）“信”的这一部分当天寄给了斯大林，但正如官方注释者所指出的，“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中没有提及列宁的这封信”（同上，第593页）。很显然，斯大林甚至向“三人帮”成员也隐瞒了这封信。这种推想不仅基于在中央领导机关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信”的这部分内容，而且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作中央政治报告时（1923年4月），完全忽视列宁的指示，而斯大林则谈到必须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把列宁的这个建议当作自己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谈到）。

后来，列宁的身体开始再次好转。他得到一天可口述三十到四十分钟的许可。当后来“三人帮”拒绝执行列宁的“遗嘱”时，他们把它说成是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瘫痪病人的病态想法的产物。然而，官方注释者写道：“尽管列宁身患重病，但却保持完全清醒的思维、不平凡的意志力、极大的乐观主义。”（同上，第592页）列宁期望，他能在行将召开的十二大上讲话并亲自阐述自己的建议和理由。他日益加紧工作。一方面，他继续口述“遗嘱”（从12月24日到1923年1月4日），另一方面，为《真理报》口授当前迫切问题的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评我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政治局也以为列宁可以在十二大上讲话，这表现为中央政治局1月11日决定指定列

宁向十二大作中央政治报告。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斯大林除前面提到的“信”的第一部分，还收到了“信”的以后部分。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写道（对她在这个时期的证词要批判对待才行）：

“列宁口授的全部文章和文件，按列宁的愿望抄写五份，其中一份他要求留给自己，三份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一份给自己的秘书处（绝密）……他请求在内装文件副本的火漆加封的信封上注明，可以启封者只有列宁，在列宁死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副本草稿已由我烧掉）。”（同上，第592—593页）

很象是斯大林事后为自己留了脱身的后路，因为要斯大林不关心列宁信的“后续部分”是十分难以设想的，而列宁的女秘书又都是斯大林指派的（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们很明白，列宁要死去，而斯大林将留下来。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后来枪毙了许多“人民敌人”的妻子，但一个列宁的女秘书也没有触动。

“遗嘱”的基本部分在12月24—25日的记录中和1923年1月4日的附言中。如果斯大林向党隐瞒了三十年之久的话，那末斯大林的继承人公布了它，而且对它作了不忠实的、简直是反列宁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遗嘱”没有任何含糊其词的东西，也不允许有不同解释。它对中央委员的评价简介如下：

（一）**斯大林**：“斯大林同志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有卓越的才能。他大概是现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过分自信和过分醉心

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

（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轶事当然并非偶然，但它也很少能加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难以把非布尔什维主义加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四）**布哈林**：“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还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宠爱，但他的理论观点能否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却有很大疑问，因为在他身上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不学习并且，我想，从来也没有完全辩证地理解过）”；

（五）**皮达可夫**：“再下是皮达可夫——一个无疑有非凡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过分热中于行政命令……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是可以信赖的。当然，我所作的评语无论前者和后者都是着眼现在，是基于一种假定，即这两个（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作者）卓越而又忠诚的工作者都找不到机会补充自己的知识和改变自己的片面性。”（1922年12月24—25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5—346页）

不久，1923年1月4日又写了“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列宁“遗嘱”的全部实质就在这“补充”之中。那里面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办法把斯大林调离这一岗位并委派另一个人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人在其他一切方面都与斯大林同志相同，只有一方面比他强，这就是要更耐心、更忠顺、更有礼貌……少任性等等。这可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防止分裂的角度和从我在上面写到的关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是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同上，第346页）

尽管列宁对中央领导人的评价有点令人想到永志难忘的索巴

凯维奇给省检察官的评语，但从这些评价中毕竟可以引出明确的政治结论。不过这既不是官方历史学家所作的那些结论，也不是托洛茨基所作的那些结论。托洛茨基是以为，列宁想要在党的上层进行领导干部改组和“在党内创造这样的条件，这些条件能让我有可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他的想法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之位的继承人……遗嘱无可争议的目的是：使我较容易地做领导工作”（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7页）。

托洛茨基错了。这完全不是“遗嘱”的真谛。诚然，托洛茨基被称作“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最有才能的人”还并不意味是最有才能的布尔什维克。此外，在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评价中，列宁显然大错而特错了。既然列宁所指的是政治“才能”，那末最有才能的该是列宁想要彻底除掉的那个人——斯大林。须知政治家的伟大或渺小是按他的政治成就来评价，而不是按他的政治作品或者演讲艺术来评价，更不是按他对自己的想法来评价。

“遗嘱”的全部含义在于：列宁在明显意识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对自己的接班问题得出了绝望的结论：他给领导党和国家留下的将是这样一个政治局，在这个政治局中没有一位政治家是没有巨大政治缺陷的，而一个人甚至早有刑事犯罪之兆。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能再次背叛（列宁想当初曾把“十月轶事”视为背叛），斯大林不忠顺并善于滥用权力，布哈林是经院哲学家和没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剩两名政治局委员列宁没有提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但李可夫是革命前的“调和派”，革命中的“逃兵”（1917年11月退出苏维埃政府），而托姆斯基一向跟列宁作对，主张共产党党组在各级工会“独立”、同中央委员会“独立”。即使他们被提到，也未必配得无保留的评价。虽然列宁除斯大林外不要求撤掉任何

人，但却想把他们都置于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因为在列宁看来，舍此，他所列举的“现中央委员会两位卓越领袖（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作者）的品质会无意中导致分裂”（同上，第345页）。要指出：列宁对斯大林与对别人不同，毕竟没有指出他任何一点政治缺陷，尽管他是有政治缺陷的。至于说“粗暴”和“不忠顺”，那末斯大林日后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这些特点的，不过要附带加上减轻罪过的条件：是的，同志们，——斯大林说，——这是对的，在对待那些践踏列宁主义的人上，我是粗暴和不忠顺的！

不过，在列宁的政治“遗嘱”做出后，全部问题就归结于上述人中谁最善于利用它。正是在这里，斯大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艺术，相比之下，马基雅弗利的全部仙方和列宁的全部成就都不过象是婴儿的喃语。

列宁在1922年12月30日和31日的《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的书简中又一次谈到斯大林。这些书简产生的简单历史是这样的。在高加索成立了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地区联邦。在三个共和国共产党之上是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不顾各共和国的“主权”，而奥尔忠尼启则感到自己即使不是“钦差大臣”，也是莫斯科的高加索地方长官。实质他是对的，不过列宁重视的恰恰是自己总督的温良统治形式，尤其是在高加索那样的敏感地区（他甚至于1921年给高加索共产党员写了特别信件，要他们不要照搬莫斯科的政策，而要根据民族风俗条件加以调整）。当奥尔忠尼启则越过格鲁吉亚的领导机关开始统治格鲁吉亚时，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于10月22日宣布辞职了。局势的复杂化还因为，在一次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当着列宁的副手李可夫的面狠狠打了格鲁吉亚中央一位拥护者的耳光。

以老布尔什维克布杜·穆吉万和马哈拉泽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向莫斯科的党中央对奥尔忠尼启则提出控告。中央指定了一个由捷尔任斯基(组长)、马努伊尔斯基和卡普苏卡斯—米茨凯维奇组成的委员会（1922年11月25日）。因为斯大林无疑是支持"大国沙文主义者"奥尔忠尼启则反对"社会民族主义者"穆吉万的（穆吉万想要格鲁吉亚不经过外高加索联邦直接加入苏联——这是他的全部"民族主义倾向"），捷尔任斯基对格鲁吉亚事件向列宁做了有利于斯大林的报告。列宁怀疑捷尔任斯基的客观性，因为他开始得到来自格鲁吉亚的确凿事实，不仅表明奥尔忠尼启则的专横跋扈，而且证明斯大林在包庇他。由此便产生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信。在12月30日的信中列宁说，他曾两次（在十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上）试图过问"臭名昭著的自治化问题"，但两次均被疾病所阻。列宁打算站在哪一边：站在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一边，还是站在"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或"社会民族主义者"——如斯大林最初所称呼的——一边，书信本身已经表示得相当明确。官方历史学家们至今一直歪曲列宁，硬说列宁似乎谴责了以穆吉万为首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事实上，列宁谴责了这顶帽子的制造者和迫害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罪魁祸首——斯大林及其助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说，在同从格鲁吉亚回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他是11月25日去那里的)谈话后，他感到的"只有最沉重的担忧……如果事情到了奥尔忠尼启则胆敢对肉体使用暴力的地步，可以想象，我们跌进了怎样的泥潭。看来这整个'自治化'的主意（斯大林的主意。——作者）压根儿就是错误的……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对行政命令的热中以及他对著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深恶痛绝起了致命的作用。深恶痛绝在政治中通常起的是最糟糕的作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56—357页）。在指控非俄罗斯人捷尔任斯基、

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时，列宁作了一个有意思的评语："众所周知，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总是要比真正的俄罗斯人情绪更过火。"（同上，第358页）列宁在12月31日关于同一问题的信中对斯大林作了毁灭性的政治判决。列宁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我们有一个典型例子，要求我们方面要加倍小心、谨慎和忍让……那个漫不经心地对待事情这一面的格鲁吉亚人，正漫不经心地指责'社会民族主义'（而他自己不仅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那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在破坏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同上，第360页）在结束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书信时，列宁要求"示威性地惩罚奥尔忠尼启则"，"为纠正无疑存在的大量错误和偏见起见，要补充调查和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小组的全部材料"（同上，第361页）。

列宁作结论说："当然，应该让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场名副其实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负责。"（同上，第361页）据列宁的女秘书弗季耶娃证实，列宁想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把这些信件作为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见沃尔夫著《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幽灵》一书第278页附注中弗季耶娃给斯大林的信）。尽管身患重病，列宁继续顽强地和详细地关心格鲁吉亚问题。由此可见，他确实在为在十二大上反对斯大林准备"炸弹"，他在同弗季耶娃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表示，并要把格鲁吉亚问题变成整个党的民族政策的原则问题。

弗季耶娃在1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弗季耶娃找来，委托她跟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要格鲁吉亚问题调查组的材料并详细研究之。这件事是委托给弗季耶娃、格莉娅谢尔和戈尔布诺夫三个人的。目的是为列宁准备报告，他要求为党代表大会准备报告。他大概不知道政治局

正在讨论这一问题。星期四即1月25日他问起，材料是否已经拿到。我回答说，捷尔任斯基要等到星期六才能来……星期六我问捷尔任斯基要，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儿。我给斯大林寄一信……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打电话来说，没有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还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从哪儿了解现状的……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将为争取给他材料而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76—477页）

果然，1923年2月1日政治局做出决定，把捷尔任斯基调查组的材料交给列宁。列宁在把这些材料交给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研究时说：“假如我自由的话（开头说走了嘴，然后又笑着重复：假如我自由的话），我会轻而易举地亲自做这一切。”（同上，第478页）但列宁不晓得，就在这个时候政治局批准了调查小组的报告和结论，谴责格鲁吉亚“社会民族主义者”，完全肯定了斯大林一奥尔忠尼启则的政策。列宁拿到调查组的材料并非没受到斯大林的抵制。弗季耶娃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曾说，“既然列宁坚持要，不给更糟”，斯大林答道，“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并要求解除他为病人制度负责，但政治局没有同意这一要求（弗季耶娃：《回忆片断》俄文版第64--65页）。

2月3日列宁问弗季耶娃是否看完了格鲁吉亚材料和政治局里是否谈了这个问题。当弗季耶娃说她无权谈论这件事时，列宁问：“这事件是专门对您有禁令的吗？”“不，我一般无权谈论当前事务。”“这么说，这是当前事务罗？”“我恍然大悟，我疏忽了。”（同上，第479页）2月5日列宁详细地询问另一位女秘书——格莉娅谢尔，问她捷尔任斯基调查组的材料整理得怎么样。他了解到，给他的报告要过三周才能准备好，而离代表大

会召开还有六周。

在弗季耶娃2月12日的记事中说，医生对看报、听情况和会见的禁令气得列宁"嘴唇发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产生一种印象，不是医生向中央委员会指示做什么，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作指示。"（同上，第485页）

2月14日弗季耶娃记载道，列宁很着急地催要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并要人通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索尔茨：他，列宁，"在受冤枉者一边"（即在穆吉万及其支持者一边），还要人把同样的话告诉给"某一个受冤枉者"（同上，第486、607页）。

3月3日列宁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交了一份对捷尔任斯基材料研究结果的书面报告。

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托洛茨基，另一封给斯大林，而3月6日又写信给穆吉万、马哈拉泽等人。在这些信中，最重要的一封是给斯大林的信。

据官方注释者说，列宁了解到，政治局已于1923年1月25日批准了捷尔任斯基调查组的结论。列宁通过自己的工作人员事先对这个调查组的材料作了研究并拿到了他们的结论，从而决定，必须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抗议政治局的决定。列宁不能亲自发表讲话，但委托谁来讲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列宁早已失去作用，剩下的只有托洛茨基了。列宁事先弄清了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态度，他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如出一辙，并错误地期望，托洛茨基会有足够的勇气反对"三人帮"和维护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列宁便给他写了如下一封信：

"绝密　亲启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恳求您务必承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案件辩护之义务。此案现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调查"之中。我不能指望他们

保持公正。甚至完全相反。假如您能同意为之辩护，我就放心了。如果您不拟同意，请将全部卷案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不同意的表示。

“致以同志式的良好祝愿

列宁”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9页）

对这封信，托洛茨基记忆犹新，他写道：“列宁的两位秘书弗季耶娃和格莉娅谢尔负责联络。这就是她们转交给我的。列宁对斯大林筹备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安到了极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准备炸弹’。弗季耶娃的原话一字不差是这样的：‘炸弹’一词是列宁说的，而不是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把格鲁吉亚案件操在自己手里。”（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20页）

托洛茨基确信，“列宁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无情地揭露专政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加米涅夫明天动身去格鲁吉亚参加党代表会议。’我告诉弗季耶娃。‘我可以让他看一看列宁的手书，以便提醒他在格鲁吉亚照此精神行事。’十五分钟后弗季耶娃回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两所房子里。——作者）：‘无论如何不行。列宁说：‘加米涅夫马上就会拿给斯大林看，而斯大林必然搞腐朽的妥协和欺骗。’”（同上，第222页）

3月6日列宁写信给穆吉万、马哈拉泽等人说：“尊敬的同志们！我在专心致志地注视着你们的案子。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和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在为你们起草书信和讲话。敬启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30页）

这封信的副本不仅寄给托洛茨基，而且寄给加米涅夫。当感

到惊讶的托洛茨基询问，为什么列宁改变了对加米涅夫的看法时，弗季耶娃告诉他，列宁说："为了不落后，只好抢先一步发表"（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223页）。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他知道列宁强烈谴责捷尔任斯基调查组的不客观。所以斯大林又向格鲁吉亚派出了由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组成的新调查组。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刚到第比利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列宁再次严重中风。如果说在动身前加米涅夫还对倾向于列宁犹豫不决的话，那末现在他决定按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的精神行动。

列宁确实在加速行动。事态开始发生戏剧性转折。有时感到，列宁反对斯大林的"炸弹"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就要爆炸。党内悲剧到3月5日达到了高潮，列宁给斯大林写了如下一封信：

"给斯大林同志。绝密。亲启。

"抄送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把我妻子叫到电话前训斥一通。尽管她对您表示同意忘掉说过的东西，但这个事实已经她告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打算轻易地忘掉反对我的事，不用说，针对我妻子做的事我认为就是针对我的。所以我请您斟酌，您是否同意收回所说的话并道歉，或者您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列宁敬启"（《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9—330页）

列宁同斯大林断绝关系一事可能在党内产生轰动，但列宁最热忱的学生们却未必能明白他的动机，即一位性情怪僻，当然也是神经过敏的妇女的被污辱的感情要高于党的利益。许多人认为列宁的这一举动即使不是市侩习气的复发，也是"世袭贵族"骑士精神的再现（须知在乌里杨诺夫—列宁的出生证上，在爵位处写着"世袭贵族"！）。

托洛茨基也通过加米涅夫了解到了这封信。托洛茨基写道："加米涅夫通知我一个附带情况。他被叫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了一趟。她告诉他，弗拉基米尔口述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他若是不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他是永远不会断绝个人关系的。"（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223页）。

在3月6日的"日记"中沃洛季切娃写着：列宁请求把他的信"亲手交给斯大林并要回信……斯大林的回信在他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后立即就拿到了（信是由我亲自交给斯大林的，回信也是对我口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86页）

列宁没有来得及读斯大林的回信。就在3月6日当天，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是与上述全部情节不无关系的。3月10日第三次中风导致右半身瘫痪加重和失去说话能力。

斯大林是否确实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回信，如果属实，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凭文件已无法弄清。当"新反对派"领袖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告诉大会说，斯大林竟然没有给列宁回信时，斯大林没有宣读自己给列宁的回信，而是把列宁的姐姐乌里扬诺娃拉来作证。她向大会主席团说，斯大林确实给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写了致歉信（《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675页）。

既然需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见证人，那末为什么斯大林不要在场作为中央监委成员的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出来作证？列宁的官方注释者对这一问题没有作答。

现在再回到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托洛茨基不遵循列宁的号召合力推翻斯大林呢（列宁—托洛茨基联盟）？更不用说托洛茨基自己说过，斯大林是他的主要敌人，没有列宁的直接参

加他也能搞倒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回答表现了难以解释的政治上的倒运、策略上的无能、对待权力的外行和对党的机器的功能“秘密”惊人的无知。这个列宁是大脑、他本人是马达的革命仿佛阉割了他的“权力意志”。结果他成了革命家，却没变成权力大师。当然，在革命中他是巨人，而斯大林是矮子，但在当权后，巨人就变成了矮子，矮子变成了巨人。不，这样的巨人托洛茨基当然是无法推倒的。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想也不想这样做。

在前面引述过的同加米涅夫的淡话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列宁采取了反斯大林的全部步骤之后，对斯大林怎么办？托洛茨基公开反对列宁。他自己这样写着：“我向他（加米涅夫）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我说，人们往往出于对虚幻的危险的恐惧而招致真正的危险。请你注意并转告别人，我最不想为某些组织变动而在代表大会上挑起斗争。我主张保持现状……我反对搞掉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反对撤掉捷尔任斯基……不要搞阴谋。要搞诚实合作。”（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24页）

同斯大林“诚实合作”！

究竟为什么托洛茨基拒绝列宁建议联合反对斯大林呢？托洛茨基的回答，假若不正好是托洛茨基的回答的话，只能被看作是在政治上幼稚到极点的典型。请看他的回答：“‘列宁与托洛茨基联盟’的思想当时充分了解的只有列宁和我，其余政治局委员都是模糊猜测而已……我的举动会被理解为、解释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个人斗争。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的队伍道德堕落，为此，即使在胜利的时候，也不得不付出残酷的代价……党是否会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革命的前途在斗争，而不是托洛茨基为争夺生病的列宁

的位置在斗争呢？”（见托洛茨基上述著作第219—220页）

这算什么问题呀？

须知是列宁本人要求托洛茨基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提出对斯大林具有毁灭意义的文件的，这些关于格鲁吉亚事务的文件是列宁亲自签署的。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表现很难找到满意的解释，除非设想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绝对毫无了解，或者，可能那个美国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他说，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中的全部行为根本“不是英雄主义的”（乌拉姆：《布尔什维克》英文版第571页）。

就是曾在1922年12月23日写信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对她的污辱而对斯大林提出抗议的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对党和伊里奇的利益的珍视，我不在斯大林之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675页）现在，当列宁同斯大林断绝关系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来说服托洛茨基执行列宁的意志。美国的列宁传记作者斯捷凡·波索尼认为，可能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对托洛茨基的坚定性不太有把握之故（波索尼：《列宁》德文版第425页）。

所有这一切都对作为政治家的托洛茨基不利。另一方面，说他缺乏公民勇气却很困难。他有一个惊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挑起的每一场党内辩论都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就不恰当的问题、跟不恰当的盟友进行的。当时机十分有利（政治局发生危机）、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政治家的主要目标）、盟友又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人和领袖（列宁）时，托洛茨基却陷入哈姆雷特式的疑虑：党能不能理解呢？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临近了，列宁写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尽管“三人帮”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列宁的片纸只字传到代表大会，但有一件事还是漏了网并使“三人帮”措手不及。4月16

日，即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弗季耶娃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并抄送给托洛茨基。弗季耶娃在这封信中写着："我已告知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12月31日口授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他打算把这一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在最近一次发病前不久，他通知我，他将发表这篇文章，但不久他病了，也没有最后谈妥。弗·伊把自己的文章看作是指导性的并赋予它很大的意义。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这篇文章寄给了托洛茨基同志，弗·伊责成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维护这一问题的立场，因为他们两人在这件事上的观点相同。 弗季耶娃 列宁私人秘书 1923年4月16日。"（这里以及下边，都是从英文反译过来的）（沃尔夫：《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幽灵》英文版第277页，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附件的英文译本）从弗季耶娃给政治局的信中"三人帮"第一次获悉，列宁同托洛茨基保持着联系（"联盟"！），而托洛茨基向中央隐瞒了这一事实和列宁的文章。托洛茨基估计到事情可能发生怎样的转折，便决定迅速纠正局面。4月16日当天他给斯大林写了"给全体中央委员"的信。托洛茨基告知斯大林，他早在3月5日就收到了列宁的文章，写了抄件以便用于自己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还为了对斯大林在十二大上民族问题提纲作修改（斯大林已经接受了修改）。托洛茨基补充说："这篇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还包括对三名中央委员的强烈谴责。我回避透露这篇文章，是存有一丝希望：弗·伊会为代表大会作关于这篇文章的某些指示。如果中央委员中无人敢于把这篇文章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提交给党或者代表大会，那末我从自己方面将把这看作是应保持缄默的决定，这个决定——与党代表大会相联——将卸掉我对这篇文章的个人责任。"（同上，第270页）

政治局临时主席加米涅夫收到弗季耶娃附有列宁文章的信

后，简直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他把全部材料都送给了中央书记处，因为材料上“没有任何涉及我个人的东西”。但又顾及到托洛茨基可能顽强坚持（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和还活着的列宁，他又加了一句：“依我看，中央应立即做出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章的决定。”（同上，第378页）然而，与加米涅夫大相径庭，斯大林并未惊慌失措。他轻而易举地把“斯大林事件”变成了“托洛茨基事件”，而以在这类情况下最普通的手腕及时阻止了列宁文章的发表。他迫使弗季耶娃给他写了又一封涉及列宁文章的信。这封注明同一日期的信说：“斯大林同志！我今天同玛丽娅·伊里伊尼奇娜（列宁的姐姐。——作者）商量，我寄给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应否发表……据我看，我只应补充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把这篇文章当作是最后完成并准备发表的文章。　弗季耶娃　1923年4月16日　晚9时。”（同上，第278页）

斯大林在掌握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的信和特别是弗季耶娃的最后一封信之后，便发表了“致中央委员的声明”，声明中说：

“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竟然认为可以容许把列宁同志的文章——这些文章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並且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今年3月5日就收到了——变成个人秘密达一月之余，而不把文章内容报告给政治局或者中央全会，直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

“这些文章的题目，据大会代表告诉我，成了代表中辩论和传闻的对象；这些文章，据我今天听说，已为同中央毫不相干的人所知。中央委员自己要靠从流言和传闻中获得情报，这就显而易见，这些文章的内容应该首先告诉给全体中央委员。

“我想，列宁同志的文章应该在报刊上发表。”（同上，第

278—279页）

这样，在必须发表列宁文章的问题上斯大林附和了加米涅夫。不过，斯大林在信的末尾又增加了一条意见，这条意见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扫得一干二净。斯大林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只是很可惜——这从弗季耶娃的信中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文章显然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它们未经列宁同志审阅。"（同上，第279页）不论斯大林的道理多么明晰透彻，文章毕竟是列宁校订和签发的。中央委员要相信列宁的秘书胜过相信列宁本人才行。况且，任何人都没有试图检查一下列宁的签字，也没有试图检查一下斯大林是怎样搞到弗季耶娃的第二封信的。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最初甚至不想把列宁的文章（信件）呈报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更不用说发表了。只是由于列宁秘书处的直接干预，才迫使他们从向代表大会隐瞒这篇文章的最初决定后退。同一个弗季耶娃在二十大后写道："尽管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了解信的内容，也了解列宁关于必须在十二大上宣读这封信的指示，他们还是回避了在代表大会上宣读此信，所利用的一点是，列宁受健康状况限制，不能亲自干预此事。只是由于列宁秘书处正式写信谈了列宁意志的结果……斯大林才在党代表大会前夕，4月16日，从列宁的秘密档案里索取了这封信，从而，此信才向十二大代表团领导人作了宣读。"（《列宁是这样的人》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431页）

"代表团领导人"其实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已经背着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向他们吹了风。非常典型和非常重要的是弗季耶娃指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早就获悉了列宁信件（文章）的内容。而他们既能够获悉，大概就一定获悉了全部"遗嘱"。在"三人帮"未同托洛茨基算账之前，不正式了解"遗嘱"完全符合他们的打算。看来，托洛茨基只了解民族问题的文

章，却不了解组成“遗嘱”的全部信件，甚至也不了解列宁在12月24日写的必须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100人的第一封信，这封信送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向托洛茨基，而且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了隐瞒。只有这种不了解才能解释：在（1923年）二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象是出于个人之意提出在下次代表大会上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十二大上他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并未援引列宁），托洛茨基和李可夫则反对这一点（见关于十二大一章）。

回头来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一文的通信。托洛茨基猜度到，斯大林想“把贫穷变成美德”，一定会吹捧列宁的“重要文章”而指责托洛茨基把如此重要的东西向中央隐瞒。所以他决定再次作出解释并打消对他同列宁有秘密勾结（“联盟”！）的一切怀疑。

在代表大会开幕这一天，即4月17日，托洛茨基给全体中央委员一项声明，在声明中拒绝斯大林的指责，说，“列宁同志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我是作为密件给我个人的，而且列宁通过弗季耶娃同志断然拒绝我想把文章介绍给政治局委员的意图”。托洛茨基写道，如果有谁认为他做得不对，他可以提议把此事交给代表大会特别小组进行调查（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2—363页，1947年伦敦英文版）。

4月18日即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洛茨基要对他同列宁有“非法”联系的一切指责进行辩护的顽强精神如此之大，以致很难对此找出满意的解释。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揭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写道：“昨天您在同我个别谈话中说，在列宁同志文章一事中我没有任何不对之处，并说您要拟写一份书面声明说明此意。”托洛茨基指出，这样的声明他迄今尚未得到，他奉告斯大林，如果斯

大林变卦而不按诺言行事，那就只有把事情交到冲突委员会去“从头至尾进行调查”（同上，第363页）。

不言而喻，托洛茨基既未等到斯大林给他恢复名誉的书面声明，也未等到成立委员会调查斯大林对他的指控。而斯大林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表明托洛茨基是不诚实的中央委员，并且是同生病中的列宁暗中勾结的人。这正是托洛茨基所害怕的，如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说，“惊慌失措”的他转向威胁……用冲突委员会相威胁（见乌拉姆上述著作第573页）。

对于这一切，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说：“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266页）①托洛茨基在援引斯大林讲话的这一处时说：“这番话无疑是斯大林极端诡诈的典范”，因为斯大林非常了解，列宁是多么愤怒地痛斥过他的民族政策，只是由于“导师”的致命之症才避免了如此“忠实的”学生的政治死亡。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5页。——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列宁生前未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列宁生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举行。出于对列宁参加代表大会的巨大期望，1923年1月11日政治局确定他为中央政治报告的报告人。但外国的和俄国的医学专家对这样的可能性颇无把握。列宁越发加紧给代表大会写书信、给《真理报》写指示性文章，这些文章每次都要有政治局的专门许可才能发表。列宁尽量想通过《真理报》编辑布哈林和在该报编辑部工作的姐姐玛丽娅·乌里杨诺娃的协助避开政治局的检查，但几乎从来没有奏效过。最重要的文件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和《论自治化》，前者列宁是写给十二大的，后者是为了在十二大前夕发表的。这两份文件的历史和宗旨竟然被那些揭露过斯大林的人加以歪曲。作为歪曲基础的是斯大林本人所杜撰的神话。这些神话是斯大林伙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却背着其他中央委员，包括背着托洛茨基偷偷编造的。直接参与制造斯大林神话和对十二大隐瞒《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有列宁周围的三个女人：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姐姐乌里杨诺娃和列宁秘书处主任弗季耶娃。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建筑在列宁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斯大林的俘虏的被迫而又不足信的供词上的斯大林神话，竟然成了西方历史学家有关《给代表大会的信》的非批判性著作的基础。让我们来依次分析这些神话：

1. 《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名称是当时的斯大林机关想出来的，为的是说，列宁的这封信只是写给他死后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而并不是给特定的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为了支持这一离奇说法，列宁秘书处的《日记》被篡改了。那里面根本没说，列宁写这封信正是为了在十二大上宣读的。而列宁的信一开头就写道："我恳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若干改变。"（《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43页）显然，这并非是笼统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而是"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2．所以，既然列宁是写给两个半月之后才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的，那末斯大林从列宁的秘书沃洛季切娃那里事后拿到的——1929年——声明就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沃洛季切娃"证明"说，列宁请她在信封上签字，信封里装的是"给代表大会的信"，拆封的只能是列宁，而在列宁死后则由克鲁普斯卡娅拆封，但她拒绝写"列宁死后"几个字（同上，第593页）。指定写给1923年4月十二大的信，只能在列宁死后才拆开，怎么会是这样呢？

3．然而，奇怪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即使在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死后也没有拆看列宁的"信"，只是经过四个月后即1924年5月18日才拆开（同上，第594页）；在列宁去世后的头几天里克鲁普斯卡娅顾不上"信"，这在心理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在俄国也有类似的历史：亚历山大一世的"遗嘱"过迟拆封一事被阴谋家利用来掀起1825年12月14日的悲剧性军事革命），但怎么能够在列宁去世后四个月期间不把重要文件交给中央呢？

4．列宁逝世那一天，托洛茨基正在高加索治病。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列宁安葬国家委员会（列宁曾想亲自在政治上埋葬捷尔任斯基），另一个是中央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的"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而列宁的全部最后"文件"都是反斯大林的。

后一个委员会接收了哪些列宁“文件”呢？当然是全部：不论政治性的还是家庭的、漆封的还是敞口的、委托给列宁秘书处的还是甚至委托给克鲁普斯卡娅的——对于党，个人的列宁是不存在的，因此，列宁的全部文件都是党的文件，其中当然首先包括“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况且《给代表大会的信》，据沃洛季切娃证实，共复制了五份：一份是给列宁个人的，第二份给他的秘书处，另三份给克鲁普斯卡娅（同上，第592页）。极而言之，列宁个人档案中的一份和列宁秘书处档案中的一份怎么可能被委员会放过呢？委员会接收的如果不是已故者全部文件中的这份最重要的文件——给党的“遗嘱”，又会是什么列宁文件呢？连托洛茨基也当真想，“遗嘱”不为任何人所知，就是说，也不为斯大林所知（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9页）。假如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这种设想哪怕有一点正确性，那末这也只能意味着一点：对斯大林的密探本领和刑事犯的思维方式绝对无知。其实，这种无知的肉体的牺牲者恰恰是托洛茨基。斯大林——中央政治局指定监视患病的列宁的合法全权代表，斯大林——哪怕只凭列宁3月5日断绝个人关系的信和强烈谴责斯大林政策的民族问题文章这两份文件就十分清楚地知道，列宁在准备打击他，斯大林——有列宁的秘书，其中包括他本人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为之跑腿，这样一个斯大林会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是难以设想的。斯大林是知道的，但他需要时间。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列宁的“信”转交到十二大上去——这是斯大林的目的。既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与此利害相关，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因为，在政治局委员中，还在侨居国外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正如是列宁的一样）最亲密的朋友，而加米涅夫又是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临时主席，所以斯大林通过他们就能很容易地说服克鲁普斯卡娅不把

列宁的“信”交给十二大。不止于此。斯大林亲自把“给十二大的信”改名为“给十三大的信”。当1927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体会议上承认，他们同斯大林一道向十二大隐瞒了列宁“给十二大的信”时，斯大林不仅违背事实，而且违背一切逻辑地宣称：“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3页）①即将召开十二大，可列宁却写给十三大！

就在十三大的前夕，斯大林的机关炮制了所谓“克鲁普斯卡娅移交列宁信件的证明书”。证明书注明是1924年5月18日。这上面有伪造的明显印记。在证明书中克鲁普斯卡娅记述：“兹由我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23日到1月23日患病期间所口授的信件……在尚未公布的信件中有1922年12月24—25日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信，这些信件中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的个人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定表示，希望他的这封信**在他死后**呈报给**下一次党代表大会**。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94页）

在列宁“遗嘱”的任何一篇、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字谈到要在“他死后”移交这些信，也没有一个字谈到要把这些信在死后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但却如我们所见，“遗嘱”一开头就说，列宁预先指定这些信给“这次代表大会”，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去世前九个月召开的。

对于这一切应该说，列宁虽然身患重病，但还不老（他只有五十二岁），没有死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写任何临终“遗嘱”。连医生也对他恢复健康抱有同样的希望。所以加米涅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译者注

夫才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各国医学科学的最优秀代表都会聚在这里……他们对我们说：列宁患的确实是难治之症，但绝不是不治之症……危险目前是没有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4月17—25日"1923年俄文版第1页）是的，列宁又在健康状况忽好忽坏的情况下活了九个月。而"三人帮"不仅背着中央委员，而且背着政治局委员把列宁"给十二大的信"暗中收藏了几乎半年之久。

就这样，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给十二大的信"到达自己的收信地点。从斯大林方面还采取了补充措施，以便使代表大会的人员组成即使不是反列宁的，至少也是反托洛茨基而亲斯大林的。"三人帮"的成员——季诺维也夫牢牢掌握着列宁格勒，加米涅夫被认为是莫斯科的主人（他同时兼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正如季诺维也夫同时兼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一样）。再远一点，往各个省，他们是不管的。独统各省的是"总书记"。各省实际上构成了例行代表大会代表的绝对多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里占多数，而代表大会由组织局和书记处组织，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全部大权都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后面我们将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控告斯大林，说他通过这两个机关篡夺了政治局的权力）。斯大林通过组织局和书记处筹备十二大，所采用的方法还是列宁的老方法，在筹备十一大时他遵循的就是这种方法，那时他还不是总书记。米高扬1970年在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向我们讲述了这种筹备技术。米高扬写道："1922年1月初，我被紧急召回中央（当时米高扬任下诺夫戈罗德省党委第一书记。——作者）。我到达后，中央有人告诉我，斯大林要见我……斯大林说，他是受列宁的委托召我来的。话题是关于党的十一大的筹备工作……我们非常关注，哪些代表将来参加代表大会，他们之中是否有许多前托洛茨基分子。须知

在省代表会议上，现在将只凭个人品质选举代表。而在负责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且又在自己的组织中受到信任。他们在西伯利亚各省中尤其居多。所以我们担心的正是，从西伯利亚可能来许多托洛茨基派代表。因此，列宁责成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您，如果您同意的话，就请您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城）拉舍维奇那里跑一趟（拉舍维奇是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央西伯利亚局成员。——作者）并以列宁的名义向他转告我在这里对您所说的一切……谈话时斯大林非常安详，总之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刚要走，列宁突然走进来了。他打了招呼，笑眯眯地看着斯大林和我，开玩笑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在讨论高加索分歧吗？'斯大林回答，他向我转告了他们商量好的一切。"（《青春》杂志1970年第4期第53页）米高扬大概没有想到，他在揭开这个"秘密"时，把列宁也描绘成了同斯大林一样不诚实的人，因为托洛茨基不仅是列宁在政治局里的同事，而且，据斯大林自己证实，就在1922年列宁建议托洛茨基作他的第一副手。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重要的是列宁如何教给斯大林筹备党代表大会。重要的是，十二大的筹备同十一大一样是借助于同一技术。现在，在十二大前夕，列宁徒然地求助于托洛茨基，毫无结果地试图把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分开，为使哪怕自己的信能到达十二大而作绝望的努力，而斯大林则按列宁的方式阻住了列宁通往十二大的道路。这真个是："谁呼风，谁遭暴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代表大会准备停当、代表经过仔细筛选之后，第二大问题就是确定中央政治报告的报告人选了，这个报告自建党之日起，尤其在当政后，一向是由列宁亲自作的。根据由谁在十二大上作这个报告，应能判断出，谁是不久于人世的列宁的继承人。如果报告人将据他在国内的名望来确定，那他就应该是托洛茨基，如

果报告人将据法律上的表征来确定，那他要么应该是政治局临时主席加米涅夫，要么应该是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但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断然拒绝，加米涅夫态度不明，而季诺维也夫则要求委托他来作政治报告。请看托洛茨基是如何叙述指定政治报告人选的历史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业已临近。列宁参加的希望几乎不复存在。这就产生了由谁宣读基础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由托洛茨基。'当即支持他的有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他显然是违心的。我反对。如果我们之中有谁企图单独取代患病的列宁，党会觉得不痛快。我们这次可以不要开场政治报告……季诺维也夫在高加索休假。问题悬而未决。季诺维也夫回来了。季诺维也夫要求把政治报告给他自己。加米涅夫一再询问多数脱党十年到十五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难道我们让托洛茨基当党和国家的单独领导？'……'三人帮'决定，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作。我没有表示反对……"（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27——228页）

这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写的。十年之后，在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手中的斯大林之斧没有让他写完这部书——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叙述作了实质性修改：当斯大林说，政治报告应该由托洛茨基作时，托洛茨基拒绝作这个报告，但建议道："我们期待列宁很快康复，与此同时，按职务，报告应由中央总书记做。这样任何投机的基础就都消除了……我继续坚持让斯大林做报告，'无论如何不行，党不会理解这一点。报告应由最德高望重的中央委员来做。'他故作谦虚地回答。"（托洛茨基：《斯大林》伦敦英文版第366页）

斯大林在提议让托洛茨基做报告时，是否出于诚意，尚难断言，但托洛茨基拒绝做报告并建议让总书记自己做这一报告，想必是有目的的，如果不是给"三人帮"制造不和，就是要阻止公

开要作列宁继承人的人——季诺维也夫。另一方面，斯大林显然想让“非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同共产国际的领袖和列宁在国外的多年助手季诺维也夫相互对立，以便防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可能结盟。然而，一向对“三人帮”和斯大林耿耿于怀的托洛茨基，竟然在斯大林背叛“三人帮”并提议让他做报告时，却执意不肯同意，仅仅是为了不让党以为他想要当列宁的继承人！这哪里有治国头脑、政治胆略或者即使是尼采主义的“权力欲”呢？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5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7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386,000名党员。

十二大议程如下：

1、中央政治报告——季诺维也夫，中央组织报告——斯大林。

2、检查委员会报告——诺根。

3、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什基里亚托夫。

4、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处的报告——布哈林。

5、关于工业——托洛茨基。

6、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斯大林。

7、农村税收政策——加米涅夫（补充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加里宁）。

8、关于区域划分——李可夫。

9、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选出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进入主席团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多数中央委员，其中包括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参加了接纳申诉委员会。

加米涅夫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词。

从议程中看到，除患病的列宁和托姆斯基外，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报告人，但“三人帮”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大会开幕式（加米涅夫）、中央政治报告（季诺维也夫）、中央组织报告（斯大林）、农村税收政策（加米涅夫）、大会闭幕式（季诺维也夫）。还有一个报告使斯大林得到补偿，这就是民族问题报告，也正是列宁想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借以把他打倒的问题。这个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实表明，“三人帮”在拚命保护斯大林而反对列宁方面，走得何等的远。中央批准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不顾列宁的意志，维护奥尔忠尼启则的立场，赞成捷尔任斯基调查组的结论并谴责“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穆吉万、马哈拉泽等人）。

在简短、但却庄重的开幕词中加米涅夫虽然给了不在场的列宁以应有的颂扬，指出列宁既不了解议程，也不了解大会决议草案，但却说了从列宁“遗嘱”角度看是明显的假话：“虽然他本人不在这里，但事实他在思想上领导着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他以号召党的团结一致而结束了讲话（《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俄文版第3页）。讲话受到了鼓掌欢迎。当大会主席加米涅夫说，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中央总结报告时，没有一只手动一下以表示鼓掌之意。会场内顿时呈现出一片互相观望的可怕寂静。不太公道的托洛茨基以为，代表大会的警觉表示是要让季诺维也夫知道，他不是列宁权力的篡夺者，也是列宁特权的篡夺者，至于鼓掌，那是小“盟友”斯大林暗中安排的，他掌握着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一向要给大会发信号：应当在什么时候、给谁鼓多少掌。斯大林和主席团没有发出信号，所以场内噤若寒蝉。

季诺维也夫反应得相当快，他立即声明，他不能代替列宁，也没有这样的奢望。他说，代表大会必须“工作得比以前更加认真，

以前这个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都由列宁替我们做了。我们不得不用集体之作来代替列宁的指示”（同上，第6页）。接着季诺维也夫说，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宣称退却已经结束。中央履行了这一诺言，现在不再有退却，而是准备进攻。季诺维也夫援引列宁的话证明，不排除有开始“第二阶段”世界大战的可能。但苏联需要和平以恢复经济，也就是说要准备“第二阶段”。所以，“我们的战略很简单：如果不得不干预，那也要尽量地晚”（同上，第13页）。革命的后备军和苏联的盟友是被协约国战败的国家（德国！）和革命的东方，尤其是中国。报告人认为同美国接近有很大意义，但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尤茨的讲话，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尤茨对苏联的世界革命论有可嘉的了解。“他用了许多引语：去年十一月，罪孽深重的我说什么，‘在俄国革命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它是世界革命的发端’。他然后指责列宁同志，说他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声称，世界革命的景况很好并将更好。但尤茨更加怒气冲冲地引证托洛茨基的讲话，他声称，世界革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洲总有一天必将到来。”（同上，第16页）世界革命的三位权威：第一名是季诺维也夫，第二名是列宁，第三名是托洛茨基，尽管后者不知为什么比前两者质量要更好。对外贸易垄断制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尽管正是季诺维也夫甚至在列宁提出抗议后还是政治局中唯一主张取消的人）。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句话是颇有特色的：“让他们（资产阶级）进行愚蠢的议论好了，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象在别的问题上一样有左、右、中”（同上，第17页）。季诺维也夫建议扩大粮食出口。我们暂时出口了二千万（普特？①），战前仅俄罗斯南部就一年出口四亿（普特）（同上，第21页）。季诺维也夫提醒不要因为

① 原文无计量单位，疑为普特。——译者注

贸易而忘了，'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目的在于最终组织世界革命。他说，1917年领导阶级要夺取政权，1918—1919年——组织红军反对白匪，1921年——援助农民，1923年领导阶级要求组织粮食出口，而在1930年领导权可能表现在，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将同外国工人并肩战斗在欧洲各首都的大街上。"（同上，第24页）

在国内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总的经济结果仍然是不能令人欣慰的：农业在1922年只达到战前收成的四分之三，工业——战前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对外贸易——战前平衡的百分之十四，生产率——百分之六十，工资——百分之五十（同上，第25页）。但新经济政策的最近几年就会打破所有战前指标，从而迫使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尤其在富裕农民即最勤奋的农民面前陷入狼狈境地。但这时季诺维也夫在同一个报告中说："是的，我们不但要'侧身'于农民及其经济要求方面，还要鞠躬施礼，如果需要的话，就得在农民的经济要求面前跪下磕头。"（同上，第37页）

在民族问题上，季诺维也夫所谈的同中央决定和斯大林方针明显矛盾。他说："我们不应允许，也不能允许对'大国主义'观点作丝毫让步或者从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学说作丝毫退却。"（同上，第38页）

在无神论宣传问题上要小心谨慎（这是西方对苏联搞宗教迫害的强烈反应的影响结果）。

从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禁忌观点来看，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里提出的提纲中、在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和在就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报告所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都犯了极大错误。斯大林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报告之后的报告中，都不曾纠正季诺维也夫的错误，但在两个月后却利用季诺维也夫的这一错误反对季诺维也夫。他的策略错误表现如下：季诺维也夫开始发

挥和阐述的口号是，在苏联实行“党独裁”。季诺维也夫提到：“我们有些同志说：‘党独裁——正在这么做，却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不说？这种羞怯态度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不该说出本来有而又不能掩藏的东西呢？”（同上，第41页）季诺维也夫建议在党内各级、在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一切领域都实行这种“党独裁”。1923年出版的代表大会记录指出，季诺维也夫博得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同上，第47页），但令人极其莫名其妙的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出席十二大，却能修改大会记录：在1968年再版的代表大会记录中说，季诺维也夫只博得了一般“掌声”（《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8年俄文版第53页）。

斯大林的组织报告比季诺维也夫的洋洋万言、内容空洞的报告略胜一筹的是，他不仅头一次阐述了鲜明的权力概念，而且阐述了在独裁体制中党的机关高于一切的理论根据。

斯大林早在代表大会之前为党的机关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一）把党内反对派从党以及国家和工会机关中清洗出去；（二）在国家机关中采取警察—契卡行动，以便揪出前白卫分子、前反共党派的成员和支持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民族主义分子、保皇分子，等等；（三）把重建的党机关到处都置于国家机关之上，如在莫斯科党中央机关就把自己置于政府机关之上（我们看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这样做）。但是，他阐明《怎么办？》的新理论，即怎样把党的机关置于国家之上、置于党本身之上，这在十二大上却是第一次。代表们看到（并同情），斯大林是如何阐明自己的组织实践的——创建新的“党中之党”、在有军事纪律和军事上下级关系的严格等级原则上创建职业的党内官僚集团（后来斯大林甚至就此使用了军事术语：在1937年3月中央全会上他说，党的工作者由三大兵团组成：党的下级军官兵

团、党的军官兵团和党的将军级兵团）。斯大林在十二大报告中关于选拔和配备党的机关人员的原则的有关段落如下：

"你们中间未必有人会说，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现在……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党的领导作用就不仅应当表现在发指示上，还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俄文版第56—57页）①。

我们已经引证了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的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列宁确乎把它翻转了过来，把民主的俄国变成了苏维埃俄国。这一思想也是斯大林关于把苏维埃俄国变成斯大林俄国的途径与方法的新理论的基本思想。"给我一个党机关权势分子的组织，我就能把苏维埃俄国翻转过来。"——这就是斯大林权力理论的构思。但"机关权势分子"一词本身一直受到禁止。斯大林只说"党的工作者"或者"党的积极分子"。在斯大林生前，《真理报》对斯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7页。——译者注

大林的权力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斯大林同志指出，只要善于使用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能形成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1952年7月25日《真理报》）

斯大林亲自解释过，他的新理论、他的个人独裁从何而来。他说："中央遵循列宁的天才思想是，在组织工作中的主要东西——选拔人材和检查执行。"（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479页）斯大林在被委任为中央总书记后不到一年，就不仅重建了党的机关，而且把党机关权势分子大军置于国家机关之上。

例如，在国家机关中如何搞清洗，斯大林向十二大报告说："我们有一个名叫工业局的机关。这个机关是在东南部。这个机关大约有两千个工作人员，负责领导东南部的工业。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失望地对我说，领导这个机关可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伏罗希洛夫、埃斯蒙特和米高扬这几个好人，他们把这个机关彻底地整顿了一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俄文版第55页）①

"这几个好人"在审查了两千个工作人员之后只留下了一百七十个"社会地位接近"和"忠诚"的人，而其余的人一律被清洗了出去。还根据斯大林在十二大上宣布的三点要求进行了新的招收人员的工作。到处如此。

诚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据斯大林报告可知，也有反对中央机关篡夺各民族共和国"主权"、自上而下搞清洗的批评声音。列宁的格鲁吉亚学生对党机关权势分子专政的抗议尤其强烈，他们证明，斯大林不仅对非党人士，而且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实行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方法是违背列宁学说的。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9—170页。——译者注

斯大林阐述了把苏维埃从国家权力机关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属机关的纲领。党的机关对苏维埃权力的篡夺是不知不觉地、表面上完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的。在各级苏维埃成立了所谓“党组”（村、区、市、州、边区、中央），这些“党组”直接从属于各级党机关。这些共产党党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由它们选出的执行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里，对有非党人士参加的苏维埃机关所要研究的问题，都毫无例外地事先作了商讨和决定。“党组”这样通过的并由相应党委会批准的决定再交由苏维埃机关作形式上的批准。今天这种制度在苏联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当苏维埃在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下当权时，党机关权势分子对苏维埃——人民议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权力的恣意篡夺简直是亵渎行为（现在“共产党组”已改名为“党组”）。

斯大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利用列宁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加强了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并且利用得如此巧妙，同时给自己的各个盟友以隐蔽而又极其沉重的打击。事情是这样的。在作中央组织报告时，斯大林仿佛是顺便说了一句，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或者如他所说，是某种“领导术士”集团。这些“术士”把大权垄断在自己手里，但，如斯大林所说，他们“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为了不致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一条出路——靠地方党的官员来扩充中央委员的数量。只字未提这是列宁的主意，但却明确指出，中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未能做出赞许的决定，甚至一些中央委员不但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而且还主张裁减（托洛茨基就这样建议），而他，斯大林，认为，中央应当扩大，吸收一些“能独立思考的人”！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的可悲盟友哑巴吃黄连似地吞下了斯大林的苦丸，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斯大林关于“术士”

的话不干他们的事，而是指一名“术士”，这名“术士”就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讲话中的这一处，是对竞争者进行迂回打击战术的精湛绝技，也是对不久人世的列宁的政治“遗嘱”进行伪装歪曲的高妙之作。斯大林说：“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我简单地说一下应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理由。目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二十七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某种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某些中央委员，比如说，十五人的核心很有经验，很有才干，在拟定指示时十有九次不犯错误，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末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其次，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插一句：这个‘核心’里年龄最大的两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只有四十三岁。——作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现在是

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同上，第60—61页）①

这是对那些一心想钻入党的“最高法院”——斯大林曾这样称呼中央委员会——的“党的各级书记”的直接歌颂。

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诺根在上次代表大会上还激烈批评了中央机关，如今在斯大林面前则认为这个机关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他向代表大会报告委员会的结论说，中央书记处现在工作得比过去好得多，这就“促成了更正确的劳动分工，在各个部和分部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还巩固和发展了机关同地方的联系，使它能更迅速更充分地考虑各个党组织的广泛经验和更正确地对生活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同上，第74页）。由此可见，党的机关已经变为何等独立自主的力量了。

就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报告所进行的讨论中有意思的是代表们对这两个人报告内容的反应和对他们在权力塔上位置的评价。科西奥尔称斯大林的报告比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要“周密”，但他对两者都进行了指责，说他们在党内建立了不能容忍任何批评的气氛。科西奥尔说，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在喀琅施塔得和党内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而现在既没有喀琅施塔得，也没有党内危机，可“这项决议变成了我们党的管理制度……季诺维也夫亲自证实，在党内一切集团都要消亡，——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个非常的法规？不过，同志们，要知道这确是一个非常的法规（笑声、嘈杂声）。非常的法规上升为党的管理制度。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党内的集体意见。但（在这种法规下）怎么可能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有集体意见呢？任何三至六名党员的集体意见都会被视为搞派别并被诉诸这一法规……只有当我们改变选拔我党领导机关的制度和方法时，列宁同志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中所说的真正统一和防止党发生个人磨擦和受个人影响才有可能。”（同上，第95页）

拉林只批评了季诺维也夫一人，因为他以党的英明为借口替错误政策辩护。就此，他提到自己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俄国共产党历史”：“我写过：俄国共产党从来不犯错误，俄国共产党永远正确，俄国共产党有最大的天才、智慧和意志。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委员会具有这样的特质，而在中央各次全会之间这些特质属于政治局。”

如果季诺维也夫在中央政策中找不出任何缺点，“那末他这样做是因为医学教育有缺点：得了‘花柳病’宁肯隐瞒，也比治疗好”（同上，第103—104页）。

老工人布尔什维克卢托维诺夫说，“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使我灰心丧气。坦率地说，我本人并没有期待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会有多少新东西，但毕竟闪着微弱的希望火花，但愿季诺维也夫同志能接近于解决令我们大家深为忧虑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说，集团已经没有了，但它们被赶到了地下……中央象鸵鸟一样把头藏进沙堆……如果出现了匿名提纲，这只是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可能通过正当途经谈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试图批评的不是政治路线，而是这条路线的纯实际贯彻情况，你马上就会被打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随便什么人。我们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中听出了这一点，我记下了他的下面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批评，哪怕是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孟什维克的批评’……只有政治局才是无罪的牧师……不能反对，谁都无权进行任何批评。这种状况不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极端有害的。”（同上，第105页至

106页）

代表别林基简单地反驳了这些发言者，他说："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路线，是我们自1903年以来整个政策的继续。"（同上，第108页）

列宁的老战友、几届经济问题人民委员、铁路工程师克拉辛的发言是对一心想当列宁接班人的季诺维也夫的沉重打击。克拉辛说，季诺维也夫作为出色的鼓动家和雄辩家在党内颇负盛名，但"他的这些特长反映在政治报告中却有几分不利"。党内的规矩是，就连人民委员都不能走上代表大会的讲坛公开谈出自己的意见。季诺维也夫认为，"一切应当照旧"，但照旧是不行的，"不行是因为，这个旧的最重要分子——列宁在相当长时期不能工作……当有人对我说，不管三人集体还是五人集体代替列宁同志，我们都会一切照旧的，我说：不，只要列宁不重新掌握国家航船的舵轮，就不会照旧……在代议制语汇中，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指责我是孟什维主义这一点，除了丧心病狂的恶意诽谤外，我找不出其他词语来表达"。在克拉辛看来，对季诺维也夫报告的总的估价应该这样表述："不能不承认，这个或那个都不会太好，但同时要承认，许多东西进展得还很好。"（同上，第114—115页）

克拉辛还批评了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因为那里没有提出苏维埃对外政策在新条件下的基本任务。克拉辛的讲话博得了掌声。

奥新斯基在发言一开头就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打成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答这种指控的话，他说，那末"我宁愿同意只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眼里当路标派、自由派、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杀害了自己亲丈母娘的家伙（众笑）"（同上，第119页）。

从奥新斯基的进一步发言中得知，“三人帮”怀疑他想把“三人帮”全部开除出政治局。这个建议是在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匿名纲领中提出来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从前属于“民集派”，如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和“工人反对派”（《工人真理报》派）。对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奥新斯基是区别对待的，但对季诺维也夫，他认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奥新斯基说：“季诺维也夫同志拚命要把匿名纲领拴在我身上，就象淘气的孩子要把罐头盒子拴在猫尾巴上一样。季诺维也夫同志还竭力要把我拴在那个要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挤出中央的不高明的建议上。”奥新斯基说，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是需要的，但对于季诺维也夫他则想，斯大林关于摆脱党的“术士”和党内将军的评语，正好指的是季诺维也夫，“我们有一系列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同上，第122页）。

奥新斯基最后说，“斯大林同志的报告十分令人高兴”，他期待斯大林关于要从地方上吸收“有独立思考头脑”的人进中央的计划能得到“实际贯彻”，但“遗憾的是，实际做的同说的总是不同，可能现在也不同”（同上，第122页）。

卡尔·拉狄克不很有把握、可能也不很真诚地反驳了科西奥尔。他驳斥了说政治局内实行集团政策的指控。如果对工作人员进行调动和撤换，这并不意味着追求集团目的。拉狄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据：“这只消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在党的历史上斯大林曾多少次对反对他的决定不满意，或者托洛茨基，或者奥尔忠尼启则，但没有人在头脑中闪出过这样的念头，中央是按集团利益行事的。”（同上，第123页）拉狄克还努力驳斥卢托维诺夫的批评，理由是，匿名纲领的作者们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如果他们公开站出来，他们的“纲领就可能发表，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党的”。拉狄克说，卢托维诺夫要求的不是批评自由，而是“报销

批评家们四处奔走的开支”。拉狄克跟季诺维也夫一样，批评了克拉辛在代表大会前夕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如下提法：“严加考验的政治路线不应当妨碍国家政权恢复生产……应当使在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里的生产者和实业家——当然是党的生产者和实业家——至少具有同报界人士、文学家和纯政治家一样的同等权威。”（同上，第113页）克拉辛所说的“报界人士”和“文学家”首先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那个拉狄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也在其中。但勃然大怒的季诺维也夫还在自己的报告中就回敬了克拉辛：“须知劳埃德·乔治①也不是农艺师。普安卡列②也不是筑路工程师，所以，可见，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治领袖也不是什么罪过。”（同上，第43页）拉狄克还为季诺维也夫的论据作了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一样，作为经营管理人员并不比克拉辛差，因为他们领导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同上，第124页）。拉狄克宣扬，“中央没有一位同志——这指政治路线——不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观点的”（同上，第126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季诺维也夫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但认为他对经济政策和经济任务的分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他也维护政治家季诺维也夫而反对经济家克拉辛。关于斯大林报告他说：“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是内容极其丰富的，我要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报告。”但他批评了中央“推荐省党委书记”的作法。如果“推荐”书记的作法（即实际上由上面指派）变成制度，那末这些书记要想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就得不到地方组织的支持了（同上，第133页）。

---

① 劳埃德·乔治·戴维（1863—1945）是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译者注

② 雷蒙·普安卡列（1860—1934）是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译者注

索林对中央提出责备说，它已经把大约三万名其他党的退党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接收到党内，而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仅有一万人左右。索林也不同意科西奥尔的如下说法："我们要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建立'壁垒'，使它同在我们中央进行工作的那个主要集团对垒。"索林说，科西奥尔所提的"壁垒""不是别的，正是你们想加进中央的楔子"（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曾建议以在中央之上的党的"会议"形式建立这种"壁垒"，但被中央否决了，因为它违背单一中心原则）。索林说，尽管科西奥尔没有同意匿名集团要开除"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出中央的要求，但他还是同意开除他们之中的一个（季诺维也夫）。

在对斯大林提出的需要用地方上"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充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表示同意之后，索林指出，他们毕竟"不能独立于"身居中央领导地位的"那层人"。他对斯大林唯一的反对意见是，中央委员会不是管理学校，而是"领导和指挥机关"，它只在"第十位"上才是学校（同上，第136页）。

"三人帮"感到，即使他们路线的最忠实的捍卫者也未能在代表大会上削弱科西奥尔、卢托维诺夫、克拉辛、拉林、奥新斯基发言所留下的印象，于是便放出加米涅夫登上讲台。加米涅夫只部分地满足了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首先他承认，"我们知道，我们被指控为了任意目标——这在匿名纲领中和在绝非匿名的讲话中说过，——党的政策不是为了一定的思想由我们所左右，而是由这样或那样集团的诡计所左右……"（同上，第139页）加米涅夫力图推翻这种指责，但他未能成功。他借助一个论据来证明"三人帮"（政治局）政策的正确："目前在这个政治局里集中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委托，而在你们那里（指中央的批评者们。——作者）只有统计学的委托。"（同上，第141页）加米涅夫引述

道，“奥新斯基同志说：政治局害怕把关键人物安置到人民委员会里去，免得他们吃掉政治局”。但是，加米涅夫说，在匿名纲领中也说了同样的话。加米涅夫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批评者们做结论说：“同我们异己的阶级的自发势力正在把你们变成自己的工具！”加米涅夫说：“我们从奥新斯基和克拉辛身上就能判断在这个大厅之外的情绪。如果不从我们同季诺维也夫想还是不想让谁把我们吃掉的观点来深入了解这件事，而是从思想原则的观点来深入了解这件事”，那末克拉辛、奥新斯基和其他批评者简直就是偏激分子，“这个大厅之外的情绪”即“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影响着他们。克拉辛说过，“人民委员害怕在这里讲话”，他是代表“那些在过道里才说话的人民委员”讲话的。对于克拉辛的这种说法，加米涅夫说：克拉辛发表了“大胆的、出色的讲话，它是那些在我们的全部政策中只理解和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同志的政治宣言”（同上，第142—143页）。加米涅夫说，批评者们想让“国家机关来治理国家”，而党搞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鼓动和宣传。“不，同志们！我们要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加米涅夫补充说。

加米涅夫宣读了匿名纲领中的一段，关于这个纲领，季诺维也夫也说了许多。加米涅夫：“这个纲领说：‘我们呼吁一切集合在民主集中派周围和《工人真理报》周围的诚实的无产阶级分子及接近工人反对派的分子，无论在党内的还是在党外的，都在‘俄国共产党工人派’宣言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援引这一段后，加米涅夫故作愤怒地问：“为什么不呼吁集合在中央周围的诚实的工人分子？”加米涅夫对前“民集派”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说：“你们所采取的政治步骤给了我们的阶级敌人以权利，把你们纳入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区。”（同上，第145页）当后来斯大林用这些同样的论据来对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时，他

们也被“歪曲事实”而深深地激怒了。

格鲁吉亚问题不仅在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而且在中央报告的讨论中都占有显著地位。第一个发言的是穆吉万，他是斯大林通过组织局从格鲁吉亚召来的，并被宣布为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而列宁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为他平反。对问题的历史和有关文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是知道的。代表大会以很大兴趣听取了格鲁吉亚“倾向分子”的发言。不过“倾向分子”要比那些指责他们的人表现得更有分寸和更为克制。穆吉万一开始就说，大问题要由大人物去谈，而他，一个外省乡巴佬，只适于谈“在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很小一块苏维埃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他说，无论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它在外高加索的机关——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经常表现动摇：忽而建议外高加索搞经济联合，忽而建议搞联邦，然后又否定联邦而建议搞“自治化”，这样的迭次更换还表现在对工作人员的不断召来召去、撤来撤去、调来调去方面。穆吉万说：“我作为老党员承认并认为这一切都是需要的，我甚至为这样的调动而祝贺，如果是需要的话。但是，组织局的同志们，政治局的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应当记住，——对此我已在政治局里谈过，——你们把一位同志从坦波夫省调往奥尔洛夫省，这是一回事，而从格鲁吉亚调往莫斯科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这是需要的，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是不能反对的……就个人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里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但非党群众对待这些调动的态度又是另一回事，斯大林同志又是这样热中于为他们寻找传动皮带。这样的调动总是被看成俄罗斯部分对该民族的惩罚（台下喊：‘不对！’）。只有在那里干错事的人才能说‘不对’。”（同上，第150—151页）按会议规则穆吉万可以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但当他大概还未讲上五分钟（在速记记录中他只讲了一页半），大会主持者（鲁

祖塔克）就阻止了他：“您的时间完了。”穆吉万：“请允许再讲三分钟。”场内喊：“请讲。”

穆吉万说，即使根据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调查组的结论，对“倾向分子”的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民族政策是对的。穆吉万说：“现在我们处在这样的阶段，即在中央那里，这一政策得到了确认，而且这会儿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也得到了承认……可现在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政策是一个，而人是另外一些。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同志，给您提个问题：政策为了人，还是按政策挑选人？”（斯大林同意赞成“倾向分子”的政策，但不同意把他们从莫斯科调回格鲁吉亚。——作者）穆吉万最后的问题是：“您的民族政策在哪儿呢？说什么倾向……这是开玩笑和说俏皮话……在民族问题上有分歧，这些分歧的解决如今是对我们派有利的。他们的政策要在那里贯彻执行，而人却要留在这里。这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是政策为了人还是人为了政策呢？”（同上，第152页）

在穆吉万之后发言的斯大林支持者奥拉赫拉施维利争辩道，捷尔任斯基或者加米涅夫的调查组在某些方面认为穆吉万集团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他说，“通过穆吉万同志在代表大会面前呈现出了格鲁吉亚倾向分子的典型”（同上，第152页）。穆吉万的支持者、格鲁吉亚政府前主席马哈拉泽指出，奥拉赫拉施维利仍然还在谈“倾向分子”，“在奥拉赫拉施维利同志了解事实之后（发言者指的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秘密论文。——作者），这个词应当废除使用……这个术语（倾向）应当用于那些确实偏离了我们的民族纲领、偏离了列宁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的同志们”（同上，第155页）。

马哈拉泽介绍说，奥尔忠尼启则不仅单独领导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而且还越过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地方

组织。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激烈地回答了“倾向分子”，其实，他谴责的与其说是“倾向分子”的政策，毋宁说是列宁要求在格鲁吉亚实行的谨慎的民族政策。照奥尔忠尼启则的说法是，孟什维克民族主义分子和公爵们通过“倾向分子”之手操纵格鲁吉亚。[68]甚至在全体代表都已了解了列宁的民族问题秘密信件之后，奥尔忠尼启则还是没有从列宁所说的“大国沙文主义粗暴政策”上后退一步。奥尔忠尼启则之所以如此大胆和毫无顾忌地对抗列宁，全凭“三人帮”的绝对支持。

奥尔忠尼启则的发言记录了五页，而没有象对穆吉万那样被主席打断。就是在穆吉万的讲话时间延长之后也只有两页半，马哈拉泽的讲话三页。还有一个表明斯大林在搞报复小动作方面多么耐心细致的细节：穆吉万和马哈拉泽自1903年建党之日起就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所有咨询手册里都是这样记载的。但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中注明入党日期的地方，给穆吉万划了条横线，好象他根本没有入党似的，给马哈拉泽注的是：“三份履历表日期不一。待征询格鲁吉亚中央。”（同上，第693、701页）

斯大林在结论中只回答了四位批评者：卢托维诺夫、奥新斯基、穆吉万和马哈拉泽。关于卢托维诺夫：“他不满意我们党的制度，说我们党内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合法性，没有民主……他要求把一切问题，至少是最重要的问题都交给各个支部自下而上地进行讨论，他要求全党干预每一个问题，参加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同上，第181页）①

斯大林驳回了这一要求，声称，“实行这种制度，我们党就会变成一个空谈不休、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争论俱乐部……我们被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1页。——译者注

敌人包围着……在两万个支部大会上讨论问题也就是等于把问题搬到大街上去。……应当记住，在我们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我方的突然袭击、出其不意的机动和神速的动作是决定一切的……卢托维诺夫的所谓民主是一种幻想”（同上，第182页）①。

关于奥新斯基：“他抓住我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吸收能独立思考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奥新斯基认为，我在这一点上和奥新斯基、民主集中派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他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如果奥新斯基真想追求这样的目的，如果他真想这样来攻击我们中央委员会核心中的某个成员，那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愿奥新斯基同志珍惜自己。”（同上，第183页）②

关于穆吉万：穆吉万反对中央，“这已为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委员会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委员会所查明……穆吉万同志把事情描绘成这样：虽然他被调回，但他仍然胜利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不过大家知道，当先哲唐·吉诃德被风车撞伤时他也自认为是胜利者的。我认为在格鲁吉亚，在上层的某些同志，看来，他们那里，并不是完全正常的。”（同上，第185—186页）③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之前对穆吉万的正确性这样突出地提出异议并为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结论进行辩护，实际就是否定和摈弃列宁文章中为穆吉万辩护的论据和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2—183页。——译者注

② 同上，183—184页。——译者注

③ 同上，188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结论，这些论据和结论代表大会也已经知道了。但即使在斯大林反对列宁的方针时，他也要象诉诸于自己的导师那样诉诸于列宁。在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斯大林从穆吉万直接转到列宁作为结束语："很遗憾，列宁同志没有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他一定会说：'我培养了党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把它培养成一个伟大有力的党了。'（鼓掌多时）"（同上，第187—188页）①

跟每次一样，废话连篇的季诺维也夫回答了每个论敌，包括斯大林已经回答了的论敌。在这些回答中，季诺维也夫象斯大林一样（大概这是中央商量好了的）采取了否定现存事实、已知情节或者有意回避列宁在所讨论问题上的立场的方法。请看一个典型例子：在回答批评者们说中央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动摇不定时，季诺维也夫说："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不可动摇这一点，中央没有丝毫争论。"（同上，第188页）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中央根据"三人帮"的建议做出了修改垄断制的决定，只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道坚决干预之后，才取消这一决定。对批评者之一克拉辛，季诺维也夫加罪说："他批评列宁的政策，却装作批评列宁学生的政策的样子，尽管克拉辛只凭一个简单原因是不能批评列宁的政策的：在近六个月内列宁甚至无权了解中央发生了什么。"对另一位批评者——他举出了中央不仅被迫取消关于外贸垄断制的决定，而且取消关于租让制的事实——拉林，季诺维也夫这样回答："拉林同志说得仿佛他不但坐在政治局里，而且生活在政治局，在那里度日，在那里过夜。"（同上，第196页）

反驳第三个批评者科西奥尔的论据是这样的："科西奥尔同志去年在并非象我这样的偶然报告人，而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1页。——译者注

奇的报告之后，发表了完全相同的讲话……看来，这是他的职业。”或者：“科西奥尔同志指责我们不给那些属于我们之外的另一个集团的同志们工作的机会，他显然不是单纯出自个人才这样说的。假如这种指责站得住脚的话，我们真该被揍一顿。”（同上，第199页）

第四个批评者奥新斯基抱怨说，由于十大的“非常的法规”，党内没有批评自由。对于他，季诺维也夫回答说：“在我们党内（请去问共产国际任何一位成员），在我们党内有足够的自由……我们没有非常的法规，凭这个原因取消它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同上，第200页）或者：“奥新斯基同志说，允许列宁，并不是也允许其他任何人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奥新斯基说：列宁在鞭打时，倒还豁得出去。我完全赞同他的爱好：要鞭打，也要找内行里手来……照奥新斯基说……‘他们据说不想让权’……奥新斯基同志，不要这样说吧！权力在我们这里，如果谈起这一点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多得很，谁也不会为缺少权力而苦恼的。”（同上，第202页）这里，不禁油然想起季诺维也夫在1936年8月被审讯时的话（是斯大林借他之口说的）。检查官问他：您为什么同加米涅夫一道成了破坏分子、间谍、杀人犯？季诺维也夫回答：“我们渴望权力！”季诺维也夫实质上指责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其他前民主集中派领袖，其中包括象布勃诺夫那样如今忠实的臣民，要他们对前面提到的匿名纲领负政治责任。匿名纲领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团结在“俄共工人集团”周围和把“三人帮”驱出中央。季诺维也夫的证据很简单：“我委托一位同志拿一份民集派纲领再拿一份匿名纲领，然后摘出前者的要点写在左面，摘出后者的要点写在右面……结果百分之九十九相符。”（同上，第203页）

“民集派”关于他们与匿名纲领毫无关系的断然声明竟没有

给季诺维也夫和中央留下印象。

对于中央政策的第五位批评者卢托维诺夫，季诺维也夫开头作了逐字逐句的引证："'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集团'，——他说。这是孤独者的威胁……而我们说，正是要这样继续下去。"（同上，第200页）一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袖将会记起，这位"孤独者"——顿巴斯的普通矿工原来是怎样的预言家。

与那位矿工大相径庭，季诺维也夫自己倒是一位蹩脚的预言家。他在闭幕词末尾说，列宁不在时，党将由集体来领导，因为"我们没有备用的第二个天才领袖"（同上，第205页）。整整五年之后，当同一个季诺维也夫在第一次被开除之后又回到党内时，却要说：有另一个天才领袖——这就是"斯大林——今天的列宁"。季诺维也夫指责"三人帮"政策的批评者们说，当列宁不在这里时，玩捉迷藏的游戏是不好的。这完全适合于他本人。两位中央报告人——季诺维也夫粗暴地，而斯大林较为巧妙地——否认"三人帮"同列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深刻分歧。两位报告人向代表们暗示，他们对中央过去和未来的政策所谈的一切，都完全依据列宁的书面或口头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一致"拥护中央政策就不足为怪了。

什基里雅托夫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很大兴趣，这是因为恰逢列宁关于改组和修改中央监委对中央的作用的最后文章在报上发表（1923年1月25日和1923年3月4日《真理报》）。列宁显然想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及其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职能。为此，他建议中央监委主席团代表团必须参加每次政治局会议。列宁认为，同中央委员会一并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应成为党的荣誉的法庭，而且应同工农检查院一道结合起来成为鞭笞党机关和国家机关官僚主义

的鞭子，要“不顾情面”，不管是总书记还是别的中央委员，列宁在副标题为《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1923年1月23日《真理报》）。所以，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增选独立于中央委员会、有多年党龄的党的老活动家，为恪守这种独立性，中央监委委员不能同时兼任中央委员。关于这一切，什基里雅托夫只字未提，更有甚者，在什基里雅托夫（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他都是斯大林搞清洗的最忠实助手）的报告中压根儿没提列宁的文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217—227页）。这是可以理解的。什基里雅托夫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的中心点说，中央监委“解决一切或大或小的重要问题都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应把中央监委机关看作“同中央委员会一道工作”的机关，当然，也是同国家政治保安局一道工作的机关（同上，第221、224页）。在托洛茨基所著《斯大林》一书中有一个注解指出，斯大林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非正式主席。在什基里雅托夫的报告中对此有间接旁证，其中说，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过或说过的东西，显然进入了中央监委的专管范围（同上，第223页）。代表大会主席团对中央监委的任务不太想特别声张（与列宁的文章相左），所以提议不开展对中央监委报告的讨论。代表梅什金正是援引列宁有关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和建议反驳主席团并坚持开展讨论的。赞成梅什金的是少数。就这样，在“三人帮”的导演下代表大会没有讨论列宁在代表大会前夕发表的这些文章。

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工作的报告只在两个问题上有点意思，这两个问题还是他早在（1923年）它们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无关紧要的时候提出的：法西斯威胁问题和殖民主义世界即将觉醒问题。关于法西斯，他说，“法西斯主义的到处泛滥”正成为欧洲的基本发展趋势，“法西斯主义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欧洲资产

阶级不能在符合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管理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法西斯组织和这些法西斯组织的功能就是合法化的国内战争……法西斯主义恐怖加强了……在意大利，法西斯党成了执政党……以希特勒为首的巴伐利亚‘国家社会主义者’组织是最引人注目的组织。”（同上，第248--249页）在殖民主义世界问题上，布哈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用语上都是毛泽东的老师。布哈林说：“如果从事物的世界历史范畴来观察事物状况，可以说，大工业国家是城市，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乡村。当‘城市’里掀起革命风潮时，农村也开始起火了，必须在世界‘城市’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世界‘农村’的农民之间建立伟大的统一战线。历史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同上，第279页）

对布哈林的报告没有进行讨论，而俄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受到了赞同。

然而斯大林的第二个报告即《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重新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在格鲁吉亚则遭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首先，斯大林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讳莫如深，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斯大林在整个民族问题上，尤其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政策受到了多么强烈和坚决的谴责。斯大林声称，不仅有一种倾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如列宁指出的），还有另一种倾向——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虽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更为危险，但要同两种倾向都进行斗争。斯大林没有指名说谁可以被怀疑为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看到，列宁点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尽管他们是前“少数民族的人”），但却点了以格鲁吉亚穆吉万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名。斯大林认为，这个集团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表现是，第一，它想不经过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苏联，第二，格鲁吉亚倾向分子压

迫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阿布哈兹人、阿扎里人和南沃舍梯人。在讨论时第一个回答斯大林的是穆吉万。他一开头就指出：“我们有伊里奇的民族问题学说，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拒绝民族纲领，而是把它推到一边……一位中央委员说，民族问题对于我们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伊里奇同志一向教导我们的和在自己的信件中所号召我们的东西，这些信代表大会只有通过个别代表团才知道……我声明，这里（在斯大林报告中。——作者）把国际主义同我们的‘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如果象伊里奇同志那样理解国际主义的话……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件中非常坚定而又明确地谈到的，正好是我们因之而在那里斗争的东西。

“奥尔忠尼启则（从座位上）喊：天才！

“穆吉万：不，我们不是天才，我们有另一些被捧为天才的人，我们是考虑民族纲领的普通共产党员。如果我们正确地解决了民族纲领，那末这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头脑所为，而不是你们的头脑。我不得不反对——这是我不想做的——报告人。作报告的同志对格鲁吉亚和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谈得相当多。

“斯大林（从座位上）喊：表示特别尊重！

“穆吉万：谢谢，斯大林同志。但请允许我为表示‘特别特别’尊重而向您提醒一下我们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事。”（同上，第454—455页）

穆吉万列举一系列事实证明，格鲁吉亚少数民族——阿布哈兹人和沃舍梯人从“倾向分子的”格鲁吉亚中央手中得到了自己的自治，并一向拥护这个中央的政策，而阿扎里人的情况则意外复杂化起来，宣布他们自治的事被搁置了，原因是斯大林在1921年来到格鲁吉亚命令格鲁吉亚政府主席穆吉万对阿扎里人要“小

心谨慎”。穆吉万补充说：“当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令这样做的时候，我应当说：是，斯大林同志！给我的指示是不要让阿扎里人在巴统（阿扎里首府。——作者）当家作主。他们的不满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给了阿扎里人自治权。”（同上，第456—457页）

穆吉万还谈到对以他为首的格鲁吉亚中央的最主要指控——“社会民族主义”倾向。穆吉万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我们反对外高加索联邦……我们不反对外高加索联邦，而反对业已建立的统一外高加索共和国……当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的委员会到达时，古比雪夫说：‘干嘛要这种形式的联邦，难道不能搞经济问题联邦和建立经济委员会？’这是中央书记（古比雪夫）说的。另一位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就坐在那里并且没有反对。可结果却是，他们不是倾向分子，我们是倾向分子和可恶的人。”（同上，第458页）

在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为一方，“倾向分子”为另一方之间的全部分歧的根源何在呢？穆吉万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作了相当明确的回答：“同志们，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有人喊：“‘我们’是谁？”）是谁？你们去问那些把我们称作倾向分子的人好了……是的，我们是全苏维埃联合！为这个苏维埃联合设立最主要的委员部，确定我们的对外政策，保卫我们的共和国……给这些个别民族另一些委员部，让它们能够表现自己的意志、自己当家作主的本领、自己创造新生活的本领。”（同上，第455、458页）

斯大林的支持者和在格鲁吉亚的报告员之一、前穆吉万分子即穆吉万的学生、现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斯图鲁阿说，“如果我们仍然忠于马克思，那末无产阶级就没有任何祖国”，而关于道德，“我们要记住列宁同志的话，当一些天真的同志问他‘什么是

共产主义道德？’时，他说：扼杀、消灭、彻底摧毁，只要对革命有利；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要安抚、要称他们是亚历山大·马其顿，如果对革命有利的话。就应该这样对待这个问题”。斯图鲁阿说，他出席过的一次格鲁吉亚旧中央委员会非法会议打开了他的眼界：“一个问题摆在那里，‘大国沙文主义者’是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等同志，要把他们打发回去……但如何打发呢？这象老鼠要在猫脖上挂铃铛，以便猫走时铃便响，但没有一只老鼠敢挂。在会上就是这样。议来议去得出的结论是……把我们要整倒的。找到的出路是：我们退出俄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作为格鲁吉亚分部……现在我明白了：‘这里有另外的意思，主人另有所好。’”（同上，第462—464页）

马哈拉泽指出，在确切的语义上来说，苏联根本没有什么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或自立：“因为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中央机关，它决定着所有共和国的一切，从一般指令到委派各共和国的负责领导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岂有独立自主可言，这自然是最难理解的局面。”（同上，第472页）所以，可以谈民族纲领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正确的实际贯彻执行。他向斯大林指出，今后闻名的格鲁吉亚对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边界警戒法令”并不是“倾向分子”制订的，而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者——内务人民委员格格奇柯里搞的，“格格奇柯里的这个方案在我们格鲁吉亚还没见着世面就夭折了”（同上，第472页）。马哈拉泽说，奥尔忠尼启则故意偷偷塞给“倾向分子”的这个方案，不仅在《真理报》上刊出了，而且竟然登在代表大会公报上，“同志们，我认为这是跟我们的代表大会不相称的”。马哈拉泽还指出，斯大林在与列宁通信中的观点，即不急于搞联邦的观点，也是“倾向分子”反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观点，他简直想按“军事命令”实行联邦。马哈拉泽针

对斯图鲁阿的发言指出，并非“倾向分子”把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说成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而是另一个人说的，“这就是伊里奇同志。这一切你们都了如指掌。现在我要问你们：这里所宣布的东西是否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呢？”（同上，第474页）。

中央委员、乌克兰政府主席拉柯夫斯基表达了许多中央委员的共同情绪，他说，“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曾在一些时候抱有这样的希望：民族问题，如列宁所设想的，将成为我们代表大会的中心，可它却成了我们代表大会的尾巴”。党曾多次把民族问题列入自己代表大会的议程，但“我们越是提得多，我们离共产主义概念和民族问题的解决就越远”。拉柯夫斯基接着指出，“斯大林同志刚好停留在弄清民族问题内幕的门槛上”。拉柯夫斯基认为，这个内幕就是党和苏维埃官僚集团担心：管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技术上不方便，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有各种各样的“自治”的话。拉柯夫斯基说：“我们的各中央机关开始从办公方便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国家的管理……管理二十个共和国是不方便，假如这一切都合在一起，假如一按电钮就能管理全国，那就方便了。”拉柯夫斯基最后说：“县执委会对自己的权利比各民族共和国了解得还多。联盟建设走上了邪路。你们知道，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同上，第532—534页）

代表钦查泽向代表大会提醒说，那个为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东方殖民地人民同情的各族人民自决权原则，被斯大林在他的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化”计划中化为乌有。报告人指出，事情完全不在于中央或地方的个别人犯错误，“事情在于人，事情在于管理体制”，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情况就不会变，所以，钦查泽说，“需要急剧转变已经并正在实行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

所谓倾向分子“同列宁同志的学说、同列宁同志本人绝对一致”（同上，第534—537页）。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的最信任、最亲密的朋友与志同道合者之一、本身也是格鲁吉亚族人——叶努基泽（后来当然也被斯大林枪毙）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秘密论文进行了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尽管在叶努基泽的讲话中明显看得出斯大林的编辑手笔，但他本人没有敢于这样维护自己、反对列宁，而由他的热诚战友代替他这样做了。最初，叶努基泽发现在拉柯夫斯基的发言中有成立某种近乎反斯大林的“乌克兰—格鲁吉亚阵线”的意思，便决定打击拉柯夫斯基。他说，拉柯夫斯基的指责由于他急躁发火而弄得让人莫名其妙。叶努基泽说：“昨天同志们看到在这里发言的格鲁吉亚人火冒三丈的样子，开玩笑说，要在发言前对他们进行搜身，以免发生冲突，而拉柯夫斯基同志以自己的火气使所有高加索人加起来还要大为逊色。”

在转而分析列宁的民族问题一文时，叶努基泽竟然敢于做出一系列明显歪曲列宁文章的断言。请看：

（一）“列宁在你们所知的信中提出的问题具有巨大意义，但并不是对格鲁吉亚或乌克兰，或者对他用来说明自己总的思想的个别事实有巨大意义。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地位有意义”（即：在叶努基泽看来，列宁的信或文章对国内民族政策没有意义，而只对对外宣传有意义）；

（二）“这里有许多非难并且最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奥尔忠尼启则的政策是暴力政策、粗暴命令的政策……这个词在列宁同志的信中确实有……实际上奥尔忠尼启则执行的是中央的政策……”；

（三）列宁要求“在高加索表现最大限度的忍让……如忍让近乎于我们向一切小民族主义偏见让步，那末这种忍让就应连根除

掉……倾向分子向这些偏见屈服了”；

（四）“现在谈列宁同志的信。穆吉万同志在讲话中每一秒钟都要谦恭地提到伊里奇同志的名字，他想制造一种印象，仿佛列宁同志专门写这封信是为了支持倾向分子同志们的和完全为他们的政策辩护的。（布哈林：“当然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这一目的，布哈林同志。我要不揣冒昧地说，我们对列宁同志也了解一些”；

（五）“列宁同志的信大部分是谈我们民族政策的普遍性问题的，对于这些普遍性思想，无论斯大林同志还是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当然都不反对。至于在他信中所涉及到的个人问题（即有关批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的行为问题。——作者），那末我感到，**列宁同志成了不正确的片面情报的受害者**”……

穆吉万：为什么不公布这封信？

叶努基泽：这封信，全体代表都看到了（同上，第537—541页）。

关于为什么中央拒不发表列宁信件的问题，其他代表们也提了。代表大会主席团责成季诺维也夫回答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解释说，不公布列宁的文章同列宁指示的性质有关，但这些指示的内容何在，他却并没有解释，没解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指示。季诺维也夫讲话的有关段落如下：“雅柯夫列夫同志要求公布列宁的信。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一致决定**：鉴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所作指示的性质，暂不公布这一文件。”但季诺维也夫决定立即打消对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任何怀疑。他说：“事情完全不在个人攻击。直接有关的同志们首先要求公布这封信。”“有关同志”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公布对他们是政治扼杀的列宁信件，如

何能相信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话呢？况且，季诺维也夫同他本人就自相矛盾。因为这些“同志”就坐在大会主席团之内，而主席团是“一致”决定不公布列宁信件的，其中也包括主席团成员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两票（同上，第552页）。

阿塞拜疆代表阿洪多夫不同意“倾向分子”的说法：假如列宁出席代表大会，他就会打击现在执行的政策。阿洪多夫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别的什么个别党员，——不管他受到怎样的尊敬，——会下决心打击整个党”。阿洪多夫警告说，“各国倾向分子都在联合起来”，所以在同他们斗争中“不应有任何动摇”（同上，第560页）。

许多地方代表也本着阿洪多夫的精神发言，说，中央政策是对的，符合列宁的精神。当中央委员开始发言替列宁信中批评的斯大林民族政策辩护时，仿佛中央一致支持斯大林。因此，布哈林的发言听起来就是完全不和谐的声音。列宁未必能象布哈林那样更好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布哈林向季诺维也夫指出，民族政策中的情况并非象他所描绘的那么漂亮。既然最近在三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了民族问题，这就是说，是既有可讨论，又有可谴责的事的。布哈林完全支持列宁对于中央政策中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提法。他宣称：“为什么列宁同志那样不顾一切地奋力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敲起警钟？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中只字未谈倾向分子的错误，相反，却用所有的字，斗大的字，反对对倾向分子所实行的政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晓得存在地方沙文主义吗？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他知道要打击主要敌人。例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地方沙文主义就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我们斗争的第二阶段。如果我们为了‘客观公正’，在谈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同时也议论，还存在格鲁吉亚沙文主义、乌克兰沙文主义、阿哈尔齐赫沙文主义、哥麦尔沙文主义和

随便什么沙文主义，我们就淹没了主要问题。因此，十分清楚，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件中和这里提到的众所周知的文件中根本不是站在这种出色的'客观公正'观点上，而是抓住某人的头发使劲儿地揪过来揪过去。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舆论转到列宁同志认为正确的轨道上去（鼓掌）。你们要注意，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反对地方沙文主义时，发生了什么——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何等美妙的团结……但当谈到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终结号（鼓掌，笑声），这是最危险的。”布哈林把斯大林当作例外，但这种例外在斯大林听起来大概象是污辱：“我理解，我们亲爱的朋友柯巴·斯大林同志没有这样尖锐地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并且，他作为格鲁吉亚人反对格鲁吉亚沙文主义。”（同上，第563—564页）（斯大林是什么民族，他的儿子小瓦西里作了最好的表达，据斯维特兰娜说，他告诉自己的妹妹斯维特兰娜一个新闻：“你知道吗，咱父亲从前是格鲁吉亚人。”）

拉狄克的发言是这样组织的：既讨好列宁，又不得罪斯大林。他从布哈林谈起：“有些同志说，布哈林同志一看到死麻雀就喊：'过两天我们都得死。'于是便陷入惊慌失措。我同意民族问题的意义在增长的意见……穆吉万在这里大喊大叫要比庄稼汉在格鲁吉亚大喊大叫好。”不过，为使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满意，他又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一件重要的事：重要的不是一院或两院（即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院。——作者），重要的是党……尽管在原则上同意布哈林同志……但我不同意布哈林同志给穆吉万和倾向分子的那张'空白纸'①。”（同上，第565—567页）

① карт—бланш来自法文carte blanche，意即交给某人的署名空白纸，让他在需要时随意填写内容。转意为“无限信任”、“授与无限权力”。——译者注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中指责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夸大民族问题的意义并因此而"忽视……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①。布哈林"建议删去关于地方沙文主义危害性的那一点。他们说用不着为地方沙文主义这样的小虫操心，因为我们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样的'歌利亚'②。一般说来，布哈林有忏悔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否认自决权，对民族有罪，现在该是他忏悔的时候了。可是他在忏悔之后，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奇怪的是布哈林竟号召党也仿效他的榜样来忏悔，虽然全世界都知道，这和党毫不相干……因此它没有什么可忏悔的。问题在于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同上，第596—597页）③。

而斯大林对于列宁为反对他而作的措词激烈的指责的实质说了些什么呢？只有如下一段话："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然而我必须引证一段已成为公理的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话……列宁同志在论民族自决权这篇论文中分析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一封信时，做了这样的结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这里总共只有一行字，但是它解决了一切问题。这是某些热心过度的同志应当牢牢记住的。"（同上，第597页）④为了不致解释错误，斯大林害怕引证他的导师仅仅在四个月前关于他和关于民族问题所写的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4页。——译者注

② 《圣经》上非利士族的巨人，与青年大卫决斗时被杀。此处为"巨人"之意。——译者注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6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215页。——译者注

话，但却不害怕引证和解释列宁在夺取政权很久以前所写的关于马克思和民族问题的话。

1968年新出版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对于政治局和中央内部围绕大会议程上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斗争，提供了某些细节。这一版代表大会记录的编辑部把1923年旧记录减掉的部分又增补上了，这些增补是：

（一）关于民族问题：代表大会主席团听取了中央关于列宁信件的通报。主席团决定不予公布，而只在各分组组长会议上宣读列宁的信和“全部材料”（多指中央的和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的材料。——作者），“在这之后，主席团成员再分别在大会各代表团中宣读……不在民族问题小组中宣读”。鉴于党内开始广泛议论政治局（“三人帮”）对列宁的信已经隐瞒了四个月之久，因此主席团认为不需说明，中央只是在代表大会前夕才得悉列宁“札记”的。所以，主席团将认为散布某某中央委员阻止宣布这一信件的任何流言蜚语都是诽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8年俄文版第821页）

新版记录附了一封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批判托洛茨基立场的信。就格鲁吉亚事务我们至少了解到托洛茨基行为的两重性。我们已经知道，列宁要托洛茨基在中央面前支持他反对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文章或信。现在，我们又从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中了解到，托洛茨基实际上没有支持列宁，而是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连斯大林甚至也投票赞成了他的决议案。这封信中说：“关于格鲁吉亚问题我们想指出，是托洛茨基同志自已拟定了政治局关于格鲁吉亚的决议……尽管下面签名的多数人现在认为中央以往的决定并不全部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要为这些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同上，第819页）这里所指的是什么错误，不得而知：从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及其支持者的发言中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中央没有强烈谴责“倾向分子”，——即使这样做是违背列宁的信的，——而是做了关于“倾向分子”的妥协决定。

（二）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业提纲。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说，“三人帮”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强调同他的分歧。这一点被现在公布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所证实。尽管信中强调，“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把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工业问题的著名提纲作为基础”（同上，第816页），但在中央全会之后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治局委员（“三人帮”）向托洛茨基指出，他犯了错误，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没有指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及“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第819页），也就是没有指明那些有关中央政治和组织报告的各点，而没有涉及委托托洛茨基做的狭隘的纯经济题目的报告的内容。这项指责的人为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旧大会记录编辑部把“政治局委员的信”从材料中抽掉，而新编辑部又把它拿来作为托洛茨基低估农民作用的害人证据！

（三）关于中央的集团组织政策。

在旧记录中被删掉，而现在又恢复的科西奥尔和斯大林讲话中的段落有如下一些。科西奥尔：“基本问题在于，中央领导在组织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奉行集团政策。”（同上，第102页）

斯大林回答：“科西奥尔同志说，中央有倾向性地自下而上挑选工作人员，由于这样挑选的结果，从托洛茨基到施略普尼柯夫的一系列同志没有工作（指党的工作。——作者）……去年九月列宁同志向政治局提出一项建议，要任命托洛茨基作他的副手，作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这项建议通过了。但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断然拒绝。今年一月我又重提了列宁同志的建议……我们又一次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任命他为副主席就

意味着取缔了他这个苏维埃工作人员。”（同上，第198—199页）

但在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建议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列宁想要托洛茨基作负责政治事务的政府副主席，而斯大林要他负责经济事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等等）。斯大林无疑还另有所图——剥夺托洛茨基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托洛茨基说有人想取缔他这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指的只能是这一点。在回答科西奥尔时，斯大林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在全体代表面前怀疑一位政治局委员、红军最高长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斯大林这样说：“显然，托洛茨基有某种动机、某种考虑、某种原因不让他承担除军事工作以外的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同志们，中央当然是没有责任的。”（同上，第199页）想必，有人在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指出，因为不愿当政府副主席即苏联概念的“不管部长”而这样怀疑政治局中的同事是不恰当的。所以，斯大林的这段话在旧记录中被删掉了，甚至在斯大林自己的文集中也被删掉了。但斯大林毕竟在代表大会代表中间散发了前面引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信的结尾说：“似乎在政治局里有一个抱有偏见的、搞裙带风的多数，我们摈弃这种对事实真相的庸俗歪曲。”（同上，第818页）由于这封信只有两位政治局委员——生病的列宁和健壮的托洛茨基没有签名，这就十分明显，它本身就证明在“三人帮”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列宁、反托洛茨基的多数。

（四）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

列宁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以便防止中央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发生分裂。斯大林抓住这个主意（但不提列宁），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换句话说，靠那些只依从斯大林一人的省委书记）扩大中央委员

会。托洛茨基看出斯大林正是想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因此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计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压根儿就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托洛茨基提出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的会议”作为指令机关时，“三人帮”看到这个建议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被否决了，而斯大林的建议被采纳了（同上，第848页）。代表大会以通过符合“三人帮”精神的决议和选出符合斯大林精神的新领导机关而告结束。

中央委员的名额由二十七人扩大到四十人。选出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五十人、候补委员十人。选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三人。

中央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中央委员——

1、安德烈耶夫，2、布哈林，3、伏罗希洛夫，4、捷尔任斯基，5、叶夫多基莫夫（新当选，季诺维也夫分子），6、泽林斯基，7、季诺维也夫，8、扎鲁茨基（新当选，季诺维也夫分子），9、加里宁，10、库勃雅克（新当选，斯大林分子），11、基洛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12、科罗特柯夫，13、柯马罗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14、克维林格（新当选，斯大林分子），15、加米涅夫，16、列宁，17、拉舍维奇（新当选，先为斯大林分子，后为托洛茨基分子），18、马努伊利斯基（新当选，斯大林分子），19、莫洛托夫，20、米高扬（新当选，斯大林分子），21、米哈伊洛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22、奥尔忠尼启则，23、彼得罗夫斯基，24、皮达可夫（新当选，托洛茨基分子），25、鲁祖塔克，26、李可夫，27、拉狄克，28、拉柯夫斯基，29、斯大林，30、苏利莫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31、索柯里尼柯夫，32、斯米尔诺夫，33、托姆斯基，

34、托洛茨基，35、乌格兰诺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36、乌汉诺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37、伏龙芝，38、哈里托诺夫（新当选，斯大林分子），39、楚巴尔，40、邱鲁帕（新当选）。

在十六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两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十名省或中央工作人员都是由斯大林直接提拔的。

候补中央委员——

1、巴达也夫，2、布勃诺夫，3、卡冈诺维奇，4、柯洛季洛夫，5、科西奥尔，6、列普塞，7、列别季，8、莫斯克文，9、米雅斯尼柯夫，10、莫罗佐夫，11、纳里曼诺夫，12、奥拉赫拉施维利，13、鲁缅采夫，14、雷斯库洛夫，15、斯克雷普尼克，16、乌雷瓦也夫，17、楚多夫。

在这十七名候补委员中三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巴达也夫、米亚斯尼柯夫、莫斯克文），两人是中央工作人员，其余十二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

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中连选，因为斯大林委任他们直接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委也从五人扩大到五十人和十名候补委员，遴选情况大致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和比例相同。列宁在“遗嘱”中预先反对过的总书记的“无限权力”，现在在组织上得到了确认。这个“无限权力”，如今别说托洛茨基一个人，就是他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在一起也未必能动摇得了。不过，当在政治上还没有把托洛茨基干掉之前，耐心谨慎的斯大林是要先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纠合在一起的。

即使“三人帮”为公开反托洛茨基而筹划的这次代表大会也照旧表明了托洛茨基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党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望。差不多每一个前来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的工人或其他组

织的代表团都在讲话末尾高呼："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但在任何贺词中都从来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代表大会的鼓掌次数来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党本身尚不晓得，谁是她的真正领袖。

第二十四章

列宁逝世，托洛茨基失宠被黜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在反对白卫运动的国内战争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某些集团曾对布尔什维克给予过道义上及政治上的支持，为此1919年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允许他们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当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白卫运动地区而且也在遥远的民族边区（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这些边区，如高加索、土耳其斯坦等宣布成立了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时，列宁开始着手消灭他的临时盟友。起初，列宁试图用折磨人的原则行事。例如，当1920年3月初以马尔丁诺夫和唐恩为首的四十六名孟什维克名单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获得通过时，列宁写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说：

> "依我看，您应当用一些**实际**工作把他们'刁难走'，如让
> 唐恩——**负责清洁工作**，
> 马尔丁诺夫——管理**食堂**。"（《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150页）

列宁想，大政治家决不乐意去干诸如管理食堂和厕所等平凡工作，因此用这种办法可以将他们"赶走"。他的目的很明确：把"忠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孤立、逮捕或驱逐国外，把他们的普通党员吸收进布尔什维克党。他很快便实现了这后一个目的：二十年代初期俄共(布)党内已有近三万党员是从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老布尔什维克却只有一万人左

右。现在只剩下孤立这些党派的领袖人物了。列宁首先拿马尔托夫集团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开刀。

列宁同马尔托夫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的敌对关系更为复杂。这是一种互相矛盾的甚至是令人费解的关系。他们的基本思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起初还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个，甚至一开始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是统一的（他们曾在彼得堡一道组织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9年马尔托夫在列宁起草的旨在反对库斯柯娃及其他“Credo”① “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过名；马尔托夫、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是出版《火星报》的发起人，马尔托夫和列宁曾一道任过该报的主编，并通过该报与列宁共同筹备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直到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人们才发现，列宁和马尔托夫不是统一的力量，甚至也不是两种平行的力量，而是根本对抗的两种力量。就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同一思想产生了一对冤家对头：马尔托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列宁的专制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然而，不管俄国马克思主义新“教派”的信徒们彼此展开了如何激烈的斗争，他们的领导人却令人奇怪的遵守着体面游戏的规则，对人身也互不侵犯。分裂后列宁和马尔托夫仍一道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做过重新联合的尝试；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一道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5年）和金塔利代表会议（1916年）；一道参加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25—27日）；还一道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俩人总是在一起，又总是彼此攻讦。

只有一次马尔托夫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列宁一边，那

① 信条，纲领，对一种世界观的阐述。——译者注

是七月事变后的事，当时有人指责列宁是德国的奸细，马尔托夫认为这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公开替列宁辩解，还给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发了贺信，虽然在信中表明了他对党和列宁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马尔托夫认为，他自己做不出的事，列宁也做不出来。因为尽管一生他们都在彼此争斗，罗织阴谋，歧见甚多，但是他们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这同一思想意识之藤的两个瓜。马尔托夫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列宁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者。马尔托夫同罗莎、卢森堡一样，对他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民主。”对于列宁来说，民主是虚幻，社会主义是遥远的目标，而专政才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所要使用的手段。马尔托夫所重视的是相信人的先天美德、相信人的社会道德可以完善。列宁所重视的是另一种人，这种人有天生的自私、残忍、卑鄙等恶习，对于这些恶习可以并且应当加以利用，以便把这种人变为无过失的、——照爱伦堡的说法——完美的共产主义之人。

马尔托夫乃至整个孟什维主义之所以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原因在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做了教条主义的估计。马尔托夫是一个过于讲道德的人，因而他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家。相反，列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策略家，他不会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政治包袱背在自己身上的。因此，作为政治家的马尔托夫不能与列宁相比，但是作为一个人，马尔托夫使列宁望尘莫及，有时甚至是列宁所不能理解的。同马尔托夫相比，列宁一生都带有一系列某种神秘的道德缺欠。因此，按莎士比亚的说法，列宁对马尔托夫是“又爱又恨”。因此，当1923年马尔托夫死于柏林时，人们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正在生病的列宁，这从心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列宁身边的人担心他得知马尔托夫的噩耗后会受刺激！列宁第一次患病复元后被获准读旧报纸时，他才知道

马尔托夫死了。

多亏赫鲁晓夫自由主义时期，苏联作家、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卡扎凯维奇（战争期间他任集团军侦察指挥员助理）才被获准翻阅肃反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因而他才能给我们讲述一件有关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事，这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至今官方历史还禁止提及它。上述这位作家于1962年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讲述列宁和马尔托夫的故事。故事的标题是《敌人》。文章的注释中说："这里讲的是一桩真事。"故事的要点是什么呢？那是1920年的事。列宁当时是政府主席，住在克里姆林宫。马尔托夫象一个苦修教徒似的秘密地住在米亚斯尼卡娅大街上的一幢房子的阁楼上。肃反委员会正加紧搜寻他，以便将他逮捕……于是列宁通过自己的女秘书叫来了一个名叫索菲娅·马尔柯芙娜的女人，她从前是孟什维克，列宁是在侨居国外时认识她的，知道她同马尔托夫关系密切，不过她现在已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向她交代任务说：

"我想委托您办一件事。您打听一下尤里（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作者注）住在哪儿，见他一面并以我的名义转告他……不，不，您别记录。记住就行了。您可是位老地下工作者了，秘密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做的正是一件秘密工作……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将从波罗的海车站第一站台开出最后一列——注意，这是最后一列——去明斯克和华沙的客车。之所以是最后一列，那是因为最近几天即将爆发同波兰的战争……如果尤里愿意，他可以坐到这列火车的第六车厢第十五号座位上。到了车厢里他就会知道的。如果他不愿意，就让他留在地下吧，这是他的事……孟什维克正在全力建立反苏的地下组织。尤里是他们的首领，他们把他藏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反苏的地下组织存在……马尔托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是敌人。您不要把这

一切都告诉他……那是徒劳无益的。您只把火车的事告诉他就行了。”当索菲娅·马尔柯芙娜问列宁，她是否要将马尔托夫的住址报告肃反委员会和为什么列宁不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去办时，列宁所做的回答在一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一定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莫此为甚的背叛。列宁说：

“尤里藏在什么地方，这您绝对不要告诉我和其他任何人。我不许您向我报告这件事。甚至连人民委员会（政府。——作者注）也不会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列宁在回答他为何不把此事交捷尔任斯基去办和他为什么要背着政府和党行事时，他的态度是诚挚的：“因为人民委员中（现在的部长。——作者注）有些人是——怎么跟您说呢，——更为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比列宁本人更坚定。”（1962年4月21日《消息报》）索菲娅·马尔柯芙娜通过苏哈诺夫找到了马尔托夫，把列宁的话转告了他。马尔托夫借助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帮助，坐上述那列火车走了。在柏林他开始着手出版反列宁的杂志《社会主义通报》。有趣的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后来以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对列宁这一明显反苏行为表示了赞许。1966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说，马尔托夫“在征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准许后，于1920年出国。”（《苏联历史百科全书》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卷第151页）不言而喻，这件事从没有被准许过，也不可能被准许，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这一点看得很明显。

列宁在摆脱社会革命党人领袖时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些人根本不想侨居国外。按列宁的说法，他并不十分惧怕以米留可夫为首的俄国资产阶级，而以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才是他所惧怕的。列宁说，他们的行为“一部分是由于愚蠢，一部分是由于对我们怀着宗派的仇恨，而主要的是由

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客观逻辑”，这对米留可夫是有利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481页）①

同社会革命党所进行的斗争是更为艰巨、更为长期的斗争。这个党的成员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乌里茨基，打伤了列宁，举行过起义。克里姆林宫决定对社会革命党进行毁灭性的打击，铲除它的领导人。1922年2月28日国家政治保安局进行大逮捕，把社会革命党的四十七名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活动家交付最高法庭，罪名是搞反苏维埃政府的“阴谋”。这意味着所有被逮捕的俄国两次革命（1905和1917年革命）的领袖不可避免地要被处以死刑。全世界的民主报刊和工人报刊掀起广泛的运动来反对这一举动。“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于1922年3月在柏林发表了“致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布尔什维克决定给所有俄国革命政党中最革命的政党编造搞反革命活动的罪名，以便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反对者。这一呼吁得到了各国新闻界的支持。甚至连共产国际的某些西方领袖也参加了抗议活动（蔡特金等人）。

列宁只好同意召开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联席代表会议以讨论审判问题。布哈林和拉狄克代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参加了代表会议。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以第二国际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确保对被逮捕者不处死刑，并要求让第二国际的主席王德威尔得出庭为被告做辩护。布哈林和拉狄克接受了这些条件，这使列宁大为不满。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的代表不应该接受这两个条件。”不过列宁已经明确地感到，把俄国老革命家交付法庭引起了世界舆论界的愤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3页。——译者注

概。因此他补充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撕毁签了字的协定。"（1922年4月11日《真理报》）

但是，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领袖之前，为使布尔什维主义恐怖统治合法化，列宁亲自为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写了臭名昭著的第五十八款。1922年5月17日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的信中是这样解释他的倡议的："现在给你寄去补充条款草案，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法院应该在原则上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297页）①

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法院在莫斯科进行了审判。社会革命党人领袖把法庭变成了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揭露布尔什维主义恐怖活动的讲坛。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及其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戈茨声明说："不管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是何等命运，我们也一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根杰利曼说："不管死活我们也要和你们斗一场。"第三名中央委员季莫菲也夫似乎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首领们挑战说："你们可以把我们的头颅献给共产国际，但是你们却征服不了我们的心。"（维什尼亚克：《流亡岁月》，斯坦福大学胡佛出版社出版）

法庭判十二人死刑，其中包括戈茨、根杰利曼、季莫菲也夫、唐斯基和拉特涅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判决，不过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敢执行这一判决。托洛茨基给列宁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托洛茨基本人是这样说的："执行这一判决（死刑判决。——作者注）必不可免地要招致恐怖活动的报复。把他们长期囚禁起来，那只会使恐怖分子们更加活跃，因为他们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0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是最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唯一的办法是：执行死刑判决与否，视社会革命党人是否继续搞恐怖活动而定。换言之，把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当做人质。列宁康复后我第一次见他时正值法庭审判社会革命党人。他立即采纳了我的建议，他说：'对，这是唯一的办法。'"（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11—212页）

列宁就是用这种办法摆脱了社会革命党人。为彻底巩固一党专政制度，还应当消除在俄国国家和社会历史上起过杰出作用的两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和东正教教徒。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三次俄国革命的精神准备方面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比百科全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准备工作所施加的影响逊色。不过，百科全书派反对君主专制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想用另一种革命专制取而代之。他们竭尽全力所争取的是做一个自由人，这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理想。当革命扫除旧制度并开始建立雅各宾党人永久的新恐怖制度时，幸存的百科全书派分子变成了新专制制度的敌人。俄国民主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做过1905年革命的精神准备工作，但是当他们看清了这场革命的血腥面孔时，其中很多人抛弃了这场革命（《路标派》）。知识分子做过二月革命的精神准备工作并接受了这场革命，但是他们谴责十月革命并断然抛弃了它。列宁极为蔑视的莫过于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了。因此列宁让长于屠杀的"革命勇士"捷尔任斯基放手镇压俄国知识分子，他的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结果俄国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方面的优秀人才有的被迫害，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枪毙，有的逃亡，很多人被驱逐到国外。

人可以驱逐，但是遗留下来的、能使人回想起从前那"可诅咒时代"的力量和伟大的历史文物以及宗教建筑艺术却无法驱逐，于是开始拆毁这些建筑物。如果说继野蛮人之后发起的这场破坏

历史文物的行动没能全部毁掉国家的文物和俄国教堂的话，那是多亏布尔什维克中那些旧文化和建筑学的“爱好者们”努力挽救的结果，如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等。当这些“爱好者”不仅要尽力救建筑物，而且还要救创造和维修这些建筑物的人时，列宁愤怒地斥责了他们。列宁1919年9月15日写给高尔基的一封谈论俄国知识分子的信便是一个例证。列宁写道，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的走狗。实际上他们决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48页）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竟然好意思发表了列宁这封粗鲁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信，但是该研究院却不敢发表列宁的另一封信，这封信虽然很文雅，然而在反人道主义和为所欲为方面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列宁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供政治局委员阅读。列宁著作年代索引中直接提到了这封信：

“（1922年）3月19日。列宁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道，必须坚决镇压宗教界对贯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2月23日发布的关于没收教堂财产的法令所进行的反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66—667页）

现在，由于莫斯科地下出版社的努力，列宁的这封信公之于世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只引其中下述几句话就足够了：“一位聪明的、研究国家问题的作家说，如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必须采用一系列残暴手段时，那就应该最坚决地采取之，时间要最短，因为人民群众不会容忍长期运用残暴手段的……政治局要对司法当局发出详尽指示，也是发口头指示，以便以最快的速度了结舒雅城叛乱分子案件（舒雅城的教徒不准当局抢劫教堂

财产。——作者注），并将舒雅城的很大一批最有影响力和最危险的黑帮分子枪决，可能的话，不仅在舒雅城，而且在莫斯科和其他宗教中心也这样做。”（见《俄国学生基督教运动》杂志1970年第98期第55—56页，巴黎—纽约）

还是让我回到党内的事情上来吧。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员（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同列宁的要求是完全相符的，但是并没有提到列宁的大名。信中说，党内形成的机关制度势力凌驾于全党之上，它比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更加残忍，令人难以容忍。党应该实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和九月（1923年）中央全会所要求的党内“工作民主”。应当把党置于它的机关之上。除托洛茨基的信外，一批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积极领导者（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于1923年10月15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极其严重的局势迫使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开诚布公地向你们说，继续贯彻政治局多数人的政策会给全党带来巨大的灾难。”信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在10月8日托洛茨基所写的那封信与“四十六人的信”之间没有正式的法律联系，但是“三人帮”人为地给它们建立了这种联系，为的是指控托洛茨基建立“左翼反对派”。列宁的健康状况与“三人帮”反托洛茨基的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律：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好转时，“三人帮”便退到幕后，当列宁的健康状况恶化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就频繁起来。现在列宁的情况又恶化了。列宁的病情越重，“三人帮”抵制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的积极政策就越坚决。后来事情竟弄到如此地步，以致托洛茨基任

何一次公开演讲，完全正统的、符合党的决议和列宁指示的演讲，政治局都说成是反列宁的演讲，把对错误的批评则说成是"派别发动"。为了使自己的反托洛茨基活动有分量和具有党的权威性，政治局在各地方广泛召开各种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中央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全会的目的也在于此。例如，十月（1923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这次全会)做出决定说，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在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各个党员书的办法，而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1册第767—768页）① 从这项决议的表决结果可以看出"三人帮"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百零二人投票反对托洛茨基，二人投票拥护托洛茨基，十人弃权。在这种情势下托洛茨基的进攻注定要失败。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列宁康复上，但是问题在于：列宁能否击败"三人帮"呢？

在列宁逝世前一周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1924年）上，政治局彻底将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和其他人列入了正式"反对派"和"派别集团"之列，并把这一切匆匆地刊登在报纸上。（1924年1月16日《真理报》）

列宁逝世前两天举行的第十三次紧急代表会议（1月16日至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0页。——译者注

18日）就斯大林所做的关于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报告通过了全面展开的决议。决议说：

1．中央九月全会后（1923年）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集团”写了一封信，在党内广为流传，这封信对政治局的政策及党内制度进行了批评。

2．政治局认为必须与托洛茨基取得协议，由于取得了这一协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关于党内民主和禁止派别组织的决议。

3．决议公布了两天之后，托洛茨基以“新方针”为题又发表了一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信。

4．在全俄各地，反对派都派出了他们的代表。“斗争采取的形式空前尖锐”。军队和高等学校的支部拥护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

5．“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号召砸烂党机关，企图把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这个斗争重点转移到反对党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上去。”

6．反对派把年轻党员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托洛茨基说：“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7．“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

8．反对派威胁着党的统一和国家的安全。

9．反对派的核心是过去的“民主集中派分子”和几个根据列宁的建议没有连续当选的前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亚柯夫、斯米尔诺夫）。

10．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全部纲领和责难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

一册第778—782页）①

列宁对代表会议的决议做了如何的反应呢？

1924年1月列宁的身体又好转了。1月7日他参加了"戈尔基"国营农场儿童枞树节，1月19日坐雪橇到森林里观赏了打猎。1月17—18日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了刊登在《真理报》上的有关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导。1月19—20日她又给列宁读了《真理报》上刊登的会议决议。

这些有关党内展开了斗争的"新闻"给列宁的健康带来了可怕的影响。他的死敌——疾病——现在找到了"三人帮"这个可靠的同盟军。医生说，任何情绪上的波动都会使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因为列宁把生命也看作是纯粹的政治，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党内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的政治遗产的未来命运更使他焦虑了。正因为这样，医生禁止他过问政治、读报和写文章。但是"三人帮"早已不对列宁的"医疗制度"进行监督了，列宁可以自由地读报、通过"第二手资料"注视政治局势（不过，他无权读中央委员会的材料和同外界联系）。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列宁轻而易举地从报纸上发现，在他的党内为争坐第一把交椅正在展开激烈的派别斗争，从政治上来说，这第一把交椅已经空起来了。他的"忠实的"学生"三人帮"人为地使局势加剧，以便把事情弄到使列宁极为害怕的地步，即发生分裂。列宁的学生们的这些行径有意无意地加剧了他的病情。对，"三人帮"是列宁致命疾病的最可靠的帮手。大概，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极大的精神绝望才促使列宁在斯大林来探望时向他要毒药，以便服毒自杀。1923年2月末举行政治局会议时，斯大林报告了这件事。如果我们想到列宁的档案中的"遗嘱"附有一份他于1923年1月4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63—367页。——译者注

日所写的关于撤消斯大林职务的附言的话，那末我们就会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这样一种意见：列宁要毒药没有找错人。（托洛茨基：《斯大林》英文版第376—377页）

列宁的亲友们常说，列宁的身体犹如勇士般健壮，现在他仍在同死神作斗争，然而党内斗争却无情地冲击着他那病入膏肓的大脑。使大家惊奇的是，中央委员会指派的列宁病情的主要“监督者”斯大林，恰恰在十三次党代表会议（1924年1月16—18日）召开前夕撤消了对列宁的“情报隔离”。这次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获得了胜利。代表会议及批准代表会议决议的中央全会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及其“遗嘱”。有关这一切，列宁完全可以从《真理报》上获知。

还是回头谈谈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吧：列宁做了如何反应呢？小心谨慎的、受人监视的克鲁普斯卡娅（监视人正是斯大林）还是告诉了我们一点很说明问题的情况。《列宁全集》45卷中所附的“列宁生平活动”时间表中记载说：“1924年1月19日至20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念给列宁听。’”克鲁普斯卡娅本人写道：“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都在读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认真地听着，时而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当星期六那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焦急不安**时，我告诉他，决议获一致通过。”就是说，列宁想必是相信了克鲁普斯卡娅的话，即托洛茨基承认自己有反列宁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并投票赞成对自己的谴责！然而，即使在临终前，列宁也未必如此幼稚。

倘若列宁在听这些决议时曾谴责过托洛茨基和称赞过斯大林，那末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对此只字不提的。

如果说1月20日列宁只是有些“焦急不安”，那末“1月21日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到了晚上六点五十分他便逝世了。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716—717页）

不是医生也可以断定：斯大林向列宁大脑中所注射的可怕精神毒剂——一月代表会议决议——加速了悲惨结局的到来。医生的诊断是："由于过分紧张的脑力活动，脑血管急剧硬化。直接死因是脑溢血。"（《列宁传记》1970年俄文第4版第682页）

前边我们说过，如果列宁在听一月代表会议决议时谴责过托洛茨基，那末党的历史学家会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后人的。但是，连斯大林也没能做成的事——硬说列宁谴责过托洛茨基——现今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1970年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列宁传记中却努力想做到它。这本书似乎顺便提到说："完全有理由认为，克鲁普斯卡娅反对托洛茨基的发言列宁是清楚的。"（第682页）至于克鲁普斯卡娅何时何地做了这一发言，有那些文字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却只字未提。这是可以理解的。世上本来就没有能证明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患病期间或临终前发表过反对托洛茨基发言的文字材料，正象没有材料能证明列宁曾委托自己的妻子袒护一个为了她而与之绝交的人（我们讲过这件事）一样，或是委托她谴责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正是他反对斯大林的同盟者。不过，托洛茨基的档案中倒有一份能完全推翻党的历史学家的新"论断"的文件。那便是列宁逝世几天后克鲁普斯卡娅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列甫·达维多维奇：

"在这封信中我要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约在逝世前一个月的时候，看过您写的一本书，他仔细地研究过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他要我给他重读这一段，他听得很认真，后来他自己又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自打您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您产生的感情至死未曾有过改变。祝您健康并紧紧

地拥抱您。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51—252页）

托洛茨基评论这封信说：“在弗·伊看过的那本书中，我把列宁同马克思做了比较……我很高兴，列宁在逝世前不久认真地读过我对他的描述，因为在列宁的眼里，马克思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高尺度。现在我读起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时，激动的心情仍不减当年。她提到了两个开头和结尾的日期：1902年10月的一天和1923年12月末的一天。这期间二十年过去了，起初是在一起工作，后来发生了残酷的派别之争，后来又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共同工作。这完全是按照黑格尔所说的：正题、反题、合题。而且克鲁普斯卡娅证实说，虽然我们之间有过很长一段反题过程，但是列宁对我的感情始终象在伦敦时那样：这就是热情的支持和友好的眷恋之情，不过这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的感情。即便除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后所写的短信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了，伪造历史者的巨著也未必能在历史审判面前取信于人。”（同上，第252—253页）

但是托洛茨基犯了一个错误，这一错误使他在政治上不能不受惩罚。1924年1月21日那一天，托洛茨基在前往苏呼米疗养的途中，在第比利斯收到了斯大林拍来的关于列宁逝世的密码电报。托洛茨基用直通电报询问列宁葬礼日期，克里姆林宫回答说，列宁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列宁是星期一逝世的），鉴于托洛茨基“反正赶不上葬礼了”，克里姆林宫建议他“继续去疗养”。托洛茨基指出：“其实葬礼是在星期天才举行的，我完全可以赶回莫斯科。不管怎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在葬礼日期上欺骗了我。阴谋者自以为得计，没有想到我会追究这件事……”（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49—250页）

对，他们欺骗了托洛茨基，但是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人们所欺骗的正是那些情愿受欺骗的人。显而易见，托洛茨基当时失去了距离概念：火车可以在三天之内从第比利斯经巴库到达莫斯科，即便葬礼在星期六举行，托洛茨基还有五天的时间。况且，国防部长还可以坐军用飞机去莫斯科。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应该想到，当全党在寒冷的莫斯科为自己的领袖举行葬礼时，他却在阳光明媚的南方疗养，这正中了“三人帮”的下怀。斯大林利用托洛茨基没有来到王位宝座旁这一点，扫除了他的政治影响，现在“三人帮”已经合法地继承了王位。在托洛茨基缺席情况下于1924年1月21—22日召开了紧急中央全会，全会推举中立的李可夫继任列宁的苏联及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推举加米涅夫继任列宁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很明显，这是“三人帮”内部妥协的方案，因为“三人帮”就推选他们之中谁做政府首脑这一问题没能达成协议。会议还决定“加强”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军事部门。在此之前，“三人帮”的亲信翁什利赫特曾被派到军事部门，现在中央委员会又决定派伏龙芝去做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并撤消了斯大林昔日的敌人——斯克梁斯基的这一职务。

托洛茨基说：“由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谢夫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来苏呼米找我，征求我对变更军事部门人员组成的意见。实际上这纯粹是在演戏。更换军事部门人员的工作早已背着我匆匆完成了……第一个对斯克梁斯基开了刀。首先，斯大林把他在察里津受挫、在南方战线失利、在李沃夫的冒险都推到了斯克梁斯基身上。”（同上，第253页）

这显然是在给托洛茨基一点颜色看，警告他不要做潜在的波拿巴，其实托洛茨基并不想做波拿巴。

中央全会通过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其中说：

“无产阶级伟大解放运动的历史，在马克思以后，从来没有

产生过象我们已故的领袖、导师和朋友这样伟大的人物……大无畏的智慧，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胜一切的钢铁意志，对奴役和压迫的深恶痛绝，移山填海的革命热情，对群众创造力量的无限信任，巨大的组织天才，都由列宁卓越地体现了出来……

“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洞察一切大小事物，善于预见各种重大的历史转变，同时又善于考虑和利用每一个细节；他善于在需要进攻时勇猛进攻，需要退却时实行退却，以准备新的进攻。他不固守任何死板的公式；在他英明的洞察一切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障眼物……

“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宝库作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工人阶级之所以感激他，正是因为他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工农联盟的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全部意义的学说，以及他的关于党的作用和性质的学说……

“列宁从来没有象在危险时刻表现得那样伟大。他坚定地引导党渡过了一连串的危险，无比冷静而英勇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对于列宁来说，没有什么比惊慌失措、心慌意乱、缩手缩脚、摇摆不定更讨厌、更可恶和更可卑的了。”（《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 1 册第809—810页）①

中央全会委托斯大林在1924年 1 月26日开幕的第二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题为《悼列宁》的发言。这篇发言犹如神甫所做的布道演讲，充满宗教的激情和神秘，讲话提出了党的萨满教徒崇拜偶像的新教规，并用宗教语言向列宁的灵魂求救。昔日宗教学校的学生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但是斯大林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394—395页。——译者注

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黑体字是我加的。——作者注）此外，斯大林还宣誓要在下列五方面执行列宁的"遗嘱"：关于党的统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农联盟，关于巩固和扩大苏联，关于巩固和扩大共产国际。每句"誓言"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斯大林全集》俄文第6卷第46—51页）①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第二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三人帮"关于保留列宁遗体的决定，要将列宁的遗体涂上防腐剂，象圣物一样停放在红场的陵墓中。为什么要将列宁这样一个无神论者和革命者象古埃及法老一样涂上防腐剂呢？斯大林亲自做解释说："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同上，第51页②；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按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现代俄语文学辞典》的解释，斯大林给布尔什维克用语增添的词汇的含义是："**遗嘱**"（"заповедь"）——"圣经或福音的格言"；按照达里词典的解释，"**宣誓**"（"клясться"）为"立下誓言、请上帝作证"之意；"**拜谒者**"（паломник）为"在上帝的灵柩前做过祈祷的人。"斯大林故意将列宁墓变成"上帝的灵柩"，以便将来用列宁的名字实行残暴统治。列宁当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6—4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46页。——译者注

然愿意自己的学生继承他的事业，但是未必愿意把他推崇为新的上帝。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对列宁了如指掌，他写道："对革命领袖列宁的态度变成了对宗教领袖的态度。尽管我反对，红场上仍建起了列宁墓，这对一个有革命觉悟的人来说是不体面的，是一种污辱。有关列宁的书也变成了这种陵墓。为了进行虚假的说教，列宁的思想被肢解为一段段的语录。"（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57页）

自从列宁逝世后，党的制度史上呈现出一个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逐步过渡的过程：由一党专政过渡到一党暴政，由列宁过渡到斯大林。但是，这只是更换领袖，他们的心理状态不同，思想却是一样的。起初斯大林同列宁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斯大林暴政的所有基本要素皆是列宁制定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列宁活得久些，如果他也碰到斯大林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中央委员会里的危险的反对派，碰到更为危险的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那末列宁是否也会变成斯大林呢？原则上对这个问题应当毫无条件地回答说："是"，但是规模、手段和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没有列宁就根本不会有斯大林。因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借助列宁谴责斯大林，这是不合逻辑和荒谬的行径。这和下面的一个问题很相似：如果在将来的战争中人类毁灭于热核武器，那末谁应对此负责呢？是发明这些可怕武器的学者还是使用这些武器的统治者呢？列宁主义便是斯大林手中的那种可怕武器，他借助这一武器在国内实行了三十年的残暴统治，并建立了世界共产主义体系。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下边还要谈到。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头来对列宁的生活和事业做一番总结吧。

在列宁逝世最初几个月里对他所做的所有评价中，有两个人的评价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一个是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所做的评价，一个是列宁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

的评价。斯大林对列宁的评价，不言而喻，是别有用心的赞扬，切尔诺夫的评价则是政治心理方面的批判。从两个人所做的评价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把列宁描绘成一个他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切尔诺夫则把列宁描绘成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却不是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斯大林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是经过互相通信认识的。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都远不如列宁，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杰米扬·别德内伊谈到这个比喻时说：斯大林是高加索山地居民，故把列宁比作"山鹰"，而北方人大概就要把列宁比作北极光。——作者注）……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塔墨尔福斯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伟大，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瞭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我记得当时有许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象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但是列宁丝毫不象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党的领袖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有时就产生了

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52—64页，《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演说）

1924年3月15日，即在列宁逝世不满两个月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在美国一家颇有名气的《外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列宁的文章。虽然切尔诺夫是列宁的敌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立场如此相近，以致使他们作为俄国社会国际主义者，一道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代表会议，早在战前，两个人皆是沙皇制度的死敌，因此有过一些暂时的配合。革命后切尔诺夫参加了第一届联合政府（七月事件后辞职）。他曾任全俄立宪会议主席，他的党在立宪会议中曾占绝对多数。虽然切尔诺夫对列宁的评价，如同斯大林对列宁的评价一样，带有一些主观主义的因素，但它仍不失为一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件。

五十年来出版了许多列宁的著作和描写列宁的书籍，但是它们没能给切尔诺夫所画的列宁画像增添任何原则性的新东西。大概正因为如此，《外事杂志》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又重登了切尔诺夫的这篇文章。

切尔诺夫说：列宁是一位大人物，在他的党里他不止是一位最大的人物，他还是这个党的未加冕的、但却是功勋卓著的国王。他是党的头、党的意志，如果他俩——列宁和党——不是把冷酷无情看作义务的话，我甚至要说他是党的心脏。列宁精力旺盛，但却是一个冷漠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充满嘲笑、讽刺心理的人，是一个公开蔑视道德伦理的人。他对多愁善感厌恶之极……对列宁来说，政治上的道德和伦理见解是"微不足道的，是虚情假意，是牧师的说教"。政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纯粹的策略而已。只有胜利才值得注意。权欲和不妥协地实现政治纲领——这才是美德。犹豫不决是唯一的犯罪行为。列宁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对牺牲持冷漠无情态度是一种可嘉的自制力，冷酷无情、惨无人道是一种义务。

战争期间人们是不择手段的，那些在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大都受到谴责的手段是最好的手段。既然政治是战争的变体，那末进行战争的方法便是战争的原则。常常有人指责列宁说，他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诚实的对手"。但是，"诚实的对手"这一概念本身对他来说就是谬论，纯属偏见。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虚伪地暂时利用它一下，但是认真地接受它则是愚蠢的。

无产阶级的保护者在同敌人打交道时，应把对道德的一切顾虑置诸脑后。蓄意欺骗敌人，诋毁他，破坏他的名誉，——这一切他皆认为是正常的。他厚颜残暴地宣扬这一切，其程度是难以复加的。列宁的良心就是使自己对敌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不受人的良心的约束。他拒不承认一切信誉准则，但是他对自己是很忠

实的。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阶级斗争”，他把国内战争也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顶点，并把这一点当成他对这一理论所做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连阶级斗争在他看来也是内战的萌芽。他常常把党内大大小小的分歧说成是阶级对抗的反映，于是他就用最卑劣的手段将党内那些不中意的人打入冷宫！难道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党本身不就是阶级敌对分子的堆积物吗？而所有阶级敌对分子都应该用“战时的军事手段”对待之。他的一生均是在党内分裂和宗派斗争中度过的。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有巨大的自卫本能，他可以不费力气地将最难以置信的东西（credo, quia absurdum）说成是信仰……每次失败和垮台之后，不管是多么难堪和丢脸的失败和垮台，列宁都能象不倒翁一样立刻站起来，然后再重新做起。他的意志犹如优质钢做成的弹簧，你越是用力压它，它的弹力就越大。他是一个严厉的党的首领，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首领，是因为他能鼓舞自己的追随者，并能用无比自信的模范行动制止他们的惊慌失措，而且当党有成为“自满的党”的危险时，他能使他的忘乎所以的追随者正视现实……他的坚定意志最使他的追随者肃然起敬。每当列宁由于敌人的莫大疏忽而获得成功时，人们都把这种成功归结于他的坚定的乐观主义……由于他的顽强，他多次把党从似乎是无出路的困境中引导出来，然而却说这是他的天才预见所致。但是，在广大范围内做出预见正是他所不能的。他首先是一名击剑大师，而击剑者只需具备很小的先见之明和不太复杂的思想。其实，他无需动脑筋多想，只要密切注视对手的每一个动作，快速做出反应，不失良机地挡开对手的每一剑击。这是他天生的本能。列宁颇有洞察力，但是他不够豁达、机智，不富有创造性。他熟悉一切政治形势，能很快地抓住它，并能预见这一形势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表现出他的政治与实际的观察力。这种完美的直接策略感，同某

些广泛的历史预测所具有的毫无根据和臆造性质构成鲜明的对比，从前他在囊括不止今天明天的任何一个纲领中，曾想做过类似的预测。例如，他革命前制定的土地纲领，或是胜利后所制定的宏伟的、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行动计划，在现实中彻底破灭，但是他所制定的近期进攻计划却是非常现实可行的。他的"近期政治"见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的"长期政治"见解则不断遭受破产。他是一个胸中有真理的人，但对其他真理探寻者所做的创造性的努力则不予任何重视。他不尊重别人的信念，对自由也不孜孜以求，这是一切有主见和创造精神的人的特征。相反，他却被纯亚洲人的观念，即垄断出版、言论、公正和思想的观念所左右，这种观念通常由统一的领导阶级来实行，如同穆斯林俗话所说的那样："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①]的藏书同可兰经一样，那它就毫无用处；如果它的藏书同可兰经是对立的，那它就是有害的。"他绝对没有创造才能，他只不过善于明确地、孜孜不倦地解释其他思想家的理论而已。他的智慧如此不足，因而应当称他的知识修养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在这有限的范围内他能做出伟大和有独到之处的事来。他的力量表现在他的论证是非同凡响和绝对明确的……他能把思想具体化和简单化。他不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他常常显得粗鲁和笨拙，在论战时尤其是这样，他经常重复自己从前说过的话，但是这种重复便是他的办法和力量所在……这是一种经常不断的压力，听众听起来枯燥难耐，于是他们被征服了。同一思想他要翻来覆去的重复几遍，直到人们记住为止。列宁总是能与听众息息相通。他的演讲从不过高地超乎听众的水平，在关键时刻，他能注意把演讲降到听众水平上……他

---

①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代文献稿本的最丰富的储藏库。纪元前三世纪建立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译者注

比任何人都更明白，群众犹如役马，喜欢别人坚定不移地驾驭它，当用马刺刺它时，它愿意刺它的是一位好驭手。如果需要，列宁能象舵手一样讲话，能威胁和鞭策他的听众。有一个人评论他说：“他不是演说家，他高于演说家。”列宁的毅力超过他的智力，智力总是屈从于他的毅力。当他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取得胜利之后，他不着手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事业中（一个事先对自己的工作考虑周详的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者却是要这样做的），而是又去搞他生活纲领的新的、创造性阶段，所用的方法也是他在夺取政权的破坏性斗争中所用过的。拿破仑所说的：“先卷入战争再说”是他所喜爱的格言。人们常说，列宁是一个盲目的教条主义者，但是就他的本性来说，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那种留恋完整的（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对称体系的人，他只要在政治游戏中达到既定目标，能在政治游戏中捕捉有利时机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他才经常象一个招摇撞骗者、实验者和狂热的赌徒那样发表演讲，这也能证明，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个概念同教条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许多批评家认为，列宁是一个贪图权力和功名的人。事实证明，他生来就适于做领导……对他来说，领导工作是习以为常的事。他对荣誉则嗤之以鼻。任何追求豪华排场的行为都使他感到厌恶。从他的爱好和本性来说，他是一个平民，十月革命后，从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他依旧象革命前一样朴素。人们常说他还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狂人。这种冷酷无情纯属精神性质，是针对他的敌人的，也就是说，是针对他党内的敌人的。同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友好、温厚、活泼愉快、彬彬有礼的人，恰似一个好同志那样，因此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亲昵地叫他“伊里奇”。对，列宁是一个温厚的人，但是温厚的人不意味着是善心的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工人阶级。他是否爱工人呢？大概他是爱的，虽然他对工人的爱

不如对压迫者的恨那样强烈。他对无产者的爱是一种专横的爱，一种严酷无情的爱，几百年前托尔克魏马达[1]正是怀着这种爱烧死了许多人，目的是为了拯救他们。对那些他认为是有利的助手们，他有独特的爱。他爽快地原谅他们所犯的错误，尽管有过严厉斥责他们的时候。他反对怀恨在心和打击报复。即使他的敌人已不在人世，但是某些抽象因素还是应该肃清的。这些抽象因素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因为这只是些用数学办法规定的各点而已，对它们可以运用毁灭性的力量。在关键时刻，单单是对他的党持消极反对态度，就足以成为他草菅数百条人命的理由(Foreign Affairs, N.Y, April 1970, p.471—476)[2]

切尔诺夫把列宁同西班牙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所长托尔克魏马达相比，今天听起来已经有些陈腐和落后。当我们看到列宁的学生和继承人斯大林的所做所为时，刽子手托尔克魏马达同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有人会说，列宁对斯大林的大宗教裁判所所承担的罪责也应该是小的，如同基督对托尔克魏马达的小宗教裁判所所承担的罪责一样。但是，基督宣扬“对亲人要爱”，而列宁宣扬的是仇恨，是阶级仇恨，政治仇恨和肉体上的仇恨。要知道，契卡（Чека，肃反委员会）这座大宗教裁判所的发明人不是斯大林，而是列宁。正是列宁对这一发明尤为赞赏，虽然他在极为坦率之际曾承认说，其实他是不愿意试用布尔什维克所发明的这些东西的，即便是最无害的发明他也不愿意试用。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谈到这一点：“亲自尝试一下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这太可怕了!!”（《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189页）

---

① 托尔克魏马达（1420—1498年）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所长。他曾把一万多“异教徒”判处火刑。——译者注

② 《外事杂志》纽约1970年4月号第471—476页。——译者注

那末，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之后，客观的历史法庭会对列宁的业迹和预见做出如何的裁判呢？

列宁活了不到五十四岁，比斯大林少活了二十年。但是这是内容丰富的一生，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列宁无疑是时代的产物。

但是，要想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象征，他要生得逢时。如果他早生五十年，俄国的历史上只会多一个民粹主义者；如果他晚生五十年，他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乌里杨诺夫，一个急进的政论家或是地方的律师。

列宁恰恰是在俄国历史的关键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时俄国由于经受了两次不幸的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了两次革命。而且，第二次革命，即1917年二月革命，它自己为自己的夭折创造了所有前提条件。

列宁巧妙地运用了这些前提条件，组织了第三次革命，即十月革命。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哲学相反，十月革命本身并不是俄罗斯发展的必然规律。

十月革命与自发的二月人民革命不同，二月革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是反对民主的革命，是阴谋者政党人为发动的革命。

但是，如果临时政府不犯下述两个致命的错误，这一革命也不会成功，列宁的名字也只有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才会知道。这两个错误是：（一）确切知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央为搞革命接受过德国人的钱后，没有马上宣布整个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合法的政党；（二）过高地估计了来自右边的威胁，过低地估计了来自左边的威胁，结果为了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并把他们的领导人释放了（托洛茨基说得好：“起来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即是将来举行十月起义的军队。”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39页）。

即便犯了这两个错误，如果临时政府能毅然决然地解决两个折磨全国和全军的问题，即退出战争和宣布进行土地改革，那末，列宁也是永远不会掌握政权的。

后来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自己也承认，如果临时政府当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他们就不可能夺得政权。因此，列宁在夺取政权后第二天，即在10月26日（11月8日）就建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首先颁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后一个法令完全是从“富农”社会革命党那里照抄的。

不过，上述这些条件都是客观因素，评价一个历史活动家是伟大还是微不足道，要看他能否善于利用这些客观因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其一；其二，要看他们预见事变的天赋有多少。

既然如此，我想，也应该谈一谈对列宁本人及其事业的评价问题。首先需要谈一谈克里姆林宫是如何描写列宁的。按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列宁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天才学者，他既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又是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还是文艺学家。

当然，所有这一切皆是苏联的神话。列宁什么学家也不是，而且他也不想当这样的学家。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从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修正。

诚然，在五十五卷《列宁全集》中，你找不到一句批判马克思的话，连一句暗示批评的话也找不到。列宁口头上承认，马克思对他来说是无可争辩的权威，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象列宁那样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说采取如此随便的态度，连马克思的敌人也没有这样做。

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修正，就不可能创造出称之为列宁主义的新理论。

列宁对马克思不是采取迂腐学者的经院式态度，而是以实用

主义的态度利用马克思的思想。列宁不是按马克思的主张办事，而是迫使马克思按列宁的主张办事。

只有在马克思断然反对的时候，列宁才勇敢地担负起马克思“继承人”的角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指责他与马克思的主张有矛盾，他则心平气和地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甚至将马克思的基本哲学信条“存在决定意识”断然地颠倒过来，列宁实际上认为是“意识决定存在”。马克思提出人所共知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列宁认为经过挑选的少数人的“有组织的意志”既决定“基础”，也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马克思象他所说的，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了过来，把它变成了唯物辩证法，那末在此种情况下，列宁也会坦然地准许“辩证法”头朝下走路，不是用物质而是用理智判断世上的行为，差别只在于，黑格尔的理智带有抽象甚至于神秘的色彩，是一种“世界理智”，而列宁的理智是具体的，创造性的，是万能的党的精华的理智。

因此，马克思说革命是实现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规律的结果，是一种内在规律，列宁却说，革命是党的精华的创造性行动。列宁是一个最大的唯意志论者，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论证他的革命行动的工具。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1902年）中有一句名言能反映出所有这一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恰恰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甚至不止于此：在工业不很发达的俄国，任何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企图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相抵触，而且还被认为是疯狂的冒险行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1931年俄文版第1卷，第14—15页）

列宁一生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中推翻马克思的这两个论断。但是为了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推翻马克思的论断，首先需要创造理论前提。

列宁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便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列宁在这本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彻底将马克思的理论颠倒过来了，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要首先在工业发达的西方爆发，它可以甚至可能在落后的东方爆发。

列宁认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内在规律"所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了解这些内在规律，因为他们未能活到帝国主义时代（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

列宁论证说，处在今天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一条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锁链，它会在"薄弱环节"上断开，"薄弱环节"断开后，整个锁链就会四分五裂。

列宁认为当时的俄国即是这种"薄弱环节"，他同时还预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结局必然是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301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6页。——译者注

列宁自己却不大相信他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新规律的“内在性”。因此，他的“发动革命的意志”（正规的提法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仍是占领先地位。列宁默认了下列几点：（一）即使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但是可以和需要人为地组织这一革命。（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应当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组织者的工人阶级，如果不人为地从外部向他们灌输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那末他们自己是永远也不会成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的（《怎么办？》）。

列宁就是依据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制定了那些主要的东西，即关于干部党的学说、组织革命的学说、一党政权专政的学说，而这些学说被认为是列宁头脑的特殊产物。

1917年10月前夕俄国国内外的局势变得对列宁有利，再加上情势的巧合，使列宁得以实现了他的组织革命的计划。

毋庸置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哲学对列宁取得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马基雅弗利就已经知道，道德和政治是互相矛盾的，列宁认为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垄断就是对人类社会道德准则的绝对摆脱。比起不走运的俄国民主勇士们来说，这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优越性所在。

当司法部的通告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拿过德国人的钱时，对这一指控最为恼火的正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齐赫泽、马尔托夫、策烈铁里、苏哈诺夫）。他们甚至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为列宁辩解的决议，说他是诽谤的牺牲品，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首都各报对政府有关德国钱的通告不予报导，等候苏维埃对这一指控进行审理。

苏维埃一直没有进行审理，因为列宁不顾他7月7日所做的第

一个书面声明，拒绝出面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调查委员会做出解释。然而，历史本身将这一指控审理得一清二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正式文件（《德国和俄国革命，1915—1918年》，Z·Zeman编，1958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表明，列宁拿过德国钱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

然而我们说过，如其说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倒不如说德国参谋总部是资助列宁搞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代理机构。在需要俄国在战争中失败这一问题上，德国皇帝和列宁的利益是一致的。

列宁1915年3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议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俄国失败都是害处最小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39页）①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列宁早在1914年11月就宣布了。（同上，第324页）②

列宁正确地认识到，不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才会给他提供夺取政权的机会。

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把列宁的预见天才捧上了天，但是却避而不谈列宁对世界革命前途和世界社会主义所做的预言变成了纯粹的幻想。列宁对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预测是不准确的。

这三个阶段是：

1、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腐朽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就注定很快灭亡。他的结论是："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2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7页。——译者注

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173页）[①]已经过了七十年了，这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却总是不肯死！而且，正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工艺领域做出了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就连世界无产阶级陛下也今非昔比了——他资产阶级化了，逐步变成了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了（只有顽固不化的苏联教条主义者还一直在宣传马克思和列宁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

2、列宁以为，他科学地论证了俄国革命必然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和第一阶段。其实不然。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是红军的刺刀带来的，并且时至今日仍是靠红军的刺刀来维持的，而在中国，宣扬民族主义和土地改革思想的毛泽东取得了胜利，就是说实际上，这一胜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取得的。

3、列宁以为，共产党国家之间将不会有边界，他们将会组成一个“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50页）[②]而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由苏联一手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不仅不愿意加入“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相反，却不得不对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占领，以便使他们仍旧保持为共产党国家。而两个共产主义巨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建筑在不间断的边界流血事件之上的。然而，他们却都以列宁的名字发誓赌咒！

列宁对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内部发展前景所做的预言也没有实现。我们只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几点：

1、列宁在1917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写道，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1页。——译者注

国家”。（《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52页）①然而，警察、常备军和特权官吏正是共产主义专政半个世纪以来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

2、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十五个月后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正如马克思学说所指出的那样，将出现一个国家消亡的过程。“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8—399页）②

看一看苏联现存的史无前例的官僚统治机器和国内的酬劳制度，列宁的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不切实际、多么幼稚啊！在世界各文明大国之中，苏联是唯一不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挣多少钱的国家。

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收入“秘而不宣”自有他的道理。

3、列宁在1919年的党纲中写道：“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是……**暂时办法**。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同时党也将努力缩小其范围，并将其完全废除。”（《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414页③；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党的寡头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5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7—208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2页。——译者注

政体已经借助这些“暂时办法”在苏联实行了五十二年的统治，虽然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声称，在苏联“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早已消失。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根本之根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要算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幻想之中的最大幻想了。

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武断结论只是一个幻梦。在苏联，一个旧的、由特权有产阶级组成的阶级体制被新的、由特权统治阶级组成的苏维埃阶级体制所代替。

从前有钱就有权，现在是有权就有钱。列宁当年总喜欢说，俄国是由十三万地主统治的，现在新的苏维埃俄罗斯则是由近五百万高级和中级官僚主义者所统治。

统治者数目增加了，人民却未感到轻松。至少这不是列宁所说的那种部长不应比工人多拿工资的社会主义社会。

还可以继续历数列宁的未兑现的预言，不过上述事例已足以证明：在历史裁判的面前列宁只通过了一项考试：他埋葬了民主并发明了一党专政，这一专政的必然结局是斯大林的暴政。

1924年5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七百四十八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四百一十六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党员和候补党员（因列宁逝世而拉入党内的候补党员，即“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就占了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人）。加米涅夫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了简短的、纪念列宁的讲话。他说，“列宁永远是我们的旗帜，列宁主义永远是我们的纲领”。代表大会的代表瞻仰了列宁墓，并在列宁墓举行了

少先队检阅（“少年列宁主义者”）。在检阅式上发表讲话的有加米涅夫（记录上写道：“长时间的掌声”）、布哈林（“长时间的掌声”）、李可夫（“掌声”）、托洛茨基（“经久不息的掌声”）。托洛茨基对少先队员们说：“你们要记住，象列宁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出现一次。任何人也不可能成为列宁。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列宁主义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707—709页）

代表大会确定的议程是：

1、季诺维也夫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2、斯大林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3、库尔斯基做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4、古比雪夫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5、布哈林做共产国际的总结报告。

6、商业和合作社（报告人加米涅夫、克尔仁比诺夫斯基、安德烈耶夫）。

7、关于农村工作（报告人加里宁、克鲁普斯卡娅）。

8、关于对青年的工作（报告人布哈林）。

9、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人莫洛托夫）。

10、梁赞诺夫做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报告，加米涅夫介绍列宁研究院成立。

没有让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做报告。并且，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谴责托洛茨基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就是说大会又一次谴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及其拥护者（“四十六人纲领”），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谴责，因为托洛茨基除要求中央委员会执行1923年中央九月全会的关于发展和加强党内民主的决议外，别无他求。

季诺维也夫在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首先读了别兹缅斯

基献给代表大会的一首诗：

一个人慢慢地、威严地
制止住喧哗……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
同志们，不行啊！
他似乎要倒下
…………
看来，他思绪万千，
精神恍惚。
深邃的目光中，
藏着痛苦。
中央政治报告，
竟不是由列宁在读……

从季诺维也夫的报告来看（他自己也承认，他说："的确抓住了关键。"），"不行啊"的含义很深。但是，季诺维也夫对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所做的工作仍给予了乐观的评价，他说："虽然没有了列宁，没有了灯塔，没有了世界上最天才的人，中央委员会对过去一年的总结仍是满意的。"

从"三人帮"保住了手中的权力这一点来看，过去的一年无疑是令人"满意的"，列宁的逝世，也是"满意"的内容之一。列宁的那份"遗嘱"，"三人帮"当时不仅不让全党知道，也不让中央委员会知道，现在列宁逝世了，"三人帮"也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列宁的"遗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那么可怕了。

然而，"三人帮"还是不敢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布这份"遗嘱"。在非正式会议上他们向一些代表团传达了"遗

嘱”的内容，但是没有给他们看原件，更不准他们泄露和讨论“遗嘱”的内容。“三人帮”告诉他们说，列宁在“遗嘱”中对“某些中央委员”做了评价。至于列宁给谁做了评价，做了什么样的评价，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斯大林在粉碎一个又一个的敌对者集团时，曾一段一段地援引过“遗嘱”中的话。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自己的鸿运紧紧同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宝座联在了一起，把他作为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工具。他们非常清楚，列宁的这枚用来炸掉斯大林的炸弹，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三人全部炸死。因此，列宁写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也没有宣读，代表大会的领导成员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季诺维也夫的报告照例是冗长、空洞的，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是却不乏廉价的冷嘲热讽。不过报告中有些地方是值得一提的。季诺维也夫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的情绪时援引了列宁格勒工程师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的话。这位非党员工程师说：“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首先应该给人们的是生活必需品，而我们知识分子却说，首先需要的是人权……这是全部力量之所在。现在我们没有人权，我们将一直采取消极态度，直到获得人权为止……知识分子是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农民也好，工人也好，手拿毕业文凭的人也好，都是人，他们把人权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并认为，人是国家的至宝。”季诺维也夫回敬这位列宁格勒的工程师说：“十分清楚，在我们共和国里，他们是看不到这种权力的，如同不照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103—104页）在谈到警惕性时，季诺维也夫对代表们说：“要记住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它对我们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侵蚀我们的机体和思想。”季诺维也夫在谈到反对派时，建议他们走上大会讲坛，说：我们错了，

党是对的！季诺维也夫忍不住强调了自己在党内的首要地位，他说："有人对我们说：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预言，十分之九的人会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他的话是对的。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得看看再说。同志们，那你们就看一看吧。（长时间的鼓掌）"（同上，第106—107页）。

季诺维也夫结束报告时，据记录中记载，"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起立唱国际歌"。连列宁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记录中没有说斯大林在做完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不过，斯大林明确、严整地论述了这样一个理论：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级组织和所有领域拥有全权。他把干部政策视为这一理论的中心，他要求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为"培养工人阶级领袖人物的学校"，变省和县委员会的全会为"培养地方和区域领导人的学校。"（同上，第121页）斯大林建议要经常从上至下地提拔"青年党员"以充实干部队伍。斯大林在谈到反对派时说，"那些不久前还叫嚷我们的党要灭亡的反对派分子，使人想起应当称他们为党内的外国人"。（同上，第127页）

"三人帮"及其领导下的党机关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论战时表现得极其粗鲁，他们的方法是"诽谤吧，诽谤吧，——这总会有某些作用的"。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派别斗争进行得最激烈时，这种方法也是不准使用的。现在中央委员会援引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声明》的作者们加以谴责，但是不是谴责他们另立派别，因为实际并不曾有过这种事，而是谴责他们竟敢给党写信，批评党的执行机关

——中央委员会。批评党的机关被宣布为犯罪，并且竟然是从党的立场出发宣布的。

在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者或曰反对派分子之中，有四个人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们是：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客人苏瓦林。

托洛茨基答应克制自己，不进行任何论战，因为论战可能会使局势加剧，也可能把个人因素带进辩论之中。这大概是托洛茨基在党的所有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次最有内容、论据最充分的发言。同时，这一发言无论就其形式或语调，都与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们所进行的粗暴、简单和放肆的论战成鲜明对比，因为季诺维也夫继乌格兰诺夫之后竟称托洛茨基的发言是“议会式”的演讲。他对什么是他所认为的“议会式演讲”做解释说：“归纳起来，议会式的演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发言者所说的不全是由衷之言，甚至全然不是他所想说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一边在议会发表演讲，一边同‘窗外的’另一些人讲话……我认为，在托洛茨基的发言中这两个特点都具备”。（同上，第251页）从党的正统观点来看，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的讲话如此无懈可击，以致季诺维也夫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样，说这一讲话是言不由衷。

既然实质上已不可能对托洛茨基的立场进行批判，于是就批判起他没有说出的话来，按“三人帮”的看法，他本应该说出这些话。这种应付论战对手的高招是斯大林发明的。

托洛茨基开始摆事实，他说，1923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自己一致通过决议，“公开宣布改变党内政策”，以便消除——正如这个决议所说——**“已经出现的党的机关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同上，第146页）

应当指出，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并非出自中央委员会的本

意，这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所做的妥协（斯大林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谈过此事）。鉴于广大党员的压力日益增大，政治局被迫暂时做了这一妥协。因此，中央委员会虽然公布了12月5日决议，但是却完全不想依据这一妥协的决议行事（难怪这一决议过去和现在一直不曾被收入党的法典汇编——《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一书中）。但是，托洛茨基却利用了这一决议，他在三天之后，即12月8日，发表了他所写的著名文章《新方针》，这篇文章象是对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所做的评论。

现在党的历史学家几乎将《新方针》定为反革命文件（克柳切娃《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巩固》1970年俄文版第129页），虽然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委员会同意才于1923年12月11日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的。不言而喻，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一些使“三人帮”大为不快的事。只需举三段话就够了：

1、“党分两个阶层：上层做决策，下层只能了解决策。”（托洛茨基：《新方针》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页）；

2、“旧方针的危险性在于……这一方针暴露了这样一种倾向，几千名构成领导干部队伍的同志同其他群众（作用对象）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同上）；

3、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对官僚主义所做的谴责即是对领导干部的谴责，不想理解这一点就是可笑的、不体面的鸵鸟政策……问题出在机关方针上，出在官僚主义倾向上。官僚主义是否孕育着蜕变的危险？谁否认这一危险，谁就是盲人。官僚主义化会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管理、选择、撤换问题上，会使眼界缩小，会使革命的嗅觉变迟钝，也就是说，会使老一代人多多少少发生蜕化变质……只有那些怀着病态的、官僚主义报复心理的人和具有盛气凌人的官僚机关作风的人，才会

把这一依据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所做的警告看成是一种'侮辱'，一种'居心不良'，等等。”（同上，第13页）

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正是依据12月5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对他的论点做了解释。

因为布哈林是“三人帮”在政治局里的最忠诚的志同道合者，所以托洛茨基举了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以证明党机关官僚主义在日益发展。布哈林在那次会上说：“导致我们党几乎发生危机的缺点多得无数……通常基层组织的书记是由区委任命的……他们来了便问：'谁反对？'因为他们怕有人反对，所以有关的人都被任命为支部书记……我们那里大部分选举是流于形式。会议议程也是老一套……先是读事先拟好的决议，然后照例要问……'谁反对？'因为不便发表反对首长的意见，于是问题到此便告一段落……这就是我们党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个司空见惯的典型……'没有任何争议！'，'谁反对？'等等这一套做法把党内生活化为乌有了……我所举的是我们基层组织的几个例子。我们党的其他各级组织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形式有所改变罢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147—148页）

托洛茨基引述完布哈林这位“有名气的中央委员”的话后指出，布哈林所指出的理由，“促使中央委员会大体上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内部对这一决议有各种各样的歧见），在决议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的利益……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即切实地、系统地贯彻工作民主原则。”（同上，第147—148页）

无论是《新方针》，还是《四十六人声明》（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亚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德罗勃尼斯等人），都要求贯彻中央委员会的这项一

致通过的决议。非常荒谬的是，现在形成了这样的形势，即“三人帮”根本不打算贯彻这一决议；“三人帮”只不过想借助12月5日的决议来对付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却真地以为使党官僚化的旧方针完结了，从今以后开始实行“新方针”了。

中央委员会想这样贯彻党内“工作民主”，其结果是让党有更广泛的权力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谁批评中央委员会，就根据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中所做的指示加以制裁。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反对这一点。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从12月5日决议中所引用的那段话，正是说“只有经常的、生动活泼的思想生活才能保全党。革命前和革命时期一直是这样，党组织经常批判地研究过去的工作，改正自己的错误，对重大的问题展开集体讨论。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确保偶然出现的分歧不会导致成立派别集团……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倾听广大党员的意见，**不要以为**所有的批评都是派性的表现……”（同上，第152页）

托洛茨基在结束引证时说：“这就是中央委员会那项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和理由从我们的记忆里或是从党的历史中抹去这一决议。”（同上）

但是中央委员会将所有这一切都从记忆和历史中抹去了，况且，从文风上判断，这项决议的作者还是托洛茨基本人，不过后来斯大林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指出，不管12月5日的决议怎么说，中央委员会认为任何批评中央委员会的行为皆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四十六人”的评价）。托洛茨基在结束这一部分讲话时指出，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策使他“深感怀疑和极为担心”。

季诺维也夫要求托洛茨基上台说，在这场辩论中党（“三人帮”）是对的，他是错的，对此托洛茨基回答说：“既然是反

对自己的党，那我们谁也别想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党最后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主要任务的唯一历史工具。说一切批评、声明、警告和抗议皆是错误的——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是，同志们，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反对党是不可能正确的。只有和党意见一致和通过党发表意见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开辟其他实现正义的道路……不管在个别情况下它正确与否，它是我的党……如果有的同志认为，我不该在这里宣扬这种或那种危险，那我却认为，我只是在履行党员的义务……不仅某些党员，而且党本身也可能犯一些错误，例如最近一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某些决议。”（同上，第158—159页）

“三人帮”说，托洛茨基反对派别，但是却维护小集团的权利。托洛茨基对此予以坚决反驳。他说，派别和小集团都是一回事。不过中央委员会应该执行一种不给派别和集团以口实的政策。托洛茨基结束发言时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人认为党做出的决定是不公正的，那他就会说：‘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但是这是我的党，我要为党的决议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到底。’”（同上，第159页）

我们详尽地引证了托洛茨基的讲话，目的是证明，从列宁的正统观念来看，他的立场是多么无懈可击，他的对手们要揭露“托洛茨基主义”是何等的困难，这一切造成了党机关不是在反对托洛茨基所说的话，而是在反对党机关本身强加给他的罪过。“三人帮”硬说他不愿意同党的官僚主义化做斗争，拿加米涅夫的话说，他“企图在党内发动革命”。（同上，第202页）甚至连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对全党所做的权威性声明和对这一切的反驳，“三人帮”都不予理睬和承认。下边是关于“派别”和“集团”的一个例子。加米涅夫就此挖苦说：“托洛茨基同志声

明说，他过去不承认、将来也不承认组织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是派别的别名。这真如谚语所说：复活节前赠送鸡蛋才珍贵！如果托洛茨基早把这一想法告诉我们莫斯科人和我本人，或是刊登在11月间的报纸上，那我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和精力呢。”（同上，第208页）

然而斯大林在结论中仍坚持说托洛茨基赞成搞小集团，说似乎正因为如此12月5日决议才“只提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显然没有读过这一决议，因为这项决议不但禁止搞派别，也禁止搞小集团。”（同上，第231页）

斯大林说，“三人帮”利用托洛茨基不懂党的政策这一点欺骗了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这样天才的谋士来说，这种说法实在是不高明的。然而，一切证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莫须有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材料均是靠这种手法搞出来的。随着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达到顶点，这种手法也越来越具有在党内制造大冤案的性质。

继托洛茨基发言之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发言表明，“三人帮”为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变成一个反托洛茨基的代表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尽管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本人也要在代表大会上讲话。

一个名叫乌格兰诺夫的来自地方的“无产者”声称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省的领导人”，他重复斯大林的话说，托洛茨基不了解党，“党已不是1917年的党，也不是1919年的党……党已不是处在预备班的阶段……党已经不象1918至1919年间那样管理国家了。”（同上，第160页）换言之，“三人帮”管理国家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要强（一两个月以后，“三人帮”怀着感激的心情任命了“不识字”的乌格兰诺夫为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解除了识字的但却是摇摆不定的泽林斯基的这一职务）。

另一位“无产者”代表伊万诺夫说，“托洛茨基同志确实巧妙地回避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问题，尽管我们不会高谈阔论，但是我们这些无产者仍然看得很清楚……托洛茨基同志未免太过分了。”（同上，第168页）

第三位“无产者”代表扎哈罗夫说，托洛茨基所说的民主正是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倡的那种民主，社会革命党就是毁于这种民主的，因此“我希望托洛茨基同志能走上讲坛，承认错误。”（同上，第171页）

这就是“无产者们”同托洛茨基进行争论时所具有的政治水平。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决定向代表们指出人为地扩大分歧的危险性。她声明说，季诺维也夫要求托洛茨基“走上讲坛认错”，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克鲁普斯卡娅说：

“从心理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反对派只要声明愿意共同工作就够了，托洛茨基在发言中已经做了这样的表示……”（同上，第225页）

克鲁普斯卡娅对人为地加剧反对派问题表示了明确的不满。她说：“不应再重演过去的辩论……（这）会使过去的反对派同党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过于尖锐起来。”（同上，第225页）

克鲁普斯卡娅显然不明白，在托洛茨基没有从政治上被埋葬之前，“党的核心”根本不会认为反对派已经是“过去”的事。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所发表的结论竟然使克鲁普斯卡娅也清楚了这一点。季诺维也夫答复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中央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对敌人的失败幸灾乐祸……我们要他们做这一声明，是想使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放心，以便使同志们回去后能够说：他们当然已经停止胡闹了……我现在要问你们，他们所做的声明使你们放心吗？（听众回答：“不放心！不放心！”）他们使你们满意了吗？（听众回答：

“不满意！不满意！”）你们回到地方上之后，在报告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该说些什么呢？你们是否该说，他们又故技重演……我们是不能将关系到布尔什维主义基础的问题置之脑后的。”（同上，第256—257页）

有人提出了一项“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路线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对反对派做了谴责，并建议把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反对派的决议列入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主席问，还有人提决议案没有。当他看到没有人再提决议案时，就开始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一决议？谁反对？不用数了，因为没有人反对。谁弃权？没有人弃权。决议一致通过。”（同上，第263页）

这种前所未有的一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

古比雪夫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总结报告。他是斯大林最忠实的战友和走卒，他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党机关镇压党内一切反对思想的辅助工具。中央监察委员会逐渐变成了党的秘密警察，它在党内如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在人民中间一样，起着警察密探和刑事法庭的作用。古比雪夫甚至对中央监察委员会所起的这种作用大加张扬，他说，“中央监察委员会捍卫了中央委员会，使它免受反对派的攻击。”他还说，“有人想使我们奉行独立的路线……对所有争论的人进行公正的、心平气和的裁判……有人阿谀奉承我们说：‘你们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机关，你们同中央委员会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规劝说，我们应当不偏不倚地行事，我们应当成为超出于目前斗争的一级组织，——这一颇有吸引力的立场未能吸引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上，第263—264页）

反对派是否正确，它的论据是否有力——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列宁提议创建的独立于中央委员会之外的党的仲裁机关。列宁在自己的最后一篇题为《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还写道："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并且总要做到处理问题'非常正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87页）①然而，与列宁的指示全然相反的是，当时总书记的话对监察委员会来说是法律。

布哈林在做共产国际报告时，重复了人人皆知的中央委员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略方针。布哈林在报告中提出了十分奇怪的论调，他说，共产国际各党中的"极右分子"支持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例如，以勃朗特列尔为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就被认为是右派人物，他们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1924年4月他们被开除出党后，卢特、费舍和马斯洛夫的左派集团主宰了德国共产党。不久这个集团也被打成了"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对共产党员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策略的解释也是饶有兴趣和别出心裁的。他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声明说：

"我们把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是宣传鼓动群众、使工人阶级免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一种手段。站在德国共产党右翼的同志们以及得到我党反对派响应的同志们，显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们把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结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317、320页）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697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两名反对派分子——拉狄克和苏瓦林（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发了言。拉狄克用非常客气的语句批评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是靠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帮助取代了勃朗特列尔的党内领导地位的；但是拉狄克为表明新领导的理论水平是如何之低而举的例子则是很粗鲁的。拉狄克援引了德国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

“依据罗莎·卢森堡的组织原则，同勃朗特列尔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就等于用注射梅毒的办法治疗淋病一样。”（同上，第443页）

当时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苏瓦林的发言是最尖锐的发言，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操纵者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苏瓦林是1914年加入法国社会主义党的，是该党的左翼人物，与列宁通过信，是法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是《人道报》政论文章的主要撰写人。当就布哈林的报告所开展的辩论告一段落时，代表大会急忙要求他发言。于是苏瓦林发了言，在谈到托洛茨基问题时他说：

“法国共产党很多党员对论战的尖锐程度感到不安……他们觉得，这已经不是在陈述原则性的论据，而是在进行各种攻讦……托洛茨基的名字具有国际意义……他们觉得，诋毁这位革命大人物的尊严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以二十二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委托法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干预这一斗争，建议调停和中止论战……谴责托洛茨基同志为孟什维主义是毫无根据的……看不出这场斗争具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对托洛茨基同志进行了无数的诽谤，散布了无数的谣言。”（同上，第354页）

苏瓦林补充说，正是这场诽谤和造谣中伤托洛茨基的运动促使他站出来维护托洛茨基。尽管他知道，一切均已安排好，中央

委员会一定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取胜，但是他，苏瓦林，并不后悔采取今天的立场。记录中写道，当苏瓦林结束发言时，会场里喊道："可耻！"显然，苏瓦林讲话的内容是出乎代表大会的意料的。这个讲话说明了问题的实质：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开展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从思想上来说是无原则的，从理论上说是诽谤性质的，而从政治上说，这却是一场有目的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代表大会也清楚，这次大会是如何召开的，是由谁和为什么召开的。托洛茨基正确与否，这对代表大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一个论据有意义，那就是政权掌握在谁人手里。政权当时掌握在"三人帮"手中。因此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三人帮"正确。正因为如此，"三人帮"的路线才在一切问题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三人帮"终于在这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鼓起勇气向代表们传达了列宁的"遗嘱"。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正象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那样，"三人帮"也没敢宣读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三人帮"只向个别代表团讲了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大意，而列宁的本意是要将这封信在大会上宣读，并对他提出的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进行表决。不过，这并不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列宁本人也未必能在斯大林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实现自己的意愿。难怪早在上一次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列宁就建议托洛茨基与他结成"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以反对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斯大林。一年后的现在，他的权力变得更大了，然而主要的是，这一权力现在已变得坚不可摧了。

斯大林的这一权力的外部特征在代表大会上全然看不到。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只做了组织报告。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宣布开幕的。季诺维也夫以党领袖的身分做了政治报告。季诺维也夫最后又做了结论。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宣布闭幕的。这和斯大林有什么

关系呢？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还不知道，他们在代表大会上是为真正的主人斯大林扮演了体面的陪衬角色，选举了五十三名中央委员和三十四名候补委员。反对派分子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再次当选。拉狄克被撤销了中央委员职务。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有三十四人，候补委员名额增加了一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由五十人增至一百五十一人。所有新当选的委员皆是纯正的斯大林主义者，可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以为，他们不是斯大林个人的拥护者，而是“三人帮”全体成员的拥护者呢。这个误会很快便消除了，虽说是快，实际是迟了。直到这最后一刻，斯大林一直没让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知道他对后者的真实看法。可能斯大林的看法同一个现代人对拿破仑三世的看法是一样的：“他当然不是一个伟人，但是他的错误是天才的。”

讲一件小事：党内有这样一条规定，一个人自打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民主小组起就算是共产党员了。因此列宁是1894年入党的，托洛茨基是1897年入党的，斯大林是1898年入党的，拉狄克是1902年入党的。列宁生前的所有代表大会的记录均是如此记载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却说，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1917年才入党的。

政治局的组成依然如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列宁在政治局留下的空位由布哈林补上了。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和索柯里尼柯夫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处变得非常理想了，这是斯大林从进入政治局的第一天起就向往的那种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第二书记（总书记的副手）——莫洛托夫，第三书记（主管干部）——卡冈诺维奇。三人都成了组织局委员。从此老的“三人帮”——季诺维

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被新的“三人帮”——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所代替，成了党和国家的实际操纵者。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没发觉他们是如何失掉权力的。斯大林根本没有触动他们。他只不过自己退出了“三人帮”，并顺便搞了一个技术性的“小部门”：中央委员会机关。凭借这个“小部门”，斯大林很快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政治上将政治局阉割了。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觉时，斯大林已给他们做完了手术。

第二十五章

季诺维也夫的新反对派

自从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搞反对派别的决议后，再没有人敢于用组织志同道合者小组的办法与党机关进行斗争了。因此，从1923年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开始，没有一个反对派是自己组成的，它们皆是斯大林用宣布党的活动家的实事求是的建议为“反党倾向”，或宣布集体的声明为拼凑“反党派别”的办法人为制造的。之后，按照事物的逻辑，斗争变激烈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是写给党员的，《四十六人声明》是写给政治局的。“三人帮”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将他们捏在一起，宣布他们是在派别基础上成立的“左倾反对派”。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斯大林也正是用这种办法制造了季诺维也夫的“新反对派”和布哈林的“右倾反对派”。甚至连所有反对派的名称也是由斯大林本人定的。

当代有些人说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是个喜怒无常、多愁善感、骄傲自大的人，在危险时刻他是个惊慌失措的人，胜利时他是一个干劲十足的人，而掌握政权后又是个残酷无情的人。在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主宰红色恐怖的人不是列宁，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契卡在全俄范围内所干的事情，季诺维也夫依靠乌里茨基也在彼得格勒干了，为此乌里茨基于1918年夏理所当然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共同商量才能为全党解决的那些问题，季诺维也夫自己一人就为彼得格勒及西北各省的党组织解决了。有时他从革

命的第一个首都发起“倡议”，竟然为全党解决问题，如1920年工会辩论时就是如此，这些我们前边已谈过。在这场辩论中“十人集团”名义上也是由他而不是列宁领导的，至于斯大林，他在“十人集团”中只不过是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的助手。

季诺维也夫在起义时曾有过反列宁的行为，胜利后他又总是对建立一个由所有苏维埃政党（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问题摇摆不定，列宁不仅原谅了他，而且还任命他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用他取代了托洛茨基，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又任命他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为了季诺维也夫的方便，列宁甚至同意在彼得格勒建立一个平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府邸。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列宁不仅长于利用自己学生的力量，而且还长于利用他们的弱点。他知道，象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这种人，无止境的虚荣，再加上同样是无止境的权欲，这就是他们的动力。因此列宁同他们分享权力，这样做的目的，第一，能使他们经常与托洛茨基相对立（列宁错误地认为托洛茨基是他的潜在对手），这一目的他达到了；第二，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变得更驯服些，这一目的他显然没有达到（见“‘三人帮’的反列宁阴谋”一章）。

然而列宁对斯大林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从1917年开始，他才对斯大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列宁却认为季诺维也夫是自己人。战争期间列宁曾与季诺维也夫合伙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反潮流》，并且在内封上季诺维也夫的名字还排在列宁前边。很难解释，季诺维也夫的哪些品质使列宁对他如此器重。诚然，季诺维也夫侨居国外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经常在列宁手下做编辑工作，为他校订浩如烟海的侨民出版物。作为一个政论家，他不是里手，而是二流人物；在分析问题方面，他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演说方面，人们只认为他是一个“鼓动员”。当你读他的讲话或文

章时（二十年代初，他同列宁、托洛茨基一起，着手出版他的《选集》），你不仅找不到任何新颖的思想，甚至看不到任何文采，而且找不到最主要的东西。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作家怎么会对列宁和全党产生那么大的思想影响。美国教授丹尼尔认为，季诺维也夫的最后一部成熟的著作《列宁主义》(1925年)，也是一本"枯燥异常的书"（R·V·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259）①

但是，一个蹩脚的演说家、平平常常的政论文作者，甚至是一个知识很少的人，却可以成为政治游戏的大师。季诺维也夫却连政治游戏的大师也不是。"三人帮"的统治及"新反对派"的斗争的全部历史就是证明。现在只剩下一个推测了：季诺维也夫曾参加过那个党领导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曾以布尔什维克侨民中央的名义接受过德国教授帕尔乌斯—益耳冯德的钱。从有关此事的全部材料来看，这个小圈子只由下面四个人组成：列宁本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帕尔乌斯的直接联络员加涅茨基。在这件事情上，列宁是被季诺维也夫攥在手中的，如同他们俩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被斯大林攥在手中一样，因为斯大林曾伙同加米涅夫追问过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出版《真理报》所用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相反，季诺维也夫的朋友和同志列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却是另外一种人。他与季诺维也夫年龄相同(1883年出生)，和他同一年入党（1901年），也和他一样是个犹太人（舒勃说，加米涅夫是个半犹太人，见他的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俄国的政治活动家》第372页，1969年版），在国外时加米涅夫也和季诺维也夫一样，一直与列宁共事，在编辑工作中当列宁的副手。但是，

---

① 丹尼尔：《革命的良心》1960年英文版第259页，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注

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不同的是，他于1912年回俄国搞地下工作，曾任《真理报》总编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领导人，属于党内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他在1912年启程回国前，受列宁委托，写了一本旨在反对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八月联盟”的书，书名是《两个政党》，列宁为该书写了前言。他是一个博学多识的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熟虑的政论家和宽宏大量的辩论家，在这些方面使得他能处在甚至比列宁更有利的地位。列宁认为他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但似乎又遗憾地补充说：“但作为一个行政首长他却不怎么样!”在生活的危机关头，加米涅夫不仅表现得勇敢，而且沉着。1915年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五名成员之所以未被法庭判处死刑，正是多亏加米涅夫表现沉着，多亏他所制定的英明的辩护策略。加米涅夫当时也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他们一起受审，并和他们一道被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他从流放地返回，并担任了《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直至列宁回国。斯大林是他在《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间的同事。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整个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一致批驳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并继续坚持对临时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的观点，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结”。

四月中旬，斯大林见列宁在党内的胜利已属必然，便背叛了加米涅夫，转而归附了列宁。在四月底举行的全俄党代表会议上，只有加米涅夫一人勇敢地、始终不渝地捍卫旧中央委员会和旧《真理报》的路线。在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他服从了纪律。他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由九人组成。当发布了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命令（因他们接受德国的钱）之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认为最好躲藏起来、不去革命民主法庭受审时，加米涅夫又成了党的首领。他不仅宣布声援列宁，而且

广泛组织工人、士兵、知识分子，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参加争取撤销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命令、对“诽谤者”追究责任的运动。根据加米涅夫的委托，斯大林就苏维埃为列宁说项问题与他的格鲁吉亚同乡、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和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策烈铁里进行了谈判。同时加米涅夫着手改组党，以便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列宁怕自己遭逮捕后被害，所以，指定了加米涅夫为出版他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的代办人。

临时政府也发布了逮捕加米涅夫的命令。但是他没有躲藏，他情愿去民主法庭受审（这对加米涅夫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从1912年起就呆在俄国，所以他没有直接参与接受德国钱一事）。没有任何人想触动斯大林。他甚至没有转入地下。但是现在党的整个领导权恰恰落到了他的手里，因为他是老资格的中央委员。

在1917年10月10日至16日举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曾同季诺维也夫一道投票反对起义，但是在举行起义的那个夜晚，从10月24日到25日，他同托洛茨基一道，在斯莫尔尼宫领导了他所不同意的起义。起义后他任苏联议会——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起义后加米涅夫同许多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一道，建议成立一个由所有苏维埃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列宁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于是加米涅夫提出辞去自己的一切职务。

直到1919年他才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他马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后来所有的党内辩论中，加米涅夫一直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1922、1923和1924年初列宁生病期间，加米涅夫代理过政治局和政府主席职务。

但是加米涅夫有一个“缺欠”，这注定他在“三人帮”中只

能扮演消极角色：他缺少季诺维也夫的那种虚荣心和斯大林的那种坚强意志。在智力上加米涅夫比他们两人都胜一筹，但是他却不善于使用其他两人所使用的手段。既不善于象季诺维也夫那样使用政治蛊惑，也不善于象斯大林那样搞复杂的阴谋诡计。加米涅夫之所以能两次当上俄国党的领导人（1912、1917年），这不是他的虚荣心而是客观事件造成的。如果抛开十月革命的某些个别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直同列宁一道构成党内生活的"布尔什维主义三巨头"，它为全党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全党官方机关的所有重要著作、纲领和决议都有这三人的签字。斯大林是于1912年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安插在中央委员会的，在党内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作为党的政论家更不被人所知晓（如果不算他1912年所写的民族问题的文章的话），因而"三巨头"不会变为"四巨头"。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要补充一点：两个人都不具备共产主义专政条件下领袖人物（政权组织者）所应有的品质。早在1924年，即"三人帮"执政时期，斯大林就论述过这些品质应该包括什么："在我国条件下做一个领袖和组织者，就是第一，了解工作人员，善于掌握他们的优缺点……第二，能够这样配备工作人员：

"（一）使每一个工作人员感到自己适得其所；

"（二）使每一个工作人员一般能按他们个人的才能对革命做出最大贡献；

"（三）这样配备工作人员的结果不是使整个工作停顿，而是使整个工作协调、一致……

"（四）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作的总方向是要体现和实现把工作人员配备到合适的岗位上去的那种政治思想。"（《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277—278页）[1]

[1]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1—242页。——译者注

从1922年起，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一“领袖理论”行事的，他巧妙地将他的人安插在国家、军事、契卡、思想和党的机关之中，当然党机关是他首先考虑的部门。然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完全陶醉于做列宁弟子的光荣，连垂危的列宁都已察觉的事他们竟一点也没察觉，列宁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

一年半后，召开了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斯大林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自己的领地。斯大林的“无限的权力”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权力。直到现在斯大林才首次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白，谁是党的真正主人。

的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已开过（1923年），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扩大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从而确保了自己的绝对多数；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也已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再次遭到政治谴责；列宁业已逝世（1924年1月21日），千钧一发的危险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可以自由地摊牌和解散“三人帮”了，但是，他不有意识地去做这一点。

讲究方式、耐心十足的斯大林并不急于求成。他想，托洛茨基只遭到打击，并未被粉碎。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应当把托洛茨基除掉，借不走运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手除掉他。因此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仍由季诺维也夫做，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须同意不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列宁临终前所写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依旧选斯大林为党的总书记。斯大林还准备再做一个让步；他同意在季诺维也夫的府邸列宁格勒召开下一次即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

一切都是按此计划进行的。托洛茨基再次受到谴责，斯大林重新当选为总书记，下次代表大会已确定在列宁格勒举行。

然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未来得及返回各地，便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十六天，即1924年6月17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县委书记训练班上做报告总结这次代表大会时，向全党讲了一些令人惊奇不已的事：

秘密的"三人帮"成员，公开的政治局的主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面前犯了一个理论上的大错误。季诺维也夫说，在我国是"党专政"，加米涅夫则说我国不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而是"耐普曼的俄国"，"即耐普曼统治的俄国"。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论错误大为不满。没有点季诺维也夫的名字（但是全党都知道指的是谁），加米涅夫被点了名，报告刊登在《真理报》上。（《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257页）①现在稍微有一点党员嗅觉的人都明白，斯大林所做的理论批评不是在练文笔，这是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发动政治进攻的信号。这真是"过河拆桥"！不出所料，以新的"独立派"（他们是斯大林所挑选的中央委员）为首的地方组织被一致谴责有篡改列宁主义"新举动"的自发反应，并且说，很快全省都参与了这一举动。于是斯大林不怕违背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的指示，越过中央全会做出新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一决定的目的很明确：批驳季诺维也夫企图在列宁格勒使人们彻底承认他是党领袖列宁的继承人的行为。事态的新发展完全是自然的。托洛茨基失去了列宁继承人的地位，因而反托洛茨基的"三人帮"解体了。真正推动党前进的人——斯大林成了党的领导人。

搞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打成"新反对派"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和组织好了，还造了舆论（地方党组织的决议）。这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4页。——译者注

时发生了两件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暂时打破了斯大林的全盘战略计划，“三人帮”——确切地说，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得救了。

1924年8月格鲁吉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起义是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所领导的，它有蔓延全高加索的危险。起义者提出的民主纲领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同喀琅什塔得精神完全一样，因此斯大林担心起义会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引起反响。第二件事同样很突然，至少形式上如此，并且就它所具有的突如其来的揭露性来说，更令人不快。十月起义七周年前夕，托洛茨基出版了他在起义准备阶段所写的文章汇编，书名是《1917年》，他为这本书加了个序言，这个序言比所有托洛茨基的书更为有名。序言的标题是：《十月革命的教训》。其主要论点是：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前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4月列宁回国前对临时政府执行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的调和政策。列宁反对旧布尔什维主义和这个机会主义的领导班子。列宁完成了“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实际上站到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立场上（“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正统派布尔什维主义的前领导人在起义的决定性日子里胆怯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者蜕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也未能避免这种蜕变。革命者要在革命中经受检验，如同游泳健儿要在游泳时受检验一样。托洛茨基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全党都知道，这是讲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同盟者斯大林。这使分崩离析的“三人帮”重又联合起来。斯大林本人对这两件事的反应也可以证明，这些事件是多么出其不意地搅乱了斯大林的战略计划。1924年10月22日斯大林在农村党支部书记会议上发表演说谈到格鲁吉亚起义的危险性时说：“应当把格鲁吉亚事件当做前车之鉴。

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事件。”（《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09页）①

看来，鉴于这一危险，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还应该保持下去。

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所做的反应，使他一举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把托洛茨基降到七名领导过起义的普通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二）口头上是在维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载有他们投票反对起义的10月10日和16日中央委员会的记录首次公布了出来；（三）提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和“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人员名单，斯大林是两个总部的委员，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第一个总部的委员。（《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26—327页）托洛茨基证实说，这个中心从未召集过会议。斯大林似乎是一带而过地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确实投票反对过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并声明说，起义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也没有起过什么“特殊作用”，因为他不是“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成员……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说法是奇谈……”（同上，第329页）这里我们要指出，根本没有过任何“实践总部”，只成立过一个“军事革命总部”，吸收了“革命苏维埃委员会”的委员为该总部的成员，托洛茨基是这一总部的领导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507页）

斯大林的这一讲法不仅同历史事实相矛盾，而且也同列宁对美国共产党党员约翰·里德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所讲的话相矛盾，这本书说，布尔什维克起义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7—268页。——译者注

下进行的。列宁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高兴地说，约翰·里德的描写是真实的。现在斯大林把这本书也归为“阿拉伯神话”一类的作品了（斯大林说：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因而就上了苏哈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25页）[①]当时有人提醒斯大林说，1918年11月6日他自己曾在《真理报》上写文章谈过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他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皆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这样快地转向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搞得之所以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写道，当有人对斯大林指出，他对托洛茨基所做的评价有明显的矛盾时，“他的回答更为粗暴了，仅此而已。”（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34页）斯大林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列宁回国前，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一条“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路线，而没有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间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当时党和列宁之间是不是有过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33—334页）不过后来，在四月底，全党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意了列宁的意见，而托洛茨基还是宣扬“不断革命”，即不要农民的革命（“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

当托洛茨基写到党的“右翼”和反对《四月提纲》思想的老的、保守的布尔什维克时，他当然也把斯大林包括在其中了。但是斯大林却耍了个滑头，把事情全推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去了。斯大林说：“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2页。——译者注

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26—327页）①

斯大林在维护他们的同时，也是在维护他自己；维护中央委员会，列宁回国前他曾同加米涅夫一道领导过中央委员会；维护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他们对列宁举行起义的要求差不多做了两个月（从九月到十月底）的抵制；最后，也是在维护党，他把组织和发动起义的主要作用归于党，而不是归于托洛茨基，甚至不是归于列宁。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使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到10月的整个准备时期是踌躇不决……万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指《十月革命的教训》。——作者注）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绕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同上，第331—332页）②

为了证明决定革命命运的不是个别人物（不是"小茅舍"般的托洛茨基，也不是"勃朗峰"般的列宁，——这是斯大林的比喻），而是党，斯大林做了一个大胆的、不容怀疑的结论："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28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87—288页。——译者注

物，而属于我们先进工人的伟大集体——俄国共产党。”（同上，第336页，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

这一次托洛茨基所选择的与斯大林辩论的时间、题目和手法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托洛茨基在策略上是软弱无能的。他以革命历史为题材所进行的习作是毫无必要的，反而阻止了“三人帮”内部已明显出现的分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推回到斯大林的怀抱，又给斯大林整整一年的时间，以便使他能充分做好镇压他自己杜撰的“新反对派”的准备工作。托洛茨基所写的那篇不幸的《教训》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为恼火，以致列宁格勒党组织一致要求将他开除出党。奇怪的是，正是斯大林断然否决了这一要求，他的狡猾目的是暂时在政治局里为季诺维也夫分子保留一个对立面。季诺维也夫分子责怪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温情脉脉，对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调和态度。因此“三人帮”内部又产生了新裂痕，多卷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认为这是“新反对派”形成的开始。

官方历史学家是这样描写这一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借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出版之际，对共产党员加以利用，他们蛊惑性地谴责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托洛茨基主义持调和态度。他们打算在讨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一月中央全会（1925年）上向政治局发难。然而，全会却一致支持政治局。于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走上了在俄共（布）党内拼凑秘密宗派集团的道路……这个集团叫做‘新反对派’。”（《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4卷第1分册第360页）那当然不是“集团”，而是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整个党组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党组织中出现了支持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小组，但是斯大林机关很快便不经任何辩论搞掉了他们，有的被撤职，有的被流放到边远地方。

列宁格勒的情况比较难办一些。如果在这里也进行镇压的话，那末只好把整个列宁格勒党组织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斯大林还没有想到这一点。由于斯大林机关篡夺了共青团中央的职权，所以列宁格勒团省委也站到了反对斯大林机关的立场上了。列宁格勒团省委当时正在筹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防止把共青团变为斯大林派别专政的工具。鉴于中央委员会中心理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已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变成了自己派别的机关刊物，列宁格勒省委决定在列宁格勒创办党的新的理论杂志。然而，中央委员会禁止这样做，虽然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这样的权利。于是从1925年春天起，斯大林着手制造"新反对派"，他的手段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每一项实际建议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建议，把他们的每一个理论观点说成是"反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1925年4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经济计划时声称，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没有西方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同上，第361页）

斯大林、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回答说，这是重复人们熟知的托洛茨基的提纲。于是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拥护者从斯大林的小册子《列宁主义基础》中援引了下述几句话："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61页）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译者注

斯大林被揭露了，在这一问题上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鼻祖，季诺维也夫分子满以为获胜了，他们问斯大林，他对他的上述论断做何解释？

斯大林用纯粹的斯大林方式摆脱了窘境：上述他写的话在当时，在1924年4月是正确的，当时他想向托洛茨基证明，我们能保持政权，但是现在，1925年4月，这些话就不正确了，现在如果我们能够不管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干涉的危险，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同上，第61—62页）爱讲俏皮话的拉狄克听了斯大林的这一新论调后开玩笑说：如果你能不管冬天和莫斯科的警察，那就可以在一月的严寒中光着身子在莫斯科特维尔街心公园中闲逛，但是冬天和莫斯科警察是否会不管你呢？拉狄克评论斯大林的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真的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话，那末它也可以在“一个县内”建成，如同谢德林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想在“一个县内创建自由主义”一样。

这是斯大林由于疏忽所犯的唯一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错误，他把这一错误归罪于季诺维也夫，因为后者不仅竟敢提到斯大林，而且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起此事。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上做总结时，竟把斯大林1924年4月所写的小册子里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拖出来，作为解决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础，——那末，季诺维也夫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弄糊涂了。”（同上，第65页）① 一年后陡然改变立场的斯大林没有“糊涂”，而没有改变立场、提醒斯大林说话前后不一的季诺维也夫反而是“糊涂了”。

斯大林所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如同第十二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页。——译者注

和第十三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一样，是有条不紊和踏踏实实的。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所涉及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私人朋友，其中包括列宁的妻子，而象列宁格勒这样重要的党组织又支持他们，所以斯大林决定把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做得更谨慎些。为此，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明目张胆地违反党章，决定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推迟九个月召开——从1925年春推迟到1925年12月18日至31日召开。

按照1924年秋大会的那种筹备精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拥护者、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泽林斯基被免去所有这一切职务并被派到塔什干任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书记。泽林斯基的职务由季诺维也夫的敌人乌格兰诺夫接任。斯大林还竭力想在列宁格勒党机关中做这种事，但是他只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季诺维也夫的亲密助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扎鲁茨基被撤职，他曾公开谴责斯大林和布哈林执行“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并说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变有在国内取胜的危险。他的职务由季诺维也夫的另一个敌人科马罗夫所接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两件事上都服从了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意志，因为形式上这是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当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还包括中央政治局所做的这样一项决定：建议政治局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国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继承者、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伏龙芝住院进行手术治疗，而伏龙芝本人是不愿意做手术的。伏龙芝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式将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拥护者。斯大林想把自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安插在这个位置上。熟谙斯大林的人都担心，斯大林的外科医生会猜出斯大林的意图，从而悄悄地为伏罗希洛夫腾出这一位置。不管怎么说，伏龙芝是死在手术台上的，伏罗希洛夫当上了军事委员。全党纷纷议论，说斯大林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杀害了“新反对

派”中对他最为危险的成员，苏联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为此还写了一部小说，书名是《红木》，并在国外出版（小说出版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儿，因为斯大林于1937年就将皮里尼亚克枪毙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也不得不指出：“不成功的手术十分突然地夺去了伏龙芝的生命。”（《苏联大百科全书》1935年俄文第1版第59卷第226页）

在1925年10月3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准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和大会议程。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首次委托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这是违反上两次代表大会的传统的。接着决定了代表大会不在列宁格勒(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决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此举行)而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次要彻底粉碎季诺维也夫觊觎党领袖地位的企图。虽然加米涅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做了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做了关于共产国际工作报告，但是加米涅夫的提纲未获批准，对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也未做任何表决，全会只“听取了”该报告。（《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146—147页）①

全会决定在党内发起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运动。中央委员会通过它派往各地的报告人从十一月起在所有党组织中开展讨伐“新反对派”的运动。然而普通党员群众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个“新反对派”，对于它的政纲知道得就更少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代表会议上、中央全会上，更没有在党的报刊上以这个反对派的名义讲过任何话。尽管报告人经常把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入倾向分子之中，但是要想从“倾向分子”本人那里得知他们的政纲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次十月中央全会禁止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2页。——译者注

进行任何“辩论”，就是说，禁止被谴责的人对他们所受到的有“反列宁”倾向的谴责进行辩解。官方历史学家谈到了事情的经过：“1925年11月底中央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了与反对派所存在的分歧。反对派政纲的某些论点在中央委员会于代表大会前发表的提纲中，在党的报刊上，其中包括在《真理报》的专栏“迎接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受到了批判……从1925年12月初开始，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展开了广泛的论战。”（《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俄文版第4卷第1分册第411页）如果说得婉转些，这段话里有两处是不确切的：第一，反对派的“政纲”不可能受到批判，因为它根本不存在；第二，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的“论战”也没有进行过，因为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一个反动派的论战观点。从1925年12月1日第二十二次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由季诺维也夫直接主持）所做的决定也可看出，斯大林要想把季诺维也夫分子打成具有反对中央委员会政纲的“新反对派”是困难的。决定说，代表会议“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25年12月4日《列宁格勒真理报》）

最后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建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承认错误的讲话。

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党内总的气氛就是如此。六百六十五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批准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由列宁格勒改为莫斯科）；2、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3、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莫洛托夫）；4、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库尔斯基）；5、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古比雪夫）；6、共产国际的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7、当前的经济建设问题（报告人加米涅夫，后来该报告被撤销）；

8、关于工会的工作（托姆斯基）；9、关于共青团的工作（布哈林）；10、关于修改党章（安德烈耶夫）；11、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不点名的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论战。他说，去年党曾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过争论，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争论时期。我深信党一定也能在这次争论中很快地取得胜利，决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事故。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现在我不来谈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的行动的实质……我想大会代表自己会谈到这一点，而我只要在结论中做个总结就行了。”（《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48页）①

斯大林的这种明显挑衅态度，促使列宁格勒代表团在大会的第二天要求让季诺维也夫发言作中央委员会的补充报告。季诺维也夫被允许做补充报告，但是他显然没能胜任对斯大林机关的派别政策进行有根有据的批判和建议代表大会对政策做决择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徒劳无益地、纯粹是按教条和繁琐的方式辩论起世界革命、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来。对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集体领导的命运即“三人帮”问题却一带而过。季诺维也夫是从历数党的主要工作困难开始的。他认为，第一个困难是，世界革命进程迟缓（“我们发动十月革命时曾以为，其他国家的工人会在几个月内，最多是几年内起来支持我们”）；第二个困难是，在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第三个困难是，列宁逝世后在党内建立集体领导。季诺维也夫曾热情地赞扬和维护过集体领导（“三人帮”），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名义上还是集体领导的主持人，现在他才发现，他只不过是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8页。——译者注

斯大林手中的一名小卒。他明白这一点之后，竟然没有勃然大怒，而只是忧郁地继续侃侃而谈："现在我才感到，我完全搞清楚了这一点（建立集体领导的困难。——作者注）。这一困难并非不重要，因为领导党也就是领导国家。这不仅是一个组织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

所有这些徒劳无益的、教条主义的伎俩，理论争辩和无数的列宁语录正是用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的：争论双方——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不是在争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是在为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季诺维也夫把国家资本主义宣布为苏联工业的主要形式后说，有的人把新经济政策宣布为社会主义，把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理想化，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不是社会主义……此处的大会记录中注明说，会场上有人大声贼道："谁这样认为？""这是政治常识问题"等等。季诺维也夫不知所措，他没有料到大会代表会对他做出如此无礼的反应。同是这些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喊过"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万岁！"而在上一次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逝世和托洛茨基被判处政治死刑，代表们只把他一个人当作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袖加以拥戴。季诺维也夫在代表们的愤怒叫喊声中走下讲坛，只有列宁格勒代表团对他表示赞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俄文版第98—109页）

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实质上多半谈的是布哈林的理论过错的话，而加米涅夫则最终想起了列宁的"遗嘱"，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撤销斯大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问题。加米涅夫声明说，"我们反对'领袖'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把政治和组织合为一体了，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政治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全权的机

构，同时主张书记处服从于政治局，并只完成政治局所做决议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那种能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成员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加米涅夫提出一个口号：“回到列宁的原则上去！”加米涅夫补充说，既然这一问题他不仅向斯大林亲自讲过多次，而且也向列宁的其他战友们讲过多次，所以他愿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代表大会记录说，此时会场的反应是：“不对！”，“胡说！”，“他摊牌了！”喧哗。列宁格勒代表团报以掌声。“我们不给你发号施令的权力！”“斯大林！斯大林！”代表们起立向斯大林致意。暴风雨般的掌声。“斯大林同志万岁！”（同上，第273—275页）

此时托洛茨基在做什么？整个争论过程中他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缄默不语，内心里大概正幸灾乐祸；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斯大林埋葬他的人，现在要被斯大林埋葬了。

仅仅一年半以前，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各代表团曾讨论过列宁的关于必须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遗嘱”，在那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中央组织全会上，曾讨论过斯大林本人关于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的声明，当时正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过列宁的“遗嘱”是病态幻想的产物，说斯大林是不可代替的总书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这个新“三人帮”，当时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完全有可能（不敢说绝对可能）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然而现在，即使托洛茨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列，斯大林的地位仍是绝对稳固的。况且斯大林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在代表大会上产生这一联合。他通过自己的拥护者们（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和其他人）给季诺维也夫分子讲托洛茨基的例子，说他受谴责后服从党的纪律，不再批评中

央委员会了。此外，斯大林还提醒说：正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早在1924年秋就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出党，而他和政治局没有同意这一要求。斯大林做了两个最伪善的声明：（一）不能在党内搞流血；（二）列宁逝世后不能由一人领导党，而只能实行集体领导。斯大林在结论中所讲的这段话值得在这里全文引用。第一个声明是：斯大林问："我们的争执是从什么开始的呢？争执是从'怎样处理托洛茨基'这个问题开始的。这是1924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当时列宁格勒省委员会通过了开除托洛茨基出党的决定。我们大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这样做……当我们召开中央全会时，列宁格勒的同志和加米涅夫一起要求立刻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我们也没有同意反对派的这个建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内获得了多数，只是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担任的职务。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鼓掌）"（《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79—380页）①

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本人就是完全按着这种方法做的，但是他却说这是他的对手的方法。

下面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声明："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集体工作，集体领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同上，第391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28页。——译者注

虽然斯大林分子硬说“新反对派”的首领们有一整套政治纲领，但是反对派不仅没有政纲，而且连一个统一的理论都没有。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不一致。很明显，他们的发言是即兴的、杂乱无章的、肤浅的和不协调的。斯大林立即利用了反对派的这一弱点。他说：“现在已经是谈论反对派政纲的时候了。他们的政纲是很奇特的。反对派在我们这里讲了各种各样的话。加米涅夫讲的是一种话，他倾向于一方面；季诺维也夫讲的是另一种话，他倾向于另一方面；拉舍维奇讲的是第三种话；索柯里尼柯夫讲的是第四种话……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呢？他们的政纲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中央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同上，第386页）[1]于是斯大林讲述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历史。在1923年，在召开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正是在列宁同死亡做斗争的那几个月里，斯大林加紧了党机关的斯大林化。当时季诺维也夫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休息，常与中央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叶甫多基莫夫和拉舍维奇聚会。他们讨论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化的问题，想把它变为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三人（“三人同盟”）组成的发布指示的最高机关。这一改组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剥夺“总书记”对权力的垄断。斯大林轻而易举地猜度到了这一目的，否决了这一计划。作为策略家的斯大林，对自己拒绝的理由却做了另一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他们“制定了取消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化的政纲，也就是说，要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组成的政治和组织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思想是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让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领导党。这个政纲没

[1]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3页。——译者注

有任何结果……因为没有上述同志参加是不能领导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04—508页)斯大林的报告再版时他删去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名字,(《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86—387页)因为人们已明白,不仅可以不要这些人领导党,而且还可以将他们枪毙。

斯大林说,现在这些人又要求书记处技术化,不是要求取消政治局,而是要求它拥有全权。他说:"如果把书记处变成单纯的技术机关对加米涅夫真是方便的话,也许应当同意这样做。但是只怕党不会同意这样做……至于说到使政治局拥有全权,那末这种政纲简直是荒唐透顶的……难道书记处和组织局不是服从政治局吗?而中央全会呢?我们的反对派为什么不提中央全会呢?他们是不是想使政治局比全会更拥有全权呢?"(《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87—388页)①

总之,反对派早就想在党内确立"三人同盟"的专政,而他,斯大林,一直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而斗争。不仅不大了解斯大林的大会代表支持了斯大林,而且非常了解他的中央委员也支持他,其中包括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为首的政治局中的右翼,因为他们深信,斯大林在陈述这些理由时是诚恳的。

斯大林十分清楚,粉碎"新反对派"不仅是一次政治行动,而且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问题。在这样一个教条主义及思想专制的党里,对每一次政治行动进行思想方面的阐释恰恰具有重大意义。要经常地求救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使列宁狂热者的党相信,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是正确的,反对派是不正确的。布哈林无论是在从前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方面,还是在目前揭露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方面都起了卓越的作用,甚至是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起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甚至在列宁的眼里布哈林也是一名绝无仅有的优秀理论家，虽然他还有些不足之处。斯大林也高度评价布哈林的理论天才，并充分利用他反对过托洛茨基，现在又利用他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此反对派也集中全部火力对布哈林予以教条主义的批判。斯大林佯装恼怒地问："为什么他们（反对派分子）不停止对布哈林同志的诽谤攻击？……他们到底要将布哈林怎么样？你们想要布哈林同志的血吗？我们不给你们。"（《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04—508页）再版斯大林的报告时（1947年）他删去了"布哈林同志的血"几个字，因为后来，在1938年，斯大林自己给布哈林放了血。（《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84页）①

按本性说斯大林永远是一个进攻者，但是他在同自己对手的斗争中却总是戴着"爱好和平"的假面具。固然总书记的职务要求他这样做，不过斯大林是出于策略考虑才戴上这块假面具的，他应该在党内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使对那些在全党面前公开要求放斯大林"血"的党的活动家，他也是以无可挑剔的忠厚态度相待的。从列宁患病后的第一天起，特别是列宁与他绝交之后，斯大林的方针是，对于列宁和列宁"遗嘱"中的指责，用最正统的维护列宁主义的理论做侧面回答，这种维护列宁主义的理论甚至是反列宁的。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他继续使用这一策略。他的著名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稿正是在他收到列宁的绝交信后一周发表的（见斯大林发表于1923年3月14日《真理报》上的《论战略战术问题》一文）。列宁逝世后两个月他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小册子(1924年4月)。1924年11月他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书，1924年12月他发表了为他的《在通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员的策略》。所有这些著作有一个中心思想——按照自

己的解释将列宁主义经典化。应当指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也写过这一题目，季诺维也夫写得很不客气，托洛茨基写得十分精彩，布哈林写得思想很深刻，三人同斯大林一样，都把列宁主义视为经典（托洛茨基还夸口说，他是第一个称列宁为天才的人），但是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了解列宁。因此斯大林所写的《列宁主义基础》才成了二十年代党内的畅销书。斯大林在宣布列宁是绝对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新的宗教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而斯大林的对手们非常清楚列宁根本不是"圣人"，列宁主义也具有党机关暴政的有害特点，而党机关暴政很容易变为国家暴政，但是他们接受了斯大林建立列宁圣人迷信的挑战。于是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在吹捧和神化列宁方面展开了竞赛。他们把列宁从一个人、一个政治家变成了无神论者的上帝。然而斯大林是最不相信这个上帝的，但是他比自己的对手更为巧妙地利用了辨别能力不高的党内权势分子大军对列宁的这一信仰。现在清楚了，同斯大林对立的所有反对派正是由于神化列宁（列宁不仅多次犯错误，而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还多次纠正过他的错误）才注定自己必然要遭到灭亡。过去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斗争时，今天在同季诺维也夫斗争时和后来同布哈林斗争时都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分析了季诺维也夫1925年的所有著作后（《论布尔什维克化》和《时代的哲学》两篇文章和一本名叫《列宁主义》的书），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的政策不仅仇视列宁主义的精神，而且它还是一种"经常摇摆不定"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升迁在列宁生前和逝世后，总是不断地朝着背离列宁主义的方向摇摆。斯大林问大会代表："谁能保证季诺维也夫不会再摇摆一次呢？这是摇摆，不是政治。这真是歇斯底里，不是政治。"对这个季诺维也夫该怎么办呢？斯大林宣读了大多数中央

委员于1925年12月15日，即代表大会开幕前三天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呼吁书。呼吁书说，如果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撤销最积极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列宁格勒担任的职务，反对派中的任何人，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局委员不反对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路线，就建议同反对派“讲和”和“协商”。为此中央委员会同意将一名反对派分子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斯大林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些协议条件。但是反对派不同意……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坚持着这个文件的观点。”（《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89页）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上很有道理地指出，斯大林不是在建议协商，而是要求反对派全面投降。斯大林在做结论时又一次故作和解姿态，指责反对派不愿讲和。同时斯大林要代表们相信：“我们应该有统一，只要党，只要代表大会显示出刚强性而不怕恐吓，就一定会有统一。（喊声：‘我们是不怕恐吓的，这里都是些久经战斗的人’。）”（同上，第390—391页）① 这些久经战斗的人之中，有一千三百零六人，即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叶若夫横行时期，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枪决了。

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做出决议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73页）②

五百五十九名代表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六十五名代表投了反对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24页）代表大会对“新的”或任何其他将来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说：“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同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4页。——译者注

不论这种企图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所策划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81页）①“新反对派”的整个政纲被当作反列宁的政纲受到了坚决谴责。大会还通过了专门致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对列宁格勒党组织说了许多恭维话，对其领导人进行了措词激烈的谴责。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首次宣布了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共同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纲领，“以便把苏联从一个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为一个制造机器和设备的国家。”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还首次出现了“集体农庄”这个名词，它是农民历史上最血腥时代的标志。（同上，第75、79页）②下一次代表大会，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叫作集体化代表大会。

斯大林信守他的“爱好和平”策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大胸怀”。虽然“新反对派”最积极的拥护者（库克林、扎鲁茨基、哈里托诺夫、拉舍维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拉舍维奇降为候补中央委员，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甫多基莫夫重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克鲁普斯卡娅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

一些同“新反对派”斗争最积极的党员干部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总数从五十三人增至六十三人，候补委员从三十四人增至四十三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由一百五十一人增至一百六十三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由三人增至七人。1926年1月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全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布哈林、伏罗希洛夫（首次进入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加里宁（首次进入政治局）、莫洛托夫（首次进入政治局）、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8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7、78页。——译者注

委员的有：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乌格兰诺夫和加米涅夫。当选为书记处成员的有：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乌格兰诺夫、科西奥尔和叶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分子）。候补书记有：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

当选为组织局委员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兰诺夫、科西奥尔、叶甫多基莫夫、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斯米尔诺夫和克维林格。候补委员有：米哈伊洛夫、列普谢、恰普林，施米特和乌汉诺夫。任命布哈林为《真理报》总编，马努伊利斯基为副总编。选举了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团由季诺维也夫（团长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所组成。会议还选举了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洛佐夫斯基、皮特尼茨基和乌克兰的马努伊利斯基和舒姆斯基为代表团候补团员。（《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235页）①

但是斯大林的"爱好和平"策略只持续了五天。1926年1月5日新的政治局撤销了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撤换了所有列宁格勒的领导人。

中央委员会粗暴地违反党章规定，违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意愿，甚至在没有召开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的情况下就解散了省委，指派了以基洛夫为首的新领导班子。

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共青团中央委员被派到了列宁格勒，以便完成粉碎列宁格勒各区级党组织的任务。这一运动完全是在"开展党内民主"的口号下进行的。这次运动的结果表明，斯大林的机关所施加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4页。——译者注

1925年12月列宁格勒党组织曾一致即百分之百地投票赞成"新反对派"，但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两周，即在1926年1月中旬，只有百分之三点二的人赞成"新反对派"，百分之零点五的人弃权，而投票赞成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人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三。(《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第1分册第432页)党的官方历史学家解释说，列宁格勒党组织之所以这样"快"地由季诺维也夫转向斯大林，是因为反对派的"骗局"很快地和出其不意地被揭穿了。这对一个完成了十月革命的党组织来说，并不是恭维话。况且，情况根本不象官方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列宁格勒代表米宁(他脱离了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作证说，政治局委员曾把大多数人所通过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宣布为"大多数人"通过了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见下一章)。

如果说"骗局"，那末官方历史学家很清楚，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对这场革命的组织者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骗局。请看下述材料：对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二十四名中央委员中，有七人属自然死亡，二人被敌人打死，十四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六十名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五人属自然死亡，一人被敌人打死，五十四人被斯大林杀害，其中包括象托洛茨基、克雷连柯、安东诺夫一奥甫谢因柯、翁什利赫特、涅夫斯基、布勃诺夫、梅霍诺申、迪宾柯、斯米尔加、古谢夫、拉齐斯等卓越的领导人。

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应该指出下述历史事实：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有主权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可以批评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还向代表大会做了报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真正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后来所有的代表大会，直至今天的代表大会，只是名义上具有主权的代表大会。在后来的任何一

次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说过一句批评中央委员会甚至是某个领导人的话。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不是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而是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不是这些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而是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通知历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委员会该由那些人组成。当然，代表大会也有一个不可争辩的权利：一致同意新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代表大会实质上完全变成了政权的冠冕堂皇的虚设品。因此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隔十四年之久他才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然而党章的规定是，不超过三年就应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之后的代表大会的性质和职能没有任何改变，只是照例召开而已。虽然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喋喋不休地声称，说他们在斯大林之后恢复了“列宁党内生活准则”，但是代表大会所拥有的选举和撤换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特权并未恢复。斯大林之后所有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撤换不是象“列宁准则”要求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机关策划阴谋的办法进行的，用这样的办法搞掉了贝利亚（1953年）、马林科夫(1955年)、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分子（1957年）和赫鲁晓夫（1964年）。完全不需要具有预见天才就可知道，今后也将会如此。有人会说，斯大林之后的某些代表大会，例如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不是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而是**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揭发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执政时，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谴责斯大林的建议。如果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建议为斯大林平反，代表大会也会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建议的。这就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各次代表大会所具有的价值。

第二十六章

反对派的统一联盟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依然拒绝把自己的派别同斯大林的派别专政相对立，他建议党给那些被他和斯大林一起开除政治生活的人恢复党籍，让他们为党积极工作。他说：

“不允许搞派别，在派别问题上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同时责成中央委员会吸收我党过去所有各集团的一切力量参加工作。”（《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俄文版第467页）

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的这段话看作是“纠合一切反对派别并把它们结成一个力量的信号”。（《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34页）① 如果季诺维也夫的确是在号召以前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起来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话，那末他没有得到响应。托洛茨基分子甚至不知道在这场新爆发的斗争中该支持谁，是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呢，还是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分子拉狄克明确要求支持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将拉狄克赶出了共产国际），而托洛茨基分子穆拉奇柯夫斯基却建议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斯大林，也反对季诺维也夫。对于是否能同托洛茨基分子结盟问题，季诺维也夫分子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要知道，从1920年工会辩论时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揭露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全党所写的反托洛茨基的文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6页。——译者注

章十分之九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托洛茨基也不等闲视之。托洛茨基错误地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三人帮”的主力，而斯大林只是一名“小卒”，是一个平庸的人。托洛茨基以为，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只是执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志。在斯大林除掉了所有这些对手后，托洛茨基仍没有对斯大林有足够的认识，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皆被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本人也流落异国他乡。托洛茨基在193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斯大林做了如下的评价：

“‘请告诉我，’斯克梁斯基问，‘斯大林是怎样的人？

“斯克梁斯基本人对斯大林很了解（叶列缅柯元帅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曾对他说，他，斯大林，身为两个人民委员部委员，在国内战争期间都得服从于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委员斯克梁斯基。——作者注）。他想听听我对斯大林这个人所做的评价，并让我解释他何以取得成功。

“‘斯大林，’我说，‘他是我党平凡人物之中顶出众的一个……无往不胜的反革命不乏一些大人物。但是它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阶段，需要的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平凡人物。”（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卷第254—255页）

可悲的是，至少是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算起，“鼠目寸光”的人正是那些在1926年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加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再加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全党。说他们鼠目寸光，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们想利用斯大林作为彼此争斗的党机关工具，因此他们才不同意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尽管不仅列宁建议撤掉他，而且斯大林本人也提出了这一要求。正是斯大林本人曾提醒他的对手们说，他们将他留任是“鼠

目寸光”。下面是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1927年）上的声明：

“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5--176页）①

假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当时满足斯大林的这一“坚决”要求的话，他们大家就不会死于非命了，而数百万苏联公民也会幸免于难。然而现在，即1926年春，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分子粉碎了托洛茨基（1924年）和联合布哈林分子粉碎了季诺维也夫(1925年)之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统一联盟”成立了。这一联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斯大林。然而，在有别于1923—1924年的现今条件下，用和平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1923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凭借列宁的“遗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斯大林的话，如果在1924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凭借列宁格勒组织（季诺维也夫）、莫斯科组织（加米涅夫、泽林斯基）以及依据斯大林的声明，还有可能（的确只是一种可能）在党的合法性范围内搞掉斯大林的话，那末到了1926年斯大林就只能用武力才能推翻了。统一反对派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不仅是毫无希望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他们想用宣传、辩论和喋喋不休地声称忠于列宁主义的方法来使党相信，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想使党站在他们一边，从而依据党章撤销斯大林的职务。这一任务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152页。——译者注

是毫无希望和毫无目的的，因为党从1921年起按照列宁的意愿不断处于戒严状态，实际上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它已不成其为党了。托洛茨基也曾指出："纯粹的机关专政制度笼罩着全党。换言之，党已经不成其为党了。"（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57页）

就是说，党是虚设，真正具有实力的是党机关。统一反对派当时是向谁求援的呢？他们向虚设物求援，并向它表示对"机关专政"不满。据说象棋游戏的规律是："己所不欲，施于别人"。反对派的首领们忽视了这一条规律，斯大林却运用得非常精彩。斯大林正在有步骤、有系统地准备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鲁茨基早在1925年就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正酝酿着雾月政变①。后来在1926年，所有反对派领袖都说党内有发生雾月政变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在那时就相信，斯大林可能组织恐怖活动来反对他们。

托洛茨基在分析后来的事件和回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讲话时写道，斯大林将要成为暴君，这一点在反对派同他斗争的年代里已可预见到了。下面是托洛茨基叙述中的有关段落：

"能否以1936—1938年（当时斯大林已成为暴君）的尺子去衡量1924年的事呢？1924年他只是为争夺权力而斗争。当时他是否有能力发动这一政变呢？他生平所有的材料都迫使我们对这一问题做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一纸空文在政治斗争中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只有死人才不引起他的警惕。当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闹翻了之后，两个人都写好了一封信并藏到

---

① 雾月政变即拿破仑政变。法国共和8年雾月18日（公元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的军事政变。政变后，拿破仑掌握军政全权。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译者注

了可靠之处。信中说：'如果我们突然死去，那就是斯大林干的。'他们建议我也这样做。他们说：'您以为斯大林会考虑怎样回答您的论据吗？根本不会。他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要消灭您，又不要受惩罚。'"（托洛茨基：《斯大林》英文版第417页）

对此，季诺维也夫补充说："如果他不是害怕某些青年人采取恐怖行动进行报复的话，他早在1924年就将您干掉了。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斯大林决定先从消灭反对派干部下手，而把谋杀您的事推迟到他感到可以不受惩罚时再干。他恨我们，尤其恨加米涅夫，因为我们对他的事知道得太多了，但是他还不准备杀死我们。"（同上，第417页）

如果在不确切了解斯大林这个天生罪犯的心理的情况下就能说出这些话，那末，应该承认，这些话是有预见性的。况且，谋杀政敌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正统主义的权利，不仅列宁、斯大林承认这一权利，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都承认。这里指出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斯大林专政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知道，他们将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正是在同斯大林打笔墨官司的年代里就知道了这一点的。要想制止这一点，即制止斯大林暴政和它所带来的数百万条人命，就得发动**暴力政变**，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本人及其六、七个最亲密的帮凶，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善于这样做。不管人们举出哪些有关"制度"的社会学见解和有关玄妙的革命规律的哲学论述来反对我，我仍然要说，没有斯大林，苏联的历史会走另一条道路的。

但是由于自己思想的限制，无论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或是后来的布哈林分子，本来就不会采取革命暴力手段铲除斯大林的机关专政。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奴仆，而斯大林却是共产主义的主人。他们生怕用暴力推翻斯大林制度会引起反

对共产主义的人民革命。喀琅什塔得事件还记忆犹新。在他们眼里，斯大林虽然犯有错误，但是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们在斯大林眼里却是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一有机会就要消灭他们。那些喜欢模仿历史上类似事件的人自己替自己制造出"雾月政变"这一可怕怪物，这与其说是要杀斯大林，不如说是自杀（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如托洛茨基分子约费、布哈林分子托姆斯基、"民族倾向分子"斯克雷普尼克，甚至斯大林分子奥尔忠尼启则就把斯大林变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物）。此外，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自诩为有思想和有高度革命良心的人，而斯大林的中心思想则是权力，至于他对良心的理解，则是非常实用的：受道德约束的敌人是更好对付的。敌人有良心就好，不讲良心的人可以更好地利用敌人的良心。如果要谈斯大林本人的革命良心，那末可以套用一位波兰作家的话说：斯大林的良心总是很纯洁的，因为他从来不用良心。如果说马基雅弗利的政治与道德是相对立的，如果说列宁的道德准则是服从于他的目的的，那末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无道德论则是具有绝对阶级性质的。这就是在政治斗争中斯大林的策略艺术经常取胜的秘诀之一。托洛茨基的道德观念是马基雅弗利之前的道德观念。他写道：

"只有为伟大历史任务服务的政治，才能确保行动方法具有纯正的道德。"（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卷第228页）

不言而喻，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和方法正是属于这一种。不过，这就注定了斯大林的胜利。诚然，在一些外行看来，斯大林表面的纯洁和他对战友的故作忠诚的姿态，只能同他的革命禁欲主义和他对私利佯装冷漠相提并论。在"争夺党、通过党和为了党"而进行的斗争中，他对自己所故意表现出的低估、他的讨

人喜欢的“谦虚”、他的降服人的“诚挚”和他为牺牲自己（当事业的利益需要他这样做的时候）而下的义无反顾的决心——所有这一切当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他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是截然相反的，后两人大吹大擂、鲁莽地想跻于显要的“历史人物”之列。斯大林于1926年在第比利斯的讲话有多大价值呢（当时已开始制造他的个人迷信）？他说：

“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凭良心说，这里对我的颂扬，我连一半也不敢当。原来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什么等等。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都是绝对不必要的夸张。这种话通常是在革命烈士灵前讲的。但是我还不打算死呢。”（《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73页）①

斯大林补充说，他曾是与会者之中老工人教师的“革命学生”，他曾是巴库工人师傅的“革命徒弟”，“就在那里，在俄罗斯，在列宁的领导下，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师傅。”（同上，第173—175页）②此种讲话风度和此种“谦虚”，不但使高雅的托洛茨基看不惯，而且连趾高气扬的季诺维也夫也看不惯，而斯大林不仅故意否定了对他的所有推崇，而且还提出口号说：“谦虚能使布尔什维克更加美好。”后来这一“谦虚”变成了什么，那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争夺权力、反对“报纸领袖”（斯大林是这样称呼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的斗争中，斯大林的“谦虚”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

回头来再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统一联盟”的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56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形成历史吧。

先看看托洛茨基对“联盟”的同事们所做的评价和“联盟”本身形成的历史。托洛茨基写道：“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三人帮’曾与我相抗衡。但是‘三人帮’本身也远不是团结一致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理论上恐怕要比斯大林胜一筹。但是两个人都缺乏那种所谓性格的小节。侨居国外时，他们在列宁的领导下获得的国际主义的视野比斯大林广，这一点不仅对他们无利，而且有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想捍卫国际主义的观点的企图（那怕能部分地捍卫也好），使他们在官僚主义者的眼里变成了次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此他们企图发动更加激烈的斗争来反对我，目的是用此种方法获得党机关对他们的信任。但是这是白费力气。党机关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斯大林是最强硬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便处于与斯大林敌对的地位了，当他们企图将‘三人帮’的争论扩展到中央委员会时，他们才发现，斯大林获得了坚不可摧的多数。加米涅夫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正式领导人。但是，当莫斯科党组织在1923年被粉碎后（加米涅夫参预了此事，当时该组织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反对派），莫斯科的广大普通党员都保持着令人忧郁的沉默。加米涅夫在反对斯大林的初次尝试中就变成了光杆司令。列宁格勒的情势则是另一种样子。1923年季诺维也夫的机关确保了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不受反对派的左右。但是现在也轮到他们头上了。对待富农的方针和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使列宁格勒的工人感到不安。工人阶级的抗议同季诺维也夫这个高官的反抗不谋而合了。于是产生了新的反对派，最初克鲁普斯卡娅曾是这一反对派的成员。使大家惊奇不已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是首先感到惊奇），他们两人不得不一部分一部分地重复托洛茨基反对派所做过的批评，并且很快也被引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列。我

们这些人至少会把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接近看成是反常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对派分子之中反对这种联盟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些人认为可以同斯大林结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老革命者和国内战争的优秀指挥员穆拉卡柯夫斯基反对同任何人结盟，并对自己的立场做了精彩的说明：‘斯大林会骗人，季诺维也夫会逃跑’。但是这类问题最终不是靠心理估价而是靠政治估价来解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公开承认，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政纲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不能不同他们结盟……加米涅夫在同我第一次会面时说：‘只有您和季诺维也夫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坛上，全党才找到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显然，加米涅夫对‘三人帮’三年来对党所做的瓦解工作估计不足。”（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63—265页）

托洛茨基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缺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党，它被“三人帮”为了党机关的利益取缔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优柔寡断，斯大林阴险奸诈，通常的斗争手段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他由此做出的结论则是奇怪的和无法解释的：同“新反对派”的优柔寡断的领导人结盟，以便用苦口婆心的规劝办法同斯大林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在谈论这一斗争的前景时说：

“我们朝着直接打击迎面走去，满怀信心地为在较长时间以后取得思想胜利而做准备工作。在人类历史上运用物质力量曾起过和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有时运用物质力量起进步作用，但是较多的是起反动作用……可是还远远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似乎暴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同上，第276—277页）

这段话解开了托洛茨基的悲剧之谜：同虚弱的克伦斯基民主做斗争时“运用物质力量”是绝对的无上命令，而在同斯大林的

正在兴起的暴政做斗争，“运用暴力”则是绝对不该的！为使托洛茨基成为历史上的伟大革命者，需要有笃信民主的克伦斯基及其虚弱的制度，但是要想证明一个革命者能变为生不逢时的唐·吉诃德，则需要“格鲁吉亚佬”斯大林和他的万能的党警察制度。在这方面“统一联盟”的历史是很值得引以为戒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它的教训也是值得吸取的：统一反对派的纲领是加紧消灭新经济政策、对农民课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对国内“右的危险”加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镇压，统一反对派置苏联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于不顾，玩弄世界性的“不断革命”。新反对派的这一全部纲领不仅使它脱离了“腐化变质的党”，而且脱离了城乡各阶层广大人民。它的纲领中唯一可取之点——与党内权势分子作斗争——人民和全党却把它看成是执政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内讧。

斯大林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镇压，反对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斯大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的盟友，布哈林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对农民提出富有的煽动性的资本主义口号：“发财吧！”（诚然，斯大林对此曾做过保留，因为他将来的计划是粉碎布哈林）；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冒险政策；斯大林宣扬“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解释，这意味着建设一个物质充盈、高生活水平的社会；最后，斯大林还提倡不仅与资本主义讲和，而且与社会主义者（英俄工会委员会）讲和，与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参加蒋介石的国民党）讲和。瞧，斯大林是一个多么温和、平静、爱好和平的人，比起托洛茨基这个从不安定、从不知足的“不断革命者”，他是多么更加令人敬仰啊。甚至连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也同情“民族共产党员”斯大林，而不同情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我手头有一份《纽约时报》。

该报说：‘保存反对派就等于保存埋在资本主义世界下的炸药。’”（《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俄文版第212页）

托洛茨基向往革命的过去，斯大林所醉心的是有舒适权力的今天。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它所需要的是另一些口号。另一个上流社会形成了，它需要另一些领袖，托洛茨基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革命第一阶段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控制党内某一阶层思想的力量，这一阶层曾直接控制过全国。国外发生了一些可以用反革命这个统称一言以蔽之的过程。构成政权机关的阶层产生了自己的独立目标……一个新类型产生了……当革命的游牧人过起定居生活时，在他们身上小市民的特点、自满自负的官员的兴趣与爱好滋长蔓延起来……‘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为革命着想的，也应该为自己着想着想了’——这种心情换句话说就是：‘打倒不断革命！’”（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42—246页）

是啊，“不断革命”使全国感到疲劳，国家想休息一下了，而党内机关权势分子却想摘革命的果实，即想把夺得的政权变为物质和荣誉的源泉。在这一势力的推动下，斯大林这颗明星升起了，而托洛茨基这颗明星陨落了。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争执和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第一次“结合”发生在1926年四月中央全会上。这不是由政治而是由经济引起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这次全会上讨论李可夫的经济任务报告时提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和实际建议：通过扩大日用商品生产的途径消灭国内商品奇缺现象，对富裕的农村地区课以高税（这一建议涉及

到百分之十五的农民），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比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建议的还要快些（由于这个建议托洛茨基分子被斯大林称为“超工业化主义分子”），为刺激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斯大林分子在全会上将这些要求列为“孟什维克的”要求，把要求提高工资说成是“蛊惑性”的要求。（《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4卷第1分册第446—447页）

然而，统一反对派的全部政纲的根本策略缺点就在于，这个政纲中恰恰没有旨在争取民心的“蛊惑性要求”，而斯大林分子的纲领则是彻头彻尾的具有蛊惑性的纲领。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在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最初的社会主义积累”）反对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沙宁）认为，这一资金应当从农村抽调，而斯大林认为这是抢劫农民。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做四月全会的总结报告时说：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时常要求用过多增加税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等办法来加紧压榨农民。”（《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42页）①

在斯大林全盘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纲领、通过“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布哈林）的途径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斯大林逝世后出版的最新《苏联共产党历史》竟然还写道：

“他们的建议是想通过抢劫农民的办法来建立工业，这是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4卷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129页。——译者注

第1分册第446页）

似乎斯大林在消灭富裕农民和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之后所搞的“全盘集体化”、似乎强迫农民在集中营做无偿劳动和对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民偿付低得可怜的劳动报酬，似乎所有这一切不是“对农民的抢劫”！

现在看看第二个例子。反对派建议增加农产品的出口，以便换进提高工业化速度所必需的机器设备。斯大林说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这一建议同美国要求给德国贷款的计划相类似，因此，说这个建议对于苏联来讲是“道威斯计划”①，是反对工农利益的计划。斯大林为他们能过上高水平的生活而“操心”，他在全会上说：

“我们不能象旧时那样说：‘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工人和农民要象人样地吃饭，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甚至还不止于此。斯大林建议使工人能得到充足的便宜的农产品，而农民能得到充足的便宜的工业品。下面是他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所做的建议：

“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降低工业品和农业品的零售价格。”（同上，第127页）②

但是斯大林的言行是截然相反的。向我们揭示斯大林两面派本性的不是某个反苏的刊物，而正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它写道：

“斯大林的工作中有理论与实际分家的现象。在诸多情况下

---

① 德国赔款计划，它是国际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银行家道威斯指导下于1923—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规定给予德国借款和贷款以恢复重工业。——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7页。——译者注

他的所做所为是与他所说的和所写的全然正确的东西直接相矛盾的。”（《共产党人》杂志1956年第5期第25页）

1926年斯大林在一月中央全会上拒绝同反对派协商，这说明斯大林最不愿意同反对派讲和，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只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因为他当时不相信能轻易战胜列宁格勒的“新反对派”。如前所述，列宁格勒“新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叶甫多基莫夫当时曾被选入组织局，并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而季诺维也夫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现在，四月全会对胜利粉碎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领导做了总结，并同时做出决定说：“根据叶甫多基莫夫同志的请求，全会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虽然，叶甫多基莫夫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联共（布）决议汇编》1933年俄文版第2册第937页）把季诺维也夫留在无权的政治局里，要比让他的助手呆在权力极大的书记处做证人安全得多。

这只能加快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党内其他反对派别的联合进程。五、六月间新的反对派“统一联盟”业已形成。“新反对派”、“左倾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及“工人小组”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这一联盟。这是手无寸铁的党内将军们的联盟，甚至是连手无寸铁的军队都没有的联盟。这是彼此互相解除武装的将军们（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是对斯大林有利的）的联盟。这是翻然省悟者的联盟，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大家的真正敌人只有一个，他就是斯大林。

然而他们省悟得太晚了。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斯大林在权力的宝座上已牢牢坐稳，现在任何反对派的批评也不会使他生畏了，况且，他们曾达成过“不运用物质力量”反对斯大林的协议。因此斯大林完全有权称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为“被

阉割者”的联盟。（《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43页）最后，这还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的联盟，他们的思想混杂异常，策略上有过极大的疏忽之处，对于斯大林当着他们的面所制造的新的党警察机器的性质和功能一无所知。反对派对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竟然无知到这种程度，以致托洛茨基在1940年仍顽固坚持说：“斯大林不是靠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靠无个性的机器帮忙才掌握权柄的。不是他制造了机器，而是机器制造了他。”（托洛茨基：《斯大林》英文版第XV页）

这种说法从历史看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因此我在我的《权力学》(1959年)一书中对这一点只发表了下述意见：“在这本书中我要得出一个反向结论：首先，斯大林作为权力大师（这是政治中的主要之点）不仅超过托洛茨基，也超过了列宁；其次，正是斯大林制造了‘机器’，尔后机器又制造了斯大林。在这之前，斯大林把列宁的党机器和列宁的党干部已消灭殆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专制。”（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权力学》1959年慕尼黑俄文版前言）

“统一联盟”的悲剧就在于，它把斯大林新制造的党警察机器仍继续当作“列宁的”不可毁坏的机器，这个机器的错误应该而且可以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是斯大林本人的有魔力的语录加以纠正。当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收集了一大堆这种语录用来反对斯大林时，斯大林做了回答，在这一回答中厚颜无耻与健全的思想是融为一体的。下面是他所做的回答：

“我想谈谈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特殊手法……（季诺维也夫）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和公式同它们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分隔开来，把它们变为陈腐的教条……季诺维也夫为了从列宁著作中引出一大堆话把听众弄得‘目瞪口

呆'，用尽了一切办法。看来季诺维也夫认为引证愈多愈好……试问，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引证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用一大堆引证来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把水搅浑。"（《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9卷第86、94、95、96页）①

斯大林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找一大堆引证就是"把水搅浑"！斯大林在向反对派分子的笨拙头脑中灌输这样一个思想：马克思和列宁的"神圣著作"中的任何原则，如果它会使党这只船搁浅，如果它开始同斯大林的个人权力的利益相冲突，他都会把它抛到船外去的。斯大林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听说克里木社会民主党人如何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引证时，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一起"笑得前仰后合"。斯大林讲到，黑海水手向党的委员会建议说：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曾号召我们起来反对沙皇制度，现在我们决定响应这个号召，请你们给予指示。斯大林接着说："水兵和步兵们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波里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波里、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一点指示也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同上，第93—94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7、84、8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84页。——译者注

斯大林说，可能这个故事有点夸张，但是他尖刻地嘲笑了一通反对派的领导人，因为他们象奴才一样用语录将自己的手脚捆住，对"教堂日历"看也不看一眼，甚至不敢同他，同斯大林进行斗争。斯大林做结论说："这个故事一针见血地说中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同上，第94页）①

统一反对派的普通活动家与他们的领导人不同，他们远比这些领导人懂得，用什么引语也说服不了斯大林。实际上斯大林建立了一个新党。只能用另一个新党才能与之抗衡。奥索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对这一思想的解释，这篇文章是斯大林批准发表的，目的显然在于向新反对派发起挑衅。官方历史学家蓄意曲解这篇文章的思想，他们写道："他要求使联共（布）内的派别合法化，要求建立其他政党的权利，要求恢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第4卷第1分册第452页）

1926年四月全会之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别连基和候补中央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7月23日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对此说道：

"反对派在进行斗争时并没有保持在党章范围内合法地捍卫自己的观点的立场……企图在反对党的斗争中建立一个非法的、同党对立的派别组织……应当特别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别连基在莫斯科近郊树林中召开的秘密派别会议……是按照秘密活动的一切规则布置的……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在这次背着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做了报告，号召到会的人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4页。——译者注

织起来进行斗争……'新反对派'的日益加剧的派别活动，使他们玩弄起两个党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161—162页）①

当然，无论是季诺维也夫、或是加米涅夫、甚至托洛茨基都没有玩弄过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来自反对派的中层，没有征得它的领袖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指责季诺维也夫实际领导了反对派建立第二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说他为此目的利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在这次七月全会上，建立反对派"统一联盟"首次成为政治和法律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叶甫多基莫夫和拉狄克等人签署的《十三人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官僚主义是党内危机尖锐化的直接原因，列宁逝世后这种官僚主义发展得尤为严重，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发展。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不仅有左右党的思想和组织手段，即党的手段，而且有国家和经济手段。列宁总是认为，行政权力集中于党的手中会导致党背上官僚主义的沉重包袱。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提出了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监察委员会不拥有行政权力，但是它拥有一切必需的权力，从而保证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保证党员自由发表意见、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选举而不受处分的权利。然而实际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行政机关，他帮助另一个官僚机构进行镇压。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扮演着惩罚机关的角色，压制党内一切独立思想、一切批评，不许给党的某些领导人提任何意见。不执行1923年12月5日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81—182页。——译者注

开展党内民主、党员自由发表意见的决议导致了派别的出现。拉舍维奇、别连基和切尔内舍夫案件便是一个证明。如果把这些案件看成是由党的某些人和集团的恶意所造成的结果，那便是一种罪恶的盲目无知。实际上中央委员会现行方针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现在只有在党的上层才能自由讲话，而在下层，在全党只能偷偷地发表意见，或者是对自己的看法秘而不宣。在党的会议上没人敢提批评意见。广大党员只能听取党机关代表的讲话，决议也只能是“一致”通过。

2、很显然，党不把党的民主方法放在眼里，不把各级领导机关所通过的决议看作是党的决议。经济政策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感情背道而驰必然会引起镇压，使整个政策带有行政官僚的色彩。

工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使得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降低。工业在农业中的影响下降和富农的迅速发展，使得农村中的雇佣工人和极贫苦的农民的威信下降，使他们失去对国家和自己的信心。城市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其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准，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产生自卑感。

3、今年又一次证明国家工业落后……只有在工业的发展速度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一般速度，并不断把国家的技术水平提高到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水平上时，才能保证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每件事情都应服从于这一任务，无论对无产阶级也好，还是对农民也好，这一任务皆是同等重要的。

4、同时，全党不安地注意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如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一样，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这个关系到十月革命存亡的根本问题上党不能也不想遮遮掩掩……党想知道，想思考，想检查，想做出决定。现存制度不准许

这样做。由此才产生了秘密散发党的文件的做法，如同在拉舍维奇“案件”中所做的一样。

5、我们发现，在巩固贫农和中农联盟的借口下，最贫穷的农民在政治上总是服从于中农和通过中农服从于富农的。

6、我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到二百万，加上交通运输工人还不到三百万。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其他机构的职员加起来不少于无产阶级。仅这一点就可证明官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多么强大。因此，很明显，国家机关就其成份和其代表人物的生活水准而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它疏远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农民，而对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却给予满足。列宁曾多少次警告我们，不要将国家机关变成官僚机关、工会必须保护工人的利益不受这一机关的侵害，而党的官僚主义者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患了最可怕的自欺欺人病。

7、1920年由列宁主持的党的代表会议做出决议说，只能出于工作考虑才能对党员进行调动。不能因为党员对某个问题和对党的某个决定有不同看法就对他们实行镇压。目前的整个做法同这一决议相抵触。党员对党机关的隶属取代了纪律。那些党在困难时刻可以依靠的同志，大批退出领导机关，很多人被调往边远地区，被流放，被迫害，代替他们的是那些一时得宠且又听话的人。现在，党制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又变成了对拉舍维奇和别连基的谴责，全党都知道，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遵守纪律，忠心耿耿。对他们的谴责实际上是对党机关官僚主义化的谴责。

坚定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具有何等意义是无庸赘言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它的多数成员是由忠于工人阶级的人所组成的。在正确的领导下和正确的分工下，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能帮助实行党民主。

8、官僚制度还蔓延、侵蚀到工厂。如果党员实际上失去了

批评区党委、州党委及中央委员会的权利，那末在企业中他们则失去了批评他们的领导人的权利。党员被恐吓住了。一个忠顺的行政领导总能得到上级党组织对自己的支持，因而他可以使自己不受基层的批评，并且常常逃避对糟糕的管理和蠢笨的行为的责任。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群众强有力的监督，首先是企业中工人的监督，是国家资源经济消费的基本条件。当他们还不能对缺点和混乱做公开批评、不能指出过错人的姓名时，当他们还在作为反对派分子被开除支部、撤销职务时，争取建立经济制度和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只能变成牺牲工人生活利益的官僚主义的企图。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9、纠正党的路线就是纠正党的国际路线。我们应当抛弃那些成问题的革新残余，这些残余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似乎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紧密相联的。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殖民地国家人民正在为取得独立而斗争……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与欧洲和世界革命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直接相关。

10、认为同所谓的反对派达成机械性协议可以扩大党民主的范围的想法，是对自己的莫大欺骗。党从自己的全部经验出发不能相信这一点。机械式谴责的办法将孕育新的分裂、分化、撤职、开除和对全党的新的压力。这种办法必然缩小领导上层，降低它的威信，迫使它用两倍、三倍的压力来代替自己的思想权威。党应该结束这一有害的过程。列宁曾证实说，坚定地领导党不等于扼杀党。

11、毫无疑问，党是可以解决自己的困难的。说通往党的统一的道路是没有的，这是无稽之谈。这样的道路是有的。只有在党的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健全的集体领导。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在

这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所进行的斗争和工作中，中央委员会一定能得到我们的完全支持。（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ed. by R·V·Dahiels, Random House, № 4, p. 280—286，①托洛茨基档案资料，我的译文有删节，是从英文译回的。——作者注）

仔细分析一下“十三人声明”即可看出，这个声明对党机关制度所做的批评，只是重复了1923年12月5日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中的有关话语。这最后一项决议的目的，按其作者特别是托洛茨基，当然也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看法，在于把党机关重新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剥夺斯大林的“极大的权力”，列宁认为，斯大林当上这一机关的首脑后便获得了这一权力。1923年季诺维也夫提出用三人同盟（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取代总书记的议案的目的也在于此。斯大林猜出了季诺维也夫的真实意图后，断然拒绝了，并以辞职相威胁，他所说的辞职既不真挚，又不严肃。他是这样说的：“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87页）②

“十三人声明”的作者们现在要求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诺言，“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同时，统一反对派认为必须向斯大林所依靠的党内权势分子大军表示恭维，以便使他们脱离斯大林。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党的官僚十分清楚，斯大林倒台会给他们带来历史性的失败。

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惊奇的，可能也是最出乎意料的事，是

---

① 丹尼尔：《共产主义运动史料》英文版第4期第280—286页，兰顿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在这一反对派的文件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签名自革命以来首次同托洛茨基的签名并列在一起了，他们多年以来一直是托洛茨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所达成的谅解也很令人惊奇。他们彼此宽恕，放弃了自己旧的政治理论，不再互相谴责。斯大林对这一致命的、机会难得的策略疏忽作了不无成效的利用。斯大林说这是一些没有原则性的人的联盟。首先让我们听听联盟的首脑谈谈什么是他们的“互相宽恕”。我们手头有一本192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印刷厂出版的名为《党与反对派》的一本文件汇编。这本书上的扉页上印着“绝密。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几个字。虽然在选择反对派的文件方面运用了当时已惯用的偷天换日手法，但是这本汇编的价值仍是极大的，特别是在过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央委员会记录》仍未公布的情况下，它的价值就更大。在这一章里，我们要把这些官方材料象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那样加以认真地引用。

早在1926年6月26日季诺维也夫就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做了如下的声明：

“那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刻。本来我们两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集团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堕落的斯大林及其朋友们，但是由于我们对党的状况有一系列的模糊认识，两年来彼此攻讦，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并希望这样的事今后不再重演。”（《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准备材料》第一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出版。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192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3页）

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上说，在1923年开展的反“三人帮”斗争中，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说：

“我犯过许多错误。我认为，我的最大错误有两个。1917年

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你们大家已经知道了。你们知道，列宁同志严厉地批评过这个错误，但是你们也知道，列宁同志认为我已经改正了这一错误……我认为，我的第二个错误更加危险，因为1917年的错误是在列宁生前犯的，得到了列宁的纠正，在他的帮助下过了几天我们自己也改正了，而1923年的错误是……

奥尔忠尼启则：您为什么要愚弄全党？

季诺维也夫：我们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义，1923年的**反对派核心**（正如当前反对派领导的进展所表明的那样）正确地警告过，说存在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党机关制度有发展的危险。然而，几十几百名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久经斗争考验的老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们不追求个人名利，不会阿谀奉承，虽然他们表现出克制性和遵守纪律，但至今仍被排斥在党的工作之外……布哈林、斯米尔诺夫、托姆斯基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演变（喧哗，主席摇铃）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所说的某些同志堕落了的话是正确的，证实了我们写进宣言的有关你们的堕落和你们的机会主义的条款是正确的。是的，**在有关堕落问题上，在有关机关官僚压制问题上，托洛茨基反对你们是对的。**”（同上，第24页）

继季诺维也夫之后，托洛茨基发言，他承认他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攻击的目标搞错了：“毫无疑问，我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把机会主义的策略苗头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字联在了一起。中央委员会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表明，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产生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我当时没有机会注视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没能及时看出，机会主义的苗头是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同上，第23页）

我们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相互宽恕是一个致

命的策略错误，因为它毫无益处地向斯大林及其集团提供了谴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原则的机会，并且斯大林还可以引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彼此攻讦的大量论战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谴责。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现在正忙于加紧大量出版这些材料。党的宣传向不大了解“高层政治”的中层党员灌输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又必然是真实的思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只想窃取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官方宣传证明说，在这场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现在打算牺牲他们从前的一切原则。在一个受列宁的“原则性的政策是最正确的政策”的理论陶冶的党里，丧失原则性被认为是莫此为甚的罪过。斯大林在谴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丧失原则性时利用了党的狂热分子的这种感情。斯大林说：

“托洛茨基同志放弃了自己的《十月的教训》，拒绝‘把机会主义的策略苗头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之所以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做出这种无原则的宽恕，是因为他想以此换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对他的宽恕。似乎是，列宁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现在不对了，托洛茨基现在打算纠正列宁的话。”（同上，第24页）

但是斯大林是第一个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做“无原则宽恕”和“纠正”列宁的人，当时他们二人还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盟友。1924年11月斯大林在发表反对《十月的教训》和袒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讲话时说，1917年10月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27页）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284页。——译者注

统一反对派企图以他们不了解中央委员会领导内幕和斯大林集团的真正意图为借口，否认对他们的“无原则性”的谴责。那些从政治局成立第一天起就同斯大林形影不离的人，讲出这样的话实在可笑。只消承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是由于不了解党内和国内形势才彼此争斗，就足以取消他们的政治家的资格。然而，在他们的政纲中，他们恰恰承认了自己的“无知”。下面是政纲中的有关段落：“斯大林重提1923—1924年各集团之间存在的旧分歧，企图以此‘压倒’反对派在这份政纲中所陈述的观点。我们摈弃这一企图，这是一种手段不正当的企图。那些分歧现在已经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了。

“在1923年至1924年的争论中，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认识不清**，布尔什维克两个集团（即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作者注）都犯了一些错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现在这些已得到改正，已不再阻碍开展齐心协力的反对机会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的共同斗争了。”（《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24页）

一般说来，在一个正常的党内，如果“总书记”也是通常的总书记，那末“十三人声明”不会被看作是某种引起轩然大波的和非法的文件。然而事情发生在“特殊的党”里（这是布尔什维克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也是一个“特殊的”“总书记”，因此这一声明没有被看作是对党机关政策的批评，而是被看成了建立新党以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及其助手扬松（他们是斯大林领导班子同反对派做斗争的最忠实的工具）向全会讲述了一件事实，并用这一事实证明“第二个党”正在成立的说法。古比雪夫说，反对派分子正在建立新的秘密组织，其原则是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建立组织所依据的原则，联络、接头和巡逻都是秘密的。扬松甚至宣布了别连基同基

层反对派秘密通信时所规定的代号。例如，扬松说，为同敖德萨集团进行通信，别连基规定了下述代号：

真实姓名：	代号：
托洛茨基	托尔斯泰
季诺维也夫	兹拉托甫拉特斯基
加米涅夫	柯罗连柯
克鲁普斯卡娅	娜杰日吉娜
索柯里尼柯夫	西比利亚柯夫
中央委员会	采马赫
政治局	波兰
党	爱国者
共青团	疗养区

（同上，第27—28页）

全会宣布了列宁从前的女秘书格斯列尔的声明（显然，这一声明是中央委员会机关捏造的），声明说，反对派曾建议列宁的女秘书走访柏林、巴黎、罗马，并通知西方共产党的领导人说，"短期内党的情绪要有所变化，起码在两个月内外国各大政党不要发表支持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同上，第28—29页）全会上还有人报告说，共产国际的两位领导人，"新反对派"的拥护者古拉尔斯基和乌依奥诺维奇利用季诺维也夫的名义，企图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同外国共产党进行有利于反对派的互通情报和联络。（同上，第29页）

共产党员对党机关专政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某些老布尔什维克确实有过反斯大林的秘密活动，这一切都算在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身上，虽然在那一时期后者并没有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发布任何指示，甚至关于他们的反斯大林的活动也是从斯大林的机关那里得知的。

从前的“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们所做的声明也成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过错。这些代表曾幸灾乐祸地祝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说，他们终于“擦亮了眼睛”，但是他们并没有做一切必要的结论。全会宣读了从前“工人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梅德维捷夫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的几句话。这封信首先落到了斯大林警察手中，然后才到了收信人、一个政治局委员之手，这一事实本身比信的内容所说明的问题要多得多。不过麦德维捷夫的某些想法还是饶有兴味的：

“您现在主张党内民主，主张一党治理形式……这是内在的矛盾……如果批评不具有观点和立场……那只不过是词汇的堆砌，是废话。没有不带派别性质的批评。但是派别即是潜在的新党。这怎么能和一党统治形式并存呢……官僚主义支配全部财富，这一事实使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国家权力。尽管这个官僚机构认为自己是“一支铁军”，是‘老近卫军’，并把无产阶级径直引向共产主义，而且它还要大家都相信它的话，但是，事实都没有改变。如果它不说这番话那倒是奇怪的……您现在已经感到，不是一切都顺利，无产阶级的山口上不是一切都很平静……您现在脱离了那条路线，当年这条路线曾迫使您用肮脏的手段与我的批评进行斗争。这很好。晚做总比不做强。”（同上，第42—43页）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以谴责统一反对派而结束。全会决议说，“‘新反对派’的日益加剧的派别活动使它玩弄起两个党的思想”，反对派的拥护者将政治局的秘密文件散发到苏联各城市中去，在地方上建立反对派集团网，派遣秘密代理人给这些集团做指导，制定了完善的保密技术，密码、接头暗语等应有尽有。更有甚者，反对派分子开始同外国共产党进行联络。

虽然全会没能举出一件事实，以证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季诺维也夫对反对派进行过身体力行的或思想上的领导，但是还是要他对反对派负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季诺维也夫丝毫没有打算斥责自己的同道者并同他们划清界限。”（《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162—164页）①

全会根据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做的提议，决定撤销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警告一切反对派分子，不管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如何，如果他们继续组织同党对立的派别，那末，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将不得不对他们也做出相当的组织结论。”（同上，第164页）②

决议全然没有提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名字。每一种蔬菜都有自己的成熟季节（等时机成熟再说）。选举了鲁祖塔克接替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至八人，他们是：彼得罗夫斯基、乌格兰诺夫、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加米涅夫。

托洛茨基对后来事件的发展做了如下的描写：

“1926年的斗争愈演愈烈。到了秋天反对派在基层组织会议上发动了公开的进攻。党机关疯狂进行反击。思想斗争被行政手段所代替：党官僚机构频频用电话通知，要求人们参加工人支部会；许多汽车聚集一起，笛声四起；反对派分子一走上讲坛就响起有组织的口号声和叫喊声。执政派集中全部力量压了过来，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生怕分裂和吵翻，对一切都不敢多闻多看。反对派不得已只好让步。10月16日我们做了声明，大意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保留在党内为之奋斗的权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82—18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84页。——译者注

利，但现在我们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能产生分裂。”（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册第274页）

但是斯大林从“10月16日声明”所看出的东西要比托洛茨基所承认的多。让我们看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甫多基莫夫在声明中都写了些什么：

“我们断然否决‘派别自由’的理论，承认这一理论和实践是同列宁主义基础和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把贯彻党的不许搞派性的决议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同时，我们认为有义务在党面前公开承认，在捍卫自己观点的斗争中，我们和我们的同道者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的某些行动违反了党的纪律，超越了党所规定的思想斗争范围，走上了派性道路。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无疑是错误的，我们声明，坚决不再采用派性的办法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这种办法有害于党的团结，并号召所有赞同我们观点的同志也这样做。我们呼吁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我们认为必须要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决定并实际贯彻执行……我们每个人应只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章程和决议规定的形式范围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1—32页）

反对派积极分子要求反对派领导人变语言为行动，而斯大林的大铁锤又举在他们头上，在这种两边夹击的形势下统一反对派领导人认为还是投降为妙。托洛茨基把这一投降称为签订“停战”协定。实际上根本没有“停战”，因为斯大林机关把10月16日声明当成了反对派承认搞反党活动的证据。斯大林机关在铲除反对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如果说迄今为止斯大林只要求反对派停止派别斗争的话，那末现在他开始要求他们放弃自

己的观点了。

10月16日声明发表整一周后召开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会讨论了三个有关反对派的报告：莫洛托夫代表政治局所做的报告、雅罗斯拉夫斯基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所做的报告和斯大林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所写的题为《论反对派联盟》的提纲。

斯大林在提纲中不仅提出了反对派的组织投降问题，而且提出了思想投降问题。斯大林的下述提议得到了全会的批准："力使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33页）①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拒不承认自己的政纲是错误的。这没有使斯大林气馁。斯大林把他们不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看成是不服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这就是粗暴的违反党纪的行为，他们在"10月16日声明"中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基洛夫代表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其实是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提出了关于反对派的新决议案。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案，并作为全会的决定。这项决定说：

"（一）鉴于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叶甫多基莫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候补中央委员尼古拉也娃同志违反党纪，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特向这些同志提出警告……

（二）鉴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奉行联共（布）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下去。"（《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5页。——译者注

册第290—291页）①

斯大林没有就此止步。尽管反对派10月16日做了投降，全会还是利用他们投降、承认在派别斗争中犯有错误这一事实做出决定：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出力最大的斯大林的盟友受到了嘉奖：古比雪夫进入政治局并被任命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取代了古比雪夫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职务。科西奥尔和楚巴尔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取代了季诺维也夫，以“政治书记”（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利用过这一职务，因此爱忌妒的斯大林将这一职务取消了）的身份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

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1926年11月）斯大林做了题为《论我们党的社会民主倾向》的报告，统一联盟的领导人则又重复了自己对中央委员会的指责。

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反对派联盟已经开始解体。斯大林谈了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之间的矛盾，还谈到“工人反对派”从前的领导人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已退出了反对派联盟。代表会议着重指出，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已经否定了梅德维捷夫所写的“巴库来信”。在这封信（写于1923—1924年的辩论即将结束时）中梅德维捷夫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对内政策说成是反无产阶级的政策，把它的对外政策说成是冒险政策。“巴库来信”谴责了共产国际和西方共产党的分裂政策，说他们是“受俄国金钱豢养的一群小资产阶级奴仆”。（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简史》1930年俄文版第455—456页）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盟要发生解体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92页。——译者注

的预言，以及他的期望——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这种解体即将发生（因为党机关对此做了强有力的工作）——没有全部兑现。只有克鲁普斯卡娅退出了反对派，斯大林在结论中郑重其事地提到了此事。但是克鲁普斯卡娅退出联盟不是因为她看到斯大林执行的是列宁的政策，而是因为“反对派在批评时走得太远了”。她怕人民会从反对派对中央委员会及苏联政府的批评中得出反共产主义的结论，从而会反对整个共产主义专政。但是她是在痛苦中，在党机关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脱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过后半年她退出反对派的声明才公诸于世（1927年5月20日《真理报》）就是一个佐证。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如既往，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仍在证明“社会主义在一国内”不可能建成，同时他们又要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相信，他们将忠实地执行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何况斯大林的盟友、政府主席李可夫曾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警告反对派说，党不允许任何人无休止地考验党的耐心。（1926年11月5日《真理报》）斯大林的右手、党机关与反对派斗争的理论权威布哈林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提醒反对派领导人说，如果他们仍继续谴责中央委员会向“官僚主义蜕化”，继续叫嚷“雾月政变”，那党就要和他们彻底算帐。（1926年11月10日《真理报》）

从前的孟什维克、现在叫嚷得最凶的斯大林分子拉林要求立即收拾反对派，把他们赶出党；或者在大街上用机枪解决问题，如同1918年对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苏瓦林：《斯大林》英文版第439页）

已决定要把反对派赶出党，每个人都清楚，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将反对派赶出党，而在于究竟什么时候进行此事。在这种气氛和条件下，反对派所采取的防御策略是完全令人迷惑不解的。斯

大林在代表会议上说，“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必然会使反对派的首领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93页）① 但是斯大林用外交辞令安慰全党说：“同志们，我必须声明，托洛茨基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是带欺诈性的。”（同上）② 斯大林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地道道的欺诈性的声明呢？从斯大林的报告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反对派承认了自己搞派别的错误，这只是它走的第一步（斯大林说：“这当然不少，但还不够。”）。现在它应该走第二步了：承认自己犯有宣扬反列宁思想的错误。与此同时，斯大林严格地按照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同以往一样，扮演着爱好和平的“总书记”角色，而他的战友们则一致说，反对派所走的第一步，即“10月16日声明”，也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打击反对派还不够，要将它彻底击溃。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曾以列宁的继承人自居的季诺维也夫两年前便无力自卫，遭到了惨败。这可以从他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对斯大林分子所做的回答中看出。当时季诺维也夫辩解说：

“我们认为这一步（10月16日声明。——作者注）对我们起着约束作用，我们将无条件地履行我们所声明的一切……

这已不是几方之间签订的条约。仅凭这一点也不能说这是外交步骤或棋招。这是必须要服从的义务，这是在广大党员、全党及其领导机构面前所做的声明……我们在10月16日声明中说，我们仍坚持最近一时期作为党的少数派所坚持的那些原则观点……你们知道，政治局讨论过我们的声明，承认这个声明至少可以保证党的统一……部分同志认为，声明的这一部分会引起新的斗争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60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声明，我们尽一切努力，尽一切可能，使这种令人担心的事不至于发生。这无论如何不会给发动一场新辩论留下可乘之机。

喊声：军事手腕！

季诺维也夫：不是任何手腕，不是任何花招。

喊声：你们是需要喘息之机。

季诺维也夫：你们不久就会看到，事情不是这样。”（《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1—32页）

实际上这已是反对派的思想投降，季诺维也夫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乞求和巴结，他的和平意愿对不动声色的斯大林不起任何作用。斯大林正要彻底打垮季诺维也夫这个昔日反对托洛茨基的盟友（而且，在那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说，1924年1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反托洛茨基的决议是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并且决定在大庭广众之下嘲弄他一番。斯大林回答季诺维也夫说：

“季诺维也夫有一个时候夸口说，他会把耳朵贴在地上，（笑声）当他把耳朵贴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到历史的脚步声。很可能事实上真是这样。但有一点还是应当承认的，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历史的脚步声的季诺维也夫，有时却听不到某些‘小事’。也许反对派确实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象历史的脚步声那样了不起的东西。但是不能不承认，反对派会听到了不起的东西，却听不到这件‘小事’……反对派已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听到。”（《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55--356页）①

换言之，党机关在党内和国内做了工作，创造了一切必要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9—320页。——译者注

政治、组织和精神前提，以便使反对派“一筹莫展”，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没有听到”这一点。要么不仅在组织上全面投降，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面投降，这样反对派分子还有可能继续留在党内一段时期；要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反对派的日子就不长了。斯大林在结论中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现在斯大林已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党的化身在同反对派讲话了。如果说在最初阶段斯大林不无根据地将自己党的制度与列宁的制度等同起来的话，那末现在，在新的阶段，他大胆自信地将自己同党等同了。斯大林不是以本人的身份，甚至也不是以“总书记”的身份，而是以党的身份向反对派提出了全面投降的最后通牒。他将这一最后通牒归纳如下几点：

“你们想知道党所要求你们的是什么吗？请听吧：

（一）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跑到大街上攻击党……

（二）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搜罗和聚集各色各样的不满分子作为组织新党的材料……

（三）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诬蔑党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制度，在派别自由的旗帜下，联合各种各样为党所斥责的派别组成新党……

（四）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企图利用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来进攻党……

（五）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跑到大街上作煽动性的声言，说要马上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六）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继续破坏工农结合的基础，宣传提高出厂价格并加重农民纳税负担的思想，企图构成无产阶级国家剥削农民的关系。

（七）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分子今后继续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夸大我们的困难，助长失败情绪，鼓吹我国不能

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

（八）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今后继续和共产国际捣乱，瓦解它的支部，破坏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 8 卷第351—353页）①

斯大林用下述警告结束了发言：

“或者你们履行这些条件，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末，党昨天打败了你们，明天就要开始彻底粉碎你们。”（同上，第354页）②

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令他难于接受的要求莫过于让他承认自己是全无思想性的。最令人惊愕的是一个革命者能将昨日的信仰抛弃。斯大林要求反对派所做的正是这些。

但是，反对派仍旧没有投降。党内那些认为“10月16日声明”是胆怯行为、是正中斯大林下怀的人对反对派施加了压力。例如，在莫斯科的一次反对派会议上，“与会者对领袖的畏怯行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现在签订和约等于自己搞臭自己”，这次会议决定反对派今后“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3页）加入联盟的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集团发表了“十五人声明”。声明对联盟领导人的投降行为做了激烈的批评，并强调不仅要在党内积极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而且还要在党外，在工人中进行这一斗争。

按斯大林的历史学家的说法，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集团曾声明说，“在斗争的时刻所有官员都会站在斯大林一边，而工人党员将站在反对派一边”，“斗争不可能局限于党内”……反对派只有确保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它才能战胜斯大林集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315—317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317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团，为此，现在就需“组织起一个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核心”，“在揭露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揭露反对派领袖的摇摆不定态度。”（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简史》俄文版第468—469页）

“十五人声明”指出，斯大林在斗争中动用了一种新的力量因素：“国家政治保安局开展活动，同工人的正当不满情绪作斗争，甚至也同党内的反对派作斗争。”（同上，第469页）这里应当指出，联盟的领导人没有发觉，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反苏行为，实际上许多是斯大林本人通过缅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安局）搞的，目的是诋毁反对派的声誉，说他们是白卫反革命的工具（例如，把从前的白卫军谢尔巴柯夫和特维尔斯基派到反对派中做奸细，以便组织地下印刷厂）。

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讨论反对派问题。斯大林认为，重要的是得到这次“世界无产阶级”讨论会的道义支持。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让那些托洛茨基称之为克里姆林宫的食客的共产国际外国领导人做抉择：“在你们面前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它满怀信心地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起来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派，它象一个腿患风湿病、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拐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说在他们资产者那里什么都好，而在我们无产者这里什么都不好。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面前的两种力量。

“你们应当在这二者之间有所选择。”（《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9卷第149—150页）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3页。——译者注

不言而喻，“克里姆林宫的食客们”选择了供养他们的人——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全会上发表了维护自己观点的讲话，但是对于他们的讲话确实“无人响应”。大概，除斯大林之外没有任何人听他们的发言，斯大林在冗长的结论（大约有九十页）中谴责反对派说，反对派在这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这一事实本身就违背了它在“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所做的停止对中央委员会进行派别攻击的允诺。现在反对派维护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的领导被看成了派别斗争。看来，要对反对派分子运用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的决议了。斯大林的结论中有许多明显歪曲历史事实的话（诚然，当时只有中央委员和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结论中还有许多对个人的粗暴攻击。举几个例子。例如，斯大林否认了托洛茨基的声明，托洛茨基曾说，1917年4月中旬之前，斯大林曾同加米涅夫参加过一个集团，反对过列宁的《四月提纲》。（斯大林说：“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声明中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曾犯过很大的错误”，因此列宁叫他“大国沙文主义警察”（列宁《论自治》的信和文章）。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这一声明也予以否认。他说，“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同上，第64—65页）①托洛茨基声明说，他比列宁先想到了《四月提纲》，因此，他当时虽然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却和列宁站在一个阵营里，而斯大林，虽然置身于列宁党内，却反对这个提纲，称它是“赤裸裸的提纲”。斯大林否定了这一声明。这一声明使斯大林暴跳如雷，他竟把托洛茨基比做苍蝇！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0页。——译者注

……农民总是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同上，第68页）①既然加米涅夫提醒斯大林说，他有许多反列宁的错误，斯大林也没有对加米涅夫留情面。他提醒加米涅夫说，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琴斯克城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就是沙皇授以'即位权'的那位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同上，第77页）②斯大林恼怒地问：“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种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同上，第77页）③

党内斗争已进入了这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双方使用了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搞耸人听闻的揭发，抛档案文件，弄虚作假，诽谤，搞阴谋，对个人进行诬蔑。历史客观事实要求我们指出，在这方面斯大林也是首屈一指的。这里只提一提斯大林在历史上所做的两件事，对于历史知识不足，政治水平不高的广大党员（两百万党员中，只有二十万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来说，这两件事对他们震动很大：

1、中央委员会机关搜集和出版了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写的所有反列宁的文章和列宁写的所有反托洛茨基的文章，其中包括私人信件。

2、中央委员会机关出版了列宁写给中央委员会有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内容的密信，在这封信里，列宁把他们叫做“革命的工贼”（因为他们给《新生活》杂志写了一封反对起义的信），并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0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同上，第70页。——译者注

此外，党的报刊（《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等）还利用其垄断权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讯、简讯、述评，把一些编造得很低劣的提纲、口号和论点强加给反对派。反对派没有任何可能予以驳斥。如果反对派采取散发自己真正的政纲和讲话的办法力图驳斥对他们的诽谤，那别人就会指责他们继续搞"派别斗争"。

1927年6月，当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十月起义时他曾在波罗的海水手和士兵中做过积极的军事组织工作，现在则是斯大林的最危险的敌人）被以"任命工作"为由流放远东时，反对派在群众中第一次做了公开的反对党机关的演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到雅罗斯拉夫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莫斯科各个工厂的工人也闻讯赶来。用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扬松的话说，"应当认为，当时形成了一种**矛头指向中央委员会的街头游行示威**……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比季诺维也夫大，因为托洛茨基当场发表了讲话。"（《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4页）

这次成千名工人群众在反对派的口号下所进行的公开游行，使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认识到，反对派的领袖们决不是"光杆司令"，如果他们呼吁上街或是向中央委员会称为"第三势力"的群众呼吁，那他们将是一支非常危险的潜在力量。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在那里的工人中间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的信号以及从全国各工业中心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迫使中央委员会又一次提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反对派问题（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

全会的议事日程是这样拟定的：在所有内政外交问题上都要批判反对派的政纲。在全会上做报告的有布哈林（论国际政策和批判反对派）、李可夫（论经济政策和批判反对派）、奥尔忠尼启则（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斯大林没有做报告，但是他

在讨论时的发言比报告还长。共产国际的新领导人布哈林在激烈批判反对派的同时，为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中的路线做了辩护。布哈林说，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伴随着工业军事化，保守的英国所搞的阴谋（同苏联断交）目的是组织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因为“苏联具有强大的革命影响”。布哈林证实说，英国正在准备发起反对苏联的战争，在这一准备工作中，英国得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极左派’叛徒们”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说教就具有特别虚伪和罪恶的性质。”“在进攻苏联问题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是一致的，只是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延缓了对苏联的进攻，但是这些内部矛盾不能排除进攻的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339—341页）①

然而，斯大林—布哈林中央委员会所做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预言完全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所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完全同共产主义苏联联合起来，以反对斯大林昨日瓜分波兰的盟友希特勒。布哈林和斯大林把共产国际、工会红色国际及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政策的失败，把从内部通过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协商或通过建立英俄工会委员会（依据工联总委员会与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协议）合法争取工人运动方针的失败不仅归咎于“柏塞尔、希克斯之流”，而且归咎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然而，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所激烈批判的正是中央委员会的这一机会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反对派坚决要求共产党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74页。——译者注

退出国民党，宣布“无产阶级在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的口号，建立中华苏维埃，因为反对派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随时可以背叛同共产党员的联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当蒋介石的“背叛”已属事实（1927年4月12日他同共产党员决裂），中央委员会竟把罪责也归咎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不断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上，第347—348页）①

斯大林在同反对派作斗争时，经常采取列宁教授他的手段：实现敌人的纲领是攻破敌人的最有效手段（1917年俄国民主政府否决同德国单独媾和，列宁把这一否决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中，但是执政后他却签订了单独媾和条约。1917年夏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届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将土地交给农民的土地社会化思想，大会代表一致支持这一思想。列宁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一纲领，并于1917年10月26日发表了《土地法令》，目的是巩固政权后再抛弃这一纲领。俄国人民、所有俄国革命政党从1905年起都要求召开全俄立宪会议，列宁于1918年1月召开了立宪会议，目的是为了控制这次会议并宣布为不合法）。现在，斯大林在他的新盟友——中央委员会右倾笨伯们（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兰诺夫、乌加罗夫）的帮助下，把列宁的这一屡试不爽的策略用来反对左倾反对派了。例如，现在全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说，虽然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昨天是不正确的，但是现在“共产党应该大力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同上，第349页）② 反对派现在只能回忆过去它是如何正确，却不能批评中央委员会今天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因为这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83—28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85页。——译者注

是它自己的路线。对于反对派在城乡经济政策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和李可夫也是这样做的：接受反对派的要求以便打击反对派（在描写右倾反对派的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斯大林在履行左倾反对派的要求时走得有多远，他的做法比起左倾反对派最极端的政策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会根据李可夫的提议通过一项决议说，反对派关于必将发生经济总危机的预言破产了，计划如期完成了，工业化正按着预定的速度在进行，反对派所预言的通货膨胀没有发生，农业在顺利地发展，党将要特别注意提高贫农中农的个体经济。但是全会同反对派一样认为，“农村中的富农阶层也增长了”，因此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限制耐普曼的增长，全会决定增加对富足阶层的税收并减轻贫穷农户的负担。（同上，第349—355页）①

这正是反对派所要求的。它还要求稳定并部分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的零售价格，以便促进工农生活水准的提高。全会所做的决定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应当指出的是，中央委员会已经抢在反对派的要求之前，把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十。当这个问题第一次在1927年四月中央全会上讨论时，反对派对中央委员会投了赞成票。雅罗斯拉夫斯基说，反对派“投赞成票是耍手腕，为的是不被工人和农民所抛弃”，而这个联盟的最左翼——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集团称联盟领导人的这一行为是“丧失原则的手腕”，并退出了这一联盟。（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第474—475页）

但是全会对李可夫报告所做的记录中有一点，不仅显然与反对派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斯大林的意愿。这一点说：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86—292页。——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驳斥反对派的关于强征余粮、过高地征收私营商业的捐税（这会使私营商业立即消灭）的动摇人心的荒谬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这些建议实质上就是要废除党在列宁领导下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57页）①

整整一年之后，斯大林采纳了反对派的这些“动摇人心的建议”，斯大林所采纳的范围和规模是最大胆的左派极端分子也不能想象的。政治局的新分裂便是由此开始的，“右倾反对派”集团在政治局里形成了。

1927年6月2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预先讨论了反对派问题，会上人们努力劝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签署一份关于停止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一切批评的新文件。反对派通过托洛茨基之口回答说：“党的方针是主要的危险……现在党依靠的是书记，不是一般党员。党的整个制度就是如此”。当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开始威胁说，托洛茨基和他的同道者们如果对党机关进行这样的批评，他们就会把自己置身于党外时，托洛茨基向主席团问道：“你们真想给党戴上笼嘴吗？”（《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9页）

当反对派的首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拒绝戴上这一“笼嘴”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提出撤销两个人的中央委员职务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在全会上为这一决定做了辩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在争论中政治谴责又同个人攻击交织在一起了），全会向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反对派分子（现在他们的总数是十三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95页。——译者注

夫、拉柯夫斯基、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巴卡也夫、穆拉洛夫、阿甫杰也夫、佩捷尔松、利兹金、索洛维也夫）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做到下述三点：

（一）放弃托洛茨基的《克列孟梭[1]提纲》（如果外来的敌人逼近莫斯科，则应该推翻现领导）；

（二）放弃在共产国际中制造分裂；

（三）“放弃建立第二政党的企图，解散派别”。

反对派又拒绝了这些要求。加米涅夫不否认事情可以导致第二政党的建立，但是他认为罪责在中央委员会：“我认为，你们还可以驾驭事件的发展，堵塞产生第二政党的道路和避免第二政党所能带来的后果。”（《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8页）

对后来这一问题的讨论情况官方文件描述说：“只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不得不因此基本上通过关于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后，——只是在这以后，反对派才认为必须退却，必须放弃自己的许多错误，基本上同意（虽然还有附带条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建议，并提出了相应的‘声明’。”

反对派领导人在《八月八日声明》中写道：“我们坚决谴责任何建立第二政党的企图。我们同样坚决谴责分裂政策。我们要执行联共（布）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消灭派别因素，在曲解党内制度的条件下，我们曾被迫为使党了解我们的真实观点而作过斗争，完全错误地在全国的报纸上谈论过这些观点，因此而产生了派别因素。”（《党和反对派文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号“老虎”。他宣称自己的政策就是战争，并积极组织协约国的反苏武装干涉。——译者注

件汇编》俄文版第37页）

反对派想不建立派别，在党章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鉴于这一声明，全会决定不讨论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给他们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33年俄文版第2册第366页）①

就这样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从1927年8月8日至9月7日停战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后来有两件事重又在党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新辩论，这两件事是：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和筹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下一章我们再来分析这两件事。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09页。——译者注

第二十七章

二者必择其一：或斯大林，或托洛茨基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推迟了整整九个月才举行，这直接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因而每年要重新选举总书记）。推迟的原因只有一个：斯大林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肃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正忙于从政治上和组织机构上创造先决条件。代表大会表明，斯大林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很扎实的，“新反对派”受到谴责，胜利者重被选为“总书记”。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被斯大林推迟了一年，这就是说，斯大林少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从“党的根本法”（党章）来看，他已成了非法的“总书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没有按期举行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斯大林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消除反对派联盟。

八月全会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举行。通常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公布中央关于代表大会议程的提纲，同时公布不同意现行政策的共产党员集体或个人的反提纲（政纲）。反对派根据党内这项法律，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的十分冗长的政纲，就极为重要的争论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详细主张，并要求和正式提纲同时印发。

1927年9月8日，政治局决定拒绝给反对派这种权利。这是首次极其粗暴地践踏党章的行为。按规定，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党章。

政治局的这种史无前例的专横行为（这项决定做出之前甚至没有征求驯服的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使党内形势重又紧张起来。反对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非法地印制和散发自己的政纲。这项活动是在老布尔什维克姆拉契柯弗斯基领导下在莫斯科的一个印刷所进行的。这里刚好有国家政治保安局悄悄安插的“白卫分子”。党的宣传机构展开了一场猛烈攻势，指责反对派同在苏联策划军事阴谋的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勾结在一起了。这一指责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甚至连党内斯大林的最忠诚的拥护者都感到这些谎言太离奇了。因为他们编造得很好，宣传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反对派被激怒了，他们就此事特致函中央委员会，写道：“在政治上已破产的斯大林准备重蹈克伦斯基、彼列维尔杰也夫、阿列克辛斯基的老路。我们所以不得不指出斯大林的这一行为，是因为在一百万党员中还有许多政治经验不多的年轻革命者，他们不能立即弄清事情的真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情况叫做“鱼龙混杂”。在一起诉讼案中，有人把革命者和保皇党分子、左派雅各宾党人和投机分子放在一起，以便把水搅浑，欺骗人民。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①]时期，这种“鱼龙混杂”现象曾层出不穷。在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阿列克辛斯基、彼列维尔杰也夫、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企图用这种“屡试不爽”的手段去反对列宁，拿出一个军官叶尔莫林柯做为证人，捏造说什么列宁给德国做过间谍……我们是列宁的学生，如果无产阶级事业需要的话，也准备蒙受不白之冤。”（《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9页）

---

① 热月政变，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新历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政变。这次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建立了热月党人的统治。——译者注

为制造出这种“鱼龙混杂”现象，为把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们同“白卫分子”、“保皇党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置于同一个被告席上，国家政治保安局逮捕了国家印刷所的全部工作人员并宣布印刷所是非法的。印刷所被封闭后，由于反对派仍想在党内和通过共产国际的反对派小组在国外广泛散发他们致中央的信，中央委员会又急忙地对反对派提出了新的指控，说他们不仅违反了“八月八日的声明”，而且实际上想推翻现政权。

1927年9月27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向党的积极分子公布了答复反对派首领们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反对派妄想推翻苏联现存制度。当在反对派的非法印刷所的非党‘工作人员’中发现了军事叛乱组织的线索之后，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佩捷尔松回答说，苏联当前的形势和1917年7月相似……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联共（布）是反革命党……反对派首领们违反他们的八月八日声明……在党内进一步采取措施，将其派别变成一个由反对派联盟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者又同妄图在苏联搞军事阴谋的分子结成联盟）组成的政党。”（同上，第39—40页）总之，反对派准备通过建立新党，用“军事阴谋”手段推翻苏联的共产主义专政。

这真是弥天大谎！和它相比，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①]，则是一件纯门外汉的发明了。反对派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们只是反复地说什么有发生热月政变的危险和可能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但是斯大林已实际完成了导致建立个人独裁的反革命政变。斯大林似乎用暗示的口吻对反对派首领们说，只有用暴力，用政治或军事的阴谋手段才能推翻他。斯大林认为反对派善于搞这种阴谋，是大错特错了。当然，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对反对派的指

① 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事件。——译者注

控。仅在一个月前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还说过："既然托洛茨基集团累得满头大汗地工作了四个月才勉强凑了千把人的签名，那就可想而知这个集团已经悲惨到了何等地步了。我想，随便一个反对派集团，**只要會做工作**，都能凑上几千人的签名。我再说一遍：这个小小的集团，它的首领比军队还多，（笑声）……竟向拥有百万人的党威胁说'我要扫除你'。"（笑声）（《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53—54页）①

为什么斯大林竟认为连工作都不会做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集团"居然这样危险，居然能搞阴谋呢？斯大林把他处于反对派地位上所能做的一切都强加给这个小小的集团了。幸好他是和"唐·吉诃德式的政治人物"（这个术语是斯大林创造的）打交道。可悲的是，这些人不是对风车而是对斯大林发动了进攻。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断地射出提纲、书信、备忘录、政纲等"文字炮弹"。认真研究了这段党史的史学家们很难理解，反对派何以会认为他们向党讲的话具有那么神奇的力量。托洛茨基本人不是早已认为党已不复存在了吗！

反对派虽然也是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的信念，但他们对义务、荣誉和正直的看法，却与斯大林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斯大林逮捕印刷所职工，说明他还不敢逮捕反对派的首领们，而被捕的人全是根据他们的吩咐行事的。为使身为中央委员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免受危险，非中央委员的反对派首领，列宁在世时于斯大林之前担任过中央书记职务的谢烈布利雅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早在8月15日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在信中声称，他们对被捣毁的印刷所和被逮捕的职工负责，因为职工只是按他们的吩咐做的。信中还写道：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0页。——译者注

"我们向你们声明，我们对此事件负政治责任。它的组织者是我们，而不是偶然和它有关系的非党群众。你们掌握全部印刷所、全部出版物、党的全部资金，可是不允许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举行前夕在党的面前维护我们的观点，并迫使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手工方式印制我们的代表大会开幕前的材料……你们很了解我们。你们知道，我们是老党员，决不会放弃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们将采取我们力所能及的其他手段……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因此事而被捕的全体人员，因为对此事承担全部责任的是我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沙罗夫。"（《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7页）季诺维也夫也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个声明，说他虽然不认识被捕的人，但也不排除其中有原白匪军官，但他们只是完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沙罗夫委托的任务，因此，他，季诺维也夫赞同他们的信，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

斯大林决定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没有任何权力，完全依附于斯大林机关，不过按传统这些机构享有一定的道义资本，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些资本）面前揭露反对派与"反革命"的联系。在1927年10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布哈林斥责反对派与反革命的直接联系，对他们提出的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表示愤慨。布哈林说：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声明中写了些什么呢？他写道，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有可能与白卫分子为伍。他在声明中说有这种可能性……大家都看到了。（托洛茨基："在军队中就有过这种情况"。）是的，托洛茨基同志，有过。请允许我说下去。可是季诺维也夫说，他们不知道被捕者是什么人。但与此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另一些人却要求释放全部被捕者。瞧，你们就是如此

承担全部责任的……现在简要地提一下印刷所以及同非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联系问题……托洛茨基赞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认为可以允许存在非法的印刷所；他也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声明，后者竟如此'稚气'，他对我们说：'把我们的机器设备还给我们'。"（《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第41期第14—15页）

新政治局的首脑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指责反对派实际上已与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了，"企图组织地下印刷所，搜罗一批搞皮尔苏茨基式的政变的人妄图在我们国家发动政变。"（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第483页）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如同历次会议一样，一致谴责反对派似乎准备搞"皮尔苏茨基式的政变"。至于共产国际外国党的委员们是否相信他们的前任主席季诺维也夫想成为俄国的皮尔苏茨基（当时的波兰军人和政治家。——译者注），是否相信在国内战争中粉碎白匪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现在想重建白匪军并率领它去反对他亲手组织起来的红军，这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不能不令人想起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原共产党员希洛涅。当蒋介石发动反对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托洛茨基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备忘录》，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亲蒋政策，而政治局却于1927年5月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托洛茨基的备忘录。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主席拟把谴责托洛茨基的提议交付表决。但意大利代表团（希洛涅和陶里亚蒂）提出在谴责之前想看一看托洛茨基的文件。会议主席（德国人台尔曼）却十分冷漠地说："我们主席团委员也没有看过。"希洛涅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台尔曼说的话，又请他重复一遍，台尔曼又逐字逐句地重说了一遍。于是在陶里亚蒂的支持下，希洛涅声明说，托洛茨基的文件可能完全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没有看到文件之前，意大利人不能这样做。

斯大林解释未把托洛茨基的备忘录译本分发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原因：因为其中有泄露苏联国家政策机密的地方（其实只有一件“机密”：1927年4月1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高度赞扬过蒋介石的功绩，袒护过国民党，但在一个星期之后，蒋介石发动了政变，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托洛茨基写的正是这件事）。斯大林看到共产国际可能不会“一致谴责”托洛茨基，便建议改期再举行会议。但在休会期间将向意大利人“通报”苏联国内情况和联共（布）的立场，却不拟介绍托洛茨基的备忘录。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柯拉罗夫被委托担任“通报员”的任务。他做得很出色。他把意大利人请到“留克司”旅馆（共产国际各国领导人的住处），边喝茶边向意大利人说明了事情的实质。他讲得头头是道，不过有些厚颜无耻。柯拉罗夫的论点可概括如下：第一，我也没有见到过托洛茨基的备忘录；第二，如果托洛茨基秘密地送给我看，我也会拒绝，因为坦率地说，我对它不感兴趣；第三，我们不是在探讨历史事实，而是要指出联共（布）内存在的两种力量——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握有控制党和苏联的权力，因此我们支持斯大林，而不支持托洛茨基。

柯拉罗夫还是未能说服意大利人，在下一次会议上，他们仍然拒绝谴责托洛茨基的备忘录，不同意开除托洛茨基。法国和瑞士代表团支持他们的意见。这时，斯大林宣布，因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央委员会撤回关于托洛茨基的决议。会议在未能谴责托洛茨基的情况下宣告闭会。希洛涅乘车路过柏林时买了一份新出版的德文报纸，他十分惊奇地读到这样一条假消息：莫斯科讯，托洛茨基因中国的备忘录问题而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格罗斯曼：《失败的上帝》，纽约英文版106—111页）

闺印刷所事件，中央监察委员会把以非中央委员的反对派首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姆拉契尼柯弗斯基为首的十四人开除出党。但是，这并未能阻止反对派印制他们的政纲。据雅罗斯拉夫斯基说："反对派使用贿赂和欺骗苏维埃印刷所个别工作人员的办法出版孟什维克的政纲，向各地散发。"（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第483页）

不受反对派首领们控制的地方反对派集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他们在莫斯科郊区，在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建立了许多新的地下印刷所，强占教室，召开会议（雅罗斯拉夫斯基："事情竟发展到强占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室的地步，他们不让前来驱散他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进入会场"——同上，第484页）。于是掀起了一个大量开除反对派分子和没有公开表态同意中央委员会立场的党员出党的新浪潮。对中央委员会内的反对派又开始了新的谴责。

斯大林仍然决定求助于共产国际。9月27日，执委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反对派问题。在这次会上，托洛茨基公开谴责斯大林，说他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集团通过党机关搞阴谋的办法非法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现在，斯大林在党内建立的制度与列宁的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党机关官僚制度作斗争，就是为恢复列宁的制度而斗争。斯大林决定向共产国际证明，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上措辞激烈的对话中可以看到，斯大林集团虽是篡夺了权力，但斯大林制度本身确是最合乎逻辑地、最彻底地继承了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制度。斯大林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特意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之前发表了自己的演说，因此这次全会又提出了反对派问题。斯大林完全有权宣布自己的制度

是正统的列宁的制度，而托洛茨基则是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异端分子。斯大林说：

"托洛茨基不了解我们党。他对我们党没有正确的概念。他看待我们党就象贵族看待贱民或官僚看待下属一样。不然他就不会断言在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内，在联共（布）党内，可以由个别的人……'攫取'权柄，'篡夺'权柄……那末，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能够'攫取'党内的权柄，窃取党内的领导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托洛茨基愚蠢，不如布哈林或斯大林聪明吗**？难道他是较为逊色的演说家吗？作为一个演说家，托洛茨基比我们党内现在的很多领袖都要高出一头，这样说不是更对吗？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技巧，尽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尽管有才干，结果还是被排斥于联共（布）这个伟大的党的领导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托洛茨基有意把原因归于：我们党（在他看来）是**一群盲目跟着斯大林和布哈林跑的**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0—11页）我标示黑体的部分，斯大林在1949年再版他的全集时给删去了。（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9页）①

关于他的制度是否与列宁所建立的制度不同，斯大林回答托洛茨基说：

"托洛茨基把事情说成这样：同列宁生前建立的党内制度相比较……现在的党内制度根本是另外一种东西。他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他并不反对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建立的制度，他反对的其实是现在的党内制度，在他看来，现在的党内制度和列宁所建立的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在这里说的全是谎话。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37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我肯定说，现在的党内制度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列宁生前建立的那个党内制度的正确表现……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要求党内允许有派别集团，并取消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托洛茨基喊道："我没有说到第十次代表大会，你在捏造"。）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我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些证据全都保存下来了，我将要把它们分发给同志们，那个时候就会明白我们当中是谁在说谎。"（《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61—162页）①

不言而喻，斯大林没有拿出任何足以说明托洛茨基要求改变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证据来。1927年10月3日，斯大林把1923年10月15日的"四十六人的声明"中的片断送给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而托洛茨基是从未在这个声明上签过字的。但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等人的声明只说了这样一点："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经过时了。"（同上，第163页。黑体字是我加的——作者注）②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后来他们开始这样称呼自己）之所以是软弱无能的，恰恰因为他们认为列宁所做的一切，包括这个极其残暴的"反党的特殊法律"——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但是斯大林却彻底地把它用来消灭善于思考和判断，勇于批评的那部分党员，以便从"派别专政"走向个人专政。反对派看出了这一点，勇敢地和斯大林展开了论战，可是他们对列宁的影子却怕得要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新的联席全会（1927年10月21—23日）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它的议程是：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3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40页。——译者注

1、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可夫）；

2、关于农村工作（莫洛托夫）；

3、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明仁斯基关于反对派与反革命联系的通报；

4、关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党的宣传机构和西方报刊总是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说成是斯大林的思想。其实，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工业化计划是由以政府主席、列宁的苏联经济问题的主要助手李可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隶属于政治局）集体创作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仍是中央委员时，李可夫的专门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工业化计划的所有主要方针、它的比例、速度、优先地位（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个计划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后来又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并记入关于中央工作的代表大会决议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李可夫主持下由隶属政治局的新的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查诺夫斯基也参加了。

正是李可夫向全会做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指示方针的报告。在李可夫起草的全会决议中写道，在制定五年计划时，“根据国家工业化政策，首先必须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使那些能够在最短期间提高苏联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重工业部门具有最快的**发展速度**”，决议还特别强调说，“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比重方面同样必须使二者达到最完满的结合……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决议回答反对派说，“要求**尽量**把资金从农业方面抽到工业方面去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会在政治上

同农民决裂，并且也会破坏工业本身的原料基地和国内市场，破坏出口，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平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71—376页）[1]

当斯大林除掉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之后，他对工业化计划做出的唯一创造性贡献，就是大幅度地修改这次全会关于五年计划必须遵守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的方针和决定，并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布哈林语）的办法看做是工业化资金的源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论述。

莫洛托夫阐述的中央关于农村的政策，似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思想的混合物，莫洛托夫自己的新观点一点儿也没有。（列宁给莫洛托夫起过一个极好的外号，叫他“笨拙的人”。他不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历来是斯大林派的党机关权势分子，在接受斯大林的计划时从不判断是非，在阐释计划时极为精细，执行计划时又极端冷酷。）

议事日程的中心点是第三项——关于反对派，即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根据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此需要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而且在这种全会上候补中央委员也有表决权。因为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二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十三人支持反对派，所以反对派首领们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

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1、政治局谴责反对派继续搞派别活动，并与反革命有联系；

[1]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13—317页。——译者注

2、反对派要求公布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在政治局做完报告后，反对派首领们开始发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发言是极端挑衅性的。

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领导有什么好夸口的呢？错误累累，屡遭失败。总之是政治上破产。”（《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俄文版第1册第385页）

加米涅夫说：“我们声明，不知所措的斯大林分裂主义分子集团无论把我们置于何种境地，我们也要捍卫列宁党的事业，反对革命的掘墓人。”（同上，第386页）

托洛茨基补充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将是斯大林派别机关的最大胜利。”（同上，第387页）

列宁的“遗嘱”是一封写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的信。现在作为反对派首领的人，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内曾拥有多数，只要他们愿意并协商一致，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撤掉斯大林，但是他们没有撤掉斯大林，没有执行列宁的遗嘱，更有甚者，他们同斯大林一起决定向全党隐瞒这个“遗嘱”。现在，撤销斯大林的职务已毫无希望，“遗嘱”是否公布也只能完全取决于他。但这时反对派却突然决定在全会上提出这种要求。如果当年斯大林不曾采取措施以使他或中央委员会因隐瞒列宁遗嘱而免于受到谴责，那末斯大林也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这些措施现在对他是非常有用了。斯大林证实说，如果说有人隐瞒了“遗嘱”，那末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要知道，隐瞒列宁遗嘱这件事对他们更有利害关系，因为列宁在“遗嘱”中指出了他们的政治错误，而关于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却没有提到一个字。

斯大林在答辩中首先说到，为什么反对派集中火力攻击他一

个人。斯大林如往常一样，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你们在这里都听到反对派分子多么不惜气力地使劲谩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他们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2页）①为证明对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进行"无赖的攻讦"是托洛茨基历来的职业，斯大林又把托洛茨基流亡国外时期与列宁斗争时所写的著作翻找出来。他特别引用了托洛茨基写给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主席齐赫泽的信。信写于1913年4月，反映了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和列宁的新中央（1912年1月在布拉格成立）之间的那一时期的斗争。这封信被沙皇警察局截获，列宁生前，斯大林就把它弄到手了。列宁没有重视这封信，因为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争论在关键时刻和关键性问题上——组织和发动十月革命——取得了完全一致而解决了。而且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盟时，他公开声明说，在革命前他和列宁有过各种不和，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他，"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实本身……已经证明，我已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9卷第83页）②

但这一切对斯大林说来毫无意义。他所需要的是使百万的党员对此感到惊讶。这些党员对昔日侨居国外时的争吵，对列宁并非象后来斯大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出于各自利益而把他说成是党的"圣人"一事，都一无所知。在公布这封信之前，斯大林说："斯大林算得什么，斯大林是个小人物。拿列宁来说，谁不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5页。——译者注

知道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八月联盟期间曾经对列宁进行更无赖的攻讦。例如，请听听托洛茨基的话……。”

托洛茨基的信用词粗野，内容耸人听闻，致使他的拥护者都为之震惊。托洛茨基写道：

“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的无聊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指原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联合中央委员会的财会处——作者注）那里搞来的不义之财办起了机关报，抢用了有名气的报纸的名称（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了《真理报》，列宁把这个名称据为己有，并把1912年5月在彼得堡出版的报纸命名为《真理报》。——作者注），并且打着‘团结’和‘非官方性’的旗号，招徕工人读者，这些工人当然会把工人日报的出版看做是自己斗争的巨大成果。当报纸站住脚之后，列宁便把它用来搞集团阴谋和无原则分裂。总之，当今的列宁主义大厦完全建立在谎言和伪造的基础之上，并包含着自行解体的有毒因素。”（《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3页）

斯大林援引了这封信后，含糊其辞地指出，早在191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就反对列宁，进行无赖攻讦”（事实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是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最早战友，至于斯大林这个人，列宁虽然知道，但是既不知道他的党内化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氏。——详见前述），斯大林用一种悲伤的腔调说道：“连列宁的一支靴子都不如的托洛茨基，对于伟大的列宁尚且如此放肆地藐视，现在对于列宁的许多学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骂，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3页）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译者注

在此之后，斯大林回答了托洛茨基指责他向党隐瞒列宁的"遗嘱"问题。为说明事情并非如此，斯大林又让托洛茨基本人作证。斯大林说，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伊斯特曼于1924年在美国出版了《列宁死后》一书，此书首次发表了列宁的遗嘱，并第一个指责斯大林向党隐瞒了这个"遗嘱"。当时政治局曾建议托洛茨基驳斥伊斯特曼。托洛茨基同意了，并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文章。托洛茨基写道："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谈到中央对党'隐瞒了'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问题的书信、所谓'遗嘱'等等），**这无非是对我们党中央的污蔑**……所有这些书信和建议……总是按照指定送达，通知了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信所以没有全部发表，那是因为写信的人没有指定在报刊上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在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遗嘱'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内容是向组织内部建议的信……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9月1日第16期第68页）

斯大林宣读托洛茨基的文章后问道："看来很清楚了吧？写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现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据什么来嚼舌根，硬说党和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呢？"（《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5页）[1]

但是，斯大林承认确实有列宁"遗嘱"，而且"由于斯大林

[1]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页。——译者注

'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可是斯大林没有宣读列宁谈论他的全文，因为否则就会看出，列宁不仅谈到他的"粗暴"，而且还谈到他不忠实和滥用权力。并且斯大林实际上认为自己的粗暴是维护党的利益的美德，从而间接地同列宁展开了争论。斯大林说："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同上，第175页）① 总之，"好心肠的"列宁容忍了党内的"分裂主义分子"，可是，我，斯大林不能容忍他们！

斯大林还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论据。他说，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他曾请求全会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但是"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同上，第176页）② 斯大林补充说："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斯大林很有理由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我这个人……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同上，第176页）③

斯大林善于突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同时又具有一种要弄骗术和颠倒是非，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惊人本领。他就在反对派首领的这些证人面前玩弄了这两种手法。他声称：

1、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其实是给列宁生前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在第二十三章详细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页。——译者注

②③ 同上。第152页。——译者注

叙述过这个问题）；

2、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遗嘱”；其实，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只是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团传达过“遗嘱”的内容，并说明决定不公布“遗嘱”）。

斯大林指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6年已决定把发表“遗嘱”问题提请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做出相应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实做出了发表“遗嘱”的决定，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发表它，直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才发表了），但是他没有等待代表大会做出决定却先宣读了“遗嘱”中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段落。在宣读之前，斯大林做了如下声明：

“反对派竭力拿列宁的‘遗嘱’当王牌。但是只要读一读这个‘遗嘱’就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当王牌。相反地，列宁的‘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同上，第177页）①

列宁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很难说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就象很难说非布尔什维主义是托洛茨基的过错一样”，可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这句话做阐释说：“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为他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毛病，也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同上，第177页。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②

斯大林极其粗暴地歪曲列宁的思想和“遗嘱”的真意，这些观点至今仍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中流传。斯大林在分析“遗嘱”

①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2—153页。——译者注

之后肯定地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同上，第177页）斯大林对"遗嘱"所做的下述缺乏逻辑的评价，没有引起他的足够注意：按列宁的意见，"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需要保留他们的职务，只有斯大林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但需要解除他的职务，尽管在"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

早在七、八月全会上，斯大林就竭力谴责反对派参加了"皮尔苏茨基式的阴谋"。可是那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供的材料全是伪造的，斯大林不得不急忙地撤销了指责。在这次全会之后的两个月期间，中央委员会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侦察机构做了一番努力，使斯大林得以采取一个党史上无先例的步骤：在全会议程上安排了苏联秘密警察主席明仁斯基的报告（不言而喻，在公布的议程上和全会的新闻公报上只字未提这个报告）。明仁斯基向全会报告说，他的机关逮捕了一批反对派分子、一批"白卫分子"和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根据反对派的指示建立了一些地下印刷所；"白卫分子"还企图策划军事政变。斯大林对此补充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给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看过这些被捕者的口供，但他们复制了这些口供并且送给了在国外的马斯洛夫（在德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首领），马斯洛夫在柏林发表了这些材料。斯大林说，"反对派的告密"就这样警告了那些还没有被逮捕的、参加反对派阴谋活动的白卫分子。斯大林以此为秘密警察头子插手党内事务做辩解，说："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让明仁斯基做一个关于事实真相的报告。"（同上，第184页）①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0页。——译者注

但是，明仁斯基的发言却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而反对派首领们却轻易地向全会表明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企图用阴谋手段推翻领导，那种认为他们可能参加白卫分子的军事阴谋的想法就更为离奇了。不仅如此，反对派还用事实和材料证明，那些似乎与反对派有联系的白卫分子正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密探和奸细。斯大林不能不看到，甚至全会的大多数人即他的拥护者的反应对他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决定"退却"。斯大林说，中央委员会从来也没有指责反对派之中有谁参加策划军事阴谋（穆拉洛夫说："在上次全会上责备过。"）（同上，第184—185页）①

斯大林被迫公开承认，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党内不仅开始利用特务网，而且还利用奸细（需要指出，列宁反对在党内利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务网，反对雇佣共产党员做告密者）。请看一看斯大林对鼓噪一时的"弗兰格尔军官"案件所作的声明吧！

"有人提到正在帮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前弗兰格尔的一个军官。反对派欢喜得手舞足蹈，嚷嚷不休，说前弗兰格尔的一个军官（反对派的同盟者即所有这些舍尔巴柯夫分子和特维尔斯柯依分子都跟他拉过关系）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侦探。但是，假如这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帮助苏维埃政权揭穿反革命阴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舍尔巴柯夫之流、特维尔斯柯依之流和波里沙柯夫之流这些先生在跟反对派结成联盟时，原来已经跟反革命分子，跟柯斯特罗夫和诺维柯夫之类的前高尔察克的军官建立了联盟，——关于这一点，今天明仁斯基报告过了。"（同上，第187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1、162页。——译者注

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在代表大会前夕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仅仅因为不同意中央的官方路线而横遭逮捕时，斯大林简短地回答说："是的，我们现在逮捕他们，要是他们不停止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以后还要逮捕他们。"（同上，第190页）①

现在怎样对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呢？在这里需要指出斯大林的一种手法，他既能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又善于搞阴谋使群情激愤，以反对自己的对手。在1924年，斯大林曾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去反对托洛茨基，但当他们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开除出党时，斯大林没有同意，说需要和解。在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唆使全会全体代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但当全会要求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又说需要和解。在1929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如此尖锐和毫不妥协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问题，以致全会又要求立即把他们赶出政治局，可是斯大林表示他不同意这种要求："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07页）② 在这次十月全会上，斯大林矫揉造作地谈到他"爱好和平"的弱点，他说：

"……在今年八月召开的上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有些委员责骂我，说我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太温和，说我劝阻了全会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听众喊声：'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喊道：'对，……我们一直要骂！'……），但是现在，同志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4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译者注

们，这三个月来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决不能再容许采取温和态度了。现在我们要站在那些要求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的同志们的前列。（热烈鼓掌。喊声：'对！对！'有人喊道：'应当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同志们，这一点让代表大会去决定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91页）①

全会做出决定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搞派别活动，"发展到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组织反列宁主义的新党的地步"，为此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全会还决定把"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首领的分裂活动以及维·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集团的分裂活动的全部材料"提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真理报》1927年10月25日）

从十月全会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另方面，对反对派和党内外的同情者实行了空前规模的镇压。很多人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开除学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批地逮捕老布尔什维克。这一切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在反对派的文件上签名，在党的会议上投他们的票，就是对反对派略表同情也堪称是舍己忘身的行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反对派的力量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增大了。1927年6月"八十三人的声明"（七十二个印刷页）征集了数千名反对派积极活动分子的签名（其中谈到1927年5月27日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对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所应负的责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5—166页。——译者注

国家”；关于中央委员会反工人、反贫农、亲富农、亲耐普曼的政策；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关于斯大林派别对党实行专政，等等）。党史学家、斯大林清党的主要干将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那个“政纲”在地下印刷所印制了三万份，有五千人在上面签名。（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简史》俄文版第487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的注释者后来把签名者的人数降为三千人。见本书1962年俄文版第2册第1644页。）

据李可夫的报告（关于五年计划）和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农村工作）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得不把反对派的反提纲刊登在《真理报》为代表大会增辟的“争论专页”上（1927年10月30日至12月2日）。反对派的代表们还在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党的会议上讲解反对派的反提纲，但会场的气氛是“文明阶层”完全不可思议和不能容许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各党委会都成立了由“一些爱斗欧闹事、吹口哨之徒”组成的专门小队。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曾提到过这些小队。（《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547页）

只要反对派的代表或支持者出现在某一个会议上，“口哨”小队就立即被派往那里。他们的任务是依靠基层党委书记和积极分子的支持，打断反对派的发言。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说过，当反对派分子发言时，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是怎样指挥莫斯科积极分子的：

“托洛茨基说，乌格拉诺夫主持莫斯科的积极分子会议，给（这是他的原话）吹口哨的人交代一种专门信号……乌格拉诺夫坐在主席台上，如果他把纸这样放着（做示范动作），就意味着轻吹口哨；如果他把纸横着放，就要用劲地吹口哨；如果他把纸撕碎，就要边吹边跺脚……反对派首领们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乌

克兰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同上，第185—186页）

当反对派中央委员和拥护他们的共产党员要求中央委员会给他们提供会场，以便能够在党的会议上阐述他们的观点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党员的起码权利。当雅罗斯拉夫斯基讲到代表大会前夕，即11月4日，反对派非法霸占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室开会时，他引用了斯米尔加的话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有责任按我们的要求提供党所拥有的各区的俱乐部和房屋”。当他谈到反对派的这一要求时，好似在某人指挥之下，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会场立即响起了喊声：“让弗兰格尔给他们提供吧！”，“给他们在诺沃杰维奇墓地找个地方吧！”，“让他们去布铁尔斯基哨所吧！”（意即监狱——作者注），“去卢边卡广场吧！”（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拘留所——作者注）（同上，第544页）

尽管存在着这种心理上、政治上和警察的恐怖，反对派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反提纲，按官方显然缩小了的统计，仍征集到了一万三千三百名支持者（雅罗斯拉夫斯基说：“在辩论时，反对派获得百分之一的支持票和百分之零点五的动摇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共有党员八十八万七千人。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俄文版第488页）。

反对派特别是各地方的反对派集团散发传单，十分活跃。在庆祝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派分子在列宁格勒发表了由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叶甫多基莫夫、巴卡也夫、佩捷尔松和索洛维也夫签名的关于“11月7日游行”的呼吁书。参加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列宁格勒代表认为，呼吁书实际上是号召“暴动”，这当然是对事实的歪曲。在呼吁书中，除列举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反对派的要求外，只提出一个“战斗”口号：“坚决制止斯大林分

子胡作非为！坚决制止一切反对反对派的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320页）

在节日前夕，斯大林要了一个诡计，表明他是一个有独到之处的蛊惑家。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专门成立的委员会提出，为庆祝节日发表一个告苏联和全世界劳动者的特别“宣言”。这个“宣言”庄严宣布：

1、苏联从现在起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现有工资不变；

2、百分之三十五的农户（即全体贫农和不富裕的中农）免除纳税。

反对派直言不讳地把它叫做蛊惑，并投票反对这个“宣言”。这恰恰中了斯大林的下怀。强大的宣传机器立即开动起来，指责反对派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敌人。这种宣传很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反对派虽然自认为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但由于策略上的错误，而使自己脱离了他们。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党机关鉴于可能举行公开游行，便事先组织了由党员组成的专门队伍。当时爱说俏皮话的人称他们是斯大林的暴徒大队。如果反对派上街游行，就动用这个大队。反对派真的组织了反游行，在莫斯科由托洛茨基率领，在列宁格勒由季诺维也夫率领。官方历史学家写道：

“反对派首领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带领自己的一小伙支持者拿着反党的标语牌搞了一次游行。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向游行者发表了诽谤性演说……游行者被驱散了，标语牌被砸烂了，季诺维也夫和他的喽罗们都各自逃命了。”（同上，第1611页）“暴徒大队”干得很出色！

托洛茨基曾这样描述这次游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日益迫近……尽管气氛异常恐怖，但党内想听一听反对派的呼声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只有采取非法途径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在莫斯科和

列宁格勒的各个角落举行了有二十人至二百人参加的大小秘密会议。在一天之内，我参加了二、三个，甚至四个这种集会。这种会议一般是在工人住宅举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近二万人参加了这种集会。反对派特别出色地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会场里挤满了两千多人，还有许多人未能进入会场。我和加米涅夫讲了两个小时……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工人书，呼吁用暴力驱散反对派的集会。这种呼吁只是为了掩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指挥的工人战斗队对反对派精心策划的进攻。斯大林想进行血腥镇压。我们发出暂时停止组织大型集会的信号。这已经是11月7日以后的事了……反对派分子决定在游行队伍中打出自己的标语牌，这些标语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反对党的：

"'把枪口转向右方——转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党的统一'。今天，这些口号正是斯大林派别用以反对右倾分子时所使用的官方口号（这些口号写于1930年——作者注）。在11月7日这一天，反对派的这些标语牌被夺走，拿标语牌的人遭到特别战斗队的毒打……甚至莫斯科街道上的一些法西斯分子也自愿地去帮助党机关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民警装做发出警告的样子，直接向我的轿车开枪……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消防队长官跳到我的轿车踏板上破口大骂，砸碎了车窗玻璃……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受到特别小队的围攻，在游行期间被关在一座建筑物里。"（托洛茨基：《我的生涯》俄文版第2卷第277—280页）

当历史尖锐地提出需要组织一次反政变以反对斯大林的"热月"政变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大师们竟象门外汉一样无知。他们的组织小得可怜，秘密工作原始落后，提出的口号软弱无力。与其说他们想取胜，不如说只想吓一吓斯大林而

已。他们是忠实于"伟大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神圣的列宁主义"的奴隶，既低估了斯大林的坚强神经，也没有看出斯大林除了追逐权力之外可以抛弃任何理想。他们大肆宣扬说，斯大林会用各种卑鄙伎俩对付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统率过的全部列宁近卫军（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瓦洛佳还在世，他现在很可能坐了班房。"）（托洛茨基：《斯大林》英文版第381页）

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举行的不成功的游行，给斯大林提供了盼望已久的借口，他现在可以同反对派彻底算帐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1927年11月14日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有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叶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阿甫杰也夫；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有穆拉洛夫、巴卡也夫、什克洛夫斯基、佩捷尔松、索洛维也夫和利兹尼金（1927年11月15日《真理报》）。这项决定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周作出的，以便让代表大会面临既成事实，使反对派首领们无法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坛。不言而喻，即使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出席代表大会也不会对斯大林构成任何危险，但他做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关于加米涅夫集团能否继续留在党内的问题，要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甚至允许这个集团中的原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拥有发言权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反对派11月7日不成功的示威游行竟招致这样的后果。萨普龙诺夫的支持者对这次游行说了如下一句话："未来的史学家将把11月7日看做是无产阶级为争取新的革命所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发动。"（雅罗斯拉夫斯基上述著作第485页）

继反对派首领们被开除出党后，开始大规模地清除和逮捕那些曾经在反对派的文件上签过名的共产党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在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做报告时说："截至11月15日，因参加派别活动而受到追究的人只有二千零三十一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50页）在代表大会上所列举的事实表明，尽管采取了恐怖手段，各地方的集团仍继续展开反斯大林的活动，举行秘密集会，印制和散发传单，抗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列宁格勒的一个代表说："反对派分子在工厂、在住宅房门上、在电线杆上张贴传单，上面写着：'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被开除出党了。这是极端卑鄙的行为……我们号召一切有觉悟的工人起来抗议这一决定'。有的传单上写道：'同志们，我们的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被开除出党了，这是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一伙搞的鬼'。还有的传单要求全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因为现在只有'斯大林分子、布哈林分子、莫洛托夫分子'才享有这种自由。传单最后号召'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斯大林！'"（同上，第320—321页）在莫斯科、乌拉尔、乌克兰也出现了类似的传单。乌克兰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写道："我们号召你们使用1907—1911年的老方法展开地下工作以建立列宁式的党；号召你们参加为争取在党内有派别活动自由和不同意见而进行的地下斗争。"（同上，第551页）

莫斯科的代表说，11月7日以后，反对派在莫斯科"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萨普龙诺夫集团的传单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在莫斯科的斯维尔德洛夫广场上布置了携带机枪的山民，连续数小时警卫在那里，以恐吓那些顽固的工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传单说，11月7日那一天，"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走上了街头；大部分工人于十月革命十周年这一天拒绝去欢迎布哈林、李可夫和斯大林；去欢迎的工人对领袖们报以沉默。从主席台上的扩音喇叭传来了咒骂声：'瞧，这些混蛋，怎么一声不吭！'"

（同上，第557页）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1927年12月2—12日），党内形势就是如此。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概念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实际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最后一次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其后的所有的党代表大会，只虚有其名而已，实际上是精心组织的全苏会议，参加者都是经过上千次审查的党内权势分子和经过政治警察上千次过滤过的驯服的捧场者。他们的任务是装扮成“群众”和“人民”。正如托洛茨基所做的公正评价那样，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斯大林派别的全苏会议”（同上，第543页）。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八百九十八人和拥有发言权的代表七百七十一人，他们共代表着八十八万七千二百二十三名正式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候补党员。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员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这一方面是由于往党内有组织地招募了一大批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别忘了，联共（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一方面，因有一大批文化水平很高的新的苏维埃官僚和向上爬的人涌进了党内。早在1920年，列宁就对这些人发表过很不客气的意见：“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只有把这班人枪毙才对。”（《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29页）①

可是，斯大林是在“为纪念列宁逝世”的口号下把这些钻营之徒吸收到党内来的。而那些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却被关进了监狱。因此，人们说，在第十五次代表会上“为纪念列宁逝世吸收一些人入党，又按斯大林的意旨把一些人开除出党”。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页。——译者注

代表大会听取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斯大林、科西奥尔）、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奥尔忠尼启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库尔斯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布哈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李可夫）、关于农村工作（莫洛托夫）、关于反对派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

从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代表大会形式上是在党的三位新领袖——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旗帜下举行的，但实际上代表大会是斯大林一人主持和导演的。对三位领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报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只有斯大林得到的是“由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转为欢呼”。

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记录中看到，工人、农民、军队代表团团长的大量贺词的结尾处总是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万岁”，从未见到过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的许多贺词只高呼“斯大林总书记万岁！”。但是斯大林本人却不突出自己（他与赫鲁晓夫不同，后者不允许任何人讲话；他与勃列日涅夫也不同，后者任何时候都要人们称他“总书记”，可是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自己从不这样称呼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善于保持分寸，巧妙地给自己的同盟者和学生分配了角色。他不象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喜欢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或闭幕词。不仅如此，他从不主持会议，他总是把这些事让给别人去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也是这样。李可夫致了简短的开幕词，除斯大林外，主席团的其他委员都分别主持了会议，闭幕词仍是李可夫做的。斯大林的惹人注目的“谦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对讨论和惩治反对派问题

做了总结。斯大林又一次概括了主要分歧，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

1、反对派否定一国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2、反对派说什么在苏联发生了热月政变；

3、反对派反对工人阶级与中农结成联盟；

4、反对派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5、反对派反对列宁为殖民地国家革命所制定的灵活策略，它允许“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甚至同盟，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

6、反对派反对列宁的同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灵活策略，以便从内部，不经过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7、反对派在党的机关问题上，完全背离列宁主义，建立了“第二党”和新国际。

关于以后如何对待反对派，它的成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留在党内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应当完全和彻底地解除武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82—90页）

在会上发言的所有中央委员和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都拥护斯大林的建议——向反对派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投降。只有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书记加洛什金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把反对派留在党内的任何条件。他说：“我们需要采取更坚定的路线，我们需要使党不再听反对派的废话……需要在党内建立严格制度，在苏维埃工作中建立严格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严格制度……我们不接受反对派的任何条件，我们也不向他们提出任何条件……和他们断绝关系！”（同上，第194—196页）

原属于反对派的克鲁普斯卡娅做了一个极为温和的发言。谈到反对派时，她说不打算谈他们的“重大错误”，因为别人说的

已经够多了。必须承认，她对反对派为什么遭到失败的原因分析是正确的："反对派丧失了嗅觉，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在想什么。"（同上，第196页）的确如此，反对派不仅早已丧失了嗅觉，而且不理解斯大林建立的党警察机构的新现实。至于工人阶级，他们对十月革命深感失望，可是托洛茨基现在却想以极左形式搞第二次十月革命。这种失望情绪，就是反对派想和工人阶级建立精神联系并寻求支持的各种尝试遭到失败的原因。不仅如此，反对派还把工人阶级当做盲目崇拜的对象，把它变成了偶象和他们与斯大林分子夺权斗争中的法官。如果他们象喀琅施塔得分子那样号召废除一切形式的，特别是共产主义专政，那末工人阶级和人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反对派的主张的实质是："用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专政取代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专政"。可是俄国无产阶级陛下认为，的确，"洋姜不比萝卜甜"！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反对派丧失了嗅觉，失掉了同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联系，才是正确的。

在讨论斯大林的报告时，穆拉洛夫、叶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巴卡也夫和加米涅夫代表反对派发了言。

在谈论反对派的处境特别是他们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之前，需要再次回忆一下党章和历史教训。斯大林、斯大林分子和他的同盟者（布哈林分子）禁止对中央委员会提出批评，扼杀了发表意见的一切自由并经常引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但是，斯大林分子故意忽视一个基本事实：谁是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这一列宁决定的最高法官和真正诠释者。只有最高机关——政治局才是。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由下列五人组成：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顺序是按每人在中央全会上得的票数排列的）。

这五人中，列宁逝世了，死前留下了关于撤销斯大林职务的“遗嘱”。其余四人组成两派：一派有三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另一派只有斯大林一人。不言而喻，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真正诠释者应是列宁政治局的多数人，而不是斯大林。因此，反对派亲眼看到并为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从列宁生病之日起，斯大林就有计划地在中央委员会内外培植本派的党机关权势分子。至1927年，斯大林派在“党”的名义下培植了巨大力量，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列宁政治局的原列宁大多数，而且可以把中央委员会中的原列宁大多数宣布为反党派别。列宁本人曾认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是国内局势（喀琅施塔得）和党内情况（“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反对派）的产物。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说，他相信无需使用这项决议；至于其中关于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的条款，他认为根本不要公布（斯大林公布了这一条款）。列宁似乎预见到党的镇压机关可能滥用这一决议，所以他在该决议中写上了下述一段话：“对于那些引起党员特别关注的问题——关于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的问题，关于与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关于发展民主主义问题……对公务上的建议应给予极大的关注……要以各种手段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主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1册第529页）（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列宁不但没有废除，而且有意保留1920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继续有效。这个决议是列宁本人亲自定稿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其中写道：“对党内决定的某一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决不允许给予任何迫害。”（同上，第509页）这位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还认为，当代表大会未做出决议以前，各种思想、意见、集团之间“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列宁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和气氛曾做过这样的描写：“他向我诉苦

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呈现出来。各种集团都暴露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列宁全集》1968年俄文第五版第8卷第333页，或者见《关于列宁的回忆录》第1卷第280页。）

列宁怎样对待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捣乱行为呢？苏联的列宁传记作者写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发言几次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扎查苏利奇打断，他表示抗议，并要求秘书在记录中写上他被打断几次。”（《列宁传》俄文版第1卷1970年）

此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即在1922年8月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由列宁校订的党章中写道：“未做出决议之前，在党内对党的生活中各种**争论问题**可展开自由讨论。”（黑体是作者标示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1册第662页）[①] 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对各种争论问题可展开自由讨论”，因此，反对派无论按法律（党章），还是按传统（“按先例”）都有权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前夕就被开除出党了，而所有其他反对派分子是在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的，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想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对中央的政策“完全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叶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巴卡也夫、穆拉洛夫和加米涅夫的发言。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27页。——译者注

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受的阻挠，鲜明地证明了斯大林党的党风野蛮和政治上的颓废；证明了这个党已蜕化为刑事犯罪的党。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通过公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记录的办法给自己树立一座“非人手制造的”文字纪念碑，这是为毁灭独一无二的艺术的暴徒所树立的纪念碑。首先，会议主席对反对派发言玩弄了一个最廉价的蛊惑性把戏——每个走出会场或者还没有到会的反对派分子，几乎都被主席呼叫名字，要他走上讲台来。会议主席又一次询问某某人来了没有，会场内几乎齐声回答说：“他跑到托洛茨基那里领受指示去了！”会议主席对加米涅夫这样搞了两次，对其他人也未放过。

如上所述，列宁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自由发表意见，并对打断别人发言的插话感到愤慨。如果他出席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说些什么呢？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有五人发言，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从主席台和听众席中传出各种叫喊声、辱骂声，有时干脆是疯狂的嚎叫（这都记入记录）。在速记记录中记下的叫喊声比发言人的发言还要长：穆拉洛夫的发言记录两页半，被打断四十八次；巴卡也夫的发言记录四页，被打断六十四次；叶甫多基莫夫的发言记录三页，被打断七十六次；按发言记录的长短而论，加米涅夫被打断的次数较少，共五十六次（发言记录六页），拉柯夫斯基被打断一百零六次（发言记录八页）。

叫喊时所使用的“激烈言辞”包括了所有侮辱性词句，从近乎文学比喻，如“小蛆虫”、“好偷东西的猫”、“固执的驴子”，到指责他们叛国：“投敌分子”、“叛徒”、“反革命”。这些辱骂充斥对人身的攻击：“你胡说！”、“你撒谎！”、“你骗人！”、“爬上台来！”、“滚下台来！”。一次在巴卡也夫发言时，会场发出的咒骂声震耳欲聋，这时连一直和听众一起侮辱发言人的会议主席也不得不做如下的声明：“反对派散布挑拨性

谎言，代表们有意地要压过他们，不让党听到他们的声音（**听众喊道：“他们撒谎成性！”**）（《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374页）。

下面简短地介绍一下反对派的发言（我们删去了所有的插话）：

巴卡也夫：“……在斯大林的报告中毫未暗示要“对富农展开强攻”（而布哈林曾宣布过这种强攻）……布哈林是不是不看教历乱敲钟呢……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调整党的社会成分问题做了指示，要求‘在一年内，产业工人应占党员半数以上’……斯大林路线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可是在总结中产业工人的比例显著下降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产业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二，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据莫洛托夫的报告说，产业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一……我们应当说，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党应当只接受工人，只接受雇农，只接受贫农。”（同上，第374—377页）

米宁（原反对派分子，现拥护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搞的运动把许多人，甚至把工人推到反对派一边去了……加里宁同志如下的话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你有什么必要为了中央委员会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呢？……二者必择其一：或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做出实行民主的决定，或是象在列宁格勒搞运动那样把多数人反对的决议说成是‘绝大多数人’赞同的决议。当人们这样实行民主时，许多工人便会问：‘发生了什么事？’”（同上，第235—236页）

叶甫多基莫夫：“有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硬说什么工人要求把我们开除出党。这不符合事实。工人中很少有人会说党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当然，工人希望在党内既允许多数派发言，也允许少数派发言。工人想听

一听双方的观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有这种愿望……工人希望维护统一，他们也不希望多数派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而阻挠少数派服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上，第259—262页）

加米涅夫：“同志们，我登上讲台发言只抱有一个目的——寻求反对派与党和解的途径……党内斗争已发展到在我们面前提出两条道路必择其一的尖锐地步。其中一条道路是建立第二党……但是，我们的全部观点，列宁的全部学说使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只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就是在为维护自己的观点做了激烈顽强和尖锐斗争之后，完全和彻底地服从党。我们选择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有在我们党内而且只有通过我们党才能取得胜利……选择这条道路，对我们来说，就是服从代表大会的全部决定，而不管这些决定对我们是多么难以接受。但是，如果除了无条件地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停止一切派别斗争和解散派别组织……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我们放弃观点，那末这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了。在我们党内从未有过要求放弃个人观点的做法。如果我们说我们将放弃在一、二周前为之辩护过的观点，那就是口是心非，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当然，我所指的观点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那些被夸大了的强加于我们的观点。”（同上，第279—281）

加米涅夫举出了一些外交（对英俄委员会、对国民党的赌注遭到失败）和内政（富农力量增强，商品匮乏，出口停滞，工业落后于国家的一般发展进程）方面的事例，以证明反对派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有人甚至要求反对派放弃这些被生活证实是正确的观点。加米涅夫用下述声明结束了发言：

“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已被生活证实是正确的。党在许多场合也不同程度地采纳了这些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观点，是无法接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同道

者已公开地为我们的政纲做辩护……他们不愧为勇敢的革命者，他们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顾自己的处境……他们准备为维护他们认为正确的观点而不惜牺牲一切。你们为什么要否定这些观点呢？这些观点是否定不了的！姆拉契柯夫斯基等人已被投入监狱，而我们还处在自由状态，这种处境是无法忍受的。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同上，第280—285页）

穆拉洛夫：“……由于两年没有举行代表大会而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中央委员会实行了错误政策……情况很不正常……两年来进行了片面的讨论，做了片面的说明……对不同意中央政策的人采取了我们党内从未有过的作法。如果反对派中有人说需要给工人增加工资，就有人大喊大叫说这是蛊惑人心……如果说富农力量增强了，雇农无人过问，就有人大喊大叫说这是蛊惑人心……当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搞工业化，而为此需要投更多资金去发展工业时，有人就把我们叫做超工业化分子，并向农民宣布说我们要剥夺农民……当我们说需要对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雇农免除税款时，有人就说我们是蛊惑人心……总之，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都被认为是蛊惑人心的手法，是诽谤。事情竟发展到对一些忠诚的老党员、革命者进行骇人听闻的镇压的地步，斥责他们是张伯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的走狗……同志们，如果有人向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说，你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吃掉了自己的祖父，砍掉了祖母的头，你会感到怎样呢？你将怎样证明你没有干过这种事呢？”（同上，第340—342页）

由于反对派的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委员会立即把它的重炮投入了战斗——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各州委书记开始发言了。李可夫的下述话完全可以把所有发言者的意思表述出来：“加米涅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最后说，他不能和那些现在坐牢的反对派分开。我应当在开始发言时说，

我不能和那些把反对派的拥护者投入监狱的革命者分开……我不能保证在近期内被投入监狱的人不会增多。”（同上，第285—291页）

在结束语中，斯大林重复了他要求反对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投降的最后通牒。他本来没有批驳反对派的指责，但是，拉柯夫斯基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刺痛了他，担心在党内引起共鸣。斯大林说：“关于叶甫多基莫夫和穆拉洛夫同志的发言，我不想谈及实质问题……只想说一句：愿上帝宽恕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胡说些什么。”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加米涅夫的发言在所有反对派分子的发言中是‘最伪善、最富有欺骗性、最能迷惑人和最虚伪的’”。（同上，第411—413页）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加米涅夫提议和解，这是斯大林所反对的；第二，加米涅夫提醒说，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任何时候也不反对共产党员有权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保留自己的观点并有权在党内维护这些观点。斯大林不无根据地提到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李可夫在发言中也提到这一决议)，因为这些决议禁止共产党员持有不同于党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斯大林坦率地说：“反对派自己解除武装，这很好；他们不想自己解除武装，那末我们去解除。”（同上，第419页）

12月18日，代表大会“解除了”反对派的武装。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时还把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叶甫多基莫夫、穆拉洛夫、巴卡也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拉法伊尔、索斯诺夫斯基、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查鲁茨基、瓦加年、瓦尔丁、拉舍维奇、艾什巴、里里娜（季诺维也夫之妻）等七十五名反对派的积极活动家（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代表大会还把萨普龙诺夫集团的二十三人开除出党。在决议中写道：“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

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是不能相容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2卷第1468页）

12月19日，在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反对派的决定之后的第二天，代表大会收到一项声明：

“……代表大会认为12月10日关于放弃宣传我们的观点的声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接受代表大会要我们**既在思想上也在组织上解除武装**的要求。我们愿承担责任，维护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和决定……。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巴卡也夫、库克林、拉舍维奇、阿甫杰也夫、索洛维也夫、盖森、彼卡利—奥尔洛夫、费多罗夫、里里娜、查鲁茨基、哈利东诺夫、巴巴汉、沙罗夫、拉维奇·奥立加、卢基雅诺夫、叶里柯维契、莱因果尔德、别列斯、富尔吉切夫、米尼切夫。”

代表大会听取了奥尔忠尼启则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后做出决定：

1、鉴于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反对派的问题，代表大会对已被开除出党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声明不予审理；

2、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只能个别地接受已被开除出党的、原反对派积极活动家的声明，并且只在呈递声明六个月后予以审理。（同上，第1418页）

姆拉契柯夫斯基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季诺维也夫退却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还刁难他，给他规定了考验的条件。联盟中的季诺维也夫投降分子在他们的莫斯科附近的别墅里接受了考验，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洛茨基分子情愿去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和哈萨克沙漠，也不去投降分子的别墅。

斯大林为夺取权力而进行的四年斗争，最终获得了全胜。最初，他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倾反对派”（1923—1924年），

后来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5—1926年），现在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作斗争。但这种胜利，不是思想的胜利，而是斯大林从列宁手中继承下来的庞大的党机构的胜利。在斗争过程中，斯大林把它改组、更新，使之日臻完善，达到极端精密的程度。

在这一斗争中，斯大林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技艺；而他的敌人却表现出缺智少谋。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公正地指出，在这一斗争中，他不是棋逢对手。他说：“反对派分子觊觎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试问，他们有什么基础呢？难道他们已实际表明他们善于领导……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领导自己的集团已达两年之久，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反对派首领们把自己的集团引向了彻底崩溃，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谁能把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委托给在领导小集团中遭到破产的人，难道还不清楚吗？”（同上，第1卷第412页）

在这里如果回忆一下米哈·契哈卡亚所讲的话会是十分有趣的。他于1898年入党，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侨居国外时，是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他同列宁一道回国。但他不大喜欢斯大林，认为斯大林的政治品质不好，但他特别宠爱布哈林。契哈卡亚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谈到反对派时，只字不提斯大林的报告，甚至也不曾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但对布哈林的报告却说，“他精辟地阐述了从思想战线和我们当前策略开始的全部问题……我想在这个报告的光辉照耀下再谈一谈正在被消除的近于病态的现象……”接着契哈卡亚对反对派首领们做了评价。他说：“毫无疑问，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雨年代，托洛茨基总是自主或不自主地服从于党，但从来谁也未认为他能够成为舵手。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委……谁也不曾认为他能成为领袖，因为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催促他离开孟什维克向左靠拢，只是到了

七月事变时，列宁才把他引进我们的党。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对托洛茨基是有一定看法的。我们想使一切人和物为革命服务。至于联盟的另一些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结局，是可悲的。他们毕竟是同布尔什维克有着不解之缘……我知道他们早期在政治上成长的情况。我不想言过其实，但他们确如伊里奇常说的那样，是两匹出色的'骏马'（听众喊："说的对！"）。但是，经十月革命的考验表明，不能指望他们成为领袖。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在侨居国外期间，愿意听季诺维也夫报告的人连五十人也没有。伟大的1917年革命使他崭露头角，特别因为他在集会上经常说'我的尊敬导师、我的朋友列宁'，而使自己出了名……谈到加米涅夫，可以说，我对他的政治历史，他在政治上的成长过程是了如指掌的。1903—1905年，他曾在我领导下搞地下工作。后来，我把他送给了伟大的列宁，继续对他栽培。我们毫不怀疑，加米涅夫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人员，但他不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领袖。"（同上，第2卷第705—708页）

斯大林是一位罕见的设计历史的战略家，是一个善于利用别人的旗帜和假他人之手组织胜利的非凡的策略家。只有党内的伪君子或不可救药的蠢人才把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描绘成是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斗争。斯大林声称列宁是他的导师，把列宁的遗体涂上了防腐剂（不顾托洛茨基反对），这样做并非出自对某种圣物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想要拜倒在布尔什维克法老的木乃伊面前，而是为了让人们向列宁做祈祷时也同时向斯大林做祈祷。列宁去世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在全党、全国无人不晓，而斯大林的名字，只有党的上层人士才知道。斯大林决心要超越这些受群众爱戴的对手，声称自己是列宁的遗嘱执行者，宣布列宁主义是无可争议的党的信条。不仅如此，他还声称自己是唯一有权判定"什么是列宁主义"的人。因此，他把

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发言、书信都宣布为《列宁主义问题》。

这一打算完全实现了。在迄今党的教科书中都把斯大林的敌人称做“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实，斯大林并不虔诚信仰神圣的“列宁主义”；反对派虽无休止地努力表白自己忠于列宁主义，但最终由于他们盲目信仰陈腐的规范和虚伪的圣物而灭亡了。在斯大林手中，列宁主义不过是他为所欲为的工具而已。但是，他对列宁主义的一项原则，即党机关对党和国家实行全面专政的学说，始终是信守不渝的。他发展了列宁主义，给它补充了新的成分：刑事罪行。这就预先决定了他必然获得胜利，给他打开了通往个人独裁的道路。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自己承认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的罪恶的一章。

代表大会在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后宣告闭幕。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委员七十一人，候补委员五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九人。这些人不是“列宁近卫军”，是布尔什维主义“第二次号召”的代表、“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新当选的各州委、边区党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书记。但有趣的是，他们这些一度积极帮助斯大林粉碎以反对派为代表的“列宁近卫军”的人，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根据核实过的材料，他们的命运是这样：

七十一名中央委员中，五十八人被处决；五十名候补委员中，四十八人被处决。中央委员中十三人保全了性命，他们是：斯大林、安得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克尔日查诺夫斯基、马努里斯基、米高扬、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斯基、什维尔尼克、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大清洗之前去

世）。五十名候补委员中只有二人保全了性命：日丹诺夫和尼古拉耶娃。

一百九十五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只有五人保全了性命，他们是：捷姆利亚契卡、马哈拉泽、乌里扬诺娃、雅罗斯拉夫斯基、米里查柯夫（后者在集中营里关了十七年）。一百九十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非全遭处决，其中有被处决的，有被流放的，有自然死亡的——无法查核，他们多半是在党内不知名的人，斯大林把他们抬了出来是为了给党装饰一个“无产阶级”的门面。

中央检查委员会九名委员中，七人被处决，二人保全了性命（弗拉吉米尔斯基、利亚多夫）。

在关于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经济问题的决议中，实际上已决定废除新经济政策并宣布了**农业集体化**方针。决议的有关段落写道：“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对日益大量增长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应当而且可能采取进一步坚决从经济上排挤的政策……进一步排挤城市的私人资本”，而在农村，“用进一步使农民合作化的办法使分散的农民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生产的轨道，这应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同上，第2卷第1432页）

在关于农村的专门决议中说的更为明确：“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这一任务要在“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的基础上完成。（同上，第1456、1459页）

可见，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左倾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开始实行他的旨在消灭新经济政策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倾”反对派。

第二十八章

“右倾”反对派是怎样形成的

“左倾”反对派和“新”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主要指责之一，是说斯大林纵容富农，没有向农民征收足够的税，没有建立起反对新经济政策自发势力的坚固壁垒。托洛茨基分子的一项声明（“十五人声明”）说：“自斯大林集团实际上决定党中央机关政策以来的两年，完全证实这个集团的政策在下述两个事实面前是束手无策的：

一、企图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的力量迅速增长；

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在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分子日益增长的力量的斗争中的地位正在削弱。（《党和反对派文件汇编》，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只供党员阅读。192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3页）

在“工人集团”的“呼吁书”（1923年）中说的更为明确：“我们的农民成了政治上唯一朝气蓬勃的力量……使全部政权机关、党、工会和苏维埃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同上，第63页）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农民问题的政治声明与上述说法极其类似。托洛茨基在1926年7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说：“我们面临倾向于富农的危险。”

加米涅夫在这次全会上还说：“农民淹没了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确属事实。”

一年之后，即1927年6月，季诺维也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

席团会议上更为尖锐地提出："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已绝对地和相对地发展起来，确属事实。资本主义在城市不是相对地发展起来，而是绝对地发展起来。"（同上，第52—57页）

根据以上各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要求向资本主义和富农展开进攻。

斯大林在两年之后表明，他向农民、向新经济政策展开的进攻计划超过了最"左倾"反对派分子的最"左"幻想。

斯大林悄悄地着手执行一个庞大计划——在"全盘集体化"的名义下对农民的土地、农民的财产和农民的劳动实行国有化。当年连列宁都没有敢于推行这种计划，至于托洛茨基也未必敢这样做。

斯大林的计划是史无前例的、规模巨大的和极其大胆的政治纲领。它要求从上到下同时进行两个紧密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在城市进行工业革命（1925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农村进行反对农民的集体化革命（1927年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恐怕斯大林也想象不出来，但两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极其明确的。在经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变农业国俄国为工业国俄国，变私有经济农村为全盘集体化农村，这就是两种革命的任务。在实现这些任务的全部过程中，将废除新经济政策这项经济政策，将用"展开阶级斗争"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商和小业主）和富农。

究竟有多少人要成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可以从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新经济政策高潮时期的数字中计算出来。在1923—1924年间，在苏联国内贸易中，私人资本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五，而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资本的比重甚至超过国营部门和合作社部门的总和，为百分之五十七。（《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18—319页）据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村

料，富农约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八至十二。（同上）如果取其平均数百分之十，那末把这个百分比改为用绝对数字表示，即在二千五百万农户中有二百五十万农户被作为富农消灭或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

有人问斯大林为什么反对反对派。一两年前，反对派提出的要求和他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形式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罢了。斯大林对此回答说：

“在1926—1927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拼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向富农进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能把它和反富农的高调混为一谈。也决不能把它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拼命强迫党采取的同富农扭打的政策混为一谈。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击破富农并消灭富农阶级……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291页）①

在这个纯“辩证法式的”回答中含有许多真理——在着手执行工业化的庞大经济计划（在十至十五年内完成西方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内做的事），以及果敢地执行史无前例的对人们实行强制集体化之前，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加强和扩大军事惩罚机关（军队、民警、民警部队、法院、检察院），使之全部处于动员状态；第二，彻底清洗党和国家各级机关中反对执行新计划的形形色色的不可靠分子。局外人认为，这个史无前例的计划不是空想就是冒险主义，根本不是建立在国家力所能及的，正常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的。斯大林的计划不是根据可能性，而是根据

① 见《列宁主义问题》第357页。——译者注

党专政的必要性制定的。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让经济自由发展，不久便去世了。斯大林认为，如果不是要“由自由王国飞跃到必然王国”（把恩格斯的话颠倒过来了），那末列宁的制度也该随同它的创始人一起进入坟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在国内才是永存的。但是，始终还存在着外来的危险，只有用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自给自足的办法才可以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小程度。不仅如此，只有工业高度发达的苏联才能不仅奉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而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基地。

为实现这个计划，斯大林不仅需要镇压老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而且要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由一些不会判断只会执行的人组成的司令部。虽然斯大林本人曾说过，列宁逝世后，党内已不能实行个人领导，可是斯大林的学生们对老师的话早已心领神会——这种个人领导只有通过斯大林才能实现。

与期望相反，如果斯大林本人真正相信在专政制度下可以实行“集体领导”，那末治理苏联的实践便会很快向他证明他说的下述一句话是正确的：“事物的逻辑比人类愿望的逻辑更为有力。”

新的经济纲领是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一次变革、一次革命，也是（这是最重要的）变农村为向工业化提供资金的主要泉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是斯大林全盘借用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正如斯大林1928年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所说的那样，是靠从农村榨取一种特殊的“贡款”而来的。布哈林把它称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取代加米涅夫新任贸易人民委员的米高扬被授予一项通过农民的谷物市场提高这种“剥削”量的任务。米高扬决心向斯大林表明，任命他担任贸易人民委员时寄予他的希望是不会落空的。

在1927年1月3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新上任的人民委员

发表了自己的初步施政纲领："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291页）

怎么会这样呢？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法令不是还没有废除吗？米高扬怎么能按个人意志操纵农村自由贸易的价格呢？在同一次讲话中，米高扬毫不掩饰地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同上）"没有人妨碍我们"，我们可以在农村为所欲为，——这是令人伤心的话，但还不是令人痛苦的真相。由于米高扬的乐观主义，城市遭遇到了1928年的严重粮食危机。

下面引用的一些比较材料可说明米高扬在他上任一年半以后把农民粮食市场搞成了什么样子。1926年7月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米高扬的前任加米涅夫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说，根据不完全统计，谷物总产量为四十七亿普特（比上一年增加四亿普特），除去农民自己的用粮，可向市场抛售九亿至十亿普特的大量粮食。但"为了将来不引起减少播种面积，需要把粮食全部收购下来"，还需要准备向世界市场"最大限度地出口"俄国粮食，所以要把粮食价格控制在能够"刺激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水平上。"（《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33年第2册第272—273页）

其实，庄稼长的特别好，农民的粮食装得满满的，市场上也呈现饱和状态，可是城市却明显地笼罩着饥馑。原因在哪里呢？米高扬开始消灭城市私人资本，但他又不能给农村提供商品，从而出现了著名的"剪刀差"，即粮食多，商品少，造成粮食价格低于商品价格。农民不愿意以低价出售粮食，把它囤积起来，使城市日益受到饥馑的威胁。怎么解决呢？米高扬向政治局保证说，他已找

到摆脱危机的最好办法。1927年2月初，米高扬在中央全会上做了题为《降低工业品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消除“剪刀差”》的报告。中央决议指出：“产品仍赶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这就造成了商品荒”，导致市场上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米高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商品价格，实行强制性的粮食价格，并在以后消灭私营商业，使农民合作化。（《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3年俄文版第2册第224—235页）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认为，新上任的人民委员只要大笔一挥就解决了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米高扬下一道命令，不给农村提供商品，农村的粮食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城市来。代表大会决议写道：“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不经过私人资本的中介而直接采购上来的……这些产品按国家机关规定的价格收购……国家依靠一定的价格政策可以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同上）

可是事情很快表明，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胜过米高扬的命令。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本人断定米高扬的强制价格政策破产了。他说：“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掌握大量的剩余粮食，在粮食市场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不愿意按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向我们出售必要数量的粮食。”

结果怎样呢？斯大林说，粮食总产量在1927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185页）②

出路何在呢？为取得农村的剩余粮食，需要做什么呢？关于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54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第213页。——译者注

新经济政策本身的命运问题，现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可看得很清楚。布哈林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正常价格往农民市场投入更多的商品，制止一切“从左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企图。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工会领袖托姆斯基，这两位政治局委员，支持布哈林的意见。

斯大林和米高扬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使用对农民“发挥作用”的“一切杠杆”，换句话说，实行强制的粮食收购体制，其实质是每户农民必须按国家严格规定的价格出售固定数量的粮食。不出售粮食的农民要被定为恶毒的投机分子，并被没收全部财产。从没收的财产中抽出四分之一，分给参加反对富农、“富农的帮凶”和“怠工者”的“阶级斗争”的贫农。斯大林认为，这种新方针是由于暂时的非常局势引起的暂时的非常措施。于是从1927年起，实行当时称做“关于粮食收购的非常措施”。如果说，为保证向城市供应粮食而不惜同农民发生争执，那末斯大林和米高扬的方针，确是一个救急的方针。

可是，这项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严重困难。农民不会自愿地按新规定出售粮食，因而必须给贸易人民委员部粮食收购机关派去契卡部队，并赋予他们搜查、没收粮食、逮捕人的无限权力。当然不是没收全部粮食，只没收所谓的“余粮”，即除去该农户口粮标准外的多余粮食。为不使这种购粮运动从表面看来是党和民警机关授权搞的“警察行动”，在去各农户购粮时总有当地的积极分子陪同。他们的组织叫做“购粮促进会”。

出售粮食的数量，也是由“购粮促进会”来决定。如果农民没有按时出售规定数量的粮食，就要受到惩罚——把出售数量增加二倍、三倍甚至五倍。如果仍不发生作用，就交付审判。因为定额不是按农户实际拥有的粮食数量而是按其社会成份（贫农、中

农、富裕农民、富农）来规定的，所以有几十万人因交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而受到审判。如果这些人的亲朋愿意为他们“筹集”，即替他们凑足粮食交给国家，那末被捕的人即使是怙恶不悛的富农也会立即获释。因为斯大林的目的不是为镇压而镇压，只是为取得粮食才实行镇压。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完全成功了——完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共收购六亿四千四百万普特粮食，而1926年加米涅夫才收购了六亿一千七百万普特。

米高扬向中央四月全会（1928年）报告他如何完成了收购计划时说，不采取“非常措施”就完不成计划，看来，今后也不能不采取这种措施。中央委员会也公开承认说，在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难免走向极端和出现“过火行为”，但这不是莫斯科而是地方当局的过错。克里姆林宫有一种尽人皆知的作法，即当计划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允许地方当局搞“过火行为”，任务完成后，就给予批评，甚至要惩办“过火分子”。这种作法虽说最早是在那些年代使用的，但后来竟成了斯大林领导中所不可缺少的了。中央四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流传下来的党内用语：“歪曲”和“过火”。这两个词意味着中央政权默许地方当局为按时完成任务所采取的行动，但在任务完成之后，它认为和这些行为划清界限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歪曲”和“过火”行为所造成的情景描绘得相当美妙。“必须绝对制止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凡是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也打击了中农的一切作法都属于这种行为，这种行为事实上已滚到余粮收集制的路上去了：没收余粮（完全不按照司法手续来运用第一百零七条）；禁止农村内部粮食买卖或一概封闭“自由”粮食市场；为“弄清”余粮而进行搜查；建立巡查队；……强行摊派农

民公债；付款由邮局转汇，其中一部分以公债券或其他证券支付；对中农施加行政压力；实行产品直接交换，如此等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76页）①（黑体是我标示的——作者注）

但是，中央委员会根本不认为今后可以用正常方法获得农产品。中央委员会声称，“粮食收购的困难”今后依然存在，因为它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与存在着富农阶级和私人市场密切相联的。因此，党如果要获得足够的、廉价的粮食，就得向富农进攻，“调节私人市场”，把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述决议正是这样说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认为，不能把今年粮食收购中所发生的困难看做是偶然的……**粮食收购中的困难在将来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党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彻底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口号以及关于调节私人市场和不断把个体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口号。**”（同上，第377页）②

因此，全会采纳政治局的建议，继续实行强制收购，但需要通过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办理（运用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并防止出现过度的“过火行为”。如果农民同意自愿交售粮食，就应从根本上废除“非常措施”。决议的有关部分写道：

“同时，联席全会认为，随着粮食收购中的困难的消除，应该取消党的措施中带有非常性质的部分。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责成政治局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今后粮食收购运动中不致再发生……中断的现象。”（同上）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27—42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29页。——译者注

历史已表明，在今后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不中断地”收购农产品。

斯大林把这种方法叫做“乌拉尔——西伯利亚”收购法（因为斯大林在1928年初在西伯利亚西部和乌拉尔地区最早使用了这种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变成了收购各种农产品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一直被保存到现在，与从前不同之处，仅在于现在全体农民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形式被“纳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因而收购本身“已自动化”——国家自动地拿走所需要的粮食，而余粮则按所谓“劳动日”分给庄员。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几乎无偿地拿走的那部分和按“劳动日”分给庄员的那部分的比例是七十比三十，即百分之七十被国家拿走，百分之三十分给庄员。百分之三十中还包括许多公共基金（种子基金，保险基金，不可动用的基金，等等）。

如上所述，斯大林一米高扬1927年在粮食收购中所采取的新的“非常”政策，恰恰成为政治局出现新分裂的直接原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声称，斯大林的新纲领旨在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复辟“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宣布他们是党内“右倾反对派”。

右倾反对派的出现，不仅是对斯大林的作法的反应，而且是斯大林蓄意挑起的。因为，如果不在中央委员会从政治上孤立右倾首领们，那末，第一，斯大林不能实现个人独裁；第二，不可能推行斯大林用暴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在同左倾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作斗争时，斯大林用布哈林关于和平变化、用和平手段变“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策略的核心，以便在布哈林的支持下埋葬左倾分子。达到这个目的后，斯大林摊牌了：为在拥有大量农民的、实行新

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建成社会主义，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第三次暴力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对象则是农民。

斯大林的这种主张毫不新奇。右倾分子指责斯大林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对农民的关系需要“特别慎重”），与这种指责相反，斯大林却证明说，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全属于策略范畴。就其实质而论，列宁认为农民是反动的、敌对的阶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持这种看法。斯大林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41页）①

列宁曾说：“我们起初是用一切方法尽力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9卷第213页。）②

在农村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的原理，斯大林早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来了。当时曾得到未来的“右倾反对派”首领们和拥护者的支持。诚然，他们还不知道斯大林在巧妙地愚弄他们。

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问题。为了不使右倾分子感到惊慌，不挑唆他们过早地出来反对，斯大林指出，集体化将“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实行。

---

① 见《共产党宣言》第3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页。——译者注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05页）① 可是，有先见之明的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上了下面一段布哈林分子当时毫未介意的话："……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将采取各种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而引导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60页）② 关于集体农庄问题，在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说，建立集体农庄以取代个体经济，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同上，第355页）③ 在另一个地方，根据斯大林的报告所作的决议更明确地说，这是"**首要任务**"。（同上，第317页）④

显然，布哈林分子认为这是斯大林为回答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而故弄玄虚，把事情故意说得"左"一些罢了，他根本不想把言语变成行动，把恫吓农民变成镇压农民。

如果他们确实这样想过，那末等待他们的就是随之而来的痛苦的失望。

斯大林不认为粮食危机和市场情况以及价格的"剪刀差"，和领导的错误有关系，而认为同现行经济体制的本质有关系。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存在农民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必然要依赖农民，依赖市场的自发势力。斯大林对沙皇专制制度崩溃的情景记忆犹新。彼得堡爆发二月革命时，人们呼的口号就是"要面包，面包，面包！"斯大林比布哈林更为清楚，布尔什维克专制制度如果自己不在农村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革命以防止城市自下而上地发生一次革命，那将要遭到同样命运，听到同样口号。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4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40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402页。——译者注

斯大林发现，苏维埃国家靠农民经济养活，是现存制度的致命弱点。他决心把这一公式颠倒过来，让农民靠国家养活。斯大林决定剥夺农民的粮食，以便用国家名义用这些粮食既养活城市，也养活农民自身。这使我们不能不回忆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宗教裁判者》一书中的论述："他们从我们手里领到粮食的时候，显然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为了给他们分发粮食而从他们手中夺走了他们用双手生产出来的粮食。他们不难看出，我们的粮食不是石头变的，但比粮食更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从我们手中领了粮食！"因为普通的苏联人在当局的官方哲学熏陶下，或许真会以为不是他们养活国家，而是国家养活他们。请看，苏联的一本杂志可以作证："每个家庭都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买什么，但国家的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国家要为大家的吃穿用操心。"（《祖国之声》杂志1966年12月第101期社论）

斯大林清楚知道，剥夺农民的粮食并"把它分给农民"的最理想方法，莫过于通过没收农民私有经济和把农民劳动国有化的办法来实现农业的全盘集体化了。"非常措施"就是要使农民相信，在集体农庄里从国家得到返销粮要比在集体农庄之外把自己的全部粮食交给国家好。斯大林决定把自己设想的"土地革命"计划付诸实行。为此目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三周之后，他带领一大批契卡人员去西伯利亚了。官方评论员几乎用抒情笔调描述了斯大林的这次旅行，尽管斯大林并不是什么"有情感的人"。评论员说，斯大林走访了边区的主要产粮区，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出席了西伯利亚边区党委和州委的常委会，参加了许多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他所采取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措施"保证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56页）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7页。——译者注

可是，与其说斯大林“出席了”党委会和“参加了”积极分子会议，不如说他“采取了行动”，进行了“猛烈的指责”。他在最初的几次讲话中就说：“我在你们边区各地走了一趟，这使我有可能相信……你们的收成很好，可以说是空前的。今年你们的余粮比哪一年都多，而粮食收购计划却没有完成。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你们说，富农不愿意拿出粮食来，他们在等待粮价提高……为什么你们不惩办他们呢？……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几乎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我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富农的住宅干净些，吃得好些……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些先生还没有被清洗掉……我建议：

“（甲）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

“（乙）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余粮由国家没收……”（《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4页）①

斯大林建议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四分之一分给贫农。按斯大林的说法，这就是“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而按常人的说法，这就是唆使农村的懒汉和穷棒子向已被宣布为“富农”的勤劳的主人展开进攻。实际上，上层中农也被包括在内了，给他们起的名字是“富裕农民”。因为在贫农中也有许多人开始斥责这种唆使农村中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反对这种军事警察的专横行为，于是善于发明创造的斯大林很快就给这部分贫农扣上了一顶帽子，称他们是“富农的帮凶”，并要他们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没收粮食，交付法庭审判，流放）。

斯大林提议在政权机关中也要进行清洗，指出：“你们很快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5页。——译者注

就会看到这些措施将产生很好的结果，你们将不仅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同上，第4页）①

斯大林最后提出了确保国家今后按规定价格获得粮食的主要办法。这个办法既明确又坚决：“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同上，第7页）②，也就是说，需要废除列宁在六年前给予农民的新经济政策。同时，斯大林提出的办法还意味着恢复“余粮征集制”（强制没收余粮）。

现在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同三个月前根据他的建议写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反对左倾反对派的决议（1927年8月9日）中的话做一番比较。斯大林的建议和全会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驳斥反对派……关于**强征余粮**、过高地征收私营商业的捐税（这会使私营商业……立即消灭）的动摇人心的荒谬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这些建议实质上就是要**废除**党在列宁领导下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57页）③

为什么仅仅在三个月以前斯大林本人还宣布反对派关于废除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是反列宁主义的，而今天斯大林又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政策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促使他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原则在哪里？既发生了重大事件，又有原则可循。

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从左边来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段时间都被清除出党，斯大林所依靠的是右倾的列宁和他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现在需要清除在争夺政权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页。——译者注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95页。——译者注

斗争中从右边来的主要对手，为此需要依靠**左倾的列宁**和他制定的方针——新经济政策不过是为准备新的进攻而做的“喘息”、“临时退却”。（见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布哈林集团提醒斯大林注意上述中央委员会决议，声称，如果斯大林不同意重申新经济政策至今完全有效，他们将向党提出申诉。因为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做好同右倾分子作战的准备，所以只好于1928年2月13日签署了以政治局名义发表的下述声明：“有人说我们好象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如此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谣言……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黑体字是我加的——作者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5页）①

在签署政治局的声明时，斯大林和过去一样欺骗了自己的党：准备继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在第二年即1929年就被废除了。

1928年，斯大林仍继续推行其“非常措施”。不出人们所料，农民以急剧缩小播种面积来对付这种措施。农业显然已由生产过剩危机变为后来在苏联接连不断发生的生产不足的危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副委员弗鲁姆金对这种不良前景老早就提出了警告，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即解除了职务。农村的播种面积并未因此而有所增加，1928年秋的粮食收购运动遭到失败，连斯大林也毫无办法从无粮区挖出粮食来。现在斯大林面临一个新问题，今后怎么办？斯大林又采取了随机应变的做法。因此，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时，说斯大林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他的一举一动都服从于“维护自己政权”的利益。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页。——译者注

从这句话足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后来夺取个人独裁的斗争阶段是和一些什么样的政治婴儿打交道的。斯大林不断改变原则，唾弃他昨天的信念，要弄阴谋诡计，造谣中伤，拨弄是非，这样做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三人帮"是一伙无原则的人，他们挽救了斯大林，免于因列宁"遗嘱"而垮台。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是一场无原则的交易，它帮助斯大林打倒了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同布哈林和李可夫结成联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政治中也是一种反常的组合，它帮助斯大林打倒了列宁的遗嘱执行人。今天，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结成联盟反对布哈林，可是后来他把这届中央委员会的百分之七十的成员连同布哈林分子一起枪决了，这个联盟使他在建立个人独裁的道路上取得了彻底的、绝对的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无原则性本身是有原则性的。如果要布哈林这个共产主义狂热信徒做出一种抉择：要么在俄罗斯建立独裁政权而不要共产主义，要么在俄罗斯建立共产主义而不要它的政权，他必然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厚颜无耻的斯大林可能会觉得做这种抉择是过于幼稚了。他不仅要选择没有共产主义的政权，而且还要证明列宁违背马克思主义规律，把国家引上了罪恶道路。按马克思主义规律，共产主义应首先在西方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然后才能在俄罗斯这样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斯大林抛弃一切荣誉和称之为原则的一切无用思想，只能证明他在同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对手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占了优势。须知，塔列兰①早已指出，如果人们过分强调某某政治家正直、有原则性，那末对他的才能就值得怀疑了。至于阴谋诡计，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政

① 塔列兰(1754—1838年)是法国一个无原则、狡猾而有远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治斗争中的，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武器。斯大林在搞阴谋诡计方面超过自己的劲敌，这正是他的长处，说明他是一个“权力大师”。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应当看做是他为反对未来的右倾分子运动揭开了序幕。斯大林十分清楚，问题不仅在于要孤立当前与他争夺政权的一伙对手，而且要进行一次如他在《简明教程》中所说的、与1917年十月革命有着同样意义的自上而下的新革命。迄今党内斗争很少触及人民的切身利益，相反，斗争是在维护这些利益的口号下进行的（维护新经济政策，提高人民的物质状况，放弃镇压）。现在到解决全国命运和占全国居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级命运的时刻了。这不仅要求斯大林在反对领导机构成员中的反对者时独出心裁地玩弄阴谋诡计，而且要把党机关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去反对人民。

斯大林从三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1、宣传机关被授予一项任务，要负责发明一种恫吓人的理论——“右倾危险”，说什么在克服了左的危险以后，右的危险已成了革命的“主要危险”；

2、党的基层机关负责在农村组织“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自发群众运动；

3、红军司令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最高法院和检察院被授权负责使一切惩罚机关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以便镇压可能发生的“富农暴动”、暗中破坏行为，并审判他们的首领（斯大林在1929年所写的“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就是为此所做的准备。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91页。）

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学说，也是为在农村开展这场革命所做的一种准备。在这个口号下，开始了一个不断清洗的时代：从党内清除“倾向分子”，

从国家机关清除“异己分子”。这种清洗后来发展到1936—1938年叶若夫旋风时期的大规模镇压。

在镇压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之后，这种新学说的斗争锋芒指向了布哈林分子。斯大林向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报告1928年中央四月全会的情况时，直截了当地提出需要批评那些脱离群众的“党的领袖们”。因为斯大林不认为自己属于这类人（是啊，不久前他不是去过西伯利亚了吗！不过这已是他最后一次“来到群众中”了）。显然，他所指的是那些劫数难逃的牺牲品——“右倾反对派”的未来首领们。斯大林的下述论断是耐人寻味的：“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群众和领袖的问题……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1—32页）①

因为在领袖中，斯大林是唯一“没有过错”的人，而且任何一个试着批评斯大林的老布尔什维克都立即从地面上消失了（斯大林的原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委员苏尔丹—加里也夫，当年就是因为批评斯大林而被处决），所以党员们，特别是党机关人员都能正确地理解这一新学说：除“总书记”外，可以批评政治局的任何一个委员。不言而喻，可以而且应当批评任何一个不尽心竭力执行党中央机关指示的地方领导人。但最为不祥的是，这个新口号的矛头不仅指向反对斯大林的官员，而且指向反对斯大林的人民。“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成了组织一支官方和非官方的庞大的“秘密工作人员”队伍的手段。依靠这支力量，开始镇压党内持不同见解的人和党外的反苏分子。因此，斯大林把这一口号同两起政治事件——所谓“沙赫特事件”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29页。——译者注

和截至1928年1月的“收购危机”联系在一起。

与此相关联，斯大林首次提出了另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高度警察式的口号：提高“革命警惕性”。鉴于他所构思的强行集体化和废除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异常艰巨，他提出吸收“几十万和数百万”人参加“秘密工作者”—“批评者”大军的问题。采用各种精神的、物质的和职务上的奖励，以对“秘密工作者”—“批评者”起推动作用。这样提出问题就鼓励了党内那些钻营之徒和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去进行“批评”（即进行告密活动）。因为升官和特权对告密者说来是和他在揭发“敌人”方面的贡献成正比例，所以告密者与其说是揭发斯大林的敌人，不如说是对人们进行造谣中伤。当这种造谣诽谤的浪潮使党内最正直的那部分人感到不满，当党内的幻想家们开始证明现在进行的批评有十分之九是对正直的人的诽谤时，斯大林对这些“压制”批评者给予了严厉的反击，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即使批评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同上，第33页）①

“即使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是诽谤，只要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就行”，——这难道不是罪犯的哲学吗？叶若夫旋风就是明证。斯大林的这一口号在那时成了数百万秘密工作者消灭数百万“人民敌人”的行动指南。

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又一次强调他在西伯利亚说过的话。他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类的大农场……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象话”。（同上，第41—42页）②

1928年5月28日，斯大林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37页。——译者注

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们谈话时，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第三次革命”计划。谈话地点和对象不是偶然选择的。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是当时著名的“布哈林学派”的最重要堡垒。列宁曾说，布哈林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和党的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在科学院的青年党员中是受到崇拜的人。布哈林虽说首先是经济学家，但他是一个全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学家，法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正因如此，“布哈林学派”的人很多。下面列举这个学派中后来被斯大林处决的一些最卓越的人士：斯泰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列普柯夫、阿斯特罗夫（《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戈利坚别尔格、克拉瓦里、卡列夫、别索诺夫、马吉亚尔、洛米纳泽、沙茨金（后边几位都是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在共产国际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员）、帕舒卡尼斯、别尔曼、瓦纳哥、皮奥特柯夫斯基、弗里梁德、鲁金，等等。这些人都是理论界的巨星，他们的著作同现代“理论家们”的著作相比，有一个勿庸置疑的优点：他们富有创造精神，敢想，敢做，同那些粗俗的费道谢也夫之流和苏斯洛夫之流毫无共同之处。原来属于布哈林学派的人还有波斯别洛夫、米丁、明茨、潘克拉托娃、米赫利斯，他们都及时转到斯大林一边，并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中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部门，我给它取个名叫“引经据典学”。“引经据典学”不仅是斯大林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科学中一个特殊的新部门，而且是一种相当高超的艺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斯大林本人的著作中引文摘句，以便为斯大林的罪行寻找论据并使之合法化。需要证明斯大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斯大林本人是“一切科学的巨擘”。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什么个人贡献，这是斯大林一人独有的权利。“引经据典学”的任务是巧妙地摘引斯大林著作中的语句，借以

从理论上论证“党的总路线”不论怎样变化都是正确的；后来，它干脆变成了转述斯大林所讲的话。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了与布哈林学派相对立的“斯大林学派”。后来，《真理报》（该报在四分之一世纪中曾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喉舌）在介绍这个学派的创作特征时写道：

“……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为例，许多著作都是斯大林语录的堆砌和对他的颂扬。人们认为，只有斯大林一人能够发展理论，提出新的、独创的观点。”（1956年3月28日《真理报》）

斯大林在同“红色教授”、“共产主义科学院士”谈话时，援引列宁的话来从理论上论证他的集体化计划。可是第一句引语就是伪造的。斯大林说：“列宁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黑体字是我加的——作者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88页）[1] 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这样一句重要讲话时，并没有象往常那样指出是援引列宁的。大家都清楚是什么原因：列宁不可能“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相反，他曾号召按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承认私人占有的权利。列宁没有号召组织集体农庄，甚至直到列宁去世前根本没有“集体农庄”这个词。只是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列宁才在革命后第一次提出了“公社”和“劳动组合”的问题，但他是怎样提的呢？列宁说：“有人硬说我们想用暴力实现社会主义，那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将从占优势的小经济的观点合理地来分配土地。同时我们偏重于公社和大规模的劳动组合。”（《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6页）[2]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6页。——译者注

在列宁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中提到过公社、劳动组合、合作社，但从来没有说过“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重要的是，与其说是向全体出席者，不如说是向全党和全国宣布斯大林提出的集体农庄就是列宁主张建立的集体农庄。

但是，援引列宁的话却不是偶然的。1918年6月，列宁确想把“十月革命”引向农村，建立过声名狼藉的“贫农委员会”。它当时做的事就是后来斯大林的“促进委员会”做的事：在国家支持下，有组织地掠夺富裕农民，征用他们的粮食、牲畜和饲料。这与其说是供国家使用，不如说是为了肥己。最初，列宁曾对在农村展开的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拍手叫好，后来弄清了情况，知道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深刻化，而是地地道道的掠夺，于是在1918年11月，以取消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的“双重政权”为借口，废除了贫农委员会，其职能移交给苏维埃行使。国内战争爆发后，列宁重又搞起了“贫农委员会”，但已与往日不同。一支名为特种任务部队的特殊警察部队取代了它。征用多余农产品，现在已由国家制度加以合法化了（“余粮征集制”）。特种任务部队协助政府搞征集工作。在不问大小对工业一律实行国有化以后，全部手工业生产被禁止，银行实行国有化，市场全遭关闭，实际上，连小农经济也实行了国有化。虽然规定实行直接“产品交换”，但因城市没有商品可以供给农村，所以流于纸上空谈。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倒把活动日益猖獗。它被视为反革命行为，遭到了残酷惩治。

总之，列宁建立了全面的“军事共产主义”。起初说，这种“共产主义”是在进行国内战争条件下所需要的，但战争胜利结束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根本不想自愿放弃“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反而认为它是农村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必要形式。今天，党的理论家们想

否认这一事实，但列宁自己承认事情正是如此。列宁在论证放弃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时说：

“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而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按照余粮征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明确地给自己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动的。不幸这是一个事实。”（《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3卷第40页）①

列宁不仅是一位灵活机敏的策略家，而且是一位清醒冷静的政治家，他很快发现，如果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那末，唐波省的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革命就可能使其制度崩溃。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列宁反对一切教条包括马克思主义教条，决心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当今的列宁追随者们竟把列宁说成是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列宁承认他的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已经失败，并从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我们是否作到了这一点呢？没有作到！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失去阶级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曾想直接用所谓正面攻击来解决这个任务，但是我们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斗中都会发生……正面攻击失败了，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3卷第46—47页）②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0页。——译者注

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围攻和对壕战”。

现在我们回到斯大林的谈话上来。斯大林解释说，由于国内存在个体小农经济，他们不向国家提供产品，因而发生了粮食危机。斯大林重又提出他向西伯利亚人提出过的问题：出路何在呢？他做了同样回答：实行集体化。党内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斯大林打算在农村搞一次新的根本性变革，其根据既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不是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家心中都一清二楚，目前发生的经济困难，恰恰是违反这些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指示的结果。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候补中央委员弗鲁姆金1928年6月15日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反映了党内的这种情绪。弗鲁姆金写道：“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农村采取的新的政治方针**加剧了**我国经济状况的恶化……应当回到党的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18—120页）①

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已正式向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阐述了他的土地革命新纲领。这个新纲领不仅背离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而且比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走得还远。斯大林在7月9日的讲话中声称：

1、垂死的阶级（农民和耐普曼）从来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因此“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

2、今后，在一定条件下，“非常措施”仍是必要的。

3、除了向农民征收一种“类似‘贡款’的超额税”，就没有高速度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农民购买工业品要向国家多付钱，而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03—105页。——译者注

出售自己的产品却没有收足金额。

4、除了变小农经济为集体农庄，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商品粮。（同上，第159、172、181页）

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同布哈林一伙的暗斗，现在首次提到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来了。布哈林在7月10日用形式温和、富有原则性的发言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四点声明。布哈林论证说，现行政策将把国民经济引向严重失调。**伏罗希洛夫**：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办法吧！**布哈林**：借用斯大林的话说，应当说对城乡“结合的威胁”现已形成，“但是列宁写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不要让这些分歧发展成为严重的阶级分歧……为改变粮食收购造成的状况，我们有无必要向富农让步或放松对它的进攻呢？绝对不能。当前的任务是消除与中农破裂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把‘非常措施’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混为一谈……”布哈林继续对斯大林分子说：试想一下，你们是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可是你们竟强迫庄稼汉加入公社。**伏罗希洛夫**：就象1918和1919年那样。**布哈林**：那样做，农民就要暴动，富农领导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起来反抗无产阶级，而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要消失。你们愿意这样吗？

斯大林：噩梦一场，愿上帝保佑（笑声）……

布哈林：无论怎么说，我们决不能再采取“非常措施”扩大再生产了。

科西奥尔：说的对。

洛佐夫斯基：但这不取决于我们。

布哈林：多半还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的政策的核心应当是：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让工农结合受到威胁。否则我们就没有执行列宁的主要遗嘱。（摘自1928年七月中央全会报告速记记

录，见布哈林的发言和托洛茨基档案。译自丹尼尔著《共产主义运动史料》英文版第306—308页。译文有删节。——作者注）

斯大林从中央全会对布哈林的发言反应中发现，布哈林根据列宁遗嘱提出的温和的农村政策在党内很有市场。因此，在布哈林发言之后，斯大林再次发言，以便削弱布哈林的发言所造成的不利于他的印象。斯大林抱怨说：“一部分同志在他们的发言中……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样重要的措施竟只字不提……怎么能把在农业方面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样重要的任务‘忘掉’呢？”（《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90页）①斯大林表示很气愤，但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参加全会的大部分人明显地支持布哈林。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接受中央全会通过的显然是反斯大林的决议。决议指出：（一）“非常措施”是临时性的，不是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产生的；（二）新经济政策继续有效，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言论是反革命的滥调；向富农进攻“绝不能使用剥夺富农的办法”，因此必须：（1）“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2）“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征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3）“……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4）“……要保证及时地把工业品运送到粮食收购区。”（《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395—396页）②

不言而喻，斯大林根本不想执行这一决议。他所以投票表示赞成，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以做好向党内的新敌人——“右倾反对派”展开进攻的准备工作。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布哈林正是这种新危险的思想家。因此，今后党机关的总任务是动员党的全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65—166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50页。——译者注

部组织和思想力量去反对"右的危险"。

早在全会之前，布哈林就和斯大林断绝了私人关系，天天都在防备他的新诡计。为寻求反对斯大林的同盟者，他去找了昨天被他和斯大林一起无情抨击过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全会期间，布哈林就曾请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给他安排一次同加米涅夫的会晤。7月11日，他们会见了。在托洛茨基的档案里保存着加米涅夫做的关于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的记录。下面是布哈林向加米涅夫谈到斯大林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觉察到，斯大林的路线会把整个革命毁灭掉。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比过去我们之间的分歧要严重许多倍。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对下述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如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取代了斯大林，那有多么好啊！'我非常坦率地同李可夫、托姆斯基谈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有好几周不同斯大林谈话了。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他不断改变自己的理论，以他想抛掉谁而定。在政治局的'七人团'中，我们同他的争吵已经到了互相指责'你胡说'、'你撒谎'的地步。现在，他表示退让了，他可能想封住我们的嘴。我们明白这一点。可是他却玩弄手段，想把我们打成分裂分子。看一看他在全会上提出的路线吧：(一)资本主义是靠掠夺殖民地、放债和剥削工人发展起来的，而我们既没有殖民地，又不能放债，所以我们必须向农民征收'贡款'。您很清楚，这恰恰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二)社会主义越发展，遇到的反抗也越多、越大……这简直是白痴的胡说。(三)因为要征收'贡款'，反抗也随之猛烈，我们需要坚强的领导。自我批评不适用于领导（政治局），当然那些不执行决定的委员不在此列。斯大林的自我批评却是以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做为靶子。

"结果我们走上了建立警察制度的道路。这还不是定论，但能

决定革命的命运。这种理论能够断送任何事业……列宁格勒人基本和我们站在一起，可是一提到解除斯大林的职务，他们就心惊胆战……

“我们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但是：(一)中间派中央委员至今还不知道分歧的深度；(二)大家非常害怕分裂。因此，斯大林如果在‘非常措施’问题上向我们让步，那末他就使我们难于向他发动进攻。我们不想做分裂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很快地把我们收拾掉。托姆斯基在他最近的发言中已明确指出斯大林是分裂分子。”（见丹尼尔著《共产主义运动史料》英文版第308—309页）

当年斯大林是否知道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呢？他似乎知道了，否则就不好理解斯大林为什么采取了迫使布哈林自我诋毁的措施。同加米涅夫谈话还不过二十天，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都不得不在斯大林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写的下述声明上签字：“在下面署名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声明，坚决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438—439页）①

布哈林及其同道者害怕被指责为搞分裂活动，因而签名承认了明显的假话，这不仅给斯大林帮了忙，而且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党和积极分子完全引入歧路，本来他们支持布哈林并把他看做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由于布哈林分子签署了声明，他们便对斯大林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镇压，对强制推广集体农庄，限制新经济政策等行为承担了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02页。——译者注

从那时起，斯大林就在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之间酝酿反对布哈林分子了。例如，斯大林曾给一个政治局委员写了内容为反对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便函："古比雪夫同志，你好！……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20页）① "老实的"斯大林就是这样唆使尚在摇摆不定的古比雪夫去反对托姆斯基的。

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上发表的题为《一个经济学者的札记》的文章中公开反对业已形成的新方针。但是，这是一篇无所指的文章。由于布哈林及其同道者已声明他们和斯大林不存在分歧，结果这篇文章不仅未被全党理解，甚至党的积极分子也不理解，只有政治局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文章对经济政策中的斯大林的唯意志论进行了尖锐的和令人信服的批评，尽管作者把批评矛头佯指托洛茨基。文章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经济计划出了错误，在现在的条件下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但"难以避免的错误毕竟也是错误"。在发展经济中，粗暴地破坏"基本比例"，由此造成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难以避免的错误"。即使一个出色的计划也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那末，一个糟糕的计划和糟糕的经济调配更会断送好事。经济领导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就在于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确比例，其后果将导致阶级关系发生令人不愉快的变化，因为破坏经济比例也就破坏了国内政治上的均势。布哈林对造成"商品匮乏"和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建议：为取得最高水平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0页。——译者注

社会再生产（摆脱了各种危机）和使社会主义获得不断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在同国内其他阶级的关系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必须使国民经济各基本部分保持协调**，“保持它们的平衡”，调整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以便能够最出色地发挥自己的长期职能，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趋向。这样，国民经济就能达到良好的平衡和均势。托洛茨基分子曾要求最大限度地从农民经济中吸取资金，以保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相反，工业要取得长期的不断发展，必须依靠农业的迅速发展。谷物经济的增长赶不上工业的迅猛增长，赶不上居民人口的迅速增长，赶不上居民需要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轻视谷物生产就是犯罪，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托洛茨基“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行抽调农村中富裕农民的农产品），将把我们引向不是假想的，而是十分现实的大灾难，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在布哈林看来，斯大林的“解决”办法就是托洛茨基的办法，说得更确切些，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解决办法或方案。布哈林继续说，那些认为计划经济的增长（作为价值规律消失的结果）可以使我们为所欲为的人，简直是不懂得经济学的起码常识……布哈林说，在我们整个经济计划中，不断发展工业应成为中心，但这决不能依靠剥夺农民来进行。经济要协调地发展，工业不仅要依靠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还要帮助农业实现机械化，这样才能为消灭城乡矛盾创造条件。

由于斯大林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反对布哈林的纲领，他便把争论转移到另一个方面，甚至转移到别处。斯大林把问题从政治局转移到州一级讨论。正如布哈林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着手粉碎布哈林分子的莫斯科基地了。

早在1928年2月中央在致各级党组织的内部信件中就提醒全党说，“右的危险”在党内日益增长，并举例说，从党内清除了

“同富农勾结”的各地农村党员。

但是，反对斯大林新方针的活动，不只是在农村出现。斯大林说：“如果往上面去看看县的和省的党组织……那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找到右倾危险分子。”（《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35页）①

外省的情况并不令人可怕，那里的党机关可以悄悄地、不需顾及什么法律，撤换那些形迹稍有可疑的党的官员，但首都的情况却令人担忧。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布哈林分子——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也是布哈林分子——中央委员乌哈诺夫。在解决政治局的布哈林及其拥护者之前，需要首先围攻和夺取布哈林分子的莫斯科堡垒。斯大林不是从中央自上而下地，而是从莫斯科各区党组织自下而上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委员会撇开莫斯科委员会直接召集各区的“积极分子”会议，撤换了一些区委书记（克拉斯诺普列斯宁斯基、罗果斯柯—西蒙诺夫斯基、哈莫夫尼切斯基等区委）。与此同时，这些“积极分子”还“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向中央呼吁，要求撤换他们的区委书记，消除莫斯科委员会的错误。”（克留契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共产党》俄文版1970年第260页）

当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十分恼火地抱怨中央委员会公然违反党章越过莫斯科委员会直接插手区委的事情时，泰然自若的斯大林于1928年10月在他召集的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回答说：“我不知道这种不满能有什么理由。莫斯科组织里各区积极分子会议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要求消除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这有什么不好呢？”（同上，第236—237页）②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04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所谓的错误和动摇表现在哪里呢？斯大林的长篇发言只字不提莫斯科委员会的“错误和动摇”表现在哪里。只有那些深知内幕的人才知道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只有一个错误：在七月全会上，他们曾支持布哈林反对斯大林。不用说，斯大林既然同布哈林展开了斗争，就决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方有布哈林分子的堡垒。斯大林建议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局召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同各区“积极分子”讨论业已出现的情况。斯大林同中央书记处全体书记以及政治局中自己的同道者出席了全会。他做了长篇发言。在镇压了“左倾”之后，他在发言中第一次公开声称现在党内出现了新的倾向——“右倾”，说“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同上，第226页）①斯大林认为，党如果不开展一场反右倾的大规模思想运动，党如果不象粉碎“左倾”那样粉碎右倾，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他援引列宁的话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同上，第227页）②因此，斯大林提出，凡不希望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人就应当起来战斗，不仅要铲除右倾，而且要挖掉国内资本主义的根子，换句话说，需要废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实行斯大林的集体化。

发言者向斯大林提出一个使他当时感到不快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有没有右倾分子？斯大林回答说：“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但“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同上，第235—236页。黑体字是我加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00页。——译者注

——作者注）①斯大林解释说，除了右倾，在党的中间环节还存在着一种同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恶性病。斯大林指责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委员会采取这种“调和态度”。事先挑选出来的各区积极分子看到这个信号后，便开始列举大量“事实”来证明乌格拉诺夫本人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发言者要求乌格拉诺夫做自我批评，“按布尔什维克方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做了同样内容的发言后，乌格拉诺夫才领悟到已决定要把他搞掉，于是他示威性地退出了莫斯科委员会全会。斯大林事先毫未预料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尴尬。斯大林的助手们向乌格拉诺夫谋求妥协：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错误，中央则同意他继续领导莫斯科委员会。乌格拉诺夫因抱有保住权力的幻想，就接受了妥协。他声明，他和季诺维也夫斗争的时候，他胜利了，因为他是正确的。现在他打败了，因为他是错误的。（同上，第289页）

布哈林及其在政治局中的拥护者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在中央全会上（1928年11月16—24日）给斯大林授予了镇压右倾分子（即他们自己）的政治委任状。根据李可夫的报告《关于1928—1929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通过的决议说：“其中突出的是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企图降低大工业的建设速度并阻止它的进展，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抱着轻视或否定的态度，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并企图抹杀这种斗争，对群众的需要采取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忽视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忽视战争的危险等等……全会确认，目前联共(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419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3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77—478页。——译者注

斯大林所以在这里东拉西扯地说什么“对群众的需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忽视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往常一样，显然是想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这项决议的序言说，决议获“一致”通过，这就是说，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中央委员、布哈林的积极拥护者多加多夫、施米特、柯托夫也投票赞成了对他们本人做的这个政治死刑判决书。

中央委员会利用这个决议和乌格拉诺夫本人关于自己是同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的供词，在中央十一月全会闭幕后第三天，即1928年11月27日，解除了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委员会全部领导人的职务。鲍曼被任命为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后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任过此职。右倾分子的第一个最重要堡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攻破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采取了“包围”这些右倾首领们的预防措施。根据中央组织局的决定，给政治局委员中的每一个右倾分子暂时派去一名“政治委员”：给政府主席李可夫派去了奥尔忠尼启则，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派去了卡冈诺维奇，给布哈林的《真理报》系统派去了沙维利耶夫，给共产国际系统派去了莫洛托夫。“政治委员”有权否决右倾分子的任何指示和行动，如果这些指示和行动与斯大林的路线背道而驰的话。

当政治局内部的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布哈林发表了他在列宁逝世五周年（1929年1月21日）所做的演说。最初这篇演说发表在《真理报》上，后来又以《列宁的政治遗嘱》这一引人入胜的书名出了单行本。布哈林对列宁逝世前写的文章做了分析，他恰恰引用了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反对斯大林的段落：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而现在**

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396—397页）①

布哈林写道，根据列宁的说法，在苏联的条件下不能也不应进行"第三次革命"。可是斯大林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

在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赶出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以及"右倾反对派"出现之前，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情况（1927年12月）如下：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

候补委员：彼得罗夫斯基、乌格拉诺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楚巴利、科西奥尔。

组织局——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科西奥尔、库别克、莫斯科文、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斯米尔诺夫、鲁希莫维奇、苏立莫夫。

候补委员：留包夫、米哈依洛夫、列普谢、恰普林、施米特。

书记处——成员：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科西奥尔、库别克。

候补成员：莫斯科文、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455页）

如上所示，斯大林在所有最高机构中都不拥有稳定的多数。在政治局的九票(只指委员)中，斯大林有三票——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布哈林也有三票——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另外三名委员——加里宁、鲁祖塔克、古比雪夫，在两个集团之间摇摆不定，在决定性时刻，有时倒向斯大林，有时倒向

---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译者注

布哈林。

在组织局内，斯大林有五票——斯大林、莫洛托夫、科西奥尔、安德烈耶夫、鲁希莫维奇；布哈林也有五票——乌格拉诺夫、多加多夫、斯米尔诺夫、苏立莫夫、库别克。另外三个人——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莫斯科文是"中立分子"。在书记处里，斯大林有相对稳定的三比二的多数票——斯大林、莫洛托夫、科西奥尔对乌格拉诺夫、库别克。

可见，在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党最高机构书记处中，斯大林是主宰者。斯大林只是把事先已由书记处决定了的问题提请政治局和组织局"事后批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篡夺了掌管组织问题的组织局的权力。党机关、经济部门、军队、工会和外事方面的高级干部的任免权，本属组织局的职权范围，现在已由中央书记处来决定。篡夺组织局的权力，归根到底，是篡夺了政治局的权力。政治局成了独揽一切大权的书记处的幌子。关于书记处的"新闻"，政治局委员往往是间接听到的。

国家机关和党政机关的人事安排，根据新党章的有关规定，已不需经过政治局。党章规定："书记处负责领导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不由书记处领导又由谁去领导呢？政治局和组织局只是定期举行会议，况且它们是由在中央机关之外的人所组成，而书记处则是中央的固定的、生动的、进行工作的机关。

如果说书记处是斯大林政权的合法机关，那末斯大林以总书记名义亲自挑选的中央机关，则是他用来加强和保持这种政权的强大武器。斯大林逐步地从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排挤掉老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重建。列宁在世时，中央书记处和它的工作机关只具有技术性的执行职能，而书记处和机关负责人只有一项任务——负责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全会的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任何一项单独决定，如果不是根据上述机构的指示做出的，

书记处，更不必说中央委员会机关都不予接受。因此，这些机关挑选或任命的干部都是十分出色的“执行者”。斯大林本人就是被作为这种“执行者”选入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不过正如后来斯大林分子所证实的那样，他不是根据列宁的建议，而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玩弄的反对列宁—托洛茨基的阴谋，进入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当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先后一个个地搞掉之后，他决定和布哈林最后摊牌了。他首先不令人注意地、十分彻底地清除了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布哈林分子。

为防止被清洗的人产生怀疑并防止布哈林提出抗议，被调离中央机关的人都分配去苏维埃或经济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提升”他们是为了把他们彻底搞掉。

这样，截至1929年初，中央委员会机关已完成改组，在中央委员会内建立了人们称为“非法的斯大林办公室”（后来，这个“斯大林办公室”在党的文献里获得了合法名称——“斯大林同志秘书处”）。1929年关于改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机关所以需要进行改组，首先是因为在改造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所担负的任务，特别是在“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方面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了的缘故。（《党的建设》1930年第2期）改组后的中央委员会机关设有下述部门：组织指导部、分配部（干部部）、文化宣传部、鼓动和群众运动部。各部部长都由忠于斯大林的中央委员担任（卡冈诺维奇、鲍曼、斯切茨基、瓦利基斯、布拉托夫）。

可是，“斯大林办公室”是由一些年轻的狂热分子组成的，他们都不是中央委员。起初，谁也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看做是斯大林的事务助手，是一些对“重大政治”没有任何奢望的、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

们负责做记录，提供有关问题的各种资料，给与会者送茶点，给首长们削铅笔。他们就象仆人一样做这类事（尽管是党的仆人），表现极其恭顺、听话，对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都很殷勤，甚至殷勤得过份。例如，他们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请问，您要叫车吗？”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您有什么吩咐？”

“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您用糕点吗？”

“是，斯大林同志（对主人）！”

斯大林的“秘密办公室”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是：托弗斯图哈、波斯克列贝舍夫、斯米亭、叶若夫、鲍曼、波斯别洛夫、麦赫利斯、马林科夫、佩杰尔斯、乌利茨基、瓦尔加、乌曼斯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式官衔。托弗斯图哈被列入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编制，职称是“中央书记助理”（这是一种纯事务性职务，与办公室主任极其类似。在地方也实行书记助理制度。）波斯克列贝舍夫是助理的助理，即给托弗斯图哈做统计和情报方面的助手。托弗斯图哈死后，波斯克列贝舍夫被任命为书记助理和特别部部长。斯米亭接替波斯克列贝舍夫做了他的“党务统计”方面的助手。叶若夫主管干部部，波斯别洛夫主管宣传部（任麦赫利斯的助手）。马林科夫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主管的特别部副部长兼政治局秘书。当叶若夫被调至农业人民委员部干部部工作后（1929年），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干部部长。

我已说过，这个非法的“斯大林办公室”后来获得官方的合法名称：“斯大林同志秘书处”（注意不要和“中央书记处”混同了！）。内外政策方面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领导机关开会讨论之前，首先都由“斯大林办公室”提出方案（实际上由它事先决定），然后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主管部门，经主管部门做些补充（这不过是把“斯大林办公室”专家们

的“事先决定”由官方加以复制而已），最后上报书记处、组织局和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这些机构在审议时出现重大分歧（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末就把问题交给常设的或定期召集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讨论。这种专门委员会多半由不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中央委员组成。无论在说明某一提案的材料，或是后来通过党的最高机关执行时（这是主要的），这些专门委员会完全服从中央委员会机关（即服从“斯大林办公室”）。当时形成了一种魔力圈，只有斯大林这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才能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对不利于他的决定进行暗中抵制。

构成“斯大林办公室”全部组织政策的理论，是他在两年后做为党的口号宣布的行之有效的原则——“干部决定一切”。当斯大林传记的未来作者们接触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文献资料时，将万分惊奇地发现一个极简单的事实：苏联的内外政策不是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治局，而是由一个事务性办公室决定的。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一些外貌谦恭，在党和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善于执行自己主人的意志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经过“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的途径上来的。这就是“干部决定一切”！

“办公室”选拔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办公室”首先是个“筛选干部的实验室”。从地方党委会的书记（后来区委书记也在内）到苏联人民委员，任何一级官员的命运或升迁，都取决于“办公室”的有关“部门”。但为了任用新人，就必须悄悄地、体面地把老人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的“特别部”就负责这类事。从外表看，这个部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个部，从前叫“机要处”，它的任务是不言自明的，它负责保管党和政府的秘密文件，不过是党的一个普通保险柜而已。当“斯大林办公室”完全建成后，中央机要处这个机构无声无息了，它在“办公室”机构中有了另一个更为神秘的名

称——“特别部”。从那时起，这个机构是保密的。直到斯大林取得彻底胜利，即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才宣布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

它负有什么职能呢？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是找不到答案的。非官方的说法是："特别部”是监视党、军队、政府上层人士的机构，当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在它的监视之内。为此，它有自己的侦察网和负责所有各级高官“专案”的专门分部。斯大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去外地休息，能经常了解和掌握莫斯科的党和国家上层人士的幕后生活。连上层人士的一般私人通信也要受到警觉的“特别部”审查，对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也不例外。这和沙皇的暗探局或梅特涅(奥地利)的作法毫无二致。因此，斯大林对自己的敌人和身边朋友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上层人士的档案中积累的“缺点”增多之后，他的命运就由“特别部”加以内定了。内定还不等于决定。正式决定需有中央的正式机关批准。经过哪一级机构，要看每个牺牲者的级别。中央委员要由书记处决定，偶而由组织局决定；不是中央委员的高官，由中央有关部门撤销其职务。如果斯大林认为事情要造成丑闻，那末他就把诋毁党内某个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的部分材料交给党的正式法庭——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那里“不可更换的法官”——施基梁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索利茨、扬索恩、奥尔忠尼启则也都是自己人。

“特别部”腾出来的位置，立即由“干部部”补上了。干部部起初由叶若夫，后来由马林科夫领导。由于这些原因，难怪人民委员们在托弗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面前总是心惊胆战，中央委员们对叶若夫和马林科夫也都毕恭毕敬、卑躬屈膝。可是他们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名册里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事务人员”。斯大林根据另一种原因又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他使用莫斯科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和马林科夫之流的双手控制中央

委员会的“技术”，也决定了党的命运。州委、边区党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书记不是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是由“干部部”任命。这个阴谋的总“设计师”为建立独裁政权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为争得“列宁的遗产”而投入“最后的战斗”时，党内的形势就是如此。

布哈林和他的同伙怎样同斯大林作斗争呢？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学院式的备忘录；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空谈自己正确。

为了“国家利益和党本身的利益”，布哈林既诉诸于理智，又诉诸于党的感情。

斯大林为夺取全部权力并在党和国家之上建立个人独裁，诉诸于党内钻营之徒的隐秘的感情，诉诸于党机关的有组织的力量。

老练的斯大林没有急于做结论。他让反对派分子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把话说完，并且他故意挑唆他们发言。他时而故意给自己的对手造成一种他软弱无力的印象……时而完全退到幕后，在背地里活动，留有余地，以便在必要时撤退。可是，党机关的活动越来越坚决，越有针对性。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乌格拉诺夫曾说：“问题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控制他的魔鬼般的机关。”只有斯大林才能使自己的对手产生这种印象。

早在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以及后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斯大林就有了灵活的策略和周密的战略——消灭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全部“列宁近卫军”，以便建立自己的斯大林党。为实现这个最终目的，已经比较轻易地越过了两个阶梯，克服了两个最重要的和有决定性的障碍，并且与其说是依靠自己的威信，不如说主要是依靠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党内的威信。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斗争中，斯大林发挥了他那作为计谋者的组织天才和最大政治暗探的非凡嗅觉。与他同时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可怜的同盟者，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伦理方面的优势，而斯大林却具有这种优势：完全不受任何道德、任何道德情感的约束。当斯大林同“左倾反对派”（托洛茨基）和“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斗争时，他在这些同盟者面前使用了最明显的伪造和故意挑唆的方法，布哈林分子们对斯大林的卓越发明才能只能赞叹不已。在布哈林分子默然同意下，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搞了最巧妙的迫害，其规模和形式是列宁对自己的政敌从未使用过的。布哈林分子对这一切竟没有表示过丝毫的抗议。据克列斯琴斯基过迟的证实，斯大林这个“长着一对黄色眼睛的坏家伙”，给自己的同盟者施用了催眠术，致使他们没有发现斯大林在党内搞的这场内部革命也是针对他们的。我谈的是党机关。党中央委员会内发生的事，我们看到了。斯大林在地方——州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机关的工作，做得更出色，更彻底。1928年以后，地方上已经没有一个按党章和声名狼藉的“党内民主”所要求的那样合法产生的党组织书记。过去经过选举产生的老书记都以各种理由被解除了职务。如前所述，他们之中有人被分配去担任行政、外事、特别是经济部门的高级职务，主要目的是把他们清除出党机关。“干部部”通过合法的中央机关——组织指导处，派嫡系斯大林分子去接任出缺的职务。如果地方党组织沉迷于党内民主和有名无实的党章而拒绝接受莫斯科推荐的书记，中央委员会就自上而下地（违反党章）任命地方书记。为防止在地方党委会上任命时出现麻烦，现在，中央委员会除指派书记外，还同时派去一位中央委员会指导员，以便向全会说明这是“列宁中央委员会的意志”。

同如此强大的“意志”是难于争辩的。如果谁反对这种作法而不同意把这个完全陌生的人强加于这级组织做书记，那末“特别部”系统就会迅速制造一起“反党集团”案件，而它通常是这样结束的：那些大吵大闹的人很快就会根据斯大林的另一附属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决定被开除出党。

在挑选和任命书记时，斯大林似乎是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英明作法行事的——不任命本地人做总督。本地人爱搞“分裂主义”，易背叛“国君”。此外，不能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得过久，要经常把他们调来调去。斯大林安排地方干部时，严格执行了这些原则。

截至1928年底，基层党机关已按斯大林的方式改组完毕。从这时起，州委书记，边区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一级的主要干部，都是经过“特别部”审查并经“斯大林办公室”的“干部部”任命的。在各地方党机关中，从州委开始也实行建立“特别部”的制度，其名称是“专门部”，由莫斯科“特别部”、“干部部”派来的人主管。在形式上，“专门部”部长受州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领导，实际上他只向“斯大林办公室”报告工作。各地的“专门部”在党委会之外另设有一个特殊的“党内情报员”网，而且在党委机关内还有一批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三至十人），由部长、指导员（一至二人）、密码译员、记录员、特殊打字员等人组成。“专门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权力，它的任务就是给中央委员会的“特别部”提供精确、详尽的情报。部长以记录员身份经常参加州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他还带着“特殊打字员”兼速记员。中央委员会就是通过这个“专门部”给州委下达指示。中央委员会的密码电文、秘密指示先发给“专门部”，然后把译出的电文送交给书记。州委书记也通过这个部向莫斯科

呈送秘密报告、答询和决定。除了通常的邮电线路和政府专线，“专门部”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系统的专用“信使”，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国内“外交信使”，负责在莫斯科和各地之间递送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这些信使比苏联政府的部长们的身分还重要，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随身带有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长签署的个人委任书，以保障不仅人身不受侵犯，而且在执行任务时，拥有要求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提供任何支援的特殊权力。1929年初，在所谓的右倾反对派发动公开进攻前夕，“斯大林办公室”党组织机关的技术状况就是这样。

在1928年上半年以前，斯大林和右倾分子的争论，就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不是对实际问题的争论。

布哈林同斯大林在政治局内关于重大实际政策问题分歧的细节，甚至中央委员也很少知道。（但是“斯大林办公室”的叶若夫、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别洛夫等人了解这些情况，并且站在斯大林一边，直接参加了争论。）

根据李可夫的坚决要求，布哈林克制自己没有把争论提到中央全会上。相反，托姆斯基却坚决主张说明情况，或者至少“三人团”集体“辞职”，借以表明他们不同意斯大林的方针。可是，斯大林抱有另一种目的——让党机关和党的积极分子做好准备在公开战斗中消灭他的对手，指责他们是新的，即“右倾反对派”。“反对派”这个称号在联共（布）的历史上总是一个求之不得的靶子，任何时候都可以动员不明真相的党员群众和了解真相的党内钻营之徒去反对他们。斯大林就是这样干的，但他是按自己的方式，按斯大林方式干的，就是说，在搞秘密活动和挑拨离间方面，他的手法非常高明，造诣极深。

第二十九章
粉碎“右倾”反对派

我们说过，截至1928年初，布哈林分子和斯大林分子在政治局内部是势均力敌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好说政治局或组织局内部存在着什么反对派，只能说有两个对党的现行政策持截然不同观点的势均力敌的集团。在党的最高机构中出现这种情况，对斯大林很不利。在这个机构中发生的斗争，是势均力敌的双方之斗争，而不是反对派与合法多数派之斗争。斯大林所需要的是“反对派”，而不是势均力敌的双方。为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和使用任何手段。斯大林行动起来了，他不仅动员了中央委员会内的秘密办公室，还通过“思想整顿”、在基层“选拔书记”，以及用他牢牢控制的中央书记处取代政治局和组织局等办法，按他本人的话说，“在各条战线展开了全面出击”。但尽管如此，斯大林对取得个人独裁的最后胜利仍然毫无信心。需要找到一支新的强大后备军，使敌人知道些厉害。这支后备军就是早已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训练有素（以备万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主席团。

无论根据党章还是按党的历来传统，它们都不能充当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之上的法官。相反，从列宁时期开始，政治局（也不是根据党章，而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不成文的法律）是全党的最高法官和立法者。虽然在书面文字上联共（布）自谦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统一”的维护者，但这只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现在，斯大林决定把上

述后备军投入战斗。可以说，这一决定是他在与右倾分子斗争中所玩弄的各种阴谋诡计中最奏效、最巧妙的一着儿。斯大林所使用的第一支后备军，当然是他自家的后备军——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写道：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统一和巩固党的队伍。因此责成中央监察委员会：

（一）协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确保党的无产阶级成分……

（二）同党内违反联共（布）党纲、党章和代表大会决定的行为作斗争；

（三）同各种反党集团、党内派别活动作坚决斗争，防止并杜绝无谓的纠纷……

（四）同非共产主义行为——发财致富、道德败坏等作斗争。

（五）同党机关的官僚主义恶习作斗争；对在党机关实际工作中阻扰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的人要追究责任。”（《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二册第223页）

党章的主要条款——第一、三、五条直接涉及到斯大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内的秘密办公室的实际活动。为对付这些条款，斯大林把自已的第一后备军——中央监察委员会投入了党内斗争。诚然起初没有动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成员。这是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九十五名委员中，近半数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人。甚至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二十一人组成）也有布哈林分子。斯大林只使用了精干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人。斯大林这样做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党章。

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

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并有发言权。后来，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富有远见的斯大林对党章的这一条做了不引人注目的、却十分重要的修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代表由各三人改为各四人，并扩大了他们的权利。这一改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斯大林分子在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名额和为此而修改原党章条款时，有意地**没有说明**（原党章有说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代表拥有"发言权"。这是第一个改动。第二个改动从形式上看虽不引人注目，但实质上是很重要的：原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休会期间的唯一最高领导机构，它有权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和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二人）实际是归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管辖的党的最高法庭。如前所述，它的近半数成员是布哈林分子。现在，斯大林使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不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并且还规定：对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决定不得上诉。

这些修改对斯大林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在后来他与布哈林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了。为说明全部情况，我想补充一点：当时党章还新增一条——"凡拒绝如实回答监察委员会所提问题的党员，应立即开除出党。"（同上，第451页）

奥尔忠尼启则是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人。现在党的这个最高的、"独立"的法庭，由下列人员组成：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索尔茨、泽姆利亚奇卡、扬索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往政治局的常任代表也是这几个人：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和索尔茨。在中央七月全会和十一月全会上（1928年）以及在与两次全会有关的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使斯大林深信，在政治局内部实际不存在"反对派"，而只有势均力敌

的斗争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他把第一支后备军投入了战斗。

斯大林借口政治局在对当前重大政策问题上没有坚定的大多数，建议中央委员会采取举行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显然受斯大林支配）联席会议的作法。

布哈林集团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对付斯大林的如此露骨的“有组织的包围”（布哈林语）呢？如果不算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招致厄运的那次谈话，那末他们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在政治局中享有同样地位，尽管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尽管受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各机构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在红军中有一定的力量，尽管有党的许多主要理论家和宣传工作者的积极支持，最后，尽管有国内基本群众——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总之，一切客观因素都支持布哈林。唉！归根到底，他只缺少一种列宁称之为“主观因素”的因素：缺少愿作出牺牲的革命者的组织。布哈林对于此行是个超级理论家；李可夫是个书呆子；托姆斯基是孤军一人。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生怕有超越党章党纪的行为，可是斯大林却当着他们的面把党章党纪践踏得荡然无存。他们生怕被指责搞派别活动，可是斯大林却当着他们的面组织了自己的派别——“党中之党”。右倾反对派不敢越过斯大林和他的机关直接向全党呼吁，可是斯大林不仅越过政治局和组织局向全党发出大量信件和指示，而且毫不犹疑地赶走了地方选出的领导人，任命了莫斯科派去的人。

斯大林没有布哈林拥有的客观因素，可是他拥有列宁所说的“主观因素”——一个由善于冒险、不择手段、渴望权力、训练有素的投机分子组成的有活动能力的组织。他们的力量表现在：为夺取权力，他们准备干的事比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个人要做的事

还要多——为取得胜利，在需要时他们敢于亵渎列宁陵墓，敢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永远革出教门。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是仅仅从书本上认识了斯大林分子。

第一次较量开始之前，党内的形势就是这样。布哈林发表著名的1929年1月30日声明，开始了第一次较量。

很遗憾，苏联从未公布过右倾反对派的这个极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据我所知，这个文件也没有流传到国外。斯大林甚至禁止联共（布）党员阅读这个文件。只有那些身居领导地位的党的积极分子才能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1929年4月16—23日）速记记录的附件中看到这个“材料”。按照斯大林分子的逻辑，这些人已经养成一种亲斯大林的能够抵制“反党邪说”的强大免疫力。不仅如此，甚至这次全会作出的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也一直保密到1933年。至1933年才公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联席全会关于右倾分子的决定。不言而喻，布哈林1月30日声明和1929年2月9日发表的“三人政纲”仍未予发表。这些决定不是全文，而且显然是后来经过“修剪”的，其中援引布哈林声明中多少有些分量的段落都被删掉了。尽管如此，这些文件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再现布哈林的声明。

布哈林1月30日声明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大林，而在领导机关中仅仅指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布哈林审慎地避开对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批评。他引用中央机关现实活动的材料，公开地指责斯大林实际上阴谋反对列宁的党。

布哈林的主要指责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斯大林的农民政策的基础是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口号“贡款”，“这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斯大林的目的在于，国家对我国基本阶级——农民进行有计划的、合法的

掠夺，在此基础上推行工业化方针。为此，斯大林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强制集体化，二是“课以重税”。

（二）斯大林与党多次提出的关于刺激农业发展和以奖励办法提高农业产量的决定背道而驰，完全采取了另一套作法：在农村实行一种新的“军事共产主义”，用极端的行政惩罚手段收购粮食（不分青红皂白地没收农民粮食，不按党的决定向农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三）在国内各项政策特别是农民政策方面，“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政治局的决定是一回事，斯大林的机关所做的是另一回事”。

（四）在党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党的组织工作中，“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党章规定了一种行为准则，可是斯大林的机关所实行的却是自己的一套准则”。这一切使“党内民主成了虚假的东西，而自上而下地任命党的书记却成了法律”。因此，“党内没有经选举产生的书记，而只有斯大林的机关任命和更换的党官僚”。用这种方法选拔书记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经过挑选的官僚们组成的斯大林派别，以便从党内炸毁列宁的党（“党中之党”或如布哈林所说的“精选出的书记”）。

（五）斯大林分子使党的官僚化过程也蔓延到国家机关。苏维埃变成了依附于党机关的机器，而且国家机关的官僚化是按照党机关官僚化的同一计划进行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列宁党的“官僚化蜕变”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按照“斯大林办公室”周密制订的计划有组织地发生的。

（六）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对那些未能用自己派别的官僚工具夺取和搞垮的党、政、工会机构，采用了一种有计划的“从组织上包围”的办法——往这些部门派去“政治委员”（卡冈诺维奇被派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奥尔忠尼启则被派往苏维埃人民

委员会；萨维里也夫和马努伊利斯基被派往《真理报》，等等）。这不是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决定的，而是“斯大林办公室”决定的，只不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履行过手续而已。

（七）斯大林分子还在共产国际系统内推行他们的官僚化和选拔官僚的组织方针。在挑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时，不是遵照列宁的原则选拔职业革命家，而是按斯大林的计划物色受其雇佣的官僚。共产国际中的忠诚的党员干部，如果有独自的见解或在工作中表现出独立自主精神，就要被开除出兄弟党。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内的工作作风，不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依靠强制政策。如果外国共产党人敢于批评斯大林机关的个人命令，他们就会被戴上“机会主义者”、“调和派”、“社会民主党人”、“蜕化变质分子”的帽子，他们不是被自己的党开除，就是被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开除（如塔尔盖麦、布兰德勒）。如果开除他们会使斯大林本人感到非常不愉快，那末就干脆把他们做为“调和派”从他们的国家召到莫斯科来（如爱维尔特、黑尔哈特）。

（八）如果这一切都是“使用斯大林机关的正常方法”取得的，那末现在斯大林的作法就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个由政治上的同道者组成的党。这种作法就是中央委员会一部分领导人和委员使用骇人听闻的挑衅、伪造、勒索、敲诈的方法去反对另一些领导人和委员，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原则。斯大林背着党和党的最高机构推行一种消灭列宁党的政策。“斯大林制度在我们党内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使党健全和恢复列宁主义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遵照列宁的遗嘱，立即解除斯大林的职务，并撤消其“办公室”。

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声明大致如此。如果读者把我对这一

声明的表述同斯大林论布哈林的文件做一对比，便可相信情况正是这样。（同上，第514—530页）

布哈林的声明是写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上一次全会是在11月举行的，下次全会原定在1月底举行，可是斯大林突然取消了全会，而把布哈林的声明提交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代表的联席会议审议。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代表（四人全是斯大林分子：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和索尔茨）审议之后，表决权和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就变得特别有利于斯大林了——即使加里宁、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仍象从前一样持“调和态度”，力量对比也是七比三。这个如意算盘确实应验了：在2月9日的会议上，七个人有组织地反对布哈林，三个调和派中的古比雪夫事先已被说服，他转而支持了七个人的意见。布哈林的信被宣布为右倾反对派三个领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行动政纲”和对斯大林与党的诽谤（斯大林第一次把自己和党等同起来）。会议决定不向中央委员会全会通报布哈林的声明，也禁止布哈林在全会上发表这一声明。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再次声明，他们要求立即解除他们所有的职务，以便保留他们在全会上控告斯大林领导的权利。李可夫拒绝了同他们一起做这样的声明。这使布哈林感到有些心灰意冷，却激怒了托姆斯基，他更加劲地攻击起斯大林来，并指责他的朋友李可夫是虎头蛇尾。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乌格拉诺夫支持了托姆斯基。

斯大林的三人团（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利用右倾反对派首领中间出现的不和，“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建议：

（一）认为布哈林对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布哈林同志诋毁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不择手段地诽谤中央委员

会，企图制订一条新路线）；

（二）责成布哈林同志在国内政策方面同弗鲁姆金同志的路线划清界限；在对外政策方面同洪别尔—德罗同志的路线划清界限；

（三）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四）责成托姆斯基同志忠诚地执行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同上，第529页）①

斯大林巧妙地没有提李可夫的名字。布哈林的"三人团"变成了"两人团"。至于乌格拉诺夫，根本未被斯大林放在眼中。事情很明显，反对派正从内部瓦解。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层组织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右倾反对派中拥有许多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李可夫在事先准备好并曾被收回过的"三名政治局委员的声明"草案上签名。

最后通牒很严厉：或是投靠斯大林，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李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签署了反对斯大林的共同指控书。斯大林称做"右倾分子政纲"的2月9日"三人"声明，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的内容没有超出1月30日声明。新声明被附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速记记录上，并归入档案。由于声明是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来的，斯大林竭力想把它搁置起来。右倾分子要求立即召开全会讨论他们的声明。斯大林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召开。

他在政治局内部的战斗中站稳了脚，现在该准备在全会上进行战斗了。为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把布哈林集团对斯大林的批评说成是对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11页。——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而不是对斯大林个人和斯大林机关的批评；需要让参加中央全会的委员们看到，布哈林对斯大林组织工作的批评和揭发都是"造谣诽谤"。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冗长的决议的内容就是如此。因为斯大林确信，不论他怎样拖延召集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哈林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次会上向中央委员们阐明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决定在作为决议附录的"致全会"的专门呼吁书中向全会说明他为什么向党和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在政治局内部存在两个敌对集团的情况。人们记得在三个月以前（在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他庄严地声明过："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现在斯大林替自己辨白说，分歧确是存在的，但是暂时的，"因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没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已经消除了的意见分歧……"，并且说："这样就使得有可能责成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全会上和全会外的发言中宣称政治局内部没有意见分歧……"（同上，第529页）①

换句话说，斯大林两次欺骗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是在七月全会上，第二次是在十一月全会（1928年）上。他封住了布哈林的嘴，而他自己却宣布"政治局内部一切正常"。

斯大林又拖了一个半月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于4月16日开幕，于23日闭幕。这就是说，十一月全会已过了五个月（我已说过，党章规定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斯大林早已拿定主意，只有一切"准备就绪"才召开全会。如读者从书中所看到的那样，准备工作不仅表现为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和报刊上公开地和集体地"批判"右倾分子，而且在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军队领导人中间秘密地个别地招募反对布哈林的分子。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12页。——译者注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还有许多人对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在形式上没有表态。他们的政治哲学很简单："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或"这不干我的事"。他们在新制度下过着舒适的生活，依靠老资本——"老布尔什维克"的息票过日子。

他们住在苏维埃的深宅大院里养尊处优，昔日的热情和理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们从革命中得到了最大冒险家所能得到的一切：以立法团委员的身份凌驾于庞大帝国之上的统治权，而其他一切都直接取决于它。为维护这种权力——有着魁伟、华丽的外表和珍贵内容的权力，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抛弃昔日的理想。总之，这些人，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一个"泥潭"。斯大林在这种"泥潭"中能游得很漂亮。

布哈林当然向往做"泥潭"的核心，可是党内寄生者的清醒的本能却暗示他，必须投靠斯大林，否则，红场离卢边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在地）近在咫尺。回忆起托洛茨基分子的下场使人感到凶多吉少。正是这个"泥潭"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救了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布哈林分子第一次详尽地批评了斯大林集团的主要对内对外政策。批评的基调是布哈林1月30日的声明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2月9日的声明。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虽然比较温和，李可夫的发言尤其如此，但批评的尖锐程度并没有减低。布哈林恰恰是在一般的批评中指责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指责刺痛了斯大林，他由衷地感到恼怒，大声喊道：

"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就是这个……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253页）①

① 见《列宁主义问题》第303—304页。——译者注

我想在这里插一段话，事情虽小，却很重要。1月30日声明对斯大林说来犹如一颗炸弹，如果它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爆炸，那末就不只是炸掉斯大林一个人的脑袋。需要采取一切措施以防止炸弹爆炸，或者至少要把爆炸推迟到自己阵地完全用混凝土加固好的时候。斯大林转而采取防御，顽强地寻找妥协的办法。这种“防御策略”在心理上赢得的优势很明显。斯大林向那些仍然把他看做是主要侵略者的人们说：“布哈林宣战了，我主张和平，因为再坏的和平也比温和的战争好。”可是斯大林的“防御策略”，按其实质是彻头彻尾的侵略。在党的“和事佬”的面纱背后掩盖着这个侵略成性的人的险恶意图。当布哈林把他的声明送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斯大林急忙成立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会”，看来，它要在斯大林亲自参加下起草一个“在政治局内部和解与休战”的条件。2月7日，委员会向“双方”——两个“三人团”（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提出了“和解”条件。从这个文件中既可以看出事件的戏剧性，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做为党的策略家所具有的手腕。不管布哈林分子是否接受和解建议，在两种情况下胜利者都将是斯大林。委员会的建议应在改变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力量对比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后来事情确是如此发生了。这个文件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斯大林把它锁在政治局的保险柜里，事隔二十年后，在1949年才首次予以公布。其主要内容如下：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

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演说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6—7页）①

布哈林集团接受这种"和解"就意味着公开向斯大林投降，承认自己对斯大林的政策和斯大林机关的批评是错误的；拒绝这种批评就意味着准备对"爱好和平的斯大林"进行侵略，况且斯大林已经建议"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并为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保证正常条件。

布哈林识破了直接打击的阴谋，而拒绝"和解"。可是他没有料到斯大林的迂回打击。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战术。他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评论布哈林分子拒绝"和解"和"调和"时大言不惭地问道：

"为什么布哈林集团的同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拒绝政治局委员会今年2月7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难道这个方案不是布哈林集团摆脱困境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吗？……

---

① 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50—251页。——译者注

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同上，第6—7页）①

斯大林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后，援引了一段列宁对一般“机会主义”所做的评定，接着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随后好似给自己的胜利进行曲配上抒情序曲一样自问自答地说：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同上，第9页）②

斯大林对一切攻击中央机关的言论，对一切涉及他本人确实搞过而非虚构的“阴谋和诬告”的攻击，以及对他这位中央书记的各种批评，表面上故作困惑不解的样子，实际上心明眼亮，表现极为镇静自若。他甚至在发言时首先声明：“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说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黑体字是我标示的——作者注。同上书，第1页）③

布哈林说斯大林是党内的成吉思汗，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小事。布哈林说斯大林是反党阴谋家，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小事。布哈林说斯大林是伪造者，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小事……斯大林

---

① 参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51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52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46页。——译者注。

不想为斯大林辩护。斯大林——这是小事。斯大林想为列宁和列宁的党辩护，而布哈林想把他引向“个人因素”的方向。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但是，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如上所述，不计个人得失，毫不考虑为个人恢复名誉，对“小事”抱蔑视和豁达的态度，但又热情地、令人信服地、逻辑上始终一贯地“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使之免受布哈林思想的腐蚀——这一切使中央委员会认为，斯大林在政治上是清白无辜的。斯大林再不需要什么了。

斯大林不仅指责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和反列宁的理论，而且提醒布哈林记住他于1918年有过“叛变行为”，说他在同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领导过反对这个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布哈林在这里说中央缺乏集体领导**……应当指出，布哈林违反忠顺于党中央的起码要求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起码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后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企图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和中央。当时他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些什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黑体字是我标示的——作者注。同上，第100—101页）①（最后一句“还不知道”很可能是后来伪造的。在斯大林演说中加上这样一句，以便证明斯大林早已“天才地”发现布哈林于1918年的“背叛行为”。）

如果斯大林确实说过“还不知道”这句话，那末这不是斯大林演说艺术的论战手段，而是不祥地预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被处决的。

---

① 见《列宁主义问题》，第319页。——译者注

斯大林不仅使布哈林从政治上完蛋了，而且决定否认布哈林是党的理论家。斯大林援引了“列宁遗嘱”中关于布哈林的一段话。列宁的这段话是：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做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同上，第69页）①

斯大林强调了最后一句话，并洋洋得意地说：“总之，布哈林是一个烦琐哲学的理论家，是一个还没有领会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这样一来，斯大林把“斯大林事件”变成了“布哈林集团事件”。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只得到少数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积极支持（乌格拉诺夫、米哈依洛夫、柯托夫、乌加罗夫、罗季特、库里柯夫、斯腾）。“泥潭”勉强支持了斯大林。和过去一样，斯大林和他的“办公室”任命的州、边区、共和国的党委书记们要求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这时，斯大林又做出了虔诚的“爱好和平者”的姿态，说：

“有些同志坚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同上，第107页）②

---

① 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9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25页。——译者注

全会决定：

“（一）撤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再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将立即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

“（二）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定和决议不在报刊上公布，只分发给各地方党组织。”（《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520—521页）①

斯大林严厉批评李可夫在领导政府工作中破坏了“委员制”，甚至指责他用布哈林路线反对党的路线，但是没有要求处分李可夫。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定李可夫在当天开幕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五年计划的主要报告。

李可夫变得更心灰意冷了，可是斯大林却信心十足起来。对布哈林集团的初步胜利，需要从组织上加以巩固，为此必须从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撤掉潜在的布哈林分子。斯大林决定搞一次“大清党”，并明确指示要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结束（当时有党员一百五十万人）。

这次代表会议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清洗工作需要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关负责进行。在关于清洗的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

“显然，即将开始的审查和清洗党的队伍的工作，会使党的成份更纯洁……要把党内的一切异己分子……和反党集团的拥护者……无情地开除出党的队伍。”（同上，第566—567页）②

代表会议于4月29日闭幕。同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全会，以便批准代表会议的决议。全会批准了决议，只做了一处修改：乌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98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9页。——译者注

格拉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处的职务，由莫斯科委员会农村部长鲍曼接替。库比亚克通过"泥潭"转向了斯大林。中央书记处的成员现在变成了清一色的斯大林分子。

布哈林在政治局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可是斯大林在处理这类事情时异常谨慎，不急于从事。斯大林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已是四月全会之后过了七个月，共产国际解除布哈林职务之后四个月的事。1929年11月，新的中央全会终于开幕，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关于农业集体化；

二、关于布哈林集团。

关于第一个问题，全会通过了加速集体化和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决议。我想指出一点，当时还没有提出"全盘集体化"和在此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决议，直至1933年才首次发表，其中写道：

"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1929年11月12日的声明后，查明下列事实：

"（一）声明人斥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说全会把他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想这样来向党力争与政治局同等的'权利'，以便做为平等的一方同党'自由地'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力争以他们为首的右倾派别集团合法化。

"（二）现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在自己的一切预言遭到可耻的破产之后，不得不承认党取得无可争辩的胜利，在自己的声明中假装宣布'取消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又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在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政纲中曾得到阐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曾加以斥责，认为'是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

"（三）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同志）

对于党没有完成工资方面和农业方面的计划进行煽动性的指责，硬说‘非常措施’使中农倒向富农方面去了，他们想借此对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发动新的攻击。

“（四）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斥责布哈林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把布哈林同志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根据上述事实，中央全会不能不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1929年11月12日的新文件是派别活动性质的文件，是与……相类似的政治破产者的派别活动手腕。

“因此，中央全会驳斥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一种敌视党的文件，并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做出如下的决定：

“（一）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二）警告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同志，如果他们企图继续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决议，党就立即给他们以适当的组织处分。”（《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11—612页）①

这个决议是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但是由莫洛托夫代表布哈林专案“委员会”宣读的。

除中央全会决议所说的以外，党的文献和反对派的文件都只字未提1929年11月12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最后一个共同声明。但是，即使粗略地分析一下全会的这项决议也可确认下述两项重要事实：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0—111页。——译者注

（一）右倾分子继续坚持1929年1月30日声明和2月9日“政纲”的观点；

（二）右倾分子要求“双方权利平等”（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

至于决议中所说的，右倾分子口头讲要“消除”某些分歧，而实际是想玩弄策略一事，斯大林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右倾分子吸取了他们与斯大林一起共同反对过“左倾分子”的经验。因为这些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根据斯大林的主张没有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首领们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机会，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个月左右（1927年12月）便把他们开除出党了。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其他人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的，因为他们的领袖已成为“人民的敌人”。现在，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又想使用这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来对付右倾分子。右倾分子不想授人以柄，他们在不放弃自己纲领观点的情况下，采取了随机应变的策略。他们所以要这样做，还因为广大基层右倾分子对于策略问题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

他们的策略未能实现。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受到书面警告，其他人受到口头警告。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显然有能力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时开除出政治局，可是他们未敢这样做，这说明他们对取得最后胜利还缺乏信心。还有一件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从未听说过的大丑闻：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不仅对全国，而且对自己的党隐瞒了右倾反对派的政纲。从他们切身利益的角度看，斯大林分子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按列宁在世或去世后联共（布）内原反对派（“左倾反对派”，“新反对派”）的作法，斯大林分子把右倾分子的政纲公诸于世，那末全国就会确信：

（一）右倾分子反对以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为代价来进行掠夺性的工业化；

（二）右倾分子反对"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以实现农奴制集体化；

（三）右倾分子反对靠牺牲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利益来参加国际冒险。

且不问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托洛茨基的纲领显然是与布哈林的纲领对立的，因此，斯大林分子情愿把它公布出来，甚至提交给党的会议展开自由讨论。托洛茨基怀念往日的革命岁月，从内心深处反对新经济政策。俄罗斯成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之后，准备继续向前迈进一步——变成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托洛茨基挺身而出。托洛茨基这样做，不仅和斯大林，而且和全国决裂了。因此，正如列宁用新经济政策粉碎了国内反革命一样，斯大林同样以新经济政策的名义埋葬了托洛茨基，把他的政纲公之于众。斯大林分子不能用同样方法来对付另一个反对派，他们在自己政纲的旗帜上写着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颇具魔力的口号——"发财致富吧！"。这就是他们不敢把布哈林的纲领公之于众的原因。现在全国报刊都大喊大叫说，布哈林分子想要在俄罗斯恢复资本家和地主的沙皇旧制度。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读到这些报道，和全国人民一样，保持了绝对"沉默"，可是如通常所说，"沉默"即意味着"赞同"。他们一声不吭，可见他们确是"复辟派"——老百姓会这样判断。他们怎会知道右倾分子被巧妙地封住了嘴呢！

如果说布哈林分子的政纲在正确、通俗地阐释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方面占了优势，那末在策略上，布哈林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相比，则略逊一筹。因为策略不仅是消极的巧妙应付，而且是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武器和在历史转变关头所采取的坚决行动。托

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坚决果敢，不畏牺牲，英勇刚毅，敢于走上街头（1927年11月7日的示威游行），可是他们的“行动”没有引起“时代的共鸣”，结果失败了。布哈林分子的行动“同时代合拍”，可是他们比斯大林还惧怕应当“唤醒”的人民。斯大林送给他们一个新绰号——“机会主义分子”，是完全正确的。唉，这个“机会主义”对斯大林本人很有好处。

从政治局清除布哈林并对其他人做了警告之后，关于今后如何对付斯大林分子的策略问题重又尖锐起来。

或完全投降，或转入积极行动，——斯大林分子不允许有别种选择。在右倾分子表示完全投降之后，斯大林才同意召开党代表大会，而且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如果说从前在中央会议上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发表自己不同意斯大林分子现行政策的观点，那末现在这种行为已不为党所容许了。不仅如此，每个党员，从中央委员到普通党员，如果不当众痛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分子，那末就算自动地加入了“人民敌人”的新范畴，即“调和分子”的行列里。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甚至向党员剥夺了右倾分子首领们享有过的“保持沉默”的权利。一百五十万党员应当大声谴责他们从未见过的右倾分子的“政纲”，这就和当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只根据希洛涅的证言而批评托洛茨基的情景一模一样。

事情并没有完结。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真理报》和《消息报》还发表党的指示，要求“查明并揭发”各处的“**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事情还不止于此。党的公开和秘密指示还要求“无情地查明并揭发”那些口头上同意并在形式上执行党的方针，但内心仍是“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对他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截至1929年

底，党内一直笼罩着这种气氛。

在这种气氛下确定能够保证胜利的策略，特别是确定能够展开积极行动的策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斯大林分子一方面巧妙地施展策略，另方面从精神上和政治上进行迫害，从而成功地在右倾分子首领中间制造了首次公开分裂。中央委员米哈依洛夫、柯托夫、乌格拉诺夫和库里柯夫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与右倾分子决裂”的声明。斯大林这位政治“资本家”很善于利用这些“资本”：

在1929年11月18日的《真理报》（第268号）上，这四位颇有名气的中央委员发表了完全向斯大林投降的声明，并坚决谴责他们从前同布哈林共有的纲领。

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加罗夫向全会表明，他们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只有布哈林一个人向斯大林挑战，声称他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说如果不让全党知道他的观点，决不罢休。可是，李可夫却同斯大林站在一起谴责布哈林的这种行为。李可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托姆斯基认为，今后需要继续采取“待机而动”的策略。看来不是斯大林，而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说服了布哈林，要他在11月25日向政治局提交声明，表示服从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多数人的决定。

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斯大林分子于1929年底开始大量出版反布哈林的书籍，实际上他们早从1928年的中期就秘密地进行了准备。书稿早已写好，存放在“斯大林办公室”，只等从组织上粉碎布哈林的时刻到来。现在，布哈林从政治上“已被揭露”，从组织上也已被粉碎，但在理论上还没有在党内把他搞臭。需要使用新出版的“一批红色教授的著作”包括原布哈林学生的著作，彻底消除布哈林作为“党的理论家和为大家所喜欢的人”的全部声望。这类书有：《反对右倾危险和调和主义》（莫斯科—

列宁格勒,1929年)；索林：《论布哈林与列宁的分歧——青年共产党员教程》（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被歪曲了的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论》）（《列宁文集》第11卷，1929年），等等。诚然，斯大林分子出版曾被篡改了的列宁著作没有能达到任何目的。从列宁对布哈林一书（写于1920年，即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年）所提的意见中，全党得知列宁高度评价布哈林，说他是一位理论家。列宁在布哈林著作的页边上批注了许多"说得对"、"说得好"、"好极了"，同时也提了若干批评意见。例如，布哈林写道："财政资本**消灭了**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列宁在"消灭了"这个词的下面加上了着重点，在一旁写上了"未消灭"几个字。

布哈林对当代"财政资本"组织性的这种观点，早在革命前就形成了。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布哈林在他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曾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反对过列宁。在斯大林面前，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可是现在，斯大林竟把理论观点问题提到犯罪的高度，企图用已去世的列宁来反对活着的布哈林。但列宁却给斯大林帮了倒忙。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捧出了列宁，尽管对列宁著作做了许多篡改，但却没有抹掉列宁对布哈林著作的总评语：列宁祝贺共产主义科学院"出版了自己一名成员的卓越著作"（见上述《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显然，斯大林的老毛病"该死的病症——粗心大意和腐朽的客观主义"（斯大林语）又复发了。直至叶若夫旋风之后，他才彻底改掉了这种毛病。从那以后，他不仅着手篡改列宁的著作，也篡改自己的著作（第四版《列宁全集》和第一版《斯大林全集》都是如此，声名狼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更不用说了）。

右倾分子与其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如说对他们同斯大林结成联盟这一致命的轻率行为感到悔恨莫及。

为了更好地了解斯大林这个人，必须同他一起干些罪恶勾当。可是当斯大林的同盟者对自己的轻率行为感到懊悔的时候，已为时过晚。列宁知道，他同意任命斯大林为党的总书记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后悔了，于是写了解除斯大林职务的“遗嘱”，但为时已晚。斯大林这个“三人帮”的引擎，甚至没有允许把列宁写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遗嘱”提交给这次代表大会。

托洛茨基十分清楚，他对斯大林阿谀奉承是犯了一个错误（见《我的生涯》一书）。他没有要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执行列宁的意愿，反而违反列宁的意愿投票赞成保留斯大林的职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想改正这个错误，但为时已晚：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斯大林就开始谴责托洛茨基。“三人帮”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也参与领导这场谴责，但当他们对斯大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很快就发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因此感到悔恨，并想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改正错误，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能召集一次党代表大会来谴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以及唯一支持他们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因此可以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6年结成的“联盟”，不过是一次想扭转无法挽回的局势的过晚尝试罢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都领导过揭发和批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以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当他们对斯大林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才醒悟到他们犯了一个不亚于当年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托洛茨基分子问题上所犯的致命错误，这时布哈林急忙去找已退休（1928年7月）的加米涅夫结成“联盟”，但为时已晚：这时斯大林通过他的机关不仅独揽了中央大权，而且控制了地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谴责“右倾集团”，宣布他们的观点“是与党的观点格格不入的”

（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对斯大林说来只是一个技术性组织手续问题。同年举行的中央十一月全会轻而易举地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其原因就在于此。（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于1930年被开除出政治局）

在斯大林时代，连真理标准也变了。真理完全成了“辩证的”：昨天的真理，今天可能变成谎言；今天的谎言，明天可能重又变成真理。黑格尔有句名言：“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存在的”。要想挤进斯大林的行列，并能在其身边站稳脚跟，就必须掌握黑格尔的真理，而且需要具有一种不大常见的特别“辩证的”品质：热爱斯大林甚于热爱真理。

正是在1928—1930年与布哈林“右倾反对派”进行斗争中，斯大林分子彻底掌握了斯大林“辩证法”的这些规律。他们还掌握了斯大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传授给他们的另一条原则：“在政治上既不能做得过火，也不能欠缺火候。”学生们要求把布哈林立即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无疑是做得“过火了”，因为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心目中，布哈林还如列宁在“遗嘱”中所评定的那样，“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如果把这样一个人物立即抛掉，自己也将受到损害。对这种人需要施用一种准确无误的、折磨人的包围战术，使他感到绝望，最终不得不自己举起双手投降。只有这时，你才能够让他说出一个罪孽深重者的骇人听闻的忏悔，以致在党员群众的愤怒叫喊声中连你本人也不敢宽恕他的罪行：要毫不留情，严惩这个叛徒！烧死这个异教徒！

斯大林只有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1930年）才能制造出惩治右倾分子首领们的这种气氛。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相继走上代表大会的讲台，对他们从未犯过的错误和从未有过的罪行

表示悔改，并且还为“英明的斯大林”以及他的“英明政策”唱赞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在代表大会上这样做了）。此时此刻，他们把过去向党提出的政策说成是给国家造成灾难的政策，他们承认对斯大林的路线和工作的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背叛行为，并且宣布自己是鼓吹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很难使人想象出他们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他们经历了三次革命，为探求社会真理而能多次临危不惧，并曾认为斯大林是集社会上一切恶棍最不道德行为的大成者，可是现在他们却屈辱地当众痛自悔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已不是当年在中央二月、四月和十一月全会上无情痛斥过斯大林的无畏战士，而是一批祈求能够得到“体面的葬礼”的政治死刑犯。“你们胜利了，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了，请你们宽恕，让我们平静地度过余生吧！”——这就是从他们的发言里透露出来的真意。对这批政治僵尸临死前的哀鸣，斯大林是怎样回答的呢？只要援引一下布哈林的老朋友、李可夫内阁的部长米高扬的发言就够了。米高扬的发言使那些抱庸夫俗子观点的人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不该打已倒下的人”。“怜悯”这个概念在这个原神甫的心灵中引起一种病态反应，并驱使他毫不留情地反对自己过去“爱他人”的观念。因此，他开始发言时好似一位法官在宣布法制的宗旨：“捍卫党的总路线，不应有怜悯”。（《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256页）

至于那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悔改的“右倾反对派”的原首领们，米高扬认为给予他们的打击还太少，需要狠狠地加倍打击他们，因为党和反对派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

由于布哈林已被开除出政治局，托姆斯基的命运也已注定。

只有李可夫还留在政治局内并担任政府主席职务，于是斯大林机关把火力集中在李可夫身上。

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委员会派李可夫去向乌拉尔地区党代表会议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李可夫对这种委托极端认真，他赞扬了中央委员会及其路线，而且按惯例把“伟大领袖”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发言之后，代表会议主席团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您是怎样对待党的‘总路线’的？”这个问题把李可夫搞得措手不及，他只证实说，他对斯大林还不够了解。李可夫不但没有理解这个提问，也不清楚为什么派他前来参加代表会议。李可夫的回答便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作者注)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我已说明我投票赞成决议，参加过起草其中部分的决议，无论我也无论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过新的决议，我在政治、经济和苏维埃工作中为实现总路线已工作七个月（即从右倾分子投降之后算起，——作者注），做过消除分歧的工作，如果在这之后还有人问我怎样对待总路线，那末我只能回答一句话：我完全不明白提出这种问题的根据是什么。”（同上，第264页）

斯大林召集的代表大会使李可夫解开了疑团，并告诉他需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李可夫应当简明地回答说：我们右倾分子想“要革命失败，要资本主义胜利”。

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现在终于明白了对他们提出的是些什么要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当众大声忏悔，放下了武器，跪倒在斯大林的面前。看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怀疑布哈林分子的投降诚意，没有任何人不预感到这些昔日领袖们的失势悲剧，没有任何人会因他们今日的失势而不原谅他们昨日的错误。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想象”而已。代表大会没有因为布哈林的痛自悔恨而感到满足。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鞭打至死，不能认为是

真诚的。布哈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径被认为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演出的一出"自杀"剧。

正因为这样，斯大林的忠实奴仆米高扬干脆用下达指示的腔调警告代表大会说："代表大会听取了右倾反对派三个领袖的发言，对他们的声明不能感到满意，……代表大会有充分根据不相信这些同志。"（同上，第256页）

事情果然如此。1930年底，李可夫被解除职务，米高扬成了政府首脑。

看来，代表大会要求的不是演戏，而是要求他们不仅从政治上，也从肉体上真正自杀……可是很快表明，斯大林分子根本不承认这种由于被诬陷而走上绝路的自杀行为是无罪的证明。例如，当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确以自杀来回答诬陷时，政治局发表了一个简短公报，说托姆斯基因陷入反党泥坑不能自拔而自杀了。

在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就是这样粉碎了在人民心目中最有威望、因而对斯大林也是最为危险的反对派——右倾反对派。在通往个人独裁的漫长和艰苦的征途中，斯大林不仅得到他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的帮助，得到忠实于他的"各级党委书记们"的帮助，得到他在策略上做为一个有耐性的谋士和在战略上做为一个极端狡猾的政客的个人品质的帮助，而且得到他的对手们在政治上空前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和稚气的帮助。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会说，怎么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家竟会是笨拙的人，竟会是幼稚的政治家？

如果说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政治不仅是一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艺术，而且是做到一切应该做到的艺术的话，那末只能用一个标准衡量一个政治家的伟大或渺小：这个政治家在夺取权力之

争中究竟取得多少成就。作为十月革命的发言人和国内战争的组织者，托洛茨基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活动家，而斯大林是一个乡下佬；但作为权力机关的组织者和统治者，斯大林是个巨人，而托洛茨基是个门外汉。

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是个智慧超群的人，而斯大林是个粗糙的手工业者；但作为实用主义帝王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剥削者，布哈林是个婴儿，而斯大林是个独一无二的刑事犯。

为弄清党内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主要代表人物的心理状态，只做一名研究苏联历史的史学家是不够的。在这些最终导致斯大林建立暴政的事件中，心地善良的编年史专家有时会对斯大林的对手的笨拙感到无可奈何。十分清楚，斯大林的一言一行，每一个策略步骤，都为了一个目的，即攫取权力。而他的对手们对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前途却模糊不清。十分之九的任务，斯大林是通过反斯大林分子之手完成的。

通常，人们认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中斯大林是个“不显眼的人”，在政治上也是个“平庸之徒”，最多不过是一个“认真执行”别人意志的人。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描述斯大林的。列宁在世和去世后，人们都习惯于这样看待他。不过斯大林甚至在他最亲密的朋友和过去同志的眼中都是个怪物。列宁去世后，这个“怪物”开始崭露头角。斯大林分子对政治、策略和战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党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特殊的“新”型党。为彻底理解并在这种特殊的“新政治”的黑暗迷宫中勇敢地迂回前进，就需要有一种必备的品质：摆脱旧政治的束缚。当然，斯大林懂得“旧政治”，但知道不多，这恰好是他的一个最大长处：他可以少患些政治上的“幼稚病”。在政治角逐中，他不受任何道德陈规的约束。托洛茨基也不认为斯大林是党

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理论方面，他被认为是个一窍不通的人。这也是斯大林的一个长处：他不受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教条束缚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赞成后者的观点。"

在"新政治"和"新型党"中，斯大林既不承认历史回忆中的豪迈情趣，也不承认历史继承性的规律。他把自己将来的打算强加给托洛茨基（在其他条件或其他借口下，他也常使用这一手），说托洛茨基似乎想败坏"老布尔什维主义"，以便从历史上勾掉列宁，确立他自己的伟大。其实，斯大林从内心也不尊重列宁。在"新政治"中，斯大林实行一条"最新的"方针。在这方面他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也许某些崇拜名位的人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根本就不喜欢崇拜名位的人。"（《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14页）①斯大林之所以承认"老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们能成为"新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还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同上，第1—2页）②

我想在这里加一段插话，指出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斯大林当然承认并奖励尊重上级的人，但是只承认和奖励那些拜倒在他一人面前的人。他执政之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4页。——译者注

比列宁还高出一头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有一件事非常能说明问题。1952年出版的尤金主编的《哲学辞典》，间接地把斯大林与列宁做了对比。关于列宁，辞典写道："列宁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关于斯大林，辞典写道："斯大林是天才的理论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只是"最伟大的"，而斯大林是"天才的"。

应当指出，斯大林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受列宁的准则、传统和对列宁"尊重"的约束，这也是做为"新型政治家"的最大长处。

最后，斯大林在理论问题上一窍不通，按布尔什维克对"理论"的旧概念，他算不上是个理论家。

尽管听起来有些离奇，但他在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也是他做为"新型"政治家的一个长处。他既不受马克思和列宁的教条的约束，也不会为未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奥理论而大伤脑筋，他根本不信仰它。斯大林立足于现实。在这种现实里，"社会主义"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为夺取权力，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择手段。

斯大林与列宁有重大的差别。列宁是在与党的敌对阶级做斗争取得胜利后取得了政权，可是斯大林是在同自己的党做不断斗争中取得权力的。列宁还教导说，取得政权只是事情的一半，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任务是保住政权。斯大林也深信列宁的这一教导。为顺利解决这一任务，列宁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先在政治上孤立，然后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斯大林把列宁的这种学说完全搬到自己党内生活中来了——取得政权相对说来比较容易，但只有按列宁的原则才能保持住政权：用政治上孤立和肉体上消灭的办法来对付布尔什维克党内与他敌对的个人和集团。目前，斯大林还是在忙于夺取政权。

为在列宁有生之年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需要首先消灭列宁本人。在这个近卫军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他独有的长处。

斯大林所具有的这些长处，恰是布哈林所缺少的。斯大林分子是正确的，他们从这些长处中看到了斯大林的英明。只需要再做一点补充：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以及斯大林辩证法所向无敌的秘密，恰恰就在这里。在斯大林使用辩证法与反对派做斗争的最初年代，恐怖手段还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在那些年代，斯大林的非凡才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说出需要的话，话一旦说出来，就要一往直前把计划付诸实现，即使这种行为与迄今被认为是“神圣的”各种教条和概念相抵触也不反顾。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动都准确地估计到新上台的党的上层人士的心理。斯大林的这种性格和他崇拜的历史偶像——拿破仑的性格极其相似。

拿破仑成了天主教徒之后说：“我在旺代结束了战争。我宣布我是伊斯兰教徒，因而轻易地进入了埃及。我成了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之后，就把意大利神甫争取到我这边来了。如果我统治了犹太人民，我就要下令恢复所罗门① 教堂。”

与布哈林不同，斯大林不是理论家，这也是他做为“新型”领袖所具有的极大长处。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后来任大臣的儒勒·西蒙证实说：

“在做皇帝之前两个月，路易·拿破仑还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维克多·雨果上了台（1848年会议），但没有成功……罕见的伟大天才爱德华·基内也帮不了忙……政治会议是才华毕露的人最难以取得成功的地方。这里只重视能说善辩，恰到好处的口

---

① 所罗门——纪元前约960—前935年以色列和犹太联合王国的皇帝。
——译者注

才，以及对党而非对祖国的效劳。拉马丁为在1848年，梯也尔为在1871年获得承认，就需要他们作为动力表现出决定性作用。当危险已不复存在，报恩思想也随同恐怖一起消逝了。”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蓬援引西蒙的上述一段话之后说：

“有一些领袖是有知识和有教养的，但通常这对他们弊多利少。文化修养能帮助人们理解一切事物的联系，帮助理解和说明事物，使人变得顺从并显著地减少人对信念的信仰程度。各个时代的伟大领袖，其实一切革命的领袖都是一些才疏学浅的人，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罗伯斯庇尔发言时常前言不搭后语，令人吃惊。当你读他的发言稿时，对万能独裁者的奇异作用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Le Bon,Psychologie der Massen,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51, S.169)①

几十年以后，作家在描述斯大林的生平时，在他的言论和“天才著作”中，不仅看不到一丝的天才的光辉，而且很难发现一个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必备的知识。可是，这样一个人毕竟完全控制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这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中曾有许多人觊觎过列宁的职位。我已列举了我认为斯大林得以成为这部机器的操纵者的一切“主观因素”。现在我需要提前地补充一个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勒蓬也谈到了政治中的类似因素。不过，勒蓬还没有阐述过我想指出的那种现象。可是他为此目的援引的泰恩和施普列尔的言论，与我们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议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同上，第171—174页）

勒蓬写道：“革命历史表明，会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与它

① 勒蓬：《大众心理学》，斯图加特，阿佛雷王冠出版社出版，1951年，第169页，——译者注

的特权完全格格不入的人为的影响。放弃自己的特权，这对贵族说来，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牺牲，但这件事毕竟在举行立宪会议的那个著名夜晚发生了。对国民议会的议员来说，放弃对他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就意味着经常要受到死亡的威胁。可是他们毕竟这样做了，而且不惧怕互相指责，尽管他们十分清楚，今天他们的同事被送上了断头台，明天就会轮到他们自己。正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我所说过的那种无理智的程度，以致任何力量也不能制止他们不受领导他们的势力的影响。”

“他们对所鄙视的东西要表示赞同和予以批准，”泰恩说。“他们不仅赞同和批准愚蠢行为，而且赞同和批准犯罪、杀害无辜者和友人。左派和右派一致积极赞同把自己天生的最高领导者丹东送上断头台。左派和右派一致热烈赞同革命政府的最恶毒的决议。国民议会在热情洋溢的赞美声中，在戴·埃尔布、康东、罗伯斯庇尔的充满激情的示威游行中，一致维护凶手政府的命运，尽管它的党痛恨中派搞凶杀，而山岳派对它则采取蔑视态度，因为它的队伍是由于政府搞谋杀而受到了伤亡。中派和山岳派（少数派和多数派）是以准备自杀而告终的。牧月（法国共和历第九月。——译者注）22日全体国民会议投降了，在罗伯斯庇尔演说之后十五分钟内，它再次投降。”

施普列尔是这样描述1848年会议的：

“争吵、嫉妒和不满变成盲目信任和寄予无限希望，这一切导致了共和党的灭亡。它的厄运可以同它对所有人的不信任相伦比。没有任何法制感，没有任何秩序感，只有无限的恐怖和幻想。它的疏忽大意可以同它的急躁相匹敌。它的野蛮同它的顺从一样，都是极显著的。这些都是不成熟的激情和缺乏教养的特征。任何事物不会使它感到惊讶，只使它莫名其妙。它会战战兢兢地、胆怯地、同时又是不停顿地、英勇地投入战斗，可是一个黑

影又会把它吓一跳。它不了解事物的行为和关系。它很容易灰心丧气，同样又很容易热情起来，它经受了各种恐怖。它有时得意忘形，有时怕得要死。它不知道必要的限度和分寸。它有如流水，能映出各种颜色，接受各种形式。”

过去曾多次列举法国革命同俄国事变的相似之处，但都不如这次列举的情节更能说明问题。请看一下俄国革命的国民议会——三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吧！

（一）1924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

（二）1925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战胜季诺维也夫。

（三）1930年（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战胜布哈林。

布尔什维克国民议会的每一届新班子，都要把上一届中的十月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送上政治断头台：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把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斯大林—李可夫把季诺维也夫及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和“老布尔什维克”把布哈林及布哈林分子；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把“老布尔什维克”送上了政治断头台。在此之后，斯大林把他们统统送到一个地方——卢边卡，以便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我国的马拉提分子、丹东分子、圣茹斯特分子、罗伯斯庇尔分子、“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命中注定要重演法兰西的悲剧，以便在互相残杀之后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永远保存法兰西九月的残酷制度。俄罗斯十月的逻辑就是这样。

列宁孕育的胎儿，竟被斯大林养成个怪物。斯大林的未来暴政的轮廓，直到从政治上消灭了布哈林一伙之后才明晰地显现出来。意志消沉、疲惫不堪、人身恐怖，——这就是党在那些年月的面目。难以忍受、窒息一切、遍及全国的恐怖使人们陷入绝

导　言

一　什么是党治制（ПаРтокРатия）？

早在亚里士多德①时代，人们就知晓三种主要统治形式，即专制、贵族（寡头）和民主统治形式。

最近两千五百年来的法学思想及国家体制的历史表明，在这方面并没有创造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新东西。直至本世纪初，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国家政权，才出现了迄今不被人们所了解的第四种新统治形式——共产主义党治制。如今这种统治形式主宰着三大洲的十四个国家，其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共产主义党治制是一种新的、独特的统治形式，但是它仍能体现出所有三种传统统治形式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的暴政便是专制，政治局专政便是寡头政治，苏维埃体制则是假民主。

1917年的二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民主（人民政权，即全民的政权），而八个月之后发生的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的却是党治制（党派掌权，即部分人掌权）。官方理论说，十月革命不是一党的革命，而是整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按着这种理论来看，十月革命仍属于少数人的革命，因为1917年俄罗斯工业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

“党治制”这一术语，笔者在最近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

①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译者注

(The Communist Partyapparatus,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68)①中首次使用。笔者认为，这一术语能更确切地表达列宁关于共产党专政的理论实质。那本书所探讨的是，党治制是如何发挥其职能的，本书主要分析党治制是如何产生的。

让我们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下国家和法学的历史。

自从人脱离了原始社会，变成——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动物”以后，他就经常琢磨建立一个理想的、有组织的人类社会，这便是国家（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固定的领土、居民，而且也包括统治形式）。如果我们只看有文字记载的西方文明的话，那末我们的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初有道，这道便是法律！”假若在我们文明史的摇篮时期没有一部刻在著名的《十二铜表》②上的古罗马法，那末人类的法学思想还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才能通过二世纪初卓越的古罗马法律创始者（盖·泽尔斯、尤利安、阿弗里坎、波姆波尼、巴巴尼安）达到历次立法活动的顶点——尤斯季尼安编纂的法典（纪元529—534年）！

无论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还是近代和现代的学者，在他们有关法学、法学和国家的哲学论文中，国家性质和国家统治形式问题总是占主要地位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而是西塞罗③，都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人的社会生活天性，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眷恋之情。在近代，由于产生了一些民族国家，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这些

---

① 《共产党组织》，1968年纽约世界出版公司出版。——译者注

② 古罗马法集，纪元前451—前450年间，由特别遴选编制十二铜表的立法者把它写在十二铜表上。——译者注

③ 西塞罗·马克·图里（纪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的杰出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理论却相反认为，国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是孤僻的、追求绝对自由、喜欢混乱。因此应当引导人习惯于相对的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只有人们根据自己的相互利益制定出的一定的秩序才能保证这一点，而国家便是这一秩序的最高体现。由此可见，国家是人的智慧的产物，是同为所欲为的自然法的自然状态（Naturzustand）相对立的。

国家乃是人们谈判的结果。"谈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布斯[①]论证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末日即是国家的开始，因为那时大家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利益都将放弃自己无限的权利。让·雅克·卢梭[②]不同意霍布斯的观点，他说，人在同其他人谈判达成协议时便失去了自然法律状态。人即便是同其他人联合起来，他仍是自由的。"自由是不能收归公有的。"——卢梭说。洛克[③]断言，人即使在自然状态中，也拥有同自由和财产概念有关的一系列权利，然而在此种状态中，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只有谈判才能调整和保障这些权力。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和法学家都强调权利的道德原理，其核心是对公共利益和正义的关切。亚里士多德说，国家能培植人的美德精神，而黑格尔也正是在道德完善方面引进了发展意志思想的最新因素。只有康德与自己的"绝对无上命令"的道德基础反其道而行之，看不到在组建国家过程中道德伦理动机会起什么作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作者[④]认为，法学和国家的最高原则是纯粹的理性，纯粹的理性根本不

---

① 霍布斯·托马斯（1588—1679年）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阶级思想家。——译者注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③ 洛克·约翰（1632—170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④ 指康德。——译者注

包括经验，所以他把“谈判理论”也认作是未经证实的假想。其他德国学者也摈弃“谈判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机体论”（国家——这是上帝造出的“机体”）。

由于几乎所有的法学理论家都同意国家的职能是执行道德法律和关心人民的公共利益，所以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国家的历史职能在于，国家应成为保证“普天安宁”的机关。这离德国的“开明的专制制度”（十七至十八世纪）只有一步之隔。“开明的专制制度”是所有这些理论之中最著名的理论，它一出现，便立即成为现行法律。

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既然国家的目的是保证“所有人的安宁”，因而国家在实行这一理论时需要拥有无限的权力（专制制度）。

当国家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经济、精神、个人生活及其他领域——进行绝对干预时，这种“开明的专制制度”便成为警察国家（Polizeistaat）在实践中所尊崇的理论。

现代西方关于把法制国家（Rechtsstaat）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理论便是对警察法的理论和实践所做的反响。这种法制国家就是各种治理形式（议会制国家、总统制国家、立宪君主制国家）下的一种现代西方民主。民主国家的形式多种多样，这就说明，民主——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死板的公式。根据许多因素和特点——历史的、民族的、地理政治的——每个国家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并促使法制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法典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条件。

但是应当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民主也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在执掌政权的人民和人民主权的代表者议会之间产生了政党这种隔阂。卢梭呼吁要恢复的“直接民主”变成了“间接民主”——政党开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治理。全民直接选

举法实质上也变成了西方政党中权势分子的法律，使他们有权事先就指派出将来的议员，而这些议员候选人要过很久才能在选民面前出现。实际上人民不是选举代表，而是选举政党；选举时所考虑的不是代表的个人品质，而是政党在选举前所颁布的纲领。问题甚至还不止于此。党派成员当选议员后，由于受自己党派纪律的约束，使他在议会通过法律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而只能听凭党派领导的命令。诚然，宪法上全然不是这么说，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说："德国议会议员……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他们不受各种委托和指示的束缚，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第38页）但是，如果有哪一个议员对这一条款恪守不渝，忽视党的"委托"和"指示"，那末下一次选举时，他就不会被党提为候选人，而不经过党的提名就想进议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一位德国的法学教授在研究各政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权体系有如何影响时指出："各政党有权指派负责人，这是联邦治理的通病——从公社到总理办公室（Bundeskanzleramt）均是如此……各政党都不允许自己的周围有另外的上帝。不赞同党的人，就是党的反对者……各政党同'人民'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今天这种距离大概比魏玛共和国甚至比俾斯麦帝国时期还要大。'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是议会民主的基石，这一基石并不是稳固得不可能有人再以人民的名义对这种国家提出异议"（理查德·洛文塔尔和汉斯—培特·史华尔兹，《联邦共和国二十五年》，西华尔特出版社，斯图加特，见文集中威廉·根尼斯教授的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西方民主（政党国家）也带有党治制的某些特点，尽管这是多党统治的特点。

但是，比起苏联的党治制来，这种民主的优越性还是不容置疑

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各政党为了获取选民的信任，彼此间进行竞争，他们不仅在提出自己的纲领时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执政后，在实行相应的改革时也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第二，人们确有从几个政党的纲领中选择出一种的余地。第三，在野党可以通过议会对执政党的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督，以使执政党遵守法律，从而使社会得到保障。第四，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议会，还是执政机关，均处在自由新闻机构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哪一个执政者——从总理到总统，如果滥用自己的权力，新闻机构都不会饶过他们。第五，如果现有政党都不能使你称心如意，那末你可以和你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一个新的党来参加竞选。第六，独立的最高宪法法院也同样在监视着国家宪法的遵守情况及执政机关和议会的活动情况。总之，可以用邱吉尔的话来说明问题：民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形式，但是它是人类迄今所想出的诸形式中最好的一种。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论述是新奇和荒谬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学说可以概括如下：（一）国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化为对抗阶级的结果；（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三）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会产生一个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四）随着各对抗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将消失，它由于不再需要而消亡。

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十分认真地论证说，无产阶级新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举动——颁布生产资料国有化法律——也将是国家的最后一个举动。恩格斯说，现在要管理的不再是人而是物。但是，要想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不是幻想，就需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取得胜利。诚然，一开始连列

宁也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幻想的俘虏。因此，如此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列宁竟在夺取政权之后，天真地把下列几点宣布为自己纲领的原则：（一）在新的苏维埃国家里“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四月提纲》，1917年）；（二）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规军队、没有特权官员的**”新型国家（列宁在1917年4月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三）列宁郑重其事地援引恩格斯的话说：“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执政后，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他也发现自己是天真的。列宁想取缔的常规军队、秘密警察和特权官僚阶层，恰恰是这个独裁国家赖以生存五十六年的三大支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这一不切实际的理论的破产，以及列宁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破产，迫使列宁提出全新的理论，以便论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最高统治者。从1919年开始，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答复，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同“工人反对派”的辩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均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列宁有关这方面的基本论述是数不胜数的。我们只举几个主要的例子。列宁在一本书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每一个有组织的无产者来实现……党要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专政就由这个先锋队实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64—65页）在另一本书中，列宁写道：“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实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

193页）①在第三本书中，列宁写道："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23页）②在第四本书中，列宁写道："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无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一切缺点、任命一切人员和进行一切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342页）③

然而，"党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弄清直接行使"党专政"的那个"先锋队里的先锋队"是很重要的。列宁给我们讲清了什么是"先锋队里的先锋队"，他写道："由大会选举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组织局（现在的书记处。——作者注）和政治局……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如果引号确是列宁加的，那显然是多余的。——作者注）……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这种机构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3—194页）④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3页（本书译者注中提到的书，除注明其它出处外，均指中文版页码）。本书有许多引文同我国流行的版本（中文版或俄文版）的原文相对照有些出入，可能是作者引自另外的版本，也可能是作者引用时作了删节。这里的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7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203—205页。——译者注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这些特点使得布尔什维克的“新型国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极权的党治制国家。

让我们分析一下党治制国家同已知的专制形式国家以及所谓的“极权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吧。把共产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制度同法西斯制度混为一谈，同极权统治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如果你只热衷于总结它们之间的同类现象，那末你不仅会忽视每种制度的本质，而且会忽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作法还会使你忽略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同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一样，是对共产主义行动的反应，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模仿，以便用敌人的斗争手段和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这一模仿比起不寻常的实物来说，总还是一件拙劣的赝品。让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主导因素做一番比较和分析，以便尽可能对上述观点加以说明。先从“极权主义”的定义说起。一般说来，什么叫“极权主义”呢？

苏联的定义是：

“极权国家——是一种公开实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恐怖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当年曾是极权国家。”（《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2版第43卷第67页）

英国的定义是：

“极权国家是指德国的纳粹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和俄国的共产党政府。这些国家的管理权是高度集中的。极权国家里的政党不是被取缔，使是被并为一个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由于强调国家的有机统一而被掩盖。”（Encyclopedia Britanica，

vol.22,p.313,1947)①

德国的定义是：

“极权主义是一种高度追求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集中化、统一化和片面规则化的极端形式。”(Das Fischer Lexikon, „Staat und Politik“,S.294)②

菲舍尔小百科全书也把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列为极权国家。

由此可见，苏联和西方的百科全书皆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极权国家。他们也一致认为，极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独裁、恐怖和反人道的实质。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只有这些是相同的。苏联不承认自己是极权国家，它认为极权国家只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变种”，即西方法制国家的变种（见上述苏联的定义）。与此相反，西方理论家们发现，在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因而从法学角度来说，它们是警察极权国家。

应当指出，在西方文献有关极权的基本定义中，不仅包括极权国家的治理实践，而且包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墨索里尼的理论乃至术语。还不止如此。研究人员发现，被墨索里尼看作理想、目标的东西，现在已成为事实，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可见，共产主义的现实同法西斯的理想已结为一体。如果我们读一读法西斯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述，那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例如，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学说》(《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4卷，引自维什尼亚克的译文，见《社会主义通报》1956年9月第9期第169页。)一文中说，对于这个学说来讲，“一切

---

① 《英国百科全书》1947年英文版第22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 《菲舍尔小百科全书》“国家和政治”分册德文版第294页。——译者注

都包括在国家之中，无论人和精神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超乎国家之外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是极权的，法西斯统治能把一切财富集聚和联合起来，能解释、发展和体现人民的全部生活。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能置于国家之外……

法西斯主义要改变的不是人们生活的形式，而是其内容，是要改变人，改变人的性格和信仰。”

不难发现，墨索里尼把国家同人民对立起来，把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他似乎在篡改和曲解林肯的一句名言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①，以便提出与之截然相反的“人民依靠国家，为了国家，听从国家”的思想。国家置于法律之上（“国家主义论”）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而法治国家（法律置于国家之上）则被看作是软弱和腐败的民主的产物。然而这种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恰恰是当时笃信天主教的意大利（那时官方认为意大利仍是君主国）的理想，而不是现实。在这方面希特勒比墨索里尼捷足先登，可是，恰恰在极重要的两个领域里，即在精神生活和建立极权的、民族化的经济体系方面他远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希特勒（在较大的程度上）和墨索里尼（在较小的程度上）所做到的，只是对国家管理机构实行一党专政，而旧的国家机器并没有被打碎。这种一党专政逐渐对社会实行控制，不过，只有控制是全面的，领导并没有达到全面的地步。只有共产党人才实现了全面领导。

归纳西方对极权主义所下的定义时，可以看出，这个定义至少包含下列几个因素：

（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

（二）对公民实行恐怖的警察监督制；

① 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译者注

（三）一个执政党；

（四）统一的、规则化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

（五）吹嘘社会革新；

（六）吹嘘自己的种族（纳粹分子的种族论和在种族问题上的所做所为；战时布尔什维克对高加索各族人民、克里木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及加尔梅克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苏维埃爱国主义"理论；莫斯科和北京之争中的种族因素；苏联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幌子下所进行的反犹太人主义）。

除最后一项外，所有其它因素皆是共产主义制度发明的（"纳粹主义"是斯大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但是这些因素本身还不能使极权统治形式变成绝无仅有的形式，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的一切专制和独裁制度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些特点。**共产党政权所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新的统治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即党治制，**是由这个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党说了算。**因此党的机关才成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党的意志，它的"权欲"和它的威力几乎象康德所说的一样，是无上命令（但是没有无上命令的道德实体！），**是国家的绝对法律，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如果我们有意展示一下列宁的党治制和民主治理、法西斯制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我们就要说：如果林肯主张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墨索里尼主张的是依靠国家的人民要"听从国家和为了国家"而生存，**那末列宁的主张则是，无论政府、人民还是国家都要依靠党、以党的名义和为了党而生存。**从此才出现了无处不有的"对党的崇拜"。（列宁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党。照共产党人自己下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型党"。它之所以新，乃是因为它有取代国

家和国家机关的独特历史使命，有特殊的内部结构。一方面它是一个有着各级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公开的、有数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党的上层人物和积极分子犹如“党中之党”一般。

按照共产党人的学说来看，共产党不仅仅是唯一的国家执政党，它甚至不只是国家中的国家，它本身就是国家，是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各级正式立法机关只是行政执行机关而已，负责贯彻执行各级党组织的决议和指示，而各级党的组织只是形式上的执行机关。**现今的共产党国家可以不要正式的国家机关而存在，但是要是没有党的机关，它就不能存在下去。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而是主从关系，从而消除了管理中的重叠现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没有打碎德国和意大利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在国家机器中安插了自己的干部。列宁打碎了俄国旧的国家机器，以便用新的党的机器取而代之。这机器就是党治制。

新建的形式上的国家机器——苏维埃，所以能和党机器并存，是因为苏维埃能在技术上帮助党机关治理国家，在政治上又能给党治制披上一件“代表人民”的外衣。

西方极权制度是警察性质的制度，其特点可以大体归纳如下：普遍设置政治秘密警察，取缔公民的一切自由，政治警察凌驾于国家之上，它的惩罚机关有权对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公民做出随心所欲的裁决。总之，政治警察作为侦查和反侦查机关，作为审判和执行机关而独立于国家之外，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相反，在党治制国家里，全部国家机器，这部机器的每一枚螺丝钉，其全部的“传动装置”、思想意识及权力艺术都浸透着无所不包、到处可见的契卡精神。因此，这里的政治警察只是完成职业行政职能的一种函数，是一党统治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诚

然，西方的极权制度对政治、社会及精神生活实行过统一化、规则化，实行过监督。但是，在党治制国家里，不但没有不受监督和规则限制的生活，甚至不受领导的生活也不存在。全面控制只是西方极权主义者的理想，而共产党人已经把全面领导变成事实。他们的出发点也不同：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极权主义者保存了旧的国家机器，使它相应地法西斯化，而共产党人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党的机器；西方极权主义者保留了旧的有产阶级，而共产党人不但把他们从经济上，而且从肉体上全然消灭；西方极权主义者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把它们解散，共产党则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政党。

不过共产主义和西方极权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别乃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即把旧社会连同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原则一齐铲除，在新的经济、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经济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生活。列宁开始的这一社会革命，由于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中断，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又接着搞了下去。这一革命使共产党成了全俄罗斯民族经济的唯一主人。工业和土地的国有化，随着经济国有化而产生的工人和农民劳动的国有化，对内外贸易所实行的垄断，交通工具的国有化，精神生活及学校的民族化——所有这一切也是一种“新型”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党对国民经济实行的史无前例的垄断**被合法化了，在这种垄断下，不是人民，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即党独揽了计划、监督、管理和分配国家财富的权力。由此产生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后果。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斯大林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核心，开始了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实验。这一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人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属性。党自己也不把党对国家财富的垄断看作是目的本身和个别党员发财致富的源泉，而是看作一种工具，看作一座能进行自愿或强迫改造旧人、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工厂。苏联社会的物质分配原则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对社会付出的劳动大小领取报酬，而这条原则的实际贯彻执行是为了促使新试验获得成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的劳动报酬和在社会阶梯的位置取决于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取决于你在贯彻执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所达到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论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莫斯科1949年俄文版第7页）①不仅是统治术的基础，而且是有关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一理论不仅要靠党对经济实行垄断，而且要靠党对政治实行垄断。与马克思不同，列宁甚至强调政治重于经济，他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62页）②这是适用于造就"新人"的理论的，就是说，当经济在党的手中是起间接作用的消极因素时，那末政治，也就是权力，便是起直接作用的积极因素。所以一位苏联法学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就这一问题写道，"在苏联社会中党的权力（政治）对生活，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莫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从前任何历史时代所不可能具有的。"（阿尔扎诺夫：《国家和法的相互关系》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页）他还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1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不仅仅进行外部的、形式上的调整，它要直接地组织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深入到生活内部去。"（同上，第14页）

由于党的政治机关和从属于党的国家机构的这种作用，党治制不仅象西方极权制度那样，做到了对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监督，而且它还进了一步：它直接**操纵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人的爱好和情感**。我们无法在这里分析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即在心理上新制度控制本国人民的有机程度和深度究竟如何，但我们可以说，在组织上新制度只能凭借强大的肉体和精神恐怖机器才能控制本国人民。这也是党治制牢固长存的秘诀所在。

我们说过，新制度不仅操纵着苏联的政治和经济，而且操纵着苏维埃人的思想和感情。这绝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从精神上控制了人民。共产党人操纵着支配人民精神的机关，而且，他们还在精神生活方面创造出共产主义的上流社会，创造了共产主义著作，但是却**没有创造出新文化和新的精神财富**。很多人都说苏联的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不错，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各种人文科学却一概停滞在1917年的水平上。为什么自然科学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没有得到发展？

答案很简单：为了维护**苏联军事机器**（核子物理学、电子学、火箭技术等）的利益，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而人文科学工作者只能撰写有助于巩固**苏联党机器**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列宁提出的"科学的党性"一直是必须遵守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在苏联只能出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撰写的社会科学著作，而且这些著作还必须是为当前党的总路线服务的。

这还意味着，在苏联只能出版这样一些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还没有写成之前，拥护共产主义的结论早已得出了。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代替了艰苦细致的分析；到处可以套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真理代替了科学工作假说；宣扬老朽、陈腐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不可动摇的学说，从而取代了对新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体系和理论的探讨。因此，苏联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名存实亡，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科学的顶峰”，而对其采取批评态度就被认为是犯国事罪，所以，今天生活在原子、电子和宇宙时代的研究人员所宣传和普及的仍是马克思和列宁在“煤油灯”下所写的东西。

党不仅对精神生活实行全面控制，不仅领导着精神生活，而且还把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定为精神创作的题材和方法。这一方法的实质概括起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分子是从党及其现行政策的立场看待和理解过去、今天和将来的。

小说、歌剧、油画、雕塑、电影、马戏都应该运用其特殊手段和“艺术”形象来宣传党的英明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同党的这条规定格格不入的作品是不会见到天日的，既使见到天日，也会被打成“形式主义”和“颓废派”作品，从而被打入冷宫，有时甚至其作者也一起被打入冷宫。

由此可见，西方极权主义只在政治领域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在精神生活领域实行相对的全面控制，而苏联的党治制不仅对苏联人的所有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和活动实行绝对的全面控制，而且实行绝对的全面领导。共产党的行径超过了墨索里尼的国家全面征服人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苏维埃国家本身也被党全面征服了。布尔什维主义领导人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政权拿来同其它极权制度相媲美，而且可以同民主制度相媲美，他们完全有理由说：“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象我们苏维埃政权这样强大

而有威信的政权。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象我们共产党这样强大而有威信的政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31页）①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器。”（见1934年3月30日《消息报》发表的布哈林的文章）

这部机器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允许把它同软弱的和很不完善的类似机器相提并论。所以说，党治制是实行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绝对统治的等级官僚制度，是“党中之党”——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实行统治的官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立法、审判、监督、管理和支配的职权都合而为一，并集中在党中央手中，而管理和支配机关却是重叠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机关，执行机构是各级国家机关。对于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来说，苏联宪法只有形式上的作用，而党机关经常变化的意志才具有绝对作用。

甚至连“党的宪法”——党章，对它们来说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象党治制这样的独裁制度不可能听凭写在纸上的某种法律。列宁在论述布尔什维主义专政时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41页）②这当然不是说，在党治制的活动中，灵机一动占主导地位。相反，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则和法律在准确无误地操纵着党治制这台硕大无朋的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和每一条传动带。不成文的“党机关章程”（同形成文字的“党章”不同）的规则和法律，在本质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这个制度的不同首脑有所变化——如果寡头专政（列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8页．——译者注

宁）占党治制的主导地位，那末党机关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同党分享立法权力；如果是个人独裁者（斯大林）占据党治制的首脑地位，那末不仅党，就连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只有发言权，他们只能在个人独裁的控制下行使行政权力。

苏联的统治形式——党治制，对欧洲、亚洲、美洲（古巴）所有新诞生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一直是个不变的党和国家的模式。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古巴之间的真假分歧所涉及的问题不管有多广，但是有一点，即这些政权的党治制实质，却没有涉及到（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虽然苏联是党治制的发祥地，但是“修正主义者”和“正统分子”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为改变党治制而争吵，他们所争的一是领导权，二是“党治制的主权”。

二 本书的目的和材料来源

党治制的历史即是列宁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

近十年来苏联出版了《列宁全集》，再版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新公布了一系列有关党史和革命历史的珍贵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能使人们正确阐明和重新评价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冲突和列宁的立场。应当指出，苏联历史学家从他们的档案材料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所应该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是相反，他们往往得出与这些材料明显对立的结论。“列宁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中央委员会时时处处按列宁的指示办事，只有几个职业叛徒例外”——这就是党的历史学的正式基调。然而，客观地分析一下苏联自己的文件就会看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是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为争夺党内领导权而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

不贬低列宁在他的党内所起的作用和所占据的地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他在党内所起的实际作用，阐明中央委员会

内部冲突的性质，这便是我的目的之一。

十月革命前，列宁所领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一个极左翼（诚然，有过例外情况），执政后，他领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右翼。在革命中，列宁与他轻蔑地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进行过斗争，并用这个名称强调他们是保守主义者。掌握政权后，列宁同“幼稚的左派”展开了斗争，同那些患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人展开了斗争。甚至连列宁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继承人斯大林，在他与布哈林的右派联合、反对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时，所继续执行的也是那条右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路线。列宁在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冲突中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因为列宁不是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非凡的布尔什维克，他一手拿着马克思的书，一手拿着尼采的书①，而头脑里却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②。

然而，列宁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被自己的创始人折磨很久。列宁病魔缠身，卧床达一年多，但是他仍十分关心党的现状和未来的命运，他曾亲眼看到他的学生和战友们为了争夺他的政治遗产——权力，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列宁还以明察秋毫的政治家的敏感，准确无误地预见到斯大林将成为他的党的掘墓人。他的“遗嘱”——列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写的关于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信以及他给斯大林个人的绝交信，便是由此产生的。但是，“列宁的近卫军们”自找苦

---

① 尼采·弗里德里希（1844—1900年）是德国反动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非理性论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② 马基雅弗利·尼科洛·地·伯纳尔多（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马基雅弗利主义是不择手段的，即采取罪恶手段也在所不惜的政策的同义语。——译者注

吃，他们不相信垂危导师的话，他们所信任的是蒸蒸日上的“总书记”。努力揭示列宁的继承者们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揭示这一斗争的内幕，这是我的第二个目的。

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政党能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简直是按着自己的“时间表”（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四月提纲》、《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圆满、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夺取政权。但是历史上也不曾有一个政党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掌握政权后便随随便便地、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党是列宁缔造的，是被斯大林扼杀的，但是斯大林是借助从列宁手中继承下来的武器将党扼杀的。作为一个策略家和战略家，斯大林不仅无法同列宁相比，也无法同托洛茨基相比。但是作为玩弄权术的行家来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斯大林。我发现，斯大林所以能在通往个人独裁的道路上取得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就，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运用起列宁主义的外科器械来，比这些器械的发明者本人还熟练。斯大林没有给列宁的武库补充一件新东西，但是在完善和运用列宁的武器方面，他却开辟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新时代，因为他给布尔什维克“权力学”增添了货真价实的新成分，即为取得个人权力所使用的罪恶手段和支配这种权力的罪恶制度。党寡头政治的列宁专政受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中央委员会也位于列宁之上，而代替列宁专政的斯大林独裁却监督和驾驭起中央委员会来。这一点是通过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搞政治谋杀，在列宁逝世以后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的，总共只用了五年时间（1924——1929年）。其实，这还不能算作谋杀，确切地说，这是自杀，并且不是一举完成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不是斯大林动手的，而是各部分彼此杀戮，直到列宁中央委员会的人已所剩无几才停止。可悲的是斯大林正是幸存的人。但自杀是斯大林操纵

的，而且这些自杀的人当时还没有醒悟到这一点。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得承认，斯大林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了把刑事艺术同政治相结合的突出成就，从而使他成为列宁遗产的自然而然的继承人，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是打着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旗帜去接受遗产的。当然，从心理学上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相比，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列宁是俄国的世袭贵族，是一个受西方政治书籍熏陶的人，斯大林则是一个破落的鞋匠的儿子，受的是愚昧和落后的亚洲教育。虽然列宁自己不会搞犯罪活动，但是他经常委托斯大林搞，无论是革命前（在高加索搞"剥夺"），还是在内战时期（例如，1918年在察里津指挥集体屠杀），都是如此。

列宁虽然否认政治斗争中有任何全人类的、"非阶级的"道德，但是由于出身所限（"存在决定意识" 1 ），他没有摆脱沉重的"资产阶级贵族偏见"的包袱，例如，对人格、义务、忠实等概念的理解，有时甚至对自己的政敌（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公爵）也信守这些概念。而斯大林在政治上对所有人都一律用阴险、不讲道义的态度对待，无论是对党内的战友，还是对自己的学生皆是如此。当斯大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枪毙"人民的敌人"时，列宁赞赏斯大林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当斯大林在党内运用起列宁的"阶级道德"时，他的所作所为便引起了列宁的沉思。据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有一次列宁讲：斯大林"缺乏最起码的、最普通的人的诚实。"（L.Trotsky, Stalin, p.375）①他不仅说，而且还做了相应的结论（《遗嘱》、《论自治》一文、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

正是斯大林的这种丝毫不讲人格的作法，使他利用列宁的"道德规范"（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自己导师关于撤销

① 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英文版第375页。——译者注

"不忠实的"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意愿），战胜了列宁，战胜了争夺列宁宝座的诚实对手们。一个历史学家，即便他手头除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之外，再没有别的材料，那他也是可以说明斯大林是一个天才的、政治上的刑事犯，国家本身将他的刑事罪合法化了。刑事犯罪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斯大林主义。

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组织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一条最基本的结论，这条结论可以概括如下：老的，独断专横的，然而是搞政治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列宁一起死去了。从斯大林起，开始了新的，独裁的，然而是搞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纪元。

指出斯大林的搞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根源、历史形成及其在苏联获胜的规律——这是我的第三个目的。不管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怎样绞尽脑汁，力图证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严酷刑法并不是党治制本身的产物，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似乎也只是"歪曲""列宁原则"的结果，但是笔者在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应当到列宁极权的"权力哲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例如，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第二，应当到这一专政的组织独裁制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认为，"无产者"本身不能直接实行专政，而只有他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我在另一本书中把这一制度称为"党治制"）才能实行；第三，应当到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分子（著名的高加索"剥夺分子""战斗队"——他们是在柯巴—斯大林和卡莫—特尔—彼得罗相领导下于1905—1912年间搞暗杀"敌人"、抢劫银行、商店、邮局的恐怖分子）的罪恶历史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第四，应当到斯大林本

人罪恶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向斯大林教授了一条列宁“权力哲学”的主导原则，这是一条关于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斯大林学得很好：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41页）①

列宁甚至提示斯大林说，需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的专政。当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批评起他们党的正式领导人，说他们企图建立“领袖专政”来取代“群众专政”时，列宁回答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同上，第189页）②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已经把列宁的这两条原则当做解释列宁主义的根据了（见《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116、128页）。③斯大林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避而不谈列宁在1920年归纳的第三条列宁主义的主导原则，以便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秘密，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这条原则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一长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19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④

斯大林还通过列宁借用了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并恰恰用它摧毁了列宁的党和国家机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考虑是正确的，他认为只有搞垮党内有思考能力的人，并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剩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才能建立起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199页。——译者注

③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46、151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6页。——译者注

列宁指出的独裁统治和一个领袖的专政。

在实现这一目的时，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在党内实行“特别戒严”（这种状况被称之为“党的团结一致”）的决议案在斯大林手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在主张一丝不苟地执行关于在党内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的“列宁原则”时，他的做法及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仍然超过了导师。斯大林发现，模仿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远比列宁的主张更为合乎逻辑，他们不仅把大规模的恐怖作为治理人民的基础，而且也作为治理本党的基础。不同思想还没有形成之前，甚至还没有露头之前就要对它提出警告。由此才产生了斯大林的下述理论：在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时，潜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军不断增长。于是他搞预防性的恐怖措施，以便对付这些潜在的“人民的敌人”。

在这方面希特勒给斯大林上了一堂示范课，他给斯大林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主意：不仅要谋杀反对派的活动家（施列赫尔将军），而且要谋杀以列姆为首的亲密战友们，其罪名是搞“阴谋”。不言而喻，其实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搞过阴谋。五个月之后，斯大林暗杀了他的密友、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并从此开始给老布尔什维克们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将领们罗织一系列“阴谋”罪名，以便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但是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超过了希特勒，他能迫使这些受害者自己诬陷自己，迫使他们承认搞过莫须有的阴谋、暗杀、间谍活动、破坏活动，而且其细节竟编得如此维妙维肖，以致局外人会真地相信斯大林所整肃的列宁的党，是由阴谋分子、暗杀分子和间谍所组成的。

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资本主义、反民主、“民族社会主义”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国沙文主

义、无神论、崇拜“领袖”和“元首”）和在统治方法上（在不断搞肉体恐怖的情况下实行极权的警察专政）变得异常相似，以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头子们完全有权声称，在同民主西方进行斗争时，他们的世界观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可以停止一切意识形态之争。

1939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所签订的条约是布尔什维主义蜕变为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的合理结局。据意大利外交部长契阿诺说，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首的政治局为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所举行的宴会结束后，里宾特洛普说，在宴会上，他“感觉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犹如置身于党的老同事之中”。（A·Rossi, Russian-German Alliance 1939—1941, Beacon Press, Boston, 1957, p.71）①这是绝非偶然的。宴会后的第二天，里宾特洛普洋洋得意地向希特勒报告说，礼仪上没有规定的话斯大林在干杯时也说了。斯大林说：“我知道，德国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想为他的健康干一杯。”（„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pp. 6—7, 19……）②。这不是一国政府首脑对另一国政府首脑的普通的礼节性外交祝酒，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是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这是“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对“德国人民的领袖”的祝酒，是苏联法西斯头子对德国法西斯头子的祝酒。

两种法西斯主义彼此间达成了如此的谅解，以至于斯大林通过他的忠实走卒、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之口说出了下面一

① 罗西著《1939—1941年间的苏德同盟》英文版第71页，波士顿毕肯出版社1957年出版。——译者注

② 《1939—1941年纳粹与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英文版第6—7，19……页。——译者注

段确有“历史意义”的话：

“同其它一切思想体系一样，对希特勒主义的思想可以承认，也可以否认……但是，任何人都明白，不能用暴力消灭思想，不能用战争来根除它。因此，**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罪过的。**”（1939年11月1日《真理报》）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专家墨索里尼所说的话了，他在1939年10月断言：

“**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见罗西上述著作第77页）

我们知道，不是斯大林而是希特勒背叛了斯大林一希特勒同盟。斯大林对希特勒深信不移，对他情同手足，因此他完全有权称希特勒对他的进攻为“背信弃义”！斯大林正是这样说的，对这四个字也应做如实地理解。希特勒毫无理由地毁掉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但是，斯大林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答案要到另一个问题中去找：列宁是不可避免的吗？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客观因素的巧合使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必然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将在专门的章节详细加以论述。这里我们只指出列宁、斯大林及其敌人的一个一致的看法，即如果临时政府退出战争，立即宣布有利于农民的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取得政权。那样的话，可能只有少数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人才会知道列宁，至于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然而，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主观因素方面的问题，即革命中列宁党的机器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心理假说提出的。

政治是一个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如果这些未知数能事先算出，那末人类的历史虽然是和谐的，但因失去了内部的紧张性而

会变得枯燥异常：数以千计的国王、君主、暴君还没登极就会拒绝坐皇帝的宝座，为的是不致死于非命；几百次战争也不会发生；为了避免灾祸，几十次有组织的革命根本不可能爆发，以免这些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我敢断言，如果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事先知道胜利之后有什么在等待他们，那末十月革命同样也不会发生。那末，让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的“父与子”们的命运吧：

领导过十月革命的二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三人被敌人打死（П·А·贾帕里泽、М·С·乌里茨基、С·Г·邵武勉），五人在斯大林实行专政前自然死去（列宁、Ф·Э·捷尔任斯基、В·П·诺根、Я·М·斯维尔德洛夫、Ф·А·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两人因斯大林而自杀（А·А·约费、Н·А·斯克里普尼克），三人失宠被黜（М·К·穆拉诺夫、Е·Д·斯塔索娃、А·М·柯伦泰），十五人被斯大林枪毙（Я·А·别尔津、Н·И·布哈林、А·С·布勃诺夫、Г·Е·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А·С·基谢廖夫、Н·Н·克列斯廷斯基、Г·Е·洛莫夫、В·П·米柳亭、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А·И·李可夫、Е·Т·斯米尔加、Г·Я·索柯里尼柯夫、Л·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奸细杀害、В·Н·雅柯夫列娃），第二十九个人便是斯大林自己。

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十月起义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三十名领导人中（中央委员除外），七人是在斯大林专政之前就死去或被杀害的（阿瓦涅索夫、古谢夫、叶列梅也夫、拉齐米尔、萨多夫斯基、斯克梁斯基、丘德诺夫斯基），一人因斯大林而自杀（拉舍维奇），二人失宠被黜（波德沃伊斯基、萨莫伊洛夫），十八人被斯大林枪毙（安东诺夫—奥甫谢因柯、安采洛维奇、鲍基、戈洛谢金、迪宾柯、扎鲁茨基、卡拉

汉、克德罗夫、克雷连柯、拉齐斯、梅霍诺申、涅夫斯基、帕甫卢诺夫斯基、佩捷尔斯、波泽尔恩、翁什利赫特、楚巴尔、尤列涅夫），只有两人是幸存者（马努伊利斯基、莫洛托夫）。

第一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十六名委员中，四人死于斯大林专政之前（列宁、诺根、卢那察尔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十二人被斯大林枪毙（阿维洛夫、迪宾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П·А·柯鲍泽夫、克雷连柯、洛莫夫、米柳亭、奥甫谢因柯、李可夫、泰奥多罗维奇、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

国内战争时期的十六名红军前线司令员，三人属自然死亡（В·Н·叶戈里也夫、П·П·列别捷夫、А·А·萨莫伊洛），一人被布尔什维克打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М·А·穆拉维也夫），一人下落不明（В·В·雅柯夫列夫），一人由于斯大林强迫做手术而死亡（季诺维也夫分子伏龙芝），十人被斯大林枪毙（安东诺夫一奥甫谢因柯、Р·И·别尔津、В·М·基提斯、А·И·叶戈罗夫、Н·Н·佩京、М·С·斯维奇尼柯夫、П·П·塞京、М·Н·土哈切夫斯基、В·И·绍林、集团军司令И·Э·亚基尔）。

三名苏俄全军总司令中，两人被斯大林枪毙（Н·В·科雷连柯、И·И·瓦采季斯），而第三名死后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С·С·加米涅夫）。

甚至经过三次清洗的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仍有九十八名老布尔什维克（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被斯大林枪毙。

如果所有这些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司令员事先知道，胜利后不但他们本人要被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杀害，而且这个制度还将堕落为史无前例的个人独裁的暴虐制度，那

末，他们根本就不会起来革命。可能有人会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反驳我的这一说法：1940年2月托洛茨基在"遗嘱"中写道，如果他能有第二次生命的话，就一定再重复一遍他今世的生活，并且说，他过去是个革命者、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要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死。1940年3月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遗嘱"中补充说，他保留用自杀的办法来确定自己死期的权利，但是他预感到他的死期可能由斯大林来确定，所以托洛茨基补充说："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下死，我都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Trotsky's Diary in Exile, p.1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①

另一个例子是：1937年6月11日传奇式的红军将领И·亚基尔在临刑前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

不言而喻，象托洛茨基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有别种写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种想法，何况他又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何等命运。但是，如果在1917年10月24日那天能对托洛茨基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夺的政权将会落入你们党内一个要把你杀死的人的手中，他要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制度，要杀死你的孩子，要把你所有的同志连同所有"列宁的近卫军"一道统统枪毙，最后，当你被驱逐国外后，他还要用十字镐敲碎你的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还同意搞革命，夺取这个政权呢？如果说托洛茨基对1917年10月24日提出的这个问题仍会做肯定的回答，那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人。

至于说亚基尔，从心理上来看，没有任何一点迷糊，"斯大林同志万岁！"在他说来只意味着一点："我在斯大林面前也没

---

① 《托洛茨基的流放日记》英文版第166页，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有一丁点儿错，可见，斯大林是杀害我的凶手。”据赫鲁晓夫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契卡的刽子手向斯大林汇报亚基尔死前所说的话后，斯大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他还把亚基尔骂了一通。

现在讲一讲本书的材料来源。

我的主要材料来源，是苏联党的文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反对派的文件，各种有关革命历史的文献，官方和反对派的出版物，党的历史学家的某些学术著作。我的所有主要结论都是依据党的这些文件做出的。只有在党和党的活动家的有关文件在苏联没有发表的情况下，我才引用西方的著作（美国、英国、德国和俄国侨民的著作），在西方，这些著作早已被当作学术论文。德国外交部关于资助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件也属于这一类。官方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党史教科书我引用得最少。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从来没有写过而且将来也写不出一部科学的、客观的自己党的历史。如果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写信（1931年）以前还出现过一些有价值的党史著作和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那末斯大林写了这封信之后，苏联共产党历史这门科学就完全被取缔了。

斯大林把所有过去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书皆宣布为“托洛茨基的私货”，其中甚至包括列宁曾给予很高评价的书（例如，约翰·里德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还为之写了前言），并决定亲自写一本党史。结果臭名昭著的《简明教程》出笼了，这本书作为学术著作一钱不值，而在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方面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38年中央委员会正式做出决议，宣布《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历史学的顶峰”，二十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在苏联起着共产主义圣经的作

用。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仍是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其成员也与1938年相仿佛，只是没有斯大林，却承认《简明教程》根本不是什么“百科全书”，而是蓄意“伪造党的历史”，是崇拜斯大林的“顶峰”。

斯大林受批判后，所谓的“党史学”也恢复了，其研究对象是苏联共产党和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然而研究这门科学的方法、原则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一套。因此，对党和俄国革命一无所知的人正是“党史学”的候补博士和博士。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华，相反，他们之中很多人有才能，甚至是些杰出的人，但是，他们所学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冒充科学的骗术和党的萨满教的大杂烩①；他们研究历史时所用的材料并非是真正的历史性文件，而是他们编造的假材料。这些假材料编得很巧妙，以便使党的未来的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的政论著作。

不仅如此，甚至连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列宁近卫军”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著作对党的历史学家来说也属于禁书，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书就更不用说了。一千五百万党员每天在党校都能听到这些“异端者”的名字。但是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师，没有一个人明白为什么列宁的战友和朋友会成为斯大林眼中的“异端者”，会成为希特勒的“间谍”，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人的生平，《苏联大百科全书》不介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的生平，但是对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思想毫无二致）等人的生平却做介绍。党的历史学家所能引用的唯一历史

---

① 萨满教是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最为发达的一种宗教形式；相信有灵魂。——译者注

资料是列宁的著作，但是他们从列宁的著作中所引用的也只是一些与党的目前政策相吻合的东西，而对那些和目前政策相抵触的东西则避而不谈。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过，斯大林分子如何利用下述理由来回避列宁著作中不利于他们的话：

“不要过多地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在他的著作中什么都能找到，就象雅柯夫大叔什么货都有一样，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引用列宁的话呢？”（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明目张胆地曲解列宁的本意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在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和波斯佩洛夫主编的七卷集《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对《给代表大会的信》，即列宁的“遗嘱”，以及对他的《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一文所做的粗暴的、反列宁的解释，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和本意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例证）。

他们的另一个材料来源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是不经常指出斯大林的名字。党的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列宁提出的和斯大林阐释的“科学中的党性”原则。这一阐释的实质可以归纳如下：在分析和评价一切事物、范畴、现象、事件和人物时，要从现阶段党的政治总路线的利益出发。所以，拿苏联历史学界元老波克罗夫斯基的话说，在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昔日被推翻了的政治”。因此，他们能用“现在发生的事阐明历史事实”，这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谈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时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不能把所有现在发生的事都用来阐明历史事实。对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事实，他们索性宣布没有发生过，这也是为了迎合那条“科学中的党性”原则的需要。

总之，“避而不谈”是党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手法。如果某些

事件非常引人瞩目，回避不了，那他们就在解释时随心所欲地编造事实。例如，在谈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不得不提及托洛茨基的名字。于是他们提了他的名字。但是，他们是如何提的呢？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苏联科学院院士，过去为斯大林撰写《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充当秘书的明茨，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十月革命》一书中是这样描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

“虽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起义的决议，但是他没有做起义的实际准备工作，并且没有参加任何起义计划的制订工作。”（1967年俄文版第2卷第954页）

但是明茨的导师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在《真理报》上写道：

“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皆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这样快地转向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搞得之所以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1918年11月7日《真理报》）

苏联所有历史教科书在谈到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时，都千篇一律地说：托洛茨基一贯背叛、出卖和破坏红军的胜利果实。而且，党的历史学家们竟然不为自己缺乏起码的政治逻辑感到羞愧：“明察秋毫、无所不知的天才”列宁怎么会容忍这样的“叛徒”、“奸细”和“破坏分子”做红军的首领呢？

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也是反科学的。一般说来，在开始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研究人员要给自己拟定一个工作假说，或者拟定一系列的假说，认真搜集所有资料，不仅搜集对自己的假说有利的资料，而且也搜集与自己的假说相矛盾的资料，然后把

资料分门别类，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只有在这之后，研究人员才能给自己提出具体的目标，才能着手写作。著作完成后，它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与最初的假想截然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中的党性”原则不允许这么做。党的历史学家还没有着手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就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他们只不过从列宁的著作或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抄几段语录，然后再搜集那些能印证这些语录的事实材料罢了。

斯大林死后出版的有关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学术著作也大都如此。布贾洛夫教授撰写的有关1917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历史以及库兹明教授撰写的有关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作用这两部有价值的著作，是个例外。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从二十大以后，也出现过许多有关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赫鲁晓夫倒台后，几乎再没有这样的书问世。

新领导时期出版的六卷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貌似巨著，其实也不过是一本斯大林的《简明教程》而已，只是篇幅拉长了，搞了六卷八分册。当你读这部《六卷集》时，你总觉得是在读一种早已熟谙的东西，而当你再进一步回想一下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你读的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斯大林的著作。不仅《六卷集》作者的构思，而且连论据也是从《简明教程》和《斯大林全集》那里抄来的。在《六卷集》中，我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新文献，没有发现一个新奇的想法是我从前在斯大林的书中没读到过的。原以为，象这样一部精心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巨著，一定会把四十年来或是五十年来的（1919 — 1930 ……）中央全会记录做为学术资料收进去，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些记录还作为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材料加以封存？